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道路探索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道路探索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七卷　道路探索

主　编： 齐鹏飞　杨志军

副主编： 杨凤城　丁玉忱

编　者： 樊丹丹　李　艳　李　慧　陈雪梅　陈　晴
李向前　张　军　孙大伟　曾　涛　张　强
于国宁　杜　夏　王　瑶　高广旭　杨　晓
莫　雷　林德洪　张　旗　徐东海　王景丹
李秦阳　李月清　高立民　李金荣　李　燚
李琦光　李璐玮　丁玉忱　王月前　李小乐
洪　石　杜　蒲　刘志男　李瑞华　李丹慧
苗　棣　胡茂桐　徐小宁　袁　熹　黄　明
王建军　王铁梅　张　明　丁　伟　孙建国
杨立新　耿大明　叶心瑜　柳建民　汤应武
王杰之　王　蓓　李　蓉　王　涛　余传东
王加祥　毛艳辉　付丽英　王　磊　冯国根
赵　阳　梁丽娜　董　智　付春林　江春林
李　敏

统　稿： 陈东林　杜　越

目　录

第二章 中苏关系的新发展

第三章 中共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

第六章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探索

第七章　政治上“左”倾错误的继续



三大改造完成

1953 年 9 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过渡时期总路线标志着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正式提出了三大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全面的展开。到 1956 年，新中国仅仅用了 4 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亦称农业集体化。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和形式，从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一步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 1952 年底，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以草案的形式发给各地党委试行。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 1952 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 830 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 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 600 余个。

第二阶段是 1953 年至 1955 年上半年，初级社在全国普遍建立和发展。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社从试办进入发展时期。1954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参加农户达170万户，大大超过了中央提出的数字。到1955年7月，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

第三个阶段是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时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总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也采取了类似农业的形式，根据积极引导、稳定发展的方针，通过合作化道路，把个体手工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

个体手工业是以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从事商品生产的一种个体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统计，全国个体手工业从业人数两千多万人，其中独立手工业者800万人。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1%，农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很大部分来自手工业。因而，新中国在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个体手工业也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决定逐步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和逐步过渡的步骤，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对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中共中央开始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创造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营代销到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对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分别采取“四马分肥”和“定息”的利润分配政策。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底以前，主要是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初



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国家在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定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实行经销代销、代购代销等，这是国家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企业外部的一种合作。

第二阶段，1954年至1955年下半年，除继续发展初级形式外，开始转入重点发展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到1954年，公私合营企业已占到大型私营企业的85%以上。到1955年京、津、沪等城市一部分行业先后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第三阶段，1955年秋至1956年，是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并迅即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经过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企业已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1956年1月，北京首先宣布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接着，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等大中城市相继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采用定息方式，即按照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共23亿余元）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共发10年。这就使得私股与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相分离，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运用。定息停付后，企业就完全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包括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使剥削者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至此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在中国破天荒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开创了社会历史的新时代，我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到1956年底，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公有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一次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历史性转变。据1956年资料显示，在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占32.2%，合作社经济占54.4%，公私合营经济占7.3%，资本主义经济下降到0.1%，个体经济则下降到7.1%。这就是说，将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

和公私合营经济三者合计，整个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达 92.9%。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 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 32.5，资本主义工业下降到接近于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和供销社商业占 68.3，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社商业占 27.5%，私营商业则下降到 4.2%，这就是说，在商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达到 95.8%。这表明，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三大改造胜利完成带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变化的同时，也必然引起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在建国初期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势力、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剩下的剥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阶级，由于其赖以存在的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也正处在消亡的过程中。由此，真正意义上地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的历史。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是在没有产生较大社会震荡的情况下，通过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顺应时代的需要，完成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使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东方大过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也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②

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三大改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生产力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合生产力水平，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由于三大改造的基本顺利完成，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之下，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多数指标，到 1956 年底都已经提前完成，到 1957 年底，一五计



划的各项建设指标大都大幅度地提前超额完成了。五年间，国家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于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的1.9倍。1957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递增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210%，平均每年递增25.4%，消费资料的增长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递增12.9%。其中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也十分迅速：1957年我国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是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是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1957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递增4.5%。粮食产量达到19 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递增3.7%；棉花产量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递增4.7%。③

同时，一大批新建改建的企业相继投入生产，一大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发电、冶金、矿山设备、重型机械、精密仪表制造，以及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制造、基本化工、国防军工企业也纷纷建立了起来。由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按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当时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提高。

由此可见，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国建立起了与在一定程度上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三大改造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创举，也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大改造的完成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以和平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将资本家的私有企业财产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除了可以采取剥夺的办法外，也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逐步地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倘若无产阶级不用暴力手段，而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家的财产国有化，那是无产阶级最便宜不过的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设想并提出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赎买政策的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列宁的方案未得到很好实施。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改造方式，在农业中的改造中放弃了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观点，采取了在现有基础上实行由初级的生产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规模比较大的生产互助合作社的改造方式；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创造性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实行赎买政策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理论贡献。

此外，我们在充分认识到三大改造伟大历史功绩的基础上，还应该注意到三大改造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差。对于这些缺点和偏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④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工作中，这些缺点和偏差对生产力的更好地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例如：在农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过大，并且以社为核算单位，搞平均主义，挫伤了一部分社员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同时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太大也不便于领导，不便于经营管理和民主办社。在工业方面，由于追求改造的速度和规模，不适当地搞"裁、并、改、合"，过多过急地改变了企业原有的生产经营秩序，打乱或中断了原有的协作关系，影响了企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在商业领域，盲目追求大店，商业网点过于集中，没有很好地照顾消费者的需要，给居民的消费带来不便，影响了产销关系。在手工业方面，同样由于"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造成不少手工业供销失调，生产下降，产品的花色品种减少，社员收入下降等情况。对于这些情况，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发现问题后很快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纠正这些"缺点和偏差"。

当然，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差，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伟大功绩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进行前人没有进行过的开创性事业，社会变革又极其广泛深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来讲，不可能完满无缺。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才得以建立起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得以大规模地有序地开展起来。尽管在国际上有反华势力的敌视、干扰和封锁，在国内我们自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过失误，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左"



倾错误。在经济建设几乎限于停顿的情况下，到 1978 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8 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煤炭突破 6 亿吨，原油突破 1 亿吨，发电量突破 25 000 亿度，钢铁突破 3 000 万吨。1978 年的主要农作物产量，粮食突破 3 000 亿公斤，油料突破 1 亿担，棉花达到了 2 167 亿公斤。到 1980 年，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都受益于三大改造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这些成就，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就曾公正地指出："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 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农业占 64%；而到 1975 年这个比例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 72%，农业则仅占 28%。"⑤

1981 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三大改造作出了相当中肯的评价："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⑥

注释：

①《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53～254 页。

②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 页。

③《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37～338 页。

④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8 页。

⑤余飘：《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42～243 页。

统战工作的新成就

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不同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为此，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曾将统一战线作为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历经 28 年的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吸收和借鉴了以往的统一战线思想，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并最终取得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新成就。

1953 年 9 月，毛泽东提出，中国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必需的，而且要继续下去。毛泽东还特别论述了工农联盟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工人阶级有两个联盟、两种合作。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中，头一个联盟为后一个联盟的基础。没有头一个联盟，我们就没有力量。必须依靠工农联盟，才有力量去联合和改造那些剥削分子，那些人才会来。"

针对统一战线的不同对象，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配合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的方针和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农民的方针政策。



在贯彻落实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在 1953 年 10 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党中央系统总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确定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原则和步骤。党中央强调要实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农业合作化必须贯彻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对农民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只能引导、说服和教育，使他们自觉自愿地走上合作化道路。为了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创造了从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社会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逐步过渡形式，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形式，“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在农业合作化中，党制定并贯彻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包括新老下中农），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对富农采取由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把消灭剥削阶级和改造剥削阶级结合起来，这就使农业合作化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和政策。

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在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培养了大批拥护党的领导和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分子，带动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3 年 10 月，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正式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团结民族工商业者为主的统一战线组织。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党和毛泽东提出用和平赎买的方式，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上纳入到国家计划上来。第二步主要实行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企业在分配利润时实行“四马分肥”，按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费、资本家红利四个方面进行分配。第三步是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对企业实行定股定息的政策，即把资本家的利润限制在一定的息率上，统一规定年息为5%。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对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两个方面，需要结合起来进行，以达到阶级要消灭，人要改造的目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同时，党提出对资产阶级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以企业作为对资本家进行自我改造的基地，对资方在职人员和资方代理人采取“包下来”的方针，坚持“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使他们各尽其职，有职有权，人尽其才。通过改造阶级成分的方式达到从整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实现了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的相结合。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参加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至此，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三，对知识分子的方针和政策。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知识分子日益显示其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1954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文教、科技方面的统战工作也列为统战部门的工作重点。切实解决知识分子中的问题，已提到中共中央议事日程上来了。1955年11月，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部长座谈会上，从知识分子的生活来源与政治立场相结合的角度，提出非党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将变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论断。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周恩来提出三项有力措施：首先，应该妥善的使用和安排他们，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其次，应该充分了解所使用的知识分子，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最后，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的工作条件和适当待遇。会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要求克服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充分发挥知识分子



的作用。广大知识分子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周恩来的报告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欢呼："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

第四，对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方针和政策。

为了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能继续充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1953年6月，中央统战部制定了《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两个文件，提交于6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形成了《关于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的意见》，并于4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该文件提出：人物安排，应以全国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政协委员会等方面通盘考虑，适当安排，尽量减少兼职，以便提拔和吸收一批新代表人物，扩大阵容；民主人士在省、市人民代表中的比例，省可占到30%，市可占到35%；要注意吸收一批文教科技人员，适当吸收私营工商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有代表性的妇女。

1954年9月15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在1226名全国人民代表中，共产党员668人，占54.48%，非中共人士共558人，占45.52%。常务委员会的79名委员中，中共党员40人，占50.6%；党外人士39人，占49.4%。人大常务委员会的14名委员长、副委员长中，中共党员6人，占44.4%；党外人士8人，占55.6%。李维汉同志指出："中央对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原则、比例，以及对国家领导人员的安排，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体现了党与非党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了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使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更加健全和完备。"

李维汉同志指出，从1953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这一期间，在我党领导和帮助下，各民主党派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主要作用可以归结为"参"、"代"、"监"、"改"四个方面：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协商、决定和执行；代表它们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协助国家适时地调整阶级关系，促进多党合作的发展；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中共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和建议；推动和帮助他们的成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使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都有较大的提高。所有这些工作，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

派的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的问题，肯定地指出：“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第五，民族和宗教的方针和政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问题，坚决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但是，怎样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党的民族纲领是强调民族自决权，主张实行联邦制。党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经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特点和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运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民族理论，从我国各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建国前就决定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1947年5月，中国第一个省级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民族区域自治区作了明确规定。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区实施纲要》。按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省一级的自治区，地区一级的自治州，县一级的自治县或旗。除这三级外，还有乡一级的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除了享有一般地区的权利外，还享有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例如：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

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我国国情，它促进了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

此外，我们党十分重视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毛泽东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强调，要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1951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中，强调要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干部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



务。1951 年 11 月 24 日政务院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一项战略措施。党和政府普遍而大量地培养民族干部，从而使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脱颖而出。1951 年，全国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5 万多名。1953 年，已逾 10 万多名。1956 年，更是达到 20 万以上。这些民族干部成为党联系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广泛团结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并且制定和执行了适合少数民族情况的方针政策，使绝大多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感受到党的关怀，并能与党合作共事，在本民族发挥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顺利地进行了社会改革。当然，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那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竭力维护旧制度，勾结帝国主义，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反动分子，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建国初期，党在精心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族政策体系时，也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先后于 1952 年和 1956 年两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批评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在检查中，着重纠正影响我党在少数民族各项政策执行不力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也注意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在宗教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认为当前党对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宗教界的影响和力量，团结宗教界人士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任务、彻底实现《共同纲领》服务。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扩大宗教界爱国统一战线的政策。195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在 1954 年的《中央批发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文件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论述了宗教的起源、本质、特点等问题，并指出，宗教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在阶级社会中形成了系统的宗教，并由于剥削阶级的利用，大大发展了宗教。因此，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地发展了控制自然力量的能力时，才有可能消灭宗教，这就使宗教具有长期性。宗教具有民族性，它在许多少数民族中获得广泛和深入的信仰，除了少数民族的社会更为落后的原因外，还由于过去受到长期的民族压迫。宗教具有国际性，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人很多，东方

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基本上信仰这两种宗教。因此，坚决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忌用行政命令去干涉。而削弱宗教影响主要是依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实践，自然地、迂回地、间接地去逐步解决。对待宗教不要采取不理和放任的态度，而应该谨慎地去进行工作，慎重地在宗教中发展和培养一部分进步力量，全力争取部分宗教领袖靠拢我们党。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宗教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对宗教的基本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建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都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1953年11月召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健全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机构，把基督教、天主教的工作做得更好。1955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在此期间，党的宗教政策业已完成建国初期《共同纲领》基础上的基本调整，进入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范畴。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一大政治优势、一项长期方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1957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左"倾错误，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伤害了一大批党外人士。当中共中央觉察了这一错误后，采取相应的方针和措施，主动调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也进入了爱国统一战线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将统一战线称作"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新时期统一战线正式定名为"爱国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的提法，一直延续至今。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制定

在“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农业获得较快增长，从1955年起，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但在当时，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农业的发展速度相对落后于工业，“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快农业的发展，使之与工业增长协调一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重大问题”。为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农业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推动农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55年底开始酝酿和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95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开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展望农业合作化合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毛泽东将会议讨论的农村发展设想归纳为《农业十七条》，并且指示所有省、地、县、区、乡都要照此做出相应的长期发展规划。《农业十七条》提出了今后12年的发展目标，但它毕竟还只是一个初步构想而已，许多内容亟待完善和扩充。于是，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亲自起草中共中央通知，于1955年12月21日，将《农业十七条》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他们在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毕，并准备好意见。

1956年1月5日—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书记开会，讨论补充和修改《农业十七条》，将农业十七条扩大为农业发展纲要，并正式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将其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1956年1月9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毛泽东和杭州会议起草的农业发展纲要。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农业发展纲要》作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文件之三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在会议期间，征询了中共党内、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讨论通过了修改稿，并正式提出了这个纲要草案，于25日将其提交最高国务会议，并最终正式通过了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毛泽东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1月26日，《人民日报》将这个草案公开全文发表。

《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农业合作化为基础，提出了农业发展的长期奋斗目标，其中心任务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产量，主要是粮食和棉花的产量为中心，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对于十七条的种种构想都作了详细的部署：

1. 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1958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

2. 农业合作社对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无依靠的鳏寡孤独和残废军人，实行"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少年儿童）、保葬，使这些人的生养死葬都有依靠。

3. 粮食的平均亩产在12年内，在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平均亩产（皮棉），在12内，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

4. 兴修水利、发展水电。在7至12年，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凡有水源可以利用的地方，在12年内，基本上做到每个乡或者几个乡建设起一个小型水利发电站。

5. 发展新式农具。在3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和相应数量的播种机、中耕机、喷雾器、喷粉器、收割机、脱粒机、锄草机等逐步地实行农业机械化。

6. 多种高产作物。首先是扩大稻谷的种植面积，在12年内，增加3.1亿亩水稻、1.5亿亩玉米和1亿亩薯类。



7. 发展国营农场。12 年内，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 1955 年的 1 336 万亩增加到 1.4 亿亩。

8. 开展绿化。12 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

9. 防治兽医和消灭农作物病虫害。分别在 7 至 12 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病虫害。

10. 提高农村劳动力利用率。在 7 年内，做到农村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 250 个工作日；女子全劳动力至少做 120 个工作日。

11. 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分别在 7 至 12 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如血吸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性病。

12. 除四害。分别在 5 年、7 年或者 12 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3. 扫盲运动。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 5 年或者 7 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在每个乡设立业余文化学校；在 7 年或者 12 年内，基本上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此外，《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还规定了 12 年内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所要达到的水平，以及 1956—1967 年 12 年内，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涉及到储备粮食，发展农业科技、交通、通讯、广播、文化体育、商业、金融等许多内容。

从此，《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国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建设有了一个完整的发展规划。它的出现，不仅在 1956 至 1967 年间起到了规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由于它的许多指标在预定期间内没有实现，因此，在十年“文革”期间其对农业的发展仍发挥着指导作用。

《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对于当时社会的主要影响在于：

首先，它刺激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提早完成。纲要草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 1956 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达到 85% 左右的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社。要求合作化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在 1957 年基本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其余地区，则要求在 1956 年，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 户以上）的高级社，以作榜样，在 1958 年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而事实上呢，1956 年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外，纲要草案不仅再次提前了合作化完成时

间，还明确提出了要求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和盐民、渔民、船民的合作化在1957年基本完成，这样无疑是在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于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潮中，小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底宣告完成。加上已于1月完成的工商业改造，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以比预计时间还早十一年的速度提前完成了。虽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如此快的速度不仅使得一些还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生产关系被提早消灭，也将工作中的“四过”倾向带到了以后的建设中，埋下了隐患。

其次，它鼓励了地方盲目冒进的风气。由于纲要草案提出了诸如普及小型水利，小学教育等主要依靠地方负责的规划，中央开始考虑将部分权力下放。扩大地方自主权的举措，虽然有利于改变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但在当时全民跃进的风气下，无疑给地方的冒进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以扫盲工作为例，根据草案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扫除文盲的标准是认识1 500字以上。”这本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中央的要求本来是要在五年至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城市和农村居民中的文盲，但到某些省里就成了四年和五年，到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时间定的愈短”。为了尽快扫盲，一些地方不顾农忙时节，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认字，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由于当时粮食和棉花产量的严重不足是农业中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制定《农业发展纲要》的公开出版的《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即提出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1956年1月25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廖鲁言对《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则认为：全国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要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3 652亿斤、3 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到公开发表时又改为要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的目标：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1955年为150斤，到1967年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1955年为208斤，到1967年要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1955年为400斤，1967年要达到800斤。棉花产量：1955年全国平均亩产（皮棉）35斤，分别增加到60、80和100斤。要完成这一目标，则必须今后每年都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建国以来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的增长率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但这种大幅度的增产是建国初随着土地改



革等一系列巨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对生产力产生具体推动作用的结果。而到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初步巩固，不可能再主要依靠大规模变革生产关系的做法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机械化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很难保持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那样高的发展速度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指标显然是太高了，远远超出了实际可能。但是有些部门和地方，却不顾客观条件，企图把12年都很难完成的事，只在3—5年内甚至更少的时间内完成。如有的地方，本来粮食亩产只有150斤，但却企图在1年内就把产量提高为800斤。

最后，它严重激化了反"右倾"斗争。为响应纲要草案的号召，农村中合作社数量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但盲目的发展使合作社中存在的严重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和社领导干部的家长制作风日渐严重，终于引起了1956年秋收后大规模的农民"退社"风潮。对此，党的主要领导人认为，"退社"主要是由于农村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由此提出："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在这种"只准左，不准右"的政治气氛下，谁也不敢落于人后，使得冒进思想在经济、政治双重领域里愈发大行其道。

在纲要草案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推进了当时党内急躁冒进倾向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纲要草案反映了全国人民希望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尽快地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愿望，使农村广大干部、群众明确了农村建设的发展远景和奋斗目标，起到了鼓舞人心、振奋精神、促进农业生产建设的作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后，全国农村迅速掀起了农业生产高潮。

《论十大关系》

1956年上半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如何实现这个转移，如何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这是当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另一方面，建国初期，由于我国缺乏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经验，在许多方面照搬苏联模式，建立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苏联模式也逐渐暴露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面。如何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矛盾，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快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被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此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激烈动荡的时期。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斯大林的错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许多国家共产党围绕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以及对苏共二十大纲领的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导致大多数共产党发生分裂。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动荡，掀起了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浪潮。苏联共产党内部矛盾公开化的同时也暴露了过去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很不平衡，农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重工业。此外，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等等。苏联建设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国际国内的情况都要求我们党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由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以苏联为借鉴，对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为加强对各方面实际情况的了解，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4 月 22 日，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 29 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一些问题与有关负责人进行探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经验，思考今后中国的发展道路。当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一是揭了盖子，就是讲，苏联、苏共、斯大林并非一切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正因为如此，他在论“十大关系”时首先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对此，我们要“引以为戒”。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个报告捅了“漏子”，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它在苏联内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56 年 4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这里所阐明的关于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科学地揭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讲十大关系。此后连续讨论 3 天。5 月 2 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他又发表讲话，对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形成了后来正式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围绕着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的基本方针，精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十种矛盾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十大关系"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其核心是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了苏联经济的弊端，批评了苏联重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过轻，国家把农民挖得太苦。当时中国面临的任务，是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为此，毛泽东指出，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把重工业作为中国建设的重点，这是已经决定了的。同时，他又提出，我们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毛泽东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从长远看，这样不仅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的生活需要，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实际上阐明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与此相联系，他又阐述了中国工业布局的问题。当时，中国全部轻工业、重工业的70%在沿海，30%在内地。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是历史形成的。毛泽东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这样做也有利于巩固国防。同时，他又指出，考虑到新的战争短时期内打不起来，我们又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这"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相联系，他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就是说，中国必须实现国防的现代化。对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为了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发



展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事实正是如此。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1964年我们就真的有了原子弹。

第四、五条讲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要处理好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为此，毛泽东强调，充分调动工农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既要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要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既要大力发扬群众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一定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农业税要轻，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要采取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同时，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使90%的农民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有独立性，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活泼。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还初步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正是在作这个报告的几天后，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整个体制问题”。他主张就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搞出一个草案来。他还要求大家研究，企业的独立自主问题究竟应当搞到什么程度。尽管毛主席提出的体制改革的思想还是初步的，但它在实际上确实已经涉及如何改革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问题了。

后五条主要讲政治关系，即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在讨论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上，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与少数民族各有优势。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优势，做到优势互补。毛主席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讨论党和非党关系问题时，他提出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明确了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反革命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问题在于，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消极因素、破坏因素能不能转化为

积极因素、建设性因素呢？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他说，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现在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反革命抓到手以后，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这就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对于是非关系，毛主席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这是团结的思想基础，但对于犯错误的人，“一要看，二要帮”。他反复讲：“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此外，毛主席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并且明确地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里所说的外国，不仅是指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而且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针对如何对待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不能简单地排斥，而是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目的是借鉴外国的经验。这说明，在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路是宽阔的、开放的。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归结起来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其中关于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等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对于党的八大路线的确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主张，实际上都融入到八大制定的路线和通过的有关报告、决议中去了。它提出的一些原则成为中共八大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向全党、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方面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然而遗憾的是，由于1957年以后"左"倾的思想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并没能真正完全贯彻执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生了严重的曲折。但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是科学的真理，这些真理性的认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终于得到了恢复、运用和发展。

总之，《论十大关系》不但是一篇重要的经济著作、政治著作、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而且同时又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一篇社会主义辩证法的专著。50年的实践表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富有生命力的。是一部伟大的光辉的历史性文献。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重温《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1955年下半年，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提前完成，我国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因而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显得日益突出。但是，当时在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分子工作上却存在一些问题。

为了改进和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并指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有关部门，先期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中共中央。

民盟中央费孝通等人将通过调查了解到知识分子问题，向中央统战部做了反映。中央统战部参照有关材料，综合编写了《高级知识分子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报送了中共中央。这份材料集中反映了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存在的六大困难和问题，通称为“六不”：

一、估计不足。认为对高级知识分子六年来的进步和作用估计不足，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和积极性。对待高级知识分子，要充分肯定他们的进步，看到他们的优点，承认他们有用的知识。

二、信任不够。认为对高级知识分子信任与支持不够，尊重他们的职权不够，对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重视不够。有的反映，希望中国共产党做孟尝君，自己不能做冯煖、中共领导干部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把知识分子当“一家人”看待。

三、使用不当。用非所学、用非所长情况较严重。

四、安排不妥。提拔不公平，德才标准没有真正贯彻，要求制定学衔、学位制度。

五、待遇不公。在教师评级、评薪工作中，有不公平现象。

六、帮助不够。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帮助照顾不够，不重视解决老教师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他们很关心国家的事情，但一年也听不到一次报告。



改造应从各人实际出发，一般号召、一样方式解决不了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知识界的状况与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这种局面如果不加以改变，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因此，如何解决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成为全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央统战部的这份综合调查材料，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5 年 11 月 22 日，周恩来同刚从外地视察回来的毛泽东谈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非解决不可了，表示打算在即将召开的政协全国会议上对此进行讨论。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并表示应先在党内开展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1 月 23 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决定在 1956 年 1 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由彭真、陈毅、李维汉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 10 人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为了做好筹备工作，周恩来、彭真等人首先抓调查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向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特别是京、津、沪、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提出要求，对知识分子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并向中共中央上报相关调查研究的材料。11 月 2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座谈会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像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

根据周恩来和领导小组的要求，调查范围包括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工程技术部门和中小学校六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求有好、中、差三类典型，同时还要有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的变化的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意见等三项内容。按照领导小组的要求，各地迅速报来了上述材料。在此基础上，领导小组办公室写出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人数的调查报告》、《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 11 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这些专题报告对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上述专题报告形成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研究知识分

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以下简称《指示（草案)》)。1955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将这个草案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在各自即将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对此加以讨论并征求意见。

《指示（草案)》明确指出："正确地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是党的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现在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为社会主义而积极工作"。《指示（草案)》在肯定几年来知识分子工作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指出目前仍存在对知识分子的变化和作用缺乏充分的认识、还没有给知识分子创造充分发挥力量的工作条件等问题。《指示（草案)》强调："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将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主题报告。1955 年 11 月底，周恩来亲自拟定了报告的提纲，然后由胡乔木负责报告的起草。在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周恩来两次找胡乔木商谈报告的内容，并就报告的指导思想、结构和重点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56 年 1 月初，胡乔木如期拿出了报告初稿。周恩来又随即召集领导小组开会，对报告稿进行讨论修改。他自己也一次又一次对报告从内容到文字反复推敲，并亲笔撰写了若干重要内容。到 1956 年 1 月中旬，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1956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建党以来的第一次大型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徐向前、贺龙、蔡畅、李先念、薄一波、王稼祥等 57 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 27 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共 1 279 人。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该报告着重阐述了下述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详细分析了知识分子的现状，正确指明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认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要从根本上切实解决知识分子问题，首先就必须科学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周恩来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目前的基本政治状况是：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40%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80%；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占百分之几。这种情况表明，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知识界的面貌6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表述，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基础。

第二，分析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倾向，明确提出了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正确方针和指导原则。

周恩来在肯定几年来知识分子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尖锐地指出，在知识分子工作上“还有不少的缺点”。他说，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表现在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针对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上述弊端，周恩来指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周恩来还提出了要采取如下三项措施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1）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有益于国家的专长；（2）充分了解知识分子，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3）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给予适当的待遇，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

积极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调整工资，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第三，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从而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周恩来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为此，他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且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更加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没有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和辛勤劳动是不能完成的。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国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支伟大力量。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有计划地帮助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已经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二个重要条件。

16—20 日，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阶段。在大会上发言的有 61 人，另有 26 人因时间关系未能在会上发言，会议印发了他们的发言稿。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 11 个专题报告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了《为提早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报告，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范长江作了《关于学位、学衔和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发言，劳动部副部长毛齐华作了《关于工程技术人员工资待遇情况和意见》的发言，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钱俊瑞作了《十二年科学文教工作的初步规划》的发言。此外，30 名中央国家机关、全国性群众团体负责人，32 名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16 名高等学校负责人，7 名中国科学院系统负责人，4 名企



业负责人，以及铁道兵司令员王震、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和甘泗琪也在会上发了言。发言一致拥护周恩来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的基本精神，并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了共识。与会代表还对周恩来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和11个专题报告，提出了重要的补充修改意见。会议决定，上述文件经最后修改定稿后，将公开发表或以文件形式下达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1月20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作了讲话。他说："会议开得很好。听了各位同志讲话，很高兴，可以看出同志们的水平很不低，很高，许多讲话是很好的。"并且强调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讲完话后，由周恩来作总结报告，他着重回答了与会代表提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知识分子的数量与质量、理论与实践、教育与研究、提高与普及、发挥祖国的文化遗产等问题。他再次强调，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依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成为送给知识分子最好的春节礼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立即开展了贯彻执行会议精神的工作。

就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当天，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中，他又一次讲到了知识分子问题，并要求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重点讨论。周恩来重申，现有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再次强调，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工业革命的前夕，知识分子已经到了向现代科学大进军的时候。必须制订科学发展的全面规划，加强和扩大科学研究机构，大量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为发展科学事业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纷纷发表自

己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教育家陈鹤琴说："最近我看到了周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所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党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和亲密爱护。"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林焕平说："看了周总理在党中央会议上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进一步体会到党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无微不至，使我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感动，也使我感到责任的重大和进一步改造自己的必要。"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年前下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经过在各地征求意见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讨论，它的内容与指示初稿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主题仍然是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干部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克服在这方面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

3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社论强调各级党委和学校等单位，要从高等学校的教授、中小学教师等知识分子中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大批地从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社论表明了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期望。在会议、中央指示和社论的指导和推动下，科教文卫部门的各级党组织开始积极培养和发展知识分子党员。截至六月底，一大批著名的大学教授、专家和中小学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有二万九千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邓稼先、赵锡武、季羡林、谢希德等都是在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在提高知识分子政治待遇的同时，中共中央还着手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4 月 16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通知除责成中央各部门从各方面进行这项工作外，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对科研机关、高等学校等处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督促有关单位采取具体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按照这些文件的精神，各地立即采取措施检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例如，这次会议一结束，清华大学就决定给教授、副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或副主任的讲师以及学校的主要行政干部共 137 人发证，在校内就餐、购买副食品、理发、



治病、看电影或演出等方面享受优待，其子女可以优先送入保育所。该校还新设了一个可容纳200人的教师专用阅览室，室内有各种技术科学书籍和俄、英、德、法、日文的百科全书，供教师们备课和查阅。此外，学校的合作社对上述人员还实行预购副食、定时送货和电话预约，校医院安排专门的保健大夫负责教授的保健工作。为解决教授宿舍中小孩吵闹影响备课的问题，学校专门在教授住宅区腾空了一所房子，供教授备课使用。

根据国务院工资改革决定的精神，有关部门还对知识分子的工资进行了调整，使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六所院校的统计，教授、副教授的平均工资原为169.74元，调整后为228.79元，平均增长了59.05元；讲师平均工资原为90.39元，调整后为116.26元，平均增加25.87元。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得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知识分子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调整和端正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党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得到了发展和充实。此外，会议还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国内的广大知识分子，而且激励着一批在国外工作多年的优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毅然返回祖国，张文裕、林兰英等便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这次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理论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彻底解决。1956年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仍然把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提出继续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制定的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新政策并没有长期贯彻与坚持下去。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日益“左”倾，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间，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因而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严重失误，一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排斥和打击，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惨痛的历史教训，从反面进一步验证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旧中国的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许多科学技术都是空白。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改变旧中国落后的状况，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火车头”作用，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支撑作用，把科技进步作为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1949 年 10 月 31 日，毛泽东亲自将中国科学院印信颁发给院长郭沫若。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1950 年 5 月 19 日，由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建立与发展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事业寄予了厚望。

20 世纪 50 年代，正是世界高新技术的发轫时期，其标志性领域主要有四个：一是核技术。1945 年 7 月 16 日，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成功，1955 年世界首座商用核电站建成，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二是 1946 年美国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机器的认识；三是 1947 年半导体晶体管出现，1959 年制成集成电路，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结合，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四是 1957 年 10 月，前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开始了宇航时代，人类第一次有脱离地球的可能。

新中国第一次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刚刚起步，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国家安全还没有可靠的保障。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科技、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要想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摆脱因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地位，增强综合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正是基于国际国内的具体情况，毛泽东从国际战略角度出发，力促全党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要增强落后就要挨打的强烈民族忧患意识。他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该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并且"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①]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在阐述其意义时，周恩来画龙点睛地指出："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②]刘少奇也强调："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③]1955年初，毛泽东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阐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④]1955年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写到："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⑤]

1956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第一次把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提上了大政方针的战略高度。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宣布，国务院已经着手组织编制《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且指出："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12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⑥]

"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具体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阐述了科技的价值和重要性。根据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及变革作用。周恩来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

第二，提出了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任务。面对中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周恩来指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提

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三，对如何向科学进军进行初步部署。报告批评了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指出利用苏联的科技援助时，要做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就，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的科技发展水平。接着，周恩来就如何完成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任务进行了初步部署，主要包括：派人去苏联学习，聘请苏联专家，向外国专家学习；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方面；把科学院作为“火车头”，同时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门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应用等等。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学技术人员，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很快，全国迅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1956 年 1 月 31 日，周恩来主持并召开中央各部门科技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制定《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1956 年 3 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同年 11 月，聂荣臻被任命为主任。由国家调集了 600 百多位各种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参加编制规划工作，还邀请了 16 名苏联各学科的著名科学家来华，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发展趋势。历经七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1956 年至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12 年科学规划》）和四个附件，全部文件共 600 多万字。经反复讨论修改，195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后执行。这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走上大规模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

《12 年科学规划》包括序言、1956-1967 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任务的重点部分、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科学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国际合作、结束语等九个部分；四个附件分别是《国家重要科学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1956 年紧急措施和 1957 年研究计划要点》、《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规划从 13 个方面提出了 57 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 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 12 个重点任务，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主要是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原则）、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的规定，是一个项目、人才、基地、体制统筹安排的规划。《12 年科学规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



科学技术的纲领性文献。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对我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学科及专业的调整，科技队伍的培养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体系和方法，以及我国科技体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加强对全国科学技术的领导，中央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同时，1956年6月，国务院还批准成立了国家技术委员会，作为组织全国技术工作的职能部门。

《12年科学规划》制定完成以后，中央政府又按照制定的规划开始有计划的实施。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科技人员匮乏，国力有限，科学技术发展不可能全面铺开，必须有所侧重。因此党中央决定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放在与重化工业和国防有关的科学技术以及尖端技术上。其突破口选在“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新科技领域。

1956年2月，中国导弹的研制工作首先提上了日程。同年4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同年5月，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的报告，作出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在研究、利用原子能方面，1956年3月26日，中国政府在11个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得决定》上签字。4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原子能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等人为副主任。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抽调干部和工人参加原子能建设的通知》。以后又先后组建了电子学、航空、舰船等方面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集中了全国最高水平的科学家，中央政府还从全国调集了各种技术人才以及各种先进设备，并配备高级干部加强领导。在生活上，研究人员则得到了政府尽可能的最好的照顾。在抓“两弹”研制的同时，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发出“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的号召。毛泽东紧紧抓住国防尖端科技不放松，要求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制定发展火箭和卫星的计划。

此外，规划的实施还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和产业的诞生。

1956年，我国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建成。7月15日正式投产，生产出中国第一批（12辆）4吨解放牌载重汽车，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1956年9月5日，沈阳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一种喷气式歼击机——歼5，这是一种单座、单发、机头进气、后掠式中单翼喷气战斗机。它标志着我国初步奠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飞机制造业的基础；1956年，中国国家高程基准点在青岛市建立，这是国家高

程控制网的起算点；1956 年，新中国第一台电冰箱——“雪花”牌电冰箱由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自行研制成功。

“向科学进军”的战略决策，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它直接促成了“两弹一星”的科研成果，不仅在当时起到巩固国防，壮大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还敏锐地抓住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促进了我国核工业、核能源、航天工业的长足进步，带动了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规律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突破形成的科技革命浪潮往往带来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使一大批落后国家可以后来居上，在短时间内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15 世纪以前的西方一直落后于中国等文明古国。但蒸汽机和电的出现，形成的第一、二次科技革命引发了工业革命，使西方各国迅速发展，把古老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以原子能、电子技术、空间技术、激光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之时。实践证明，原子弹、导弹等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其意义远远超过中国拥有核武器本身，它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实施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科技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初衷。有的国外学者把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称之为“中国的现代工业革命时期”。

其次，“向科学进军”的战略决策，推动了我国科技队伍建设，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新中国成立时，国内仅有 30 多个专门科研机构，全国自然科学研究者不足 500 人。建国初期，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很快，但总的说来，科技人才还很匮乏。1955 年全国科技人员只有 0.9 万人，高校毕业生人数只有 5.5 万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正式决定实施“两弹一星”计划后，科技人员严重短缺的矛盾突出，聂荣臻受命主持“两弹”研制工作后，向全国高校、工业部门、科研部门选调人才。在第一次选调人才的会议上，由于人才奇缺，一时面临尴尬局面，最后陈赓大将慷慨解囊，割爱 6 名专家教授。以后，各有关部门也大力支持，才奠定了我国两弹研制的人才基础，聂荣臻事后回忆，当时调人之难，使我国“两弹”事业举步艰难。因此，培养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成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和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1956 年 9 月 10 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号召：“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



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⑦从1956年初到1957年上半年，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到1965年底，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已达245万人，专门从事研究开发的人员达到12万人。中国形成了一批学科较齐全、设备较好的研究所，培养了一支水平较高、力量较强的科研队伍。

“向科学进军”的战略决策，极其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了中国当代科学事业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模式。从此，中国科技实现了新的跨越式发展。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无畏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由于集中了全国的优势力量，研究工作进展非常迅速。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除了与军工有关的科技——航天、导弹、核能等迅速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57年1月，中国科学院评选并颁发了1956年度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共有34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6项。一等奖的获奖者和获奖项目为：华罗庚，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吴文俊，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钱学森，工程控制论。对获奖者除了授予奖章、奖状之外，还给予有了奖金，这是新中国首次颁发科学奖金。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结果、评审经过、得奖论著的简要说明以及一等奖获得者照片，还发表了题为《我国的第一次科学奖金》的社论。这篇社论指出：通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奖励制度，“检阅我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奖励先进，鼓舞后起，更好地促进向科学技术的大进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⑧

注释：

①《毛泽东同志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849页。

②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第180页。

③《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

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49 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6 页。

⑦《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26 页。

⑧《人民日报》,1957 年 1 月 25 日,第 1、7 版。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88 页。



双百方针的提出

“双百”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简称，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其基本精神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国内，当时，一方面，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在科学文化领域内仍然存在着某些“左”的思想影响，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是不相适应的。在国际上，随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解冻文学”思潮随之兴起，一批在30年代以来受到迫害的作家被相继“平反”和恢复名誉，尤其是1954年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文艺行政化、文学创作模式化的质疑，激发了中国作家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传统的重新认识，也引起了中共中央对文艺和科学的反思。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艺术和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要贯彻毛泽东过去吸收党内意见分别提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

“双百”方针，是党在指导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提出的。在“双百”方针正式提出以前，“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就已经先后单独提出。

“百花齐放”是针对戏曲问题提出的。中国戏剧丰富多彩，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戏曲，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当时，国内关于京剧问题的发展出现了争论，一派主张全部继承；另一派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的，主张全部取消。1950年11月，在全国第一届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百花齐放”。时

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周扬认为这个提法很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1951 年 4 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他主张京剧还是要，不单是京剧，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这一题词实际成了建国初期戏曲工作的指导方针。这里的"百花齐放"还只涉及到各种戏曲形式的同时并存、互相争妍的问题，并没有涉及到文艺界、科学界及整个学术界的问题。

"百家争鸣"是在研究中国历史领域的问题而提出来的。1953 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10 月，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会的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精神。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百家争鸣"的口号还没有公开宣传。

1956 年 1 月 14 日至 20 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陆定一在会议上说：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4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讨论中陆定一发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其自己讨论。他还表示不能同意"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的，魏尔啸、西医是资本主义的，中医是封建的"，"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说法。他认为，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在讨论中，还有人发言，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4 月 28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1956 年 5 月 2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让



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还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郭沫若的邀情，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上，为首都 1 000 余位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他强调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在自然科学工作方面，他指出：“在某一医学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签，……就是错误的。”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指出：限制创作的题材“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批评工作来说，就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而现在的批评，有些令人害怕，应当纠正，对被批评的人来说，别人批评得对，应该虚心接受。他还强调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来指导文学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工作。1956 年 6 月 13 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经修改后的陆定一的报告，至此，“双百“方针正式公之于众。

“双百”方针的提出，立即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受到了广大文艺和科技工作者的拥护和赞扬，激发了广大工作者工作上的热情和创造性，使整个文艺和科学领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春满院”的景象。在 1956 年初到 1957 年春夏之交的近一年半的时间内，科学文化部门的思想空前活跃，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批判的热情空前高涨。1956 年 8 月 10 日，全国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与会 130 多人中包括了我国遗传学界两派的主要学者。中宣部有关负责人针对遗传学界两派之间严重对立的不正常状况，阐述了党的“双百”方针，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

唯心论，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学派遗传学的各种政治帽子，强调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待，不要急于作结论。这是“双百”方针提出后，我国为贯彻落实这个方针，突破苏联模式而召开的一次影响巨大、效果良好的会议。其他如中国地理学会关于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能否组成地理学以及地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动物学会关于麻雀是不是害鸟的争论、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关于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的争论、电影界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哲学界关于真理的讨论等等，呈现出非常热烈的“争鸣”局面。据1956年12月21日新华社报道，当年度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50多次，多于过去的任何一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共有2 000篇以上，也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使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起来了，自由讨论的风气浓厚了。“双百”方针的实行，对文艺界来说无疑更是春天的消息。中国作家协会连续多次举行会议，研究讨论在文学领域如何贯彻“双百”方针。1956年底，中国作协作出决定，从1957年起，文学期刊一律取消“机关刊物”的说法，而以某某社或编委会代替，以显示各文学期刊地位平等，淡化“领导、指导”的色彩。广大作家、艺术家满怀激情，采用各种艺术形式，以不同的风格，生动地描绘了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崭新风貌。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里，再次重申了“双百”方针。并且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里也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对“双百”方针做了详细阐述，并且把它作为长期的、有效的方针来指导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健康持续的发展和繁荣。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双百”方针是对的，合乎辩证法。同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中，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双百”方针。他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并且指出，“双百”方针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双百”方针的提出，吸取了我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也借鉴了外国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方针。它同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其他重要方针一起，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根本保证。“双百”方针的提出，反映了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反映了当时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国家形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双百”方针所带来的文艺和科学繁荣的春天却是短暂的，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文艺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强调“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创作题材越来越狭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比比皆是，科学技术基本上是在“小土群”上转圈子，科学规律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面前遭到蔑视。1961 年、1962 年，党中央先后制定了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纠正违背“双百”方针的错误。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受到了严重破坏。不仅给文艺和科技领域带来了可怕的灾难，而且给社会主义建设带了严重的无法估量的损失。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双百”方针才再次得到肯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共识，邓小平更是强调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且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步走向健全，为全面贯彻实施“双百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和最重要的条件。回顾“双百”方针命运的曲折路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新时代下“双百”方针的继续贯彻执行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基础，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自由市场一度活跃

1953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我党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主要由“利用”“限制”转移到“改造”的方面上来，“改造”的目的就是要变私有制为公有制，这一转变使整个市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到1956年底，私营商业户数的82.2%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统一市场。

应该说，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对资产阶级的逐步和平赎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市场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支援国家建设、稳定市场和物价，而且有利于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活。但是，毋庸讳言，当时党对市场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作了片面的“左”的宣传和理解。认为这种新建立的市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它的运行主要不是依靠价值规律的作用来进行调节，而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因此，新建立起来的统一市场，在运作过程中很快暴露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缺点：

第一，商业网分布不均。全国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有56.6%的机构和60.5%的人员集中于城市，城市中又特别集中于大城市。但是，从零售额来看则又相反，农村占53.1%，城市仅占46.9%。商业网分布乡村中又偏重于集镇，在地区分布上又偏重于沿海而疏于内地。商业网分布的不均匀现象显然不利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也不利于城乡之间的交流。

第二，经营管理过严过死。国家的商业体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它的经营方式是在原来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派货以及对各级市场严格管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很快就不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生活。

上述弊端的存在致使国营和供销合作社迅速占领农村市场，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的自由市场急剧萎缩，根据社会商品零售额计算的自由购销部分



1956 年较 1953 年减少 48.6 亿元，下降 33.0%，平均每年减少 12.5%。自由购销占社会商品总零售额的比重也由 1953 年的 42.0% 降为 1956 年的 21.2%。①

由此造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工农业生产方面，由于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好坏一个样，产品的质量下降，花色品种大为减少。在城市，商业缺乏经营积极性，"东来顺"的涮羊肉也不好吃了；在农村，由于有粮、棉统购任务，土特产品价格偏低，农民只顾种粮、棉，非种植业生产经营（主要指家庭副业和兼业）受到很大限制，能进城的副食品越来越少。

其次，城乡居民生活受到不利影响。由于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初级市场上能上市的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急剧减少，物资交流陷于停滞。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受到严格限制，农村市场也被限制甚至取缔。供销合作社利用垄断地位，在购销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村商业疏通受阻，给农业的生产生活造成困难。这种状况在 1955 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更加突出，农民怨言很多。农村市场萎缩在影响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对城市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城镇居民的副食品供应紧张，排队购物现象普遍。如蔬菜，大多由国营商业包揽、统一经营，流转环节过多，菜价规定过死，不但影响蔬菜生产和贩运者的积极性，而且在蔬菜的规格和数量上，也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最后，对于国家建设来说，国家的收购任务难以完成，国内外的市场供应受到影响。据统计，1956 年 45 种主要工业品收购计划有 18 种未完成，其中大部分属于农产原料加工品和金属制品及建筑材料。国营、合作社的主要农产品收购没有完成计划。②

在这种条件下，党内外人士针对市场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主张保留一定的自由市场，放宽对农村市场的管理。1955 年 6 月 3 日，《大公报》发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阎顾行的文章《中国农村的农民贸易》，文章指出：中国农村的农民贸易，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今后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它在过渡时期以及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一种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国营商业的补充形式，但是由于它没有计划和受价值规律支配，应对其加以合理管理。

同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提出的《关于改进初级市场管理工作的报告》，提出必须迅速纠正

当前初级市场上存在的管理过严过死的现象。

但是，由于其后迅速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改造压倒了一切，农村自由市场并没有受到重视和恢复。直到1956年4月，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完成，而合作化因限制了农民的家庭副业和兼业（过去农民的收入大约有30%左右来自种植业外的副业和其他经营）导致社员收入下降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956年4月3日，针对有些农民收入下降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要求各地“开辟生产门路，发展副业生产，经营多种经济”。同年6月，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的一个通知里指出：“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的错误。”[3]

当时，主管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也很快发现了工商业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由于自由市场萎缩而带来的微观经济过死、人民生产生活不便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那就是开放自由市场，恢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他在1956年1月指出：“我们是要改组工商业的，但并不是每个小厂统统需要改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调整。如果轻率地并厂合店，就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即使“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改掉了”[4]。1956年6月30日，陈云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因市场调节消失引起的生产流通中的问题和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提出应改变过去因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对市场管理过严的办法，应允许农村自由市场的存在来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并且提出要建立“在计划经济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市场”[5]。7月21日，他还指出：“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6]在陈云的敦促、支持下，开放自由市场的政策便呼之欲出了。8月中旬，陈云在全国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会议上的讲话谈到计划经济问题时提出，新的经济体制的特征应该是“大计划小自由”，总的原则是“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

八大预备会议期间（8月底至9月中旬），八大代表也对市场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9月8日，华北代表提出，目前的市场很死，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意见，资本主义改造已经差不多了，对市场管理应该有新的措施。

9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



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凡是国家统购和委托收购范围以外的农副产品以及完成统购任务和履行收购合同义务以外的多余产品，都可以通过这个市场自由买卖。

在八大正式会议上，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和周恩来作的《关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都提出建立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附有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观点。陈云在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大会发言中专门讲到这个问题。陈云指出："市场管理办法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这些办法使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因此，当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农业副产品没有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就会减产。"⑦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关于市场的问题，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其他代表如姚依林、曾山、陶鲁茄等也都发表许多看法，呼吁开放自由市场。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宣布："为了适合于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购销关系和市场管理办法"。建立自由市场的决策就这样在八大获得了通过。

从 1956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发出了陈云起草的《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国家开放了农村自由市场。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各地逐渐开始恢复集市贸易，农民堂堂正正地大干起副业来，农村市场开始发展起来，由此推动了自由市场的开放和恢复。到 1957 年春天，农村自由市场活跃达到顶峰。正如陈云所说的那样："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要搞副业，要搞推销，很多地方对农村集镇上的市场，不像过去管得那么死了，开放了一点自由市场。"⑧自由市场在一省范围内开放大约是从 1956 年 7 月份开始，最早开放的大概是湖北省。到这年 8 月份以后，许多省都陆续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八大召开以后开放自由市场的省份更多了。自由市场的种类、自由市场交易的品种也在不断增加。

随着自由市场的开放，参与自由市场的队伍迅速扩大。单从手工业个体

户的情况来看，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在1956年9月份，个体户只有1661户，从业人员5 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8 100多人。据全国的统计，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有所发展，从事私营企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大约有70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大约有60至70万人。[9]与此同时，自由市场交易额不断上升。据估计，1957年全国自由市场交易额将达到120亿元左右，比1956年增加20亿元，其中农副土特产品的自由市场约在80亿元左右，工业品约在40亿元左右[10]。

这些新开放和扩大的自由市场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前的旧的自由市场有着本质的区别。旧的自由市场还有大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参加，是资本主义可以借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新的自由市场没有资本主义企业参加，是社会主义企业和劳动群众交换商品的场所。正如陈云所说："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自由市场的开放，给社会经济增加了不少活力，城乡人民生活出现了不少生气。首先，它分布面广，品种丰富，有利于扩大城乡交流。扩大社会商品供应量，活跃城乡市场，弥补国营、合作社商业的不足等方面都有很大作用。以上海为例，由于自由市场的开放，长期缺货的毛鸡、鲜鱼、南北货和中药材，货源不断增加，像上市的鲜鱼每天有八百担左右，毛鸡每天有二万斤。某些滞销的土特产也打开了销路。其次，刺激了农副业生产。农民已经停止生产的东西，现在恢复了生产，过去生产少的，现在增加了生产。由于货畅其流，收购的价格比较公平合理，农民们的生产劲头也愈来愈大了，多种经营的开展，增加农民收入。最后，活跃城乡，方便市民。一是从蔬菜质量与价格来看，自由市场的蔬菜一部分来源于农民的自产自销，另一部分来自于小商小贩的批发。从进货渠道上减少了诸多中间渠道，运输时间缩短，交易成本费用低，蔬菜新鲜便宜。二是从品种上来看，国营菜店里面有的品种，自由市场也有，国营菜店没有的品种，自由市场里面补充。由于蔬菜新鲜、品种丰富，活鱼活虾应有尽有，而且可以议价，因而受到市民的欢迎。尤其是节假日，去自由市场采买时鲜蔬菜水果，成了许多市民家庭的选择，城镇家庭主妇不要排队就能买到新鲜的鸡、鱼、蔬菜、水果，不少商品质量提高、价格却降低了。不少农民通过贸易增加了收入。



毋庸讳言，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由于它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市场主体是完全独立的个体农民或经济组织，市场上无证商贩显著增加了，几年来很少看到的掺假、短秤、抬价收购、投机倒把现象又开始出现了。某些供不应求的商品开始涨价了。某些国家统购的商品也流入自由市场。有的个体工商户开始雇工。少数小商贩、个体手工业者、农业社社员也要求退出合作组织。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对农村的单一公有制和国家的计划购销体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随着问题的产生党内对自由市场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并最终决定了自由市场的命运。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中共中央针对农村中存在的退社风潮和许多农民对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的现象，决定开展一场以“大辩论”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农村自由市场受到严厉限制。自由市场可供交易的商品非常有限，其自由度也大大萎缩。由于国家严厉限制进入自由市场的农副产品种类，并通过严厉的政治运动来贯彻这些规定，而地方政府和工商行政部门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往往“宁左勿右”，结果使1956年下半年活跃起来的农村自由市场，到1957年8月以后就冷落凋敝了。

此后直到文革结束对于自由市场始终没有成型的政策，直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注释：

①②⑩《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第267~269页，第232~233页，第269~270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④⑤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第327页，第335页。

⑦⑧《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第22页。

⑨《当代中国商业》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建设形势的不同估计

1956年，国家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以苏联的历史教训为经验，总结中国的经验，开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建设形势如何作出了的不同估计，这些不同意见主要集中体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的思路上。

首先，对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全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毛泽东认为1956年年初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后来压制这种势头从上到下搞反冒进是错误的；而陈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则认为这一年经济发展冒了，主张采取反冒进的措施。

当时，毛泽东认为，尽管当时国内经济形势很好，但他还是谨慎地考虑斯大林去世后的国际形势，敏锐地从政治上提出“以苏联为鉴戒”、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为此还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在1955年5月以前，毛泽东对农业形势判断上，曾一度认为农村中因自然灾害和统购统销的失误而情况紧张。但是，在这之后的外出视察中，他就改变了原来的估计，认为当时言过其实了，农村的形势还是“好得很”。对形势判断的变化引起了决策上的连锁反应，农业合作化进度的加快由此而来。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过多地强调速度，多次出现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周恩来、陈云等人认为：从具体事实讲，1956年“冒”了，一是财政信贷多支出了30亿元，二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出现了以物易物、抬价抢购等社会现象；从程度上讲，问题很严重，他曾动情地说：“我们这样的大国，不能出问题。少奇同志管党的工作，小平同志担任

 

党的总书记，总司令也不管这些事，总理忙得很，所以，财经问题由我们作决定。我们肩上担着6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

由于对1956年经济形势的不同判断，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冒进与反冒进的争论。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1956年经济计划时，毛泽东主张追加一大笔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与会者大多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会后，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起草《关于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明确提出"在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确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刘少奇还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交待，为《人民日报》起草《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在当时形成了反冒进的共识，并且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毛泽东确实也认为1956年经济有"冒"的现象，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但他不同意搞反冒进运动。不过，由于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反冒进的意见都很一致，所以他的不满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来，而是到了1958年初，他才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期间，明确、尖锐地表达了他对1956年经济形势以及由此而来的反冒进的意见。

其次，关于计划与市场。长期以来，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形式上纷纷仿效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中国也不无例外。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在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们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弊端有所察觉和分析，并且提出和采取了许多革故鼎新的措施，努力探索改革的新路子。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毛泽东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

务。”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同时，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说法“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

1956年1至2月期间，陈云对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情况作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陈云发现，对本应采取经销、代销方式进行改造的那些不雇用店员的商店，也批准合营的做法对经营不利，那样做只会给消费者造成很大的不便。陈云认为，对这些人要继续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发展方向可以吸收一部分到国营公司或变成公司合营的商店，另一部分则在很长时间里保留单独经营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时期让他们单独经营，如果把他们全部都组织起来，经营活动完全统一，就有一种危险，即，质量下降。①针对公私合营企业合并过程出现的混乱情况，1956年2月8日，国务院通过决定，提出制止盲目合并的趋势。1956年3月30日，陈云出席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会议时讲，夫妻店、小摊贩合并了老百姓不满意，“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②1956年5月29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作总结时说，手工业带有极大的地域性，对手工业的管理要照顾生产和销售习惯，不要太多的由上而下的条条管理，过分集中和不适当的同一计算盈亏的办法要逐步调整。在对工业企业的调整中，有的企业必须单独存在，分散生产，不要勉强合并。③对于统购包销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陈云指出，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的情况，从1953年就开始了，“统购包销是为了稳定物价，防止投机倒把，这很必要，但也有一点毛病，就是产品都由政府包下来，结果都不大注意提高质量、增加品种”。④“各级市场管理，大、中、小城市和集镇都有一套办法，而且管理得很严格”，这套办法不但表现在产品的质量、品种和销路上，而且“把市场卡得太死，没有活动的余地”。⑤1956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陈云在肯定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的同时，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在该报告的结尾部分，陈云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思想。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



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1955 年底，刘少奇在听取中央 30 多个部门汇报时，就提出走向市场的问题。他举例说：捷克斯洛伐克的皮鞋有几百种样子，我们就统统买来看看，搞出各种式样的产品来；服装设计也要搞，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要专有一些人研究消费者的需要，想出许多新产品新花样。1956 年 12 月 7 日，刘少奇召集中央工人阶级问题十人小组和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负责人座谈时进一步指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第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毛泽东从 1955 年开始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觉察，以后不断提出改进的措施。归纳起来，他提出的改进措施核心是权力下放，包括四点内容：一是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这既指中央部门对省、市、区，也指省、市、区对地、县、区、乡。他说，“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二是给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一点利益，使其在经营活动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三是批评了中央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 28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中央部门办事见不到人、处理问题拖延不决的官僚主义作风。四是强调了全国平衡的问题。尽管毛泽东提出了放权的改进措施，但大的框框还是要全国一盘棋。他说，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全国的工业化也搞不起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既是总结了苏联管理体制中的弊端，即中央统得过多、过死，损害了地方、企业、个人的积极性，经济体制缺乏活力，也是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统一与分散的经验教训的结果。他说：“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

朱德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可贵探索，1955 年 10 月，他强调要改

变财政由中央集中统一收支的管理方法，“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⑥1956年8月，朱德作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一文，文中也指出：“要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起码也应该先把中央和省（市）这两级划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两级，可由省（市）量力而行，能划分下去的就划下去，不能划下去的就由省（市）暂时包起来。”同时，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的问题。1955年12月，他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表示：“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不久朱德又深入实际调查，他针对工业的管理体制，主张部分工业管理权应下放给地方。1956年5月，朱德视察山西的工业生产后，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和小型炼铁炉让给地方去搞。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⑦这年8月，他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这一问题作了许多重要发挥，再一次强调了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的重要性。1955年1月，他在视察广州时说：“像蔬菜、水果这类东西，要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可以养活很多人。”又说：“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要流通。经济流通了，国家才能发展。”1956年5月，他对建工部副部长宋裕和等人说：“有些小商品生产还是让给合作社去搞比较好，不能收为地方国营。”他还提出了合作社的集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他指出：“并不是什么都交给公家搞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搞的集体经济不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吗？”“否则，一方面国家要吃亏；另一方面对群众也不方便。”⑧从而纠正了部分人认为合作社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错误认识。

注释：

①②④⑤《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296页，第307页，第300页，第332~335页。

③《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06页。

⑥⑦《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页，662~663页。

⑧《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页。



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近乎奇迹般地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展了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并从1953年开始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原先准备用大约15年左右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到1955年，国民经济一直健康发展，成效显著。但是，这几年的顺利发展，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新中国建设中焕发出的蓬勃热情，以及巩固新生政权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再加上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召开以后，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也已初步形成，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也热了起来。

实际上，1953年起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浪潮下急躁冒进情绪就开始涌动，当年的预算多列了30亿，结果是财政出现30多亿的赤字。1956年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情况较之1953年更为加剧，它的苗头萌发于1955年的夏季。

1955年7月，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慢，因此指责某些干部像"小脚女人"。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也不满意，认为指标低了，投资少了，速度慢了。1955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97.9亿元，比上年增长31.5%。执行中，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几次调整计划。在调整中，削减了一些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减为91.7亿元。到年底，原来收支平衡的预算，结余了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又由于缺乏经验，还未认识到保留

必要储备的重要性，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些结余作为后备并不是坏事，错误在于急于出口。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由于发展速度慢造成的，感到很不满意。随即，他把对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扩大到了经济建设领域。

1955 年 11 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了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加快建设速度，并且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为中心。毛泽东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1955 年 11 月 16 日至 24 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并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改造进程大大提前。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说法是：“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②]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再次号召全党要消除顾虑，加快改造步伐，并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会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迅速传达、讨论和学习《决议（草案）》，并在 1956 年 1 月中以前提出规划和进一步措施。12 月 5 日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的时说，到 1957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公私合营达到 90%，手工业合作化也要求达到 70-80%。很快，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便卷入了群众运动的洪流。原来设想 15 年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来压缩到两三年，最后仅用一两月就完成了。形势发展之快，再次令毛泽东感到意外。他后来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在他看来，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前赴后继奋斗的目标，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

12 月 21 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不得不以反对保守主义的精神重新进行全面规划。周恩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毛主席提出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以后，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周恩来要求，各部门都要考虑，需要扩大多少，于 1 月 15 日前提出来。文教、卫生、政法也要提出计划。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反“右倾保守思想”成为1956年初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方针，当时是受到党内一致拥护的。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的新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中共领导人开始都是积极赞同的。除了认同毛泽东的权威和希望迅速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外，这里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理念问题。大家都相信这样一个道理：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相信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必定推动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

在推动提前完成所有制改造的同时，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如何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问题了。他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作序。序言中写道：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毛泽东提出，现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已经不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是体现在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面了。毛泽东把对客观需要和客观可能估计不足的一般缺点，把那些坚持按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这种倾向表现在计划工作中，就是大幅度提高各项经济指标，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讲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胜利，又给我们提供了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的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我国自然不应该再拘守原来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而是要适当地把它扩大和加速了。”这种看法在当时中共领导层无疑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首先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后来被毛泽东大加赞赏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口号——“多、快、好、省”，就是首先由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提出的。据现在看到的材料，首先完整地使用“多、快、好、省”的提法，是1955年12月14日薄一波在全国农具工作者会议上作的报告——《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此后，“多快好省”的方针逐渐宣传开来。对于经济建设而言，“多快好省”的要求，即希望以高速度、高质量、低成本来取得多成果，当然是一个理想的方针，而且周恩来等人当初提出这个口号的用意，很可能就是为了以“好”

和“省”去制约“多”和“快”。但在实际宣传和执行中，由于主旋律是反右倾保守，由于热火朝天的社会氛围，人们注重的只是“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只讲数量、速度，不讲质量、成本。于是，这一方针后来事实上成为高速甚至超速实现工业化的代名词。1956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地把反右倾保守的口号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并列提出，从标题到内容，充满了逼人的气息。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社论并肯定“写得很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在当时情况下对经济建设的冒进起到了升温的作用。反右倾保守造成了逼人形势，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普遍发热。

当时正开始考虑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从最先编制到最后敲定前后有过 3 个方案，其中计划到 1962 年实现的指标情况反映出的变化足以窥见急躁冒进的表现。

早在 1955 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讨论编制 15 年（1953－1967 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问题。按照各部汇报，1967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6 000 亿斤，棉花产量 5 600 万担，钢产量 1 800 万吨，煤炭产量 28 000 万吨。毛泽东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了。1955 年 11 月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按照十七条，到 1967 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 6 000 亿斤，而是 10 632.8 亿斤，超出原来设想的 80%；1967 年的粮食产量，不是 5 600 万担，而是 12 000 万担，超出原来设想的一倍多。如果说远景规划中的高指标还只是造成了一种“跃进”的气氛，那么，1956 年年度计划的修改则直接影响到当年的经济工作。195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即基本建设投资 112.7 亿元，比 1955 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 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 1956 年投资额增长 12.4%。这已经是十分惊人的增长，但是在批评“右倾保守”口号的激励号召和追求高速发展的热情之下，各省市和各部门还纷纷要求追加投资，开始修改自己原定的生产计划。

1955 年 11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传达下去后，许多省、市领导人就开始动起来。山西、江西、山东率先提出 1956 年就要完成 1957 年的指标，其他省、市随后跟进。浙江省委更加激进，提出要总结亩产“千斤粮、万斤薯、百斤棉”的增产经验加以推广。各地加强了在农业生产上反右倾保守的宣传，从省、县直至农业合作社，都在提高自己的增产



目标。如山东省许多农业合作社提出的增产目标“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十几甚至几十”。头脑发热的不只是地方负责人，还有中央的各业务部门，急速修改、提高的也不只是农业指标，还有各种工业指标。1956 年初，国务院各部门召开了 21 个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 15 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十七条》中规定 12 年或 8 年的任务，提前在 5 年甚至 3 年内完成。

据国家计委 1956 年 1 月 5 日报告，要求的投资总额已达 153 亿元，后来又增加到 180 亿、200 多亿元，比 1955 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了 1 倍以上。1956 年 1 月 14 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远景规划对 1967 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做了大幅度修改：粮食 9 500 亿斤（加上大豆实为 10 000 亿斤），棉花 1 亿担，钢 2 400 万吨，原煤 3.3 亿吨。与 1955 年夏北戴河汇报的指标相比，粮食增加 3 500 亿斤，棉花增加 4 400 万担，钢增加 600 万吨，原煤增加 5 000 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 1967 年实现的指标，提早 5 年，改为 1962 年实现。

毛泽东此时甚至开始考虑赶超美国和苏联。1956 年 1 月 20 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和 25 日召开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 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稍后，他在听取 34 个部委工作汇报时还说，我们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的头几个五年计划。

从 1955 年第四季度开始到 1956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逐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5 年 10 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 1956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的数字是：1956 年基本经济建设投资是 112.7 亿元，比“一五”计划规定的 1956 年投资多 12.4%，但是，据计委 1956 年 1 月 5 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 153 亿元，后来，又增加到 180 亿元、200 多亿元，比 1955 年预计完成数增加 1 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 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 694 个，建成的 455 个，可是 1956 年初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基建会议将项目追加到 745 个，要建成的项目追到 477 个，几个月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 800 个，建成的项目追加到 500 多个。

结果造成 1956 年出现全局性的冒进，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147.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高于 1953、1954 两年的投资额，基本建设贷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 30.2% 猛增到 48%，造成国家财政紧张。当时的形势正如周恩来所说：“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导

致了各方面的紧张。使财力、物力支撑不了本来就处于紧平衡运行状态的国民经济，极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混乱。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第182页。



反冒进和批评反冒进

如何正确地认识国情，恰当地处置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然而，从围绕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到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中共中央高层在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毛泽东要求超速实现工业化，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周恩来等人主张积极稳妥地发展，提出反急躁冒进的思想。

早在1953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然而，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的冒进势头，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看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纷纷感到形势发展的严峻性，经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对经济建设上盲目冒进的问题。于是，1956年，在组织当年的生产建设中，在编制1957年的计划和“二五”计划草案中，进行了反冒进的努力。

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就一再做防止和反对冒进倾向的工作。从1956年1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①。30日，他又在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

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②]

面对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周恩来、陈云等人表露出忧虑和担心。1956 年 2 月 6 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十七次常委会上提出：“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同日，他和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指出：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2 月 8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 24 次全体会议上又提醒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要大家注意“急躁的苗头”，并且提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 12 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是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③]此时，作为财经部门主要领导的陈云，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 月 11 日，他在国务会议上说：工业高潮来了，很好。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回避。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尽力了，不叫“小脚女人”。超过可能的是“左”，片面追求产值不好。3 月 6 日，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发言说：预算平衡容易，问题在于现金不能平衡。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现金每年总要结余一些才好。经过努力，1956 年度的基建投资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

4 月上旬，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严峻形势，国务院立即采取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以求平衡的应急措施。与此同时，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对急躁冒进上。在 4 月 10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必须联系到平衡。陈云进一步说：订计划应该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基建和生产的比例，首先决定于原材料而不是财力的多少。钱是用来买材料的，如果买不到材料，钱又有什么用 。以后定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通过努力，4 月 14 日，国务院为 1956 年物资供应计划方案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



供应相结合”。

除了在计划工作中防止、纠正冒进，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还从指导思想和方针上提出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5月11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在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会后，为支持国务院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社论对两个倾向作了很长一段解释，认为两个倾向都对工作有害。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得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方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社论着重提出当时的急躁冒进倾向，“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反对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社论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社论指出：“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认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

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的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冒进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社论特别针对1956年元旦提出的"多、快、好、省"指出"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要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多求快求省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如果多了，快了，省了，但是不好，不安全，那就是违背了我们的目的。执行四十条的问题也是这样。四十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当然都是要坚决地加以执行的，但执行的方法和步骤，则是可以因各地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用不着强求一致。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急躁冒进的错误。"

通篇社论，都讲要反对两种倾向，但是重点是在反冒进。反冒进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对于这篇社论，毛泽东非常不满。当社论清样送给他看时，他就在上面批示："不看了"他后来说，社论是"庸俗的辩证法"，是"尖锐地针对我"。而引用他的话来反冒进，"是用毛泽东反对毛泽东"。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反冒进指导思想，在纠正了1956年年度预算和计划中的冒进倾向后，周恩来、陈云等又开始纠正1957年度和长期计划中的冒进指标。

6月12日，周恩来、陈云共同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1955年决算草案和1956年预算。陈云说：今年预算不但没有结余，还要动用上年10亿元结余。会议通过了《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其中，关于1956年预算部分，基本上是按削减以后的数字计算的。

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连续召开常务会议，讨



论“二五”计划草案。尽管经过反冒进，草案中的一些主要指标有所下降，但与实际可能相比仍显过高。周恩来和陈云都主张把钢产量降下来，不赞成把它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唯一尺度。8 月，在北戴河会议，周恩来和陈云审查国家计委根据 7 月会议精神新编的方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最后敲定，1962 年粮、棉、钢三个指标分别为 5 000 亿斤、4 800 万担、1 050－1 200 万吨。1956 年 9 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一次谈到了盲目冒进所带来的危害。他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这次大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党和国家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个方针是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总结。10 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1957 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1957 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在某些方面作些适当压缩，确定基本建设投资为 111 亿元，比上年减少 20%，并且在国家机关中大力开展节约运动。12 月 4 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他在会上发言说：“二中全会决定 1957 年基本建设投资为 126 亿元，关键是看材料，材料够就搞 126 亿元，如果材料不够就砍下来。”12 月 27 日，陈云再次就 1957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问题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说“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陈云这些话对于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一系列努力，盲目冒进势头得到遏制，1956 年的经济建设避免了大的曲折，取得了重大进展，为 1957 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在具体工作中削减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陈云还通过总结“一五”期间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这一阶段反冒进的思考，他系统地提出了以“国力论”反对冒进的理论。1957 年 1 月 18 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将这一时期的思考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完善，在会上作了题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指出，1956 年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但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 30 亿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供应紧张。因此，要找到制约建设规

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办法。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④

然而，随着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和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毛泽东认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更加相信反冒进是错误的，他多次批评周恩来、陈云等人在1956年主持的反冒进。为此，周恩来、陈云等一批反冒进的干部，被错误地认为思想"右倾"而受到排斥。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首次提出批评。他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现了右倾。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讲话，明确说，对中共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在出访莫斯科期间，毛泽东签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把批判1956年反冒进公布于世，社论说，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形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做"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社论号召批判保守思想，动员全国人民的热情，在生产战线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来一个大跃进。12月12日，又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期间，说这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本来应该可以多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社论要求把1958年的各项计



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

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一再批评，在经济上直接助长了急于求成的“左”的发展，在政治上强化了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政治积习，在组织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健康的民主生活，从而为“左”倾思潮的泛滥打开了方便之门。

注释：

①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32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页、第191页。

④《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1953–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国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53 年 5 月，国家计委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准备工作。1955 年 9 月 24 日，国家计委召开专门会议，传达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关于未来 15 年远景计划（草案）。李富春就未来 15 年远景计划（草案）作了说明。他说：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编出 15 年远景计划草案；根据 15 年远景计划的要求和实际可能性，编制出“二五”计划轮廓草案；在以上两个草案的基础上，起草第“二五”计划指令性草案。为搞好上述工作，他强调重点研究以下问题：（一）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上，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十五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二）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研究国民经济的 15 年远景计划和“二五”计划的发展速度，要达到的水平与比例关系，以及经济区划等问题。（三）研究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技术政策，以及劳动、物价、外贸、财政等方面的问题。①

1956 年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计委编制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并于 9 月交中共八大讨论。周恩来在八大上就这个草案作了报告。他提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基础任务是五条：（一）集中力量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三）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四）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五）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



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他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我国的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将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5 年内确定的主要指标是：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由“一五”计划的 35% 左右增加到 40% 左右。因而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就将比第一个五年增长一倍左右。到 1962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将比“一五”计划规定的数字增长 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 35% 左右。钢产量达到 1 050–1 200 万吨，粮食产量达到 5 000 亿斤左右，棉花产量 4 800 万担。职工和农民的年均收入将增加 25–30%，国民收入增长 50% 左右。“二五”计划虽然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却用主观愿望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比如，“二五”计划规定的钢产量同“一五”计划规定的 1957 年的产量 412 万吨作比较，只增长 1. 5 倍到 1. 9 倍；同当时预计的 1957 年产量 550 万吨作比较，只增长 1 倍到 1. 2 倍。[②]

1956 年 11 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讨论 1957 年的计划和预算时，周恩来又提出编制 1957 年的预算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但此时，在“反右倾保守”的浪潮下，对经济建设的规律了解和尊重不够，对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速度要求过大过高，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以至到 1956 年年终决算时，出现了 1953 年以来第一个财政赤字年度。特别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解决，反映在编制 1957 年计划的时候，从各部门、各地方汇集起来的指标，仍然大大高于保证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实际可能。于是，围绕对 1956 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 1957 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争论。毛泽东强调 1956 年财政开支的基本建设投资中不正确的部分不到“一个指头”，主张 1957 年预算指标可以高一点。他在大会上说：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实际上，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不过当时没有提出批评。周恩来等人则主张宁肯慢一点，稳当一些，1957 年预算指标应该低一点。经过讨论，毛泽东保留了他的意见，最后大会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方针。

1957 年 4 月 14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初步总结“一五”计划和研究“二五”计划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总结和

研究上述问题的方法，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由理论到实践，由原则方针政策到重大措施，由第一个五年的初步总结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安排，结合苏联和各民主国家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总结我国的经验，由专业到综合，由小综合到大综合，并密切和基层单位、工农群众的经验相结合，和科学技术人员结合，和各部门各省市以及经委、建委、技委和国务院各办结合。《报告》说，系统地、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有关的重大问题，对于克服编制与执行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主观主义，提高计划质量与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很有效果。《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着手总结"一五"计划和研究"二五"计划。

然而，对于"二五"计划，毛泽东有不同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1957 年下半年，他对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作了专门的指示：（一）关于怎样贯彻多快好省的问题。从 1956 年冬到 1957 年大半年，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很少有人提了，有的人认为不行了。这就是没有看到 1956 年的主流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建设的大高潮、大跃进，虽然执行中有某些缺点，但总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充分可靠"，不能片面地了解为越少越好，应该是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条件下的充分可靠。生产与基建在好省的基础上尽可能越多越快越好。中国的国情是"一穷二白"，但不应该认为穷就什么都不能干了。今天提出"穷白"正是为了明天的不穷不白。要掀起新的生产建设高潮。（二）15 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问题。15 年后，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英国。根据这一目标，在工业方面也应搞出一个像农业四十条那样的纲要来，作为工业的奋斗目标。（三）保证重点的方针仍很重要，不能百废俱兴，分散力量。第二个五年的重点，根据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和要求，重点是煤、电、油等动力工业和冶金、化工等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一方面发展农业机械，另一方面要以发展原子能、飞机和无线电及精密机械工业为重点。轻工业要跟农业走。某些方面要少做，才能保证重点方面多做。具体要注意三点：生产性的多搞，非生产性的少搞；基本建设要多有所为，事业费要少有所为；军、政费要减。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席卷全国，这年 2 月，《人民日报》发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5 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 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 070 万吨钢而奋斗。同时，作出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大跃进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二五”计划编制工作上，“二五”计划在制定和执行中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倾向，原定的关于国民经济发展指标开始不断地被改变，许多计划指标不断修正和大幅度提高。

1958 年 6 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财政部在报送“二五”计划要点里说，1958 年全年麦子增产已经达到 350 亿斤，比 1957 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 150 亿斤还要多 200 亿斤。经委说，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1958 年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该意见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到 1962 年，全国就能建成强大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就能建成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有各自特点的工业体系；全国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就能接近美国；在主要科技方面就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据这一目标和要求，很多的具体指标比原“二五”计划高出 1—8 倍之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农业要达到 30% 左右，工业要达到 53%；到 1962 年，粮食产量要达到 1. 5 万亿斤，棉花 1. 5 亿担，都比 1957 年增长 3 倍左右；钢产量 8 000 万吨，原煤 9 亿吨，均比 1957 年增长 5—6 倍甚至十几倍。由于计划严重脱离实际，指标过高，加之自然灾害和前苏联撕毁合同，使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陷入困境。

1959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社论说：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更高地举起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在今年内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的伟大战斗任务。由于“大跃进”，1958 年原煤、原木、粮食、食盐的产量已经超过和达到“二五”计划规定的 1962 年指标的要求；而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将使钢、棉花、棉纱、冶金和发电设备等超过和接近 1962 年的水平。也就是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提前 3 年基本完成。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实现“15 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的口号；使原定

在 1967 年实现的 12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可以大大提前完成。[③]

1960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六十年代》。社论论述了过去 10 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并宣布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在 1959 年提前 3 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的号召，已经胜利地实现。社论提出，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 10 年间，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

大跃进时期的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完全违反了客观经济的发展规律，急于求成，因而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据统计，到 1958 年底，我国共生产钢 1 108 万吨，其中合格的钢只有 800 万吨。这一年公布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猛增 54. 8%，后来核实只有 2. 4%。基本建设投资比上一年猛增 87. 7%，全国职工总数也比上年增长 2/3 以上，超过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使市场供应紧张，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困难。[⑤]由于计划的错误，再加上从 1959 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生产急剧减产。到 1960 年夏季，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鞍钢工人的供应仅为每月 2 两肉，每天 4 两菜，甚至连这些也难以长期维持。

鉴于大跃进带来的影响，1960 年 8 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提出要对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的问题；8 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在讨论编制 1961 年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 8 月底，国家计委在向国务院汇报 1961 年经济计划时，提出了“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加上了“充实”两字予以完善，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 月 30 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大力恢复农业，压缩基本建设和重工业生产，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到 1962 年，国民经济才开始好转。但是，与 1956 年提出的《建议》相比，除原煤、石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远远低于规定指标。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不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 1958 年以后，在



“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提出“大跃进”的口号，修改了原有的计划，提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建设任务和过高的奋斗目标。执行结果导致，“二五”期间农业、工业大幅度减产，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0.4%，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只有3.8%，大大低于“一五”时期；粮、棉、猪和机床、棉纱、糖等主要产品和固定资产投资都低于1957年，出现了第一次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建设被迫后退；到1962年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原来提出的八大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每年平均下降2.5%，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这是追求高指标、高积累，放弃实事求是，违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不搞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恶果，由此带来的教训的十分深刻的。从1961年8月下旬—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为了继续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再用3年的时间（1963－1965）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创造条件。

注释：

①《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178页。

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228页。

③人民日报社论：《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1959年8月27日。

④人民日报社论：《展望六十年代》，1960年1月1日。

⑤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中共八大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56年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怎样完善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完全没有经验。1956年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当作楷模，加以仿效。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采取苏联的经验，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基本上也是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模式。但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内部长期积压的矛盾和问题逐步被揭露出来。苏共"二十大"更是披露了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和对他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种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引起极大的震动。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某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苏联经验，毛泽东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重新审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力图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1955年12月起，刘少奇为准备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着手检查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他先后听取了中央各部委的汇报，并陆续对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战时与平时等关系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做法表示赞同。从1956年2月中旬起，他也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找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等34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来汇报、讨论问题，并要求工交部门200~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写出书面汇报。在此



期间，陈云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小商贩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作了详细、大量的调查研究。

1956年1月，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托，主持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宣布经过新中国成立后6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这年2月到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以便确定党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方针。

在这些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他还指出，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标志着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到会代表1021人，请假5人，列席代表107人。应邀列席会议的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有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宋庆龄、李济深等，还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等，盛况空前。主持大会的是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张闻天、康生、林彪、邓小平。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他宣布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他还指出："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

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大会在选举了大会主席团、大会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大会议程、大会的会议规则以后，听取了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府报告》。此外，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经过热烈的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 年—1962 年）的建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 97 人，候补中央委员 73 人。

大会正确地确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

大会认为，除台湾还被美国侵略者侵占以外，近百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被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被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被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有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空前巩固，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基于此，大会肯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确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党的工作重点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



针及管理体制方面“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

大会对“一五”期间经济工作所取得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同时也指出了政治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以这些认识成果为依据，大会决定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大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我们应该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并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为完成上述任务，陈云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第三，在国家工作方面，提出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大会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对此，大会强调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他们的组织机构，明确规定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帮助他们改变那种只是忙于开会、签公文而不接近群众、不研究情况和政策的作风，定出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的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下情、检查工作、倾听意见的具体办法，督促他们严格地加以执行。

大会还强调，要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大会提出，为了把国家的各种事务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省市县乡都应当有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职权。这样，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互相的监督。

在加强民主建设的同时，大会还提出了法制建设的任务。大会提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

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

第四，强调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大会提出：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必须坚持这一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第五，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但执政党的地位也使我们当面临着新的考验。这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也比过去增加了。这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是脱离群众的最危险倾向。大会强调，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基于此，大会对党的章程作了较大修改，并着重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1) 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2) 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3)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4) 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宗派主义。(5) 大会号召诶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

八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又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毛泽东会前就提出准备适当时候不再当党的主席，可以当名誉主席，还提出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



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这是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很有意义的一个设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执政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充分肯定了七大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会议期间，代表们总结交流经验，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党的八大是一次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也是一次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新方针和新设想，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首先，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突出了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

第二，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及在改进经济体制方面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意见，对于克服社会主义高潮中容易出现的一些弊病和思想，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八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将有利于加强国内各个民族的团结，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党和政府的活动依法进行，可以更好地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第四，坚持在文化和科学方面提出的双百方针，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五，八大决议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这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中共八大制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不长，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没有牢固地确立和达成共识，许多正确的意见和观念没有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许多正确设想没有付诸实施或者还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就发生了反复。虽然八大对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初步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良

好的开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历史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参考资料：

［1］谢春涛主编：《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事件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2］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3］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曲折探索 1956—1966》，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4］陈峰、高敏编著：《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版。

［5］《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

［6］中共党史文件资料汇编。



党章的再次修改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内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对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将党章作为党的旗帜和“根本大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党章担当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历史使命和任务。

党章的基本内容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需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使党章更好地发挥对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党章的不断充实和完善，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奋斗过程，也记录下了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因此，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章的修改工作。

1956 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但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而且通过“一五”时期的努力，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得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党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这些情况跟七大党章规定的已有完全不同了，需要通过党章的修改在党章中确定和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各地区、各个单位和各个民族。党员人数比七大时增加了 8 倍，达到 1 073 万。而且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了一定的工作。执政后的七年里，一般来说，我们党已经经受住了考验，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使一些党员干部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骄傲自满情绪，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高人一等；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事实说明，我们国家和党的状况所发生的上述一些巨大变化，对于我们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这注意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

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制度和党规上作出规定，以便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严格监督。对七大党章进行修改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召开八大并修改党章。早在 1955 年 3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宣布了党的八大主要议程之一就是通过新的党章。同年 10 月，邓小平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宣布说：“中央政治局认为七大所通过的党章，有些条文不适合于革命已在全国取得胜利和党领导全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实际情况，需要修改。”1955 年下半年，就开始党章的起草工作。党章起草过程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由邓小平主持的党章起草小组先后提出了几个党章草稿，并报中央转发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多次修改，直到八大会议正式召开之前的预备会议上，各代表团又集中了三天左右的时间对党章草案进行了逐条讨论。邓小平还在各代表团讨论党章专题小组组长、副组长联席会议上作了发言，然后形成了提交大会通过的党章草案。按照程序，先由党的七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后交八大会议通过。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修改党章来规范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毛泽东非常重视八大文件起草工作，曾亲笔逐字逐句地修改。《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的原稿写道：“我们党的胜利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我们要永远纪念和感谢为党的事业而牺牲了生命的先烈。我们党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者，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这四个“归功于”中的第一个“归功于”之前，毛主席加上了“首先最主要地”。

16 日，邓小平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首先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党的建设的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报告也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国家和党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党员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因此，必须经常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这对于我们党的要求更高了，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对原有党章作出适当的修改。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在发扬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员标准、反



对主观主义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报告同时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需要来自党内外的监督，其关键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坚持集体领导。这些新的思考，在八大党章中得到充分体现。

9月26日下午，党的八大举行了第十一次会议，按照预定议程，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八大党章。八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这部党章有总纲，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自治州组织，党的县、自治县、市的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监察机关，党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党外组织中的党组共9章60条。八大党章同七大党章相比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其基本精神，正是七大规定的关于党的工作的各项原则的逻辑发展。然而在具体内容上却有很多的改变，作了较大的增删。

作为我们党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在总纲上，八大党章同七大党章相比突出强调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增写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及党的内政外交政策。由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了执政党，党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执政的考验，如何在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初步探索的同时，八大党章对于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作了明确阐述。党章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党的政策方面，规定了党的民族政策，包括实行和帮助少数民族的自治，实行民族完全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规定了巩固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

第二，突出了党的领导地位和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总纲阐明党“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的分散主义倾向。”同时还强调在党已经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必须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的作用，使它们相对独立地充分行使职权，反对党包揽一切，对国家机关行政工作不正确的干涉。

第三，增加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总纲从党的传统、执政、党的领导和对党员的要求四个方面阐述了群众路线问题。（1）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

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因此，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2）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所有党组织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应当同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3）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取决于党能否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的党的主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正。（4）所有党员都应当理解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疾苦，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

此外，在一些具体条文上，八大党章也作了重要的修改：

（一）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增加了新的规定。改变了建党以来一直实行的中共党员“不分国籍”的做法，突出强调党员应当是“中国公民”。要求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增加了党员义务，提高了对党员的要求。增加了党员权利，由七大党章规定的四项增加到七项。取消了七大党章对不同社会成分的人申请入党规定的不同的入党手续，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支部大会的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并且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首次用“预备期”代替了原来“候补期”，用“预备党员”代替了原来“候补党员”的提法。规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党员请求退党，应当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且报告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八大党章首次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出于跟入党自愿原则相一致和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考虑。

（二）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首次规定在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

（三）对党的机构作了新的规定，如县以上各级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四）对党的基层组织作了更完备的规定。

（五）取消了有关奖励与处分和经费两章。《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七大党章虽然规定了奖励的条文，但是，在过去 11 年的执行过程中，证明并不是必要的。这当然不是说，党没有注意到许多优秀的党员在工作中



的出色的成就。党介绍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党按照他们的品格和能力，选拔他们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这些都是党对他们的奖励。但是，取消奖励的规定，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为奖励而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当我们的工作是正确的努力的，因而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的时候，这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是最高的奖励。

（六）取消了七大党章关于对党组织的处分规定。将党的纪律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种。

（七）因 1949 年青年团已经重建，所以新党章又专列了与共青团的关系一章。规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自己的工作。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受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青年团的地方各级组织同时受同级党组织和青年团上级组织的领导”。对共青团的性质作了新规定，“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

实践证明，八大通过的党章是正确的，为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然而，八大召开时党执政只有七年，要全面且深刻地认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七年时间毕竟太短了。虽然党在执政以前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但是，执政以前和执政以后是党的建设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执政以后，党的地位、自身状况、党所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就必然对党的建设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例如，党的建设必须适应领导经济建设的需要；建立科学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防止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约束和监督，防止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和各种腐化变质现象等等。因此，党执政以前的建设经验终究不能代替执政党建设的经验。八大召开时，党只有领导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经验，还没有经受社会主义时期曲折发展的经验。同时，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主要是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而不是自己的切身感受。这种历史局限性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中，就是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认识不全面；对于执政党建设规律及党的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党章的权威性和执行党章的严肃性，以及党章可能遭到的破坏都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八大通过的党章的许多规定没能引起全党足够的注意和深刻的认识，一些正确规定也不够具体，更缺乏具体制度的保证，整个党章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践踏。随着实践的发展，八大党章偏离了它最初指明的方向。

八届二中全会

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国际上，发生了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借此掀起一股反共逆流。这种斗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党内。

为贯彻执行党的八大路线，澄清党内的一些混乱的思想，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确定1957年年度经济计划，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84人，候补中央委员65人；列席会议的中央、地方的党的负责人和军队的负责人共147人。为期6天的会议着重讨论了国际局势问题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以作好第一个五年计划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衔接工作。

在会上，刘少奇作了《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形势，谈到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着重介绍了波、匈事件的经过，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并且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国际事务问题上所采取政策及其应当记取的教训。他也提出了应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在发言中，他还报告了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指出，东欧事件的教训之一是国家领导人有许多特权，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为此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他还着重指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劳动工农群众。"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国家和党内"也可能产生一个新贵族阶层。"

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



报告》。报告说明了1956年度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执行的情况，充分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也提出了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认为“今年管得有些松了，马已经上去了，不能下马太快，否则要摔跤，影响不是一年的。1956年成绩是有的，但肯定是冒进了”。周恩来在报告中认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放慢一点，八大和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指标经过研究可以修改。报告指出，鉴于1956年初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以及经济发展计划中有些项目过高，有些费用过多，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确定基本建设投资为111亿元，比上年减少20%。他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并提出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陈云作了《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陈云对改善粮食的收购工作和销售工作，对于增加猪肉和食油的生产，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报告指出除了猪肉以外，其他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状况，陈云提出了一些办法：第一，减少猪肉和油脂的出口。第二，增加鸡、鸭、鹅、兔子、鱼这些不用粮食或者少用粮食的家禽和鱼类的养殖。第三，调整副食品的季节供应。第四，各大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供应要加以改进。此外，他还指出：“从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要搞副业，要搞推销，很多地方对农村集镇上的市场，不像过去管得那么死了，开放了一点自由市场。”他指出，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开放的三条好处：1. 从前因为市场管得太死，农民已经停止生产的东西，现在恢复了生产；过去生产少的，现在增加了生产。2. 城乡的物资交流活跃了。3. 开放了小土产自由市场，“将”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军”。他同时指出，在开放自由市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1. 哪些东西可以进入自由市场未划清楚。2. 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你也买，我也买，势必提高价格。3. 农业生产合作社做生意，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应该做，也需要明确规定。为此他特别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三点方法：第一，把我们现在的农业产品分为三种。一种是法定统购的物资，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第二种是没有法定但实际上要统购的，就是说，委托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统一收购的，如茶叶、蚕丝、烟叶等。第三种是小土产，自由成交的一些东西。第二，价格政策要作一些调整。第三，对农民贸

易要作一些新的规定。（一）凡是农民自产的东西，应该让农民买卖，可以在当地卖，也可以远销；（二）不应该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做贩运生意；（三）应该规定，凡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的手工业，和市镇上的专营手工业有冲突的时候，应该照顾专营手工业。第四，改变对市场的领导办法。

对上述三个报告，全会作了认真而深入的讨论。全会完全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及其采取的立场和政策，并深信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强大团结，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的阴谋。全会指出，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都有增长和取得了好成绩。人民生活有改善，就业有增加，人民对这些是满意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渐进的，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解释清楚。会议一致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压缩 1957 年经济指标的意见，决定 1957 年的计划应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适当压缩基本建设，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并确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增产节约运动。

会议的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并着重谈了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整风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

毛泽东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他指出，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1956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 308 亿元（旧价）的预算开支中，有 20 亿元到 30 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 15 亿元左右。他还指出，1957 年的预算，收支各为 308. 65 亿元（其中包括自筹资金 2. 15 亿元。30 865 亿元折合旧价为 31 765 亿元）。在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 157. 26 亿元，社会文教支出为 39. 3 亿元，国防支出为 57 亿元，行政支出为 25 亿元，债务支出为 8. 42 亿元，援外和其他支出为 6，41 亿元，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为 5 亿元，信贷资金为 5 亿元，总预备费为 5. 26 亿元。在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 126. 73 亿元（折合旧价约为 135. 73 亿元），其中自筹资金 2. 15 亿元。1957 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的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还是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并指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根本正确的。而错误则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



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在谈到东欧事件的教训时，他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并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还提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观点，他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县委以上有几十万，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我们一定会被革掉。”我们党之所以要进行整风，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他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还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他强调说，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密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而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自 1957 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主要整顿三风，力图根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全会延续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正确路线，贯彻了八大所提出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调整了 1957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把经济建设工作放在了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保障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使 1957 年的经济建设工作扎扎实实，取得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效果。

对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的调整

1956年夏季，全国绝大多数农户已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也有少数农民或由于自己不愿入社，或由于某些原因被拒绝入社，仍在进行单干。因此，有些地方的单干农民与社员、单干农民和干部之间产生了矛盾。当时，河北省保定地委针对下属西羊平区出现的歧视单干现象，提出了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单干户的关系的四项原则：一是对单干农民必须采取团结教育、热情帮助的政策，哪怕只有一户，也要热情对待而不能歧视；二是要在自愿、公平和不影响生产的条件下，处理合作社与单干农民的土地问题；三是结合生产合作社与单干农民的关系进行一次检查，纠正歧视苛待单干农民的现象，端正对单干户的态度，提高单干农民的政治觉悟；四是对讽刺苛刻、破坏合作社的单干农民给予批评教育。6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保定地委《关于曲阳县西羊平区委纠正歧视单干农民问题的通报》，并要求各地参照保定地委的做法，正确地对待单干农民。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对农业集体经济内部的关系进行了调整，会议指出，一部分合作社成立比较急促，当前需要处理许多遗留问题，调整现有组织形式，纠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和集体经营而忽视社员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和家庭副业的偏向，要求合作社在产品分配方面实行“少扣多分”，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强调必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后来又决定增加社员的自留地。

在八大之后，在农业集体经济内部，中共中央提出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农业社生产管理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不宜过大；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深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对队组实行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

1956年秋冬，随着秋收分配的开始，高级社发展过快、过乱、过粗以



及生产力水平同一些集体生产不相适应的问题开始暴露，部分农民（主要是原先的地主和富裕农民）开始要求退社，并逐渐在全国酿成了一股退社风潮。

1956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分配中若干具体问题的指示》指出："在今年的秋收分配工作中，……把社员应该交纳的股份基金计算清楚，欠交的应该尽力补交，多余的应该分期偿还。有些社员不愿意把林木、果树、苇塘等作价入社，可以采取按比例分益的办法，由社统一经营。已经入社的零星树木（包括果树）和零散家畜，社员要求抽回的，应该退还给社员，应该偿还的生产资料的价款，应该分给的林木和果树等的收益，应该归还的社员投资的本息，都必须按照章程规定支付，不要失信于社员。

与此同时，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一些主管农村工作和研究农业理论的干部，也从生产力的角度和高级社在经营管理上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主张。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生产组和社员都应当包工包产》的文章，文章介绍安徽芜湖、四川江津一些农业社包工包产的情况，支持这些地方试行的包产到组、到户。文章指出："费人工比较少而且连成大片的作物，可以由全队负责，不再分给各生产组。需要比较精细地进行田间管理和收获工作的作物，可以划分地段分给各生产组负责，甚至可以分给每个社员负责。""划分给生产组或社员负责一定的地段上的一定的工作，并不是说生产组或社员就可以随便在这个地段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应当按照全社全队统一的生产计划和技术措施来进行工作，在这样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四川、安徽、广东、浙江、河北等不少地方的农村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包产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在中国农村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1956年发生在温州地区永嘉县的"包产到户试验"。

1956年3月，浙江永嘉县基本实现了高级合作社，"农业合作化高潮带来了生产高潮，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6年，战胜了百年未见的83天大旱和3次台风、两次洪水的灾害，全县农业生产仍获得好收成。"然而，随着高级社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传统手工工具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缺少管理劳动和劳动力的方法和人才，在分配上出现了平均主

义，“干活一窝蜂”、“出勤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明显。因此，1956 年 5 月，燎原社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实验。1956 年 6 月，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燎原高级社蹲点。他根据社员的要求，在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的基础上，试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即“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由于领导得力，群众拥护，试验进展顺利。1956 年 9 月 17 日，永嘉县委召开全县高级社社长千人大会，并委托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潘长育作了《县委关于推行专管地段、多点实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意见》的报告，其中介绍了燎原社的经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君宝代表县委，在会议总结中布置“多点实验包产到户”的任务，要求全县“不管山区平原半山区，都可以推行个人专管地段分工到丘、责任到户”。

会后，根据燎原社包产到户责任制试点工作的经验和县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后的意见，燎原社工作组组长戴浩天执笔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以中共永嘉县委驻燎原工作组的名义上报县委、地委。文中提出：“用大生产方式来积极兴修水利、搞基本建设、抗拒灾害，改造自然条件来适应集体生产，而对精耕细作、及时耘整、饲养积肥方面，保留小手工业生产的细致精巧程度”，文中列举了社员反映责任制有“六好”，即责任清楚好、劳动质量好、大家动脑好、干群关系好、记工方便好、增产可靠好；“六高”，即农活质量高、粮食产量高、学技术热情高、劳模威信高、生活水平一定大提高；“八多”，即增积土肥多、毛猪养得多、学技术的多、千斤田增多、勤劳人增多、关心生产的人多、和睦团结多、勤在田头的人多。文章还精辟地指出：“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这样子的过渡时期生产方式，也正是反映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的特点。”

然而，这场试验从一开始便引发了一场争论。

在永嘉县委决定多点试验之后的两个月，1956 年 11 月 19 日，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刊登了《“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的文章，并配发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指责燎原社搞包产到户，是对合作社出现的新问题“消极的退缩”，“在生产方式上就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认为它可以提高社员生产的自觉性，可以发展生产。但他们不理解，这积极性是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这篇文章拉开了批判燎原社包产到户的序幕。

看到这篇文章后，在中共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的主持



下，决定向温州地委和《浙南大众报》社领导反映自己的看法。在地委会议上，李桂茂与《浙南大众报》总编辑当面辩论。1956年11月25日，李云河写了长达5 500字的专题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油印后分别上报给了中共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

李云河在这篇文章中，概括了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了《浙南大众报》对包产到户的批评。文章在一开头就指出包产到户“这个办法是有效地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方法”，提出要“从燎原社的实践中看效果”，说明包产到户推行后，有“六好”、“六高”、“八多”、“五少”、“两省”的良好效果。论证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包产到户“没有改变所有制”。文章认为，集体生产“如果管理不好，社员容易滋长等待观望、粗枝大叶、缺乏精打细算、主动考虑等缺点”，如果个体经济可以作为它的补充。文章还指出个体经济“一旦与集体劳动的优越性相结合，它就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永嘉县和温州地区，关于包产到户展开的辩论，引起浙江省委的重视。

1957年1月4日，省委召开了农业调查研究座谈会，指名要李云河专门汇报永嘉包产到户问题。会上，戴洁天代表永嘉县委向省委详细汇报了燎原社试点情况，并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述包产到户的性质、作用。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在听取汇报后认为：“责任到户是好的，怎样解决责任制，很重要。永嘉提的四句话基本上是对的，不过这四句话的排列应该颠倒一下，‘统一经营’是第一句，‘三包到队’是第二句，‘定额到丘’是第三句，‘责任到户’是第四句。”“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理论。社队都保存下来，怎么会成单干呢？一句话的口号是简单了些，4句话就完整了。”

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了李云河的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使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影响进一步扩大。

由于得到了省委领导和永嘉县委的支持，到1957年2月，永嘉有255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合作社的40%。在永嘉和邻近的12个县，共有1 000多个合作社自发、公开地实行包产到户，包括17.8万农户，占全地区农户总数15%。

然而，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从它一诞生便没有停止过，大论争从永嘉、

温州开始，逐渐扩大到浙江全省，涉及到省、地、县各级领导机关，省、地两级党报发表双方多篇文章，前后延续了近一年。1957 年 7 月，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中央对包产到户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1957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包产到户成了两条道路大辩论的重要内容。中共温州地委扩大会议认为“包产到户”是“路线性、原则性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实行包产到户就要使合作社完全变质和解体”。

到了 1957 年 10 月，中央新闻媒体也参加进来，使论争的影响扩大到全国。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把永嘉包产到户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并对李云河公开点名批判。这场争论最终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严厉的惩罚接踵而至。支持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的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剥夺党内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划为右派。自此以后，永嘉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实验就被停止了。

尽管如此，从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说当时对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体制所作的改革尝试，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尝试的预演，它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了铺垫和准备，为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积极的、有益的经验。



波匈事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956 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在这年下半年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它的发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巨大震动和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参与了此事件的解决，尽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与此同时，波匈事件的发生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它领导的正在开始起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波兰和匈牙利同属东欧国家，从历史上看，东欧是世界上冲突较多的地区之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都在这里。二战前，东欧各国除民主德国原是欧洲列强的一部分外，其余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并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场所。二战爆发后，东欧各国无一例外地为法西斯铁蹄所蹂躏，有些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直接成为德意法西斯的附庸，参加了侵苏战争。二战后期，苏联对东欧各国摆脱法西斯奴役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战前东欧分属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大战中英、美、法又是苏联的同盟国，因此，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势力在东欧各国一直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这就孕育着战后在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夺的尖锐斗争。对于东欧各国来说，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援助，在这一态势下别无选择，差不多无一例外地向苏联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又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实行了在经济、政治上高度集权、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体制。

苏联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主要指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以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重工业优先发展，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重积累轻消费等为特征，在当时的条件下其优越性是很明显的，用 10 多年的时间就在贫穷、落后的苏联初步实现了工业现代化，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创造了连资本主

义政治家都不得不叹服的‘工业奇迹’”。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定和巩固，这一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违背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遏制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重型经济结构，使苏联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即使高投入、高积累，形成的却是典型的高速度、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实际购买力下降，使人民对政府不满；由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滞后，也影响了重工业本身的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斯大林不仅没有及时地对这一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且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模式在东欧推行一段时间后，这一模式弊端的逐步暴露，造成了各国普遍的经济比例失调，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效率不高，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除此之外，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粗暴地横加干涉，造成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苏联在与东欧各国的大宗贸易方面，不平等现象十分突出；政治上由于出现大清洗，又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在干部选配上坚持唯苏亲苏等标准，排挤和打击民族独立意识强的干部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伤害了东欧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损害了东欧各国的主权。因此，50 年代初期，东欧各国普遍蕴藏着一股反苏的情绪和独立自主处理本国事务的强烈要求。这可以说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1956 年 2 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的当晚突然通知代表再次开会，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报告以大量的、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对斯大林的否定，以及苏联一些政策的调整，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对采用苏联模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后使得东欧各国人民开始发泄不满情绪，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控制，追求独立自主。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一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不知所措。可以说，苏共二十大为波匈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某种现实条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东欧各国的内部矛盾，兴风作浪，掀起一股反共逆流。则是造成两国事态发展变化的不可低估的外部因素。波兰和匈

 

牙利两国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波兰事件得到了基本解决，而匈牙利却酿成了全国性的暴乱，导致苏联出兵才得以平息。波兰事件的解决实际上是波兰统一工人党适应人民群众的意愿争取独立自主的一次胜利，它是通过党内领导班子及路线的调整，苏共领导的被迫让步而完成的。而匈牙利的结果却不是这样。

波兰解放后，就按照苏联模式“发展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给波兰以极大的震动，政治局势顷刻间动荡起来。新上任的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奥哈布顺应党内和社会上的要求，在国内政策上进行调整，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但显然跟不上苏共二十大后的形势，没有对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也没有坚决检讨和纠正党在过去执政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对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上方面的要求估计不足。1956 年 6 月，波兰波兹南机械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税收，遭到机械部长的拒绝。工人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和警察发生冲突，当地政府又出动警卫部队和坦克镇压，造成死 74 人、伤 900 多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著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哗然，波兰统一工人党受到极大压力。由于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方法上的分歧，又引发了波苏冲突的“十月事件”。

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和事件的前半程与波兰事件大致相同，从一定意义上讲，它的发生也是受到波兰事件的影响。匈牙利和波兰一样，也照搬了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到了匈牙利，人们立刻激动起来，愤怒情绪迅速蔓延，不满情绪已如火山爆发，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0 月 20 日，当传来波兰党政治局改选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的消息后，更促使匈牙利人采取积极行动。布达佩斯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提出撤走匈牙利境内的苏联驻军、政治生活民主化等要求。它所反映的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模式及当时党内拉科西集团的不满，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愿望和要求，这应该说是符合匈牙利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正义的，但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大批反革命分子介入，该国人民的民族情绪被其利用，使匈牙利的秩序遭到破坏，共产党人遭到屠杀。这就使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为挽救匈牙利，也为了保卫这块当时尚属社会主义的阵地，苏军不得已出兵平息了暴乱。24 日上午，苏军应匈牙利政府请求出兵镇压暴动，布达佩斯街头燃起了战火。25 日，许多匈牙利军队倒向暴动者一边，同苏军作战。到 11 月中旬，暴动被苏军最终平定。

1956 年 10 月 19 日和 21 日，正当波苏矛盾有所激化，波兰事件处于紧

张之时，苏共中央两次打来急电，称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要求中共派高级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中共决定派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苏。10 月 23 日，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一天，匈牙利事件爆发。由于中共代表团是针对波兰事件和波苏关系的目的而来的，对匈牙利事态的发展尚需进一步了解，所以当赫鲁晓夫向中共代表团介绍匈牙利事件时，刘少奇未作任何表态。但刘少奇向赫鲁晓夫表示：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即对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是表示支持的），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们这次来，带来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一个商量性意见，也希望有机会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同你们交换一下这方面的意见。赫鲁晓夫当即表示同意。

10 月 29 日，中苏高级会谈正式举行，会谈的主要议题是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引申出来的苏联与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刘少奇向苏共中央转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苏联共产党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关系上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兄弟党之间发生了矛盾时，应多作自我批评，主动地纠正错误和偏差；兄弟党之间应经常互通信息、交换意见、交流经验、相互切磋、沟通思想，但绝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发号施令，要求别人无条件服从。关于现时的苏联和波兰、匈牙利的关系，刘少奇建议：苏联对东欧国家是不是可以采取一项根本的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来搞，不干涉他们，不仅对波兰、匈牙利，而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都满足他们独立自主的要求。军事方面，可以主动撤回驻在那里的苏军。华沙条约可以跟他们商量，问他们是否要。无非是三种情况：一是完全不动；二是撤军，必要时再回去；三是完全不要军队。刘少奇说，我们的意见，是要跟苏联同志商量，看怎么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关系，用华沙条约帮助苏联同志取得群众拥护。苏联老大哥对某些问题，特别是在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不妨多作些自我批评，以弥补不足和疏漏之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党建议，公开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在对待兄弟党关系上的态度和国际问题上的主要立场。

10 月 30 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拥护宣言，指出："它对于改正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方面的错误，对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社会主义运动越出一国范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国际共运的新课题。社会主

 

义国家如何做到既团结一致、又彼此尊重各国之间的独立主权，在当时来讲尚无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宣言》的发表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为波兰事件的解决和波苏矛盾的缓和作出了贡献。

中苏双方正式高级会谈时，刘少奇已经对匈牙利事件初步了解并得到国内明确指示，因此，他代表中共中央向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表示，对待波兰和匈牙利，应该是不同的方针，波兰是是非问题，匈牙利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如果不挽救，后代会说我们犯了错误。邓小平当时斩钉截铁地表示："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中共代表团的具体意见是：第一，苏军不能撤出匈牙利，不应把革命阵地拱手送给敌人；第二，全力扶持匈牙利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第三，掌握住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护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中共代表团这一明朗的态度对苏共下决心出兵匈牙利平息暴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从 1956 年到 1957 年年初，中国国内出现部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我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革，经济建设工作中已出现的冒进又未能完全克服，加上苏联模式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弊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人民物质生活资料紧张的局面。1956 年秋冬，在许多城市出现了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升学、就业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6 年 9 月到 1957 年 3 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有多起共约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全国总工会反映：1956 年一年中不完全统计，工人罢工事件 29 起，请愿事件 57 起，共 86 起。其中，第一季度为 6 起，第二季度为 19 起，第三季度为 20 起，第四季度为 41 起。1956 年以来，在山东、辽宁、江西、陕西、甘肃、福建、浙江等地，还发生了复员军人请愿闹事事件。"在农村中，夏季以来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还有一些错误议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

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从理论认识和实践行动上把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也促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思考如何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便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更好。

虽然毛泽东并不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毛泽东还是从大局出发，对苏共二十大给予了支持。1956 年 4 月，在他的主持下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共中央在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并且指出，“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根据党中央再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发表了毛泽东主持撰写并亲自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分析了国际共运中的几个问题，第一次从国际共运的范围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获得解决并得到新的团结。这篇文章的论点尽管并非完全正确，但对帮助共产党人从当时的思想混乱中获得清醒，起了一定作用。文章对两类矛盾的分析尽管是从国际问题和国际矛盾而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客观分析的思想。这一思想随后在毛泽东 1957 年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后来整理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作了系统的阐发，并构筑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体系。



1956年的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反映了苏联在处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大国主义错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阵营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各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要始终清醒和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

波匈事件打破了过去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其历史进步性和优越性而不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观念，破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苏联模式的迷信，从而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并不是只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各国都可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波匈事件的发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思考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正是基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斯大林，并且正确认识到苏联模式带来的弊端，开始了大胆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研究回答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适应了我国由革命到建设转变的需要，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继承和发展，是1957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还需要一个继续巩固和完善的过程，加上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了过急、过快的问题和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倾向，以及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使得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紧张。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短缺，少数地方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工作安排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发生了闹事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的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共约一万多人；城市发生多起大、中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由于1956年夏收成不好，粮食减产，于是不少地方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 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也有十一二万户，等等[①]。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处于被动地位。他们用老眼光看待和处理新的问题，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涉及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有过一些科学预见，例如，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式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②]，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不具有对抗性。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他们没有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作出系统的阐述。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消失了、矛盾还存在，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非对抗性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源泉。但是由于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十分短暂，最终难以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系统的理论。斯大林则是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是完全相适应的。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如果调节不好，是要出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下还存在矛盾。但是缺乏理论分析和科学的论证，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理论性的问题提出来。这些情况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对立统一的理论，突破理论禁区，在深入考察和分析民主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从酝酿到形成，在当时十分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思考和逐步完善的过程。据他自己所说，这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③]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分析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经济十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十种关系，就是十种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他对十大矛盾进行了逐一分析，提出了出处理各种关系的原则。

1956 年 12 月 4 日，毛泽东在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最早提出两类矛盾思想的。他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他指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了（即使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以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随后，1956 年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两类矛盾的观点，“我们目前有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互相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文章还指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分析当时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时，强调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上述理论探索的基础上，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对在座的 1 800 多位各方面人士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发表了讲话，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讲话稿最初只是一个 1 600 余字的提纲，讲话从下午 3 点开始，讲到下午 6 点 40 分，“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提纲展开的”[4]。讲话由速记员记录，胡乔木将记录稿整理成文字，于 3 月 30 日报送毛泽东。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不同场合继续阐发了这个问题，而后对讲话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于 6 月 19 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毛泽东指出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并进一步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了各种矛盾，其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不断运动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基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并且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客观实际。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大量的、普遍的存在着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敌我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因而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则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进而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这就在本质上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以往一切旧社会的矛盾严格区分开来。

他进一步指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的方针、方法。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绝不能混淆。简单地说，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就是对敌人实行专政，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将其改造为新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说服教育，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是非问题，有害而无益。基本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政治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就是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毛泽东还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指出两类矛盾转化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因此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举例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本是对抗性矛盾，但在我国条件下，处理得当可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如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政策，就会变成敌我矛盾。”同样，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也会转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他坚持认为，只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矛盾，就一定能创造有利的主、客观条件，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

同时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就 11 个具体问题作了分析。关于肃反问题：反革命还存在，但是不多，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究”。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必须注意从生产和分配上处理好国家与合作社、合作社同合作社、合作社内部之间的矛盾。关于工商业者问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看做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还要经过学习改造。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

造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世界观，逐步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方针，加强民族团结，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问题：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于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应当把闹事群众引向正确道路，要利用闹事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未解决的问题。对闹事带头人物，除违犯刑法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法办外，不应轻易开除。对少数坏人，则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关于坏事能否变好事：必须学会全面看问题。关于节约：我国既是社会主义大国又是经济落后的穷国，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毛泽东指出，我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今后主要的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思想的提出是符合我国实际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在当时有着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十分必要的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发表时因受6月中旬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加上了在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思想。"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话，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论点。这些论述修改了八



大精神，同原讲话稿不大协调，在理论上也有不妥之处。此外，还增加了关于鉴别“鲜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些修改对于其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它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理论的纠正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阐述，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独创性贡献。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面对许多新产生的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发扬光大毛泽东所倡导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87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3 页。

③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记录稿），1957 年 3 月 10 日。

④《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22 页。

整风运动的开展

1956年，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形势，经受新的考验，然而事实证明，这时党内许多领导干部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办法处理新问题，用错误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人民群众，甚至日益滋长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弊病。

鉴于此，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告诫全党："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为了落实党的八大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最后一天的总结报告上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①并且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②他还说："整风是我们在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③

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并要求全党在新形势下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整风提出了指导思想。在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的总结报告中，他说，"政府有缺点就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4]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于党内整风的动员。紧接着，在3月6–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再次强调整风问题。他指出，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在整风中，应允许人家提批评意见，但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5]。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

会后，党内外人士对于毛泽东在整风问题上的讲话出现了不同的反应。各民主党派反应热烈，他们先后召开会议，纷纷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储安平在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章伯钧听到毛泽东的讲话后，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6]。然而在党内，一些干部则表现出怀疑和抵触的情绪，对整风运动缺乏足够的重视。山西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一些人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他多了""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7]。

为了说服党内干部解放思想，鼓励党外人士敢于向执政党提出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以促进整风运动的展开。从1957年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上海、南京等省市。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召开会议，发表讲话，动员党内干部参加整风运动。例如，在济南，他指出，革命胜利后少数党员意志衰退。他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毛泽东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2/3的心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重新振作起来。因此，必须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他指出"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8]在南京的讲话中，他强调"我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

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提醒全党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在战时，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那么，和平时期，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就难于原谅了。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他还提出，全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次南方巡视，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在巡视过程中，他发现党外人士对整风反应积极，而在党内，大多数干部则表示怀疑，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迟缓，面对党内普遍存在的消极情绪，毛泽东下决心进行开门整风。

1957 年 4 月 9 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同时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1957 年进行准备，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 年全面开展，用二至三年时间完成。但是，这一草案和通知并没有下发。[9]4 月 19 日毛泽东亲拟党内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并把讨论中“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各级领导的意见及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写成报告”，在 15 天内用电报（外地）和书面报告（北京）送中央。[10]

1957 年 4 月 27 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同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作为吹风，即《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发至基层党委。这些文件阐明了整风的目的、方式和步骤。规定整风要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纠正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29 日，毛泽东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11]。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毛泽东讲明整风的意义，表明共产党人的真诚态度，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整风的总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关于整风的方法，毛泽东说“非



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标志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展。

关于整风运动的目的，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社论表示，目前的整风运动将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保证我们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先进的、生动活泼地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开展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评，不要停顿或间断。党外人士参加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如有不便，则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畅所欲言地对党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批评和不正确的观点，应予以反批评，不应当让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但要研究回答的时机，要有说服力。指示下达后，中共中央统战部于5月8日到6月3日，召开了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共有70余人次发言。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于5月15日至6月8日，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共有108人次发言。从5月4日至23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9个大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并对发言内容作了报道。与此同时，各级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都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他们对党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例如：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民革中央常委刘斐说：现在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会也开得不正常。党和政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说：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却权力极大。中国

致公党常委黄鼎臣说：过去党组常常代替行政布置工作，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党组出面。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说：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各个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也要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党组织不能代替行政。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人怀疑党的领导权问题，那就与宪法的规定违背了。但是领导的方法是可以研究的。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 、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策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就会造成很多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他们还提出了必须加强法制建设的意见。民革中央副主席熊克武说：目前法制不完备，政策方针的宣传不够深入，不但人民群众对某些事物感到模糊，就是有些领导人有时也免不了表现得无所适从。健全法制，不仅有关肃反工作，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有重要意义。刘斐说：党政不分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等原因造成的。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注意不够，也不无影响。要改变这种情况，除开展进行思想整风之外，还必须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黄绍竑说：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规定。民革中央常委刘文辉还提出了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等等。

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运动中的处理，民革中央常委王昆仑说：一方面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某些人在哪里受到错误处理的，在弄清楚后，就在哪里为他公开恢复名誉。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说：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通过群众运动来处理肃反，也是正确的，执行方面发生部分偏差，要根据根本搞错、没错但处理不适当、有嫌疑而无证据、没错而予宽大处理四种情况分别处理。同时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民盟中央常委邓初民对于批判陶行知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与杜威的生活教育在内容与实质上都不能混为



一谈，就因为批判杜威的“生活教育”和武训传就把陶行知一棍子打死，不能让人服气，并且希望党能重新给他评价。

此外，一些人还提出了应重视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在提拔奖惩问题上，要对党内外人士一视同仁；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等等。

这些批评、意见和建议揭露出许多问题，其中绝大多数人是真心诚意的给党提意见，许多意见是正确的，对于党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具有积极作用。

注释：

①②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

④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 年 3 月 1 日。

⑤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 年 3 月 12 日。

⑥《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23 日。

⑦吉林省档案馆，1-13 / 1-1957. 72，第 19 ~ 21 页。

⑧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 年 3 月 18 日。

⑨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421 ~ 422 页，第 432 ~ 433 页。

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06 ~ 607 页。

反右派斗争

整风运动开展以后，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号召和动员社会各界和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不断要求他们打消顾虑，大胆给党提意见，批评的闸门终于打开，各种批评汹涌而来。他们针对党派关系、党政关系、立法和执法问题、干部人事制度等有关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尤其是对中共执政以来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和农业合作化、手工业改造、私营工商业改造、建设中的冒进等经济政策提出了质疑。此外，在这些批评意见中，也确实有少数人趁机散布反对共产主义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

此时，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鸣放的作用作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知识分子的言行当作敌人的言行，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更由于党和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对一些涉及到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问题的提法没有思想准备，因此在反对主观正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中，就很容易把对现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需要改革的意见，误认为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了。尤其糟糕的是，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缺乏正确的认识，长期忽视民主制度建设，主张采取群众运动集中鸣放的“大民主”，将整风运动中社会各界和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公开登报发表，因而造成了以往历次整风运动所没有的社会氛围和社会影响，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样，原本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进行开门整风运动，可以形成一定的社会空气和社会压力，促使党的干部和党员更好的改正错误，转变作风。但却没有料到，如此汹涌的批评潮流势必形成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这些现象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

于是毛泽东不再把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说成“姑嫂吵架”，而说成是“敌我”了。这表明此时的毛泽东不但敏感了，而且给这一新的矛盾



重新定了性。整风运动发生了出人意料的逆转，变成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章以严肃的语气告诫道：党内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他们否定一切，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危险；还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新党员，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在一起，亲如兄弟。党外知识分子中，中间派占 70% 左右，左派占 20% 左右，右派占 1% ~10%。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他们是做梦。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 7 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但是他们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①]文章写好后，他先是批给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彭真阅看，然后，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将文章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在文章印好后，他又提醒说：“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报纸上发表。”[②]

至于为何要继续把那些右派言论登在报上，毛泽东的策略是：在一个时期内报纸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进攻不予回击，是为了“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并说“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③]

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开始部署运动，从 5 月中旬至 6 月初，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制定反击右派的策略。中共中央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更广泛地动员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各级党组织不予公开批驳。5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开展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报道

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认为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认为在整风运动已经展开的北京、上海等地，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不够。各地党报应该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越好），在一个短时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行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于是，这一时期，一大批对共产党的批评和意见的言论被引出来，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鸣放言论主要表现为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建议，他说：“我带头主张中国搞两院制。把政协变成参议院，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提出关于成立“平反”机构的意见，认为“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以及《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批评等等。由于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许多报刊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鼓励鸣放，将这些言论刊登出来，这些言论在知识界和学生中产生了共鸣，学运风潮从北京大学开始并引向全国。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发生动乱的苗头和趋势。例如，陕西省的高等院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风波和闹事事件，学校领导“处于紧张被动状态，‘四面作战’，招架不住”，情况严重的有西安航空学院、陕西师范学院、交通大学、西安建筑学院、西安动力学院等[④]。城市工人闹事，以上海为例，据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统计，1-4月份闹事的约有44个工厂，参加闹事的职工约3 200余人，但到了5-6月份，闹事风潮急剧上升，涉及548个工厂企业，参加闹事的职工约31 000余人[⑤]。此外，部分农村也出现了闹事风潮。这使得党中央和毛泽东感到局势很严重，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他们认为反击右派运动已经刻不容缓。



于是，6 月 8 日，反击正式开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⑦]由此标志，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按照中共中央安排，各地报刊发表大量反击右派的社论、文章，公开动员反击右派；全国许多工厂、机关、学校、民主党派纷纷举行座谈会，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论。6 月 19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修改稿（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⑧]，并且增加了判断我国政治生活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成为划定右派的政策界限。这一修改为批判右派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 6 月 8 日到 7 月中旬，反右派斗争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反右派斗争首先在民主党派、高等学校、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科技界中进行。斗争采用“疾风暴雨”的方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反右派斗争在民主党派中，以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为重点，其代表人物是章伯钧和罗隆基。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指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飞，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错误地把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高等学校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右派表现的“最坚决最猖狂”，因此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7 月 7 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吉林省委《关于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报告》。报告认为，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中活动。中共中央认为，中共吉林省委的这个观点很重要，希望各地予以注意。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全国许多高校到处是批判右派言论的大字报，被划为右派的师生成为众矢之的。在教育界，批判围绕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学校领导体制、院系调整和改革等意见展开。其中，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等一批教育界知名人士遭到批判和处理。在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涉及到文学、戏剧、电影等各个专业领域的文

学家、艺术家。一大批文学作品受到批判和否定。其中著名的有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批判认为“丁、陈反党集团”“其目的就是要使文艺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使文艺成为给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9]在新闻界，批判主要针对党外的报纸，如《文汇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认为这些报纸在一个时期大量宣传资产阶级右派言论，已经脱离了党的领导，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其中以对《文汇报》的批判最为猛烈。7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指出，《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并且说，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在科技界，全国科联通过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决定》，要“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绝不允许丝毫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绝不允许违背社会主义的道路”。[10]

1957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对反右派斗争作出进一步部署。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1957 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发给与会者阅读。文章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单有 1956 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使这场革命更加深入，文章表示赞成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其“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并提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文章还指出，“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

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反右派斗争进一步扩展到地县两级和大厂矿、中小学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向中央和各省市一级单位深入。8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一方面正在向地县两级（城市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随着这个指示的发出，对党内右派的揭露批判及其报道开始不断增加，不少党内干部遭到批判。9 月 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



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全面深入展开，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更多地暴露出来。据统计，目前已发现党内右派分子约3 000人。他们多数是解放前后入党的，有不少是有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这些党内右派分子的暴露，是这次反右派斗争的很大成绩，这对于我们党的巩固和纯洁，具有重大的意义。指示还说，党内右派分子的言行同党外右派分子一样，没有理由不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把他同样划为右派分子，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党内右派分子，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对那些同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决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党员而有所宽容，决不应该漏掉真正的党内右派分子。据此，对党内右派分子的批判和斗争日益加大，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内高级干部被划为“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甚至被说成是“反党集团”。

除了在党内深挖右派，在农村、企业、高等学校还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认为，目前有必要在全体农民中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这是关系农村两条道路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对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指示下达以后，各地农村采用大鸣、大放、大斗争、大辩论的方法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并同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相结合起来进行。在企业，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企业的领导，用大字报、辩论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放手发动工人群众提意见，边整边改。特别是对一些重要问题，要组织群众讨论，以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在整风期间，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做到整风和生产两不误。在高等学校，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高等教育部认为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不平衡，要深入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并要求除了运用课外一切方法和各种专业进行政治教育外，还要在课程内有系统的进行，改变原有的政治课的内容和方法，利用政治课时间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至此，反右派斗争由各民主党派、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工商界逐步扩展到地县两级、工厂企业、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部队以及中小学，从党外波及到党内，逐步推向全国，直到

1958 年夏季才宣告结束。

注释：

①②③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66 页、第 268 页，第 476 页，第 531～532 页，第 344 页。

④《内部参考》1957 年 5 月 29 日，第 14～17 页，陕西省档案馆，123-43-38，第 1～9 页。

⑤上海市档案馆，C1-1-187，第 1～15 页、第 74 页；《内部参考》1957 年 9 月 28 日，第 12～14 页。

⑥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第 284～285 页，第 289 页。

⑨《人民日报》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人民日报》，1957 年 9 月 1 日。

⑩《全国科联全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批判右派分子曾昭抡、钱伟长》，《新华社新闻稿》，1957 年 7 月 21 日。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其危害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①]。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国情认识不足，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缺乏全面的认识，导致对当时右派进攻的形势的估计严重脱离实际。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逐步席卷全国，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从实践上看，这种扩大化体现在量和质两方面，即对右派人数的判定和对右派性质的认定上。对右派数量的判定上，在斗争之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设想划定后来那么多的右派，"除个别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②]。6 月 26 日，中共中央认为，"全国暴露出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③]6 月 29 日，中共中央根据北京 34 所高校和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极右派"约有 400 人左右的数字，估算出"全国大约有 4 000 人左右"。[④]7 月 9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指出，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 1 倍，全国不是 4 000 人，而是大约有 8 000 人，例如北京约有 800 人，上海有 700 多人。现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 3% 左右。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 10% 左右为止。8 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认为，右派分子将继续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极右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 10%，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 20%、30%、40% 或 50%。这样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分化右派。[⑤]8 月 17 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到 8 月 7 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 7 511 人，已在不同范围内重点批判 3 529 人，占右派总数的 47%。9 月，根据八届三中全会的统计，已划右派 6

万余人。这次会议后不久，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指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分为下列三部分：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意推翻某一部门或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共产党的个别组织或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或工作中、学术性的问题等；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且已经认错的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的人；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等等。《通知》还指出，划分右派分子要有适当的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但是，这一标准是很含糊的，并不具体，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精确地掌握和运用。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到运动结束时，在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到55万余人。

在对右派性质的认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同样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5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认为，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到7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的建议中指出“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并且指出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经处于敌我界限的边缘。然而，没过几天，毛泽东就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将右派分子



定性为“反动派”、“反革命”，并且强调“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到了1958年5月，更是将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归为一类。[⑥]

由于对右派分子的定性，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受到降职、降级、留用察看、下放农村工矿监督劳动、劳动教养，甚至开除公职、学籍、开除党籍、团籍的处分。使得一大批出于善意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议和批评的知识分子、党政干部、爱国人士受到打击，不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然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带来的影响，不仅仅限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特殊群体，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回忆中就曾写到“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⑦]

从理论认识上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改变了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中共八大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正确地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反击右派开始后不久，1957年6月，毛泽东在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时，补充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⑧]。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并且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错误提供了理论的根源。

在理论认识上的又一重大失误是剥削阶级继续存在的思想的提出。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发展

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国内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即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这年4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谈了我国“还有两个剥削阶级”的问题。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采用了毛泽东关于国内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点。在中央工作报告上说：“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和过渡的状态。”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建国之初便已经被消灭的官僚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仍然存在，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作为剥削阶级，那些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显然是错误的，是认识上的倒退。这样原本应当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问题，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了。直接导致在反右派斗争时对阶级力量对比作出不正确的估计，并最终对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不仅如此，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生，给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由于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大批的群众性集会，到处张贴大字报，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紧张气氛。用群众运动和斗争的方式代替司法，把很大一批人在政治上定性为“反动派”、“反革命”，并给以严肃的处理，甚至株连其家属。这些处理因为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可能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办理，这样做，不仅导致扩大化的继续严重，也堵塞了言路，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严重损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得法治思想日益淡薄，人治思想日益盛行，严重阻碍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所产生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不仅导致当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继续深化，并最终影响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走不出阶级斗争的误区，使“这个反右派斗争扩大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这个怪物(或是叫魔影)，就很长时间笼罩着我们的党了。[9]”给中国社会造成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1957 年 6 月 8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第 285 页。

②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 年 5 月 15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0 册，第 267 页。

③《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1957 年 6 月 26 日。

④《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1957 年 6 月 29 日。

⑤《中共中央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1957 年 8 月 1 日。

⑥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 年 5 月 5 日。

⑦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版。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44 页。

⑨《胡乔木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68 页。

给“右派分子”摘帽子

1959年党中央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全国共有近20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不可能进行实事求是地甄别改正工作。197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为右派的改正过来。截止1981年年底，基本复查改正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待遇，也都根据政策做了妥善的安排。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共中央首次决定给一批右派分子摘帽子。

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写到：“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带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9月16日公布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为了便于给右派摘帽子工作的操作，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摘



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指示规定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三个条件，以及给右派摘帽子的手续和办法。并且要求在国庆节前最好宣布摘掉一批。为了配合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1月2日又下发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12月5日，报纸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共142人，其中有费孝通、潘光旦、沈志远、徐铸成、浦熙修等等。各地也都这样摘掉一些右派分子的帽子。

12月30日，中央组织部、统战部联合下发《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

"自从中央下达关于摘掉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很重视，普遍设立了工作机构，指定了专人负责，经过对右派分子进行摸底排队，在国庆节前后陆续地摘掉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措施在国内外发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摘掉帽子的人表示非常高兴和感谢，认为是党的宽大，自己的新生。他们的家属和亲友更加感激。没有摘帽子的右派帽子，一般也表示有了前途，决心好好改造，争取下一次能摘帽子，有的劳动和生产效率立即大为提高。一向不低头的右派分子多数表示认罪。中间分子一致表示赞扬和拥护中央这一决定，认为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这是我们党的政策的一个新的胜利。

根据最近的统计，全国共有右派分子439 305人，第一批计划摘掉帽子的37 506人，占右派分子总数8.5%，已经摘掉帽子的28 165人，占6.4%。

我们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检查一下此项工作，争取尽可能在春节前完成第一批摘帽子的计划。计划比例太低的应该实事求是地适当提高。同时要抓紧这一有利形势，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对已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要巩固他们的改造成果。对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要促使他们进一步分化，帮助他们继续改造，并且经常地和及时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在改造中的表现，为今后摘帽子做好准备。已结束第一批摘帽子工作的地区要认真作出总结。

以上报告，如中央同意，请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9月14日，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又发出《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认为1959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后，各地都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一指示。在全国四

十四万右派分子中，摘掉了约四万名右派分子的帽子，占总数的 9% 左右，这对于右派分子的改造和分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半年来，各级党组织对改造右派工作的进一步加强，资产阶级右派起了更大的分化，绝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和悔改。根据各地摸底排队的情况，目前右派分子改造得好的占 30% 左右，表现一般的 50% 左右，表现不好的 10% 左右，其中死顽固的分子约有 3% 至 5% 。

为了进一步改造和分化右派，报告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继续贯彻中央关于分期分批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根据目前右派分子的表现，今年可以再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控制在 15% 至 20% 。

关于今后摘帽子的时间和方法问题，一般仍以每年国庆节前后集中地摘一批为宜。这样作，政治影响大一些，也便于安排工作。

二、在今年摘帽子的同时，对于一部分虽然不够摘帽子条件但是参加体力劳动时间较长（已有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并且悔改表现较好的，可以调他们回来，分配适当工作。对右派分子中的妇女和年老体弱，有病的，由于他们不适宜搞劳动或长期体力劳动，也应该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或作轻微的劳动，这样做，既体现了党对他们的照顾，有利于改造和分化他们，也有利于进一步团结中间派。

三、要注意对右派分子的家属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并给他们以劳动生产的机会，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可给以适当照顾。这样，可以使她们成为推动右派分子改造的助力。对于右派分子的子女入学、就业等，除机密性的专业、单位外，不宜限制和排斥。

四、在右派分子中有一部分被开除公职或清洗回家（约占 5% 至 10% ），目前还分散在城市街道或农村中，对他们的教育改造缺乏统一的系统的管理，希望各地区的主管部门协同所在地区的基层党的组织，对这些人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没有人管的，要指定专人管起来。各地党委应该责成一定的组织没有管理这项工作，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和监督。

五、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今后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同时要注意克服和防止两方面的偏向。一方面是对右派分子丧失警惕，麻痹大意，界限不清，放松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是以简单生硬的方法对待，忽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与地、富、反、坏分子等同对待。这两种偏向都不利于改造分化右派。



六、1957 年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过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整风反右运动，有一些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另有一些人戴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右派）帽子。这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经过两年多的教育改造，也有少数人确有悔改，在摘右派帽子的时候，可以根据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参照具体情况，摘掉他们的帽子，以利于进一步分化和改造他们。

此外，报告还提出希望各级党委抓紧时机，对改造右派分子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并通过检查，作好第二批摘帽子的准备工作。

文件下发后，9 月 16 日，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宣布摘掉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中有黄绍竑、钱伟长、王葆真、叶笃义、金善保等。1960 年全国共摘掉了 55 856 名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1 年 9 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提出，1961 年要多摘些右派的帽子，右派不再进行劳动，让右派有所休息和补充。会议还提出了争取在 1961 年使 90% 的劳教右派分子解除劳教，其中悔改表现好的第一类人占 30% 左右，这部分人都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会议还提出了加强和改造右派分子的措施，指出要加强领导，明确分工，密切协作。

这次会议以后，各地先后召开了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成立了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领导小组，并且设立相应的办公室，加紧了对右派分子的摘帽和改造工作。这一年，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有了较大进展，截止到 1961 年 9 月，全国全国总共有 189 384 名右派摘掉了帽子。

但是，对于错划成右派的人，特别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党外朋友，要求改正和平反的呼声很高。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 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

1978 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 年 9 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把错划的右派改正过来。9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随后，为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12 月，人民政府特赦了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经过两年多的艰苦细致工作，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55 万人中 98% 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被错划的人恢复了政治名誉，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也都根据政策作了安排。从而使许多人从长期的政治困境中解脱出来，

得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9 年 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在 1959 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加快了对错划右派的甄别、改正和落实政策工作。截止到 1981 年上半年，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全国共改正错划右派 54 万多人，占原划右派总数的 99%。原来失去公职的 27 万人，恢复了工作或重新安排了工作。不能工作的，在生活上作了较好的安置。对被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 31.5 万人，一律给予了平反，并对因此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也基本落实了政策。对维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 3 000 多人，也全部正确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过，恢复了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工作和生活。

1981 年 7 月，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处理工作，全部结束。这一拖 20 余年的严重错误，终于得到切实改正。

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在回顾政治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时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



中共中央对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评价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评价作出了结论。结论指出：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①

可以说，这是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从国际国内环境上看，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史上极不平常的一年，苏共二十大以及波匈事件的发生，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风波不断。在国内，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日益滋长出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使党群关系出现了危机，导致国内闹事事件不断发生。综合国内国外的因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此时开展整风运动，无疑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摆脱苏联模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衷所在。胡绳在谈到1957年整风时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他指出，“整风和通过整风想要造成的政治局面的提出，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对于党的事业同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②

从社会历史条件上看，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我们就实现了社会主义，面对这样深刻的变革，必然会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在国内，锣鼓喧天的后面，进行着深刻、激烈的阶级斗争。”原因在于“资方人员曾经长期直接地剥削和压迫工人，

在工人群众中种下了阶级的恶感。解放以后，不少资方人员又曾经一度肆行'五毒'，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3]而这些人当中，就不乏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因此，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这些右派分子人数较少，但所造成的声势、影响却很大。整风运动开展后，广大人民群众、各界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对党和政府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很快揭露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矛盾。这都是正常的，他们的基本态度也是善意的、诚恳的。但是极少数右派分子则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浪。尤其是在"大鸣大放"的口号下，煽动性地言论一时形成了相当紧张的气氛。李维汉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指出，在极少数右派分子"所煽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的一部人一时思想动摇，有的迷失方向。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工、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如果坐视这极少数右派分子掀起来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泛滥下去，刚刚建立起来的尚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4]胡绳也指出："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5]

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对右派的进攻予以坚决地反击，以此稳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遗憾的是，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

首先，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造成理论上的重大失误。党中央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把许多正常的甚至善意的批评建议当做右派的进攻，导致阶级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从而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向"左"的方向偏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由此开始日益的发展。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从根本来说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否认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而且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6]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



计过于严重，因此，1957 年 10 月，八届三中全会上即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过会议小组讨论后，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了这一论断，并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改变了八大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也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源。

其次，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伤害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我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对大多数右派分子进行了过于严厉的处罚，导致许多同志和朋友长期受到委屈和压制，使他们不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党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并对众多"右派分子"进行严厉处罚，使一大批无辜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长期遭受冤屈和打击，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影响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有作用的发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历史上的反右派斗争作了全面的总结。198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指出："对右派问题的复查结果表明：1957 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方面。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处理得不适当。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时期的委屈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这是又一个方面。中央认为，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两个方面，才是历史地全面地看待这场斗争，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是不符合实际的。"⑦

中共中央还总结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教训。认为“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同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矛盾的性质一时未能分清，要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要把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轻易定为敌我矛盾。”“1957年党提出要党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不适当地支持了党外有些人提出的所谓‘大鸣大放’，以至逐步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紧张的政治动乱气氛，这也是后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对于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不应该通过群众政治运动的方式加以解决。因此，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3页。

②⑤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第346页。

③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第833页。

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

⑦《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80年6月11日。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关系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两大阵营的对抗依然存在，但是斯大林去世后，东西方关系一度有所缓和；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动荡不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波匈事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危机；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亚非会议的召开，加强了亚非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推动了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彻底失败，英、法的力量也严重削弱，只有美国依仗其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统治地位。而苏联在战后势力的强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影响的增大，引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敌视。美苏反法西斯联盟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美国推行反苏、反共的"冷战"政策。"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以及北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建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也加强了多方面的联系。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建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西方阵营的重要举措。两大阵营的对立，对世界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分裂、朝鲜战争都是两极对立的结果。

1953 年 3 月 5 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以马林科夫为首的新领导集团一方面继承了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调整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莫洛托夫 5 月 30 日向土耳其大使宣布，苏联"可以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马林科夫在 1954 年元旦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称，"在 1954 年内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存在着有利的条件的"。[①]1954 年 2 月，在日内瓦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还提出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以及世界普遍裁军会议等一系列建议。1956 年 2 月苏共二

十大召开，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赫鲁晓夫提出了“三和”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把这三点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关于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认为，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在那个时期是正确的”，而现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基础，因此“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路：要么和平共处，要么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关于和平竞赛，赫鲁晓夫说：“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的事情，“全世界劳动人民一旦相信共产主义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他们迟早会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道路”。关于和平过渡，赫鲁晓夫强调，不应该“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除了依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苏维埃形式以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有些国家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②]由此可以看出，苏联此时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这主要是因为苏联希望通过缓和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关系，取得他们对东欧现状的认可，扩大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另外，东西方的和平共处，有利于苏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本国的建设上来。在美国方面，1953 年 1 月，第三十四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他提出了新的外交方针，即解放战略。这个战略主要是针对杜鲁门时期的遏制政策提出的。他认为遏制政策使美国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却没有取得胜利，所以要采取更有力更彻底的解放政策，解放社会主义国家。正是由于两个大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才使双方的关系出现了暂时的缓和。其重要的标志就是 1955 年 7 月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

美苏之间的关系刚刚有了和缓，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掀起了波澜。1956 年 2 月 14—25 日苏共二十大召开。就在最后一天凌晨，赫鲁晓夫却突然抛出了一份长达 4 个多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赫鲁晓夫列举了斯大林的诸多罪状。主要有破坏法治、发动大清洗，个人迷信，在卫国战争中的错误，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在和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实行个人独裁等。对斯大林的批判，颠覆了他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伟大领袖的形象。尽管赫鲁晓夫强调，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拿到党外去宣扬，尤其不准登报，以免为敌人所利

用。但是苏共中央书记处在代表大会闭幕的几天后就发出指示，将报告的全文向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不久又在苏共所有基层组织全体党员会议上传达。3 月 5 日，《纽约时报》披露了“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院后来又公布了报告的全文。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政客和媒体借机大做文章，掀起反苏反共的浪潮。社会主义阵营也陷入混乱。在苏联本国，一部分人认为报告是对伟大领袖的诋毁，完全是胡说八道；也有很多人觉得斯大林是“国家的罪人”；那些在 20 年代受到镇压和迫害的反对派的亲属还要求为他们的亲人恢复名誉；更有极端者建议取缔苏联共产党。3 月 7—9 日，在斯大林的故乡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

6 月波兰西部波兹南城又发生流血事件，简称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波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致使经济不景气，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6 月上旬，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政府增加工资和减少税收，派代表团到首都找机械工业部谈判，因陷入僵局，工人不等代表团返回，就到市区广场向市政当局请愿。28 日，该厂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后来与警察发生冲突，死了 54 人，伤了 200 多人，数百人被捕，骚乱当夜平息。7 月 10 日，政府宣布分期偿还向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超额税收等，于是双方矛盾趋于缓和。10 月 23 日至 11 月 4 日，匈牙利发生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被平息。历时 13 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波匈事件的发生，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

与此同时，西方阵营内部的矛盾也有所激化。1956 年 10 月 29 日，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一条国际通航运河，全长 175 公里，它沟通了地中海和红海，缩短了欧亚两洲的航程，是沟通欧、亚、非三洲的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运河自开通以来，一直为英法所控制。1882 年，英国派兵占领埃及，在运河区建立了它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1936 年又签订了《英埃条约》，肯定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权。二战结束后，老牌殖民国家如英、法等受到很大削弱，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1951 年 10 月，埃及废除了《英埃条约》。1952 年 7 月 23 日，以纳塞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英国扶植的法鲁克王朝，废除

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1954 年 10 月，英国同埃及签定协定，同意分批撤军。1956 年 6 月，英军全部撤离埃及，但苏伊士运河仍为英法控制。7 月 26 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为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英法与以色列联合，于 10 月 29 日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埃及军民坚决抵抗侵略者，尤其在保卫塞得港战斗中，充分发动和武装群众，军民联合，英勇作战。苏联此时宣称，如英法不停火，苏将对英实施核攻击。美国为把英法势力挤出运河区，命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威胁英法。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英、法被迫同意停火和撤军，战争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是资本主义阵营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这次事件使英法的实力受到削弱，而美苏两国仍显示出超强的势头。

在五十年代中期国际风云变幻中，亚非诸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蓬勃发展。1955 年 4 月召开的亚非会议，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重重障碍，大大促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二战后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对峙局势，严重威胁着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安全。由于帝国主义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亚非地区成为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的地区。许多亚非民族主义国家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出发，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认识到，为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并要求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亚非两洲的第一次历史性聚会在美丽的山城万隆隆重开幕。来自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今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也门（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 304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一些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如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突尼斯新宪政党、摩洛哥独立党、南非联邦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等也派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大会上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致了长篇开幕词。他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他指出，殖

民主义是一个狡猾的敌人，只要它没有死亡，世界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他呼吁，亚非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苏加诺还强调，亚非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出呼声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是要建立反对其他集团的集团，而是为亚非各国、为全人类找出通向和平的道路。世界和平和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亚非国家进行建设、实现社会正义和繁荣的必要条件。从 18 日下午至 19 日全天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共有 22 个国家的代表。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认为这些祸害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希望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合作和团结；要求维护世界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消除饥饿和贫困。由于与会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加上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某些国家之间的隔阂，彼此间存在分歧是难免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在 19 日下午发言。他首先向与会各国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存在着广泛的求同基础，他说："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总理还就关于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关于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关于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以确凿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回答两天来少数代表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周总理真挚地表示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来中国参观。他最后热忱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与会代表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周总理的发言。从 20 日到 24 日会议进入专项议程讨论阶段。此次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 10 项原则。

历时 7 天的亚非会议，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亚非会议所体现出的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要求亚非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精神，鼓舞了亚非拉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促进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和睦邻友好，加强了亚

非新兴国家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觉；推动了日益众多的亚非国家走上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此后，这些国家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在世界事务中所处地位日臻重要，促使国际政治力量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可以说，亚非会议是战后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总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国际关系十分复杂，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对各国的前途和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①②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三分册，重庆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67 页，第 579 页。

参考文献：

[1] 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2]（英）理查德·克罗卡特，王振西主译，《50 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 年版。

[3] 百度百科 http：//baike. baidu. com/view/89232. htm。

[4]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 年版。

毛泽东第二次率团访苏

1957 年 11 月 2 日，毛泽东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 64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受到了最高礼遇。

苏联领导人十分重视毛泽东的此次莫斯科之行，不仅是因为 5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还因为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国对新上台的赫鲁晓夫政府在处理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事务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问题时，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与帮助。

1954 年 9 月 29 日，赫鲁晓夫率领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党政官员乘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参加我国国庆五周年庆典。这是自苏联成立以来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访华。中国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刘少奇、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贵宾，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方对苏联代表团的接待是最高规格的。中苏双方签署了《中苏两国政府联合宣言》、《中苏两国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问题的联合宣言》、《中苏关于各股份公司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等 8 个文件。同时，苏方给予中国 5.2 亿卢布的长期贷款，赠送中国一批农业机械设备。在访问期间，赫鲁晓夫说，援助中国就是帮助苏联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苏联的最大支持。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闭幕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引发出了强大的冲击波。几十年来，斯大林的名字，他的语录，他的画像和塑像无处不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心中，斯大林就是一位神圣的精神领袖。而“秘密报告”发布的比较突然，事先没有和各国共产党商量，一瞬间斯大林的神圣形象被打碎了，人们在心灵上所受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另外，“秘密报告”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仅仅将个人崇拜的原因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而不去分析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并且在言辞上明显掺杂着大量个人情绪，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得不客

观。这样的批判不仅无法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端，而且还为西方攻击斯大林、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它不但损害了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而且降低了苏联的大国威望。苏共领导者们显然没有考虑到“秘密报告”的严重后果。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处理让苏共领导人感到十分满意。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多次讨论，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来阐明中国的态度。毛泽东指示既要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观点，同时也要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既保护又批评，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正面阐述中共的观点。文章的发表对于澄清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混乱，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6 月 30 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开始为“秘密报告”纠偏。决议引述了《人民日报》文章对苏共的劝告：“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即使这样，“秘密报告”的影响仍无法完全消除。与苏联最近的东欧国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国家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手里解放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后，东欧国家的人民也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于是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不断高涨。波兰、匈牙利接连出现了大的社会动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困境。对此，中共中央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从维护苏联稳定的大局出发，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波匈事件的平息，使苏共更加看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1957 年 1 月，周恩来访问苏联。在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时，周总理批评了苏联在世界战略方针和大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和做法，建议他们采纳毛泽东提出的“世界讲和，长期防御”的方针。他还阐述了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说第三阵营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但是他们害怕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使他们安心”。1 月 24 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此次访问的情况。他说：“中苏两国可以平等地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总理还建议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党和政府代表会议。此时中共中央认为，虽然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有缺点错误，但却是可以被说服的，召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并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广泛团结。[①]鉴于中

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再加上苏联当时的处境，苏共中央决定邀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在庆典活动之后召开国际会议。

苏共多次表示希望毛泽东亲自来苏一趟。毛泽东对苏联大使说，我作为国家元首已经访问过苏联一次，希望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回访中国之后他再访苏。为争取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1957年4月，苏联政府派遣伏罗希洛夫对中国进行礼节性回访。伏罗希洛夫离开北京时再次邀请毛泽东访苏，毛泽东留有余地地接受了邀请。但是不到一个月，苏共中央发生党内斗争，赫鲁晓夫差点下台，反对派莫洛托夫等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的第二次政局变动，而且就发生在波匈事件之后不长时间。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怎样看待这件事？赫鲁晓夫最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反应，于是急派米高扬于7月5日来华向毛泽东当面解释，希望中共中央能再次支持以他为首的苏共中央。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件事的是非曲直颇为怀疑，认为赫鲁晓夫的胜利，以力压人多于以理服人，对莫洛托夫等人的处理太粗暴。但是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公开发了支持电。毛泽东还向米高扬表示，他将出席莫斯科会议。②米高扬回到莫斯科后，把中国之行的情况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赫鲁晓夫非常高兴，作为对中国的回报，赫鲁晓夫决定增加对华的援助项目，并答应帮助中国发展核技术，甚至提供一枚原子弹样品。

1957年11月2日早晨8点半，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由苏共中央派来的“图104”专机从南苑机场起飞。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是毛泽东，副团长是宋庆龄，团员有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郭沫若、沈雁冰、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刘晓、赛福鼎，杨尚昆兼任秘书长。①

“图104”首先在伊尔库次克机场降落。苏联派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外长费德林，专程来这个边境城市迎接中国代表团。波斯别洛夫向邓小平同志介绍《莫斯科宣言》的起草情况和活动日程安排，又向杨尚昆主任介绍会议组织筹备情况。下午3点左右，飞机抵达莫斯科，降落在伏努克机场，舷梯下红地毯铺成长长一条路，当毛主席的身影在舱门一出现，机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赫鲁晓夫满面笑容热烈鼓掌，在他身后是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柯西金等一大批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也来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并发表

简短讲话，对苏联的热情邀请表示感谢，赞扬40年前十月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最后指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欢迎仪式结束后，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同乘一辆装甲“吉斯”汽车，来到克里姆林宫内的捷列姆诺伊宫。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这次来访格外重视，其他国家和党的领导人都被安排到列宁山等处，对毛泽东则给以特殊规格的礼遇：不仅住到克里姆林宫来，而且要住到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寝宫里。那离会场即乔治大厅只有几十米远，有一条走廊通往乔治大厅。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以及工作人员也都被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苏方为接待中国代表团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重新布置了他的卧室：把原来笨重的钢丝床撤掉，换上一张宽大的木板床，把毛毯、鸭绒枕头之类的东西拿走，换上从北京带来的又长又宽的棉被和枕头，把卫生间的坐式马桶改成蹲式马桶，调整了床头上的灯光等等。

11日3日，即中共代表团到达的第二天，苏联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得知这个消息，代表团的同志都很高兴。晚上7时，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共进晚餐，两人进行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4日上午，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到苏共中央办公大楼，又礼节性地拜会了赫鲁晓夫。5日下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墓，并献了花圈。6日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卢日尼基体育馆召开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庆祝大会由卡班诺夫主持，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报告。然后，卡班诺夫宣布休会。下午4时继续开会，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团长致词。毛泽东第一个致词。他一出场，全体与会者立即起立致敬。在讲话中，毛泽东热情地赞扬了苏联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对赫鲁晓夫奉行的方针政策表示了充分的支持。他说：苏共中央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空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在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

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那么，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在毛泽东讲话的过程中，会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毛泽东讲完后，全场再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致敬。接着，波兰、捷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蒙古的代表团团长依次致词。他们的讲话都受到与会者的热烈鼓掌欢迎。接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致谢词，然后大会通过了《告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书》。晚上8点半大会结束。

11月7日上午，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苏联在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和群众游行。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步行到红场观看了阅兵和群众游行。游行结束时，当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从列宁墓上走下来，群众围上前来，热烈欢呼。据苏联朋友讲，这种场面是前所未有的。11月7日晚上8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招待会，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出席。11月8日上午，莫斯科市在卢日尼基体育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群众纪念大会。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出席。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致开幕词，接着陶里亚蒂、多列士和宋庆龄相继致词。

宋庆龄在致词中说，30年前的十月革命节，我也曾经同你们在一起。30年来在你们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国人民为和平和人类的进步赢得了光辉的胜利。30年前，当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为了抗议对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对中国革命的背叛，被迫离开了我的国家。但是，当我一踏上苏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完全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人民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在久经锻炼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获得了胜利。根据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苏友谊的深厚，在我们所进行的改造世界的历史性事业中，中国将永远同伟大朋友苏联站在一起。最后，宋庆龄说，我深信，在不远的将来，社会主义将成为全人类的选择，剥削和民族压迫将会永远消灭。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将会出现普遍的和睦。人类的充分的和广阔的发展将会开始。宋庆龄热情洋溢的讲话，获得多次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后，还出

席了14日—18日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11月17日，毛泽东看望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并发表了著名的和青年留学生的谈话。11月21日，在圆满完成出访任务后，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回到北京。

注释：

①②罗燕明：《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纪实》，《党史文汇》，2009年第六期，第13~19页。

参考文献：

[1] 阎明复，朱瑞真，赵仲元：《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秘闻》，商都网文化频道 http://cul.shangdu.com/photos/20090408-21980/index.shtml。

[2] 何明，罗锋编：《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3] 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4]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中苏之间潜在的分歧

苏联曾是中国最亲密的战友和伙伴。新中国刚成立，苏联最先与中国建交并结为同盟。随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互相支持、合作。中国把苏联当做“老大哥”一样尊敬，苏联也给予了中国很多的援助。1953 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执政，中苏关系一度更加亲密。然而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对当时国际形势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苏联分析当时国际形势，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已是事实。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两种社会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同样，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也会越来越多样化。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并且将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工具转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中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很成功。赫鲁晓夫认为暴力和内战并不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形式，“除了依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苏维埃形式以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有些国家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关于“和平过渡”的理论，中共是持不同态度的。

在毛泽东看来，“和平过渡”的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的。因为按照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工具。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绝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即通过所谓争取议会中的多数来实现的。在去参加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在 10 月 29 日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两手论”的观点。他当时明确告诉尤金说，他希望赫鲁晓夫能够修正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提出的“和平过渡”的观点。他表示，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的思想，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认为，对于夺取政权问题，还是提“两种可能性”，

即做两手准备比较好。一是尽量争取和平过渡，二是准备暴力革命。前者是为了便利争取群众，不给资产阶级攻击共产党人的借口，是策略性质的口号；后者则是战略问题，因为到了夺取政权的时候，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不能设想资产阶级不使用暴力。

对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评价，中共也不完全赞同。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赫鲁晓夫发布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处理是十分谨慎的。毛泽东说，“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这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对待斯大林。毛泽东认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七分是正确的，是主要的；三分是错误的，是次要的。后来决定不直接对此事发表看法，采取发一篇文章来阐明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观点。经过起草、修改，1956 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主要论点有：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错误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在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在他一生的后期，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犯了一些错误。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文章最后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曾经被压抑的一切积极因素将普遍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决定五一节时不再在莫斯科红场上挂斯大林的像，并要求中国也不要挂。毛泽东说：他们不挂，我们挂。赫鲁晓夫和其他一些苏共领导人对此很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在与苏共领导人的多次谈话中，中共的领导人都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周恩来曾对波诺马夫阐述了中共对苏联的不满：“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完全没有全面分

析”“苏共领导人缺乏自我批评”。毛泽东也和尤金大使表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受“秘密报告”的影响，东欧国家出现动荡的局面。1956 年 6 月，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接着波兰国内反苏情绪不断高涨，苏波关系紧张。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毛泽东得知此情况后，马上组织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对待这件事情。毛泽东认为，苏波关系紧张，主要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苏波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会上其他政治局常委也一致认为，苏联的做法是不妥的，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独立平等的原则。所以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警告苏联，表明中共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并主张协商解决问题。后来苏波关系出现缓和，苏共邀请中共派人去莫斯科参加苏波两党的会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过慎重商议后决定，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去莫斯科。从 10 月 23 日起，苏、波、中三国党的代表在莫斯科轮流会谈。中国代表团批评了苏共大国沙文主义的行为，并力劝他们在同兄弟党交往时，要学会与其协商、合作，要多进行自我批评，不要只为自己着想，自以为是。[②]对于波兰方面，中国代表团又劝他们要以和为贵，顾全大局，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努力。经过中国的斡旋，苏波双方一致同意尽快再举行一次会谈，协商解决问题。10 月 30 日，苏联单独发表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方面有错误，声明要改正错误，要根据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平等的原则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③]苏波关系终于缓和下来。

就在中、苏、波三方会谈期间，匈牙利又发生了反革命叛乱。匈牙利政府要求驻匈的苏军支持他们平息反革命叛乱。可是，反革命暴乱越来越严重，匈牙利人民政权岌岌可危。恰在这时，苏联政府准备从匈牙利撤军。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对待苏联撤兵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不是一个性质的。对波兰出兵，属于干涉他国内政，而对匈牙利撒手不管，则会导致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决定，马上起草电报，告诉还在莫斯科协调苏波谈判的刘少奇等人，向苏共中央提议，继续在匈牙利驻军，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渡过难关。中国政府也支持匈牙利人民。经过考量，苏共采纳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很快，在苏军的帮助下，匈牙利各地的叛乱平息下来。在中国党代表团刘少奇等人要离

开苏联回国时，苏共主席团全体成员到机场欢送，他们一再表示，十分感谢中国党在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上对苏联的帮助。

波匈事件虽然平息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总结教训，在处理社会主义各国和兄弟党之间的问题时，要采取正确的原则，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7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在苏联，周恩来坦率地对苏共领导人说，苏联要经常批评大国主义，波兰同志要经常批评反苏情绪，这样两方面就可以结合起来。如果苏联也批评波兰的反苏情绪，就会引起波兰人不满，火上加油。他还对苏联出兵波兰提出批评。对于中国党的批评，苏共领导人是不满意的。他们认为这是中共在与苏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力。但鉴于当时苏联要解决波匈问题还需要中国的帮助，所以没有和中共争辩。同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中苏关系，我看总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是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④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总的来说还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1957 年 6 月，赫鲁晓夫主动通过尤金大使向周总理提出，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9 月，聂荣臻、陈赓、宋任穷赴莫斯科与苏联代表谈判，于 10 月 15 日达成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国还派出了以郭沫若院长为首的代表团，同苏联签订了 1958 年至 1962 年中苏共同进行和由苏援华进行的重大科研项目 103 项。经济合作方面，除了原来达成的 156 项外，又确定增加援助中国 55 项重大工程。两国的合作关系达到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最高点。

然而，1957 年的莫斯科会议上，这些分歧变得更加明朗化，终于引发了后来的中苏大论战。

注释：

①③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第 6 页，第 46～47 页。

②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98 页。

④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版，第 682～684 页。

参考文献：

[1]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二版。

[2]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3] 从进著，《1949-1989 年的中国 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4]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主要是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6日至8日，参加了苏联举办的十月革命40周年各种庆祝活动。从11月14日至19日，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4日至16日先召开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接着17日至19日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共发表了三次讲话。

11月14日，毛泽东做了一个即席发言，主要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如果一旦有事，我们大家还是要靠苏联，这是大局。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①]毛泽东的这番话，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兄弟党对苏联党有戒备，怕它再以势压人而提出的。

11月16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签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毛泽东对这个宣言的签署进行了评价。他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宣言时，

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这个宣言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宣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这次开会，形成了一种协商的气氛，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毛泽东的第三次发言是在 11 月 18 日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所有发言者都按照预先提交的发言稿发言，只有毛泽东例外；所有发言者都走到主席台前站着讲话，也只有毛泽东例外。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没有特别准备的情况下，先是谈到苏联党的领导中发生了的冲突，他说："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并肯定说："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由于在口头讲演当中，翻译由于事先没有看到讲稿，中方又没有提供译稿，因此，俄方翻译没有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毛泽东的意思，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同苏联共产党的斗争翻译成"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取得了胜利"，这引起了苏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引起麻烦的还不仅仅是这一件事，在讲到有关国际形势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一开头就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又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抹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今年，1957 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

在发表这次讲话之前，毛泽东曾和赫鲁晓夫有一次谈话。毛泽东问，在力量对比上，苏联和美国哪一个领先些。赫鲁晓夫答复说，在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苏联领先些，而就整个经济方面看，还是美国领先。因为美国的工业相对发达得多，最主要的钢铁一项，苏联的产量只是美国的二分之一。要赶上美国，苏联还要许多年时间。但苏联有信心在 15 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听后算了一笔账：当年打希特勒的时候，美国和丘吉尔手里有 7 000 万吨钢，而苏联实际只有 900 万吨钢，最后美英还是请求苏联帮助，

才打败了希特勒和小日本。这件事有力地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并且，历史从来就是首先由人心向背来作决定的。所以毛泽东认定了当前世界总的形势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他接着列举了十件大事来证明。第一件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时，1945 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同意把德国易北河以东作为苏联红军的进攻区，这就使东欧国家有可能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件事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美国也帮不上忙，蒋介石只能跑到台湾。第三件事是朝鲜战争。当时中国警告美国不要打过三八线，美国人不听劝告，最后只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战争。第四件事是越南战争。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党的领导下，打败了法国人，在日内瓦会议上，法国人不得不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人也无可奈何。第五件事是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区，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苏联对英法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英法军队不得不撤退。第六件事是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好要打的，它的军队在黎巴嫩登陆了，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苏联讲了话，美国人就不敢打了。第七件事是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总是宣称自己厉害，但是它一个人造卫星也没有发射上去。苏联做了先锋。毛泽东说，从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我们抛在后面了，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 15 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 15 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另外的三件事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来也很可能还要退出阿尔及利亚。[②]

从上面这些事情来看，是原来落后的国家强一些，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强一些？毛泽东说，据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 6 点钟的太阳，而我们

是早上6点钟的太阳。这就形成一个转折点，把西方国家抛到后面，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为了进一步证明资本主义是不足以为惧的，毛泽东又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他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包括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好怕的。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要设想一下，如果要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我和尼赫鲁谈过这个问题。尼赫鲁说，原子弹不得了，美国人讲了，原子弹一打，世界就要毁灭。我说不是我们要打原子弹，是美国人要打原子弹，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拿氢弹来吓唬我们。如果打原子弹的话，美国一定要打，我们也没办法。它要打，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还有一半人口，他们还要革命，还要造反。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毛泽东还说，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不要怕原子弹，不要怕帝国主义拿原子弹吓唬我们。我们怕也不管用。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就不难战而胜之。[③]

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本来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的，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首先，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其次，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只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所以，苏联人认为，“东风压倒西风”，对苏联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引起了苏联人的猜忌。

毛泽东说“东风压倒西风”，其实也是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增加信心，不用惧怕帝国主义，他们已经走向没落，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然而，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出尽风头，赫鲁晓夫对他的几次讲话也多有不满，再加上在《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签署上两党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中苏论战埋下了伏笔。

注释：

①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②③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119页,第121~122页。

参考文献:

[1]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3] 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4] 罗平汉,《"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签署

莫斯科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签署。

1956年和1957年初，苏联曾多次邀请毛泽东访苏。1957年5月，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后，毛泽东答应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苏方提出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的同时，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毛泽东表示，既然要开这样的会，就要开好。首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家预先交换意见，取得一致，最后发表一个共同文件，希望苏联能多做准备工作。10月28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起草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共同宣言的草稿。中央政治局于10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这个草稿。经过认真的讨论，大家觉得苏联的草稿与我们的观点相离甚远，所以，会议决定毛主席提前去莫斯科，到那后尽快起草一个稿子，交给苏联讨论，争取中苏两党在提交给其他兄弟党之前有一个意见统一的草稿。会议还确定了此次代表团的目标：一定要把这次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对苏共以保为主，以批为副，尽可能去掉他们宣言草案中有害的东西。[①]

中共代表团11月2日到达莫斯科后，就收到苏共起草的宣言的第二稿。但是，中方觉得第二稿没有太大的改动，一些有害的观点还是没有去掉。所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我们党准备起草一个好一点的，供你们参考。于是，从11月3日晚上起，中共代表团由陆定一、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头执笔，邓小平主持讨论修改，毛泽东负责最后审定，11月5日，初稿完成后就交给了苏共中央。从11月6日至11日，中方由邓小平牵头，苏方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负责，开始讨论双方各自起草的宣言稿。经过讨论，双方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为基础，再进行修改和补充。经过几轮磋商，最后以苏共和中共两党代表团的名义提交给会议。14日至16日，召

开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苏斯洛夫向全体会议报告了起草委员会对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与会各党代表发言表示同意这个宣言草案。接着召开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同时由64个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

在《莫斯科宣言》的起草过程中，中苏双方，以及各国兄弟党在许多问题上都曾存在分歧。

关于提“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以苏联为首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苏共开始是不同意的。尽管长期以来，苏共一直以老大哥的身份统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其他兄弟党颐指气使，不听别人的意见，但是，当中共在起草宣言草案中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开始并不同意。后来，毛主席在同赫鲁晓夫谈话时向他解释说，因为你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搞了40年的社会主义，只有你们才够领头。赫鲁晓夫提议说，是不是以中苏为首更好一些。毛主席说，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是在谁为首的问题上，中国还差得远，不能与你们平起平坐的，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经过毛泽东的解释，赫鲁晓夫同意了。[②]但是，有些兄弟党反对提“以苏联为首”，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都表示不同意，还有一些虽然没提出意见，但对我们的提法不表态。为此，毛泽东在12党国会议上重点谈了这个问题，在起草委员会中反复解释，苏共代表也一再表示，会尊重兄弟党的平等地位，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可是波兰党代表还是特别提出，应该讲清楚苏联召集会议、讨论问题、做出决议都是以协商为前提的，而且不能成立国际组织。苏共代表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公开表示，不会再成立共产国际那样的组织，情报局那样的组织也不再成立。最后，在宣言中不是单独地写一句“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这样论断性的话，而是在讲到维护和平事业的强大力量方面，提到“不可摧毁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且还把“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作为处理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关系原则写入宣言中。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在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中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同时还论述了现在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和平努力，存在着制止帝国主义战争阴谋、使它不能得逞的机会。对于这些提法，意大利党、波兰党、英国党、法国党的代表都不满意。他们认为，应该突出强调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否则就没有争取和平的信心了，就不能更好地

动员人民。中共认为，在战争问题上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战争可能爆发，另一种是战争也可能制止，可能推迟。经过磋商，最后双方都做了妥协，把“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改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把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和平力量就“一定能够在战争中消灭帝国主义本身”改为“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因为人民绝不会再继续容忍那个给他们带来如此惨重的痛苦和牺牲的制度”。[③]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在修改宣言稿的过程中，这是争论最大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共产党，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资产阶级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观点在二战后的西欧一些共产党内比较流行，后来也为苏共所接受。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里，赫鲁晓夫就提到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是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但考虑到要维护苏联的威望，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就没有同苏共进行争论。后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也多次谈过，并且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观点，可是赫鲁晓夫却固执己见。为此，毛泽东提出，此次到莫斯科，他与赫鲁晓夫都不再谈这个问题，而由邓小平同苏方有关人员来谈。邓小平在同苏斯洛夫的会谈中，代表中方严肃批评了苏方关于“和平过渡”的提法。但是苏方不认可中共的观点。在各兄弟党一起参加讨论时，也发生了争论。英共、法共、意共和波共都赞成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讲的和平过渡的观点。毛泽东为此亲自和英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交换了意见。最后，毛泽东认为，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一方面是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进行自卫，进而夺取政权。其他党认为可以在文字表述上不必那么明确，把两种可能性都平列出来。然而，苏联党竭力反对，要求中共遵照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中共代表团同意保留宣言草稿中的“和平过渡”的提法，并在宣言上签了字。宣言最终的主要观点是：现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是远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有实际可能防止战争，争取和平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

作。[4]宣言最后发表了，但是中方对“和平过渡”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为阐明自己的立场，中共代表团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出：“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5]赫鲁晓夫对中共这个提纲是不满意的，但因中共的提纲既未公开发表，又未向其他兄弟党散发，所以就没有再争论。

关于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在宣言草案中，苏共写了这样一段话：“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根据当前条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关于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友好的可靠基础。”中国代表团认为，不必在宣言中提某一党的决议，应该删除“苏共二十大”的字样。但是苏共坚持要写，而且波兰党也支持苏共的做法。中共后来做了妥协，但在苏共那段话后加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共同提出的五项原则，以及亚非国家万隆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原则，是符合和平共处的利益的。现在，争取和平、争取和平共处，成了世界各国最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样的一段话。[6]

关于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波兰党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但是意大利党却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不是修正主义。法国党同意波兰党的说法。中共在1956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出：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在这次宣言的草案中，中共的提法是，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最后经过几次折中、修改，在宣言中对这两个方面都提到了，并且加上了“对于每一个共

产党来说，哪一种危险在某一时期是主要危险，由各个党自己判断”。[7]由此，与会各党都表示了赞同。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问题。毛主席在会议期间与其他党的同志进行交谈时，发现他们在思想方法上不注重辩证唯物论问题，因此，他建议各兄弟党在开会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使干部群众都能掌握这个思想武器。中共代表团在起草宣言时，就把毛泽东的意见加了进去。然而苏共的苏斯洛夫以理论家自居，认为中共的建议是课堂里讲的问题，放在政治宣言中不合适。这一次中共坚持自己的意见，再三指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强调大家注意这个问题。苏共最后同意了。所以宣言在讲到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之后，特别加上了“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关于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措词问题。在中苏两党起草的宣言草稿中，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世界无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美帝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等提法，波兰党认为这样表述太过分，调子太高。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党也觉得这种说法太尖锐，无法接受。后来经过再三斟酌，把“美帝国主义”改成“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或者“美国某些侵略集团”，把“美帝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改成“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力图依靠所谓实力地位政策统治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而“世界无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则被换成“这些反人民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所实行的政策使它们自取灭亡，自己造成埋葬自己的掘墓人”。这样改动之后，其他党的代表表示可以接受。

关于肯定苏共二十大决议的问题。苏共提出要把苏共二十大、中共以及法国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都加到宣言里。中共不赞成这一观点。因为觉得各个党的代表大会是各自的事情，不需要国际会议批准。但是，苏共始终坚持要把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意义写进去，事情一直拖到最后，毛泽东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对赫鲁晓夫说，现在大家在许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你们也一直坚持，那我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妥协，照顾照顾你们。赫鲁晓夫很高兴。所以宣言中就有了这样一段话：“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8]

《莫斯科宣言》经过十几天的讨论，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达成协议。

而《和平宣言》的签署还比较顺利。因为这个宣言主要是由法共和意共领头起草的，宣言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平、团结，所以尽可能地包含了各方面的意见，宣言中也没有提美帝国主义，为的是不让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感到为难。因此，在大会结束之际，64 个国家的党团代表共同签署了《和平宣言》。

注释：

①②⑦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95～96 页，第 131～132 页，第 135 页。

③⑥⑧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年，第 49 页，第 50 页，第 54 页。

④罗平汉著：《"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⑤《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1963 年 9 月 6 日。

参考文献：

[1]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2]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3]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二版。

[4] 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年版。

[5] 罗平汉，《"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对南共新纲领草案的批判

1958 年 3 月，南斯拉夫把已经成稿且准备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的《南共联盟纲领草案》送给苏共等各国共产党征求意见，并邀请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南共联盟七大。这份纲领草案不仅阐述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而且还阐述了对诸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式等问题的看法。苏共对南共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不服从苏联领导的倾向极为不满，于是组织各国共产党围攻南共联盟。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党，中共与苏共采取了一致行动，结果苏南、中南关系急剧恶化。

在 1957 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为了将南斯拉夫重新拉回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来，中苏两党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南共代表团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签署《莫斯科宣言》，明确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等提法。而南共新的纲领草案又不顾苏联的权威，特立独行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这使苏共十分恼火。因此，苏共决定对南斯拉夫给予公开批判。为了扩大声势，苏共中央将他们对南共新纲领草案的意见向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作了通报。

1958 年 4 月 3 日，苏共中央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南共联盟的纲领草案是企图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实质上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相违背的纲领性文件。"草案中对当前国际形势、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有不少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和评语。纲领草案的观点实质上是近乎现代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①]此外，苏共中央还列举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许多"错误"观点，并通知中共中央，苏共将不派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而且，他们要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进行批判。信中还要求中共中央将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告诉苏共中央。

中共中央在得知南共联盟公布了纲领草案后，立即电示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要求他们迅速将纲领草案内容及其看法寄回国内。收到电报后，伍修权大使立即组织人员将长达15万字的纲领草案全部译成中文，并进行了研究。伍修权将南共纲领草案与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9条共同规律进行了对比，发现有6条相同，只有二、三条不完全一致。另外，伍修权还认为，在实现农业集体化方面，南共也有自己的做法。[②]最后，伍修权起草了一份《对南党纲领草案的初步意见》，连同译好的纲领草案全文送回国内。根据当时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认识上应该与苏联和中国保持一致，如有不同，那就是搞“修正主义”。所以，中共中央认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存在严重问题。

4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指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大会在各国党尽了一切改善同南共的关系之后，提出并准备通过这样一个有体系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基本原理的纲领草案，表明南斯拉夫领导集体向全世界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同莫斯科12国共产党宣言相对抗。同时中共中央还表示将同苏共采取一致行动，不派代表出席南共七大，只派观察员列席。[③]在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上，中共与苏共已经有过一次“配合”。1948年6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批判。7月10日，中共中央也通过一项决议批判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这一次，中共决定与苏共再次联手，对南共进行严厉的批判。

4月21日，苏联首先在《共产党人》第6期发表长篇文章《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纲领草案》，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文章认为，纲领草案对现代国际局势的估计，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估计，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莫斯科宣言》相违背，具有“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观点。”[④]4月22日，即南共联盟七大召开的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苏联的批判文章。5月5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文章，这是中共公开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第一篇有重要影响的文章。文章指出，“这个纲领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诡辩代替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论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论，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为垄断资本辩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

本区别。”所以，南共的纲领草案“公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⑤

5月9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一致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保证》，从6个方面继续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5月1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文章。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对《莫斯科宣言》作了高度评价，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却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决议》指出，南共联盟“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在纲领中表示出“自己的顽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充满了敌意”。“南共代表大会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纲领，各国共产党同样有权利，也有责任，批判南共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⑥

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署名文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详细地从12个方面批判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接着，《红旗》1958年第2期又发表《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驳斥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的国家论》和《南修正主义者的“独立”和美援》等3篇文章。6月3日，，赫鲁晓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同南共“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称赞中国共产党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是“十分正确十分深刻的”。为了呼应赫鲁晓夫的讲话，6月4日，《人民日报》就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决议》发表《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斗争到底》的社论，认为南共联盟纲领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6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赫鲁晓夫在保共七大上的讲话。6月14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署名文章《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恰恰适合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指责南共联盟纲领“向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动进攻”，表示要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除了舆论上的攻击，苏联还在经济上制裁南斯拉夫。5月27日，苏联单方面宣布决定修改现有的苏南经济协议，推迟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按照当时的安排本应向南斯拉夫交付的20万吨小麦，苏方也以同样的手法推迟交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东德，也“立即如法炮制，中止了对南斯拉夫的贷款”。政治上，苏联人为了表示不满，临时通知取消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对南斯拉夫的访问。⑦

面对中苏联合的强大攻势，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辩论和反击。6 月 15 日，铁托在拉宾发表演说。他说："发动批判南共纲领的运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拒绝在 1957 年宣言上签字，在于我们反对把世界分裂成各种阵营。"[⑧]他还集中攻击中国，认为《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国报纸的文章以及某些中国领袖的演说，是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国家和党的领导的恶毒的诽谤和污蔑。而且"中国领袖们……是反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在这方面，他们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子处于同样的地位"。南斯拉夫的报纸也发表了对中国不利的评论，如南斯拉夫《政治报》、《战斗报》等，在刊登有关西藏叛乱的消息时，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认为"中国当局正在愈益破坏和压缩"给予西藏的"某些自治权"；中共八大所确立和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被他们称为"非人道的官僚主义，国家集权主义的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实践和理论的官僚主义的修正"。[⑨]

7 月 21 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向毛泽东汇报问题时，也提到南斯拉夫问题。他说，苏共中央认为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要继续批判，不能停止。他还表示，苏共中央感谢中国党对苏共的支持。现在南斯拉夫集中攻击中国党，而这个攻击本来是应该针对苏共的。中共支持并参与苏共对南共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经济方面，1958 年正值中苏关系最友好、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援助规模最大的时期。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提前完成了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大大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能力，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苏联的援助在新中国的建设上是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中，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力度，这就鼓舞了中国的士气，促使中国制定了更高要求、更高目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在"二五"计划中，苏联的援助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这关键时刻，为了保护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成果，中国必然会在政治上对苏联作出积极的响应。另外，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也与中共党内出现"左"的错误有密切关系。1956 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急躁冒进、贪多求快的毛病。中央许多领导人主张积极稳妥地发展国民经济，但毛泽东对此有所保留，甚至最后把反冒进与右倾保守、与非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借助于批判南共联盟修正主义来反对党内外所谓的右倾，批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中共

中央在批准中联部和中宣部《关于在国内批判南斯拉夫纲领草案宣传问题的请求》文件中指出，批判南共纲领草案，是一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十分重大意义的理论性政治性斗争，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从国际战略方面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维护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用一种统一的纲领路线来统一各国党的行动，是中苏两党共同的一个基本观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对分裂主义，维护苏联的权威，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共和苏共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步调是一致的。

随着中南两党关系的恶化，中南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也严重倒退。据时任中国驻南大使伍修权回忆，"1958年我奉召被调回国内，一到家先在外交部挨了一顿批，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做检讨。……我本来是'回国述职'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不辞而别地就离任了，把通常的外交礼节都抛弃掉了。我的回国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逆转。不久，南斯拉夫也将他们的驻华大使召回国。……这场本来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快发展到国家关系上，两国外交关系规格降低到代办一级。"⑪两国的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也大大减少，甚至中断。

一个统一的阵营、一个领导中心、一个统一的纲领路线的观念，是中苏共同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后来中苏两党之间发生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

路线大辩论的原因之一。后来的实践证明，硬要保持一个统一的阵营，由一个中心来起领导作用，用一种纲领和路线来统一各国党的思想与行动，这种努力是不正确的，也是无益的。⑫

注释：

①③12 从进著：《1949—1989年的中国 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5页，第348页。

②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105页。

④《人民日报》1958年4月22日。

⑤《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

⑥《人民日报》1958年5月28日。

⑦邢和明：《关于1958年中共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1期。

⑧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⑨齐栋：《1958年〈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对中苏南关系的影响》，《岱宗学刊》，2010年3月，第14卷第1期。

⑩沈志华著：《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⑪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6—317页。

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

1957 年 11 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也随毛泽东、宋庆龄带领的党政代表团一起来到莫斯科，彭德怀访苏主要是与苏联进一步商谈 1955 年同赫鲁晓夫所谈的有关军事合作的问题。主要包括建立中国原子能工业，生产原子武器以及原子武器运载工具等。赫鲁晓夫同意了彭德怀的要求，双方还商定，由两国军事部门进一步协商解决，原则上决定苏联远东海、空军将同中国进行合作。在毛泽东等人参加完莫斯科会议回国后，中国军事代表团继续留在苏联参观访问。11 月 27 日，苏方为彭德怀一行举行告别宴会。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盛赞中苏两党、两国之间亲如兄弟般的伟大友谊。莫斯科会议把中苏同盟关系推向顶峰。然而，接下来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却使中苏友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1957 年 12 月，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线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但是，苏联海军也遇到了一个技术性难题，即外出潜艇如何与本土保持通讯和联络。苏联决定在海外建立两个长波电台。南太平洋的无线电台建在中国的海南岛，印度洋的无线电台建在印度半岛。赫鲁晓夫最后决定把无线电台建在海南岛。苏方的考虑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况且中国海军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海军的建设发展，舰艇需要远离基岸，特别是潜艇，远离祖国海岸潜航在大洋深处，必须依靠无线电通信与指挥机关保持联系。1955 年中国先后建起了 3 个小型超长波电台。但是随着舰艇远航任务的增加，原有的超长波电台已远远不能满足部队作战训练的需要。于是，1957 年秋，萧劲光大将在党委会上提出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设想。不久，他委婉地向苏联首席顾问阿夫古斯契诺维奇提出请苏联政府给予支持援助的要求。

1958 年 1 月 6 日，苏联海军上将普拉顿诺夫致函萧劲光："为了苏联海

军和中国海军设在太平洋西岸地区的长波台更加有序和提高双方利用这些电台的效率，苏联海军首长认为，最好组织两国海军对设在海参崴、青岛、宁波和西营各地之间超长波电台的共同使用”，[①]同时还附了一份协议草案。

苏联这一提议旨在通过一定形式将中国已有的3个小型超长波电台纳入其在远东的通讯网络中，以保证苏联海军在南太平洋中部海区活动的指挥。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又来函提出：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1958—1962年间，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共建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射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提出，建设这两座中心所需的资金，由苏方出七成，中方出三成，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这个建议因为是双方合建，所以涉及到主权由谁控制的问题，中央军委不得不慎重对待。6月12日，中方经过研究，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一切费用由中国自己承担，请苏联给予技术上的帮助，建成后中苏双方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并希望双方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议。

6月28日，由苏联海军通信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一行6人来华，带来了苏联海军首长给彭德怀元帅的信和协议草案。草案提出，为了“苏联国防部的需要”，两国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个超长波电台”，“所需费用，由苏联负担”。投资方式是苏方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30%（土建）。并且毫不含糊地规定，超长波台建成后由中苏共管，苏方派一个15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电台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也就是说，超长波台建成后，主要由苏联管理、使用。这样的方案与中国方面原来的设想相差甚远，毛泽东指出，使用权七比三，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却只有三分使用权，这比袁世凯的卖国条约还厉害！[②]经过国防部、海军与苏联大使及专家组等多次商洽，7月21日，彭德怀元帅再次复信苏联国防部长，重申了中国坚持自建超长波电台的原则立场。同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提出了要和中国搞联合舰队的问题。他说，苏联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不能发挥舰队的作用，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北面也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不安全，海上通道都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而想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并邀请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商谈。毛泽东听到这里很恼火，他认为苏联又要搞“合作社”。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在中国

开矿，开采出来的矿物再以低价“卖给”苏联。毛泽东把这样的合营公司叫做搞“合作社”。当时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们只好答应了。可是现在苏方又提出搞联合舰队，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赫鲁晓夫是想通过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来控制中国的海军和沿海港口。这是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所以他问尤金，我们只是请你们帮助建设海军，不想与你们搞“合作社”，搞什么联合舰队。是不是我们不同意和你们搞联合舰队，你们就不帮助我们了？尤金说，这只是个提议，还需要两国共同商定。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召见尤金大使，他说，中央政治局今天早上开会决定，撤销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建设核潜艇。接着他又强调，打起仗来，中国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苏联都可以用；苏联的一些地方，中国军队也可以去，因为我们是同盟国。但是搞联合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是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

毛泽东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不要粉饰。接到尤金的回报后，赫鲁晓夫决定来北京同毛泽东当面会谈。7 月 31 日，赫鲁晓夫来到中国。从 7 月 31 日至 8 月 3 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举行了四次会谈。会谈初期，气氛相当紧张。赫鲁晓夫刚到北京，就直接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就苏联提出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他否认苏联曾使用过“联合舰队”或“共同舰队”的说法，认为一定是尤金不懂军事，没有领会苏联领导的意图，造成了“一次误会”。他解释说，苏共“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3]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我先后跟你们谈了三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事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不干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第三，撤回我们的请求，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毛泽东的这番话，让赫鲁晓夫感到很尴尬。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赫鲁晓夫提议由中苏达成某种协议，允许苏联的潜水艇在中国沿海某个港口加油、修理或作短暂停留。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海军可以在苏联北冰洋沿岸的摩尔曼斯克建立潜水艇基地。毛泽东断然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赫鲁晓夫又提到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他继续推脱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这只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个人提出的。尤金是苏共中央里的老实人，做了许多事情来加深我们两国的友谊。这次的事情，都是由于他错误地理解指示而产生误会的结果。苏联的想法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可以使用这个电台，所有权是中国的。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和北海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④毛泽东强调说，中国同意建长波电台，但全部费用由中国自己承担，所有权归中国，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就应该出一些钱，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提供。而毛泽东坚决不用苏联的贷款，并表示如果苏联一定要出钱，就不建了。赫鲁晓夫只好作罢。

在随后的几天会谈中，双方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主要谈了美国出兵黎巴嫩的问题。虽然还是有些争论，但气氛比第一天的会谈融洽一些。赫鲁晓夫抱怨说中国往他们后院抛石头。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不是抛石头，是抛金子。刘少奇同志也说，我们只是当面给你提意见，我们背后不向任何人讲我们之间的分歧。⑤

8 月 3 日，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关于援助中国建设长波电台的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赫鲁晓夫离京返回莫斯科前，中苏双方发表了一份会谈公告。公报说，中苏双方对国际问题和中苏双边关系的问题充分地、全面地交换了意见，谴责美国和英国出兵侵略黎巴嫩和约旦，要求他们把军队撤走，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两党对国际形势下所面临的亚洲、欧洲方面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就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公报还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正在顺利地发展着和日益巩固着兄弟般的友好、全面合作和互助的关系”，而且双方还决定要“继续全面发展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⑥

赫鲁晓夫这次访华，使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表面上得到解决，然而，这四天的会谈，也显现出中苏双方第一次面对面的抗衡。毛泽东一再坚定地表明，中国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国压力，包括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长

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则暴露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后，看到中国威信的上升，企图采取措施遏制中国的意图。中苏第一次较量虽没有撕破脸皮，但在双方的心里，却都已留下难以抹去的裂痕。

注释：

①②吴殿卿：《中苏两国共建超长波电台分歧始末》，中新网。

③⑥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二卷，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④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249页。

⑤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参考文献：

［1］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2］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从进著，《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5］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6］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7］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三版。

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新变化

1958年赫鲁晓夫来华处理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后，中苏两国在公报中仍高调公布两国首脑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但是紧接着炮轰金门、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批评、苏联突然中断对华高端技术项目援助以及中印边境冲突等事件的发生，终于使两国两党分裂的关系表面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公开争论、互相指责的境地。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决定立即发起炮击金门，给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惩罚性的打击。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于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大规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台湾国民党当局立即向美国求援。美国当即把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第七舰队大部分军舰派往台湾地区集中，同时把支援在黎巴嫩登陆的美军的一部分军舰，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调到印度洋。中美两国军队在台湾海峡形成对峙局面。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在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的航母已由4艘增加到6艘，空军战机也达到715架。美军还准备从冲绳再向台湾调动3个海军陆战师。

炮击金门事件发生后，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炮击金门得到了莫斯科的默认，但事实上中国并未向苏通报。苏方认为中国这样做违背了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为了搞清楚当时中国炮击金门的意图，9月5日，赫鲁晓夫通知中国，将要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华，要求中方就炮击事件做出解释。其实，炮击金门是中共中央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做出的决定。1958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中东事件和国际动向的基础上，正式作出决定炮击金门。7月底，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并没有和他谈这件事。9月5日晚上，周总理先接见了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表示欢迎葛罗米柯来华访问，然后向苏达利柯夫介绍了中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蒋矛盾以及中国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

行动。周总理说：第一，我们不是要解放台湾，而是惩罚国民党在我们沿海的骚扰；第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因为美国企图独霸台湾，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台湾单独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搞两个中国；第三，如果美国要发动战争，中国全部承担起来，决不连累苏联，不会拖苏联下水。周总理要求苏达利柯夫把这三点马上报告莫斯科。①下午，葛罗米柯到达北京，周恩来又向他解释了中国的意图，并不是要登陆金门、解放台湾，不过是要打击一下国民党的气焰，打击美国人的气焰而已。葛罗米柯听了解释之后，表示赞同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策略。毛泽东也会见了葛罗米柯。在摸清了中国的底牌之后，为了显示苏联同中国的团结，葛罗米柯特意向中方通报了苏联政府首脑准备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的主要内容。

第二天，赫鲁晓夫就通过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佐夫，将信件交给了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戴维斯，让其转交给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在信中呼吁美国要理智，不要采取任何引起无法挽回的后果的行动，并特别强调，“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忠于自己义务的我国，将尽一切可能同中国人民一道来维护两国人民的安全、维护远东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②9 月 19 日，莫斯科的口气更加强硬。它警告美国政府说，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核袭击，它将立即以同样手段对侵略者予以反击。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机器已全力开动，很快进入相应的戒备状态。毛泽东对莫斯科所采取的上述行动比较满意。但是，10 月，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苏方考虑要派一个导弹部队去。后来又提出要派带有导弹的轰炸机和歼击机部队到福建前线。这些提议都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认为，苏联派的导弹部队又不能交给我们指挥，我们就不要。看来，苏联还是要控制我们沿海，控制福建，就像美国在台湾驻扎美军一样。那样以后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就像蒋介石有什么事都得问美国一样。这些我们都不干，统统给他顶回去了。③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8 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

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

中国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试图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其中最积极的是保加利亚领导人。1958 年 9 月，以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加利亚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回国后，立即在报刊上大肆宣传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仿效中国的人民公社，开始扩大或合并集体农庄，同时增加重工业，特别是对黑色冶金工业的投资，实际上也是大炼钢铁。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虽不赞成，但在表面上采取了既不称赞也不批评的态度。随着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担忧起来。因为在大多数苏联人看来，中国的经济文化都比他们落后。苏联要赶上美国，至少还需要 15 年的时间，而中国却想要超越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不悦。他们觉得中国这样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只会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膨胀，此外，不会带来任何积极后果。④赫鲁晓夫还把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叫到莫斯科，要保加利亚立即停止“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

1958 年底，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再“沉默”，开始进行公开评论。12 月 4 日，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赫鲁晓夫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⑤

1959 年 1 月，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和尤金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知道后非常不高兴。7 月 18 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对公社提出了批评。赫鲁晓夫所讲的只是苏联的公社，没有指名批评中国。但是，7 月 22 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讲话就是针对中国的。毛泽东获知这些消息后相当不满。8 月 19 日，他给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写信，要求他们对赫鲁晓夫

的批评进行反击。他在信中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⑥

还有两件事情也是中苏关系发生逆转的重要原因。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联正在日内瓦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就禁止核武器试验进行谈判为借口，提出暂时中断向中国提供若干重要援助项目。所谓"若干重要援助项目"，指的是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的原子弹样品和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和原子弹样品。为此，中国方面派出部分专家到苏联参加原子能中心的工作，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始进行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建设。苏方决定停止这一援助，也就等于单方面撕毁了该协定，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收到苏共中央的来信后，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已经把实现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国达成协议上，而不是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其中包括中国拥有核力量，这是对帝国主义的妥协。

接下来的事情让中共领导人更为恼火。1959年8月，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事件，本来这件事是印军越过边境蓄意挑衅造成的，但是，印度方面却倒打一耙，说中国"侵犯印度领土"。同时，国际上也掀起一股反华浪潮，污蔑中国侵略印度，甚至恶语中伤，说中国要占领印度东部某某城市。鉴于国际上对中国的诬蔑，中国方面考虑，因为中苏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同盟国，因此有必要让苏联了解中印边界冲突的真相，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9月6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他介绍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情况，并告诉他这次冲突是印军越过中印边界设立哨所进行巡逻，并向中国边防军开枪而引起的。外交部还表示，中国政府将要发布有关文件和材料，说明中印边界冲突的真相和中印边界状况。然而，9月9日晚，苏联回避事实真相，且不顾中国政府的劝阻，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声明》说："值得注意的有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集团抓住了这个事件，它们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相互访问前夕的局势复杂起来。他们指望用这种手段来瘫痪在西方国家中主张同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关停止'冷战'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日益强烈的要求。"所以，《声明》宣称："对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事件不能不表示遗憾。"

而且，《声明》煞有介事地说："苏联领导人表示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不会允许那些不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而希望它尖锐化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得渔利，这些势力竭力阻挠已经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苏联领导人也表示深信，两国政府会本着中印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精神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来解决所产生的误会。这也将有助于加强争取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力量。"⑦

表面上看，苏联塔斯社的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似乎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但是中印边界冲突涉及中国领土主权问题，塔斯社却把这说成是一场"误会"，明显在偏袒印度一方，这让中国人是无法接受的。实际上，苏联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消除中印边界冲突给即将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给赫鲁晓夫的东西方缓和政策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代，塔斯社的声明，实际上表明了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不满和不信任以及一心追求他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计划，这无疑是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声明》一出，西方世界果然一片喝彩，认为这个《声明》表明"莫斯科并没有充分公开地支持它的中国盟国"，进而称赞"赫鲁晓夫这么做是勇敢的，也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赫鲁晓夫向中国船头放了第一枪。"美国人对此也大加称赞，认为"苏联的立场接近于美国的立场。"

尽管苏联在这个时期不断制造舆论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中共中央还是采取了克制的方针。毛泽东说，中苏关系是团结的，有时候有一点别扭，这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⑧

9月15日至27日，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在戴维营他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会谈，着重讨论了全面裁军问题，以及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访美期间，赫鲁晓夫发表了多次演讲，表达了他对和平竞赛、和平共处以及缓和紧张局势、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看法。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撕毁了原子弹协议，又发表了塔斯社声明，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适应美国的战略需要。对于苏联这一连串的表现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中苏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不应该将分歧公开出来，这会有损于中苏两国的团结。使中国领导人更不能容忍的是，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局势下，赫鲁晓夫公开支持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赫鲁晓夫在美国发表的一些言论，毛泽东也不赞成。9月底，当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就赫鲁晓夫对台湾问题和中印冲突问题的看法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9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中国举行的国庆招待宴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一



方面称赞新中国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又说现在“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是不可取的，实际上是影射中国不应该如此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10 月 2 日，中苏双方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会谈。由于双方观点对立，所以会谈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赫鲁晓夫责怪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周总理对赫鲁晓夫说，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解决台湾，是用和平的办法还是用武力的办法，别人不能干涉。对于中印冲突，赫鲁晓夫依然认为是“中国突然对印度发动侵略性军事行动”，甚至为印度辩解说：谁先开枪我们不知道，“反正印度人被打死了”“你们采取的方法，只有利于帝国主义”。他还坚持认为塔斯社声明发表的立场是正确的。陈毅责问赫鲁晓夫，中国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而且又是资本主义国家挑起的，你为什么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狡辩说，“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外交，不是战争”。毛泽东在会谈快结束时明确表示，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一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是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9]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说，你给我们扣了好几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炮击金、马，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0]

北京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最后连一个会谈公报都没有发表。10 月 4 日，赫鲁晓夫回国。10 月 6 日，他在海参崴发表讲话，继续宣传自己的观点，批评中国领导人。他宣称：“我们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保障和平问题进行了相当坦率的交谈。应当说，我喜欢同他这样一个理解国际局势严重性的明智的人交谈。”赫鲁晓夫还说，如果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显然他是在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

赫鲁晓夫在离京前对毛泽东说，苏联党政代表团怀着坦诚的心回国，我们的友谊不应因具体问题的一些分歧蒙上阴影。毛泽东回答，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虽然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无论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还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都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已经走向无法挽回的境地。

注释：

①④⑩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262~263页，第271页，第298页。

②⑥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二卷，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第439页。

③⑧⑨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第204页，第226页。

⑤与中共竞争：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反应，中华网新闻中心。http：//news. china. com/zh _ cn/history/all/11025807/20090818/15604630 _ 1. html

⑦《人民日报》1959年9月10日。

参考文献：

[1] 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2]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5] 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6]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7]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中共中央发出反“右倾”的批示

所谓右倾，是指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党内的“左”、右倾问题是关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认识上的问题。1959 年，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发出了反“右倾”的批示，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

庐山会议的召开是为了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

1958 年发动的“大跃进”，由于客观上违背了经济规律，在“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盛行情况下，导致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被打乱，国内政治气氛十分紧张，全国城乡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被动混乱的局面之中。进入 1959 年，这些消极影响则暴露得愈加明显，城市粮食告急，市场供应紧张，同农民的关系也很紧张。于是，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称为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前期继续贯彻 1958 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纠正左倾错误。然而，到了会议后期，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信陈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原因，中共中央错误地开展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作了一个总的估计，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于是，他提出读书、形势、任务；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体制问题、协作区关系、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等 19 个问题要与会者讨

论。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会议按六个大区分组进行讨论，起初会议还开得比较轻松活泼。中央领导同志分头（或派秘书）到各个小组参加会议。各组会议的主要情况都整理成简报发给大家，以便互相交流。7 月 10 日，毛泽东在组长会上讲话，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一些干部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说法。他强调总路线、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他宣布会议到 15 日结束。

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西北组多次发言和插话。由于他对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发言中对问题谈得比较深刻、尖锐。彭德怀鉴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担心“左”倾错误能否彻底克服，于是，7 月 14 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 1958 年的成绩，其次实事求是地批评了 1958 年的缺点错误，分析了错误产生的原因：“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并谈了改进工作的建议。这封信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体现了彭德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从信的内容上和提出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逆耳忠言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把它加上“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标题，于 7 月 16 日印发给与会人员讨论，并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由此，会议开始转入了对这封信的讨论。黄克诚、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张闻天在会上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不同意有些人对这封信的非难。23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判了信中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失有得”等，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毛泽东还严肃地提出了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要求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从此，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

8 月 2 日至 16 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进一步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历史上的是非，搞“新帐老账一起算”，把彭德怀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8 月 2 日，毛泽东说，党内出现了一种分裂的倾向。他认为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反了九个月的“左”倾，到现在刮“共产风”的问题没



有了，浮夸也没有了，现在不是反“左”的问题，而应该是反右的问题了。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他的讲话和随后印发的一系列文件，为全会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批“反党集团”定了调子。8月11日，毛泽东同志再次讲话，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分析彭德怀同志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经验主义者，说他三十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抱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特别严重的是指责彭德怀同志这次向党“进攻”是想在党内挂帅。显然，作出如此武断的结论是大错特错了。这个讲话，使会议上的斗争进一步升级。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8月16日，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并发表了公报。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在庐山会议上反右倾的同时，会外也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会内会外互相促进。8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示全文，内容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

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运动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逐步获得解决和生产指标比较落实之后，在六亿多人民共同参加的伟大的战役胜利之后，经过适当休整，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伟大干劲，又在新的基础上日益高涨起来，为新的跃进而英勇奋斗；可是另一方面，在一小部分干部中，右倾思想又开始抬头和滋长起来。并且以各色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

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有些右倾保守分子，不但对于人民公社和去年以来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对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迅速获得解决的事实，熟视无睹，不感兴趣；而且对于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和缺点，不管是否已经克服，都如获至宝一般地广为搜集，加以夸大，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积极分子的武器。右倾保守分子，不是和群众站在一起，而是站在群众运动外边，指手画脚，非难人民公社，非难大办钢铁，非难大跃进，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向干部和群众大泼冷水，松他们的劲，泄他们的气，实际是要把这些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有右倾情绪的人，不是实事求是地同群众商定可能实现的先进指标，而是把生产指标大大落在实际可能完成和必须完成的水平以下，而且认为指标落得越低越好。仿佛只有这样，才不是虚报浮夸，才不是主观片面。

还有一小部分干部，他们在口头上，虽然并不反对总路线，并不反对大跃进，但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却缺乏朝气，缺乏干劲。他们对于工作中所发生的困难和问题，不是迅速抓住加以解决，而是畏难苟安，互相推诿，或者马马虎虎，拖一天算一天。

上述这些思想、情绪和作风，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

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物力和财力。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必须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请你们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使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全面地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用光辉跃进的成就，迎接国庆十周年。

中央

一九五九年八月七日



按照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各地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8月14日，庐山会议转发了《辽宁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批示》，指出“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

此后，中共中央又接连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运动的重点是党政军机关，同时殃及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以致工人、农民。

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会议按照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基调，从历史上揭批彭德怀，认定彭德怀早有野心，几次错误路线都跟着走，并认定彭德怀，黄克诚是高岗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这次在庐山会议上就是要篡党篡军；追逼彭德怀交代所谓反党“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名单和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此外，会议还抓住彭德怀过去主持修订颁布的军队内务条令某些内容，指责他是“单纯军事观点，资产阶级建军路线的倡导者和主要责任者”，是“教条主义的总根子”。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要求全军“彻底肃清彭黄在军队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恶劣影响”。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的职务和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反右倾运动”，是建国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失误，它造成了严重后果。

首先，政治上，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那些敢于实事求是并且按照组织原则向党反映情况和提出批评的同志，遭到无理地批判和打击，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严重损害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全国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00多万人。错误地批判和打击使得不仅使得他们在精神上、工作上受到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更为严重的是，由此导致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受到重大损失。此外，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党内生活中形成了“一言堂”、“一边倒”的不正常风气。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不仅在工作上、决策上造成了许多失误，而且还给了野心家、投机分子的活动以可乘之机。

其次，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把阶级斗争引向党

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把彭德怀等对经济指标、速度高低问题的探讨、争论，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党内在政策方针上的思想分歧，当作敌对性质的政治分歧来批判，把通过组织向党提出意见的同志，视为敌对分子予以打击。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危险是右倾，必须不断反右。以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判断是非、划分敌我；迷信群众运动，不仅在生产建设上大搞群众运动，而且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生活问题和意见分歧。不仅在当时，而且特别是在后来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其次，经济上，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相反又大张旗鼓地“反右倾”，对国内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使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察觉并开始纠正的错误又重新发展起来，并延续了更长的时间。要求提前两年实现“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1959 年要完成钢 1387 万吨，比 1958 年的 800 万吨增长 73%，积累率高达 43.8%，比 1958 年还高 4.5%。结果造成，1959 年拼命猛攻钢铁，粮食产量比 1958 年减少 600 亿斤，下降 13%。这就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导致轻工业生产萎缩，城市供应日趋紧张，因而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1960 年规定钢产量要达到 1 840 万吨，结果只完成计划的 48.3%，粮食产量计划达到 6 000 亿斤，实际只完成 2 870 亿斤，比 1959 年又减少 530 亿斤。1958—1960 年国民经济损失 1 523.2 亿元，因而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使我国遭受了 1959—1961 年的严重经济困难。生产大幅度下降，粮棉产量退到 1951 年的水平，人民生活严重困难，1961 年职工的实际平均工资比 1957 年下降 37.4%，北京凭票供应商品多达 69 种。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1960 年死亡率达 25.43%，大大超过尚处于战争年代的 1949 年 20%，其中农村人口减少 1 702 万。党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

此后，宁“左”勿右，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及实践，这样，越反右人们思想越“左”，直至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灾难，教训是沉重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指出：“必须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

进入1958年，批评反冒进的斗争升级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周恩来、陈云。1958年1月3日和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和华东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对1956年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等人。并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11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九省二市的党委书记。1月11日晚，毛泽东发言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 、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他还说，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6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就是这样的。第二天，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的人用的是这种“错误”方法，即是只讲冒进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他还说：（1957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鲁言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这样，批评反冒进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涉及到了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

1958年1月15日，毛泽东夸奖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委党

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他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1月16日，毛泽东又在大会上拿出柯文当众问总理："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答道："我写不出来。"他接着又说"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月17日晚，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针对陈云的。

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1月19日晚，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对此负主要责任。

极力主张冒进的人受到表扬，主张反冒进的人受到严厉批评。一时党内"左"的急躁冒进思想迅速泛滥。

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他用辩证法的理论阐述了前进和后退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反冒进方针问题。他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趋势，发展是个总趋势。



从南宁会议以后的两三个月里，在批评“反冒进”的气氛下，批评“反冒进”的调子越来越高，给主张反冒进的同志戴上了“稳妥派”、“促退派”等帽子。

1958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 月 29 日，中共中央将这个草案转发全党。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实际是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它是总结几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特别是反右倾和反“反冒进”的经验教训的成果。

1958 年 2 月 13 至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 1 月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会议强调，今后不得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会上，周恩来、陈云为反冒进承担责任作了检讨。李先念和薄一波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的错误的责任。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

1958 年 2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指出，对于已经到来的工农业大跃进的局面，有些人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对许多省市和部门能否达到他们提出的高指标表示怀疑，并担心由此而破坏国民经济的平衡。社论认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时时刻刻在向旧的事物冲击，向旧的定额、旧的指标、旧的规章制度挑战。这是先进和落后、新事物与旧事物的竞争。在这个竞争中，旧的平衡一定要被冲破，不平衡一定要出现，不平衡经过调节，然后再达到新的平衡。社论再次批评了 1956 年“反冒进”的口号，说这个错误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社论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

此后，相继召开的成都会议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都对“反冒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将反冒进与社会上的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批评的调子再次上升，甚至上升至路线高度。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说，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他说，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他还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此1957年多一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那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毛泽东认为：“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他接着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到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再次猛烈批评了反冒进。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



报告》。报告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在陈云5月16日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作了检讨。在检讨中，他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在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周恩来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批评反冒进，将建设速度和平衡发展问题的不同意见，上升为政治问题，为经济工作的冒进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使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地位也实际上被取消。此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兴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各地以反对所谓右倾保守为经济上的冒进开路，片面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特别是主观地认定粮食问题已解决，加之基本建设规模失控，钢铁工业“单兵突进”，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

既继承八大的正确路线，又为“左”倾思想提供了发展机会的八届三中全会

为了总结整风和反右的经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问题。1957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91 人，候补中央委 62 人。此外，中央各部门党的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地委第一书记，以及直辖市的区委书记共 416 人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开幕词上说，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议程，原先通知的是两个问题：整风问题，农村问题。现在合并在一起，因为整风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提起来了。他还说，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同志准备讲体制问题，恩来同志准备讲劳动工资、劳保福利问题，但主要题目是整风运动。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

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五个问题：一是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很合适的形式；二是关于农业问题；三是关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四是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五是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

一、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邓小平指出：在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大多数党员表现是好的。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运动揭发了大量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现象。一部分党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味追求



个人享受，计较名誉地位。也有极少数党员丧失革命意志，甚至堕落腐化，违法乱纪。他还指出，党内所以发生这些严重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1）大部分党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2）党的组织发展较快，注意质量不够，而且思想政治工作也没跟上。（3）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党员是在胜利后的环境中入党的，他们入党的时候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觉悟，入党后长期处在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环境中，没有经过同资产阶级的直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180万知识分子党员中，大部分没有经过生产劳动的锻炼，没有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考验。为此，他提出，党的领导能否巩固和加强，决定于党的本身，决定于领导是否正确，能否切实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指出整风以来党内党外提出的很多批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的虽较偏激，也并不是没有益处。在我们的工作中，许多规章制度不合理，不切实际，相互矛盾；许多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有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为了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他提出了三点意见：（1）要克服宗派主义和特殊化的倾向。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呼吸。党员同非党群众、党外人士要有亲密的联系，要多交朋友，等等。（2）改变制度上和组织上的一些不合理的规定，适当地调整党政之间和上下之间的集中统一和分工负责的关系。（3）在人民内部扩大民主生活，继续健全民主制度。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坚持和风细雨的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出现扩大化的错误，党的指导思想上开始发生“左”的偏向，报告中提出的正确意见并未得到落实。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也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发表了意见。关于整风，毛泽东指出：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同时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他高度评价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斗争形式，认为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他还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

会议对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分析和意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会议肯定了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我国政治形势的估计和关于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见。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进攻，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由此，会议确定整风运动要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中展开，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

动。会议改变了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正确分析，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因而确定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在上述估计的情况下，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在会前已经提出的关于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会议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作用，说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并且指责不敢实行大鸣大放的观点是“右倾观点”；五、会议对下半年运动作了具体部署，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少数民族、军队、党和团等方面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要求。其总的精神是要求在一切方面，都要把运动进行到底。会议还规定了在工人、农民中主要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在少数民族中，还应反对民族主义倾向。

二、关于农业问题。会上，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并且指出，中国要靠精工细作吃饭，要争取粮食高产。会议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此外，会议还特别强调了发展农业对于发展工业，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意义，要求人人对农业发展都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全会强调了发展农业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现代化。工业与农业必须同时并举。陈云指出，现在看来，农业已成为建设中的弱点。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农业再不加注意，就要晚了，赶不及了。

会议讨论了《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草案规定：从 1956 年开始，在 12 年内粮食亩产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 1955 年的 208 斤增加到 500 斤；淮河以南地区，由 1955 年的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这个草案过去曾先后在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修改。全会认为，组织全体人民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不仅是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事，要求人人对农业的发展都要尽自己一分责任，各工厂、机关、学校、部队的成员和街道的居民、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都应该明确发展农业同自己的密切关系。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行动起来，尽快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加强农业战线的领导和力量。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纲要。

三、关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报告中，陈云提出要努力保持中央权力下放的控制，要更加全面地考虑全局利益，在权力下放之后，经济方面的平衡工作要加强，财政体制的变革要谨慎。他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分成制度基本上三年不变。他坚决反对省、市、自治区对财政的绝对支配权。但是在“大跃进”的锣鼓声日益紧密的1957年，平衡和控制是没有可能的，在以后三年“大跃进”的狂热中，平衡和控制更是成为一句空话。

全会认为，经过八年的发展，我国的企业数量和规模有了很大的增长，原有的旧的组织管理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地方上需要更多一些权力来调整中央所属企业和地方的关系，因而必须将权力下放一部分给地方和企业。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三项体制改进的总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单位，以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利于加强各种企业和事业的领导，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也不至于损害统一领导和重点建设，以便于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

四、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从1956年开始，周恩来一直在抓工资改革问题，因此由他向全会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报告。从9月3日至16日，他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和讨论。9月26日，周恩来向全会所作的这个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我国在劳动就业、工资制度和劳保福利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对于我国人口多、底子穷的情况了解不透，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切实际和不合理的现象。他说：“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他还谈到，我国人口的增长应同生产发展相适应，指出节制生育的重要性以及公费医疗严重浪费和低房租的不合理性；提倡用互助互济的办法，解决职工生活中的某些困难问题。

会议根据我国劳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决定，规定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必须统筹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要把适当安排城乡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实行合理的低工资

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

五、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在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就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看，“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不适合了，今后15年到20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仍将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反右派，但不应把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作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之后，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估计，是不符合目前实际情况的。“八大”决议对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仍然是正确的，不能因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估计。但是会议最后还是接受了修改国内主要矛盾的意见。10月7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意见说：“八大”决议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10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说：“八大”决议上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他肯定地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说：阶级斗争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样就完全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正确估计。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讲话中号召全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夫学习，做革命的促进派。他指出：“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他还说：“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这不仅背离了党的八大所坚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而且也成为后来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及发动“大跃进”的开端。这次会议在阶级斗争的估计上，在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所作的具有结论性的意见，反映了党内的



“左”倾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后导致了后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出改变八大决议的正式结论，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会议还基本通过了《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以及《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

南宁会议与成都会议

1957 年，党在总结和吸取苏联经济建设教训的基础上，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工农业开始出现增长的新形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68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157.3%。年末，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促使他确定高速增长、超英赶美的经济战略，来尽快发展我国经济。进入 1958 年，为了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讨论 1958 年的经济建设问题，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两次会议都批评了反冒进，肯定了冒进发展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左”倾思潮开始泛滥。

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工作会议，即南宁会议。会议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九省二市党委负责人共 25 人参加。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讨论和研究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家预算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划的有关问题，进一步掀起生产建设“大跃进”的高潮。

1 月 15 日，薄一波在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汇报提要（草案)》的发言。发言指出：“计划的中心是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高潮，迎接新的大跃进的一年，为第二个五年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建设铺好道路。”草案提出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 15.1%，即 747.47 亿元；发电量达到 220 亿度，增长 15%；煤炭 1.5 亿吨，增长 16%；生铁 720 万吨，增长 22%；钢 620 万吨，增长 17%；水泥 765 万吨，增长 12%；木材 2 850 万立方公尺，增长 9.4%；机床 2.6 万台，增长 3.3%；农业总产值增长 6.5%，即 642.5 亿元；粮食产量达到 3 920 亿斤，增长 5.9%；棉花产量达到 3 500 万担，增长 6.7%。财政收入 330 亿元，增长 7.22%；基本建设投资 134.36 亿元，增长 12%。国家计划内职工年末达到 2 440 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 40 万人。”[①]薄一波在汇报中讲，上述计划的中心是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高潮，迎接“大跃进”，为二个五年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建设铺好道路。



会议还听取了李先念关于1958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根据中央和毛主席强调指出的反对保守，反对浪费，勤俭建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估计到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安排的”，是“既积极又可靠的”。[②]

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作了关于钢铁生产的指标问题报告。报告指出“二五”计划预计1962年钢产量达到1 500万吨。[③]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和插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反冒进”。此外，会议在批判了1956年经济工作中反冒进的问题的同时，对工作方法也进行了讨论。会议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强调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并提出今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重申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他提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④]南宁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5至10年内超过当地农业产值，要求在5至8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并且提出苦战3年使大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的急于求成的口号。要求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超过英国。

由于南宁会议将对反冒进的批评上升到政治高度，使它成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2月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宣称：“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可以说，成都会议是南宁会议的继续。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成都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大部分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个别书记、候补书记，大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39人。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建国8年来的工作，研究了经济建设的有关问题，进一步扭转所谓右倾思想，树立经济建设高速度的思想，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关于继续对残存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

毛泽东在主持会议过程中于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作了六次重要讲话，并在其他领导人发言时插话。其中有3次讲话提到反冒进问题，并且说，1956年在国际上反斯大林和波匈事件没有料到，在国内反冒进没有料到。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表讲话。共讲了23个问题。他从全国、各省都需要协作讲起，讲到1958年第二本账问题，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生产计划能否4年完成，他希望全国、各省、各县来一个大协作，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苦战3年，改变面貌”。

毛泽东提出：党内存在两种速度的分歧，一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或者叫冒进派同反冒派的分歧；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在领导方法上，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一是干劲十足，搞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的热潮中前进，另一个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寡妇的心情和面孔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批评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基本观点“成绩是主要的，肯定是冒了”的报告是错误的。他说，1956年的反冒进，吹掉了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是方针性的错误。他并把党内的反冒进与1957年社会上出现的右派进攻互相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反冒进和右倾保守思想是不了解合作化后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指示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部分按语给大家看，还特意在3月19日写了重印的说明。说明写道：“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波，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周恩来等在会上继续作了自我批评，对1956年的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在会议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的观点，提出了有两种个人崇拜的观



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讲正确的主张必须要赞成，错误的主张必须要反对。他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的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在会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此后，个人崇拜开始空前高涨。

毛泽东在讲话中，发展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国内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其中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存在着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或者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按三个阶级分，恐怕清楚一些，按四个阶级分，工人、农民分开，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

毛泽东讲到右派时说，右派原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因为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作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现在的右派就是国内的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对上述这些敌人，我们要经常警惕他们的破坏，但大多数仍是可以改造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中，右派只占10%，90%的是中间派，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2.5%，老教授中右派的比例就大了。我们对右派的方针是孤立、分化、改造，除少数违法者外，不捉不办，给选票。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又不反，又拥护共产党又反对共产党，有的反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很好地做工作，这些人是完全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指出：不要那么迷信工业化、机械化，破除"人多地少"的迷信；人多是好事，现在还是人口少，实际人口到7.5亿至8亿时再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了。毛泽东说，我们应该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们敢于说话，交出心来；指出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毛泽

东说，先进分子应该不怕那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毛泽东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

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计划和预算的第二本账，确定工农业生产指标。这个问题本来在2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了一个方案，但是，随着大跃进浪潮的到来，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指标已是大势所趋。这次会议把南宁会议确定的1958年指标作为中央的第一本账，另搞了一个高指标的第二本账。会议通过的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指标是：工业总产值903.8亿元，要求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增长33%；农副业总产值754亿元，增长16.2%；财政收入372亿元，增长20.7%；基本建设投资175亿元，增长41.5%；钢700万吨，增长35.5%；生铁800万吨，增长35.5%；煤1.6737亿吨，增长31.1%；发电量246亿度，增长29.3%；粮食4 316亿斤，增长16.6%；棉花4 093万担，增长24.8%。这些指标已开始严重脱离客观实际，标志着整个国民计划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3月23日，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他按照在重庆起草的《总结纪要》，向会议提出了要积极准备兴建三峡工程的建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大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并且指出，“长江规划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在这一总的指导方针之下，周恩来提出了应当进行的几项工作。会议认真听取和审议了周恩来的报告，充分肯定了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党中央关于三峡水利工程的第一个正式文件。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反右倾”运动，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只要抓好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力、财力、物力，办出比原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倍计的事业。于是各行各业的“反右倾”运动很快铺开了。对一些主张谨慎地稳步前进的同志，往往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在各级干部中提倡和滋长了急躁冒进倾向。



1958年春天，各地在反右倾保守思想的推动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积肥等群众运动，农村的“大跃进”运动这时已经开始了，党在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也由此开始发展起来。

胡绳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对这两次会议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注释：

①薄一波：《关于1958年计划（草案）的汇报提要》，1958年1月15日。

②《李先念同志的汇报提要》，1958年1月。

③《王鹤寿同志的报告》，1958年1月19日。

④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二十一条（草案）》。

参考文献：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二次，唯有八大。1956年9月，八大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八大。按照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每届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即将党代会改为常任制。八大二次会议就是这种性质的会议，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的一个重要尝试。不过，党代会的常任制并没有坚持下来，此后再也没有举行过类似的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产生过及其重要的作用。会议的基本方面是全面否定了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同时发展了八大的不足，是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从正确到错误的转折。

1958年5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中共八届四中全会。到会人员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列席了会议。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八届四中全会讨论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议程、代表团的组成和大会主席团的组成。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5月5日上午，八大二次会议预备会议召开。会上，通过了大会的日程和主席团成员名单，并组成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中直、军队8个代表团。大会主席团由44人组成，主席团常委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乌兰夫、柯庆施、李井泉。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列席代表中有县委书记、大城市的区委书记、省辖市的市委书记、企业党委或其他基层党委的书记。

5月5日下午，大会正式开幕。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谭震林作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



增选候补中央委员。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内容主要有三个：

1. 目前的形势。关于国际形势，报告首先援引了毛泽东的一句话：世界形势的发展在最近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报告指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人心归向、人口数量、生产发展速度等方面，早就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工人队伍的壮大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促进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这些说明了，东风已压倒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报告同时认为，帝国主义阵营的首脑国，现在已经陷入了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猛烈下降，失业大量增加。这个危机正在冲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且使得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学者、改良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战后所散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逃脱危机的欺骗宣传，彻底破产。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加深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扩大了。此外，报告还说，帝国主义除了战争威胁、加紧镇压和剥削外，还竭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寻找新工具，企图从内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据此，报告认为目前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重要任务是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国内形势，报告认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并且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地都应当采取整风的方法加以解决。报告指出，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人们的思想、作风及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汇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伟大革命干劲。

2.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是报告的核心内容。报告首先对总路线的形成进行了回顾。报告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两种建设方法的观点，认为两种方法（即好些和快些的方法与慢些和差些的方法）的斗争，已经在理论和实践是解决了。报告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 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报告认

为，由于反冒进，1956 年到 1958 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 年—1957 年—1958 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3. 今后的任务。报告认为，党在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百折不挠地为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斗争。报告还提出，要改进国家工作方面的首要认务是迅速地正确地解决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问题。随着管理体制的改进，必须改进现行的关于经济工作及其他的各项规章制度，继续精简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机构，改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报告还提出：在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条件下，无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都应适当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便更多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报告最后说，我们的六亿多人口在革命觉悟高涨和革命斗争胜利的速度方面，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西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发展的速度方面，也必然远远地超过他们。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莫斯科会议的情况，以及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工作。报告共分为六个部分：1. 关于国际形势；2. 关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3. 关于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势；4.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民族特点的相互关系；5. 关于修正主义；6. 关于思想工作。八大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决议重申了莫斯科会议宣言的一些重要观点，指出：宣言发表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以及团结合作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决议同时认为，必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政治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

5 月 17 日下午，受中共中央委托谭震林作了《关于 1956 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他首先介绍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以来我国农业的情况。他说：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必须努力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接着，他又谈了提前实现和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规划的具体措施问题。他说：自从1957年冬季开始出现农业新高潮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专区、县、乡、社，都提出了提前实现和超额完成全国农业法纲要的规划。许多单位提出了提前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绿化”和“四无”的口号。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客观条件方面出现的不利因素的可能，例如发生不能控制的自然灾害，或者由于某些措施的客观条件不具备而落空。预先计算到这种可能，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使他们在不利条件下仍能够保持旺盛的干劲。在“水利化”“机械化”“绿化”和“四无”等等问题上，同样要注意踏实，防止虚报和浮夸。谭震林还讲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情况。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自1957年10月公布，提交农业合作社和全体人民讨论后，到1958年4月底止，共收到各地方、各方面、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综合整理为293条。根据这些意见，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形成第二次修正草案。

这次修正草案主要的修改和补充是：1. 在生产指标上，增加了发展油料作物的指标，要求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一到两倍。在棉花亩产量指标方面重新恢复了1956年1月公布的草案中的规定。在制定纲要时还把可能发生大水、大旱等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也估计在内了。这样使纲要所制定的指标既是积极的，又是灵活的。2. 在增产措施方面，补充和修改了关于水利、肥料、土壤和机械化等条款。强调了农具改良运动的现实意义。同时，纲要还提出了普及小学教育，增加了关于在农村兴办农业中学和提倡勤工俭学等内容。

修正草案经过大会讨论，予以基本通过，再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作必要的修改。

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没有作工作报告，只是作了4次讲话，而且讲得很随意，似乎也没有刻意地做准备。然而，从对会议和会后所产生的影响看，这些讲话是此次会议的主题和灵魂。在随后全面启动的“大跃进”中的许多做法，都与讲话的内容有着直接的关联。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主要内容涉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破除迷信、国际国内形势、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等。

第一，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要求大大缩短超英赶美的时间，争取7年赶上英国，再加上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在谈到总路线形成时说：现在我们形成了许多新的概念，如多、快、好、省，是集中多少

年的经验，反映了人们的干劲。并且指出六亿人民的绝大多数干劲很大。与上述问题相联系，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是右倾，是促退。他强调：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他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把指标订得过高的意见，说他们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他说：对于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不能不准人家革命，要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转变，他们还是积极分子。于是会上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第二，关于破除迷信。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二月、十月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接着，他说：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



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毛泽东在批评了奴隶性、“贾桂作风”之后，指出：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会议期间，毛泽东于 5 月 18 日批发了一份关于工人进行技术设计的文件，他作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示：“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同日，毛泽东在同各代表团团长的会议上说：我这些材料要证明一条：是不是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来创造。

第三，关于赶超英美。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嘛！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 10 年 15 年，八亿多人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吗！吃了饭就干社会主义，因此说十几年二十几年就赶上实际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毛泽东说，钢产量如果 5 年内能达到 4 000 万吨，可能 7 年赶上英国，再加上 8 年就能赶上美国。他还说：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

第四，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讲了外行领导内行问题。他说，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他以孙中山为例，说孙中山原来是当医生的，医生是他的正业，政治是副业，后来转化成

政治是正业，医学是副业，他就可以管医生了。谈到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时，他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不够全面，缺乏辩证法。他还提出设置对立面的主张，他说，要设置对立面，对立面是客观地存在，人民中的创造性也是客观存在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党的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些人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老资格。我们要破除这个东西，谁有真理我们就服从他，不论他是挑大粪的、扫街道的。摆架子，看不起人，这是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一种高级趣味。

第五，关于形势。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国际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资本主义时间到处都有乱，凡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都于我们有利。帝国主义互相吵架，互相争夺殖民地。关于和平和战争问题，他说，和平是第一种可能性，战争是第二种可能性。现在看来争取和平比过去可能性大，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强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西方世界有许多不愿意打仗的人，除去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中也有不愿意打仗的。和平的可能性很大，战争的可能性也有。在谈到国内形势时，他说：国内形势很好，一片光明。过去没有信心，现在信心提高了。因为农业大跃进，逼迫工业也大跃进。但也要看到阴暗一面，不要怕。他接着说，国内问题，还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作为同盟军，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所以中国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他说，不抓农民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针对党内会不会分裂，毛泽东说，现在看来，一般不会有，可能性是有的。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出现党内分裂，就要乱一阵子，但又会走向反面。

从5月6日开始，大会进入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阶段。主要围绕刘少奇所作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以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讨论了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发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贯彻执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问题，并对工农业生产和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1958年5月23日下午，大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增选王任重等25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大会于这天下午闭幕。



中共中央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范畴

早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就曾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宣布了这个论点。这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转发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并且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同他们共同工作的错误倾向。

然而，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能够透彻解决，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开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1956年8月30日举行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毛泽东认为，“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①]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出现了反复。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但是，

八大报告没有重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没有提到周恩来报告中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新结论，而是恢复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传统提法，虽然强调的重点是必须运用这些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八大报告一方面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认为“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另一方面又重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这里并没有确认大多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已经树立起工人阶级思想观的事实，这里面就包含着矛盾。这为后来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定性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埋下了伏笔。

1956 年底到 1957 年初，国际上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给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观察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以消极的影响。尤其是看到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加之，在国内出现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产生了不信任的心理。由此导致，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之一，“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已转化为新社会服务”“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应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多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报告中还批评了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方法。然而，讲话于 6 月正式发表时，又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一段话。在这里，毛泽东虽然依然承认知识分子的变化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但同时又第一次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个与以前中央政策相左的观点，改变了中央的文件和指示中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规定。

1957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



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在当时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明确地改变了中央文件中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规定。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把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开创了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属性的错误先例。从此，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不再被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是逐步被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实际上就把党中央在1956年初作出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结论否定了，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的斗争，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错划为“右派分子”，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957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②

1957年5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认为，在共产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整风运动演变成一场反右派运动时，毛泽东更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坚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因而产生了这些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观点和思想，直接导致了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于是，1957年9月召开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了关于整风反右斗争问题，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因而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干部应该加强业务学习，知识分子应该加强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角度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并指出“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1958年1月他又说“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

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可见，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又红又专的要求是侧重于红，红是首要的，并且以参加政治学习、政治活动的多少作为“红”的标准，甚至把红与专对立起来。这个口号在当时对知识分子思想状况做出错误判断的情况下难免有“左”的倾向，导致许多人在实际上将红与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使知识分子背着沉重的包袱，不敢言专，不敢全力以赴搞业务。

毛泽东在对知识分子做出错误判断的同时，又提出了“又红又专”的口号。1957 年 10 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干部应该加强业务学习、知识分子应当加强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角度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此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对“红”与“专”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从这些论述和其他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到，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又红又专”的要求侧重于“红”。强调“红”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要以红带专，以政治带业务，这与当时突出宣传“政治挂帅”是一脉相承的。“红”的要求包括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两个方面，而世界观的改造则是“红”的主要要求。当然，从知识分子应该在政治、思想、业务诸方面不断进步以跟上时代步伐的一般意义上讲，“又红又专”的要求并没有错，问题是在对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况下，这个口号便难以避免“左”的倾向。而正是这种“左”的倾向，导致了很多人在实际上将红与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在背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沉重包袱下，更是不敢言专，不敢全力以赴搞业务。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此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对“红”与“专”的含义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从这些论述和有关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知识分子来讲，“又红又专”的要求侧重于“红”，强调“红”是首要的，第一位的，要以“红”带“专”，以政治带业务。“又红又专”口号简单化地把知识分子划分为“红专”与“白专”两类，给许多刻苦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戴上“白专”的帽子，批判他们走“白专道路”。这种做法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敢言专，不敢全力以赴搞业务，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

1957 年，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后，“左”倾思想得以日益发展，随着党在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判断上的失误，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左”的逆转。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将其明确归入

 

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中。

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28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说“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判，对知识分子像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像旗杆那么高。”“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

1958 年 4 月 6 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又说，反右派斗争以后，“对知识分子戴上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这说明，反右派斗争后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一方面是从世界观出发的，另一方面还包含着对其政治立场的担心，即认为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这样一来，就发展了前一阶段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错误，知识分子就由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知识分子明确归到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行列中，就从根本上改变了 1956 年初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并据此强调继续对知识分子实施教育和改造政策。成都会议和汉口会议的错误论断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成为轻视、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依据。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明确地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划入剥削阶级的范围，这就完全错误地分析了我国的阶级状况。会议错误地接受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估计，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会议形成了“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政治上、思想上，从世界观上，一般地被归入资产阶级的范围。

给知识分子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产生了一系列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观点是“知识分子最无知，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外行领导内行是个规律”和“白专道路”。这些错误观念是轻视

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集中反映，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很多不良的后果，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而且，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在知识界展开了红专辩论、拔白旗、插红旗，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知识分子劳动化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这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都严重得影响了党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还导致我国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受到了严重干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1962 年 2 至 3 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3 月 2 日，周恩来向这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这次会议以后，陈毅在转达他的观点时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且强调“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的正确意见未能成为党中央的共识，并且遭到了否定。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打击越来越严重，并且最终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①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 年 8 月 30 日）。

②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89 页。



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

1957年以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思考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对国家建设的问题提出了不同地意见和建议，并且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内容十分丰富的一个问题，又是事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果和速度的关键。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发表了关于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新观点。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毛泽东在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针对“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批道：“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表达了他对计划体制的疑虑。他还针对书中所说社会主义商品“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批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这些批注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并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突破了斯大林的某些论点。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讲话中得到了充分展开。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批评了我国当时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加区分的错误倾向，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1959年2月3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

出："我们犯了冒险主义。在生产关系改进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下面的同志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毛泽东从经济规律的相互联系中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显然已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更加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这一时期，刘少奇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这是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和倡导的一种新型制度。1958 年 5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作了《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讲话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来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就是说，不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当然，学习的年限以及课程、待遇等等，需要加以相应的调整。这样，就可以多办学校，国家经费不至于增加很多，但要盖些房子，并且提供教员。就是说，势必会有这么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在工厂中，也是两种主要的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员、大学毕业生。

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陈云这里所说的财力、物力，就是指投资和机器设备、原材料、消费物资、外汇这四个方面。陈云提出，必须寻找一些制约的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在



这篇讲话中，他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思想：一、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二、原材料的供应必须有分配的顺序。在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时候，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三、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四、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五、注意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的约束力。为了解决当时财政经济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陈云还提出了三条切实的措施：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二、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三、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这些措施对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忽视和违背了陈云提出的这些正确的原则。从钢铁生产一年“翻番”的高指标开始，其他部门也都相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在纠正经济工作中的错误的过程中，陈云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且进一步发展了上述重要思想。

在开始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企业，实行职工代表大会等观点。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扩大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民主等等，都是一些新的重大问题，它关系到企业的方向，也关系到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邓小平经常关心和研究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符合马克思主义又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要观点。1957 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的工业企业要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制度。他指出：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是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应该充分运用和全面推广。1958 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给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带来了严重混乱：许多企业的生产指挥系统失灵，规章制度废弛，无人负责现象相当严重；经营不计工本，不讲究经济核算，亏本赔钱：职工的工资、奖励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在分配上不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主要依据：对科学技术不尊重，忽视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企业党组织包揽日常行政事务，削弱了党的领导，放松了思想政治工

作。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中央和地方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在听取有关部门、有关人员的工作汇报中，多次强调要整顿工业企业，要治乱，要把企业管理上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他说，大跃进以前，我们的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好的东西。有些不应该否定的东西给否定了，应当恢复起来。他指出，1958 年以后，在工业企业管理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创造，应当把那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的经验肯定下来。

邓子恢提出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从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之日起，他就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巩固集体经济上来。早在我国合作化运动的初期，邓子恢就指出要发挥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农业合作社必须“把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搞好，建立责任制”。在我国农村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之后，我国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搬用了苏联已经实行了多年的“集中劳动，集中经营”、“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的一套集体农庄的经营管理体制，这在缺乏经验的当时是难免的，但并不是天经地义的。1957 年 5 月，邓子恢在《论农业合作社内部矛盾与民主办社》一文中指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而不是个体所有制，至于生产的经营管理是高度集中还是适当分散，就要根据各种生产对象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原则是要看如何有利于生产。”他批评“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确实有一种机械观点，只能集中不能分散，只能大不能小，只能高不能低，以为这样就是社会主义，其实这是一种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按实际情况办事的最有害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观点”。1957 年 9 月，他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山东、湖北等省某些地方实行包产到队、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的责任制形式，肯定这种“大活一起干，小活分给个人干”，“是最好的方法，能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也适合地区的季节性、分散性”。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肯定了各地创造的“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的生产管理制度。当时，在邓子恢的主持下，中央农村工作部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并实行超产提成奖励、减产扣分的办法”（即三包一奖），指出“工包到组”、“田间管理包到户”，是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一种有效办法。在轻率发动起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冲垮了各种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之后，邓子恢仍然主张实行三包一奖的责任制。1959 年 10 月，他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指出，高级社时各地实



行的三包一奖制，“是适合于目前农业生产特点的生产责任制，是鼓舞社员积极劳动、改进技术、提高劳动效率的良好制度”。

张闻天十分关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8 年初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他曾到东北、广西、广东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张闻天明确提出“不能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做拜物教”，强调“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1959 年 7 月 20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7 月 21 日，在华东组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长达 3 个小时约 1 万 4 千字的系统发言，他诚恳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公开表示支持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深刻地剖析了 1958 年错误，并阐述了自己的经济观点。他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经济生活带来的严重后果和重大损失的原因。他认为，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钢铁指标过高，搞所谓“元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使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基建战线太长，新增工人太多，企业产品不成套，原材料缺乏，停工待料，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下降等。张闻天认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他反对刮“共产风”，认为“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它还有生命力。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巩固、稳定下来。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它的改变。”他还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所谓“吃饭不要钱”、“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等等平均主义，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这些办法。他要求“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按照多劳多得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张闻天针对“大跃进”和刮“共产风”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要搞经济核算，实行节约原则。他建议在庐山会议的文件中增加“经济核算”一条，并说，“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账，并不是‘算账派’。”“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他还指出，我国目前还是“一穷二白”，资金有限，“应该实行节约原则，把钱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张闻天同时指出，1958 年所犯错误的原因在于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他说，应该着重从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方面找

寻犯错误的原因。他指出，前一时期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是片面性，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干劲强调过了分，反对讲条件，就造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他认为，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不能光是主观愿望和政治上的要求，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要吃亏的。今天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后提任务，也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他还强调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普遍规律在我国建设中同样起作用。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他在北京从事经济科学研究的岗位上，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近七年的时间内，写了大约有80万字的"读书笔记"即"北京笔记"，其中包括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以及现在收入《张闻天选集》的《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等文章都是采自这个笔记本。这些文稿和笔记的内容，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思考，也是他庐山会议发言的深化和发展。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酝酿和讨论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议上他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将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

1958年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会议，一部分中央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几次讲话，并在一些人发言时插了许多话。

3月18日，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说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一天等于二十年”。对此，毛泽东在陈伯达发言时也插了许多话并表示了赞同。在插话中，毛泽东还说了这样的意见：“‘反冒进’那个时候，同志们倒不是不赞成搞生产建设。156项，800多项，都是要搞的。只是当前遇到困难怎么办？相当限制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当作理论性的问题提出，市场和基建，搞几个平衡，恐怕就不妥当。”

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所以成都会议上就这个问题的所谓讨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很多发言都反复重申速度问题，这也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措施。否则，指标很高，实现不了。他说，有的高指标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得那样重。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说。他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毛泽东要求，要宣传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如何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

识。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要求宣传“丰收例子”，引发了各地大放“卫星”，都变成了浮夸的典型。对这些浮夸典型，人们又不敢“泼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终于成了危害极大的“浮夸风”。

3月20日，毛泽东在讲话中第一次对总路线进行了表述：“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一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同时，陈伯达还受命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出文字表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和发展轻工业同时并举；在中央重点工业的领导下，发展中央工业必须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所有这些目的都是在于力求促进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后来为八大二次会议所采纳。

在成都会议批评反冒进，要求加快速度的气氛中，与会的部门和地区的负责人都纷纷修改计划，提高指标。例如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说：“我们的任务是：在七年内（争取五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提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比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指标高得多，工业总产值由年增长13.9%提高到33%，粮食和棉花的增产速度分别从5.9%、6.7%提高到16.6%、24.8%。有的省委书记提出一年“四实现”，即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亩产400、500、800斤的粮食指标）、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有的省要争取5年完成10年规划，即粮食、棉花的产量翻一番，油料的产量翻两番，消灭四害，扫除文盲，其根据是“欲慢则不达”。

会上，还有人表决心：“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某大区负责人表示：全区5年完成纲要四十条的主要产量指标，5至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



中央有的工业部门提出："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一面告诫中央和省部两级领导必须稳当一点，要谨慎，要留有余地；一面又说，现在只是压缩空气，反冒进是一齐下马，现在不是下马，是如何搞出措施。显然，毛泽东是欣赏这种"大跃进"气势的。他并没有表示不相信上述高指标，反而说，今年如果能增加 1 000 亿斤粮食，700 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实际上，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只能增产粮食 100 多亿斤，就是 30 多年后的今天，在一般情况下，全国每年粮食产量也仅仅能增长二三百亿斤。可见，当时提出的那些高指标是多么脱离实际！正如谭震林在 1960 年 12 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成都会议的高指标，撒下了浮夸风的种子。

在生产上追求高速度，必然导致加快改变生产关系的问题。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必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这是农村生产关系向着"一大二公"转变的开端。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且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会议不断加剧的对反冒进的批判，使中国共产党党内普遍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是应该肯定的，综合平衡积极稳步的发展则要否定。这种错误的认识加剧了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发展。

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制定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开始提出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56 年党的八大也提出了正确的路线。但是，由于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党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一些错误判断，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我国的经济建设因此遭受了严重挫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如果中国不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安全就不能保证，如果不能很快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这种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愿望，在毛泽东那里显得尤为迫切。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认为，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来一个“生产上的大跃进”，取得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大胜利。正是在上述良好的主观愿望支配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着手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总路线的形成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在对此批判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了一条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建设总路线。

从 1955 年底开始，毛泽东认为在各个方面都要开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于是，在 1955 年底和 1956 年初，毛泽东提出了“多快好省”的方针要求。195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提出“多快好省”的问题，他强调：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不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后来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的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95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



又省地发展自已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发表了。

结果导致在1956年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冒进的偏向。1956年间，包括党的八大以后一段时间，反冒进仍然继续进行。1957年9月到10月举行的八届三中全会，一方面总结了此前的反右派斗争，另一方面就是对反冒进开始了正式而系统的也是更猛烈的批评。“反反冒进”，也成为了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10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①]

到了1957年，我国已经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人民群众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有利的客观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而且也能搞得更快一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社论中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第一次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好。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南宁和成都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多次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提法给予肯定。毛泽东还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基本观点已经有了，但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会后，各地反右倾保守思想的运动很快展开，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

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观点，还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成都会议结束后，由刘少奇主持、胡乔木负责，对《报告草稿》进行了大的修改。修改后的初稿比原来的草稿增加将近两倍，在初稿的第二部分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和基本内容进行了具体阐述，报告中说：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体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

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包括了为执行总路线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具体工作路线，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肯定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并在实践中发挥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

然而，这条总路线又是在党内错误地不断地批判“反冒进”、“右倾保守”的形势下逐步形成的，“左”的错误倾向已经出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忽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的错误。尤其，在此后的宣传工作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等等，致使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多、快，忽视了好、省，严重违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使“左”的指导思想开始蔓延，人们的头脑开始发热。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因而总路线提出不久，未经过认真的调查和试点，就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

注释：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第 605～606 页。

②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对八大二次会议的客观评价

八大二次会议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产生过及其重要的影响。大会的一个最主要成果是讨论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大会闭幕后，《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曾这样概括它的意义：“这次大会是整风的大会，是大跃进的大会，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次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①

23 年后，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可以说，《决议》对八大二次会议所制定的这条总路线作出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首先，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

后的普遍愿望。这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和当时中共八大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相一致的。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可以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感受。因此，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确实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这一感受体现在总路线的内容上，突出表现为四个字："多快好省"，这个提法本来是较全面的，"多快"和"好省"也是可以互相制约的，但在实际的贯彻执行中，脱离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结果，不能不事与愿违，不但没有加快，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出现一次大的曲折。这也是造成后来"大跃进"运动中，制定高指标，追求高速度的一个错误根源。因此也违背了中共八大关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

其次，这条总路线鲜明地体现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就是全力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就这点来说，它是坚持了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路线的，是八大前后明确提出的党的主要任务已从革命转变到建设的正确战略思想的继续。然而，八大二次会议在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同时，又正式肯定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本来，主要任务总是解决主要矛盾的，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但在这里，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却脱节了，反映了党的指导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这种矛盾，就使得党不可能集中全力，聚精会神地搞建设，发展生产力；也就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坚定不移地把八大的任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贯彻执行下去，实现这个战略转移。所以，随着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开展，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把它引申到党内。1962 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实际上取代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地位。"文革"期间，终于把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完全统一到了阶级斗争方面，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此外，八大二次会议还制定了总路线的基本点，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以及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这些原则固然可以说是八大路线的继续，也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把这些要求同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等理论结合在一起，同“不断革命”和“积极平衡”等口号结合在一起，同依靠群众运动，仅凭主观努力，“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等要求结合在一起，实践的结果，却从根本上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甚至走向它的反面。

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八大二次会议把建设速度问题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以此制定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指标。会议对反冒进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判，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在这些批评的压力下，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会议断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认为，“建设速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求的建设速度，不是一般的超过过去的中国，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要求的建设速度是成倍地、几倍地以至几十倍地超过过去的中国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会议正式提出了“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农业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会议甚至还提出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1956年9月八大会议时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其中钢产量从1 200万吨提高到3 000万吨，粮食产量从5 000亿斤提高到7 000亿斤。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就抛开了八大会议通过的《建议》，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事实上，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所提出的这些指标和目标，严重脱离实际，其绝大部分是达不到的主观愿望而已。

八大二次会议的又一重要影响是重新分析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结论。会议确认了毛泽东1957年在党的八

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意见，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会议正式采用了毛泽东关于国内阶级状况的新论点。会议宣布：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这样，轻易地修改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轻率地把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范畴，否定了 1956 年 1 月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分析。这些重大的改变，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为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党在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上陷入了自相矛盾当中，并且严重干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八大二次会议完全肯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是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全会肯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我国政治形势的不恰当估计，认为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是"极力猖獗、极为狠毒的"，进而确定整风运动在原有基础上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肯定毛泽东在会前提出的关于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作用。

除此之外，八大二次会议在党内民主生活方面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会议过程中，由于对党内的不同意见采取上纲上线的批评，党内一些正确的意见受到了压制，党员乃至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民主权利受到了侵害，严重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并且最终造成"左"倾思想严重泛滥，而得不到迅速的纠正。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一些正确的决定，但是会议确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强烈愿望，但从根本上忽略了客观规律和实际。会议还错误地分析了阶级斗争形势，修改了国内主要矛盾



的重要论断，给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可以说，八大二次会议反而是八大的后退。这次会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不顾客观规律、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9 日。

②李富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的基本问题》，《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1958 年第 1 期。

农业发展纲要的制定及修改

农业发展纲要一直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农民的指路明灯。其全称为《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共 40 条。《纲要》从制定到正式公布实施，期间经历了几上几下，并通过 4 年的试行才正式通过实施。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提出《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草案)》公开后，各地方掀起冒进高潮，纷纷要求把纲要中 12 年或 7 年的任务提前在 5 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各种地方基础建设项目纷纷上马，造成了财政、物资和市场供应的全面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陈云等党中央领导人开展了与冒进思想针锋相对的“反冒进”。他们以“保证重点，适当压缩”为原则在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上调整了过高的计划指标，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并且通过发布《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等社论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反冒进”问题的重视。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纲要草案所带来的冒进影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是从 1957 年 1 月起，毛泽东开始公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责“反冒进”，特别是自同年 6 月起，受整风运动后期已经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的影响，毛泽东认为是“反冒进”打击了人民的积极性，导致了资产阶级的进攻狂潮，提出要恢复在“反冒进”中被“砍掉”的农业四十条（即纲要草案)。

在这种气氛下，1957 年 9 月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上进一步讨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会议基本通过了这个草案，并决定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组织农民和全体人民讨论。

会议对这个《纲要（修正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关于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 400 斤 500 斤和 800 斤的基本指标和绝大部分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变，重点将发展合作化的条文改为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突出强调



了农业机械、化肥等问题，同时增加了发展山区经济的条文和有关条文的部分内容。为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该发展纲要制定了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大力增加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积极地因地制宜地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等增产措施。此外，修正草案还更加鲜明的烙上了阶级斗争的印记：在修正草案中序言指出，农业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的存在，要求尽力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并明确提出了要巩固贫下中农在合作社中的领导地位。

当时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鼓舞下，1957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规定》，由此在全国农村首先掀起了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的高潮。在这次高潮中，一些明显带有“大跃进”特征的因素也开始初露端倪。

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目标宏大，在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运用中国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生产运动成为了实现这一草案目标的唯一选择。为了发动群众，各大报纸铺天盖地地进行舆论宣传，号召：“人们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性的建设运动变得势不可挡，并开始慢慢失去控制。据粗略统计，自 1957 年 10 月份起到次年 1 月投入到水利建设战线的劳动力就从两三千万骤增至一亿。各省各市普遍开展了兴建水利工程和积肥的劳动竞赛，有的县还喊出了“粪坑挖净，粪源找净，厕所起净；大街扫光，粪蛋捡光，畜圈起光，城粪下乡；锅台、灶洞、碾台、井台、老尿窝、破房框都来个大翻身”的口号。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是推动“大跃进”前进的主要动力。

在这股建设高潮中，也孕育了公共食堂、公共托儿所和人民公社等“大跃进”的标志性产物的雏形。在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中需要集中组织大规模群众劳动，而且农田水利建设也要求打破地域上的一定限制，这样，原有的只拥有数十到数百户的小型农业合作社便渐渐不能满足运动的需求了。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决议，由此便开始进入小社并大社，大社合并成为更高级的人民公社的飞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为弥补劳动力的不足，简易的公共

食堂，托儿所也开始广泛流行以腾出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参与建设运动。

为了迅速实现《纲要（修正草案）》的宏伟目标，毛泽东于1957年10月9日作了《作革命的促进派》报告，报告指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就是大鸣，大方，大辩论，大字报。"号召群众用"四大"的方法与带有"右倾保守主义"思想的人作斗争。在毛主席的鼓励下，全国上下顿时陷入反"右倾"的汪洋大海之中，各种报刊杂志的急进思想也随之高涨。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正式提出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的口号。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文章明确了"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就是1956年反冒进事件的制造者。这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所以他们要"反冒进"，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这篇社论第一次把《农业发展四十条》看成"跃进计划"。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指出："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从1958年开始，中国农业生产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一五"计划的农业生产指标超额完成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广大农民和干部迫切要求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这年年初，在《纲要（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于1958年5月拿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予以基本通过，再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行情况作必要的修改。

这样，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上讨论和审议了《纲要（修正草案）》。并最终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及其相应的决议。批准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



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建设的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大大提高我国农、林、牧、副、渔生产的要求，规定了达到这个要求的各种有效措施，制定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开展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划，它向全国农民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改变我国农村面貌的伟大目标。"

此后，《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开始作为正式文件向全国公布。《纲要》在序言中指出，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地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后一条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工农互相支援，是农民解放的保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封建残余分子为了恢复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极力挑拨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他们这种卑鄙的挑拨失败了，并且还要继续失败下去。

《纲要》对巩固农业化制度、提高农作物产量、发展畜牧业及兴修水利、推广经验、发展山区经济、消灭虫害、扫除文盲，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电话网和邮政网、交通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规划了我国农业从 1956 年到 1967 年 12 年期间的发展远景和蓝图。《纲要》认为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基本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加强对少数个体农户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的，听其自便。

《纲要》规定，从 1956 年开始，在 12 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

（皮棉），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下，各地应当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保证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纺织原料（棉花、麻类、蚕茧），油料（大豆、花生、油菜籽、芝麻、油茶、油桐），糖料（甘蔗、甜菜），茶叶，烤烟，果类，药材等项农作物的计划指标，还应当积极地发展其他一切有销路的经济作物。华南各省有条件的地区，应当注意发展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农业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和饲料。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应当按照国家的计划种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此外，《纲要》还指出，要按照各地情况，有计划地发展国营牧场。大力保护和繁殖牛、马、驴、骡、骆驼、猪、羊、兔等家畜和适当地繁殖各种家禽。特别注意保护母畜、幼畜和种公畜。建立配种站，改良畜种。

1960 年 4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提前两三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社论高度评价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认为它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社论说，1956 年，特别是 1958 年以来的事实证明，提前实现纲要规定的各项指标是完全可能的。到 1959 年，完成粮食亩产指标的县已达到 504 个，占全国县（市）的 28%；完成棉花亩产指标的县已有 204 个，占全国植棉县的 20%。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提前 8 年、10 年以至 11 年完成纲要规定粮棉指标的县，其自然地理条件并不特别好。这证明其他条件好的地区经过努力，当然也能够提前完成纲要指标。社论认为，要在全国其他 70% 以上的县达到纲要指标，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就是说，那意味着全国粮食总产量还要在 1959 年的基础上再增加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全国人民应当下定决心，再奋战几年，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完成这个任务。

《纲要》的制定和发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振兴农业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但是，由于受到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纲要》实际上成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总纲领。随着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以后的“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纲要》精神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



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

1958 年 5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举行，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这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如前文所说，“大跃进”运动是在不断错误批判 1956 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反冒进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倡导的反右倾保守主义导致的急躁冒进而展开的。对于反冒进，毛泽东一开始就不十分赞成，但他采取了相当克制和保留的态度。到了 1957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则正式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在会议结束前发表的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说，1956 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对这几项东西要恢复。他还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这次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并于 10 月 25 日公布。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为《纲要》配发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社论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批评。社论指出，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于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特别是“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了四十条纲要的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农业生产就吃了亏”。社论同时指出，“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农村中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建设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社论还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通过媒体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动员，也是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有信心地告诉毛泽东：15 年后，苏联主要工业产品可以赶上并超过美国。这既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兴奋，也使他感到了压力。他认为中国也应该奋起直追，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回答：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会议期间，他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谈话中了解到，再过 15 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现在的 2 000 万吨增长到 3 000 万吨，而按计划中国再过 15 年可达到 4 000 万吨钢。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于是 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相应地提出："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①]

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处于一种兴奋状态。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把全国发动进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毛泽东还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冒"一点。后来这一口号不断修改，并把赶超时间提前。1958 年 5 月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②]。同年 8 月和 9 月毛泽东又提出："两三年超过英国"和"五至七年接近和超过美国"[③]，更为脱离中国国情的主观目标。赶超的时间被越缩越短，而赶超的目标则越提越高。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1956 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在党报上使用"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欣赏，



认为“大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在批语中建议给“大跃进”这一口号发明者授予“一号博士”头衔。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给参加此间政治局会议的同志的信中说：“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

为使“大跃进”成为全民性群众运动，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中共中央动员全国农村近亿农民投入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从此以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群众兴办中小型水利工程的高潮。此后，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全国各地组织全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进一步落实以社办小型水利工程的政策。随着以社办中小型水利工程为主的政策在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中指导地位的确立，这一方针日渐明晰具体，逐渐被概括提炼为“三主”方针，即“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治水方针。在“三主方针”的指导之下，全国迅速掀起以促进农业“大跃进”为目标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进一步重申和肯定1956年经济战线的“大跃进”，批评了“反冒进”。

伴随着“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进入了1958年。在这一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就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要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从此，“超英赶美”成为“大跃进”中响遍全国的口号。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把1956年“反冒进”说成是“右倾”、“促退”，进而提出了“大跃进”概念。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认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和

超过英国。”在这里毛泽东重申了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南宁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5—10年内超过当地农业产值，在5—8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苦战3年使大部分地区面貌基本改观的急于求成的口号。

南宁会议以后，农村的“大跃进”已经开始，并由农业领域发展到各个方面，“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其中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五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河南省委向地县部署：当年麦收前，全省实现水利化；消灭“四害”：老鼠、麻雀（后改为臭虫）、苍蝇、蚊子；当年实现纲要规定在12年内达到的粮食亩产指标；年底全省城乡消灭文盲。因工业集中，历年吃外调粮的辽宁省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毛主席对河南的部署虽有怀疑，但认为危险不大，只要求不要登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大运动。党中央和省委要求如此之急，下面当然就更加“只争朝夕”了。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宣布：“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社论在分析了当前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后，再次批评了反冒进，说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对整个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名为“冒进”，实为反跃进。社论对什么叫“跃进”作了解释，认为跃进与冒进有原则的不同，它是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千方百计，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前进。社论要求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苦战3年使全国大部分省区基本改变面貌。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国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行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指示要求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发批判浪费、保守现象，推动运动的发展。

195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继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经历着“一



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成都会议还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生产计划要有两本账”的观点（即中央和地方计划工作都要有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可公布的账，一本是期成的、不公布的账），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实现大跃进的1958年第二本账，即比2月上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计划“高了许多”的“一个多快好省的账”。成都会议的第二本账，标志着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表示：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

伴随着对反冒进的批评，“大跃进”也就一步步升温。在上述一系列会议的基础上，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再次对反冒进进行批判，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 200万吨提高到3 000万吨，粮食从5 000亿斤上升到7 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

“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

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至此，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5页。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6页。

③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农业大跃进

1958 年发动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大跃进开始的。1957 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从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农村生产建设达到了高潮。伴随着“大跃进”口号的提出，各地纷纷制定出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提出了“以粮为纲”，将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成了农业生产的混乱。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在进一步批评反冒进后，各省纷纷响应制定了更高的农业计划指标，使农业产量计划的高指标在全国进一步确立。这年 2 月，河南省提出，1959 年就要基本实现水利化，争取在 1962 年超额完成“四、五、八”，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粮食产量，到 1962 年全省粮食的总产量达到 600 多亿公斤。广东省则提出，到 1962 年就要实现全省粮食亩均年产 800 斤的目标，到 1967 年实现亩均年产 1 000 斤，总产量由 218 亿斤增至 480 亿斤。陕西省提出，8 到 10 年内使八百里秦川的粮食亩产达到 800 斤，总产量达到 115 亿斤。江西省提出，十年规划，五年完成。1958 年的农业产量要有 140 亿斤增加到 175 亿斤。河北省提出，到 1962 实现“农业四十条”的农业产量目标，粮食亩产 500 斤，棉花亩产 100 斤。

在农业大跃进中，由于高指标和反对右倾保守的压力，各地很快出现了严重的虚报产量和浮夸现象。浮夸风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放卫星”。1957 年，全国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出现了小麦亩产千斤的记录，然而，到了 1958 年的夏收时节，全国几乎所有的省份和地区都出现了小麦亩产千斤的记录。

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一场放高产“卫星”的竞赛，各地纷纷发出了夏粮高产的喜报，这些喜讯很快见诸报端。1958 年 1 月 3 日，汕头报出晚稻



亩产3 000斤的消息。入夏之后，各地更是放出了许多离谱的农作物高产“卫星”。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出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5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2 105斤，比去年湖北省房县双河农业社创造的全国小麦亩产最高纪录1 540斤多产565斤。报道还特地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卫星社坐上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 105斤》。消息报道后，仅仅过了4天，6月12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 530斤。随后，各地陆续放出了小麦亩产“卫星”。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 353斤。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 689斤。6月26日，江西省贵溪县早稻亩产2 340斤；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 320斤的记录。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 806斤，随后又报道早稻亩产7 275斤；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 195斤。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 597斤。

高产“卫星”进一步催生出了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并且愈演愈烈，最终形成了农业浮夸的恶性循环。由于这些不实的报道加上有的省和国家部门的领导头脑发热，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决定。广东省宣布春收和早造粮食增产65亿斤，比上年增加60%；6月份，华东区召开第一次农业工作会议，会议预计，华东四省一市小麦比上年增产73.5亿斤，即增长57%；油菜比上年增产317万担，即增长76.2%。主持会议的谭震林认为，华东四省一市当年粮食增产是以70%的速度飞跃前进的，这些省市的粮食总产量1957年共715亿斤，1958年夏季即已达到203亿斤。6月20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水稻生产要加油》的社论，鼓励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社论指出“争取今年油菜、小麦丰收的斗争胜利地结束了；下一个斗争，争取大秋作物，特别是水稻丰收的斗争又来到我们面前了。我们夺得了油菜和小麦丰收的胜利，更要夺得大秋作物特别是水稻丰收的更大胜利。”社论还说“去年，我国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三百五十多斤的时候，小麦的平均单位产量才只有一百一十多斤。水稻的产量比小麦高出两倍以上。今年，小麦赶上来了，它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已经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增长，而是百分之几十的增长了。有些省、更多的专区和县、成千上万的农业社甚至已经以一倍、两倍或更高的速度增长了。小麦等夏收粮食作物的总产量比去

年增长 50% 左右。小麦的产量能够如此迅速地增长，素有高产作物盛誉的水稻为什么不能呢？仅以早稻为例，今年我国共种植早稻一亿六千万亩，如果平均亩产量增加 50%，由去年的亩产三百多斤增加到五百斤，全国就能收获八百亿斤稻谷，约占去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20% 以上。争取水稻产量更迅速地增长，对于争取全年农业大丰收，对于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和作用！”

7 月份，西北、华北、西南等区也相继召开农业协作区会议，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甚至提出 1962 年粮食产量人均突破 3 000 斤。而 1958 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只有 406 斤。7 月 28 日，农业部估计，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加 400 亿斤，翻一番，达到 800 亿斤左右。夏粮产量同比增长 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 40 亿斤。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8 月 22 日，安徽省第一个宣布已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的省；9 月 13 日，河南省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 月 20 日，四川省也宣布是千斤省。从此，中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人民日报》经常报导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 36 000 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 46 000 斤。

当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经常报导虚假新闻，大放农业高产卫星，高产卫星列表。7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宣称：中国小麦（包括春小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苏联）。并且认为“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这是我国全体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贡献。”“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 36 900 斤。社论说：早稻亩产 36 900 斤，花生亩产 1 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显麻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了。这是今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又一件大事。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这又一次生动地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来。这也是新闻舆论中，最早出现“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的口号。随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也成为“大跃进”时期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8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夏粮大丰收说明，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于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文中说，山东省寿张县提5 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1 000斤—2 000斤，根本没人提了，全县都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高产“卫星”一浪高过一浪。进入9月以后，“卫星”就放得更热闹了。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 437斤。9月18日，广西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0 434斤。截止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 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 586斤。11月3日，高产“卫星”的旗帜，湖北省麻城县在《麻城报》上报道出：思想插红旗，跃进再跃进，战胜大灾害，丰收再丰收。宣布全县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粮食总产101 354万斤，比去年增长88.1%；棉花亩产1 023斤，比去年增产259.2%；花生亩产1 000斤，比去年增长233.3%。

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粱、谷子、番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2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元帅”。

一些领导人对农业“大跃进”也持乐观态度，毛泽东接见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时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 000斤，100斤猪肉，20斤油，20斤棉花。再过一段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粮食。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了。”[①]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在视察山东农村的消息。报道中写到，当毛泽东向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李书诚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诚说：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争取4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好，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1958年7月15日，陶铸在《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认为，自然界的蕴藏力是广漠无垠、无穷无尽的。1958年的粮食增产还只是在水稻增产的途程上跨出第一步，只要是需要的话，到1962年前，广东粮食增产目标可以达到亩产粮食3 000斤或者更多一点。一向被认为是低产作物的小麦，1958年尚且出现亩产7 000多斤的纪录，那么，高产作物的水稻，在广东可以一年种三造，达到亩产1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文章据此还认为，对中国的人口增长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②]。

由于浮夸风盛行，“报实受批评，报假受表扬”，弄虚作假、欺上压下的现象习以为常。在安徽凤阳，1958 年实产粮食 1.5 亿斤，上报 4 亿斤。山西太谷的杨家庄大队，1958 年粮食实收了 80 万斤，在上级的压力下，多报到 160 万斤还不行，报到 180 万才通过了。结果上级按虚报的 180 万斤产量下达了征购粮食任务 100 万斤，整个大队要不吃不喝才能完成征购任务。

注释：

①《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人民日报，1958 年版（1）。

②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50 页。



全民大炼钢铁

在不断提高农业指标和浮夸风盛行的情况下，1957 年 7 月，各省上报的粮食估产数量达到 5 000 亿公斤。由于对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并认为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这就使人们产生某种了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从这个错觉出发，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建设首先是钢铁上来，放手发动全党全民大炼钢铁。

早在 1956 年 2 月 16 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主张钢产量每 5 年翻一番，今后就采用这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1956 年 8 月 30 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上说：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1957 年 11 月，毛泽东提出了要在 15 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随后，追求钢铁产量的增长成为经济建设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心中钢铁占有非常重要的特殊地位，他把钢铁作为一个国家工业发达与否的标志，甚至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的标志。正是受到毛泽东的这种“赶超”思想的影响，才催生出“为 1 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目标，继而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57 年末，毛主席提出“大跃进”的想法，大量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随之出台，1958 年钢产量 1 070 万吨钢这个指标即是其中之一。1 070 万吨钢产量的指标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1958 年 2 月 3 日，薄一波在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提出 1958 年的钢产量指标是 624. 8 万吨；这个指标是在对各项生产条件进行综合平衡，并考虑 15 年左右赶上英国而提出的。1958 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部署农业加快发展速度时，也考虑了加快工业发展历史的名词速度问题，他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求到 1962 年时，地方工业产值能够到达何种程度，做一个表并上报。按照各地上报的数字，1958 年的钢产量指标，是 711 万吨；随着“超英赶美”时间的缩短，钢产量指标也就飞快增长。

根据毛泽东在批评反冒进以来提出的又红又专、虚实并举，1958 年 3 月 20 日，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给党中央、毛泽东提交了《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报告。报告认为，我国钢铁工业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路线指引下，只要有具体措施，到 1962 年，钢产量超过 1 500 万吨而争取 2 000 万吨，是可能的。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王鹤寿又提出 1962 年的钢产量可以达到 3 000 万吨。据此，在 1958 年 5 月召开的第 48 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 1958 年的钢产量指标定为 800 万吨到 850 万吨；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根据会议的精神，对各部向中央汇报的“跃进”指标作了研究，并经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后，由李富春向中央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认为“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赶上和超过英国”，估计 1958 年的钢产量可能达到 850 万吨到 900 万吨；《要点》认为，要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关键是 1959 年要较 1958 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工业方面，钢产量要超过 2 000 万吨，争取达到 2 500 万吨，超过日本、英国。6 月 17 日，毛泽东对“二五”计划要点作了指示，称赞“这是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

《要点》提出后，6 月 16 日，李先念向中央作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的要点》的报告，提出“二五”期间财政收入 4 000 亿元，财政支出 4 340 亿元的总计划。在支出计划中，生产性支出安排占到 80% 以上。6 月 17 日，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报



告对1958年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过高的、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1959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可能有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这样经过3年苦战，我国就可以在钢铁及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6月19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搞1 100万吨。6月21日，冶金部党组向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一份《产钢计划》。该计划称，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 000万吨，1962年的生产水平将可能争取达到8 000～9 000万吨以上”。6月22日，毛泽东批阅了农业部6月中旬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二五”期间农业所要达到目标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粮、棉产量在5年中都要翻一番。这些高指标的设想和提出，成为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作出“跃进”决策的重要基础。

1958年8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时说：“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十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1 100万吨。”内部是决定1 100万吨，对外宣布是1 070万吨，即以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

1958年的钢量就这样由624.8万吨、711万吨、850万吨、900万吨、1 000万吨到1 070万吨。这个指标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大跃进年代“跃进”的时代特征。

为了推动“大跃进”的开展，毛泽东的赶超英美的时间表也一步步提前。1958年6月21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3年基本上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次日，在《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批示说“超过英国一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了2 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大跃进运动由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高速度开始而拉开了帷幕。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确定要把钢铁作为全党的第一位大事来抓，提出了以8 000万吨钢为纲的第一本账方案和以1亿吨钢为纲的第二本账方案。这两个方案的钢产量，分别比1957年的实际数增加13.9倍和17.7倍。其他指标也大幅度提高。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对全国“以钢为纲”的“大跃进”风潮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要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并且提出了“全力保证实现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可是，直到北戴河会议结束的8月底，全国的钢产量只完成了450万吨，还差620万吨，一个季度要完成北戴河会议制定的这个目标，从当时钢铁工业生产能力和交通运输、采矿、能源等生产能力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就只有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为了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高指标，中央先后4次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和催促大办钢铁。全国各地采取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例 如：（1）各地区、各部门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凡与大炼钢铁在设备、材料、能源、人力等方面发生矛盾的其他工业部门，一律“停车”，为“钢元帅升帐”让路，保证钢铁生产的需要。（2）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法炼钢。除了原有大中型钢铁企业发动群众突击炼钢炼铁以外，全国动员大批群众采取土法炼铁、炼钢。到1968年9月，全国有5 000万人直接从事冶炼工作，建立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小 高炉、土高炉60万座。到12月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9 000万。同时，尚有2 000万人从事找矿、挖煤、交通运输、后勤保障等工作。（3）对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追加投资，扩大基本建设规模。

中共中央肯定了各地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做法。8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达百万人。最高峰时达到9 000万人。工人、农民、商店职工、学校师生、机关干部，纷纷上阵。在大炼钢铁高潮中，全国上下共建各种小洋炉、小土炉上百万座，广大群众纷纷参与土法炼钢，各个部门也“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在农村，农民在田野间垒起了小土炉，就炼起钢来了。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炼钢铁的工人，没焦炭只好用煤，没煤只好砍树、拆房，用木料替代；没有铁矿石，铁锅、铁锁、铁钉……凡沾铁星的物品，甚至关帝庙内的百斤关公大刀也成了炼铁原料…农户家中触目可及的铁块都被动员起来统统送入了熔炉。一位英国记者在描述当时农村大炼钢铁的情形时写道：我们穿过稻田来到另一个村子，这里已经赶建了四座巨大的土高炉，到处人声鼎沸，一派忙乱的景象。有的人在搬运一筐筐矿石；有的驱赶着牛车；有的倾倒装有炽热溶液的大锅；有的站在摇摇晃晃的梯子上观察着炉子；还有的用手推车装运冶炼过的料渣———虽然这些东西是从高炉底部倾泻出来的，但



是在我看来这跟从炉口倒进去的原料没有什么两样。在学校，学生们放下手中的书本，投入到了这场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在 1958 年秋后，几乎所有的大学、所有的中学和相当一部分小学都停课炼钢了。他们在操场上修起了各种各样土高炉，然后四处弄铁矿石和焦炭，他们挨家挨户收集废的或不废的铁器，然后拉着木制的风箱将废钢铁溶化，然后把溶化了的铁水浇铸成形。甚至为了赶进度，把食堂里的饭桌统统搬到室外，让位于钢炉。一个可容纳 1 000 多人吃饭的食堂里，一夜之间修建出 30 多座钢炉。工厂、机关、街道，到处是红红火火大炼钢铁的场景。“大炼钢铁”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主题。到了 10 月份，钢的日产量高达 10 万吨、铁的日产量高达 37 万吨。

当时所谓的“炼钢炉”，就是用砖砌起来，里面糊着焦炭粉和黄泥土，再加个鼓风机或是烧火做饭的风箱就算大功告成了。因为炼铁炉体积较小，有的高不过 2.5 米，直径不过 2.7 米，在三立方米以下，所以称为小高炉。在“先土后洋、土洋结合、大搞土法炼铁”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小高炉。薛暮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1959 年他做过统计，大跃进“一股风建成了 200 万个土高炉”。这样的小高炉炼出来的多是废铁疙瘩。

经过几千万人 4 个月的日夜苦战，1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宣布：1 070 万吨钢的指标已经完成。1958 年 12 月 22 日的《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1 070 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到 1958 年底，国家冶金工业部宣布达到了产钢量 1 108 万吨，据史料记载：兴师动众用土法炼成的钢铁，几乎都是多种金属渗入的混合物，根本无法进行再加工，利用率不到 40%。虽然钢铁生产指标完成了，但是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不尊重科学，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哄而起，盲目冒进，片面追求数量却忽视钢铁质量，不仅严重削弱了农业，造成了农业丰产而不丰收，还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据统计，1958 年全国用于钢铁行业的劳动力最高时超过一亿。

1960 年冬，党中央因“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形成脱离中国实情的高指标，通过纠正“左”倾错误，停止了“大跃进”运动，并对大炼钢铁给予了“没有炼成钢铁，但炼成了人才”的结论。“大跃进”中，农业“高产卫星”多是在农村，大炼钢铁则是影响了全国城乡，所以很多人一提“大跃进”就想到“大炼钢铁”。

教育方针和教育大跃进

1958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社论宣称："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此后，中国开始了一场以"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教育方针的"教育大跃进"。

早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曾对河南的全面跃进形势、包括教育跃进形势大加称赞。3 月 18 日印发了《河南省委吴芝圃同志在电话上谈的几点意见》其中说："全省已经有十几个县普及了高小和初中教育有二十个县扫除了文盲所谓教育和劳动结合就是边生产边教书边生产边读书教学质量很好一般地说比官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好教师很负责学生很用功如何扫除文盲办法是千人教万人学包教包学教学与生产结合造成识字的环境造成学文化的空气这样只要五十天到八十天的时间就可以在一个合作社里扫除文盲扫除文盲的标准是能识字一千五百个能写二百字的文章采取这样的办法扫除文盲效果很显著做到了多快好省。"①

面对教育事业的"跃进"形势，教育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新形势下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1958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8 日，教育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和部分中小学民办学校代表等 119 人出席了会议。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董纯才出席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的议题是"反掉右倾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代表们讨论了教育跃进中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会议提出，教育工作既要普及又要提高，要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会议还交流了各地教育事业大跃进的经验，并讨论了教育部起草的《国民教育纲要（草案）》。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了实现文化革命教育工作，必须完成五大任务：（一）大力开展识字运动，扫除青壮年文盲，积极发展工农业余中小学；（二）大力普及小



学教育，使新生一代受到国民基础教育；（三）大力举办农业中学、工业中学和手工业中学，把高小毕业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又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劳动者，同时要发展普通中学，提高教育质量，以适应培养专门建设人才和提高国家文化科学水平的需要；（四）积极发展和改进各级师范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教师队伍。同时要改造提高现有的教师；（五）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二、教育工作既要普及又要提高，学会用两条腿走路。首先要大力做好普及，在普及之后紧跟着就要巩固、提高。

三、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是体现教育方针的一项根本措施，它应该服务于教育目的。生产劳动必须列入教学计划。

四、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把学生教育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是学校基本任务之一。

五、教育事业的“大跃进”，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指的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办学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作普及工作；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坚持自觉自愿；采用多样办法，因时、因地、因人制宜。[②]

此外，会议还交流了各地“大跃进”、“大改革”的经验，这次会议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促进了全国教育的“跃进”发展。随后，1958年4月，张际春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展开人民教育大跃进、人民教师红专大跃进》的文章，为全国教育事业“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继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后，4月15日至24日和6月10日至28日，中共中央分两阶段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教育工作的书记、文教部长共100多人出席了会议。4月、6月，中共中央分两段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建国以来的教育工作，讨论教育方针和教育改革等问题。会议确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一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并提出教育事业发展措施。

4月15日至24日，会议的第一阶段讨论了教育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4月15日陆定一发表讲话，主要阐述了：

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要建立和巩固党在教育工作中的领导权，主张党委领导，党委对教育事业要又红又专，要学会领导教育，学会管理教育事业，教育管理权限要下放；主张放手发动群众。等等。同时他还提出了六条办教育的意见。

6月10日至28日，会议的第二阶段继续讨论下放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问题，并且研究了高校招生分配及中小学学制课程等问题。会上传达了刘少奇6月8日、6月20日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陆定一作了报告，其主要内容是：

一、我们的教育，解放前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现在它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的大、中、小学都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二、我们要用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生产观点）、唯物观点和辩证观点、集体观点教育学生。

三、全日制、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都是正规制度。

四、乡村普及小学，大城市普及初中，初中毕业后进工厂半工半读。实现这样要求，教育可以大大跃进，大大超过计划。

五、过去教育分为三段：1949年—1953年，比较好，学习苏联结合中国，并以此与资产阶级作斗争；1954、1955年，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很严重，搬苏联的；1956年，搬资产阶级教条。过去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严重的，在一个时期内有方针性的错误，如劳动教育等。

六、政治教育很重要。

七、要研究体制问题。

这次会议的结论，由陆定一写成《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并经8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概括了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现状及任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反对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指示在回顾了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成绩与不足之后提出了我国发展教育的方针。《指示》将教育方针明确表述为：“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指示》同时还提出了我国教育事业“大跃进”的目标是：“全国应在3年到5年时间内，基本上



完成扫除文盲、普及中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应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的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③]由此展开了全国范围的“教育大跃进”。

“教育大跃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群众积极参与办学，各地大办学校。

在高等学校方面。为加快高等学校的发展，一些领导人在讲话中进行了鼓励和推动。1958年4月，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起先每个省办几个高等学校，以后每个专区都办几个高等学校，再以后，每个县、每个乡，凡是有条件的都办起来。办高等学校没有什么神秘，不要害怕”。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8小时的劳动制度，一种是4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鼓励。1958年8月，高等院校已从1957年的227所增加到1 065所。到了当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23 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如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就是把原来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以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为例，这个大学有工业系、农业系、科学技术研究系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校舍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都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的成分好、觉悟高的青年，“教授”是“土洋结合”。“土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所谓的“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土教授有讲不出来的时候，就由洋教授讲，土教授在旁边操作。这个大学据报道还很有成绩：工业系的不少人学会了开拖拉机，文艺系的编了很多快板、相声和戏剧。最为显赫的是科学技术研究系，搞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嫁接，比如槐草嫁接在稻子上、红芋嫁接在南瓜上、蓖麻嫁接在芝麻上……农村的“土大学”如此，城里的“洋大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9月的一天，北京

大学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从8月4日开始算起，40天之内，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3 400多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100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1958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95部，其中有几部是10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的要数武汉大学物理系，他们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教育大跃进高潮"坚持了不久便退去。当时，苏联、捷克等国家纷纷向中国提出质疑，要求北京大学等提交那些已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校方清查过后，无数泡沫湮灭。在农村，无数工农学生坚持不下去而逃走，无数大学办不下去而解散。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左右的水平。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我国从1958年春开始贯彻落实勤工俭学和开办农业中学两项措施，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大量涌现，成为"教育大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4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民办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江苏省委的报告总结了他们办农业中学的经验，认为这种办学方式对地方发展很有助益。中央的批示说，普遍发展民办农业中学，对于满足广大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的强烈要求和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有重大的作用。这是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批示要求凡是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都应大力发展民办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教育部在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提出了大力举办农业中学的任务。对农业中学的性质，1958年5月，刘少奇认为："农业中学就是半工半读学校"，8月，陆定一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进一步完整地指出"农业中学是一种民办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技术）学校。"在"大办"的口号声中，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了兴办农业中学的热潮。农、职业中学从1957年的没有一所，一下子发展到1958年的两万多所，学生达到200万人。例如，福建省在"苦战三十天普及初中小学教育"的号召下，全省新办的民办小学有13 329所，学生达525 113人，加上原有学校的学生，全省已有小学生200万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92.54%。新办民办农业中学2 317所，学生达85 287人，占全省应入学的历届高小毕业生数的115.5%。实现了乡乡有



一所到几所中学[4]。

在扫盲教育方面。随着“大跃进”的发展，掀了起全民扫盲运动的热潮。1958 年 2 至 3 月，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等单位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大会。会议发出五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河南、山东等省提出了“一年变成文化省”，一些省提出“今年内扫除文盲”等口号。5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用革命的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成为全国扫盲“大跃进”的纲领性的文章。文中提出：“从今年起每年要扫掉 3 000 万到 4000 万文盲，比往年的速度加快十倍才行。”这样，高速度、高指标、浮夸风在教育领域蔓延起来。各地扫盲教育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争放“卫星”，纷纷争做无盲厂、无盲县、无盲省。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1958 年 7 月底，已有 639 年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 28. 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已有 4 100 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有 1. 12 亿人坚持扫盲学习[5]。到了这年的 8 月，数字又大大上升。根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从 1 月到 8 月，我国扫除了近 90 000 万文盲，在全国 2 257 个县、市中，已有 1 516 个即 67. 2% 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到 10 月中旬，数字达到了最顶峰。全国已有 1 799 个县市单位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占全国 2257 个县市单位总和的 79. 7%。全国已有 17 个基本无盲省。1958 年 1 月到 9 月共扫除青壮年文盲 1 亿人[6]。

在“教育大跃进”中，还出现了以改革学制、教材、教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的热潮。由于这些改革缺乏连贯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导致教学的正规化受到极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为了改造知识分子，中共中央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号召下，全国广大师生掀起“教劳结合”热潮，都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大、中、小学劳动时间急剧增多。从 1957 年到 1958 年，全国大中学校师生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展勤工俭学，同时要求学校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大炼钢铁。

“教育大跃进”作为“大跃进”的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带有浓厚的“左”倾色彩。虽然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它科学精神不足，依靠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它的结果与初衷相违背，断送了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方针的理性探讨。正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教育方针的歧义性和不稳定性，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教育指导思想埋下了伏笔，给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重

大挫折。

注释：

①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38 页。

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19～220 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98 页。

④《群众办学，干劲冲天》，人民日报，1958：5（12）。

⑤《我们的文化面貌正在飞跃变化》，光明日报，1958：8（7）。

⑥《全民办学，满园花开》，人民日报，1958：11（12）。



文艺“大跃进”

1958年，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全面启动之后，文艺战线上的“大跃进”也就迫在眉睫了。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文艺发展的“高潮”。

1958年2月25日，上海市委举行文艺干部大会。会上，市委书记、市长柯庆施在讲话中说：“上海文艺队伍力量大，人才集中，新人纷纷出现，物质条件也比过去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大跃进呢？为什么不能百花齐放？我们要下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群众中去落户，改造自己。”“要文艺界大跃进，要百花竞放，繁荣创作，就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干；一个人不行，大家来干。不但要有干劲，还要有股牛劲，坚决和困难作斗争。”[①]

柯庆施作完报告的当天下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界如何跃进的问题。上海分会原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 000件，这个指标显然已经落后了，经过讨论改为3 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此时也增加为235部。作家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跃进规划。一位著名作家表示，两年内准备写中、短篇小说集、散文特写集各一部，谈自己创作的文章十万字以上，同时编辑、整理和修改自己的文集九卷，年内译完高尔基的《文学回忆录》。

1958年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 000个以上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会上，作协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作家做到：在修正补充原定计划的时候，要注意到：学习新的技巧，充实写作本领，使我们的思想跃进，本领也跃进。没写过诗的，试试看；诗能更快地反映当前现实。没写过歌词的，试试看；全国到处都迫切需要配合跃进的新歌，大家都唱起来，干劲就更大。写评论的试试创作，创作的也试试评论。同样地，试试相声、鼓词，以至各种戏曲。要叫我们的计划凑在一起就是文学百货供应总站，要什么有

什么，而且具有新的风格，和有普及而提高的特色。真乃是百花齐放，大胆创造。这对人民和我们自己都大有好处。

与此同时，作协上海分会向各地分会发出竞赛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出了上海分会两年内要完成的创作指标：

一、创作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 4 000 篇。其中，长中篇小说 50 部，多幕剧本 50 部，电影剧本 30 部，长诗、诗集 40 部，短篇小说集 40 部，散文特写集 40 部，儿童文学 50 部。

二、两年中创作歌词 3 000 首。

三、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 12 部，讨论文学问题、评论作家和作品集 12 部，编辑中国文学批评选辑六种，选编现代文学思想斗争史 10 辑、现代革命文学选辑 20 辑，出版文学理论丛刊 8 辑。

文化部也作出了关于促进影片生产“大跃进”的决定，要求：各电影制片厂必须继续鼓舞群众对大跃进的热情，在电影工作中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总方针，大力完成并超过各自的生产计划。为了实现电影大跃进，文化部电影局提出在摄制影片、放映发行、机械生产等方面，都要鼓足干劲大跃进，实现“奋斗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并提出了具体的跃进指标。

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各专门小组从 1958 年 3 月 3 日起就分别召开关于大跃进的会议，讨论如何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献力的问题。该协会于 3 月 22 日向各地美协分会及全国美术家提出了“凡协会会员（欢迎非会员美术家参加）都订出 1958 年创作跃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注意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反对粗制滥造”等 5 项倡议，号召广大美术工作者行动起来，投身于“大跃进”运动之中。

在“全民办文艺”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新民歌运动。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在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中，涌现了一批歌颂“农业发展纲要”，歌颂农村水利建设和合作化运动后新貌的民歌。1958 年 3 月 22 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他说：“印一些诗，净是些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各个阶层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

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收集和创作“新民歌”的号召，同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文联、作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发出了“采风大军总动员”。在



5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又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提出："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或文学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现在群众文艺创作如何发展，我们的国家简直说得上是一个诗国。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欣赏。这样的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因此，要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收集民歌，就非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不可了。"全国各地也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各地报刊纷纷开辟民歌专栏。一位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描绘了"大跃进"时期的"盛景"："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于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数计。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

在 1958 年"新壁画运动"中，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在"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会议"上，河北省昌黎县后钱庄中心俱乐部主任高学谦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据介绍：他们在"生产大跃进，文化紧紧跟，壁画打头阵，歌唱做先锋"的口号下，仅用了 3 天工夫，就创作了 164 幅壁画，出现了"墙壁粉刷白，诗画满墙山，户户六面光，村村大改观"的局面。中共昌黎县委宣传部长黄德玉在发言中说："该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在 3 月 18 日开始，7 天突击，3 天扫尾，到 3 月 30 日共计 12 天的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 6 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美术》杂志 1958 年第 9 期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报道了江苏邳县的群众美术活动的情况。文章说："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目前，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八一前统计：全县即有 1 800 个农村美术组，6 000 多个美术骨干，7 月份完成壁画 23 300 幅，宣传张贴画 15 000 幅，达到村村有壁画 10 幅以上，队队有壁画 5 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8 月 3 日县委在官湖召开了现场会议，又来了一个大跃进，至 8 月 15 日，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 15 000 人，完成壁画 105 000

幅，宣传张贴画 78 000 幅，达到 50% 的村社户户有壁画 1-5 幅。”“编者按”称赞道：“邳县的农民壁画运动是群众美术活动中的一颗‘卫星’。”“这是党的总路线的伟大作用在美术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我国革命美术事业向共产主义跃进的一个新形势，它的重大意义在我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至此，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三面红旗”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飘扬。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专门讲到了科学、文化事业如何飞速发展的问题。他说：“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同时他还提出，要“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的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②]

会上，时任上海党政一把手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 15 年后的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不但有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而且工农兵自己也能更普遍、更高明地动手创造文学艺术，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人们不但可以经常看到电影，而且可以从电视里学科学、学先进经验，同先进人物会见，看到整个地球以至整个宇宙许许多多的新东西。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大跃进”的背景下，文艺家也坐不住了。他们在“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要求下，被迫制定自己的“跃进计划”，开始放“文艺卫星”。在北京，仅以美术界为例：当时参加跃进计划的 39 名漫画家决定当年要创作 5 800 幅作品（包括漫画插图），绘画组 54 位画家计划创作 6 000 幅作品，雕塑组的 96 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作品 1 507 件，版画组的 30 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 2 112 幅，



中国画组的39位画家所定的创作指标是5 812幅，书签、扇面、贺年片还不包括在内，另外还要完成8本书稿和16万字的文章。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7月中旬提出了“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大者为300平方米）、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 350张。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全体教师在两天半的时间内绘制了14幅国画形式的跃进规划纲要（草案）说明图和3幅大油画。北京中国画院的23位画家苦战5昼夜，完成了1丈2尺的大画5张（其中的两张山水画描绘的是40万劳动大军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场面和十三陵水库的远景）、中小幅23张。人民美术出版社苦战3天，创作出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的6张大壁画，编出脚本18本，宣传总路线的题材增加289种，宣传画的发行由1万跃到100多万。

1958年8月至10月，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

同年9月，中宣部根据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 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据此要求，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很多地方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

一时间涌现出许多的农民、工人作家、诗人，上海自称拥有70万人的文艺大军，成立了200个工人业余创作小组和1 000个农民创作组。清华作为一所以理工为主的高等学校，此时成了著名的群众文艺创作的典型。全校1万名学生，创作了5 000多首诗，3 000余首歌曲，1 500个剧本，2 000篇小说、散文、特写、曲艺，3 000多幅漫画，办了700多种系和班级的油印刊物，“许多班做到了人人是诗人”。

不可否认，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对于普及文艺知识、使人民

群众零距离地触摸和感受文艺，活跃和发展农村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当时带着严重的“浮夸风”色彩的“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这种一哄而上的突击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行政命令式的发展文艺的方法，是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首先，从艺术价值上看，文艺“大跃进”所产生的文艺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其次，“大跃进”时期文艺表面的繁荣，并不代表文艺的真正进步和发展，只能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同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由于文艺“大跃进”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文艺家、诗人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了。1959 年 3 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再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和随后到来的全国严重的粮食饥荒，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的锐减，文艺“大跃进”逐渐偃旗息鼓。

注释：

①《文汇报》，1958 年 2 月 26 日。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第 304 ~305 页。



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论战

“资产阶级法权”，又称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这个说法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用以解说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之间相交换的平等权利。马克思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在此基础上，每个人的劳动都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在消费品分配方式上，劳动者从社会总产品中，获得在劳动量上与他所给予社会的一样多的产品，当然是在扣除了公共基金等等之后；因此，在消费品分配领域，仍然是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的，而这个原则，与商品交换的原则是一致的，这也就是平等的权利；因此，此时的平等权利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此时的平等，是形式上的，因为此时的权利仅仅把劳动者当作劳动者，仅仅从劳动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实际上劳动者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不光每个人之间有区别，而且每个不同的人之间还代表着不同的家庭组成，等等；所以，分配的权利应该是不平等的，但是，那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实现。马克思没有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混为一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发挥了马克思上述思想，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是一种残余的阶级关系，还需要国家来“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对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始终心存疑虑，他担心按劳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差别，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产生资本主义。因此，他多次提出旨在限制按劳分配的破除“资产阶级权利”问题。

从 1958 年上半年起，毛泽东在不同的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改变现在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一开始，他主要是讲改变上级和下级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打掉官气”。从 1958 年 8 月下旬北戴河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他把这个问题同现行的分配制度（工资制）联系在一起讲，并把它们纳入"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范畴之中。毛泽东曾列举过"资产阶级权利"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除了列举薪金制、工资等级制、计件工资等属于分配关系的以外，还列举了许多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权利"，例如，三风五气（三风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指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干部特殊化、军衔制，等等。他认为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这就是说，凡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领域中存在的一切不平等、不合理现象，几乎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权利"。他也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

柯庆施把毛泽东的见解转告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随后于1958年9月16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上，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文章将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必要制度和做法，都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提出要对此予以彻底破除。其主要观点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他认为在战争年代中我们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受到资产阶级法权的冲击；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的作用是钱能通神，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这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张春桥的文章，改变了马克思、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本来含义，文章发表后在当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然而，这篇文章引起了正在探索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毛泽东的注意，他批示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指示该报转载。然而，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并致信毛泽东，请他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话是否说得活一些。毛泽东在10月11日的回信里说："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①]根据毛泽东的要求，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并加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并亲自加了一段按语：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

 

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于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②]

张春桥的文章发表之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讨论。人们围绕着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核心内容、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性质及其表现、资产阶级法权与按劳分配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

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肯定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的作用为标志，这场讨论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58 年 10 月至 11 月。以《人民日报》为代表，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建国以后应采取供给制还是工资制。这是讨论中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针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建国以后应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将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物质财富还不是极其丰富，人们还缺乏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形式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能从绝对平均主义出发把工资制诋毁为等级制。[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将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一种倒退，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退让和妥协。这种退让和妥协将会压抑革命队伍中共产主义精神的发扬，在某种程度上助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应该不断地扩大供给制的范围，逐步替代工资制。[④]此外，还有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以人民公社实行的部分供给和部分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为例，认为工资部分是以劳动作为分配的尺度，即按劳取酬；供给部分是以需要作为分配的尺度，属于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范畴。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可以削弱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⑤]

2. 建国以后是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讨论中，人们普遍认为既要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残存着资产阶级法权，但也要创造条件使这种残余消失。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定情况下，利用某些资产阶级法权，正是为了创造条件逐步削弱资产阶级法权，以至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将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消灭。[⑥]

3. 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问题。讨论的过程中，大多数人认为我国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⑦]。还有人进一步分析指出按劳

分配具有两重性，它既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又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既要肯定按劳取酬具有革命性，又要认识到它实际上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原则。[8]因为按劳取酬所依据的原则还是“等价交换”的“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不平等。

在第一阶段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较为极端的观点。例如，一些人贬低或否定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主张以供给制取代工资制，以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应该取消商品货币；一些人抵制或否认物质利益原则，片面地强调政治挂帅，夸大政治挂帅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9]；还有一些人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响已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尤其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他们认为在领导与群众、企业中技术人员与工人、医院里专家与普通医生、军队里的官与兵等关系上，无一例外都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且简单地认为只要将上下级关系、高中低级职称颠倒互换，就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10]；还有一些人片面地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他们认为只要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做文章，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就能使社会主义快速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对于这场讨论，毛泽东是十分关注的。他详细地阅读了讨论中的一些文章，并且还对个别文章作了批注。毛泽东认为，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个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因而，他一度主张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使毛泽东认识到我国还不能搞“供给制”，还没有条件取消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面前，毛泽东不得不面对现实，因而对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即由最初的“全面破除”改变为“逐步破除”和“加以限制”。12 月 6 日，在武昌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到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以张春桥的文章为例，说：《人民日报》在讨论张春桥的文章时，他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将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讨论越来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11]这是对张春桥文章引起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的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总结。

在 1958 年 11 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不再笼统地讲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他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



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在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把资产阶级法权分为“有用”和“无用”两种。他认为对“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入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32]

毛泽东在阐释资产阶级法权上的思想变化，直接影响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第二阶段的讨论从1958年11月中下旬到1959年4月中旬。这一时期的讨论改变了前一阶段对按劳分配的否定，分析了按劳分配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并且肯定了按劳分配在当时的积极作用。这一阶段的讨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按劳分配进行阐述：

1. 明确了按劳分配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我国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以后，已经实现了消灭阶级的平等，按劳取酬的不平等，没有阶级利益对抗的性质，不是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具有资产阶级性。因此，按劳取酬不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而是劳动人民的法权，是被提升为法律的劳动人民的意志，是通过国家法律体现出来的劳动人民的利益。

2. 肯定了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按劳分配反映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利用它的积极方面来为社会主义谋福利，同时借助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来限制它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否定方面发生作用的范围。衡量分配方式的合理与否，最根本的尺度是要看它是否有益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按劳取酬仍然是目前整个社会分配产品的主要尺度，如果不根据生产力发展、产品丰富的具体状况，不根据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具体状况，逐步削弱它的作用，而企图马上削弱，甚至立即抛弃这个原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3. 指出了供给制对现实生活的消极影响。供给制包得太多，不但因生产水平有限，事实上办不到，也脱离了人们的思想水平。现在还存在着货币和商品流通，包死了既不利于促进生产，也不利于商品流转；同时也极易陷

人平均主义，陷入生产突击、报酬平等的泥坑。不能否认工人中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但不能把萌芽的东西看成森林，不能完全否认物质利益的作用，资产阶级法权不同于封建等级制度。

1959 年 2 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人民公社工作中的“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等错误，认为它们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了价值法则，否定了等价交换。他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⑬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解成为其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对“大跃进”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起了加速的作用。同时也为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供理论依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由于对党的作风出现新问题的担心、党内高层对包产到户的不同认识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分歧争论等多方面的因素，促使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此后，他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忧虑、限制、破除，逐渐演化、发展为如何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这种观念继续发展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认识，实际上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不经过在实践中探索和曲折难以认识的问题。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要实现公平、正义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不能绕开市场经济这个阶段，也不能采取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做法。

注释：

①陈晋：《毛泽东 50 年代后期的探索思路和他读几本书的情形（上）》，《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科 7 页。

③《工资制在解放后势在必行》，《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7 日。

④《供给制改工资制是一种倒退》，《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8 日；《改工资是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27 日。

⑤《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试论部分供给制和部分工



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22 日。

⑥《从供给制说起》,《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13 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试论部分供给制和部分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22 日。

⑦《谈谈消除资产阶级法权》,《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8 日。

⑧《从供给制说起》,《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13 日。

⑨《用共产主义观点看分配制度》,《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3 日。

⑩《打开资产阶级法权的防空洞》,《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30 日;《冲破医学科学跃进的障碍——等级制》,《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5 日;《部队干部当兵的革命意义》,《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8 日;《大破“权威”和“等级制”》,《人民日报》1958 年 11 月 10 日。

⑪陈晋:《毛泽东 50 年代后期的探索思路和他读几本书的情形》(《党的文献》1993 年第 4 期)。

⑫《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49 页。

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 页。

参考文献:

“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转自 国公网 www.21Gwy.com】

对“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批判

1958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开始掀起了一场“大跃进”浪潮。在全国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大跃进”的同时，毛泽东也设想促进军队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发展相适应。在这种背景下，1958年5月至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是从1956年反对教条主义演变而来的。

1956年是国内、国际风起云涌的一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借鉴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提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在工作中反对和克服存在的教条主义、机械搬运的倾向。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①此后，中共中央接连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特别是克服用教条主义对待和学习苏联经验。在8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和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学习苏联经验和反对克服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的问题上，作了明确的指示。

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开展了检查纠正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工作。1956年9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发言。发言中，他肯定了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军队在学习苏联军队中存在的一些不恰当的训练方法和工作方法。1957年2月，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彭德怀在学院讲话，并向中央和军委作了《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



中说："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首先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军事学术，并进行了传授，虽然不是介绍和学习了全部，但是一般的内容都已经学习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其次是，正由于对苏联军事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为整理我军的经验，编写我军的条令、教范，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再次是建立起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学院，并为海、空、炮、装等兵种分别成立学院准备了基础，这是该院全体同志艰苦经营缔造的结果。最后就是为部队、机关、学校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合成军队和技术兵种的作战指挥、组织训练、战术和技术，都具备了一定的知识。这些成绩是显著的。"报告接着说："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设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教材和作业设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报告在肯定学院成绩时，并没有明确指出成绩是主要的，只是说"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在批评学院缺点时，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国防部的这个报告，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同时，国防部的这个报告，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

刘伯承是在建国后人民解放军进入新阶段，从军队大局出发，于1950年向中央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职务，自告奋勇去创办陆军大学（后命名为军事学院）的。数年后使军事学院成为培养军队中高级领导骨干的重要基地，成绩斐然。他在1954年至1958年春兼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期间（中后期由叶剑英代理），贯彻和执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向苏联军队学习”、“把苏军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指示，组织领导部队军事训练，起了重大作用。军队在向苏军学习中，也发生有某些机械搬用和同自己以往优良传统结合不够的缺点。此时，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国防部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军经验的估计，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是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

5月16日，彭德怀主持第109次军委会议，讨论总高级步校党委进一步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时说，中国军事的教条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从袁世凯建立新军以来，中国的军事学就开始衰退了。袁的新军是抄袭日本的东西，北伐时代是抄袭苏联的东西，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又去抄袭德、意、日、美、英的东西。中国的红军建立后，旧军队的制度和习气被农民游击队打得粉碎，逐渐创建了人民军队自己的一套。可是有人对这一套缺乏信心，有自卑感，认为自己的东西土里土气，不叫科学。当然对苏联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好东西。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当时确定的会议重点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军队工作的领导。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听说在1958年3月至5月召开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他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

 

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他认定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副部长李达是搞教条主义的，并“反对反教条主义”，而另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便报告毛泽东，并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原训练总监部部长刘伯承作检查。

人民解放军总部和军事学院在检查和克服工作中的偏差方面作了许多有效的努力，但人们对缺点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上有分歧。刘伯承指出：“我们今天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个思想方法问题，不是走到方针路线上去。”叶剑英不赞成有的人关于“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指出：“全军包括院校都有教条成分，当然也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萧克认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和“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两个口号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先后提出来的，内容精神一致，不应将他们对立起来；也不赞成对学习苏军的成绩估计不足和对缺点错误估计过分。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对军队工作中所谓“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展开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会前在5月24日召开了小型会议。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彭德怀宣布会议的内容一是整风、二是整编，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个问题：一是建军原则，二是建军方针，三是战略方针问题。这次会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这三个问题搞一致。在讲话中点了萧克的名。

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提出：军委工作的重大问题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军委的经常工作是在彭老总的主持下进行的，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领导下更好地团结起来。林彪的讲话摆出了支持彭德怀的姿态，暗示有的人不能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接着贺龙、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元帅也发表了讲话。会议的主旋律“一是揭发，二是批判，三是检讨”。

此后，继续举行小型会议。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

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得不明显，吃了亏。6 月 1 日，彭德怀批评萧克说："朱可夫事件、匈牙利军队未经战斗就瓦解的教训，你都不吸收，我军的历史教训你也不吸收，就是看到了正规化。你不同意我批判正规化口号的提法，写信给我，说只是执行中的问题，我不能同意。就是执行中的问题，也得要批判。"彭德怀还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给萧克等人扣上"军事教条主义"和"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从 6 月 7 日起转成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及一些军、师的负责人共计 1 400 多人。大鸣大放的会议方式，不断加强了斗争的气氛。

6 月 21 日、23 日、29 日，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朱德、林彪、邓小平、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萧克也在会上做了检讨。彭德怀作了大会总结。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由原来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纠正缺点的努力，变成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条军事路线斗争"。毛泽东提出了"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会议以"四大"的方式进行了所谓揭发批判。7 月 10 日，刘伯承带病由人扶上中南海怀仁堂讲台，作了检查发言。萧克、李达和刘伯承一样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叶剑英也受到牵连。

7 月 22 日，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决议指出："训练总监部和一些院校，教条主义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且个别同志，还坚持了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现在我军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我军历史上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这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着我军 30 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军事路线在某些范围的复活"，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决议还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展开"。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这份决议表示暂不对萧克作出结论，待大会闭幕后，在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做进一步的彻底揭发检查后再作定论。

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8 日至 11 日，举行了训练总监部 200 余人出席的部党委扩大会议，采用"四大"方式，对所谓"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



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进一步揭发批判。给萧克、李达作了所谓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公开抗拒中央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的正确路线开展猖狂进攻”的结论。

与此同时，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也举行了两院党委联席扩大会议，对刘伯承、陈伯钧、宋时轮等也进行了继续揭发批判。会议给刘伯承和南京军事学院作出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的结论。说这条错误路线“在较长时间内和中央军委正确路线相对抗，是我军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反映。这条错误路线统治学院数年之久，在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中表现最为严重，其影响遍及全军，其发生发展过程是由盲目到自觉，由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发展到路线错误”。

经过这场斗争，组织上也作了变动。刘伯承被免掉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叶剑英被解除了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的领导工作，调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曾兼任过一段时间的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和第一书记）。粟裕被免掉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萧克、李达被免掉国防部副部长职务，训练总监部撤销，所任职务也自行免除，萧克调出军队，任国家农林部副部长，李达也被调出军队，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还有一些干部因这件事受牵连，被处分或处理。

这场斗争是不正确的，给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它错误地批判了正规化、现代化，使军队在很长时间里模糊了完整明确的建军目标。它打击了一批多年热心和致力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化建设的干部，挫伤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它树立了一个开展所谓“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样板。由此为开端，军队内部的所谓“路线斗争”接连不断，使军队一再地大伤元气。徐向前对这起运动的评价是：“这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错误的，不仅伤害了刘伯承等同志，而且严重干扰了起步不久的我军现代化建设。”聂荣臻也说：“反教条主义，把这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身为当年反教条主义的当事人钟期光将军晚年的回忆中把这场运动的弊端总结为这样几点：第一，把上面的问题搞成了下面的问题；第二，把学术学风问题搞成了政治问题；第三，把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搞成了建军路线问题；第四，把工作问题搞成了党内斗争问题；第五，把国际、党际关系调整问题，搞成了国内、党内的人事问题；第六，以保守反进步，以愚昧反科学；第七，以土教条反洋教条；第八，以主观主义反对所谓主观主义；第九，自相矛盾的必然的逻辑错误；第十，对刘伯承元帅创办军事学院

的功过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

1980 年，邓小平指出：1958 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1986 年 10 月刘伯承逝世。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说：“刘伯承同志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胸怀坦荡，顾全大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1958 年，在对建军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刘伯承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仍严格自责。1980 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②]随着中共中央关于“1958 年的反教条主义是错误”宣告，中央军委纪委于 1987 年的第 15 号通报中给那些在反教条主义中受害的干部予以昭雪。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1 页。

②《人民日报》1986 年 10 月 17 日。



对《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 938 035人，并且预计每年要增加1 200万人到1 300万人，增长率为20‰。这些数据表明，由于我国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此时，中国人口早已不是新中国刚成立时期的四万万五，而是发展为惊人的六亿，我国开始进入了一个人口迅速膨胀的时期。

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这个规模仍然迅速增长的形势，如何认识中国的人口问题，如何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就成为中国发展最需要回答的、紧迫的重大时代课题。人口的急剧增长引起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人的关注。马寅初认为这次人口普查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而这种调查方法“是一个静态的记录”，不能概括和反映人口增长的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39‰，能否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20‰呢?为此，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对浙江家乡的人口增长情况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

马寅初几乎走遍了浙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详细地调查了解人口问题，特别是农村人口与粮食增长的情况。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达30‰，这就是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已经达1 300万之多。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于人多地少，今后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并征求意见，引起了很大反响。马寅初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

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看来可以公开谈论控制人口的问题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毛泽东对马寅初的发言表示赞赏，说他讲得好。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①]在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又说：“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规划。……”[②]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马寅初受到很大鼓励。

这年4月，在接见《文汇报》记者时，马寅初高兴地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这个演讲稿经过补充、整理，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新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成为后来《新人口论》的发言稿。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同年7月，马寅初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以《新人口论》为题，作了长篇的书面发言。

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新人口论》，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文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引起的十大矛盾：1. 人口迅速增长与生产设备不足的矛盾；2. 人口迅速增长与工业原料增长缓慢之间的矛盾；3. 人口迅速增长与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4. 人口发展快与资金积累慢之间的矛盾；5. 人口增长快与就业不足之间的矛盾；6. 人口发展快与教育事业落后之间的矛盾；7. 人口发展快与提高科学



技术水平慢之间的矛盾；8. 人口发展快与粮食增产缓慢之间的矛盾；9. 人口质量低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0. 人口发展快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据此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刻不容缓。人口增长被控制住了，十大矛盾就会缓解，逐渐还会消失，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才能协调向前发展，人口增长才能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在作了上述分析说明之后，马寅初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实行定期的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把人口增长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以便为制订正确的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提供准确的数据。在 1958 至 1963 年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了解在 5 年或 10 年中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二）加强控制人口重要性的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提倡晚婚晚育。要大力进行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传统观念；待宣传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后，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 25 岁、女子 23 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如果力量还不够大，应辅之以更严厉的行政力量，主张生育两个孩子的有奖，生育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育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三）运用避孕的办法，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他认为控制人口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是要普遍宣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等等。此外，为了不被人误解，在这篇文章中，马寅初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批判，并且论证了自己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本质区别。他特别指出，“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出发”，而《新人口论》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出发，两者立场截然不同。

《新人口论》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经过科学的分析得出结论，尽管今天看来还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的地方，但它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它在当时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几乎在同一时期，1957 年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中国，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新人口论》被当做“新马尔萨斯人口论”遭到了批判。1957 年 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同日，人民日报另一篇文章《斥责资产阶级右派的所谓农村调查》也含沙射影地指向马寅初。

大跃进开始后，从 1958 年 4 月起，开始了对马寅初的点名批判。北京大学一些人首先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此时，号称“党内理论家”的陈伯达和康生也先

后发难。他们打着毛主席主张“人多是好事”的大旗，马寅初把拉出来点名批判，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点名批评了马寅初，说：“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③]同年7月1日，在北大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向北大师生作报告时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④]从此《新人口论》成了“马尔萨斯在中国的翻版”。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马寅初的运动。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这年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马寅初，他指示说：批判的文章分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光明日报》共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批判马寅初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同一时期，参加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多达200人，他们在《北京日报》、《文汇报》等全国性报刊上纷纷发表批判文章。这些批判认为：“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不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分析人口问题，而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性欲、数量、质量、生殖率，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认为马寅初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鼓吹者；他篡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理论，把它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是根本错误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是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感情，甚至是仇视劳动人民；他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新人口论》就是这种进攻的一支“毒箭”。

对于众多的批判言论，马寅初针锋相对地与之论战。从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初，他发表10余篇文章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他说：“在研究工作中，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就承担责任，错了勇于改正，是真理要坚持，即于个人有所不利，亦该担当一切后果……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康生对北京大学当时的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之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右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



在强大的压力下，1960 年 1 月 3 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翌日，向教育部写了书面辞职报告，很快获得国务院的批准。随后，又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3 月 18 日，马寅初离开北京大学，此后不久，他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文革”十年中，周恩来指示对马寅初进行了特殊的保护。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马寅初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批判，带来了极为严重和深远的后果，它将人口问题归为政治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人口政策，阻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和实施。大批判的恶果，也许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然而几十年之后，中国人口无节制的生育造成了人口迅速膨胀，并且最终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从那时起，能像今天这样真正地重视这个问题，能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个问题，用科学地精神去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我国人口的增长不至有这么快，困难也不至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重新来过。值得令人庆幸的是，70 年代初期，在国民经济即将滑向崩溃边缘的时刻，中共中央果断采取了马寅初先生控制人口的主张，在全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计划生育活动，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到 1980 年，已降至 11.92‰。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过大，这时的人口总数已经接近 10 亿，中国人口仍以每年新增上千万人的速度递增。事实表明，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仅是那个时代人口论著的杰出代表，今天我们回顾其思想仍然对当前的人口发展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他提出的人口增长、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设计等内容，已经被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伟大实践所验证，并对 21 世纪统筹解决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人口问题，不断完善我国人口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注释：

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2 月 27 日）。转引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 年 3 月版，第 131 页。

②张光照，杨致恒；《中国人口经济思想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91 页。

③胡希宁：《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简史》。

④杨勋：《马寅初传》。

人民公社构想的萌发

1958年，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农业生产“卫星”不断，使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感到农村的生产力已经空前的发展起来，农村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便萌发了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实行“人民公社”的念头。于是，我国农村开始普遍建立起人民公社。

在我国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在1955年，毛泽东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就表明了他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的观点。其中，他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按语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因此，1956年内一些地方办的高级社，规模比较大，例如安徽省有16个社规模在3 500户以上，河南省千户以上的大社有495个。

1956年秋后，一些地方出现闹退社、分社风潮。后来查明某些社规模过大，难于管理，吃“大锅饭”严重，是酿成风潮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党中央在1957年9月14日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指出：“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要求，适当分小。”“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规模确定之后，应该宣布今后十年内不予变动。”

但是，在经历了批评反冒进的曲折之后，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出动几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由于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灌溉渠系，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相适应，这就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各农业社投入的大小，与受益挂钩进行结算。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打主意。

面对农田水利建设大规模开展带来的新问题，以及许多地区进行了撤区并乡工作，因此，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合作社的规模问题。

1958 年 1 月，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泽东就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后来正式提出并大社的主张。有关部门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

《意见》下达后，各地迅速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辽宁、广东两省最快。辽宁于 5 月下半月，即将 9 272 个社合并为 1 461 个社，基本是一乡一社，平均每社约 2 000 户左右，最大的为 18 000 多户。紧接着，河南、河北、江苏、浙江也相继完成并社。河南由 38 286 个社合并为 2 700 多个社，平均每社 4 000 户左右。北京郊区农村，由原来的 1 680 个社合并为 218 个社，平均每社 1 600 户。

1958 年 3 月 20 日，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向毛泽东报告说，该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十分振奋，亲笔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推介文章。文章一开头，他就以饱含激情的笔调写道：“‘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走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

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5]这里所说的“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指的是“大跃进”发动之初确定的十五年超过英国，然后再赶上美国的时间。不难看出，此时，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是信心十足的。

各地并起来的大社，初期叫法多种多样。在河南省，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别的省情况也差不多，例如辽宁省盖平县花园地乡由7个社、18 024户合并而成的一个大社称为“太阳升共产主义农场”、四川省成都市郊区第一批由24个农业社并起来的4个大社都称为“国营农场”。北京市顺义县4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的8个大社，分别叫“红旗”、“卫星”、“七一”、“火箭”、“东风”、“东方红”、“先锋”和“红星”合作农场。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时，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见，要求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30日，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提出三四十年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就要开始试验。

1958年6月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公社”命名的大社。浙江省诸暨县城南乡6月中旬成立一个大社，叫“红旗共产主义公社”。成立过程大体是这样的：6月13日，城南乡党委书记丁祖铭，参加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听到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在报告中讲到每个县可以搞个把共产主义雏形的乡、社。回来后，经乡党委讨论，同意试办公社，立即动员全乡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写申请书，接着就制定规划，宣布公社正式成立。6月底在辽宁省安东县的前阳地区出现了一个“前阳公社”。这个公社由原前阳、新安等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共有13 000多户，72 000多人。安东地委和安东县委在这里进行“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试点。

公社这个名称，原出于欧洲中世纪，是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大多数公社的特点是：其公民或市民宣誓互相保护或帮助。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成功后，雅各宾派中的一些派别，曾主张在法国恢复公社制度。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学生们，于1824年至1828年在美洲购置土地，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就把他们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欧文的公社是由2 000人到3 000人组成的工、农、商、学相结合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在公社内部，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为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每个人可在公社仓库领取必需的物品。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也常把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称为公社。19 世纪中叶在欧洲其他一些派别的共产主义者也使用公社这个概念，因此，共产主义也常称为公社主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871 年巴黎公社的革命者，把自己政权称为公社，并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城市自治的传统意义上，使用公社这个概念的。因为巴黎公社革命者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出现了三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共耕社。1919 年 12 月 3 日到 10 日，俄共（布）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俄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代表大会。4 日列宁在代表大会讲话称：“农业公社是个很响亮的名称，是与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有联系的。”⑥

1958 年 5 月，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中提到，“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发展。”这期间，陆定一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收入书的第一条语录中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本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的大社叫人民公社起了促进作用。毛泽东还一再向全党推荐这本书。

1958 年 6 月底 7 月初，在晋、冀、鲁、豫、陕、京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谭震林特地讲到了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问题。他说，像遂平县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的公社，有工业部，有农业部，有林业部，有水产部，有畜牧部，有财经部，有交通部，有文教部八大部。会议期间，谭震林把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干部找到郑州汇报，并向他们讲了办公社的道理。

1958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第 3 期发表了陈伯达的短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在介绍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办小工厂的经验时指出，这种做法“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党的机关刊物

上首次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1958 年 7 月 16 日，《红旗》杂志第 4 期，刊载了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37 周年大会上的讲演稿：《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章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物质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

陈伯达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明确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向，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普遍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后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到人民公社的起源问题时，陈伯达也有一段回忆。他说：人民公社，我没有感性知识，主席要我们到天津（当时河北的省会）去，到天津后，跟安国、徐水、定县、正定几个县委的同志谈了一下。安国的同志说过这个问题。他们有五万亩洼地要搞成稻田，他们说，既然调了很多劳动力，大家协作，把洼地变成稻田，就不如搞一个大社。

据有关资料称，河南省是最先得到关于人民公社信息的，也是最早成立人民公社的省份。7 月间，河南省在并大社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热潮。据 8 月 13 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电话汇报，全省已建立公社 1 463 个，占计划数的 52.42%。新乡地委 8 月 10 日向中央和省委汇报，已办起 354 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 5 345 户，其中：7 月 18 日成立的修武县人民公社是一县一社，共 29 193 户。

8 月 4 日、5 日，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保定地委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河北徐水县、安国县。在徐水，他称赞人民公社成立后，达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称赞农民上山炼铁，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小学。在安国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这说明，此时毛主席的头脑里，已经在思考着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从安国回保定的汽车上，他问陪同视察的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说在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还说，县也要并大一



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头少了好领导。还称赞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毛主席走后，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同志到达徐水，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几天之内，全县24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布转变为人民公社。8月22日，徐水县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规定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宣称："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

8月6日下午4时20分，毛泽东又南下到达已经成立了人民公社的河南新乡县七里营视察。在公社办公室门口，久久地凝视公社牌子，连连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视察公社棉田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

8月6日晚上，毛泽东到了郑州，在这里接见从嵖岈山赶来的史向生，并详细地了解了嵖岈山卫星公社的情况。史向生汇报了嵖岈山公社的组织结构，当听到公社采取工、农、商、学、兵结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分配时，毛泽东说："工、农、商、学、兵，那么工业、商业、学校都包括了，是五位一体啊。两个招牌换成一个招牌，是政社合一。"在谈到公社的名称时，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9日，毛泽东到达山东。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向他汇报了山东各项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还讲到了办大社的优越性。随后去历城县的北园乡视察农业合作社。在提到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3日，毛泽东结束了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视察，回到北京。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特别是8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办人民公社的好处是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的文章之后，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以后，人民公社成了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②《列宁全集》第37卷，第2版，第362页。



北戴河会议上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讨论与决议

为了适应钢铁生产翻一番和农村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的新情况，研究解决这些新问题，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称“北戴河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的负责人。会议议题共有 17 个，主要包括：工农业生产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领导原则问题、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农村工作、商业问题、文化教育卫生问题、军队问题以及加强民兵工作问题等。作为“大跃进”高潮的标志和影响进程的大事，北戴河会议更重要的是讨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

会前，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谭震林准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的文稿。8 月 17 日，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亲自指示将这份文稿同陈伯达转送他的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一起印发给与会人员讨论。

毛泽东称赞《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认为是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中写得最好的一个。他对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更看重，视为“至宝”。这个简章是经他亲自修改过的，是他提供给人们学习的“人民公社样板”，并且对它做出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共二十四条，分别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社员成分和入社手续：公社对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处理：公社对农具改良、农村电气化、发展工业的规划；公社设立供销部及其经营方式；公社建立信用部及其经营方式；公社的义务教育和学校设置；公社的科学研究工作；公社实行全民武装及民兵的组织、训练和任务；公社的辖区范围；公社的最高权力机关社员代表大会的权力；公

社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组织形式；公社的工资分配和管理；公社的粮食分配和管理；公社的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幸福院和公墓的建设和管理；改善社员居住条件、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以及公社的年收入分配项目、公社的计划管理和民主管理等等。大到公社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小到托儿所、缝纫组、公墓的建设。公社年收入分配项目，简章均有明确阐述，其中还规定，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和粮食的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

在会上，毛泽东要求大力宣传这个《简章》。他说："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不一定照此办，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十来个人吹。……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于是，这个简章在北戴河会议上印发后，又在9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7期全文刊载。这个章程后来被奉为"公社宪法"，可见它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

整个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五次讲话，讲得最多的就是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8月19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办公共食堂。

8月21日，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

8月25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十分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现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月3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以、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

 

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8 月 29 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把各地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1958 年 9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决议共六条：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两千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

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现在就应该对人民公社的分布，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作合理的布局，

社的规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综合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构也必须有适当的分工，要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建立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三、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贫农、行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并大社，转公社必须与当前生产密切结合，不仅不能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生产更大跃进的一个巨大力量。为此，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

社规模的大小，并大社，转公社进度的快慢，以及做法和步骤，都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决定。但是，无论在秋前秋后或者今冬明春合并，都应该从现在起，就把准备合并的一些小社串连起来，共同商量，统一规划秋后的农田基本建设，统一安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在并社过程中，应该加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自然地变为公有。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的问题。

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封，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暂时仍然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等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以改变。

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制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但是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做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

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这一天，北戴河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通过鸣放辩论，使广大农民充分了解人民公社比原有的农业社具有更伟大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把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并且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来解决与转为人民公社有关的各种经济问题，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除此之外，北戴河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 1 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和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八个文件，农业方面的 9 个文件，财贸方面的 10 个文件，教育方面的一个文件，其他方面的九个文件。其中有《关于 1959 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等。

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危害国民经济发展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在北戴河会议精神的推动下，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逐步推向高潮。各省、市未经充分准备，就争先恐后匆忙地并小社转公社。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到年底，全国农户的 99% 以上参加了公社。



北戴河会议后公社化的迅速发展

1958 年 9 月 1 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公开发表，10 日，公布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此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并且迅速席卷神州大地。

1958 年 9 月 30 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 4 期介绍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根据这份《简报》的介绍：运动从 7 月份开始发展，8 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 月份进入全面高潮，截至 9 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 1 个多月。在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中，12 个省、市、自治区 100% 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 个省、区已有 85% 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浙江、贵州、宁夏、新疆 4 个省、区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有云南一个省计划在 10 月底完成。截止到 9 月 29 日的统计，全国共建立起人民公社 23 384 个，加入农户 1.1 亿多，占总农户的 90.4%，每社平均 4 797 户（据 11 个省、市、区 7 589 个公社的统计，5 000 户以下的 5 287 个；5 000 到 1 万户的 1 718 个；1 万到 2 万户的 533 个；2 万户以上的 51 个）。河南、吉林等 13 个省，还有 94 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起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简报》还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工、农、商、学、兵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各条战线上陆续出现的奇迹如雨后春笋。许多地方成立公社以后，立时办大工厂，遍地小高炉林立，铁水奔流；农村中学、大学、红专学校遍地开花；普遍地建立了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劳动效率倍增。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一昼夜或几天以内就实现了。随着人民公社的实现，农村食堂、托儿所等组织日见普及，大量的妇女劳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将加速社会主义的建成。这些农村的人民公社将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中央级报刊也连发社论，号召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要求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使运动进入高潮。到10月底，原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1.2亿多，占全国农户的99%以上。平均每社为4 637户，达1万人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特点，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可以概括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的“大”，首先指办社规模大。人民公社一般相当于几个乃至几十个高级社的规模，平均每个公社有4 800多户，6万多亩土地和1万多劳力。在11个省市区7 589个公社中，1万到2万户的公社533个；2万户以上的社51个。有的甚至一个县只成立一个县联社，河南、吉林等13个省，有94个县实行一县一社；其次是指经营范围大。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样样俱全。例如“沿着人民公社的道路，奔向共产主义乐园”的先进典型——河北省徐水县。当时的报道说，“在已建成的公社中，广大社员正在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生产高潮。乔家门巨龙人民公社2万多社员群众建立了240个工厂，其中110个已开工生产。西太康路人民公社社员正在日以继夜地生产耐火材料放焦炭，有100多名妇女已经成为耐火焦炭工厂的工人。许多人民公社的各种组织已建立起来，乔家门人民公社已经建立了幼儿园、托儿所16处，红专大学1所，百货供应站5个，储蓄所5个，书店1个，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赞扬。”

人民公社的“公”，首先表现在公有化程度高。公有化程度高则主要体现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公社可以随意调动并无偿征用土地。原来高级社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他公共财产，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实行全公社统一核算；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社经营，家庭副业等一律收归公有。国家把在农村的粮食、商业、财政、信用社等基层机构下放给公社经营管理，统一分配消费品；其次表现在分配方面。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据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五省统计，共建公社5 254个，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的共842个社，占21%；实行伙食供给制（即饭菜不要钱）的2 151个社，占61、3%；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即吃饭穿衣等不要钱）的590个社，占15%；实行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等）的103个社，占2、7%。当年，很多公社秋后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了，只发给社员一张食堂就餐



证。工资制则是在供给制之外，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由于公社的收入首先要用来维持供给，工资也就名存实亡。

“一大二公”两者之间是互为条件的关系，只有公有化的程度提高，才能保证公社规模的扩大；而规模扩大的同时又促使公有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一大二公”又离不开“政社合一”的体制。所谓政社合一，就是采取分级管理体制。公社既是农村中的生产组织单位与经济核算单位，又是一级政权机构，具有乡一级政府的职能。在人民公社内部，将公社分为若干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实行三级管理。统管全社的经济核算、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生产大队负责本大队的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则是一个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可以说，公社既承担了经济生产的职能，又承担了政府的行政职能，其职能范围包括户籍管理、治安、税收、教育、公共福利等等。

此外，为了便于集中、调动劳动力投入，在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搞“大兵团作战”，许多公社搞起了所谓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是实行军队体制，把公社的男女劳力全部编入师、团、营、连、排、班等军事组织，在劳动时像军队参加战斗那样进行部署、指挥、调动。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妇产院以及米面加工厂和缝纫厂等公共事业，对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进行改造，使社员过着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吃食堂的社员占农村总人口的90%。已建托儿所、幼儿园475万个，幸福院10万多个。河北、贵州、辽宁等20个省市区，共建民兵师1 052个，民兵团24 525个。为了方便生产生活，各地公社还建立了粮食加工、缝衣洗衣等组织。

人民公社化初期，全国各地学习河北省徐水县的经验，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其中，作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更是在短时间内骤然兴起，如火如荼，农民们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

早在1958年4月中旬，徐水县城附近的香家庄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公共食堂。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在全国掀起高潮，公共食堂在各地生产跃进中也迅速发展起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事十分重视。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的谈话中，

提出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要求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的文章，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一是吃饭时间一致了，社员出工、开会和学习都不再等待了，可以节省出许多时间用于生产；二是可以把妇女劳动力从做饭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增加了一批劳动力；三是解决了单身汉做饭、喂猪的困难；四是家禽家畜集体饲养了、社里的轻微劳动就多一些，稍能劳动的“五保户”都可以参加工作，这样就减少了“五保户”，减轻了社员负担；五是有计划地用粮，就可以消灭吃过头粮的现象，也没有人闹粮食问题了；六是便于发展集体副业；七是过去夫妇、妯娌、姑嫂、婆媳之间，往往因做饭、吃饭问题闹意见，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家庭和睦了；八是人畜分居，卫生情况大改善，社员心情舒畅。把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增加了劳动力，减少了粮食问题的矛盾，团结了群众，提高了社员集体主义觉悟。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县大跃进，称赞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徐水县的“三化”及社办公共食堂的经验迅速推广全国。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内成立公共食堂。

9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的社论，并刊登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的简章。简章明确规定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与粮食供给制，要以生产单位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赞扬嵖岈山卫星公社的供给制与公共食堂。此后，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公共食堂一哄而起。“到10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总人口的70%、80%到90%”①。

公共食堂成立伊始，就大刮“共产”风，平调社员群众的生活物资，房屋碾磨、炉灶刀板、锅碗瓢勺无偿充公。当时，最为严重的地方，甚至只剩一双筷子是社员自己的。由于把愿不愿意加入公共食堂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办食堂看成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愿加入食堂则被视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就此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公共食堂很快在全国农村推行。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开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即使这样仍要求争取80%的人到食堂吃饭，能争取到90%以上更好。

 

随着农村公共食堂广泛兴起，当时提出了一个“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实行粮食供给制，并在少数地方实行了一段时间。9 月中旬，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当听到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②]1958 年 9 月，刘少奇在江苏省考察时也表示积极支持供给制：“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公社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刘少奇在河南考察时又说：“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好的。”[③]9 月 27 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我经过 3 个省，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根据薄一波回忆说：“当时甘肃的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这个口号很积极，看到过路的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要他吃不行。”

由于人民公社被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在“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的鼓舞下，一些地区出现了急于过渡的情况。

其中，典型代表应首推河北省的徐水县。徐水县是“共产主义”的试点。8 月初毛泽东视察该县后，8 月 6 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即来到徐水亲自指导工作，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他在 8 日的座谈会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过去没有想到跃进这么快，……这样就逼得我们想问题了。就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机关、学校都搞。在中央、省、地委的帮助下，县委于 8 月 22 日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奋斗目标是：1959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 1963 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9 月 1 日，《人民日报》宣布：“徐水人民公社将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的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9 月 15 日，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实行县社合一，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9 月 20 日，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每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农商学兵

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同时，按照这个规定，全县实现了供给制的“十五包”：吃、穿、住、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由县里统一包下来。不仅全县都吃饭不要钱，就连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

许多地方纷纷仿效徐水县，推出了与之相类似的种种供给制。当时，山东省莒县爱国人民公社实行了“九包”供给制；以渔业为主的山东荣成县石岛人民公社也推出了“11包”的分配方法；而在全国第一个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河南省七里营公社，更是推出了“16包”的供给制，包括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理发、洗澡、缝纫、电费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山东省范县也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1958年10月28日，县委第一书记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了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两年实现工业化、电气化”、“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等，还用一首诗描绘出范县的共产主义美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中共中央在徐水县的“共产主义试点”的消息，经《人民日报》报道后，徐水县就成了参观的热点。当年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和3 000多个国内单位的代表前来参观，国内外影响很大。赫鲁晓夫知道后，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参观、察看，结果看出破绽。赫鲁晓夫听了记者的汇报后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财力、物资等方面的严重匮乏，最终导致徐水县的共产主义试点在经济上难以负担，无法实现预定的各项计划指标，结果使这种供给制的“共产主义试点”不得不宣告失败。

注释：

①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49页。

②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25页。

③《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人民公社的弊病

1958年兴起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它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正如邓小平同志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灾难。"[①]这种党政不分，政社不分，政经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超越了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超阶段的空想。

人民公社的建立反映了我党不顾生产力的实际水平，片面变革生产关系的"左"倾错误，违背了生产关系要同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客观规律。由于人民公社所特有的生产关系严重脱离了生产力水平，因而是行不通的。当时，在人民公社的问题上，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来说，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已包含着若干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实际上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

应该说，人民公社的目标与理想是美好的，但其现实情况却并不美好，超越了现实基础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阶段，削弱了农村生产力。当时为了摆脱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所进行的制度创新不但没有提供一条通往美好社会的捷径，反而背离了既定目标，成为农村发展的障碍。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人民公社体制明显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生产力状况，而正是这样人为的拔高与超越注定了早期大公社体制的失败以及后来相应的退却。人民公社它不仅在规模上比大社还大，而且在性质上比大社的公有化程度更高，在社会意义上被赋予新的内容。如果说大社还是被作为一种农村的经济组织，那么人民公社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政社合一，被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

组织形式”，甚至被当作“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一些基本的思想，简要说来，这样一些原则是明确的，即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可能开始，这一过渡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及人们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当然，到底还要具备哪些具体条件，才能开始过渡，这是需要依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探索的，需要实践已经向人类提出这个问题时才能开始解决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轻率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简化为“产品丰富”和“共产主义精神”两条，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这两个条件，竟以为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几年内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空想。

其次，它窒息了农村经济活力，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实行高度集体化和计划化的生产经营和分配方式，超越历史条件地剥夺了农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应该发挥的基本功能，因此无法长久地激发和维持农民的劳动热情，同时生产的高度计划化和对农民的严格限制也制约了农民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窒息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农业生产尤其是农业经济效益的增长缓慢。在当时的农村中，产权关系模糊，生产活动混乱，田地里的庄稼无人过问，人为造成粮食下降。1957 年以后，人均粮食产量开始逐年下降，1958 年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 24%，粮食、棉花比上年增产，而生猪头数则下降了 58%，大牲畜减少六百多万头，总头数降到 1952 年的水平。到了 1959 年则呈现全面下降，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下降 136%，从而宣告了人民公社早期制度的失败。一直到 1977 年也没有达到 1957 年的水平。农业的停滞不仅使人民的生活无法达到温饱水平，而且制约了农业向工业和外贸提供更大的支持能力，使农村长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状态，农民始终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1977 年与 1957 年相比，每个农业劳动力良田负担量由 0.7 公顷减少到 0.42 公顷，下降 39.7%。劳均粮食产量由 1 030 公斤减到 962 公斤，减少 6.7%。每百元农业收入的成本费用由 36 元增加到 55 元，增加 53%。劳均净产值由 355 元降到 317 元，下降 10.7[②]。

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徘徊状态。据统计，全国粮食产量自 1958 年达到 20 000 万吨后，直到 1978 年才达到 30 000 万吨，20 年平均每年只增加 524 万吨，尽管年年强调“以粮为纲”，实际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 2%；棉



花产量20年间一直徘徊在200万吨左右。[③]

农民收入的提高极其缓慢，相当数量的农民还处于贫困状态。据统计，1957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73元，1978年才增加到133.6元，其中从集体分得的只有88.5元。21年间年均增加2.9元，年递增率为2.5%，扣除物价因素，年均递增仅1.4%。[④]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人均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50元以下的占27%，40元以下的占16%，人均口粮，旱粮地区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19%，水稻地区4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18%。这说明，全国约有1.4亿人口处于半饥饿状态。如果再考虑到人地比例关系，那么，绝大多数中国农民都大大低于"饥寒界线"，处于生存危机边缘上。邓小平曾严厉地指出："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⑤]"

第三，它超越了农民的认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总的来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是超越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觉悟水平的，虽然农民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确有联合起来的必要，但采取什么形式为好，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化是以互助组，生产队，公社为单位进行农业劳动，按照工分进行分配。它有利于培养农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以及共产主义劳动觉悟，是用工业化的模式管理农村。但是，由于受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的影响，家本位思想是不可能迅速在人们头脑中消除的。因此公社化政策限制了农业经济的自由发展。由于集中劳动的方式抹煞了劳动质量的差别，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平均分配的分配方式也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以生产小队为一个劳动单位和分配单位，破坏了的家庭生产组织形式。一个农民出一天工，记8分或10分，收获时，每人按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连柴草都要分配。农民没有私留地，也没有生产工具。农民干活时，在地头上"磨洋工"生产效率极低。大锅饭越吃越光，越吃越穷。再加上国家的粮食征购政策的实施，农民的生活水平遭到了空前的下降，浮肿病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上升。这些不切实际的提高公有化程度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损害，造成农民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反行为"，如农民个体性偷粮、生产队集体性的瞒产私分，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由于实行“吃饭不要钱”，很多地方在短短的几个月便把集体的家底吃空。例如，湖北省委在后来的一个报告中说到：“由于‘吃饭不要钱’，办大食堂，号召敞开肚子吃，而引起了大吃大喝大浪费。有的地方，吃饭放‘卫星’，一天三顿干饭，开流水席，个别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照这样‘吃’法，农民的估计是‘一天吃了三天的粮’，这样大手大脚搞了两个月到三个月。”⑥河北省委的一份报告中也说到：1958 年“秋收没有搞好，丢、烂、糟很多，再加上一度放开肚皮多吃，丢失、浪费和多吃的不下八十亿斤粮食”⑦。这样，从 1958 年末开始，粮食出现紧张现象。从 1958 年年底开始，粮食出现了短缺现象，“吃饭不要钱”的现实利益也不再具有诱惑力，种种矛盾渐渐暴露出来。农民最初对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憧憬的那种热情也开始逐渐冷却下来。1961 年，随着中央关于纠左、调整一系列指示的下达，加之 1959 年至 1960 年农业连续受灾，各地食堂最终以失败而宣告结束。

第四，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容易助长官僚主义作风的盛行。

由于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实行公社一级经营体制，各种权力集中在县、社。显然，这种组织体系是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很容易出现干部瞎指挥、强迫命令的问题，造成干部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的泛滥。违背了我党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使党的措施和政策失信于民，从而降低了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工作效率。这种危害要比物质上的损失更为严重。在公社化之前，国家对农业劳动的集体组合还强调自愿互利原则。人民公社体制下，自愿互利原则被破坏，农民一旦参加公社，其作为公社社员的身份便具有了强制性与终身性，农民实际上没有自愿参加和退出公社的权利。在以强控制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内，由于没有退社自由，农户便丧失了以退社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

有一个顺口溜评价公社体制是“瞎指挥的班子，吃大锅饭的架子，一平二调的路子”，还有一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当年公社社员劳作的场景：“出工慢腾腾，下班一窝蜂，成天磨洋工，吹个哨子敲个钟。”

随着实践的发展，人民公社运动的弊端日益暴露，出现了“过分集中”、“生产效率低”、“虚报浮夸”、“平均主义”等现象。中共中央也有所察觉问题，并试图加以改进。



195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提出纠“左”。12 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交换的错误思想。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止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势头。

为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 年 2 到 3 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

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和努力，“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高指标”、“瞎指挥”受到了初步遏止，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由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严重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性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未根本好转，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又重新发展起来。

1960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设想，用 8 年时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为促进这种过渡，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各级层层下达硬性指标，助长了“五风”的重新抬头。

由此可以看出，1958 年调整后的人民公社仍然不能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不仅没能从制度上找到公社化后存在的问题，而且还在继续恶化。鉴于人民公社存在的种种问题，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 年 1 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 1962 年底，公社所有制于基本上退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所有制后，公社规模大大缩小。根据统计，公社总数由原来的 2.6 万多个变为 7.4 万多个；每个公社由原来的平均 5 233 户缩小为 1 621 户；生产核算单位的规模由原来的平均每个生产队 36 户缩减为 21 户；生产队总数由原来的 329 万多个增加到 558 万多个。

但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也就是说，以生产队为基础、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农业生产关系形式，虽然已

经退到初级社的规模、高级社的性质，但仍然不能很好地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说明它基本上不适应生产力水平。

人民公社的弊端在日后的岁月里不断显露，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国农村发生了重大变化，促进了农业从自给自足经济向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实行政社分开，撤销公社、大队，改设区、乡。到1984年底，全国建立了九万多个乡（镇）政府。经过改革，农村的体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公社”这一历史词汇已随时代进步而消失。

注释：

①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第237~238页。

②《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4月30日，第66页。

③④《光辉的3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第162页。

⑥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第214页。



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教训

从1958年到1960年发动的“大跃进”，导致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发动的有过严重失误的一次运动。这一时期，由于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减产，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

对此，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初步总结，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基本总结，“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大跃进”所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具体来讲，就是积累率过高，积累效果极差，在基本建设投资中，过多集中在生产性建设上，忽视了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为完成钢铁生产的高指标，不但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需要扩大，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部门的建设项目也要增加。因此，1958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基本建设投资额由1957年的15 123亿元增加到27 906亿元，增长84.5%；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从143.32亿元增加到388.69亿元；大中型竣工项目由的992个增加到1 815个。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积累占24.2%；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中，各年的积累率分别达33.9%、43.9%、39.6%，平均为39.1%。三年积累共达1 438亿元，比“一五”时期全部积累额高出44%。过高的积累，一方面挤占了消费，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超出了国家在原料、材料、能源、资金、设备

等方面的承受能力，使不少基建工程迟迟不能完工投入使用。

第二，工农业比例失调，农业战线受到极大削弱，粮食产量急剧下降。

1958 年我国粮食获得丰收，但是，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对粮食产量的估计严重过高。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 1958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3 000–3 500 亿公斤，比 1957 年增产 60%–90%。到 1958 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 4 250 亿公斤[①]。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 650 公斤，早已超过需要[②]。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 年 10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 500 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 275 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由于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

（1）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 1960 年 1 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 391.9 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 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 7 省市区达 90% 以上。

（2）抽调农村劳动力，使农业战线受到极大削弱。1958 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 3 000 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1960 年使用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由 1957 年的 18 365 万人下降到 14 620 万人，而且留下的大多是弱劳力。1960 年 10 月，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 4、5 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 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原因是基本建设和支援工业抽调劳动力过多。

（3）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 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 174 034 万亩，比 1958 年的 191 420 万亩下降了 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 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 8.5%[③]。按照 1957 年粮食亩产，等于 1959 年全国减少了 169.5 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 10%。

（4）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粮食征购量从 1957 年的 960 亿斤增加到 1021 亿斤，粮食征购占产量比例也由 24.6% 提高到 35.6%。这些都大大超过了农业负担的实际可



能。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2 月 19 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 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 674 亿公斤和 41. 6 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 1960 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 510. 5 亿公斤和 26. 5 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 1958 年相等④。

正是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导致国家、集体、家庭都出现了严重的亏空。从 1960 年开始，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由 1957 年的 19 505 万吨降到 14 385 万吨的水平，仅相当于恢复时期 1951 年的水平。此后，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下降，直到 1965 年才稍有恢复。1961 年 5 月 17 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⑤

第三，实行“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58 年，工业总产值比 1957 年增长 548%，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 788%，而农业总产值仅增长 24%。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 1957 年的 255% 猛升到 352%，而农业总产值则由 433% 陡降为 343%。1958 年到 1960 年三年工业总产值增长 1. 3 倍，其中占用运输量最大的生铁产量增加 3. 5 倍，铁矿石产量增加 4. 8 倍，煤产量增加 2 倍，但全国货运量只增加 1. 1 倍。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生产也由于为钢铁工业“停车让路”而大幅度下降，这 3 年轻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 55% 下降到 33%。轻工业产品产量和品种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的紧张状况。

第四，市场上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的比例失调。由于全力支撑大跃进建设，生产又都不讲效益，1958 年到 1960 年三年财政赤字实际达到 169 亿元，货币流通量也增加了 82%。由于农业、轻工业大幅度减产，市场商品可供量急剧下降。1960 年在挖了大量商品库存的情况下，商品货源仍比社会购买力少 74. 8 亿元。特别是人民必需的消费品已不能保证基本需求。例如，从 1957 年到 1960 年，全国城乡居民每人平均消费的粮食由 406 斤降到 327 斤，猪肉由 10. 2 斤降到 3. 1 斤。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 19. 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 23. 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 23%，猪肉人均消费

量减少70%。至于禽、蛋等食品，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

“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更严重的是，还由此而导致了我国发展机会的丧失以及人民生活的极度恶化等。根据李先念在1979年1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年“大跃进”的经济损失估算为12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我国1959年或1960年的国民收入，等于当时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一年的辛勤劳动成果付之东流。“大跃进”运动后，我们用了5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恢复到1957年的产量总水平。国家的建设走了大弯路，在一些重要方面丢失了8年的时间。而恰是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如日本等，经济与科技得到迅速发展，正是在此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才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外，由于营养不良，城乡居民比较普遍地出现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多得惊人，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 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 300万人。

尽管，不可否认的是，在这3年中，由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产建设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国重工业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生产能力，比1957年有成倍的或者很大的增长，这些新增的生产能力经过调整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新建了石油化工设备制造，拖拉机制造，精密机械制造，有机合成等过去没有的重要工业部门。地下资源勘探取得很大成绩，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与付出和损失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三年“大跃进”实为得不偿失。

作为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大跃进”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

第一，经济建设首先要遵循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关系的调整不能超越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如果超越生产力的现实水平，一味追求生产关系的所谓“先进”，依靠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那就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三年的“大跃进”期间，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什么事都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一天等于20年”，要求过高过快，不仅要赶快建成社会主义，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而，欲速则不



达，大跃进像个抛物线一样跌落下来。在我国，由于人口多、耕地少、工业交通基础差、农业生产和教育科技长期落后的基本国情，这些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就决定了经济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必须采取稳步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如果不从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盲目求快，急于求成，必然会事与愿违，造成重大的损失，这也是"大跃进"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教训。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做到综合平衡。在1959年江西庐山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就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一定要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既是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又是经济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在大跃进期间，积累与消费，农、轻、重的比例存在着严重失调，表现为"工业比重不断增大，农业比重不断减少；在工业内部，重工业速度飞速增长，轻工业比重急剧下降；积累与消费矛盾突出，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经济上的失衡导致了社会发展陷入了困境。因此，安排国民发展计划，必须要注意经济综合平衡的问题。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自身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其《十年总结》的文章中谈到了经济建设需要主动权，但主动权离不开要"实事求是"："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书中，把大跃进的教训归纳为："搞经济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要反对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不顾客观规律的主观随意性。[⑥]"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和进行都违背这一思想路线，不是根据客观国情量力而行搞建设，而是根据主观需要制定各项经济指标，而完成指标所能依靠的仅仅是政治热情和鼓动起来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也因此有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各地报的粮食亩产量从几千斤上升到几万斤，再升到几十万斤这也警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自身的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点的原则，通过调查研究，不断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本途径。

第四，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1957年以后，随

着党内个人专断作风的滋长和个人崇拜现象的逐渐形成，党内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起来，不仅使得党内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意识滋生蔓延、党员主体意识被严重压抑，而且使得党内产生了严重的个人集权专制的倾向，最终造成党的决策产生重大失误、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害。因此，要坚持集体的决议任何个人不能推翻，特别是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党的领导和个人威望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谦虚谨慎，注意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家长制。以使我们尽量不犯错误，少犯错误，或者在错误出现后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由于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等一系列弊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严重滞后。这也成为“大跃进”轻率发动和难以控制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健全党规党纪。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始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实行依法治国而不是以人治国，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注释：

①1958 年 12 月 7 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②《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05 ~109 页。

③《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 45 ~49 页。

④《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393 页，第 422 页。

⑤《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59 页。

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版。



中共中央对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我国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同时，考虑到建国初期我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于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采取了借鉴苏联经验，逐步建立起了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可以说，这一体制在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我国于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使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来。然而，在“一五”计划末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这一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不足。首先，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之下，由于人、财、物和产、供、销由中央各有关部门统管，政企不分，妨碍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使企业缺乏活力，也容易助长官僚主义的作风。其次，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忽视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机制，制约了社会生产和流通，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克服这种弊端，从1956年起，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了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共中央开始尝试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地方放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逐步下放管理权限，破除和修订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大计划、小自由”的方针，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办更多的事情。毛泽东也多次讲到经济管理体制要改，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要只发挥中央一个积极性，要让地方办更多的事。这年4月，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讲话，明确提出要改进和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改进和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在讲话中

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的多。"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1956 年 5 月到 8 月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会议对如何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初步起草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周恩来对此曾说过："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缩小或妨碍生产。"在这个大原则下，"主要的不是把现有的分掉，而是要地方搞更多的生产，更多的事业、企业"。

1956 年 9 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酝酿和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这两个报告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作出了阐述，并且提出了相关的改进意见。

在会上，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还专门就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集中地总结了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系统地改进措施。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在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经济都已经成为唯一重要的经济形式。但是大量的原来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如此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当然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些问题越来越明显，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目前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国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这就使一部分工厂不像原来自销的时候那样关心商品的质量，因此，也妨碍了一部分工业品的质量的提高。在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办法的情况下，国营批发公司的上下之间，也不能不大部分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向工厂订货的工作集中于少数批发公司，基层商店不能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直接向工厂进货。因此，商业部门向工厂所定货物的品种规格减少了。国营批发公司发到各地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就难免发生一些不合当地需要的情况，因而发生一些这里积压、那里脱销的现象。市场管理办法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这些办法使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社或国营商业独



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因此，当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农业副产品没有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就会减产。其次，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陈云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切合时宜的措施：第一，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把商业部门对工厂实行的价格订货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第二，工业、手工业、农副业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必须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和集中经营的现象；第三，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以活跃商品的交流；第四，改革价格体系，实行按质论价，允许某些商品的价格上下浮动，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第五，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总之，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不是相反。基于以上的分析，他还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总体构想，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有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陈云的这一段极为精辟的概括，实际上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他设想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成为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先导。

此外，在这次大会的发言中，一些会议代表也在发言中谈到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建议。这些设想基本上为大会采纳，集中反映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上。

1957 年 1 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经济工作和改进体制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着手研

究这个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工作的指示，在陈云的主持下成立了工业、商业、财政、农业、交通、文教六个小组，对相关方面的体制问题分头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五人小组与国务院各部委以及东北、华北等十二个省市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改，他们重新研究了全国体制会议拟定的关于改进体制的决议，认为中央对下放权限后如何搞好综合平衡工作考虑不够，改进体制的重点应该是工业、商业和财政，首先应解决好这三方面的问题。为此，提出了《关于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

在 1957 年 9 至 10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听取和讨论了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基本上通过了《关于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并且，决定将这一套规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和批准。陈云在会上做了《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的发言，着重阐述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第二，“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第三，“改进体制一经改变，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第四，“中央和地方各种分成制度，基本上三年不变；执行一年以后，如果有不适当的地方，应该有局部的调整”。

1957 年 11 月 1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八十四次会议，批准了《关于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11 月 15 日，国务院公布了上述三个规定，宣布自 1958 年起实施。

《关于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针对我国工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中央集权过多，地方职权太小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例如“在计划管理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简化计划编制程序；“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以增加企业利润；企业把利润分成的大部分用于生产事业方面，同时适当照顾职工福利方面；取消对企业财务管得过死的一些不合理规定。另外，他要求扩大企业的人事机构管理权。“除企业主管负责人员（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等）、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企业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



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

《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则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例如：地方（省、自治区、市、县）商业结构的设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决定；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利润，实行与地方二、八分成；调整价格管理；实现外汇分成等规定。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明确划分地方财政收支范围；扩大地方财政权限，确定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等等。

这三个文件总的精神，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权利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完成国家统一计划。

1958年，中央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开始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的尝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多次会议，中心议题都是经济工作和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并先后作出一批改进体制的决议、规定。其基本精神是：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和扩大管理权限下放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这次下放的思路，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体制下放”的主要权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下放计划管理权。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在发布《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要求将原来由国家计委统一平衡、逐级下达的计划管理制度改变为“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实行以地区为主、自下而上逐级编制和进行平衡，使地方经济能够“自成体系”。这份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对本地区内的建设规模、建设项目、投资使用等进行统筹安排；可以对本地区内的物资进行调剂使用；可以对重要产品的超产部分，按照一定分成比例自行支配使用。

其次，下放企业管辖权。195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提出国务院各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极少数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性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外，一律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这样，原来由中央各部委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有88%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有的还下放到街道和公社；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下降为1958年的%。这以后，中央部直接管理的1165个企事业单位，下放885个，下放比例为76%。

第三，下放物资分配权。一是减少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物资（“统配物资”或称“一类物资”）和由国务院各部管理的物资的品种和数量。二是对保留下来的统配、部管物资，也由过去中央“统配”，改为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平衡，差额调拨”。三是在供应方面，除少数部门外，都由地方政府的计划机关负责分配和调拨。

第四，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为了增加地方的财力，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权，决定实行“包税制”。

第五，下放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权、投资管理权和信贷管理权。1958年9月《关于改进限额以上基本建设任务审批办法的规定》提出，今后除生产全国平衡的工业产品的骨干建设项目，具有全国性的或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重大习作关系的重大项目外，对于地方兴办的限额以上项目，只需将简要计划任务书报请国家计委批准，其余由地方审批；限额以下的项目，完全由地方自行决定。在投资方面，允许地方政府在中央下拨资金和地方自筹资金总额的范围内兴办各种事业，包括限额以上的大型项目。在信贷方面，实行“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地方银行可以根据各地“生产大上”的要求，“需要多少就贷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

第六，下放劳动管理权。1958年6月，中央决定改变劳动用工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制定、层层下达的做法，各地招工计划经省、自治区和中央直辖市确定以后即可执行。

以上改革措施，其大方向是正确的，有些尝试也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对于发展地方的工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从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为了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差。

首先，在企业和权力下放的问题上，片面强调下放，造成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比例失调。由于企业下放过猛，把一些不适宜于地方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如铁路、交通、邮电、港口、电网等大批下放，破坏了中央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管理，造成了地区分割、线路不畅、流转不灵的现象。加之下半年开展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各级政府响应中央“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不仅打乱企业间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而且出现了各地大上基本建设项



目，大量增加职工，以及平调国营企业设备、材料，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的计划指标。很快爆发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工农业生产秩序一片混乱。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958 年有 1589 个，1959 年有 1361 个，1960 年有 1815 个，每年的施工项目都超过 1953－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 1957 年的 143.3 亿元增加到 1960 年的 388.7 亿元；3 年投资总额达 1 007.4 亿元，比“一五”期间 5 年合计的 588.5 亿元还多 71%。由于劳动管理权下放，1958 年一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就由 2 451 万人增加到 4 532 万人，净增 2081 万，增长 84.9%。1960 年，职工总数达到 5 969 万人；城镇人口由 9 949 万人增加到 1.3 亿人。

其次，“体制下放”，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依靠行政命令的方法，造成各地盲目大干快上，采用了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58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把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近 900 个企事业单位下放到省市区，并完成交接工作，可见当时改进管理体制是多么的盲目追求速度。

台湾海峡风云再起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曾被西班牙、荷兰、日本先后占领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重归中国的版图。1949 年后，反共内战失败后，蒋介石集团逃离大陆，占据了台湾地区。此后，他们一直利用金门与大陆最近的地理优势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而部署重兵，经常对大陆沿海地区骚扰和破坏。

领土完整，祖国统一，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标志和国家强大的基本条件。台湾在我国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台湾是我国东南近海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是中国沿海的重要屏障，它与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构成海上长城，屏蔽中国东南沿海陆地。同时，台湾紧靠菲律宾海，台湾以东部分水域是我国唯一拥有主权和经济权的太平洋水域，是我国战略出海口，也是我国唯一能够进入太平洋的通道，是对外联系的交通枢纽，若台湾与大陆不能统一，不仅我国海权发展将受到巨大制约，亦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1950 年，朝鲜内战爆发。6 月 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踞守台湾，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企图以此阻止我解放台湾，使原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趋于复杂。鉴于美国政府及杜鲁门的行径，中国政府及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6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对外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随后，又在一次大会上讲：“现在中国人民同国民党残余的斗争还没有完结，这是因为反动派残余所盘踞的台湾，现在是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直接控制之下。”形势突变，迫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考虑和调整已定的战略部署。6 月 30 日，周恩来批示海军司令肖劲光：“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新的麻烦，因为有美国挡



着，”所以中央决定“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至此，我战略重点由东南转向东北，主要任务由抗美援朝取代了解放台湾。

1951年11月，美台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美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在台北设立，美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更亲自赴台，与蒋介石会晤，双方商讨决定，美蒋双方海陆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共同防守台湾。1952年3月，美发表128号文件，强调美可以采取单方行动，确保台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在美国的操纵下，国民党当局依赖美援不断对我沿海岛屿进行挑衅，国民党海军的“巡逻线”伸到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一带，以武力威胁各国商船进出厦门、福州等港埠，国民党空军机群也不断骚扰大陆领空，蒋介石狂妄叫嚣“反攻大陆”，美国也提出“战事边缘”，其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由于要进行抗美援朝，党和国家不可能有更多的力量来处理台湾问题。所以，直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停战协定签订不久，中共中央便成立了对台湾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3人领导小组。再次决定将军事斗争的重点由抗美援朝转回到武力解放台湾上来。1954年7月，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指出：“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中央军委很快制定了“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8月，中央军委批示华东军区，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准备同国民党军作战的命令，并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浙东前线指挥部。1955年初，华东部队开始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计划，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了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岛。而后，遵照军委指示，挥师入闽与福州部队会合，待机攻打金门、台湾。

与此同时，美国为了推行其称霸亚洲的“遏制战略”，希冀在全球建立起对新中国和苏联的封锁链。美国政府不断扩大对台问题的干涉。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历次反对和警告，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参、众两院通过了《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据统计，美国第七舰队在我东南沿海集结了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对我实行赤裸裸的“炮舰政策”。1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声

明，郑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一切关于所谓台湾“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不能同意的。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决的回击。同日，福建省、福州市各界人民1 200余人举行反对《共同防御条约》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拥护周恩来外长声明，坚决反对《共同防御条约》的决议，表示要从各方面加强工作，支援解放台湾。

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领导层经过研究后认为，进入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内各项社会改革取得伟大成绩，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加紧完成，经济建设已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务，人民迫切希望在和平安宁的条件下建设祖国。在台湾，国民党于1955年前后完成了“党改”、“土改”工作，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希望看到新的战争发生。在国际上，朝鲜停火得以维持，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的协议也已经达成，特别是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增加了相互对话的机会；而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其目的是要借助台湾的战略地位，搞“两个中国”，并不想过深地卷入与中国的对抗。而完成浙东沿海作战任务，已达战役目的和部分战略目标。从目前形势看，如继续对金、马、澎、台进攻，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之间直接的武装冲突。因此，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毅然决定停止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把工作重点放到促成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和平谈判上来，并由周恩来在外交口寻找机会，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

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会议代表所作的《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公开提出，要看形势的发展。”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折。

1955年3月5日，毛泽东写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复信中，指出：“我们设想，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将有可能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做更多的接触，利用同这三国主要是印度的接触和会谈去创造解决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机会，也许对我们有利。”“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因为



美国武装干涉中国解放台湾，造成台湾地区的危险局势，所以才需要同美国进行谈判，要求它放弃干涉和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1955 年 4 月 23 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许多国家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尽早就缓和紧张局势，从台湾撤兵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国政府对话，并尽快举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经过双方交涉，中美大使级会谈于 1955 年 8 月 11 日正式开始。但是，中国政府的努力却遭到美国的百般阻挠，1957 年 12 月，美国通过单方面降低中美大使级会谈级别，使会谈中断，继而纵容台湾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和破坏。

从参加万隆会议回来后，周恩来便作了认真的考虑，1955 年 5 月，他在全国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 年 1 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再次提出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并向全国发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的号召。6 月，周恩来又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了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国六万万人不可动摇的共同意志”。“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1956 年 8 月，毛泽东对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所作的修改稿中谈到：“在过渡时期中，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

为了促成同台湾当局的和谈，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渠道。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因此主要通过

密使故旧来传递信息。1956 年 3 月 16 日，周恩来接见孙中山前副官和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如果你这次或者以后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或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1956 年 7 月 11 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曾在赣南同蒋经国共过事、现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7 月中旬，周恩来先后三次同曹聚仁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不久，曹聚仁在《南洋商报》发表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内容写成的文章，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遗憾的是，1957 年 10 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

1958 年 5 月，美国把在台湾的"军事援助顾问团"、"美国台湾协防司令部"等 17 个不同统属的侵略机构合并在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之下，成立了"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当局把它的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集结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同年 5 月 9 日，黎巴嫩人民举行反对本国亲美政权的武装起义。7 月 15 日，美国政府以保护本国侨民的名义，派兵在黎巴嫩登陆，对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宣布在远东的陆海空三军进入戒备状态。而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趁火打劫，公然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并加强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的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活动。美军头面人物也扬言，随时准备在台湾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更是接连不断地炮击福建沿海村镇，台湾海峡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8 月 7 日，蒋介石集团宣布实行紧急状态。8 月 8 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叫嚣说，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8 月 11 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所谓"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备忘录"，大肆诬蔑



中国人民，用相当多的篇幅攻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企图以此来掩盖它对华政策的失败，阻挡许多国家日益增长的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趋势。

作为对美国强硬态度的回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寻机对国民党采取军事打击，并以靠近大陆的金门为目标，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以促成和谈。

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针对台湾海峡出现的紧张局势，及时地做出了加强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决定，并果断地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

1949 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后，占据着的台湾地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一部分是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当时，台湾驻有美国军队，并受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如果打台湾，会为美国参战提供口实，也会引起一些中立国的不安与误解。而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则不同，那里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制约，我们打金门可以不和美国人直接交锋。如果美国出面干涉，只能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它的侵略立场，使其政治上陷于被动。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您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由于执行了打金门的决策，使中国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的斗争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主动。从 7 月中旬到 8 月中旬，中共中央为打金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炮击金门的准备工作从 1958 年 7 月中旬开始，其指导方针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7 月 14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参谋长粟裕在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制定在金门、马祖一带实施军事行动的具体方案，主要研究了炮击金门及海、空军配合的问题。会议研究决定了以下事项：陆军以福州军区为主，调集 22 个炮兵营轰击大小金门蒋军目标；以 6 个岸炮连打击料罗湾的蒋军舰艇；组建福州军区空军指挥部，以取得作战地域制空权；海军以东海舰队为主，集中 8 个岸炮连，配合陆军轰击大小金门；调 5 个鱼雷快艇大队、2 个潜艇大队、1 个高速炮艇中队，准备从海上打击蒋军舰艇。7 月 18 日晚，毛泽东召集军委副主席和空军、海军等部队的领导人，紧急部署东南沿海的军事斗争任务。他指出，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的领土，打



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他还明确指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当晚，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部署了炮击金门的作战事宜。7月19日，总参谋长粟裕召集海军、空军、炮兵及总参谋部有关部门的领导人，研究炮击金门及海军、空军入闽的具体部署问题。当日，各军兵种领导人分别向所属参战部队下达了入闽作战的命令，炮击金门的部署基本就绪。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为掩护地面炮兵集结，7月下旬，解放军空军集中600条架战斗机分别转场进驻福建各机场。至8月中旬，一线机场已进驻了6个歼击机团。经过几次空中较量，我军初步掌握了前线的制空权。7月底，为统一入闽空军的指挥权，经彭德怀同意，成立了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也被调到厦门前线指挥部，指挥海军舰艇部队及海军航空兵、海岸炮兵入闽。1958年7月21日，军委总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作战部署、火力配置、各军种间配合、各指挥机构的设置、后勤保障、通讯联络、作战费用预算等问题。从7月29日至8月22日，同国民党空军进行了4次空战，击落国民党军飞机4架，击伤5架，破使国民党空军活动线由福建内地推到海岸线以外。与此同时，海军鱼雷快艇部队也以“陆上行舟”的方式，由铁路输送进入厦门附近海面。

8月18日，毛泽东作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随即，他召集彭德怀等人开会，研究了具体行动方案，决定边打边看，探明美国的态度和台湾当局的动向后，再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8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台湾国民党的海军实力1/3吸引至马祖区域。8月23日，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阿拉伯国家从中东撤军提案的第二天，毛泽东下令对占据金门诸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地炮击。

17时30分，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对准金门国民党防卫部军事目标急袭。顷刻间，炮声隆隆，地动山摇，成群成串的炮弹怒吼着向金门方向倾泻而去。20分钟以后，国民党军炮兵开始还击，但很快被解放军的炮火压制下去。炮战持续两个多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459门火炮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一举毙伤金门和澎湖防卫部队的3名中将副司令（击毙）、少将参谋长（击伤）及以下官兵600余人，击伤了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运输舰“台生”号，破坏了金门的有线通信系统，摧毁

了国民党的大量地面工事和炮兵阵地，解放军取得了重大胜利。随后，解放军持续进行炮击，并对金门实行了从地面、海上、和空中三个方面的封锁，截断了台湾到金门的运输供给线。

按毛泽东最初的战役构想，炮击金门的目的是为了封锁金门列岛，迫使台湾方面从金门撤兵，达到收复金门的目的。与此同时，通过炮击金门来侦察美国是否协助蒋介石集团协防金门、马祖，并以此考验美国的决心。在炮击金门当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在美国干涉台海后，中央决定因势利导，将金门和马祖作为拴住美国人的两根铰链，使其如食鸡肋，骑虎难下。"

解放军炮击和封锁金门10天后，即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12海里以内的岛屿，包括东引岛、高登岛、大小金门岛、马祖列岛、大担岛和二担岛等均为中国内海岛屿。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在声明中，中国政府严正指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在此时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是毛泽东经长期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

这个声明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国人民捍卫祖国领海、领空的严正立场，又包含着试探美国底牌的意思。声明发表的当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公然宣布美国政府将会派兵协防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同时，杜勒斯又在同一份声明中向中国暗示，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毛泽东后来评价道："（杜勒斯的声明），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炮战开始时，赫鲁晓夫担心中国的行动扩大，会导致美苏之间的冲突。9月5日晚，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科夫面见周恩来。会见时，周恩来表示，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会拖苏联下水。次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来华，与周恩来进行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已做好了迎击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的局部战争，包括核袭击的准备。据葛罗米柯回忆，毛泽东后来在与他会谈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此次访华，葛罗米柯特意带来了核试验的纪录片，请中国领导人观看。



毛泽东看后淡淡地说："中国人不怕核讹诈，如果美国人胆敢施行核打击，中国就把政府迁到延安，然后继续斗争。"在得知中国的意图和即使出事也不拉苏联下水的保证后，苏联开始公开表示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不会袖手旁观。赫鲁晓夫还致信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核攻击，那么他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攻击。苏联的态度对美国的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此时，在世界范围内，除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外，几乎都不赞成美国的做法。即使像日本、英国这些美国的盟友都表示反对。日本有关人士表示，金门沿海岛屿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最好不要干涉，英国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互相配合共同行动，而在远东即台湾地区问题上则反对美国"介入"。在美国国内，反战空气甚浓，甚至像赫尔利那样敌视中国的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在执行一种"自杀政策"。在国内外种种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慎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

从 9 月 7 日起，美国派出军舰开始为国民党军驶往金门的运输舰护航，并通过护航的名义侵入中国领海，对中国实施威胁和试探。在此情况下，中国中央作出决定，"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结果，9 月 8 日，我方一开炮，美舰立即丢下蒋运输舰退向外海，并一炮未发。9 月 15 日，在炮击金门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与华沙复会。但美国缺乏诚意，强硬要求我方先停火，然后再谈判。鉴于此，为配合华沙谈判，福建前线指挥部拟采取三项措施：一、继续进行炮击；二、实施对金门轰炸，增加蒋军压力；三、采取海空炮联合攻击，全面开花。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确运用边打边谈的方针，以及考虑到美国国内愈来愈多的人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对台湾问题的政策。9 月 30 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中声明：我们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今后我要说，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可能的保卫"福摩萨"（台湾）和条约地区的工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这个讲话标志着美国对金门、马祖的政策从"协防"转为"脱身"，目的是以放弃金门、马祖，换取长期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

杜勒斯的声明发表后，激化了蒋介石集团同美国的矛盾。当时，驻守金门的军队有 11 万，占蒋介石集团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军队的成员多来自大陆。如果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不仅会影响军队的士气，而且会影响政

权的稳固。因此，蒋介石坚决反对美国放弃金门、马祖的做法，并同美国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先收复金、马，还是把金、马暂时留在蒋介石手中，联蒋抵美呢？毛泽东后来在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开始我们想打金、马，后来一看形势，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个意见在党内取得共识。周恩来后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辦安东诺夫时解释说：我们的方针，简单来说，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中，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与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与家奴，不给外人”。

把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拖住美国，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绞索政策”。10 月初，经中共中央讨论后，这个方针被确定下来。

10 月 6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并且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终究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当。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从 10 月 6 日起，金门海域的炮声沉寂下来。

10 月 7 日，美国下令舰队不得进入我领海 20 英里以内，停止护航。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央适时调整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为使金门军民获取充分补给，得以驻守下去，10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次发布命令，宣布“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目的是对付美国人”。命令还指出“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10 月 21 日，杜勒斯



和美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访台，逼迫蒋介石撤离金门、马祖，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为配合蒋介石同美国的斗争，在杜勒斯到达台湾的前一天，毛泽东下令恢复炮击金门，及时帮助了蒋介石，使其获得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兵的口实。会谈未取得结果。

10 月 25 日，毛泽东再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着重揭露美国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在《再告台湾同胞书》中，毛泽东明确宣布对金门“逢双日不打炮”，“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策略，并告知台湾人民：这“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从此，炮击金门进入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阶状态。隔日炮击的结果，一方面使金门继续成为套在美国人脖子上的绞索，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不能从金门、马祖等外岛撤军，继续保持与大陆的联系，从而避免台湾孤悬海外，成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的借口。金门炮战的高潮由此过去。

炮击金门的政策，挫败了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使美国的战争政策遭到破产。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废止。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正式结束了长达 20 多年的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

西藏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南部，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至此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在的藏族。

自唐朝开始，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逐步建立起血肉相连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到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以及民国，都对自己的领土西藏行使着主权。在这期间，西藏地方政权也几经更替，但是西藏与中央政府的政治隶属关系从未间断。

历史事实表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西藏在古时候曾是一个独立王朝，但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家庭的一员了。十二世纪时，元朝蒙古族上层统治中国，西藏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现在盛行的喇嘛教派（黄教），就是在蒙古族上层统治中国时成为主要的教派的。达赖成为西藏的统治者是十六世纪时清朝册封的。'达赖'这个词不是藏语，而是蒙古语，是大海的意思。七百年来，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英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近代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制造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者为达到其长期侵略的目的，在西藏上层培植了一些分裂势力，埋下了制造动乱、分裂的祸根。

西藏解放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社会制度的最显著特征是政教合一，宗教上层和寺庙势力庞大，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



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拥有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也是西藏地方政府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约占西藏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阶级，即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阶级，依附于三大领主，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人身自由。三大领主把农奴视为私有财产，当做会说话的牲口，可以随意买卖、抵押或作为礼品相互转让，就连婚姻生育也要受农奴主干预，稍不如意，立刻遭到严刑毒打。三大领主完全具有对农奴的生杀予夺大权。农奴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西藏等级制度森严，已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西藏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直到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这种社会制度是西藏地区贫穷落后和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根源。

和平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1949年7月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帝国主义的分裂分子把持了西藏地方政府，唆使西藏当局驱赶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企图使西藏与祖国断绝政治关系，积极谋划“西藏独立”。美国在此期间也逐步插手西藏。在国际上英、美等外国势力公开支持西藏地方政府的分裂倾向。反动而自大的西藏地方政府乘势扩充藏军，在藏东沿金沙江部署，欲以武力抗拒祖国统一。毛泽东及时地注意到这种情况，在给彭德怀发电时指示：“班禅现在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第十世班禅就率先向

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同时，内地各省的藏族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也都纷纷座谈或发表文章，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西藏，并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但是，在西藏地方政府内部，以摄政大札为首的亲帝国主义分子，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的支持下，千方百计破坏我军和平解放西藏。1950 年 1 月，在英、美等帝国主义分子的挑动下，西藏地方当局企图派出一个非法的“亲善使团”赴美、英、印度等国活动，并声明其“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揭露了这个阴谋，指出，如果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赴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中央表示欢迎，若是派出非法使团到各国进行背叛祖国的分裂活动，中央是决不容许的。

对于西藏地方政府无视祖国人民热望的行径，中央一直采取克制态度，耐心等待他们能够及早改弦更张，转变立场，这时，藏族中一些爱国人士，也为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积极贡献力量，以促进谈判早日举行。1950 年毛泽东在给西藏工作的具体指示时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定前进”。在“慎重稳进”的方针指引下，采取了不同于内地和其他民族地区的特殊政策：不触动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不进行改变旧西藏地方政权结构的革命，而在具体行动上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行使我对西藏的领土主权为主。

1950 年 7 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青海省当采活佛和西康省格达活佛前往西藏，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去面见西藏当局进行说服工作。当采活佛经海路前往，未能到达西藏；格达活佛从陆路前往，竟被反动分子于 8 月间毒死于昌都。反动分子的这一野蛮暴行，激起了广大藏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1950 年 10 月 6 日，中央人民政府鉴于先后对西藏当局函电晓谕和派人劝说未获结果，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昌都进军。昌都是藏东政治、经济中心，川康入藏的咽喉通道。西藏当局在此部署了藏军 10 个代本约 4 500 人的兵力，另加民兵 3 500 人，妄图依仗其军事力量并凭借金沙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10 月 6 日，在要求西藏代表赴京谈判期限已过半月之后，十八军部队奉命横渡金沙江。对昌都实施了大的迂回包围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作战。其一部与由青海南下的骑兵支队迂回昌都以西，截断藏军退路。十八军主力和由云南北上的一个团，从侧翼包围和正面攻击前进。当部队逼近昌都时，昌都总管署及守军于 18 日撤离。10 月 21 日，到达昌都西



南之竹阁寺的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下令藏军 2 700 余人放下武器。10 月 24 日，昌都战役结束。由于人民解放军在战役过程中注意政治争取，尽量避免与民兵作战，从而争取了一个藏军代本起义，近 3 000 名溃散藏军和民兵携械归降。昌都战役的胜利，不仅消灭藏军主力，解放了昌都广大地区，粉碎了西藏亲帝分裂势力以武力顽抗的迷梦，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同时，使中央的方针政策直接同藏族人民见面，人民解放军以完全不同于旧军队的形象在西藏出现，迅速荡涤一切反动派的造谣诬蔑，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昌都战役为最终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和平谈判的基础。

然而，昌都战役胜利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反华浪潮，公开干涉中国内政。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外交上进行坚决斗争，顶住国外的压力，另一方面则加强政治争取工作，力促谈判的实现。西藏上层集团在昌都战役的震撼下，内部发生分化。亲帝分裂主义势力头子摄政达扎下台，达赖喇嘛亲政，并派出代表同中央方面接触，由对抗转为对话。然而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失败，一面操纵国际舆论，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自己的领土是“侵略”、“扩张”“最不幸的严重事件”；一面策划由联合国出面进行干涉。11 月 8 日，滞留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在外国反华势力的唆使下，以西藏政府的名义，向联合国发出所谓“呼吁书”，要求把“西藏问题托付联合国解决”。11 月 15 日，南美的萨尔瓦多政府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西藏问题”提案。中共中央迅速剖析这一阴谋，在 11 月 22 日《人民日报》的短评中，严厉斥责美国“露骨地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这一提案在辩论中遭到多数国家代表的冷落，苏联代表马立克等发言反对，“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延期审理此案，所谓“西藏问题”提案被搁置起来。此外，印度在进行外交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派兵进占达旺，进一步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1950 年冬，以达扎为首的亲帝势力，勾结帝国主义，挟持十四世达赖逃往边境城市亚东，准备逃往国外。这种违反人民意志的行为，当即遭到广大藏族人民和部分上层人士的反对，经过斗争，1951 年春，执政十年的摄政达扎下台，由十四世达赖“亲政”。

在西藏爱国人士的积极努力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前往首都北京，同中央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和谈。阿沛·阿旺晋美等代表于 3 月 29 日自昌都启程，经雅安、重庆、西安，

于4月22日到达北京。他们在途中和抵京时，均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由亚东启程的两代表转道印度途经香港，于4月26日抵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于4月29日开始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

5月23日，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共十七条，故今常被简称为《十七条协议》。5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协议。《十七条协议》由一个前言和十七项条文组成，具体条文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行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十七条协议》，正确处理了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了西藏内部的关系，符合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得到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毛泽东主席在庆祝协议签订的宴会上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1951 年 9 月 26 日至 29 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对"十七条协议"进行专门讨论，认为该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十四世达赖喇嘛于 10 月 24 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 1951 年 5 月 23 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

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根据协议规定，胜利进驻拉萨。接着，人民解放军又先后进驻察隅、江孜、日喀则、亚东、阿里等地，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终于从西藏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了。

根据《十七条协议》精神，1952年9月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外事帮办处，由中央统一管理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务，取代了西藏地方政府原“外事”局的活动。到1954年，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签订有关协定，结束了印度在西藏的驻军、设立邮电、驿站等机构的特权，消除了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遗迹。

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取得的成绩，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

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打破了西藏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实现了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实现共同进步与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从此，西藏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注释：

①周恩来：《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1959年5月6日。



平定西藏叛乱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广大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西藏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但是，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极端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

195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定，毛泽东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①]1957 年 1 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向达赖、班禅及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强调六年不改，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 年）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可以说，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仁至义尽，作出了最大让步。

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为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直至发动武装叛乱。

1952 年 3、4 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趁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立足未稳，粮食供应严重困难之机大做反对协议的文章，暗中支持伪“人民会议”进行非法活动，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围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驻地，并准备发动武

装骚乱，妄图把解放军赶出西藏，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施。经中央驻西藏代表提出严正要求，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也作了应变的准备，最后，达赖喇嘛撤销了鲁康娃、洛桑扎西两人的司曹职务，西藏人民政府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这次流产的伪“人民会议”事件实际上是西藏上层反动派阴谋策划叛乱的一次预演。从此，伪“人民会议”的一些骨干分子从公开转入隐蔽，继续干非法活动。

1957 年 5 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稍后又成立号称“卫教军”的叛乱武装，公开打出“西藏独立”和反对改革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武装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破坏交通，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到处抢掠财物，杀戮干部，残害人民，奸淫妇女。

1958 年，青海、甘肃藏区也发生武装叛乱。甘、青、川等省藏区的叛乱分子纷纷窜入西藏。这些叛乱分子在“四水六岗”的统一组织下，暗地酝酿在西藏进行武装叛乱。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与叛乱分子狼狈为奸。他们在支持和参与各种叛乱活动的同时，积极扩充藏军，使藏军的人数由 1951 年的 1 400 多人，增加到 1959 年 3 月的 3 000 多人，并不断从国外运进武器弹药，装备藏军，使藏军成了叛乱活动的骨干力量。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西藏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从维护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大局出发，将各处发生的武装叛乱情况及时向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通报，要他们负起责任，平息叛乱，并防止叛乱的再次发生。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却把中央仁至义尽的做法视为软弱可欺，散布“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平叛”，“他们不敢动一下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等等。他们对中央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表示要按中央的指示办，承认叛乱是错误的，其暗中给叛乱分子充实人员、武器，纵容、支持、鼓励叛乱。

1959 年 3 月，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经过精心策划，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借达赖喇嘛准备到西藏军区看戏之机，挑起事端。2 月 7 日，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提出：要到西藏军区看文工团演出。邓少东等当即表示欢迎，并请达赖确定演出时间、地点，同时将达赖的这一愿望告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等噶伦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等人。3 月 8 日，达赖确定 3 月 10 日下午 3 时到西



藏军区礼堂看演出。

3 月 9 日晚，拉萨米本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次日晨，叛乱分子胁迫 2 000 多人去罗布林卡，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叛乱分子还打伤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才旺仁增，用石头将爱国进步人士、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嘉措活活打死，并拴在马尾上拖尸到市中心示众。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武装叛乱。

他们的预谋是，先向达赖喇嘛灌输汉人要消灭宗教、杀活佛的“消息”，使达赖喇嘛产生恐惧心理而自动设法逃走。若此种办法不能奏效，则在拉萨搞起骚乱，利用骚乱活动使驻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自卫的机会，采用强制的手段，把达赖喇嘛弄走。

3 月 10 日晨，有 2 000 多人涌向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西藏军区。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门口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打死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嘉措。上千人手持小白旗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等反动口号。这时，罗布林卡与拉萨市区之间的正常交通被叛乱分子阻断。他们违反达赖喇嘛的意图，使本来准备去军区看戏的达赖喇嘛没能如愿。当日下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提出同中央决裂，要为争取“西藏独立”搞到底。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街头张贴布告，声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当天晚上，在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小股向市区集结，同时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

对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蓄谋已久的分裂行径和叛乱活动，党中央早有察觉，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力争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叛乱发生后，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西藏工委：“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为充分。”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前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分裂。”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十分克制，采取了后发制人。3 月 15 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致信达赖喇嘛，争取摆脱叛乱分子，珍重自身安全。规劝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制止叛乱。但西藏地方政府把

党中央的指示置于脑后，叛乱活动有增无减。

3月16、17日，他们以“西藏独立人民会议”的名义，连续给在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孜本发去两封密电，声称藏历2月1日（公历3月10日）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请予宣布，让一些外国和国际组织“立即派代表到西藏调查观察，以设法谋求其支持”。17日晚，达赖喇嘛随噶伦索康、柳霞等叛乱头目一起逃出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他们又逃往印度。

19日凌晨，叛乱分子在拉萨调集7 000人，抢占了市内各要点和坚固建筑物，并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及市郊各要地构筑工事，把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以及其他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包围。他们在市郊割断电线，破坏桥梁，向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开枪射击。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及其他机关单位发起了全面攻击。至此，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全面爆发。

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达赖要叛乱的阴谋从1955年由北京回去后就开始了。1957年初他从印度回来，到1958年布置了两年。”1959年逃亡国外后，十四世达赖及其政治集团更是公然成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公开宣布“西藏独立”，重新组建叛乱武装，在中国边境进行多年的军事袭扰，在国际上长期从事反华活动，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策动多起骚乱事件，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和平解放的路堵死了。西藏广大僧俗群众对为非作歹的叛乱分子深恶痛绝，他们强烈反对违背历史潮流而动的叛乱分子，纷纷要求解放军早日平息叛乱。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再三规劝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改弦更张，不要成为千古罪人。但是他们利令智昏，不听忠告，错误地估计形势，依仗着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一意孤行，拒绝党中央的警告和挽救，执意要破坏民族团结，分裂与背叛祖国。

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严重情况下，为维护国家统一，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叛乱分子发起全面进攻数小时之后，于3月20日上午10时，奉命进行反击。平叛部队在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指挥下，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在西藏劳动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积极参加和大力支持下，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叛乱武装实施进剿和清剿。仅仅用两天时间，便一举歼灭了集结在拉萨地区的叛乱武装，平息了拉萨的叛乱。



3 月 28 日，鉴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走上叛国的道路，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责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在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下，一面继续进行平叛，一面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百万农奴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的权利。

4 月 4 日，平叛部队以 4 个多团的兵力，分五路向山南地区进剿。经十几天奔袭作战，歼灭山南部分叛乱武装，粉碎叛乱武装的第二个指挥中心，截断了外国势力援助叛乱武装的主要通道，取得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由于对叛乱武装全面溃退的情况估计不足，未能全歼山南地区叛乱武装主力，其一部逃往国外。

经过 1959 年的平息拉萨市区、山南地区、纳木湖、麦地卡和昌都等地区的武装叛乱，西藏各主要地区和交通要道沿线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但边沿地区还有叛乱活动，尚有叛匪 2.5 万余人。他们同外国势力勾结，帝国主义空投武器弹药给予接济，在空投特务的操纵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于是从 1960 年起，平叛部队对边沿地区开展平叛斗争。对无大股叛匪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肃清叛匪，实行民主改革外，乃集中优势兵力对重点地区实行进剿。部队以远程奔袭、分进合击的方法，控制主要要道，切断叛乱武装逃路；运用先包围后争取、争取无效后再打、边打边争取的原则，对投降者一律宽大处理，实行不杀、不斗、不关、不判的“四不”政策，扩大了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叛乱武装中大多数人员投降。

至 1961 年底，西藏地区延续近 3 年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平叛斗争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正义斗争，所以得到了渴望翻身解放的西藏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得到了广大上层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藏族同胞的有力支援，是取得平叛斗争彻底胜利的保证。

平叛斗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国外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开辟了道路，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 6 册，265 页。

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召开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一次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次会议，是我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一些“左”倾错误的开端。为了区分这次郑州会议与 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的另一次扩大会议，所以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郑州会议”。

郑州会议是在经济工作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的背景下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调动全国人民的总热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摆脱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忽视客观规律，犯了相对严重的“左”倾错误。

同年 8 月的北戴河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不但对于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梦想表示了错误的态度，而且还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例如，1958 年要生产钢 1 070 万吨比 1957 年翻一翻。在这个“以钢为纲”的口号下，一个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1958 年 8 月，河南省组织 577 万人参加大炼钢铁，要求年产量达到钢 30 万吨、生铁 150. 9 万吨。当年实产钢 3. 17 万吨、生铁 22. 9 万吨。在农业秋收大忙季节，农业第一线的强劳力被抽去大炼钢铁，造成这一年的农业丰产却没有能够丰收。这样不但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也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

在大炼钢铁的同时，以“一大二公”为指导思想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一哄而起。到 10 月底，全国原有的 74 万多个农业社，合并成 2. 6 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 1. 2 亿户，占总农户的 99% 以上。在人民公社



化运动中，由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搞了“穷过渡”，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也发展起来，给农村中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立即召开一次纠正“左”倾错误的大会，就显得尤为必要。

对于这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大规模蔓延全国之时，毛泽东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并于1958年10月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一些农村。他先后派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到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田家英、吴冷西等分别到新乡县七里营一乡一社和修武县一县一社作调查。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发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许多混乱思想，对于实现全民所有制、废除商品生产操之过急。他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同志做说服教育工作，使大家冷静下来，“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①]，为此，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势在必行。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到达新乡市。在新乡听取了新乡地委负责同志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钢铁”等问题的汇报后，他接见了新乡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当夜乘专列到达郑州。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9个省省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在开会过程中逐步增加，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陈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李富春、谭震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胡绳，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会议开始，只请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张承先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史向生等五个省的负责人，后来又通知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四个省及中南协作区负责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华东协作区负责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西南协作区负责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东北协作区负责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红旗杂志社

副总编辑李友九也参加了会议，共31人。会议的地点分别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停在郑州市东郊）和省委第二招待所西楼会议室。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正确意见和具有重要的长远意义的理论观点与政策思想。

召开郑州会议的最初目的是想研究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提出对于旧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应该加以修改，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具体日程是：

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9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听取了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②]

11月5日的会上，柯庆施、史向生相继就关于城市办人民合作社问题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进行发言。柯庆施主要谈到了城市里的混乱现象，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在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省里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



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③

11 月 6 日、7 日两天晚上，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出席了会议。在 6 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

11 月 8 日，毛泽东审阅《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对其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11 月 9 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左”的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还主张扩大调拨，扩大商品生产。毛泽东认为：“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 1967 年要达到年产 4 亿吨钢。对此，毛泽东表示怀疑。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

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④

11 月 10 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这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

总之，这次会议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针对当时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提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线。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也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曾经多次批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毛泽东指出，徐水县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是十分错误的。徐水之所以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制，是因为“不能作全国的调拨”，既然连全民所有制都不是，徐水的所有制就只能是一种刚刚碰到社会主义“门槛儿”的经济组织形式，距离共产主义还有一个相当的路程。这样一个徐水县，怎么能当做全国的表率？这样的典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毛泽东最后强调说：“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强调，典型还是要搞，榜样还是要树。

就在毛泽东批评徐水的同时，中国又冒出来一个比徐水县还冒进的山东范县（现属河南省）。10 月 28 日，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代表县委，在全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提出了要在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

同时，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用一首诗概括了范县的共产主义美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 月 6 日上午，毛泽东看到了桌上摆着的新送来的《宣教动态》，“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看过这个文件，并作了批示。



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但是，毛泽东对范县的情况究竟如何没有太大的把握。“大跃进”运动以来，说大话的人太多了，特别是看了许多关于徐水的反映之后认为，大话和假话说了不少，真正能够落实的东西甚少。因此，毛泽东认为，徐水县不能再作全国的表率了。于是毛泽东在批语中提出，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之后，希望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去范县了解实际状况。

毛泽东并在这一期《宣传动态》上批了“照发”两个字，作为郑州会议的文件。

同上述两种界线相联系的，是党内以陈伯达为代表的某些人，主张废除商品、货币。他们错误地认为，人民公社既然已经是全民所有制了，产品就可以由国家直接予以调拨。

毛泽东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

毛泽东指出，有些人向往共产主义，就不要商业了，并且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更“左”，主张立即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

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中国人民不能避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极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的问题。

毛泽东针对这种害怕商品生产、避开商品生产的做法发表意见说：“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 1954 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 830 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

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毛泽东特别强调，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中国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同时，毛泽东也肯定了按劳分配，指出要保护按劳分配。

其次，这次会议还起草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和与会者对于这一文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且详细地讲到了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家庭、商品、资产阶级法权、高指标和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对四十条表示越来越高的怀疑。

《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提出，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要达到5 000斤至10 000斤，棉花亩产要达到500斤至1 000斤，并且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即把全国土地平均分成三份，三分之一用来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用于休闲和种植绿肥，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树和种草。

这些想法都是理想的社会主义，是人们的美好向往。但是这些想法却严重脱离实际。高指标和非科学的设想，理所当然地会落空。

第一次郑州会议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支配下，主观主义膨胀的情况下，对一些正确措施和具体经验不顾客观实际，任意拔高提出的。

在此文件进行反复讨论期间，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

另一个文件是《郑州会议纪要》。这一文件在11月7日形成初稿，经过毛泽东修改，最终定名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



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这个决议草案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不过，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通过这个决议可以看出，中国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这两个文件都没有定稿下发，而是决定提交到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讨论审议。

再次，为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恩、列、斯对于商品和价值法则等经济理论问题的观点，以纠正一些错误认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11 月 9 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毛泽东还亲自和与会者一起，认真地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并且，这次会议还针对当时全民大炼钢铁、大兴水利、深翻耕地等连续苦战需要休整的实际情况，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着积极意义。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在完全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讨论和认识问题的。所以，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会议认为，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这又引发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觉，以为中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因此还继续提出了一些高指标，结果适得其反，闹出许多笑话。这次会议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也还没有认识到，因此这次会议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这次会议仍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划清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种过渡阶段的界限，明确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关于两种过渡界限的理论论述，不仅在实际上否定了当时出现的不符合生产力水平的两种过渡，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理论，为党纠正

"左"倾错误奠定了基础，而且它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长期的重要的基本指导方针。并且对澄清当时存在的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我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一些"左"倾错误的开端。

第二，否认了取消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国家是个商品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我们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列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而且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制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的指导作用。

第三，在举国上下进行"大跃进"、全党绝大多数干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能够认清形势和错误，在进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同时，带领全党进行思想上的纠正和清理，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永远值得全党同志学习和发扬。这对于以后在党内正确、即使的纠正各种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形成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反思的光荣传统。

注释：

①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1958 年 11 月 9 日。

②③④《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版。

参考文献：

[1] 逄先知，李捷，《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纠"左"成果》。



武昌会议

1958年初以后的“大跃进”，特别是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给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给“大跃进”降温，同时也为了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给八届六中全会做准备，党中央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这次会议是第一次郑州的继续。

在总路线的指引下，1958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全国上下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下，决心赶上英国，并同苏联“赛跑”。全中国人民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奋斗，向共产主义跑步“冲刺”。

1958年秋，由“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而引起的矛盾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暴露。武昌会议前，毛泽东批阅了反应农村问题的几件材料，反映出“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一些情况。如11月10日批转《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的报告》。11月14日批发了新华社《内部参考》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症也有发生，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所未有的，已波及到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食堂办的不好，社员得不到休息，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

在“大跃进”的推动、影响下，人民公社这一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都犯了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的错误。这两次运动在运动进程、发动方式、造成影响和后果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人民群众极度向往共产主义，想要尽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摆脱原来那种贫苦的生活，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到生产力的水平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盲目地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难免出现错误，造成很大的浪费。在1958年9月至10月

间，许多地区公开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日程，或者宣告人民公社已经是全民所有制。

河北省徐水县提出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山东省范县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河南省一些公社宣布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许多地区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

1958年10月中旬以后，毛泽东视察天津、河北和河南，并派专人下去调查。毛泽东在调查中和在专人调查的报告中发现，原来对人民公社的一些设想是行不通的，受到农民的坚决抵抗。于是，毛泽东下决心调整政策。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之后的大办人民公社，不仅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还带来一系列的困难。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缺少粮食。生活用品的供应也出现了紧张的局面。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乱子出了不少，与秋冬季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这些文字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广泛得多。

毛泽东首先从办人民公社的一些混乱中发觉到，如果让人民群众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长期存在下去，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于是，毛泽东就立即动员干部群众，及时纠正错误。他认为有必要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这一大堆混乱的思想中，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给“大跃进”降降温。

党中央召开的武昌会议，在思想和组织上是有准备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不久的这次会议，也经过了全面的筹备准备。武汉市委在接到中央要在武昌召开重要会议的通知之后，武汉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谢滋群召开市接待人员动员会。接待人员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武汉市委机关干部，二是公安系统人员，三是省市外事办公室（主要是宾馆、车队人员），会议地点定在洪山宾馆。

1958年11月21日，武昌会议正式召开。除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书记处的部分成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也都参加了武昌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除周恩来、朱德、林彪外，其他的常委都参加了武昌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工农业生产指标问题，目的是继续第一次郑州会议进行降温。毛泽东指出，四十条容易因为被认为“务虚名而受实祸”，到最



后虚名得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所以，毛泽东还是建议要谨慎一点，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关于四十条纲要的处理办法有两种，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办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最后会议决定交由八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

武昌会议在纠正“共产风”的同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和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关问题。会议首先传达了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随后毛泽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讲了话。毛泽东的讲话的主要内容有：

其一，不能作假。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还是号召反对做假，直接批评了此时盛行的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这有利于降温工作的进行。

毛泽东指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

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

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

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

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

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①

其二，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其三，要"压缩空气"，降低高指标。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话的另一主要问题，就是降低自 1958 年以来过高的指标。这也是武昌会议所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21 日，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毛泽东就说："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压缩一下。"根据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同志的意见，初步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



毛泽东在21日的会议上就提出要不要这么多钢和怎么样才能生产出这么多钢的问题。他说：“1959年钢的指标，北戴河会议定为2 700万吨至3 000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去年535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1 070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6 000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邓小平说：“明年任务，各省自议。3 000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

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认真加以考虑，不能盲目下结论。薄一波对工业生产的情况比较熟。他说，1958年计划生产1 700万吨铁，而实际上估计有700万吨。尽管如此，能炼钢的估计也就是200多万吨，仍有近500万吨是虚的。

薄一波分析形势说，钢产量达到1 100多万吨，在数量上是可能达到并超过的，但好钢不会超过900万吨。薄一波的这个估计是接近事实的。不仅如此，薄一波还说，1959年钢产量定为3 000万吨，即要翻2. 5倍，很难达到。

毛泽东提议，降低钢铁生产指标，把1959年产钢3 000万吨降为2 200万吨。尽管如此，毛泽东心里仍无把握。

11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11月22日和各区同志商量一下究竟1 800万吨钢铁有无把握的问题。各区的同志所提的根据不可信，如果没有充分的根据，钢铁产量指标还要减到1 500万吨。

毛泽东从钢铁生产谈到了有计划、按比例的问题。毛泽东说，要求以钢铁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

毛泽东说，领导干部在实践中要有计划、按比例慢慢地进行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然后去熟练地运用它。”

除了提出压缩钢的指标外，毛泽东提出，还有什么任务实在压得喘不过气来，也可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会前，谭震林、廖鲁言向中央提交了有关农业生产安排的报告，提出1958年冬、1959年春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要搞1 900亿土石方，这个工程量相当于1958年春的近4倍。毛泽东认为要减轻任务，他说，工人群众不仅要干活，还要吃饱饭，睡足觉。“吃饱饭、睡足觉”是群众的生活问题，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引起重视。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批发了云南省委的一个报告。1958年春夏期间，云南省因为领导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群众坚持连续苦战，吃不饱，睡不好，

抵抗力下降，发生了因病死人的严重情况。

毛泽东在批语中批评一些干部不善于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并指出，这“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相关”。

毛泽东在会上也提出了两条解决的方法，即任务不要压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23 日，毛泽东又说：“我说把空气压缩一下，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变，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变成液体和固体形态。”毛泽东还强调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三个结合”，再加上“土洋”结合。在毛泽东看来，空气只是过于膨胀了一些，压缩一下就好了，不是减少“空气”，更不能改换“空气”，总路线还是要坚持的，三个红旗必须高举。因此，农业的指标却没有降下来。会议讨论批准了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报告建议“1959 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公布数字可以订为 10 500 亿斤”，要求“掀起一个比 1957 年冬季更高的生产高潮，保证 1959 年更大的跃进”。[②]

其四，关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有所退却，他提议应该放慢一些。毛泽东还批评了北戴河会议上的错误决定，他说：“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 3、4 年，南方多者 5、6 年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办不到，要改一下。现在就是太快，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错误。照有人的意思是趁穷之势过渡，认为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不然就难过渡。看来过渡还是时间长点好，商品时期搞久一点好。”毛泽东认为，这是对全局考虑不够的表现

毛泽东在讲话中承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大概是“冒失鬼”。但是，会上有不少人的意见仍然是快些过渡。对这种意见，毛泽东似不以为然。他说：“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需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生活水平。他认为，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 80 元，大概在六 60 到 80 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 60 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 74 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



薪。5 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 80 元，穷得要命。苏联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开会的前几天，即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提出苏联未来 15 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毛泽东让与会者看了这个提纲。

毛泽东说，苏联已经建立 41 年了，还准备搞 20 年。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经有了 5 500 万吨钢，1 亿吨以上的石油。他还那样"谨慎"，还要 20 年过渡。中国过渡到共产主义，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同时，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考虑，毛泽东认为还是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好。毛泽东认为，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即 1971 年），苏联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不过中国很有可能在此之前就具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了。中国虽然已经准备好了，但也不能进入共产主义。中国至少要等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两三年以后再进入。

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虽然承认苏联的基础比中国强，但是又以为中国有可能先进入共产主义。这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国向共产主义过渡所需要的时间远比他想象的要长，更没有认识到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武昌会议对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的决议草案》和 1959 年经济计划都进行了讨论，然后将两个文件都交给八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审议，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作了内容上的准备。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承认，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领导干部要真正掌握客观规律，并熟悉地运用它，还是有问题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客观的东西，有它的客观规律，能速则速，不能速就不速，不能勉强。

这次会议，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为克服当时工作中急躁冒进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会议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指出，北戴河会议提出 3、4 或 5、6 年即可过渡，这时的估计比北戴河会议的说法延长了，而且说这个时间"难以设想"，这就遏制了"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势头。当然要看到，毛泽东仍然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难以设想"，比如 10 年、15 年或 20 年、30 年，而没有认识到从现在起到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

历漫长的过程。还要指出，毛泽东一方面承认苏联的基础比中国强，另一方面似乎又以为中国有可能先进入共产主义，思想上还是有急于求成的成分。

其次，经济上的“左”的错误，实际上也会推动政治上的“左”的错误发展。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产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到武昌会议又有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波助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武昌会议当然也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系统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构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链条，即经过一步步发展，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再次，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他在讲话谈到消灭阶级时说：“消灭阶级的两种情况：一种的经济上的，容易消灭，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但是作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由此他又说：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消灭。如果宣布消灭，地主都是农民了，资本家都是工人了，有利无利？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个剥削阶级”的概念时，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是隐含在他作出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之中的，这两个标准还没有显性化，更没有归纳成为明显的概念。武昌会议则沿着成都会议的逻辑轨迹，将隐含在“两个剥削阶级”中的政治、思想标准显性化了，并且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明确概念。这个概念错误的首先在于，没有反映正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把已经消灭和正在消亡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依然作为存在的实体。其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学说，把非经济标准（政治、思想标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偏离。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又推进了一步。

注释：

①②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 11. 23。

参考文献：

[1]《珍贵时光——参加中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接待工作散忆》，李少明，武汉文史资料，2002. 6。



八届六中全会

继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之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党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弥漫全国，并暴露出诸多问题之际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在武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之后召开的，这两次会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混乱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也开始着力于纠正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可以说，这两次会议为接下来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做了准备。

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经过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准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等中央委员84人，候补中央委员82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不提名毛泽东作为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会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会议主要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并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共有 8 个部分的内容。《决议》对于过去几个月中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同时《决议》也集中反映了自郑州会议以来党中央在纠正公社化运动错误方面的成果。《决议》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反对和纠正了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以及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并且，《决议》还重申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宣布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

1958 年至 1959 年为人民公社兴办的初期阶段，采取公社一级所有制，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一大二公”的生产体制、“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等，这些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在公社化运动中，急于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阵风潮。《决议》中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决议》进一步明确地告诫全党，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事实上，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对此，《决议》进一步强调：

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武昌会议时，曾有人提出要“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决议》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并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这



“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决议》强调，其实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在阐述具体问题时，《决议》说：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在人民公社的社员收入中，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为了促进社员劳动的积极性，也为了使社员在生活中的复杂的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公社必须努力使社员所得的工资逐步增加，并且在若干年内必须比供给部分增加得更快。即使已经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以后，由于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足以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在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仍然将保留按劳分配的制度。

《决议》说，各个公社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同别的公社和国营企业实行必要的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换。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对于人民公社的生产、分配等具体的原则，《决议》强调指出：

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④]

针对一些公社把社员的私有财产归公的做法，《决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此外，《决议》对人民公社的生产方针、组织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民主办社、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同时也向各级党委提出要紧密结合生产任务，在冬春两季用五个月的时间，对本地区的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教育、整顿和巩固的工作。

其次，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初步纠左”的大环境下，总结了1958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提出了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调整的计划。为了解决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摆脱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浮夸成风这一问题，会议在听取了李富春的说明之后，通过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决议》提出了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努力使各项指标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并初步降低了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如降低了基本建设的投资，由原定的500亿元降为360亿元，钢的产量指标由原定3 000万吨降为1 800万吨。但是，粮食指标仍未有所下调，反而有所上升，要求在1959年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为10 500亿斤，比北戴河会议上定的8 000亿斤到1万亿斤升了500亿斤到2 500亿斤。棉花1亿担，比北戴河会议定的9 000万担到1亿担上升了1 000万担或持平。因此，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左”倾错误仍然存在。

再次，全会经过充分讨论之后，于12月10日，通过并发布《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确定毛泽东专作党中央主席。这样可以使他更能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但又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在将来，如果出现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这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

全会讨论了关于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村贸易体制问题，通过了《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的决议》，对农村商业工作、财政工作、银行工作提出了若干改进的意见。

八届六中全会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全会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和平力量大于战争力量，因此就使战争的制造者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帝国主义阵营也正在逐步走向四分五裂。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阵营更加壮大了，团结得更加巩固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苏共提出的1959年至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它的实现将大大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人类制止战争的和平事业。

会议期间（12月6日），毛泽东提出，对于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要着重谈一谈。

在“大跃进”的过程之中，一些地区确实发生了一些强迫与造假的坏现象。毛泽东说，比如湖北省枣阳县，文盲一个未消灭。但是，县委一布置，限3天时间内消灭。结果，县委登报说文盲被消灭了，成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针对为什么造假比强迫好一些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造假并非是文盲未被消灭；而强迫就要打人、捆人、劳改。

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布置任务或者听取群众反映，都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同时，毛泽东对于经济工作中的浮夸风进行了批评，并指出，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做愈细致，一定要尽可能的接近实际或者符合实际。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是党自“大跃进”运动开展以来，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议围绕“反冒进”“纠左”这一问题，通过了一系列的文件和决议，为各项工作的初步“纠左”做出了努力。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划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对于澄清思想和实践中的混乱思想，纠正在实践中的“一平二调”、“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有着积极作用。《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提出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既要反对保守，破除迷信，又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这些文件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它是当时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力武器，是推动当时工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

不过这次会议对“左”的错误纠正的还很不彻底，全会尚未看到人民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存在的规模偏高问题。管理体制仍是实行一级经济核算，公社统一负责盈亏。全会继续强调供给制的“吃饭不要钱”，是“共产

主义因素"，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等。这就难以解决好平均主义、"共产风"等弊端。

全会通过的决议仍然肯定了不少"左"的东西，如《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举办公共食堂、乡村居民点、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这些都脱离了客观现实，仍有"左"的倾向。而且在《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制定的部分经济指标仍然很高，强调继续跃进。所以说，八届六中全会虽然是一次"降温"的大会，它对于纠正前进中的一些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仍未摆脱跃进的倾向。

尽管这样，全会还是初步开展了从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人手，逐步明确生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编者注）为基本核算单位，并提出了生产小队的所有制问题。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陈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09。

[2]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3]《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

[4]《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1958. 12. 10。



第二次郑州会议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是继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召开的又一次纠“左”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重点是强调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问题，以及继续压低 1959 年经济指标问题。同时，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到 1962 年 2 月，人民公社逐渐实行了“三级所有”、“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认真贯彻会议精神，普遍开始了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的工作，虽然刹住了急于向全民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但人民公社内部仍严重存在着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同时，由于向农民征购了过头粮，出现了农民瞒产私分，全国闹粮食风潮，完成了征购任务的省市只有 7、8 个城市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民生产情绪不高，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而且，在整社过程中又对生产队干部作了反对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致使党和政府同农民的关系日益紧张。

1959 年 2 月下旬，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和解决当时农村中瞒产私分等问题，亲自到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进行调查，以便能够深入实地了解更多的情况，并将自己思想上酝酿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同这些省的负责人交换意见，然后三月到上海开会，作出决定。毛泽东在南下之前，批转了赵紫阳在广东湛江地区雷南县（后并入雷州市）指导反瞒产私分粮食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感慨颇深，促使他思考了很多问题。因此毛泽东在思想上初步酝酿了解决瞒产私分问题、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本身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在现阶段应当是以生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所有制为基础，即部分的社所有、基本的队所有。在

河北、山东、河南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毛泽东将这一方案同三省的负责人进行了讨论，并交换了意见。在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后，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从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着手，进一步开展纠正“共产”风的运动，于是，决定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是怀着一定程度的信心和期望的，他希望能尽早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突出的问题解决掉，以使得春耕生产正常进行。按照原计划，这次会议只开 3 天，即 1959 年 2 月 27 至 3 月 1 日。其日程是分别有两天与长江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最后集中起来开一次会。但是，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得并不像毛泽东所预期的那样顺利，不仅是一些省市委书记的思想阻力较大，连个别的中央负责人也同毛泽东的想法有相当的距离。

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主持下，于 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同志 20 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27 人。具体人员分别为：中央政治局委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康生，中央书记处书记谭政、黄克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中央监委副书记肖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李景林，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邵式平，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子厚，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及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等 47 人。这次会议是分批开的，自始至终没有开过全体会，参加会议的人都是中央派专飞接送的，会议地址是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停在郑州市东郊）和省委第二招待所西楼会议室。

会议开了 16 次，毛泽东主持在专列上开了 7 次，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在省委二所西楼会议室开了 9 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讨论解决人民公



社的一些重大问题，最后形成了《郑州会议记录》，下发全党。毛泽东作了多次重要讲话，重点是强调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会议主要研究了如下几个问题：

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这一核心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公社所有制前进得远了一点，农村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

会议针对党同农民关系紧张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讨论过程中，仍有人认为农民瞒产私分还是错误，本位主义必须批评；有人说还是要一点集中的观念，有一个究竟怎样带领农民更快地进到全民所有制的问题等等。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我们过去设想，一下子就是公社所有了，没有想到现在基本上还不是公社所有，而是生产队所有。"

在会上，毛泽东总结了人民公社运动在开展一年来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他说："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犯了超前的错误。

他还指出，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①]

这样一来，下面的基层干部也就把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这实际上否认了此时还存在于人民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

从我们目前和农民存在着的紧张状态来看，我们必须透过这些现象看出

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毛泽东说，“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②]现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即“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目前我们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说，由基本的社有、部分的社有制，到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就是说实行相当于原高级社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只有像这样的坚决退回来，才能真正缓解同农民的紧张关系。

他强调生产队的所有制是“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人民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三级核算应当“以队的核算为基础”。[③]这就有力地批评和纠正了刘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由于在整社过程中，曾对生产队干部作了反对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因此也导致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侵害。面对在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运动中，该如何处理好关系到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直接利益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说：“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④]。他要求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列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⑤]。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方针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关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共产风”问题，这也是会议要研究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就刮起了一阵“共产风”。“共产风”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



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可以认为是，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

2月27日上午开会前，毛泽东同洛阳、新乡、许昌、信阳四位地委书记的座谈中，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现在上下顶牛，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是反“左”。

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批阅山西省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时，在决议中提到批评本位主义的地方写了一段批语。他指出：“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小队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⑥

为克服这种“共产风”，必须纠正党在工作中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毛泽东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

毛泽东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等价交换、否定价值法则的思想在内。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为克服这种平均主义倾向，要反对剥夺农民，并强调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不要太高。

第二次郑州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

针，即五十六字方针，这个方针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14句话对人民公社内部的体制和基本政策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于纠正“共产风”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较大的作用，是纠“左”的继续，也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重要成果。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在清理“共产风”时，过去的旧账一般不算的意见。

全会通过的《郑州会议记录》明确规定了人民公社在管理体制方面要统一领导，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大队为基础；在统一分配上，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之间可以有合理的差别，要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

关于纠正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党所犯的“左”倾错误问题，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

1958年夏天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说毛泽东应该对过早地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不过对于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等“左”倾错误，也是毛泽东最早觉察和认识到的。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毛泽东主动而真诚地承担了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

关于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左倾错误，毛泽东在讲话时说“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对此，他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在带头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首先否定和纠正自己思想上存在的并且倡导过的某些“左”的东西，还要克服党内的众多批评意见和思想阻力，争取达到全体一致的认识，是十分难得的。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我们前进的过远一点，忽视了客观规律，他提出在现阶段公社的所有制应当以生产队的所有制为基础，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是纠“左”的实质性措施。作出这一决断是需要政治勇气的，因为这个方案在当时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倒退”。这正如他所说的，“许多事情我们还正在试验”，由于缺乏经验肯定要犯一些错误，“问题在于有错误要发现得快一些，纠正得快一些”。[⑦]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错误的郑重的态度。

除此之外，第二次郑州会议还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职权范围作了具体划分。规模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和生产大队，是人



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有权按照公社的计划和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兴办和管理小型工厂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和公共福利事业，搞好劳动管理。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会议的精神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随着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调整，各地又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直接掌握着这一工作的进行，以党内通信的方式随时提出指导性意见。

3 月 10 日，毛泽东到湖北视察时，通过批阅各省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发现一个问题，即以河南、湖南两省为代表的省主张以生产大队（即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以湖北、广东为代表的省则坚决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个分歧的出现是因为，第二次郑州会议说的“队为基础”就是指两级，没有明确，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错误，导致两种不同主张的出现。

为了及时地纠正这个错误，毛泽东在 3 月 15 日写的党内通信中强调说：“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毛泽东还在《党内通信》中纠正指出：“《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

3 月 17 日，毛泽东在另一封《党内通信》中又进一步提出：“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变化是很关键的。这对于完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正确看待生产小队的权限，纠正“共产风”非常有益处。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还特别告诫基层党组织说：“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方式提出的，目的在于展开讨论。

第二次郑州会议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五十六字方针，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方针中提到的“统一领导，队

为基础”，明确规定了人民公社目前必须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这是承认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阶段，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要承认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必要的过程。其中的“等价交换”一条，是根据毛泽东后要求加上去的，毛泽东指出，“等价交换”就是要在人民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之间在物资和劳动力两方面都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允许无偿占用。这对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对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是一个重要的保证。毛泽东所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思想，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走在全党前列，带领全党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已触及到一些实质性问题。并且提出实行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找寻到一个出口，抓住了当时人民公社的一个主要问题、一个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问题，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倾向、过分集中倾向、否定等价交换原则等问题，才有可能顺理成章地加以解决。还为进一步调整人民公社的内部体制和有关政策，打下了一个重要基础。

虽然第二次郑州会议认识到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公有水平过高这个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调查到实情，毛泽东在原则上依然肯定并且鼓励人民公社体制，而且认为实行的基本队有的公社所有制经历一段时期必然要改为基本社有的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只决定把所有制的公有水平降到以原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础，所有制的规模仍过大。其次，实行相当于原高级社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对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改变和进步，但规模依然偏大，不完全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觉悟水平，所以后来又改为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小队。加上供给制问题没有解决，纠“左”不可能深入彻底。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局限性。

注释：

①②③《郑州会议记录 ·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128页，第127页，第125~127页，第128~130页。

④⑤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3月15日、17日。

⑥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评）。

⑦毛泽东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9年5月22日。

八届七中全会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是为了继续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调整生产指标、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而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进一步整顿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调整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表明我们党在纠正“左”倾错误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1958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人民公社化运动又普遍兴办起来。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公社当成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火热的“大跃进”运动、高指标、“放卫星”等“左”倾思想的影响，为刮起“快速迈进共产主义”之风奠定了基础。从第一次郑州会议起，中共中央就一直在进行着纠正各种错误的运动。

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一个多月来，全国各地普遍贯彻会议精神，会议的决定下达到广大的农村，得到了公社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全国纷纷开始结合整社工作，以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共产风”问题。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问题，在3个月的整社过程中，“大跃进”、“高指标”、“共产风”的错误进一步暴露出来。

在关于清理“共产风”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时曾作出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在接受了浙江省和湖北省的意见之后，中共中央于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决定“旧账”是要算的，要彻底退赔。因为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剥削农民，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允许的。

出席八届七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81人，候补中央委员80人。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听取了薄一波作的《关于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

作的《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说明》，李富春作的《关于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说明》。全会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全会还讨论并决定了准备向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

会议重点讨论了：（1）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2）《1959年国民经济草案》；（3）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在全国各省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围绕着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调整，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原则的规定。在会议上起草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称《纪要》），总结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成果，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作了一系列原则的规定，并且进一步解决了一些“左”的问题。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纪要》作为中央的指示正式提出，要“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建立新账”，“原则上过去的账都要结算，有些不易算清或者无法处理的，算一算也有好处，对群众有个交代。”

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毛泽东在3月30日审阅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一份报告的时候就写下了一段重要的批语。毛泽东在这段批语中指出：“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4月3日，毛泽东又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给他的信及转来的报告上明确指示：“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全体会议检查了上次全会以来的农村人民公



社的整顿工作。全会指出，三个多月来的整社工作是良好的、有成绩的，1958 年 12 月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正在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全会对于在整社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且规定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全会讨论通过了 3 月下旬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 18 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主要研究的 18 个问题分别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确定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旧账”的清算和处理；国家银行和公社间的信贷关系问题；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众宣布；关于工资制；关于供给制；1959 年的粮、棉生产指标；关于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农村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十亿元投资的用途和分配；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穷社、穷队；关于开会方法；公社的管理机构；召开公社的党员代表；制定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准备工作。

《纪要》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政策。提出“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进行退赔”。纪要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纪要》规定的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在毛泽东和各界都比较关注的“旧账”的清算和处理问题上，《纪要》指出：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建立新账，这是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一项重要工作。原则上，过去的账都要结算，有些不易算清或者无法处理的，算一算也有好处，对群众有个交代。对于干部来说，算账，一方面可以使广大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又可以把干部中占小便宜、超支工资、挪用公款、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的情况揭露出来，可以挽救一批干部。算账还可以教会农民管理自己的公社，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公社和基本核算单位应当成立有负责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算账小组，实行发动群众和专门小组相结合的方法，同群众商量办事。哪些账必须细算，哪些账可以粗算，哪些先算，哪些后算，算清之后如何处理，都要经过群众讨论决定。

在算账中间，揭露出来的一些干部在财务上的问题，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性质，划清贪污和非贪污的界线，分别加以处理。要教育犯了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群众检讨，主动“下楼”，要做到少处分人，把处分的面缩小到最小限度。贪小便宜、超支工资、挪用公款的干部，只要愿意检讨，并且愿意退出不该自己所得的那些东西（一时退不出的可以分期付还），应当一律不予追究。有贪污行为的干部，只要愿意坦白，决心改正错误，除了必须追回贪污的东西以外，也应当从宽处理。

在关于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纪要》指出：各地人民公社在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的时候，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相当于原高级社的单位，有些地方是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或者管理区）。这是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做法。这种做法符合于郑州会议的规定，得到原高级社的干部和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因而是适宜的。也有少数地区，是以几个原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做法，如果群众确实同意，也是可以的；如果群众不同意，就要改变，千万不可勉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要求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即使勉强实行，终究是行不通的。

这里把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的规模明确规定为，相当于高级社，强调的重点与第二次郑州会议不同。这是又一个新的进步。

《纪要》明确增加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一节，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

关于这一问题，《纪要》指出：“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为了提高这一级组织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在少数地区，是以生产大队（或者管理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下面的生产队是包产单位。这种作为包产单位的生产，同样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事实上，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的权限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小队对于土地、牲畜、劳力等生产资料有固定的使用权，不得任意调动；二是小队有权对增产技术措施的实施作出决定；三是小队的超产收入，除按一定比例上缴外，其余归生产小队所有和支配。

这些新的规定，明确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一部分具体问题，对



人民公社存在的弊端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明晰和正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关键的，在指导思想上就准备避免急于过渡，尤其是准备避免急于由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克服公社、生产队规模过大、统一核算造成过分集中，贫富队拉平，损害群众经济利益的缺陷。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分析了国内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服坚持高指标的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做计划要留有余地。会议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规定，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有的中央委员曾提出利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公开修改一些过去宣布过的高指标，未能得到多数委员的支持。毛泽东肯定了陈云的正确意见，并表示赞成调整生产指标。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钢产量1 800万吨、煤产量3.8亿吨、粮食产量10 500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的情况而编制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对主要指标作了适当调整，

工业生产方面：钢产量仍然确定为1 800万吨，其中好钢1 650万吨（1958年的1 100万吨中好钢为800万吨）；原煤确定为3．8亿吨。同1 800万吨钢和3.8亿吨煤的指标相适应，计划规定：生铁产量由1958年的1 369万吨增加到2 300万吨，发电量由1958年的275亿度增加到400亿度，水泥产量由1958年的930万吨增加到1 250万吨。其他重要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如原油、木材、硫酸、烧碱、纯碱等产品的产量也将有很大的增长。上述这些产品在1959年增加的产量，都将比1958年所增加的产量为高。例如，1958年比1957年，生铁产量增加了775万吨，发电量增加了82亿度，水泥产量增加了244万吨；而1959年比1958年，生铁产量将增加931万吨，发电量将增加125亿度，水泥产量将增加320万吨。应当说明，在今年生铁和钢的计划产量中，包括一小部分土铁土钢在内。

农业生产方面：1959年发展农业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努力，争取粮食产量跃进到1.05亿斤，棉花产量跃进到1亿担，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关于粮棉增产的要求，并且使各类经济作物和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

都得到普遍的发展。

基本建设方面：1959年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计划为270亿元，比1958年的214亿元增长26%。计划规定，1959年建设的铁路，包括新的干线、支线、企业专用线和复线在内，共有5 500公里。因为1959年增加的货运量主要集中在现有铁路，因此，铁路的建设，将首先加强原有的线路。

运输方面：为了保证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继续跃进，1959年的铁路货运量计划为5.2亿吨，比1958年的3.8亿吨增长36%；交通部直属企业的货运量计划为3 500万吨，比1958年的2 800万吨增长25%。此外，各地方还分别规定了发展公路和水路运输的指标。

商业方面：1959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计划为650亿元，比1958年的548亿元增长19%。通过商业机构供应给人民的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水产品、盐、棉布、针织品、呢绒、卷烟和其他日用品，都将比1958年有所增长。

文化教育事业方面：计划规定，1959年高等学校招生25万人，在校学生达到83万人，比1958年增长25.8%；中等专业学校招生70万人，在校学生达到182万人，比1958年增长23.8%；高级中学招生65万人，在校学生达到152万人，比1958年增长28.8%。1959年的初中教育、小学教育、业余教育和扫除文盲的工作，都将由各地方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分别规定适当的指标。1959年的文化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事业、体育事业都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看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

总之，今年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有利条件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完成1959年计划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计划规定的钢、煤、粮食、棉花的生产指标，都等于1957年实际产量的三倍左右。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合计的钢的总产量不过1 667万吨，而1959年一年内就将生产1 800万吨。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粮食和棉花的生产，目前我们还缺乏必需的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抵抗自然灾害侵袭的力量还不强，要在1958年产量增长一倍的基础上，再增产粮食3 000亿斤和棉花3 362万担，任务的艰巨性也很明显。我们对于农业上可能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困难，应当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必须首先在战略上藐视困难，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继续跃进的计划已经定下来以后，主要的问题就



是要在战术上充分重视困难，克服麻痹大意和自满的倾向，抓紧时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去认真战胜困难。

与会者纷纷认为，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作了认真的考虑。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草案将由国务院提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中央委员会深信，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继续鼓足干劲，继续发扬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潜在力量，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

此外，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他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他指出，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定计划要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实事求是等。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他号召大家要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了坚持真理，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强调言者无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全体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这些候选人的提名将在同各方面协商之后，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召开，为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八届七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大会，全会通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总结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成果，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作了一系列原则的规定。《纪要》中对于毛泽东和许多人关注的“旧账”的清算和处理问题上，明确规定了几笔大账的处理原则，切实保证了干部和群众的利益。这表明了党中央的领导人带领全党发扬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能够坦率面对自身在工作中由于经验不足而犯的错误，并勇于承认和改正，是值得肯定的。

会议进一步整顿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调整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部分指标，表明我们党在纠正“左”倾错误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然而，由于指导思想不端正，纠“左”是不彻底的。比如《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虽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不过规定的粮棉依旧维持原来的高指标，其他农产品指标略有一些降低，但仍然规定了比1958年还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59年4月17日至4月29日在北京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委员总数共1 071人。第二届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

参加会议有中共党员60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40人、中国民主同盟40人、中国民主建国会40人、无党派民主人士20人、中国民主促进会20人、中国农工民主党20人、中国致公党8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8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人、中华全国总工会38人、农民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32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10人、合作社11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40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52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60人、社会科学团体20人、教育界42人、新闻出版界11人、医药卫生界40人、对外和平友好团体22人、社会救济福利团体12人、少数民族36人、华侨17人、特别邀请人士308人。

根据会议通过的议程，全体政协委员从这次会议起，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4月17日至22日，全体与会的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听取会议报告，并参加大会讨论。4月23日至29日，主要是研究讨论政协工作，通过有关决议。

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政协代表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所作的《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听取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闭幕式上，班禅额尔德尼委员就西藏问题发了言。

本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提案审查的



决议》。会议一致同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指出，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结起来，背叛祖国，发动了残害西藏人民的武装叛乱，这是全国人民不能容许的，是国法不能容许的。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决不容许外国人干涉。会议还一致热烈祝贺中央人民政府平定西藏反动集团叛乱的胜利。

会议推举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彭真等14人为副主席。

在列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们听取和讨论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委员们一致热烈拥护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和经验。

委员们认为，几年来我们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特别是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大跃进，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它表现了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为改变国民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面貌而斗争的伟大创造精神和英雄气概。

委员们以亲身经历或视察工作中看到的许多事例，向大会生动地描绘了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图景，也向与会者表达了自己从中受到巨大鼓舞的兴奋心情。

政协委员们认为，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委员们一致表示热烈拥护，对实现这个计划充满了信心。

会议认为：“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贯彻执行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而使1958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全面的大跃进。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会议深信，只要全国人民继续鼓足干劲，提高技术，厉行增产节约，努力克服困难，这个宏伟计划，是一定能够完成的。”①

在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些政协委员还对工农业建设和各项实际工作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政协委员们一致表示，要在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在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政协委员们还听取和讨论了政协副主席李维汉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李维汉在报告中总结了人民政协第二届委员会4年以来的主要工作。

在政治协商方面，人民政协就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协助党和政府作了大量的工作。举其要者，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三大改造高潮后，人民政协协商了关于调整工商业公私关系的方针政策，对于公私合营企业推行定息办法和财产清理估价的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等，并且协助国家机关宣传和推行了上述政策；协商了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正确估计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从而加强了对于他们的团结工作；协商了关于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在民主党派整风期间，协商了政协的整风办法和关于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等问题。

在民族工作方面，人民政协反复协商了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问题，使各界人士进一步认识了国家的民族政策，认识了巩固祖国统一和各民族亲密团结的重要意义，并且批判了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

在国际事务方面，人民政协协商了参加亚非会议、签订中德友好条约、支援埃及反抗侵略、中缅边界等问题。

在处理战争罪犯和反革命分子问题方面，协商了关于处理日本战争罪犯和处理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等问题，一致拥护政府的方针。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解放我国台湾的问题，本会举行了多次协商会议，坚决拥护政府的既定国策，争取台湾的和平解放。

此外，还协商了许多重要问题如兵役法、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和拼音方案等。

李维汉还总结了1956年11月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分别举行了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1958年10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举行的对于自朝鲜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盛大的欢迎活动。



李维汉还提到，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期间，本次政治协商会议还设了国际问题、工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社会福利、妇女、华侨、民族、宗教等十一个组。组的工作除委员参加外，并吸收了各有关方面的人士参加。开展组的活动，对于密切与各方面的联系，协助国家机关宣传政策，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就某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协商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帮助各界民主人士进行自我改造方面，《报告》说：“人民政协于1956年3月发布了《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建立了社会主义学院，各地举办了政治学校和工商业者短期讲习班。此外，人民政协还举办了学习座谈会。这些学习是有显著成绩的，参加学习的大部分人员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为了帮助各民主党派进行整风运动，组织了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方面带有根本性和共同性问题的报告会和整风经验交流会，还组织了本会委员和其他民主人士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参观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本会帮助各界民主人士进行自我改造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中，主要是采取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严肃地进行政治思想批判；在右派的猖狂进攻被粉碎和整风运动告一段落的形势下，就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耐心说服的正面教育，适当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他们的自我改造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同时在政治理论学习中，注意到联系实际，适当地结合社会实践和劳动锻炼。”②

李维汉在报告中还总结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国际活动方面的成绩，如：会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发起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会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举行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大会和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接待来自三十二个国家访问我国的外宾，分别举行了欢迎会，邀请他们发表演说，或者同他们举行座谈等。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同国际友人的友谊，也使外宾对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李维汉总结了人民政协在全国各地地方委员会的组织发展情况。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期间，全国各地共设立了九百零八个地方委员会。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28个，市委员会一147个，盟、自治州委员会33个，

县、自治县、旗、镇、矿区委员会643个，市辖区委员会57个。并且李维汉指出，今后还要继续加强这一工作。

李维汉在《报告》中还指出今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应当加强以下5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努力。

二、加强政治协商、视察工作和各种政治活动，密切同各界民主人士的联系，协助国家机关宣传政策、法令，并且向国家机关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三、积极推动和协助各界民主人士根据六条政治标准进行自我改造，加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帮助各界民主人士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

四、推动各界民主人士继续坚持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为保卫祖国安全、实现祖国统一、解放台湾而斗争。

五、推动各界民主人士继续巩固和发展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亲密团结，巩固和发展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友谊，支持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国际和平友好工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战争威胁，保卫世界持久和平。

全体政协委员讨论了李维汉的工作报告。在发言中，政协委员们回顾了几年来政协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他们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政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人士及教育、医学、社会科学、文艺工作者在发言中谈到，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及“大跃进”运动的锻炼，加强了自我改造，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感谢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使他们有所成就。

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不少委员谈了自己在自我改造方面的切身体会，决心以后要无保留地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无保留地传授知识，培养青年。全体委员表示，完全同意李维汉所作的工作报告。

在政协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政协委员们还讨论了西藏问题，听取了班禅



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就西藏问题的发言。

班禅额尔德尼的这次发言谈到了印度尼赫鲁总理说他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不公正”的问题。他严正地指出，“当我国内政受到外国狂妄干涉的时候，我站在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中印友谊的立场，表示义正词严的警告，这不但完全是公正的，而且完全是应该的。”

在谈到关于尼赫鲁总理表示欢迎他去印度会见达赖喇嘛一事的时候，班禅额尔德尼郑重声明：“西藏问题只能在西藏解决，在中国解决，决不能在任何外国去解决。”

班禅额尔德尼的发言，不时地为全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全体政协委员一致同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结起来，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发动背叛祖国、破坏国家统一、残害西藏人民的武装叛乱，这是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绝对不能容许的，是国法绝对不能容许的。西藏从来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决不容许外国人干涉。印度某些扩张主义分子继承英帝国主义侵略衣钵，支持西藏反动集团叛乱，要求所谓" 西藏独立" 的行为，严重地破坏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损害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不仅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而且违反印度人民的利益。”

会议一致热烈祝贺中央人民政府平定西藏反动集团叛乱的胜利。

决议指出：“这一伟大胜利更加巩固了我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证了西藏地方的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会议对于奉命讨伐西藏叛乱集团的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于协助人民解放军平定叛乱的西藏僧俗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③

政协三届一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选举人民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领导人。

4 月 26 日，大会主席团和各委员组组长举行联席会议。经过讨论，联席会议通过了向会议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候选人的名单。

4 月 28 日，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推举毛泽东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

名誉主席，接着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各项选举。

4 月 29 日，会议宣布了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周恩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彭真、李济深、郭沫若等 14 人为副主席；徐冰当选为秘书长；王从吾、王稼祥、程潜等 143 人当选为常务委员。全体委员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庆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员的产生。

同一天，政协主席周恩来宣布，这次会议各项议程进行完毕，大会闭幕。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政治决议》中指出，一致拥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都是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是促进继续“大跃进”的会议。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人士，加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努力奋斗。

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表示，全国各族人民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坚强正确领导下，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繁荣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继续前进。

注释：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③《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在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的同时，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于1959年4月18日至4月28日下午3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各个民族、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共1226人。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同一时间内正在北京开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列席了会议。

其中主要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林彪、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彭真，以及副委员长林伯渠、罗荣桓、赛福鼎、程潜，副总理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出席会议的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部分外宾应邀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及部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

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分别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明方所作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及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山《关于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1958年国家决算和1959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和《关于撤销司法部和监察部的决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提案审查意见。

周恩来总理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

内容。

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即1958年的伟大成就。周恩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年多的任期中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

当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并且大量地存在着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农村中劳动互助运动已经广泛地发展起来，参加农业劳动互助组的农户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左右，但是，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还只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左右。在那时候，我国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但是，究竟我们能不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这样一个有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来，还有待于事实的证明。而现在呢？大家看到，只经过四年多的时间，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①]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

随后，周恩来把1957年和1958年中国各项生产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了具体的阐述。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一九五八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二千零五十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一千二百四十一亿元增长百分之六十五……通过国家预算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二百一十四亿元，比一九五七年的一百二十六亿元增长百分之七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适应中国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它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说，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是推动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形式，而且是将来全国农村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

同时，周恩来也分析了中国发生"大跃进"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于是帝国主义者所不能够了解的，也是他们不愿意了解的。对于这个问题，



周恩来作了具体的阐述。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1958 年“大跃进”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中共中央在 1958 年春季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开始找到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好的方法，因而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②]

周恩来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制定的这条总路线，是“充分估计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六亿多人民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动员起来的路线。”而 1958 年的“大跃进”，就是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出现的。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根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实行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1958 年的工业“大跃进”，主要还是依靠中国原有企业的增产。同时周恩来还说，实际上，1958 年以来的“大跃进”，还是由农业开始的。1958 年，中国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还很少。中国在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却仍在迅速地提高。

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干部种试验田，干部下放，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项办法。的确，在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措施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干部更加了解群众，群众更加拥护干部。这一切都大大鼓舞了工人和农民的干劲。

第二，关于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1959 年经济战线上的任务。

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针对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发表了他自己的观点。周恩来说：“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是根据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拟定的，是根据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拟定的。这个计划既考虑了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也考虑了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既考虑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和运输在发展中必须互相适应的要求，也坚持了建设必须有重点、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发展原料、

材料工业和以钢为纲的方针。

周恩来认为，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

周恩来针对实现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应注意的问题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加强集中领导，全面安排，抓紧各项组织工作和具体措施，大力开展各个经济战线上的群众运动。

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为了实现 1959 年的“跃进”计划，还必须继续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公社的干部和县的干部必须深入田间，同社员打成一片。

周恩来认为，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就一定能够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

第三，关于我们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

在总结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后，我国文化教育战线上取得的成绩之后，周恩来提出：“继续调动文教战线上的一切积极因素，向前推进文化革命的事业，普及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且不断地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巩固和提高的工作，使文教工作的发展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任务。”③

周恩来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从各个方面提出了期望。

在教育事业上，周恩来说：“教育的成就不只是表现在数量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在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大大加强的条件下，我们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贯彻执行了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展开了教育事业的巨大的深刻的革命……在我们的学校中，已经开始把生产劳动正式列入教育计划，按照不同的情况，组织学生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采取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办法。”④

在卫生工作中，周恩来认为，应当继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使专家和群众结合起来，迅速有效地改进我国人民的卫生面貌。

在科学技术上，周恩来又提出：“我们现在还是落后的，必须加紧努力。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任务，应当放在首要的地位。在生产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存在着千千万万的技术课题，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当分工协作，为解决这些课题而努力。尖端科学技术也必须注意发展；对于条件还不具备的，目前应当从各方面准备条件。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在社会科学方面，周恩来提出：“理论研究工作也应当积极发展，加强领导。”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鼓励专业的文学家、艺术家，经过艰苦的努力，用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的作品来教育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求。同时，应当积极地领导群众的文学艺术活动，注意培养从劳动人民中涌现出来的文学艺术人才。

为了科学和艺术的健全发展，应当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指出了我国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道路，给了整个科学界和文化界以巨大的鼓舞。

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文教战线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这支队伍要依靠培养新知识分子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而产生。

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旧知识分子，都应当继续努力，在今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实现自我改造。我们应当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重视他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在工作中作出更多的成绩来。同时，要帮助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帮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并且根据自愿，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⑤

第四，关于国家的政治生活。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内部的团结，在各个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巩固了。”接着，他从在工商业、在农业和手工业、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分析了原因。同时，“我们在人民群众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先进分子的队伍中进行了整风运动，展开了两条道路问题的辩论和教育，展开了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斗争，大大加强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⑥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美帝国主义在西太平洋占领了许多的地方，并且还占领了中国的领土台湾，随时都在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因此，中国必须继续巩固国防，加强国防建设，保卫中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保卫亿万人民群众的和平、安定的生活。

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是工农联盟。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跃进”，工农联盟愈来愈巩固了。

周恩来还强调说，各民主党派在整风运动中都整顿了自己的组织。各民主党派在团结不同的社会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伟大事业中，仍然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中国以后仍然需要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牢固基础上继续巩固和

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和近日来的西藏问题，周恩来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方针历来是明确的……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和这一叛乱的平定，是中国的内政，甚至力图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者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我们希望，随着西藏叛乱的平定，通过中印双方的共同努力，亚洲两个共有人口超过十亿的伟大的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将获得更加巩固的基础和更好的发展。"⑦

第五，关于对外政策。

周恩来在谈到对外政策时说，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同苏联以及各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在谈到帝国主义敌对势力时说，中国、苏联两国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这种友好团结和友谊，被认为是不利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各国反动派。中苏两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团结的钢铁堡垒，是任何人冲不破的，是永远也冲不破的。

周恩来说，中国同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的国家发展着良好的外交关系。

周恩来指出，1958 年以来，中国同也门、缅甸、印度尼西亚、阿联酋、锡兰、突尼斯、摩洛哥、伊拉克等国先后签订了加强经济贸易联系和文化合作的协定。同时，中国也扩大了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的友好往来。

在谈到帝国主义干涉别国内政的问题的时候，周恩来指出：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中国和美国两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两国的关系很恶劣。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并不在中国方面。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同样，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政府一定要解放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台湾地区的一切美国武装力量必须全部撤走。任何割裂中国领土、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够容忍的。

周恩来强调，一切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都必须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外交关系"，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尊重中国的合法权利。中国政府愿意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和进行合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总结指出：

"对于我们的事业，无论在国内方面，或者是在国际方面，形势都是好的。我们的事业，各方面都在欣欣向荣，都在快步前进。"①



代表们表示热烈拥护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普遍地认为，1958年能"大跃进"，1959年同样可以继续"大跃进"。

4月21日，李富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4月28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一致批准了这一《报告》。李富春在这个《报告》中说明了1959年我国在各个经济领域的计划。

李富春在《报告》中说，195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计划为2 870亿元，比1958年的2 050亿元增长40%，即增加820亿元。在工农业总产量中，工业和手工业产值计划为1 650亿元，比1958年的1 170亿元增长41%。农业总产值计划为1 220亿元，比1958年的880亿元增长39%。计划规定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速度，体现了党的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⑧

李富春在《报告》中对1959年我国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运输、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划，并且各项指标与1958年相比，都有一定的提高。可以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

李富春在会上分析了实现这样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是必要的，同时，他也强调，实现这样一个继续大跃进的计划，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也是可能的。

首先，一九五八年工业生产的大跃进，为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提供了有利的物资技术条件。其次，由于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再次，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各个战线上，都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和组织经验。实现一九五九年计划的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强了政治团结，掌握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并且，在1959年，我们将继续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

李富春说，要完成1959年的计划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李富春强调，在各项组织措施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立即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开展一个全民的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

李富春又强调：要把全民的增产节约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必须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要把各项工作任务的内容，提出任务的理由，可能出现的困难、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基本途径，向群众交代清楚，并且发动群众

展开鸣放辩论，倾听各方面群众的意见。”[9]

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经济战线上的一切领导工作人员，不仅要关心生产的状况，而且要关心群众的思想政治状况。国家将继续贯彻执行干部下放、干部定期参加体力劳动、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办法，巩固干部和群众的亲密关系。

李富春强调，在国家企业中，要加强党委的统一领导，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且确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各种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使生产建设在统一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在人民公社中，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相结合的方针，迅速地把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

1959 年 4 月 21 日，李先念也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4 月 28 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一致批准了李先念所作这一《报告》。

李先念说：“一九五八年国家财政预算执行的结果，收入和支出，都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收支规模和增长速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10]

李先念说，1958 年支出 409.6 亿元，相当于原预算 332 亿元的 123.4%。1958 年支出同 1957 年支出 304.2 亿元比较，增加 105.4 亿元，增长 35%。1958 年支出决算中，经济建设费 262.7 亿元，为原预算的 149.7%；社会文教费 43.5 亿元，为原预算的 88.9%；国防费 50 亿元，为原预算的 100%；行政管理费 22.7 亿元，为原预算的 113.7%。此外，还有归还内债外债支出 11.8 亿元，其他支出 2.4 亿元，增拨给银行作为发放贷款的资金 16.5 亿元。1958 年的支出超过预算的部分主要是用来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

李先念说，1958 年的国家财政收入之所以会取得巨大的成就，归根到底，是来自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是来自工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1959 年，财政部门在国家预算执行的过程中，也根据收入不断增长的新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增加生产建设的经费。生产的发展充裕了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发展，同时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于 1959 年国家预算的安排，李先念在《报告》中说，1959 年是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中国人民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为实现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



进”而努力奋斗。

李先念在《报告》中说，1959 年国家预算收入 520.1 亿元，预算支出 520.1 亿元，收支平衡。同 1958 年决算数相比较，收入增加 101.5 亿元，增长 24.2%，支出增加 110.5 亿元，增长 27%。1959 年预算收入的增长，是充分考虑了客观可能性的。

李先念在《报告》中阐述了 1959 年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些充分条件。这些条件包括：

第 1，轻工业生产主要是依靠上年收获的农产品做原料，一九五八年农业的空前丰收，给一九五九年轻工业生产提供了远比上年为好的条件，而轻工业生产是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的；

第 2，一九五八年大量投入生产的厂矿将要在一九五九年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还将有一批新建的厂矿投入生产，设备增加了，生产的规模更大了；

第三，还由于经过一九五八年，我们开始有了大跃进的经验，有了在生产建设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我们的人民公社经过去冬今春的整顿工作，将要更加发挥它的优越性；等等。

因此，在李先念看来，尽管预算收入的增长幅度很大，但这是有根据的，是经过努力能够完成的，甚至能够超额完成的。

李先念最后强调说：“为了圆满地实现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我们必须坚决贯彻实行“全国一盘棋”的原则，把集中领导同分级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把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企业同群众的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整体和局部、重点和一般、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是对立的统一体，不注意局部，不照顾一般，不设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发展各种建设事业；但是，分级管理必须是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积极性必须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积极性，一般必须服从重点，局部必须服从整体。从经济部署来说是如此，从财政安排来说也是如此。各地方各部门不论使用预算拨给的资金，或者使用自筹资金进行建设，都应当从整体出发，尽一切力量保证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的圆满实现，使自己这个局部为整体的胜利作出最大的贡献。”⑪

会议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这次会议曾详细地讨论了有关西藏的各方面问题。

这个决议中说，会议完全同意国务院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举行叛乱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决议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是中国人民大家庭的西藏，是西藏广大人民的西藏，而不是少数反动分子的西藏，更不是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的西藏。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对于叛乱的平定，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干涉。"[12]

决议强调指出："在西藏地区，贯彻地实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由广大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当家作主的民族区域自治，贯彻地实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主改革，并且依靠各族劳动人民兄弟般的团结和互助，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定不移的方针。西藏少数反动分子的叛乱，不但不能阻止这个方针的实现，而且只能加速西藏人民的觉悟，从而加速这个方针的实现。同样，任何外国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对于我国在西藏的这个方针进行干涉，也不能阻止这个方针的实现，只能激起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反对干涉的爱国斗争。"[13]

决议最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遵守五项原则，同西南各邻国和平共处，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遗憾地注意到，最近在印度某些政界人士中出现了极不友好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这种言行不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只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利益。会议希望，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将迅速消除，中印两国之间的伟大的悠久的友好关系将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14]

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是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还将选举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中共中央已经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同意他不作为这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已决定了这一届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并且已经在过去几天中同各方面进行了协商。

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根据刘少奇主席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赛福鼎、程潜、班禅额尔德尼、何香凝、刘伯承、林枫当选为副委员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彭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六十二人：王昆仑、王维舟、邓初民、邓颖超、卢汉、叶剑英、史良、刘宁一、刘长胜、刘格平、刘澜涛、朱良才、华罗庚、汪锋、李雪峰、陈劭先、陈其尤、陈其瑗、陈垣、陈嘉庚、吴玉章、吴耀宗、武新宇、张云逸、张苏、张治中、张难先、张启龙、张闻天、邵力子、竺可桢、季方、周叔韬、周建人、周纯全、施复亮、赵寿山、南汉宸、胡子昂、胡乔木、胡厥文、胡愈之、胡耀邦、茅以升、高崇民、唐生智、马明方、马叙伦、马寅初、徐冰、徐向前、徐特立、许广平、梅龚彬、曾山、彭绍辉、杨明轩、熊克武、蔡廷锴、蔡畅、谢扶民、龚饮冰。

1959 年 4 月 28 日下午 5 时 45 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本次大会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大会，这次会议肯定了四年多来我们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特别是 1958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大跃进，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它表现了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为改变国民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面貌而斗争的伟大创造精神和英雄气概。大会对于我们国家在 1959 年各方面的工作都做了详细的计划，其中各方面的经济指标都有所下调，说明自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我党在纠正“左”倾错误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

⑧李富春：《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⑩⑪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⑫⑬⑭《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实际上，“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的会议：即7月2日至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8月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庐山会议起源于“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1958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以“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和以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与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这样两个大规模的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1958年，在“三面红旗”贯彻落实中出现了“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为了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左”问题，毛泽东从1958年10月份起到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9个月内接连不断地召开会议。这些会议都是集中地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会议。

虽然毛泽东不断强调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强调要综合平衡，但在总的方面依然坚持“大跃进”的口号，坚持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口号，继续大搞钢铁，致使1959年钢的指标下调（从1 800万吨降到1 300万吨）之后，产量仍达1 387万吨。积累率高达43.3%。严重地影响了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就粮食而言，1959年以来，收购供应情况很不稳定，且趋于紧张。到年中，全国大、中、小城市和工矿业区供应的粮食都随到随销。而1959年的新小麦登场之后，也扭转不了现收购现调运，现供应的局面；大米、杂粮在新粮登场前则已无调动的余地了。



1959 年 6 月 13 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由 30 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心议题是讨论工业、农业、市场等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在讲话中都指出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问题：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

毛泽东指出，过去经济的发展没有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没有注意到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也没有照顾到重、轻、农的联系。因此，从现在到 1959 年底还有 7 个月。这 7 个月就要搞平衡。

对于高指标，毛泽东认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一些定得过高的指标，又使各项工作处于被动。在工业、农业的指标中，主观主义的影响比较大，领导干部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也不足。

在农业增产方面，毛泽东指出，农业究竟增产多少是个未知数。他对“增产三成”表示怀疑。毛泽东说，假定增长 3 成，全国也只有 4 800 亿斤。

在谈到食堂问题时，毛泽东认为，食堂要保持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是否要钱也要分两种方式。有的吃饭要钱，有的吃饭可以不要钱，即老、弱、“五保户”吃饭不要钱，其他的人吃饭要钱。

周恩来认为，工业布局上的毛病是生产资料的指标定得太高了。他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提高生活资料的比重。

针对增产节约办法不太具体、有偏向的情况，周恩来提出，增产节约的具体办法是多抓商品性生产、抓食品定量、压缩购买力、减人。

同时，周恩来还批评基本建设项目计划多、上马少的情况。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要求尽快成立支农小组，先抓机械、化肥、水利。

李富春在讲话中说，各地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在工业方面的表现是：中央注意了重工业，对轻工业注意不够，特别是对手工业注意不够；轻工业中对大商品注意了，对小商品注意不够。

在工农业指标方面，这次会议没有提出新的意见。但 1959 年钢的生产指标降到 1 300 万吨，粮食指标由 10 500 亿斤压缩到 5 000 亿斤。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为庐山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在召开一系列会议的过程中，中央领导先后多次分头到各省视察情况，以便尽可能多地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周恩来对一些过高指标已经不相信了。因

此，在6月11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讨论1959年的计划执行情况的会上，周恩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把主观能动性搞得无限大，自己造成迷信；下边空气很紧张，以后应允许有对立面，听取不同的意见。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此期间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汇报了国内经济形势和部队的思想情况时说，近期以来，全国很多地方灾情十分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

同时，彭德怀也发现国内形势与他在国外访问时看到的报道相差甚远。全国的粮食、日用品、建筑材料、电力、运输等都处于紧张状况。

在视察和调查中，中央领导和其他深入实际的党员干部了解了实际情况，觉察到了“左”的指标思想仍然存在，并向中央作了汇报。

为了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力争使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变。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18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分组讨论。

这18个问题是：读书、形势、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4年的任务、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关系问题、公共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团结问题。后来，周恩来认为，这18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涵盖此时的形势，便在7月2日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的时候，提议增加一个“国际问题”。这样，庐山会议的议题最终被确定为19个。

会议分为六个大组座谈讨论，具体分组情况是：第一组组长林铁，副组长宋任穷、江华；第二组组长柯庆施，副组长廖鲁言、甘泗淇；第三组组长陶铸，副组长谢富治、谭政；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肖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第六组组长欧阳钦，副组长江渭



清、张国华。

会议从7月3日至10日，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

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

讨论中大家在原则上都用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过在对形势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认为，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这两大运动的积极领导人。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和缺点，并且认为，经过195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后，缺点和错误已经纠正，问题也已经基本解决了。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甚至暴露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他们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跃进”运动中的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好好总结。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而不是给群众“泼冷水”。在讨论中，也有一些中央部、委和大区及省、市负责人对自己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7月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在上海召开的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的情况报告。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指示》强调，在副食品中，除了蔬菜、家畜、家禽和水产外，食用植物油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项。为了改善食用植物油的供应，所有广大农村和城市郊区，凡是适宜于种植油料作物的地区，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大力增加油料作物的生产。

7月4日这一天，刘少奇在中南组小组会发了言。刘少奇说，1958年的“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的财政。因此，1959年、

1960 年都要补课。这主要是由于领导干部看好的多，而且估计偏高。

7 月 6 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小组会上发了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朱德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心理这一面，要把农民的私有心理看得重些。供给制、“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私有性，在目前是行不通的。

对于农村办公共食堂，朱德的看法是，它可能对生产有利，但对消费不利。只有农民在食堂吃饱、吃好，人心才能稳定。如果大范围地吃公共食堂，粮食不够吃就不好办。

随后，朱德又谈到了工业问题。他说，工业方面主要是钢铁工业搞乱了，他认为，各省不要搞什么工业体系，但工业发展方向要慎重考虑。

7 月 8 日上午，李锐谈了两点意见。他说，一是“以钢为纲”、“元帅”等口号，不再提为好；二是很多人在 1959 年怕提综合平衡，怕提按比例发展。

7 月 9 日下午的中南组小组讨论，主要集中在综合平衡的问题上。与会者提出了很多的意见，主要是综合平衡中最重要的比例——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其次是工业与农业、劳动力的分配，工业内部轻与重、原材料与加工业等方面的综合平衡等。

7 月 10 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 7 月 15 日结束。

7 月 14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草案）》，即《会议纪要》的草稿。

《会议纪要》共写了 12 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形势和任务、读书、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关系和协作区的问题、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过日子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关于形势和任务问题，《会议纪要》总结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重大意义，并充分肯定了 1958 年和 1959 年的成绩。

《会议纪要》指出了“大跃进”运动中的 3 个缺点，并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还对这些缺点作了一般估计，认为这些缺点是局部的，暂时性的，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克服较快，许多情况已经好转。



同时，《会议纪要》还提出了1959年下半年、1960年和1959年至1962年的任务。为了顺利完成这些任务，《会议纪要》提出了综合平衡的基本原则。

在读书方面，《会议纪要》要求，从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对于宣传问题，《会议纪要》提出了3点要求，即国家应公开宣布1958年粮、棉总产量的核实数字和1959年落实的计划指标，并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人民公社应当在适当时机，公开宣传整社的结果；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应当对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对任务，对存在的某些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进行宣传。

在有关综合平衡这个问题上，《会议纪要》指出的各种比例关系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必须遵守国民经济中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并应当在计划工作中作好综合平衡。

在涉及群众路线这个问题的时候，《会议纪要》说，各级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不摆官气，虚心地听取群众的各种不同意见，鼓励群众和上级干部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反对虚夸作假的歪风。

在1958年这一年，企业管理工作有了重大的改革。但是在这些改革的过程当中，企业生产管理仍然产生了某些混乱的现象。

对此，《会议纪要》分析指出，出现企业生产管理混乱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有些企业不实事求是地推行所谓“无人管理”或“工人自我管理”等方法，把一些不应该取消或者合并的机构，也取消或者合并了；二是领导干部比较普遍地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出现了“一条腿走路”的现象；三是生产秩序出现的混乱，没有得到及时的整顿。

因此，《会议纪要》要求，为了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老企业在1959年下半年、新企业在1960年上半年，应当逐步建立一套既便于发动群众积极性、又便于集中领导的管理制度。

《会议纪要》在谈到体制问题时说，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应当收回和重新调整那些下放得过多的权限，要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把管理权限集中到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两级，便于提高国民经济的计划性。

《会议纪要》分别对计划、工业、商业、财政、劳动工资的管理权限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划分规定。

《会议纪要》在写到有关组织农村集市贸易问题时指出，管理农村集市贸易的原则是，“活而不乱，管而不死”。进入农村集市进行交易的公社、生产队和社员，只限于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和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不得进行商业贩运，不得开设店铺。

根据这一原则，《会议纪要》说，各级管理部门应该根据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类别，作出具体的贸易规定。

《会议纪要》还明确规定，应当在全党全民中普遍开展一次学会过日子的教育，并且提出凡有条件的地方要办公共食堂；条件较差的地方可以缩办公共食堂；可以把常年性的食堂改为临时性的农忙食堂；也可以暂时不办公共食堂。

在谈到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这个问题时，《会议纪要》指出，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树立任务越艰巨，基层组织领导作用越要加强的思想；要把整党工作和党的经济建设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所有基层组织要严密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和帮助；加强党的教育工作。

这份《会议纪要》反映了庐山会议初期讨论的情况，既肯定了成绩，也讲了缺点，并有许多指导性的具体规定。其基本精神是纠“左”的。尽管这份文件是一个成果和进步，若能真正贯彻到实际中去，也会起好的作用，但它还很不彻底，并且与彭德怀的期望相差较远。

彭德怀在与周小舟私下交换意见之后，得到了周小舟的赞成和支持，认为有必要向毛泽东反映当前“左”的问题的客观事实。于是，彭德怀决定写信给毛泽东。

7 月 14 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彭德怀希望能够得到毛泽东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彭德怀的信是写给毛泽东本人“参考”的，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信中所谈的缺点和错误问题，本来也是与会者在会议上所谈论的，也是毛泽东多次讲过的。

7 月 16 日毛泽东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题目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到会上，还在政治局几个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

随后几天，各小组讨论的情况不断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其中有赞同彭德怀的，也有反对的。

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



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总之，从庐山会议开幕到7月22日的这段时间内，与会者分组继续批判了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也初步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从而使会议对“左”倾的分析和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有新的进展。不过，由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这一封表达自己客观意见的信，而使会议转入对这封信以及对所谓的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批判。

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4人列席了会议。人数几乎相当于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这次会议除讨论经济问题外，主要是继续批判揭发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毛泽东提出，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即修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

关于修改指标问题，毛泽东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定的1959年的几个指标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但多数人不同意。即使多数人同意，也改不彻底。

毛泽东也认为，高指标已经成为一种负担，是“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破除迷信，将菩萨打烂。党员干部要打破那些不符合实际的钢、煤、粮、棉高指标，重新确定合乎实际的指标，即搞1 300万吨钢、2 000万吨铁、7 000万吨铁矿石、3.4亿吨煤等等。

毛泽东说，离年底还有5个月，还是改了好，应由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

在讲话中，毛泽东重点讲了路线问题。

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黄克诚等人要分裂中国共产党这个团体”。因此，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团结，犯错误的同志要改正错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

毛泽东讲话后，各小组开始展开讨论。其中心内容是“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

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庐山会议有着正确的开始，最终却以错误结束。全会讨论的19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准确的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形势，并且提出了一些适宜的办法和举措来调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儿引起的“左”倾问题。不过，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的一封反映客观意见的信，而导致八届八中全会上，全党甚至全国开始了一场“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的运动。在当时“左”倾错误正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党内领导人错误的发动这场“反右倾”的运动，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也使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批忠诚为国的人蒙受了屈辱。



“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运动全称是“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运动”。在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自己客观想法的信，因此导致了党内开展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错误运动。

1959年7月，为了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调整部分过高的经济指标，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在江西召庐山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按照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已定的方针，共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继续前进。

会议前期总的来说，气氛还是轻松活泼的。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19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尽管有些同志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但许多人还是对前一时期的工作坦率谈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也曾表示，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大家称之为“神仙会”。

彭德怀在会议期间，通过参加小组会的发言和讨论，感到会议对“大跃进”以来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经验教训总结、分析不够。特别是有些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切实的批评意见。

同时他又感到真正客观地、冷静地研究问题的空气不是很浓，有些话不便在小组会上讲。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又听说会议安排到7月15日为止，担心匆忙结束，11日晚，当周小舟到彭德怀处交换意见时，彭表示要给毛泽东写信。周表示支持，可以去找毛泽东直接谈谈，反映一些具体情况，还建议彭把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送毛泽东参考。彭则说，我同别人谈话．总是谈不完全，言词生硬，容易顶撞人．经过反复思考、酝酿，彭还是

决定写信来陈述自己的意见。7 月 13 日晚写好信，14 日晨就送给了毛泽东。

彭德怀的信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作参考的，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彭德怀的这封信有 3 000 多字，分为两个部分。在信的第一部分，他指出了 1958 年"大跃进"运动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中说道："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1958 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发生了比例失调"；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彭的结论是："成绩确实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在信的第二部分，彭德怀谈了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种矛盾究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发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把本来需要几年或几十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还提到纠"左"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信的最后部分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 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反之，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

他还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第一是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是"共产风"导致农民积极性不高；第三是"浮夸虚报"，使我们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受到影响。他主张"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强调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为此，领导上要造成一



种风气，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

彭德怀写信的基本用意是希望深入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

由于彭德怀的信陈述并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缺点错误以及产生的原因，并在提出具体批评的同时触及了“左”的指导思想，这就为毛泽东所不能接受。于是，毛泽东提出要对这封信进行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大多数与会者是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的，认为虽然个别用词或提法尚需斟酌，但信总的精神是好的。

这时，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奉命上庐山参加会议。7月19日，他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意见书”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至于某些提法、词句，可以斟酌。黄克诚主要谈了对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是认为短期内还是不要搞为好。周小舟发言结合湖南的情况谈到得失问题时说，总的来讲得大于失，但是得失要加以区别。他认为，正确地检查缺点，总结经验．不仅不会泄气．反而能够鼓舞干劲，因此他主张会议把缺点讲透，否则是难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的。

对于彭德怀的信，周小舟最后表了态。周小舟说，彭德怀同志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他是同意的。但是，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是应该斟酌的。

7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他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又客观地、深刻地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经验和教训的看法，批判了某些不正确的提法，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首先就大跃进以来我党所犯错误和思想根源作了深刻的分析。同时也指出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接着，张闻天就彭德怀的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提出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至于个别的说法，彭德怀也存在着不足。

在刮“共产风”问题上，彭德怀指出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彭德怀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张闻天指出，彭德怀所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值得考虑。刮“共产风”恐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可以看出，张闻天是明确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的。

不过，对彭德怀的观点持反对态度的同志，发表的意见也很尖锐。

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纠正“左”倾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认为1958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庐山会议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统一认识，形势就会好转。而彭德怀却要求进一步深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因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因而是右倾的表现。由于对彭德怀、张闻天过去积有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记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他认为彭德怀这个“海瑞”是“右派”海瑞，是“居心不良”，彭、黄、张、周是结成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

在这赞同与非难两种观点尖锐对立的时刻，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向党进攻，是反对总路线的，是针对“三面红旗”的。因此，他很难接受和容忍彭德怀等人的这种“攻击”，决心进行“反击”。

在随后的几天里，对彭德怀的批判随着毛泽东指示和批示的下达开始升温。在小组讨论中，庐山会议被说成是“围绕党的总路线这一中心展开的一场大辩论、大论争的会议”；彭德怀被说成是“党内反对总路线的代表”；张闻天的发言被认为是“一个反总路线的纲领”。那些坚持“左”倾的人在讨论中支持并发挥了毛泽东的观点，指责彭德怀的信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发言及某些个别言论是“指向党的根本路线”，“拆毛主席的台”。

为了彻底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开展反右倾斗争，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由此庐山会议改变了方向，从纠“左”转向了反右倾斗争，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党，造成中共历史上一次后果严重、影响深远、很值得思考的悲剧。

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接到



通知后上山的）、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

毛泽东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已经把彭德怀写信说成是“有政治目的的行动”，即所谓“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对此，彭德怀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他解释了“从国外取了点经”这一问题。彭德怀说，在访问期间，他只与罗马尼亚国防部长谈过公社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问题，与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谈过施肥的问题，其他政策问题都没有谈过，不存在“从国外取经”的问题。

彭德怀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写信的问题。彭德怀强调，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信的内容。信是交给毛泽东的，只是觉得会议就要结束了，写个信，请再阅、批示。写信的原意是，“有无参考价值，请斟酌”。

这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就是要“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

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主要的内容就是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党的干部，同时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也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受到严重的处分。

在8月2日的开幕会上，毛泽东讲，现在有些同志对党的路线提出了怀疑，提出要加以修改。总路线是否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需要另换一条，是要经过讨论的。这些同志的信和发言以批判1958年为主，说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的8月初共有9个多月来的这些工作，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应该重新对国民经济作一个客观评价。

毛泽东说，这些通知提出当前“问题不少”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而不是别的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党已经反了9个多月的“左”倾。因此，现在基本不是“左”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党及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6亿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毛泽东指出，党的分裂“直到现在才有显著迹象”。

从8月3日至10日，与会者分成三个大组，按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保卫“三面红旗”的基调，分头对彭、黄、张、周等所谓“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展开了“揭发”和“批判”。其间，有关负责同志向未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分同志介绍了彭等“发难”经过及进行“反击”

的情况。

在会上，林彪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给批判定下了最高调子。于是，很多政治帽子，如：“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等都加在了彭德怀的头上。还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并将彭德怀历史上难免的某些过失，拿出来批判，而这些问题早已得到正确解决。如今重翻这些历史旧账，搞所谓“老账新账一起算”，既无助于弄清是非，更伤害了同志。

8 月 11 日，毛泽东再次讲话，他从世界观方法论谈起，讲了二十个问题，分析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经验主义者，说他 30 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抱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把彭德怀的襟怀坦白武断地指责为向党“进攻”，是想在党内挂帅。

面对不断的追逼围攻，彭、黄、张、周只得在说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给自己扣了许多帽子。并且，为了顾全大局，违心地作了一些检讨。

黄克诚说，他在 7 月 19 日发言中“所犯的错误”，并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的缺点，而在于对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其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

黄克诚说，他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了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

对于 1958 年具体工作中的那些缺点，黄克诚认为，应由全党来负责，绝不应该由毛泽东个人负责。黄克诚还说，他是中央书记处的一员，也应该负一份责任。

关于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说，他上山后，才看到彭德怀的信，并对彭德怀说，如果有意见可以写信告诉毛泽东，这种做法是好的，但信中对某些问题的提法和用词不妥当，特别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提法很不好。

迫于会议的压力，黄克诚违心地说，彭德怀对信中所述意见的“错误性质认识不明确”，没有认识到这封信的内容所反映的思想具有“右倾代表性”，也就是说，总的精神是“错误”的。

张闻天也被迫做了检讨。他承认对“大跃进”运动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总路线还有某种程度的摇摆，积极支持不够，干劲不足，表现也不够



坚定。

张闻天还在检讨中承认，毛泽东说到“立场问题”、“动摇问题”是正确的，他是“有这个问题”的。张闻天认为，彭德怀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同时，张闻天也强调说，自己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主要是因为，这是出于责任感，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进一步认清问题，并不是自己立场有什么问题。

张闻天在发言中还说，对彭德怀的信，他认为基本上是好的，肯定了“大跃进”运动的成绩和总路线的正确，只是在缺点方面的有些提法还有待于斟酌，但关系不大，也不是有“立场问题”，只要把问题提出来就好了。

周小舟尽管对许多事情想不通，但也被迫承认自己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

最后，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撤销国防、外交、省委等领导职务。随后，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指出：“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着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

所以，《决议》的定性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中央政治局讨论

并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身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彭德怀，就党内国内重大问题，给党的主席写信，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是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党章所允许的。所提的内容是正确的，且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发动这次对彭德怀的斗争，却是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因而是错误的。把彭德怀的信和会上的发言看作"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且毫无根据地与国际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更是人为地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致使党内本已有所克服的"左"的思想，"左"的行动，重新萌发，再次泛滥，对全党全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深刻的不良影响。

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等和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

参考文献：

[1] 刘庆旻，《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悲剧的缘由》，《史料研究》。
[2]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



“反右倾”运动扩大化

庐山会议结束后，“反右倾”运动一直反到基层组织，走上了扩大化的道路。全国从上至下，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样，自然又让很多人遭了殃，不仅受到狠狠地批斗，而且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客观现实的信，因此使庐山会议改变了基调。不仅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受到严重的处罚，并且由此导致的一场“反右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倾，其实并不偶然。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是一个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是“反革命”。彭德怀不但敢于提出意见，而且还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因此，毛泽东把彭德怀强调总结经验教训看作是向党中央领导“下战书”，认为他动摇了“三面红旗”，是“右倾”的表现。同时又把彭德怀的行动与当时国际的反华逆流相联系，认为这与彭德怀出访苏联、会晤赫鲁晓夫有关。因此毛泽东下决心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极端错误地对彭德怀发动了歪曲事实的批斗。

这样，经过党中央一系列的部署，庐山会议后，很快在全党，甚至全国开展了一场批判与打击所谓“右倾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斗争，致使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许多人长时间蒙受了不白之冤。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

在八中全会批判彭、黄、张、周的同时，有的地方也开始进行“反右倾”斗争。

此时的江西省委中级党校学员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大问题开始了辩论。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明确肯定，毛泽东还认为：“我们这里持肯定态

度的人比江西党校多得多，持模糊态度的人也比江西党校较少。”毛泽东要求“学江西的样，在省、地、县三级分批举行，一律照此大办一场……每一批时间两个月，读书与辩论并行，做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定有极大意义。”

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的部署，于当年的8月至翌年的3月，在湖南全省开展了以“反右倾”为主要内容，以保卫“三面红旗”为目标，以批判所谓“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党员干部为重点，以解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为首要任务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党政机关整风运动大体经过传达庐山会议精神、重点批判和自觉交心、对重点批判对象作出结论和处理三个阶段。

8月5日晚，省委召开了“反右倾”电话会议。8月10日，省委、省人委联合举行了“反右倾”广播大会。庐山会议后，斗争迅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8月22日至9月15日，召开有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地、市、县委书记及省直机关负责干部1928人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集中揭发批判周小舟、唐麟、杨弟甫、方用、章新、方克等人所谓“右倾反党集团”，通过《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问题的决议》。会议起了大发动、大示范的作用，使反右倾整风运动，在全省乡迅速铺开并进入高潮。

湖南“反右倾”期间，广泛发动群众，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批判“右倾思想”和右倾机会分子”。

参照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方法》，规定凡在言行上属下列性质的党员干部，都应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情节确实严重的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三面红旗”；（二）积极支持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三）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缺点之机，猖狂向党进攻；（四）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执迷不悟，不主动深刻检讨；（五）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缺点，反对党中央。

根据上述原则，在县以上单位共排出重点批判对象4 586个。凡阶级异



己分子、反革命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般调离重要工作岗位和机要部门。

并且就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待群众运动态度、党的领导、领袖作用和意义，工农关系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采用以小组辩论为主，辅以专题报告、组织参观、大会辩论、现场辩论和写文章等形式，进一步落实一些思想和组织方面的问题。

同时，全省农村也开展了整党整社运动，它以保卫“三面红旗”为主要内容．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9 月初，省委通过省委农村部在 10 个大队进行试点，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少数富裕中农的“右倾思想”和“错误言行”，划清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同时开展整党、整团、整顿干部作风运动。10 月 4 日，湖南省委书试点情况报告中央，迅即得到中央的肯定，并转发全国。

另外，文化教育等部门，也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至 1960 年 2 月，全省“反右倾”斗争基本结束了（个别县延续到三四月份）1960 年 8 月．又进行了反对省委书记周惠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

湖南的“反右倾”斗争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把党内思想斗争与阶级斗争混为一谈，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后果。运动中，把对待“三面红旗”的态度作为衡量政治立场的标准，一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因此而遭到批判斗争以至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受到撤职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全省、县以上机关 4 697 名重点对象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496 人，90% 的受到各种处分。有 80 万农村党员干部参加整风整社，遭批判斗争的达 1. 7 万余人。据 66 个县统计，参加整风整社运动的 1930 万成年人，重点批判的达 100 万人。严重损害了党内外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1959 年 8 月中旬至 1960 年 2 月，怀安县按照党中央、省、地委的部署，也在各机关单位、企业、学校、农村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中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党的总路线。

怀安县“反右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在此期间，怀安县各级党组织带领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中央关于“反右倾”的文件，并且组织训练骨干队伍，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同时还建立了整风运动小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通过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揭发问题，自我检查，普遍开展交心活动这

些具体措施和方法，全县揭发暴露出不少问题，共找出 293 名重点批判对象。县委认为：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和右倾活动，都是社会主义事业“大跃进”的“绊脚石”。因此县委领导提出，必须集中力量，把反右倾斗争进行到底，坚决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

在县委领导下，全县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县委号召，对重点人、重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通过批判斗争和专题辩论，统一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进而把“三面红旗”举得更高，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在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和党员干部 293 人，占党员总数的 3.46%。最后落实定案的 287 人，占重点批判总数的 97.6%。其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2 人，严重右倾错误 197 人，严重个人主义 74 人，蜕化变质分子 9 人，阶级异己分子 4 人，坏分子 1 人。在定案的 287 人当中，受党内处分的 29 人，占定案总数的 10.1%。

怀安县“反右倾”运动总结报告写到：经过半年之久的“反右倾”斗争，打退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进攻”，肃清了“右倾思想”在怀安的影响，再次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反右倾”运动获得了“全胜”。

庐山会议之后，中共成都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贯彻省委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10 月下旬，运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很多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运动到 1960 年 1 月结束，全市受到批判和斗争并被列为右倾分子的达 1 392 人。

当时成都市西城区的形势和全国一样，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很多问题具有共性。由于是基层，很多同志亲历亲为，因此在一些场合敢于讲真话、说实话。当“反右倾”运动一来，一些人对这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上钢上线，歪曲事实。对党的事业有责任心的同志反而被打成了右倾分子，撤职批判。

被划定为西城区右倾分子的典型人物高某，时任中共西城区委工业部部长，具体负责区的经济工作和主持二郎山的开矿工作。

其实，说高某反对政治挂帅一事，是指 1958 年西城区二郎山开矿期间，与天全县委共同组织的矿区党委会，党委会的书记由天全县委工交部部长担



任，党委委员也有天全县的人员参加，高某是副书记，矿区党委会不开会，责任不应在高某头上，因此说高某反对政治挂帅，理由根本不成立。

另一件事，1958 年在区的总结二郎山开矿的工作汇报时，高某谈了一些实际情况，他说“去二郎山开矿初期参加开矿上山的人很多，而所去的人绝大部份又未带工具，人上去闲逛，这些人的粮食靠天全县解决是有困难的，有的人在成都已经领了粮，来二郎山又吃双份，高还讲“二郎山开矿花了 20 多万元，打死 2 个人，人死得很惨，有一家 5 个小孩靠其生活。”大炼钢铁一哄而起，高某从二郎山开矿回来时说“我才走了几个月，西城区就建立了 4 个钢铁厂，牌子到不小，重庆也才只有 2 个，4 个钢铁厂一年要多少矿石”。

以上就是高某反对炼钢运动，夸大困难，否定成绩的右倾表现。其实，高某都是在会上谈的事实。大跃进一开始，西城区在二郎山开矿和在夹江县炼焦碳，都缺乏科学依据，是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的追风行为，二郎山铁矿石本来就不宜开采，且品位也不高，矿石还要运到几百公里外的青白江成都钢铁厂冶炼，亏损巨大。结果二郎山开矿仅采了 1 000 多吨矿石，就只有停下来了，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因为高某在具体负责此项工作，从实际出发，敢于对存在的问题讲真话，结果反而被打成了右倾分子，这种不顾事实真相和客观实际的定性，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高压和左倾的危害程度。

这场反右倾的政治运动，是继我们国家在两年前反右派斗争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政治运动。其扩大化的程度更是在全党、全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不但彭德怀在中央，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受到了严厉的批斗和惩处，更严重的是，这场运动给全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毁坏性灾难。

在经济方面，“反右倾”运动的发动，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不久前已被认识的问题，仿佛不再是问题。比如，大跃进的一个主要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在反右倾中，把这种正确认识当作“谬论”加以批判，硬说“我国国民经济中重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1959 年上半年降低一些过高指标的正确措施，被指责为“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兴风作浪”而造成的一个“小小马鞍形”。在整顿人民公社过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

造，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中心的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并且 1960 年要求实现“比去年更好的大跃进”，钢指标定位 1 840 万吨，也不顾一切地“保住”了。总之，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

这场运动无疑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生活中出现的一次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失误，而且也成为导致三年闲难时期到来的直接的政治原因。

在政治方面，这次“反右倾”运动扩大到全党、全国，打击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毛泽东认为，这场“反右倾”的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个论断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申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致使一些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正之风，甚至给少数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机。这种混淆是非的错误做法必然使党内民主和党风遭到更大的破坏。

庐山会议错误地提出了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作坚决斗争的口号，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使中国共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使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与它一脉相承，有历史渊源。

这次运动连同之前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的批判都是完全错误的，打击了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为代表的众多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让许多对国家忠诚奉献的人受到牵连，使他们蒙受了屈辱。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理，据 1962 年甄别平反时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和定性为右倾分子的干部和党员达 300 多万人，而这些人，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这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重大损失。”

中共后来认为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真实情况和



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运动是错误的。七千人大会前后，对错划的“右倾”分子进行甄别平反工作。

参考文献：

[1] 曙初，《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湖南党史，1996年第4期。

[2] 杨海，《关于怀安县的“反右倾”运动》。

[3]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

1960年的“继续跃进”

在“三面红旗”的带领下，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大搞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各个领域的跃进，使国民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善和提高。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运动的情形下，大跃进的步伐更是越走越大。1960年，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继续跃进”。

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因对“大跃进”有所批评，被毛泽东宣布为“反党集团”。毛泽东认为大跃进中出现的困难只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他看来，“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①]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只能坚持，不能动摇。因此，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城乡又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这场“反右倾”斗争使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不敢再提及，并且，这场斗争打断了在经济上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标志的“左”的问题进一步提升并泛滥。

从1958年开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过两年的连续大跃进，196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已经从3 700亿斤增加到5 401亿斤，钢的产量已经从535万吨增加到1 335万吨，全国人民已经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当然，同全国人民的那个要摆脱贫困、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的目标比较起来，这一切都只是开始，因为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党中央认为我们需要继续跃进。

196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吹响了“持续跃进”的号角。上海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并要求在城市试办



城市人民公社。随后的3月杭州会议更是号召加快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

1960年的“持续跃进”是由五大运动即技术革新运动、公共食堂运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城市支持农村运动和卫生工作运动组成，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是其中的重点，也是继续跃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巩固农村人民公社的同时，毛泽东希望进一步实现城市的人民公社化，这样既能体现跃进在“持续”，又能证明人民公社确实“好得很”。

我国广大城市人民，从1958年夏天就开始试办城市人民公社。首先是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家属，从一开始就踊跃地参加人民公社。

大跃进“红旗省”之一的河南省，在率先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又“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据河南省办公厅1958年10月1日报告，到9月底，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参加公社的人数占总人口的97%。每个城市公社平均规模为4 950人。”[②]仅仅一年之间，“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多数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城市公社人口近2 000万人。”[③]

这些城市人民公社，从组织生产开始，两年来一直在逐步地发展着。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和街道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1959年总产值达二十亿元，超过1949年全国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一倍以上。

3月26日，刘少奇起草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稿，毛泽东对其略作修改后，将此文件发往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毛泽东指示全国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和广州五个城市外，其他城市则应一挂上公社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④]并要求“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⑤]周恩来也积极拥护城市人民公社的建立，他“原来设想，城市人民公社暂不宣传，只是试点，不挂牌子”。[⑥]后来，周恩来改变了看法，他说：“现在看，城市人民公社势不可挡，要有计划，有领导地提倡，要办好。”[⑦]在中共核心层对此看法取得一致后，这一指示迅速从农村延伸至城市。

1960年以来，在党中央号召新高潮的调动下，全国各省开始了大规模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一个组织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高潮席卷全国各个城市。许多城市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大办服务事业，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邻里服务站。千千万万的城市家庭妇女摆脱了繁琐的家务劳动，参加了街道工业，大办文化卫生事业和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城市家

庭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城市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成为城市中进一步组织人民经济、文化生活和彻底改造旧城市的很好的组织形式。

江苏省在接到中央"继续运进"的号召以后，重点发展城市人民公社。在继续坚持"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开始大规模的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对不愿入社者轻则称之为"落后分子"，重则冠之以"右倾分子"的帽子。仅用一个多月，江苏省10个市，就"规划建立了45个城市人民公社。"[⑧]根据江苏省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的调查，70%多的城市居民积极拥护公社的成立，其中主要是"工人、干部和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家属"。[⑨]

不过社员不愿将本来就很少的个人财产转为公有，这样就会被划归为"资产阶级"。因此，很多人开始到市场上抢购手表，收音机等物品，以维护自己的财产。

随着城市的人民公社化，城市开始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一过程中，空想的乌托邦逐渐融于现实生活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这种亢奋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气氛之中。

公共食堂被宣传为"干不干社会主义的分水岭"，于是公社领导带领社员大肆办公共食堂。至4月下旬，仅南京市玄武区办起各类食堂454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居委会食堂，4、5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 927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

同时，各个城市人民公社掀起了大办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站、敬老院的运动。不过，对于不同出身的人，这种服务站也有不同的待遇。比如，出身劳动人民的孤老可进敬老院养老；至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孤老不应进敬老院，而应由公社组织教养院教养。

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江苏各地开始大办工厂，充分发挥"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配合同时开展的技术革新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在妇女解放方面，公社让许多妇女参加到集体劳动中，"变消费者为生产者"。

同时，"继续跃进"的口号也激励着经济指标的改变。

1960年3月30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大会作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了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指出，在这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年，我们一定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我们也一定能实现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



1960年国民经济针划草案规定，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将达到2 980亿元，工农业总产值此1959年增长23%，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29%，农业总产值增长12%，也就是说，今年工农业总产位的增长速度将比第一个五年针划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一倍以上。但是要了解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的全部意义，不仅要看增长的百分比，还要看增长的绝对量和每增长百分之一所包含的内容；因为基数增大，每增长百分之一所包含的绝对量就增加了。今年工农业总产值增加的绝对量是567亿元，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加的总和（1952年至1957年共增加560.4亿元），从每百分之一的绝对量看，今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增长1%，就意味着要增加24亿元产值，而在1959年，每增长1%只意味着增加18亿元产值。

在1960年国民经济发展中，不仅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快，而且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增长速度也是很高的，现从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来看，钢的产量将达到1 840万吨，比了1959增长38%，即增加505万吨，这个数字接近1957年全国钢的产量，这种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把钢的产量由1 300多万吨提高到1 800万吨，英国用了17年时间，美国用了4年的时间；战后西德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恢复，也用了3年的时间；法国的钢产量虽然在1955年就接近1 300万吨，但直到去年仍没有达到1 800万吨的水平；日本的钢产量在1957年达到1 258万吨，但直到去年也没有达到1 800万吨的水平。1960年煤的产量达到4亿2 500万吨，比1959年增长22%，即增加7 700万吨，这个数字接近1954年全国原煤的总产量。粮食和棉花将分别比1959年增长10%左右，大大地超过第一个五年补划期间粮食年平均增长3.7%和棉花年平均增长4.7%的速度。

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贯彻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草案中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加快农业的发展，认真地贯彻实行和提前实现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中心环节。为了迅速发展农业，加快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要在十年的时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并且实现相当程度的电气化。为此，不仅工业部门，而且运输、商业、金融、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部门，都要把支援农业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国家计划在今年内以更多的钢材、农业机械、动力设备、运输设备等支援农业的发展。

根据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要求，1960的农业总产值将达到880亿元，比1959年增长12%，增长的速度也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快1.7倍。农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都将有很大的发展。主要农产品中，粮食和棉花的产量仍将增长10%左右，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3.7%和棉花产量平均每年增长4.7%的速度。农业生产这种跃进的速度，特别是这种连续几年不断跃进的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的。拿粮食的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生产不仅增长慢，而且很不稳定。例如，美国1949的粮食产量为三千零三十五亿斤，1952年起就下降到3 000亿斤以下，直到1956年才恢复到1949年的水平。我国农业的技术装备比美国差得多；但是我们做了美国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国农业生产是以持续跃进的速度发展的。

根据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都将有很大的发展。

1960年以来的仅仅三个月的时间里，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已经席卷全国。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小型企业到现代化企业，从国营企业到公社工业和街道工业，出现了技术大革命的沸腾景象。在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已有80%以上的职工参加到运动中。在广大农村，在商业、财政、金融部门和文教卫生部门，千千万万群众也积极参加了改进工具、改进操作方法以及各种发明创造的活动。

城市人民公社此时在全国以空前的规模进行着，不过，公社自身的发展却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中。这固然与城市人民公社的工业并不足以支持公社———公社集体福利无法正常运行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到了1960年下半年，城市的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

江苏省各个城市为此专门成立粮食办公室，检查城镇口粮供应情况。同时，为了“节约粮食”，江苏省在北京的指示下降低了城市粮食供应定量标准。在这严峻的时刻，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已成为刻不容缓、压倒一切的任务。至此城市人民公社已难以维系，“共产主义”般的生活、生产已处于半停顿状态。终于，乌托邦的色彩开始从城市中逐渐褪去。胡乔木在一年后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道出了城市人民公社的某些实情：“由城市人民公社办的实际上强迫参加的，城市居民食堂的情况，其严重程度，不下于农村。”“公社的企业和农民，都要揩大工厂的油，侵占国家财产，这



也是一个严重问题。”[10]胡乔木信中指出的问题其实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各省的城市人民公社也大多陷于同样的困境之中。不仅城市人民公社如此，“持续跃进”的浪潮到了1960年下半年事实上已全面下落。农村陷入一场大灾荒之中，城市的供粮则日益告急。

毛泽东也意识到了现实已不容“乐观”。他在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正确”的前提下，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11]现在的毛泽东已无意于实现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普遍化，甚至不愿再提及城市人民公社一事。毛泽东默许了各地对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整”。但对农村的人民公社，他不愿做任何让步，农村仍然高高飘扬着人民公社的红旗。

1960年的继续跃进，是在“反右倾”的大浪潮下，全国大规模的进行的。并且这次跃进使庐山会议之前的“左”倾错误又卷土重来，“以钢为纲”、“赶超英美”、“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口号引发了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没有达到“继续跃进”的目的，另一方面导致国民经济基本比例完全失调，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同时，这一次的“继续跃进”，也是导致全国经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第393页，第55页、第214页。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页、第769页、781页。

③《工人阶级与城市人民公社———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在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载《城市人民公社大放光芒》，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页。

⑤《建国历来重要文献选遍》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⑥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5—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⑧⑩胡乔木：《胡乔木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版，第321页，第322页。

⑨《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

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6页注释、第55页、第214页。

 

三年自然灾害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期间，我国连续发生了干旱和洪水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量农田受害，农业的减产，农村的“共产风”等天灾人祸加在一起严重地影响了粮食的供应，人畜出现非正常死亡。在此期间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民多达 3 000 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饿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

1959 年至 1961 年，全国受灾严重。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的遭受到了自然灾害的袭击。

大英百科全书 1958 年至 1962 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 1959 年六月的 5 天之中超过 30 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所有这些因素导致 1959 年中国粮食产量较 1958 年下降 15%，而 1960 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 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 1951 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 1962 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1958 年 12 月，粮食部党组向中央反映：与 1957 年同期相比，1958 年 7 至 10 月粮食征购减少 88 亿斤，销售和出口增加了 52 亿斤。10 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减少 100 多亿斤。许多地区因为粮食库存急剧下降纷纷要求调入粮食。这是个不好的预兆。1959 年伊始，山东省馆陶县一些公社因粮食短缺，食堂停伙，大量农民开始外逃。随之，全国各地普遍出现春荒，各省市共有 8 228 多万人无米下炊，其中河北省最多，约有 2 000 余万人。山东、河南其次，各为 1 400 万人和 1 300 万人。全国不少地区都开始出现人口大规模外流和局部的饿死人的现象。

1959 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 4 463 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 30% 以上为成灾）面积 1 373 万公顷。这次自然灾害的受灾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为建国后 10 年来之最。

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的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的影响十分严重。

1959年1至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的生长，黑龙江受旱达4寸至5寸深，为历史罕见。

3月的东北，遭受到了干旱，导致春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辽宁省西部地区、辽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连续40至50天滴雨未下。吉林西部、长白山区同样遭遇旱情，无法进行春灌。

4至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等地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

与此相反，从2至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5至9月，东亚飞蝗在山东、河南、江苏等省大面积发生，危害面积约为317万公顷，其中夏蝗面积160万公顷，成为解放以来发生面积最大的一年。

3至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至8月，出现以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

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200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7名。

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黄河流域，河南、山东两省受灾最为严重。河南7至9月平均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减少一半，某些县市的降雨量仅为正常年份同期的1/5。由于降水少，土壤含水量急剧下降，大部分耕地含水量只在12%至15%，旱情严重的地区含水量仅有6%至7%。河南省共有90多个县受灾，成灾面积高达1亿亩。干旱造成大面积耕地绝产。

7至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1959年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并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历来饱受水灾之苦的淮河、长江流域，1959 年的夏天也遭遇到了干旱。在秋熟作物生长旺季的 7 月中旬到 8 月底之间，江苏省仅有 30 毫米的降雨。全省 56 万余座小水库、塘坝中有 67%（约 37 万座）干涸见底。5 400 万亩的秋收作物中有 2 800 万亩受灾。

继 1959 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达 6 546 万公顷，成灾面积 2 498 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 50 年来首位。到 1960 年春天青黄不接之时，饥饿更像瘟疫一样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从 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6 月，华北冬小麦生产区总降水量仅有 50 至 150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了 3 至 6 成。特别是在麦收前期，小麦灌浆的关键时刻，降水量仅是常年同期的一半。长时间的干旱还给许多农作物害虫、病菌的流行创造了良好的天然环境。

1960 年 1 至 9 月，从 1959 秋季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 300 天至 400 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 2 319. 1 万公顷，成灾 1 420 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 1 598. 6 万公顷，成灾 808. 5 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 68. 9% 和 56. 9%。流经山东、河南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 800 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地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 3 812. 46 万公顷，是建国 50 年来最高记录。

1960 年 6 至 10 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 个月里台风登陆达 11 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长达 10 小时至 20 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 11 省受灾面积达 993. 3 万公顷，直接死亡 5 000 余人。山东部分地区 30 多天内降暴雨 19 次，平地积水 3 米至 4 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 143. 7 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

1960 年 3 至 5 月、9 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 11 个省区，受灾面积 138. 1 万公顷。3 至 9 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 21 个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 392. 26 万公顷。

1960年大灾害不仅成灾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受灾的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更大。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部分地区则持续干旱，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根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所编《中国灾情报告》披露的资料，1960年春荒期间，全国共有1.2亿人口忍饥挨饿，其中山东省3 100万人，河北、四川各有2 000万人和1 500万人。迄至当年5月，北京市粮食库存仅有7天余量，天津只剩10天的库存，而上海已经见底。辽宁省10个主要城市也只有8天的存粮。12月底，国家统计局对市场情况作出了分析报告：1至10月累计，粮食收购量比1959年同期下降34%，食油下降42%，生猪下降31%，棉花下降23%。到1960年9月，各地凭票供应的商品已达30余种。这年的粮食产量，根据1961年的核实，只有2 870亿斤，比1957年的3 900亿斤下降了26.4%，基本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6 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为建国50年来的第2位。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1/4面积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 300万，也超过了1960年。

从1960年冬季持续到1961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 300万公顷的农田遭受大旱。

1961年4至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 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1960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省有67万公顷土地未能播种，河南省有73万公顷农田基本失收。

4至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冻、大风灾害，淮北地区有375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毁房屋504万间。

1961年4至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

7至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54%，近100万公顷农田没有收成。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土地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 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4.9%。



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风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产。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农田绝收。

1961年8至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的占9次，是建国50年里最多的。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的如渔船损坏、房屋倒塌、海堤被冲毁、人口死亡等损失都超过了1960年。

连续两年的减产后，1961年的春荒达到了顶峰，全国约有2.18亿人口缺粮。缺粮人口在1 000万以上的，就有四川（2 500万）、河南（2 491万）、河北（2 000万）、山东（1 838万）、湖北（1 673万）、安徽（1 512万）、湖南（1 500万）、辽宁（1 175万）等8个省。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倒退。饥饿遍布城乡，饿死人在各地都不再是骇人听闻的事件。被死神首先召唤的自然是老弱病残，接着就是年轻力壮的劳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安徽、河南、四川等省一些县的人口死亡率竟超过了100‰，河南光山县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高达218.9‰，也就是说一年有1/5的人死亡。许多公社大食堂开不了伙，社员不得不在自家煮红薯叶、野菜。有一个村的党支部，23个党员中就有20个人饿死了，剩下3名党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向省委写下了血书求援。

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1961年9月，刘少奇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当前的“一连三年大灾”是80年来没有的。毛泽东也同意说：“过去局部性旱灾有过，但全国性的没有。”他还指出，中国水利灌溉抵御旱灾的作用“还差得很远。中国几千年来，加上我们十二年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耕地有灌溉。其他地方还是靠天吃饭。要逐步来。”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生产力十分低下，综合国力很弱，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遇到持续三年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共产风、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等，使本已不多的粮食储备很快耗光，抗灾能力极大地削弱使缺粮信息迟后，从而也影响救援的及时性。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

木砍伐，农田荒芜。当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 至 1959 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 415.75 万吨。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还有后果更严重的措施就是坚持一部分农田应该休耕。

与此同时，大饥荒的起因除了由于罕见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歉收和错误的农业革新造成农业减产外，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也是造成着这次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在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时，中共和各级政府又是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的呢?

政府首先对灾荒采取省内返销的措施。省内返销是本省政府对省内灾荒、灾害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缺粮地区的粮食回销。在保证本省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和国家粮食调拨、出口任务的前提下，省级政府对本省内返销粮的数量和地区的发放拥有较大的决定权，可以说硬性政治任务的压力比较小，因此反映在年增长的变化上就比较大。

在灾荒时期，各省都对灾荒作出了反应。除了安徽省外，其他高死亡率的省份在 1959 或 1960 年都加大过返销粮的发放量。其中西南两省四川、贵州反应相对较慢，而河南、湖南、广西、云南、甘肃和青海则明显在 1959 年就对灾荒采取了措施。不过，省与省之间的决策差别非常之大。虽然省级政府采取了救助行动，但是收效甚微。到了 1961 年，粮食的返销量开始有所减少。一方面与灾情已逐渐缓解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各省的粮食库存已耗竭殆尽，无力再增大发放量。

其次，政府也采用了省际调拨大方式。那些灾荒严重的省份会积极地要求中央政府或邻省调入更多的粮食，而那些死亡率低的省份也会积极地调出



粮食而帮助邻省救荒。不过事实上，灾荒严重的省份并没有采取明显的行动向中央或邻省请求调入粮食。过高的死亡率表明即使这些省份大量发放返销粮，也远远不够。

许多灾荒严重的省份实际上隐瞒了本省的灾情。向中央报告要求调入粮食就等于向中央报告本省发生了严重的灾荒，这明显是那些极左省份的领导不愿干的事情。华东的安徽，华中的湖北、湖南以及西南三省直到其灾荒达到高峰之际还在坚持大量调出粮食。

中央对于此次自然灾害作出了相应的防御和补救工作，但在灾荒中仍有大量人口死亡。这里面的原因除了返销量不够大外，主要还是因为不够及时。救荒是时间性极为紧迫的工作，无论返销量是多是少，如果不能及时运抵灾区并发放到灾民手中都统统无济于事。救荒不够及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是“大购大销”造成的时间上的差距。1958、1959 年的大购是建立在高估产、浮夸风和反右倾基础上的，在上层普遍造成了粮食足够多的假象。对基层干部来说，虚报产量和指标已经成了工作的正常部分。许多省份直到春荒高潮的 5 月份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知道开始出现肿病、死人的情况才开始作出反应，但是为时已晚。

其次是粮食的统购统销体制实行以后，粮食的价格成为国家牌价，市场价格失灵。

粮食价格可以敏感的反映一个地区粮食的供求状况。但是，在统购统销的体制下，粮食价格是国家制定的征购价格，根本无法反映各地粮食的供需情况。在缺少价格信号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粮食的供应和需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征购和销售计划主要依靠上级干部根据估计产量、人均留粮和城市用粮来制定，这种计划制定是根据其下级计划部门的上报数字作出的。受到浮夸风的影响，各地虚报产量，并且还报告中央各地农民瞒产藏粮，因此还掀起了一场“反瞒产”运动。

第三，省内粮食的“大购大销”对粮食运输体系和运输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灾荒时期，即使省内的粮食返销和地区间的调运也陷入一片混乱，这也是粮食难以及时到达灾民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年自然灾害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灾难，这场浩劫的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死亡的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同时，由于政策的失误，导致了自然出生率降低，全国人口极速递减，劳动生产力下

降，人民的积极性也受到强烈的打击，整个国家陷入了灾荒之中。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全国出现的这种情形，一方面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使国家领导人对工作中的错误重新进行了思考。

参考文献：

[1] 夏明方，康沛竹，《三年自然灾害——1959 年至 1961 年中国大饥荒》，《中国减灾》，2008 年第 11 期。

[2] 李建军，《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3] 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1959 年至 1961 年，中国经历了建国以后最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经济遭受了沉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期间，农业生产全面衰退，粮食产量骤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发生；工业生产急剧下降，比例关系完全失调，经济效益大幅度降低；市场供求关系日趋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社会经济滑入深渊。

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三年，也是全国面临许多问题的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充斥全党、全国；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全国农业破坏了大部分的农田；苏联撕毁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中速关系走向破裂；国际反华势力也趁机搞破坏。这些问题并发在一起，就成为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的原因。

当时的官方宣传的原因在于“苏修卡我们脖子”，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的确是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部分因素。

当时的苏联政府背信弃义，于 1960 年 7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将它在华专家 1 390 人全部撤回。撕毁了 343 个专家合同及补充书，废除了 257 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而且携走全部设计图纸和有关材料，停止或者大量减少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致使我国 250 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与科研项目被迫中断。我国的建设事业由此蒙受巨大损失。

在中国与苏联关系正日趋走向破裂的同时，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1962 年 2 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带任何条件的方案：允许中国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 300 至 500 万吨小麦。美方的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王炳南同意，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方的沟通中，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1959 年至 1961 年，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春种之际的干旱以及部分地区的洪涝灾害使大量的农田被毁，庄稼歉收。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了粮荒，因此导致大量人口因饥饿、营养不良或浮肿病而死亡。人民吃不饱、吃不着，在生命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进行体力劳动，因此丧失了劳动的积极性和能力，国民经济也在一段时间内止步不前，甚至大幅度倒退。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是造成国名经济严重困难的最重要原因。

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全国出现的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加上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从而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先是“大跃进”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后是人民公社化，都对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958 年 6 月，各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等“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垒起排排高炉，乡乡炼铁。当时政府倡导的土法炼钢，缺少燃料，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缺少炼钢的原材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

1958 年和 1959 年的农业收成都不错，但大锅饭、人民食堂，加上大炼钢铁，庄稼没人管，许多都烂在田里了。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浮夸风、官僚主义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瘟疫和群众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在人口方面：1959—1961 年，这是建国后的一个低谷期。由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出现曲折导致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加之自然灾害严重，粮食短缺，造成人民食不果腹，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得病死亡的人数以千万。结婚率、生育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下降。

自然灾害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河南、安徽、山东等省的农村地区形势比北京、天津还要严峻。经济困境，特别是面临死亡的威胁时，许多到了结婚年龄的人无法结婚，其结果是结婚人数减少，结婚率下降。并且饥荒使许多妇女因营养不良而得了妇女疾病，失去了生育能力，造成妇女生育水平的降低。1959 年下半年，广东惠州市妇女每天的粮食供应量只有 0.4 斤左右。1960 年 3 月，惠州市对该市 26 家工厂的 1 071 名女工进行检查，查出患子宫下垂的 52 人、闭经的 96 人，患病率为 13. 8%。营养不良的另一个后果是怀孕的成功率下降。据统计，1957 年全国妇女怀孕活产率为 95. 31%，1960、1961 年这一比例分别下降到了 92. 58%、92. 04%；1962 年后开始缓慢回升，但 1963 年也只有 94. 66%，低于 1957 年的水平。同时，妇女的怀孕死产率在上升，1957 年全国妇女怀孕死产率为 1. 52%，1960、1961 年分别上升到 1. 86%、1. 56%。三年困难时期最苦的 1961 年，全国出生婴儿死产率、自然流产率和人工流产率都是三年中间较高的。

1958 年全国人口出生率是 29. 22‰。1959 至 1961 年间分别降至 24. 78‰、20. 86‰、18. 02‰。地区性的出生率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方面，1958 年到 1960 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 33.9%、43.9%、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 24.2%。可以看出，积累率过高。这当然为一大批工矿的建设打了基础，但是，只有经过调整才能形成可靠的生产能力。从 1958 年到 1960 年，每百元积累新创的国民收入，分别为 55 元、19 元、负 0.4 元。这个数字说明经济循环不断恶化。

在工农业比例方面，重工业畸形发展。从 1957 年到 1960 年，俺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由 704 亿元增加到 1637 亿元，增长 1.3 倍，其中重工业增长到了 2.3 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 537 亿元下降为 457 亿元，下降 14.9%。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紧张，国家挤农民、口粮挤饲料，粮食挤经济作物，致使农业全面下降。

在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方面，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

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增加大量职工和投资，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人民最必需的吃饭、穿衣已成了大问题。人民生活明显下降。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人均消费粮食由406斤降到327斤。农村发生饥荒，河南、四川、安徽等走在“大跃进”前列的一些省情况尤为严重。大饥荒使人口结婚率和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下降，这也必然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从而使人口总量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在农业生产方面，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最严重的部分。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 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 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 400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5 000亿斤增加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 348亿斤，超过时间产量的1/3。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 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前的水平。轻工业生产急速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 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后果和教训。

在严重困难面前，党和国家开始想办法解决粮食的问题，进行了代食品宣传推广运动。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了一批代食品。北京正式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全力开展征集代食品运动。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秋



收力争多打粮，无论哪一个省、哪一个县、哪一个公社，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

1960 年 11 月 14 日的《紧急指示信》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任务是动员开发代食品，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一些代食品开始如繁殖小球藻，制人造肉，人造蛋白，人造肉丸子，各类植物（蚕豆、豌豆、洋芋等）的橛根，冷树皮，各种野菜、野芹菜、野池米、毛菇及野生菌类，各种作物枝茎（红薯秧、豆角皮等），各类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开始作为主食被利用。

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代食品运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救灾渡荒的措施，从精神上缓解了人们对饥饿的作用比填充肚子的作用更大。

其次，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粮食调运和粮食返销。为了解决当时严重的粮食危机，只能使用国家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周恩来和国家领导人在 1960 年第三季度，根据粮食部门计算，从有关省区调运 60.3 亿斤粮食，去保证京、津、沪、辽出口的需要。

同时，中央对农业政策也加以调整。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滑坡局面，1961 年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由于农业上的问题最先暴露出来，调整农业便成为 1961 年上半年党的中心工作。1960 年秋天，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又称“十二条”）。周恩来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共产风”。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周恩来提出“三包三定”，即包产、包购、包销，定产、定购、定销。周恩来强调说：“三定三包”政策“一定要贯彻，否则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稳定农民情绪，增收农业生产。”

为了同严重的灾荒做斗争，领导人带头提倡节约。为了同严重的灾荒做斗争，毛泽东带头节衣缩食，低标准、瓜菜代，每月 20 斤粮食。为了渡过难关，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 2 斤提高到 2 斤 8 两。至此，全国各地纷纷开展节粮运动。

全国粮食产量逐渐下降，村民口粮严重不足，社员生产自救也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程度，很多人开始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像野菜、榆钱儿等，将它们和粮食掺和在一起，以此来解决吃饭的问题。同时，人们还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出来后，和在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就可以吃。这都是在困难时期人们为了吃饱饭想出来的办法。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传统人们用野菜、草皮、树叶、蚯蚓，各种作物枝茎及各种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等代食品救灾。

三年的经济严重困难时期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中国共产党从中汲取教训，走上了全面调整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

[2] 许涤新，《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88 年版。

[3] 温艳，《三年困难时期救灾途径探析》，《经济研究导刊》，总第 44 期，2009 年第 6 期。

为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中共中央发表的三篇文章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显现出来。由最初对斯大林评价的异议，到 1958 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进入 1960 年，双方的分歧已经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

1959 年 10 月 4 日，送走赫鲁晓夫之后，毛泽东立即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议论，大家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只看到美国当局表面上所谓“爱好和平”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这表明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有“修正主义”的倾向。[①]在中共的领导人看来，无论我们怎样讲，他都不会听的。对美国的问题，对印度的问题，他都听不进我们的话。我们也是赞成和平共处的，这是外交政策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当做路线，他相信苏联跟美国、社会主义跟帝国主义可以永久和平共处下去，可以实现他提出的所谓“全面彻底裁军”，这就不对了。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因此，毛泽东在会上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很重要的教员是反面教员，像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这样的反面教员。用反面教员来教育他，往往比我们跟他辩论，跟他讲道理，会起更好的作用。[②]

10 月 6 日，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访华归国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10 月 31 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再次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把中共领导人比做托洛茨基，把中国的对外政策比做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政策。12 月 1 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社会主义各个国家应该“互相对对表”，即要和苏共保持一

致。他还说，“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符合敌人的利益”。很明显这又是不指名地批评中共领导人。

面对赫鲁晓夫的多次挑衅，12 月 4 日至 6 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共的对策，包括赫鲁晓夫 12 月 1 日提出的“对表论”。会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其中谈了他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在会上，根据这个提纲，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但是，毛泽东又指出，赫鲁晓夫也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所以“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③]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会议最后确定了中共应采取团结为重、暂不公开争论、从容观察的方针。同时会议还认为，应该注意国际上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

1960 年 1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讨论后依然认为，赫鲁晓夫虽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不同于南斯拉夫的铁托。毛泽东也认为，他还没有“完全变成修正主义者”，也没有坏到“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程度。苏联共产党还是一个好党，对赫鲁晓夫还是应该讲团结。然而，时隔不久，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态度就发生了大的转变。

1960 年 2 月 4 日，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华沙条约其他缔约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党的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中共中央派康生等人作为中国观察员参加了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并就全面彻底裁军和缔结对德合约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赫鲁晓夫在会上宣布关于苏联新的大量裁减武装部队的措施，并阐述了苏联在即将召开的东西方高级会议上的立场。会议还通过了《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宣言认为，由于全

 

世界人民为争取和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美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国际局势出现了某些缓和的迹象。整个国际形势正在继续向着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冷战”的拥护者遭到了失败，使战争不能再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苏共中央在没有征得中共同意的情况下，在宣言中声称，苏联政府提出的裁军建议反映了华沙条约缔约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立场”、“所有华沙条约缔约国声明它们愿意参加未来的全面彻底裁军协定。”④中国观察员康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会上宣读了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主张普遍裁军，但是，一直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⑤康生的发言，实际上把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公开了，引起苏方强烈不满。在当晚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中共，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有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还说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提意见可以，但不要玩弄尖锐的词句，不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是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更过分的是他还影射攻击毛泽东是“老套鞋”。2 月 5 日，苏共中央派人向康生等宣读了口头声明，批评康生 2 月 4 日的发言是错误的，还给中共戴了许多帽子，攻击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表现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等等。

2 月 22 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要同西方达成妥协，就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要准备必要的反击。3 月初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收集有关列宁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等问题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在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时发表，要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陆定一分头准备起草工作。为了写好这些文章，4 月初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文章的初稿。毛泽东曾指示，主要是集中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在文章中

可以引用南斯拉夫的观点，但是苏联共产党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所以，对于苏联人的观点不要直接引用，尤其不能引用赫鲁晓夫的讲话。[⑥]

4月22日，中共中央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也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由陈伯达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同志起草的《列宁主义万岁》，主要从理论上阐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文章首先分析了从十月革命到1960年这四十多年来，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人口已经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而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对立。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现在已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将近40%，不用很久，就会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瓦解了，并且还在进一步瓦解中。斗争当然是曲折的，但是总的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正在日益广阔地席卷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事物的发展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者在那里正在一步一步地由强者变为弱者，而那里的人民却一步一步地由弱者变为强者。"[⑦]文章还指出，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列宁主义的影响，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不惜利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对列宁主义进行攻击和污蔑，对列宁的学说进行歪曲。"美帝国主义者，许多国家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表人、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他们为了把世界人民引入歧途，竭力对于现代世界形势进行完全歪曲的描绘，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列宁主义也过时了'这类呓语。"[⑧]文章的第三部分，重点批判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否认暴力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根本区别；否认战争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区别；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否认帝国主义重新发动大战的危险性，否认只有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才有消灭战争的可能性，以至于无耻地把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艾森豪威尔叫做是"消除冷战和建立持久和平及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竞赛的奠基人"；他们否认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还存在复杂的、激烈的，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斗争；等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这些论点，都是为了毒害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思想，而



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9]所以，"当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玷污列宁主义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旗帜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列宁主义。"文章最后阐明了中共中央的立场："作为列宁的学生，作为列宁主义者，我们必须完全粉碎现代修正主义者曲解和割裂列宁学说的企图。"[10]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主要论述了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三大任务：一是建设社会主义，二是争取世界和平，三是团结国际友人。文章指出，苏联用很短的时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就超过了西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赶上或超过美国。相信中国也"能够用跃进的速度前进"。文章还重点谈了要争取世界和平。通过列举美帝国主义在戴维营会谈之后的35件事例，揭露美国还在继续执行它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扩军备战政策。文章指出，"美帝国主义不但正在竭力扩大自己的侵略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迫不及待地扶植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使他们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11]所以，为了争取世界和平，就要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要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

陆定一同志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主要讲了列宁的革命精神。他认为，列宁的精华就是他的革命精神。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前是如此，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也是如此。"在讲话中，陆定一没有点名地批评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他们"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害怕战争，害怕革命，他们自己不想革命，也反对人家革命。既反对资本主义国家革命，也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文章提出，我们的神圣责任就是彻底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这三篇文章主要是重申列宁革命学说的基本原理，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对南斯拉夫进行批判，而没有直接提到苏联及赫鲁晓夫最近的言论，即使提到苏联，也是讲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每篇文章的末尾，都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共同抵制美帝国主义的挑拨。但是，文章中很多地方明显是有所指的，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后来，这三篇文章被合印成一本小册子，以《列宁主义万岁》为题，印成中文、英文、俄文、德文、日文和法文，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引起很大反响，也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大不满。中共中央发表这三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帮助莫斯科改正"错误"，使两党能够团

结起来，没想到事与愿违，反而扩大了双方的分歧，使争论更加扩大化。

注释：

①⑪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299页，第309页。

②③⑥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第233页，第252~253页。

④⑤《人民日报》1960年2月6日。

⑦⑧⑨⑩《红旗》杂志：《列宁主义万岁》，1960年。

参考文献：

［1］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2］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5］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6］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7］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布加勒斯特会议

中共发表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三篇文章后，苏共中央认为我们把双方的分歧公开化了，所以心存不满，在6月份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突然对中国党发动围攻，中苏关系更加恶化。

1960年5月1日，美国U-2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苏联政府为此向美国提出抗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马上转发了苏联政府的抗议。赫鲁晓夫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深表气愤。5月16日，他去巴黎准备参加四国首脑会议，在巴黎他发表了声明，要求美国就此事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苏联政府将重新考虑对召开四国首脑会议的态度。然而，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赫鲁晓夫愤然回国，四国首脑会议随即流产。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对苏联表示了支持。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这次硬起来了，他做对了，我们要给予支持。5月2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1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朱德委员长、宋庆龄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

6月2日，苏共领导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趁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各国党的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中共中央经过讨论认为，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共同点的，苏共中央的信里面说1957年《莫斯科宣言》是正确的，而且，赫鲁晓夫对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的方针也还是对的。有共同点就可以求同，对他表示支持。再有苏共要召集开会，可能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共同对付美国，也有可能是打着团结的旗号整我们，因为中苏两国在很多事情上有了分歧。刚刚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的三篇文章就让苏联人很不高兴。所以，我们要有所准备。6月5日至9日，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举行。在会议上，苏联工会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在报告中大谈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堡垒，还扬言苏联提出的全面彻底的裁军计划实现后，就可以腾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援助。中华全国总

工会主席刘宁一觉得格里申的讲话过分强调了和平共处的作用。据此，刘宁一专门向格里申提出交涉，要求修改报告。他提出："与资产阶级坐在一起，把他们美化，是骗自己也骗别人"。事实上，"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能防止"。为了有助于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6 月 5 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以邀请与会的 20 位外国工会共产党领导人吃饭的名义，试图向他们系统介绍中方的观点。这一尝试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由于受到以苏联代表格里申为首的多数工会领导人的反对而未能进行下去。[①]

6 月 10 日至 18 日，中共在上海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提出的召开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建议。经过几次商议、研究，毛泽东提出，中共代表团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设法同苏共中央就双方的分歧进行一次讨论。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尤其要做好被苏方围攻的准备。毛泽东还强调，既然我们同意开会，就要为开会创造好一点的气氛，四个月内反修宣传暂停一下。会议还确定了中国代表团的方针：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6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派遣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的目的，一方面是按照惯例去祝贺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另一方面是借罗大党会议与各国兄弟党负责人就原定在年内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6 月 17 日，途径莫斯科时，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等人与彭真举行了长达八九个小时的会谈。科兹洛夫对各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避而不谈，只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对中共大加指责，批评我们发表的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把两党关系公开化"，还说我们"修正了《莫斯科宣言》"。中共代表团已经预感到赫鲁晓夫很可能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6 月 19 日，中共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6 月 20 日至 25 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包括中共在内的 50 个党的代表列席了会议。21 日，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致辞，同时向出席大会的各党代表团散发和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赫鲁晓夫在致辞和通知书中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但是直到 23 日下午苏方才将通知书的中译本交给中共代表团。

6 月 22 日，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欢呼。彭真团长也在大会上致贺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贺电，坐在大厅里的人反应热



烈，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却反应冷淡。自从中国代表团到达布加勒斯特后即遭到全面封锁，其他各国的代表团都不与我们接触，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罗党联络员不告诉我们，想去拜会兄弟党也不给安排。想见赫鲁晓夫，也一直拖延不见。想到这些境遇，中国代表团感到苏共要对我们采取行动了。[②]果然，这一天赫鲁晓夫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在会谈中，他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说，你们中国搞“大跃进”，老百姓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到北京去。”他还提到我们提的“东风压倒西风”，实际上是中国想压倒大家，压倒全世界。并且，他依然坚持说中印冲突的责任在中国一方，苏联表示中立实际是在帮助我们等等。面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一系列指责，中共代表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会谈成了双方的又一次激烈交锋。至此，中国代表团终于摸清了赫鲁晓夫的意图：要我们来布加勒斯特“会晤”，就是借机整我们。

6月23日，苏方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6月21日签署的“通知书”，“通知书”的中文译本长达84页，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而且，这份通知书是苏共在莫斯科就准备好的，21日时就印发给其他兄弟党了，赫鲁晓夫在指责完我们之后才发给我们。通知书涉及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时代的性质。他们不赞成说当今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认为帝国主义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已成为可能。第二个问题强调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第三个问题讲和平共处。主要批驳毛泽东曾提出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第四个问题主要谈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还是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第五个问题讲关于国际群众组织，指责中共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独特的立场”。第六个问题是故意罗列一大堆罪名，诬蔑中共违反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第七个问题是指出团结的重要性，指责中共严重破坏了国际团结。[③]整个“通知书”充满了苏共对中共的指责和谩骂，完全是蓄意的攻击。

6月24日上午，12国党代表团举行会议，由罗马尼亚党的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主持，他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的党代表都在发言中攻击中共。只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的党没有这样做。最后赫鲁晓夫讲话时，又一次对中共进行了激烈的攻击。针对赫鲁晓夫的攻击，彭真站

起来批评了他，指出他如何吹捧艾森豪威尔，如何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并强调中共始终维护《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对彭真的讲话十分生气。当天的会议决定发表一个公报。彭真说，原先苏共只告知我们来“会晤”，没有提发表公报的事情。现在我们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说不能修改，还要求中共代表立刻签字。彭真坚持要在公告里加上反对修正主义的内容，赫鲁晓夫也不同意。两个人争吵起来。最后彭真只好表示，事关重大，在没有接到国内指示之前，中国代表团不会当场表态。会议不欢而散。

6 月 25 日，赫鲁晓夫擅自把 12 国党会议扩大成 51 国党代表团会议，欧洲、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兄弟党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中共代表团又遭到围攻。当天晚上，中共代表团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于是代表团制定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6 月 26 日早上，中共代表团在会议上向各代表团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声明公开点名指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声明还说，“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有分歧的。”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的关系”。“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念屈服。”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正忙于应付大跃进所造成的空前困难，格外需要苏联的援助，所以，多数领导人对保持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仍旧相当重视，对苏方的做法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因此，这个声明一面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一面仍然表示：“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



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④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代表团表示同意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公报》上签字。下午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以作总结的形式发言，对中共作了全面系统的攻击。他放肆地诬蔑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采取了"托洛茨基方式"。彭真接着发言回击赫鲁晓夫，两个人再次争吵起来。最后乔治乌·德治不得不出面收场，宣布公报草案已经通过，会议到此结束。

实际上，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对中国的突然攻击是早已预谋好的。这次会议上的争吵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暴露出来，而且使国际社会也了解了中苏关系的走向，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正如摩洛哥一家新闻媒体所说："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早已存在观点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已经产生愈来愈坏的后果。"然而，中共中央还没有把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看得那么严重，在6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依然认为这是"十个指头里边一个指头的分歧"，强调要同赫鲁晓夫讲团结。但是，现实却让中国人不得不担心：据中国驻南斯拉夫代办发回的电报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真理报》已经不再报到中国的消息，连"中国"这两个字都不见了。而且，欧洲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已经追随苏联，公开把矛头转向了中国。由此可见，中苏之间公开的斗争已经不可能避免了。

注释：

①莫斯科的背水之战：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恩恩怨怨 中华网军事频道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90424/15449536_2.html

②③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第282~283页。

④从进著：《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363页。

参考文献：

［1］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

年版。

[2]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3]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4]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 年版。

[5] 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年版。

[6]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二版。

[7]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苏联撤走在华专家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组织了一场对中共的“围剿”，企图压服中国人，结果失败了。接下来，他采取经济手段报复中国，迫使中国就范，从而将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的层面。

1960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汇报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斗争，只是第一回合，双方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所以我们要做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在十月革命节开个兄弟党会议的时候会有一场恶战。会议决定在 7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要着重讨论一下国际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同时，在十月革命节开兄弟党会议之前，不发表对苏联进行论战的文章，即使不指名的也不发表。这个时候，党中央还是认为赫鲁晓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有可能变化。所以还是要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留有余地。

7 月 5 日至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原定的会议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但是回忆从一开始就主要集中在了中苏关系问题上。彭真提出，中苏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会议认为，我们和赫鲁晓夫在现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我们认为革命力量越壮大、越发展，和平的保证就越大，战争的危险就越小。而赫鲁晓夫却认为，革命越发展，战争的危险性越大，和平的可能性越小。另外，他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搞阴谋，进行突然袭击，这不是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所应采取的方法。中苏之间的斗争看起来是长期的。要想使赫鲁晓夫转变过来，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苏共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对他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二是中共坚持不跟他走，不听他的指挥，对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三是利用美国的反面教育。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这次“围剿”我们没有成功，估计下一次在十月革命节时召开的世界兄弟党

会议上还会压制我们。所以我们要静观一个时期，暂时不公开发表和他论战的文章，看他还有什么法宝拿出来。[①]

7 月 14 日至 16 日，周恩来回顾了 1949 年以来的中苏关系。他说，在整个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有错误的，有正确的，但还是正确的是主要的。赫鲁晓夫时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953—1955 年的几年间，由于要巩固他的地位，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与中国党的关系是不错的。1956—1957 年，因为我们在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整个世界性反共高潮期间，是维护苏共的，所以赫鲁晓夫觉得我们对他还是不错的。但是从 1958—1960 年，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想逐渐发展，从惧怕美国到羡慕美国，且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讨好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看到中国的强大，他也不高兴，总想压制我们。在最后总结时，周总理指出，我们和赫鲁晓夫的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从长远来看，我们绝不先发制人，而是要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斗争是为着团结，我们的目的是争取团结，争取能够拖延、推迟分裂的时间，这对中国有利，对世界革命有利，对苏联人民也有利。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后，苏联已经开始了报复行动。先是禁止国内有关中国一些书籍的印发和中止向中国购买书籍，接着停止发行中国的俄文杂志《友好》和中苏合办的中文杂志《苏中友好》，然后是遣送在莫斯科散发“反列宁主义”文件的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最后决定从中国召回专家。

根据苏共中央宣传与动员部 1960 年 6 月的提议，苏联开始对本国作者撰写的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中国领导人著作的书籍进行批评。苏共中央通过的有关决议指出：“上述书籍的大多数作者是对中国内外政策，以及它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问题无深入研究，消息闭塞，缺乏专业性知识的人。这些作者因此美化中国的人民公社，视其为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基层组织，宣传中国工业发展中的所谓“跃进”仿佛源于“小钢铁”，而没有展现苏联对中国工业发展援助的巨大意义。一些作者没有批判地对待发表在中国报刊上的材料，做出错误的总结与结论，混淆苏联读者的视觉。”[②]不仅苏联国内出版的一些书籍被禁，而且中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渠道也被切断。一直以来，苏联都是通过对外贸易联合公司——国际图书贸易公司同中国进行图书交换与购买工作的，中国则是通过中国国际书店。1960 年 6 月 14 日，苏共中央书记处研究了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工人党联络部提出的



关于停止图书交流领域的合作问题。后来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工人党联络部以对外贸易联合公司——国际图书贸易公司的名义起草信函，提出终止合作。但是他们没有指出拒绝合作的真正原因。根据当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的证实，苏共中央在1960年7月召开的全会上提出，"苏共中央应被迫采取某些实际举措，以表示我们对中共领导错误做法的不能容忍。我们没有将中国同志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的错误文章刊登在苏联的报刊上。苏共中央指示苏联相应机构停止向中国购买讲述中国领导错误立场的书籍与其他宣传材料。"③

7月6日，苏共中央通知决定停止《友好》杂志在苏联的印刷与发行。苏中友好协会主办的中文杂志《苏中友好》因为"刊登的材料与众所周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背道而驰，"而同时停刊。停止在苏联印刷与发行《友好》杂志的另一个原因是苏联领导想限制苏联读者从报刊上获得中国的信息，以此"消除苏联读者单方面就苏共中央和中共讨论的问题，展开不必要的讨论。"④

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在1960年6月开始向苏联各机关、单位散发苏联报刊未曾发表的文章和其他材料。苏联中央国际部在1960年6月7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建议，"在适当的情况下通知中国驻莫斯科使馆，类似文件应当只能通过苏联外交部发出。"⑤苏联外交部在一个月后的7月，照会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以无条件的方式建议停止在苏联散发带有中共特别观点的材料，并将负责此项工作的中国使馆工作人员驱逐出境。

7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将苏联政府决定召回苏联专家与顾问的照会转交给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苏联政府在召回专家的照会中称，"苏联机构挑选优秀、极为训练有素的专家到中国工作，这时常对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带来损害。苏联人恪守上级发出的指示，摈弃任何可能被视为干涉中国内政或批评中国内外政策及中国政府的各种言论与行动。苏联专家通过一系列事实深信他们在所要完成的任务面前没有得到中方的信任。事情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苏联专家提供的相关建议书与技术规程被当众烧毁，中国方面还对一些专家实施了监视。这令苏联专家感到羞辱与愤慨，苏联专家在得不到中方信任的情况下被迫向苏联政府请求回国。苏联使馆奉命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与顾问，其中包括军事专家与顾问根据其相应状况由中国撤回国内。"⑥其实苏联政府要找回专家的理由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一面之词。他们说中国方面对来华专家缺乏信任，专家们希

望返回苏联，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在哈尔滨工作的苏联专家证实，“苏联政府所得到的有关中国对待苏联专家态度的报告并非正确。”通过苏联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军事专家组长巴托夫 1960 年 9 月中旬就人员及重要物资撤离进程，致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与赫鲁晓夫的报告也可以证实，召回专家的建议是由莫斯科发出的，而不是苏联专家本身。绝大多数专家其实不了解中共与苏共之间的政治分歧，所以，在向中国政府发出召回专家的照会后，苏联方面立即开始向专家本人解释苏联政府此项决定的政治意义。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没等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又于 7 月 25 日通知中方，苏联在华专家将于 7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全部离境，同时中止按照两国协议应该继续派遣 900 名专家来华的计划。

根据双方过去签订的合同，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原为 156 项，后来又增加了 148 项。到 1960 年，已经完成 157 项，还剩下 147 项。苏联中止合同，意味着这些项目将全部作废。而且，苏联给我们的援助并不是无偿的。他们只是为我们提供设备，我们要向苏方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成卢布计算，这 304 项一共要 152 亿，到 1960 年，我们已经还了 72 亿卢布，剩下近 80 亿卢布的债务我们还要偿还。苏联派来的专家共 1299 人，有一部分属于文教和军事顾问，但大部分是从事经济援助项目的，包括国防工业。这些专家一旦撤走，购买的设备就无法安装。[⑦]所以，苏联这一举措对中国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7 月 31 日，中国政府复照苏联，希望苏方能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中方愿意按原定聘期与这些专家继续合作。但是，苏联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诚意，在短短的 1 个月内，就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 12 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 1 个议定书以及 343 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 257 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许多重要设备。[⑧]

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当时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使中国 250 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扰乱了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工作，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重了我们的困难。1960 年下半年，在一些由苏联专家照管的生产车间，工作完全停止。还有一些企业，由于技术工程干部缺乏对技术的了解和不能正确使用设备，结果导致了事故发生。此外，中国军事工业领域也受到了巨大的影



响。据报道，“国营工厂1961年上半年生产武器、设备及零部件与配件的计划只完成了15.9%。由于材料与物资的匮乏，中国基础军事建设在1961年缩减了50%～70%。中国军队在1961年上半年只得到计划数量23%的钢材，大约10%的木材，4.9%钢板，17%的轮胎。”⑨

召回苏联专家对苏联方面而言同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断绝业已存在的贸易联系使苏联遭受一定的损失。苏联迫不得已对为中国生产的一系列机器与设备以及后来拒绝购买的货物寻找销售市场。中国方面极大缩减了向苏联供应锡、汞及钨与钼的浓缩原料，而钽铌与铍的浓缩物、电压石英及其他原料在供货中则被完全取消。与此同时，这些战略原料开始从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国家。⑩

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中国人没有被困难压倒。毛泽东说，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志气。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各地方也成立一个外贸小组，把钱挤出来还债。8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讲话。他说，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他还指出，苏联这么着急的撤走所有专家，看来他们是害怕，是心虚了。我们不急，要硬着头皮顶它十年。邓小平也说，对付赫鲁晓夫的办法就是顶，即使社会主义阵营剩下我们一家，也要坚持到底。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有干劲，就能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刘少奇也强调，只要我们能够硬着头皮顶上十年，我们经济发展了，粮食过关了，钢多起来了，那就比较主动了。

苏联突然撤走在华专家，给中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是，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经过几年的调整，到1964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好转。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县级以上党员干部介绍了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现状。中共中央依然强调，中苏两党、两国的分歧只是局部性质的，还存在着克服这种分歧的积极因素。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的更坚固的团结。”⑪

注释：

①⑦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313页，第336页。

②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4，目录16，卷宗833，第7～8页。

③④⑩（俄）扎捷尔斯卡娅著，栾景河译：《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一期。

⑤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书记处，卡片集，3848号记录，1960年6月8日。

⑥《苏联外交部文件集》，莫斯科，1985年版，第266～268页。

⑧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页。

⑨《中国红军的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通讯》，总政学院出版社，1966年版。

⑪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323页。

参考文献：

[1] 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2]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5] 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6]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7]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俄）扎捷尔斯卡娅著，栾景河译，《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一期。

中共代表团参加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尽管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不久后就背信弃义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但是，中共方面仍然为改善双方的关系作了最大的努力。1960年11月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中苏关系开始趋向缓和。

1960年8月，北戴河会议快要结束时，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来到北戴河，他向中共表达了劝和的意愿，希望去莫斯科做一做赫鲁晓夫的工作，使中苏之间的分歧通过谈判得到解决。毛泽东与胡志明交换了意见，最后同意他去莫斯科沟通。8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约见周恩来，向他转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两封信，一封信是苏共中央对中国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声明的答复，另一封是建议在1960年11月举行莫斯科会议前，中苏两党举行一次会谈，交换意见。契尔沃年科表示，苏共中央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苏之间的分歧，也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发展两党的团结。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9月10日，邓小平通过苏联大使向莫斯科转交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通知书》的《答复书》。《答复书》对《通知书》中苏共歪曲事实、攻击我们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逐一批驳。

9月17日，由邓小平和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团进行第一次会谈。苏斯洛夫一开始就抢先讲话，他一边说愿意消除分歧，一边又指责说中共的《答复书》讲了许多反马克思的观点，不考虑苏共的意见，这是20年代托洛茨基事件以来对苏共的最严重的攻击。针对苏斯洛夫的责难，邓小平一一作了回击。19日、20日双方又进行了两次会谈，每次都是针锋相对的争吵，不欢而散，但是，双方又都留有余地，没有完全破裂，最后决定以后继续谈。

10月2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代表，

组成了26国起草委员会，为莫斯科会议起草声明。中国党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为副团长，团员里面有李井泉、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刘宁一。会议从10月2日开始到10日，共召集了七次全体会议，每个代表团都作了一般性的发言。在第一次会议上，苏共提出了莫斯科会议声明草案，与会各党同意以此草案为讨论的文本。邓小平在10月5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和苏共草案中的一些提法，做了正式讲话，就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裁军、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党所处的形势、和平过渡、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问题，申明了中方的立场和观点，驳斥了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所谓"滚到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所谓"不依靠相互援助和单干"、所谓"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等提法。[①]

全体会议以后，起草委员会又成立了秘书处，负责修改文件。从10月10日到21日，大会秘书处又召开了十一次会议，讨论和修改草案。我党代表团在邓小平和彭真的组织下，研究了苏共的草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秘书处会议上由康生和胡乔木根据中国代表团的修改方案逐条提出意见。秘书处的会议也开得十分激烈，大家都发言，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各自为自己的意见来辩护。我们党提出修改意见之后，苏共代表团发言，同时也组织其他代表团来反驳。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尼、朝鲜、日本等代表团除了阐明自己的意见外，对我们代表团提出的重大修改意见，都表示了支持。[②]对于苏共草案中可以接受的或经过修改、补充后可以接受的观点，中共党代表都表示支持；对于我们不赞成的提法和意见，就在发言中详细说明我们的理由，表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经过十多天的热烈而又激烈的讨论，到21日，秘书处草案基本上达成协议，但是一些重大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10月22日起草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发言，提出有三个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团结问题，没有重申各国共产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协商一致的原则是我们党坚持的，就是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如果讨论什么问题，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强迫少数接受意见的行为和方法，应该采取通过协商、讨论、交换意见，达成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达成一致，苏共反对这样的提法。二是文件草案全面肯定了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这个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中共认为，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不能凌驾于全世界所有党之上。一定要服从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决议，这是不对的。三是在战争和和平



的问题上，中共还有保留意见。起草委员会一共开了二十天的会，最终仍没有拿出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声明草案，所以决定把修改过的稿子和争论中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起提交11月份即将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1月10日至12月1日，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参加此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为刘少奇，副团长是邓小平，团员有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刘宁一和刘晓。还有胡绳带领的顾问团，翻译组由阎明复负责。在出发前，中央召开了几次会议，确定了此行的方针和任务。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的协议。[③]

11月7日，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十月革命43周年的纪念活动。苏共交来了对中共中央9月10日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的答复。这份答复的答复，对中共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并且苏共将其散发给其他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这使会议还没开，就笼罩着一层不愉快的氛围。

11月9日下午，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到刘少奇同志的住处会见代表团。他们说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把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告诉我们：立场就是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因此赫鲁晓夫在这个即将召开的大会上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到他的答复书中谈到的问题。两党的分歧还是可以讨论的，不要提到这个会议上。米高扬提出，希望两党的争论就此结束，不要再提。而且苏联会继续援助中国，专家还会重新派去。很明显，苏共中央表面上维护团结，让我们不要提争论，实际上是以散发答复的办法来谴责我们，还让我们对谴责默不作声。对此，刘少奇毫不示弱地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的愿望来的，在北京时就准备好了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讲话，可是你们11月7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愿望，原来的想法就不得不改变了。因为你们一边说团结，不争论，一边又提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讲的团结不真实。你们的来信我们研究后，将决定我们的立场。看来非要在会议上回答你们了，争论是你们挑起来的。[④]

苏共中央11月7日交来的答复，对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对毛主席的论点，比如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再次进行了攻击。这些攻击，代表团决定必须在会议上驳斥。因为又将面临一场复杂的斗争，代表团讨论由谁在会议上发言。考虑到发言以后，苏共以及其他的一些党在苏共的组织下一定会发起攻击，会有很激烈的斗争，所以当时想，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共和

国的主席，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如果他发言，那么其他代表团的发言一定会指名道姓地攻击他。所以，不能让他第一个讲。后来决定由邓小平同志来发言，这样，该讲的话就会讲透。这个建议报告中央后，获得了批准。

11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言，他讲了两个多小时，多次影射攻击中共。赫鲁晓夫讲话结束的时候，有几个党带头鼓掌起立，全场跟着起立。但是中共代表团没有鼓掌也没有起立，用这种方式表明了对赫鲁晓夫发言的态度。

11月14日，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就当时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如时代的性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防止世界大战，争取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准则等做了精辟的阐述，申明了我们党的观点，指出我们不能同意和接受苏共的论点。同时，针对苏共的攻击，邓小平列举大量的事实，说明赫鲁晓夫坚持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错误，破坏了中苏关系。他还强调，应该迅速采取缩小分歧的步骤，立即停止一切公开的攻击，不要明骂也不要暗骂，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和父子国的关系的。最后他指出，如果社会主义阵营最后的分裂代替了团结，世界的形势必然会发生巨大的逆转，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于和平，对于世界进步事业都是灾难。

邓小平的发言，如中国代表团预想的一样，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苏共组织了大批参加会议的党的代表发言，对中共进行猛烈的攻击，为苏共辩护。同时，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日本、印尼、澳大利亚，还有其他的一些党的代表，在发言当中，从各自的角度批评了苏共的观点和做法，支持中共的立场。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在发言当中，直接指名批评赫鲁晓夫，指出布加勒斯特会议是错误的，并且讲了很多的事实，说明阿尔巴尼亚不同意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断绝援助，分裂阿尔巴尼亚党。霍查直言不讳地指出，正是苏共在搞派别活动。霍查的发言，引起了会场的震动，有很多代表团发言，对霍查进行辱骂。很明显，这是赫鲁晓夫操纵多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了会议的其他代表。

11月17日，中共代表团接到指示：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对会议声明，必须坚持反对写上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坚持关于对战争要准备两手而不是一手的论点，坚持不接受有关派别活动的提法，否则就拒绝签字。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不签字不等于分裂。接到指示后，代表团就把中共的立场陆续地通知了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团。



11 月 21 日，波兰党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还有他的总理到刘少奇同志的住所拜访。他先讲了一些必须团结的话，然后对怎样修改草案提出两点意见。第一是只写苏共二十大，肯定二十大，不写二十一大，而且在文字上，完全可以照抄 1957 年的声明当中对二十大的提法。第二就是派别活动，谴责派别活动，要写上，写法可以改变，力求使别人不会理解是针对中共。哥穆尔卡明显是苏联的说客。刘少奇同志说，1956 年苏波关系不好，我们曾经努力加强团结，缩小分歧。现在你们关系好了，我们很高兴。现在中苏关系发生争论，也希望波兰同志本此精神，做做工作，而不要增加困难。至于他提出的两点建议，刘少奇表示坚决不能同意。哥穆尔卡又讲阿尔巴尼亚是华沙条约国的成员，不能闹独立，单独行动。这其实是赫鲁晓夫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面目已经暴露无疑了。刘少奇严肃地批评了哥穆尔卡的看法。实际上也是通过哥穆尔卡，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了苏共。

11 月 24 日，邓小平针对苏共和其他一些党对我们的攻击，做了第二次发言，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揭露了赫鲁晓夫实行的路线实质上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压力，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自己不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的错误路线。二是对赫鲁晓夫攻击毛泽东的论点进行了回击。[⑤]

从 11 月 24 日到 29 日，文件起草委员会举行了四次会议，讨论存在争议的问题，包括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包括协商一致，包括集团活动、派别活动等问题，争论得非常厉害，没有达成协议。在 11 月 25 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同志邀请日本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澳大利亚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古巴共产党等代表一起开会，呼吁中苏两党克服分歧，达成一致，并且开始斡旋。

11 月 26 日下午，苏共中央的米高扬、苏斯洛夫来到刘少奇同志的住所访问，实际上是想探听我们代表团的最后态度。刘少奇利用这个机会，明确表达了中共代表团对会议和声明草案的看法。他再一次指出我们是本着团结的态度来的，但是苏共如果硬要坚持写民族共产主义、集团派别活动的问题、肯定二十大和二十一大，还搞一个内部的决议来谴责中共，我们代表团就不会签字。米高扬、苏斯洛夫辩解了一番，又说中共的修改意见，都可以商量，协议是有让步的，总可以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28 日，代表团收到中央的指示，中央对形势作了分析，指示代表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妥协、可以签字，以及斗争中应注意的策略。

29日，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讨论声明草案。彭真与苏方代表科兹洛夫私下就分歧问题再次交换了意见。彭真提出中方妥协的条件：第一，不做任何内部协议；第二，声明中不能写反对宗派活动和民族共产主义；第三，声明中要写协商一致的原则；第四，同意保留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但措词要修改。[⑥]科兹洛夫表示同意这样的意见。于是，30日上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人进行了会谈，基本上按照中方的条件达成了妥协，文件起草的几个分歧终于达成了一致。会谈中，双方表示，希望结束两党的争论，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1957年前的水平。双方还商定，会议之后，刘少奇同志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12月1日，莫斯科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苏斯洛夫代表起草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接着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刘少奇指出，会议的声明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愿望的，是有利于争取和平、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有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它又一次证明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讨论，通过协商的办法，取得一致，是兄弟党之间解决分歧的唯一道路，虽然过程是曲折的，有一段时间内的气氛不正常，但是兄弟党之间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终于克服困难，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尽管不少兄弟党对我们党提出了我们不同意的批评和指责，但是我们认为，并不妨碍我们和兄弟党之间继续保持良好的同志党关系。最后，他又指出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重要性。[⑦]讲话结束时，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党的代表全场起立，热烈鼓掌。然后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并举行了签字仪式。会议结束后，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庆祝会议最终取得较满意的结果。宴会非常热烈，充满团结的气氛。

12月2日至9日，刘少奇同志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莫斯科举行了友好大会，对刘少奇等人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回国之前，刘少奇去看望了赫鲁晓夫。他说，不管有什么分歧，都应该由我们两党来协商一致，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两党应该团结，同时他还劝赫鲁晓夫要善对阿尔巴尼亚。

经历了二十多天复杂的斗争，中国代表团坚持原则，删掉了苏共企图强加给会议的一些影射攻击我们党的提法，使整个宣言草案基本上符合我们最初的目标。而且，中苏两党的关系非但没有破裂，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这是参加此次会议的最大收获。

注释：

①③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88页，第90页。

②④阎明复：刘少奇出席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人民网资料。http：//www. people. com. cn/GB/shizheng/8198/30513/30519/2533582. html

⑤⑥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第412页。

⑦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参考文献：

[1] 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2]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5] 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6]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7]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苏共二十二大两党再起分歧

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后，中苏关系有了一点缓和。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最亲密的兄弟，最伟大的友谊》，高度赞扬了中苏之间的关系。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50万吨古巴糖，缓解中国的经济困难。周总理3月8日表示接受50万吨糖，建议把苏提供的粮食作后备，就不必运来了。赫鲁晓夫还表示愿提供生产米格21型飞机的全部资料，并且，中苏贸易中，中方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并不计利息。[①]然而，不久之后的苏共二十二大，两党再起分歧，使刚刚缓和的局面又再度紧张起来。

赫鲁晓夫一面对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一面又不顾中共的劝阻，对莫斯科会议上全力支持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进行打压。1961年3月，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谴责阿尔巴尼亚的决议。同时，苏联军队撤出阿尔巴尼亚。5月，苏联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在苏联的操纵下，8月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拒绝阿尔巴尼亚代表出席。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刘晓受中央委托发表口头声明，反对苏方拒绝阿代表团出席会议的做法，呼吁改变此项决定，但是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及指责。

1961年8月，苏共中央对外公布了即将提交给苏共二十二大讨论的纲领草案。8月5日，《人民日报》以六个版的篇幅刊登了苏共的纲领草案。在这个草案中，苏共将二十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进一步系统化，并且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此时，中共正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于苏共的纲领草案，与会者也曾多次讨论过。9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陆定一、王稼祥、彭真等也参加了会议。陆定一在会上做了发言。他说，《苏共纲领草案》将赫鲁晓夫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报告做了一些修补，有更大的欺骗性。而且，这个《纲领》比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81党会议的声明都倒退了，他赫鲁晓夫把莫斯科声明中删除的一些错误观点又拿回来放到了纲领草案中。陆定



一认为，《苏共纲领草案》反映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他们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分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②]毛泽东说，这两年我们的斗争没有完全拖住赫鲁晓夫，没有改变他的基本立场。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高薪阶层，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赫鲁晓夫却认为这个社会是一个全民国家，他的思想已经背离了马列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刘少奇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把赫鲁晓夫的理论概括为"三和两全"。"三和"是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是指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些理论是违反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看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形成了"。[③]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苏共已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尽管中共对这个纲领草案持否定态度，但是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前，却一直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

9月20日，刘少奇召集会议，讨论出席苏共二十二大的方针。刘少奇指出，苏共的纲领草案主要还是针对我们和阿尔巴尼亚，只是没有点名而已。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中共代表团依然要奉行既坚持原则，又坚持团结的方针。如果苏方攻击阿尔巴尼亚，我们要表示反对；如果攻击我们，则进行反击。

10月16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与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赫鲁晓夫在谈到斯大林时使用了一些极其粗鲁的语言，如"斯大林是个坏蛋"，是个"白痴"、"傻瓜"，"刽子手"等等。周恩来只是专注地听完这些话而没有反驳。其实，从赫鲁晓夫的谈话中，中共已经意识到苏共二十二大可能要对斯大林做进一步的否定。所以，周恩来只是说："我们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对斯大林有很大的意见。这些很大的意见是与他对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的评价有关的。在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时，我们并没有把这些错误归咎于他，而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党的错误。我们把所犯的一切错误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不去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这些错误负责的问题。"[④]

10月17日，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主要论述了他的"三和"理论。他说：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胜利将属于社会主义。"这个胜利将在和平竞赛中取得，而不是通过发动战

争的途径。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立场，将尽一切努力巩固世界和平。”他还指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已经完全成熟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沸腾起来的不发达的国家把反帝的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就将能够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以，在现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发展的水平如何，实际上都可以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⑤]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不指名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人发动了攻击。因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一个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国家，所以，赫鲁晓夫此举无非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更出人意料的是，赫鲁晓夫再次提到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因为莫洛托夫对苏共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他说纲领草案体现了实用主义、和平主义，甚至修正主义的观点。这让赫鲁晓夫十分恼火。在会上，赫鲁晓夫说莫洛托夫是“反党集团”的主要谋士，是“不可救药的保守主义者”。同时，他也再一次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他说，斯大林总是不信任身边的人，滥用职权迫害好同志，许多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像楚巴尔、科西奥尔、波斯季谢夫等同志都无辜地死去了。他甚至扬言要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出列宁墓。米高扬、谢列平等苏共领导人也在会上谴责了斯大林。苏共中央甚至在会上公布了列宁当年不赞成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政治遗嘱。实际上，赫鲁晓夫把苏共二十二大搞成了“四反”大会：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中共。听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共代表团立刻请示中央，对代表团针对赫鲁晓夫所讲的几个问题该怎样表态提出了建议，请中央研究最后定夺。接到电报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经过研究商讨，会议决定在周恩来的发言致词中加上一段话，表明我们不赞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这样公开反对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因此。10 月 19 日，周恩来在大会致词中明确指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所以，中国共产党希望“有争议的、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⑥]周恩来的讲话赢得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而主席台上赫鲁晓夫等人却没有鼓掌。在中国国内，由《人民日报》于 10 月 20 日摘要报道了赫鲁



晓夫的总结报告，并全文发表周恩来的致词。这既表示出中共对苏共报告的重视，又申明了中方强调团结的立场。在莫斯科，21 日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花圈，上面分别题词："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和"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约·维·斯大林"，[7]以此表达对赫鲁晓夫在会上反斯大林的态度。

根据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决定找赫鲁晓夫谈一次，表明我们反对他们大反阿尔巴尼亚的态度，然后提前回国。22 日，中国代表团与苏共主席团负责人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了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会谈中，按照中央的指示，代表团从正面阐述中共对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苏共党内反党集团等问题的立场和态度，而不直接批评苏共纲领，不就意识形态分歧问题做面对面的争论。周总理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报告中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党的做法，重申中共中央是反对这样做的。他指出，苏联最近几个月对阿尔巴尼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不对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符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周总理希望苏共中央能郑重考虑中共的意见，主动同阿尔巴尼亚搞好关系。关于对待斯大林的问题，周总理指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已经多次与苏共谈过了。毛泽东同志在 1956 年 4 月和米高扬、尤金谈话时就指出，"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计"，斯大林功大于过。11 月间，毛主席又对尤金说过，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斯大林。[8]会谈持续了九个多小时，但是，赫鲁晓夫根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他反对中国党关于阿苏关系的批评和劝告，而且也不同意中国党关于对待斯大林问题的立场。赫鲁晓夫不满地表示：中共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对苏联党内"反党集团"的支持。他还公然地宣称："我们过去是很需要你们的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了。"[9]

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3 日，周恩来以要回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由向苏方提出提前回国的要求，并指定彭真为代理团长。赫鲁晓夫明知道这是中共的托词，虽然心中不快，却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去机场为周恩来送行。10 月 24 日，周恩来乘专机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到机场迎接，迎接周恩来的仪式异常隆重。当周恩来走下飞机看到毛泽东时感到很吃惊，毛泽东极其热情地向他问好。中共中央以此向苏方表明中共的不满情绪和态度。

虽然中共代表团在会上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一般性辩论，但是周恩来回国后，以彭真为代理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一些参观活动中，尽量避免涉及两党的政策分歧，主要还是讲友好团结。彭真认为向群众讲话应和会议讲话不同，气氛要和缓一些。[⑩]

10 月 26 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决定，《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20 日发出的谴责赫鲁晓夫的声明。苏共二十二大最后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并在通过的《关于弗·伊·列宁墓的决定》中提出："在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针对这件事情，毛泽东在 10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不写文章，对此默声抗议即可。彭真在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指示刘晓说：尽管两党争论很激烈，但两国关系还要保持友好，应多做一些友好工作，不要把形势弄得太紧张，使得没有回旋余地。中苏关系还在变化中，改善关系的因素仍然存在着，因为两国都有此需要。[⑪]然而，12 月份，苏联还是同阿尔巴尼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苏共二十二大是苏联恶意再次挑起中苏的分歧，使中苏关系再次陷入紧张的状态。1962 年 4 月至 5 月间的伊塔事件和中印边界冲突，则重新燃起了双方争论的战火。

注释：

①张德群：《解密 60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网资料。http：//www. china. com. cn/aboutchina/zhuanti/zg365/2009-06/24/content_ 17994036_ 3. htm。

②③⑧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60 ~ 461 页，第 467 页，第 473 ~ 474 页。

④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著，彭卓吾译：《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党的文献》，1993 年第 5 期。

⑤张静如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二卷，青岛出版社，2009 年版，第 450 页。

⑥《人民日报》，1961 年 10 月 20 日。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441 页。

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85 页。

⑩⑪刘晓著：《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第 113 页，第 114 页。

参考文献：

[1] 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 年版。

[2]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3] 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4]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 年版。

[5] 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年版。

[6]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二版。

苏联在新疆制造叛逃及暴乱事件

1962年4—5月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发生了数万边民集体逃往苏联境内事件，一些不法分子还趁机制造暴乱。这些事件的发生与苏联的阴谋颠覆有关，中苏关系再次跌入低谷。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中原内陆相隔甚远，历史上多次受到沙俄的侵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俄罗斯先后侵占中国西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虽然沙俄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但是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不利于发展，一旦发生战争，也不利于防守，所以俄国早存掠夺新疆人口的意图。

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领整个伊犁，根据《中俄伊犁条约》规定：伊犁人民可以自愿加入俄国籍。为怂恿中国居民迁入俄国，俄方造谣生事，煽动因内乱而到俄境避难的伊犁人进入俄国。1881年4月，沙俄占领军当局在伊犁建立了非法的专门机关，负责掳掠人口。当年就将100余户中国人迁往俄国。第二年，规模更加扩大，上半年掳走6 549户，下半年掳去牧民5 000余毡房。掳掠人口的罪恶活动延续3年，直至1884年才结束。前后被掳至俄境者共7万人左右，胁迁而去者占十之六七。[①]到了俄国之后，部分人因不堪忍受沙俄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压迫欺凌，又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困苦，逃回伊犁。

1912年前后，俄国相继有3 000多户哈萨克牧民进入中国伊犁地区。后来，新疆地方政府要求俄方接收这批哈萨克难民回国，但俄国领事以这些难民已被取消俄国国籍为由，拒绝接收。新疆地方政府只好接纳这3 000多户哈萨克族难民加入中国国籍。1916年俄国革命爆发，为了逃避兵役，许多哈、维、回族人被迫逃入中国新疆境内。当时，逃入中国新疆伊犁、塔城一带的难民基本上是哈萨克族。逃人塔城地区7万人，伊犁地区16万人，还有2倍于人口的牲畜。1917年伊犁方面共遣回俄国10万多人，牲畜26万多头，还剩9 000多人。塔城方面遣返5 000多户，余下5 000多户。尽管新疆地方当局善言劝令出境，但留居者不少。1927年，留居新疆的哈萨克族

 

难民拥有了中国国籍。1930 年前后，又有一大批不堪忍受的农民逃入新疆地区。[②]1917 年至 1933 年间从苏联逃入新疆的人绝大多数没有苏联护照，新疆地方政府向他们发放公民证，从法律上确认他们为中国人，于是他们被定为“归化族”，成为当时新疆的 14 个民族之一。“归化族”事实上已不再是苏联侨民。苏联驻新疆的 5 个领事馆对此均未提出异议。二战结束后，苏联因战争和饥饿、肃反等使人口和劳动力锐减。为了解决苏联国内粮食短缺的问题，赫鲁晓夫在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地开垦荒地，建立了许多机械化农场，动员组织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青壮年去各地开荒。但是许多人吃不了苦，就跑回去了。因此，农场劳动力变得十分匮乏。

1954 年 4 月，苏联政府决定迁返苏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中国政府答应了苏方的要求，并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此外，赫鲁晓夫在 1954 年 9 月访华时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 100 万工人到西伯利亚帮助开发森林资源。根据他的请求，中国政府于第二年派出 7 000 名河北青年农民到西伯利亚协助苏联开发森林。这些人都是年轻力壮的棒小伙，有的苏联人就怀疑他们是人民解放军。他们担心大量中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将会把那里变成中国移民的乐土。因此，此次劳动大军抵苏后，苏联政府即告知中国，西伯利亚劳动力已经够了，无须再提供了。其实这只是托词，苏方是既想得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又担心“引火烧身”。为了解决劳动力饥荒，苏联政府想到煽动新疆边民逃苏的办法。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与苏联中亚地区的居民有着血缘关系以及相同的宗教、文化、语言，他们对苏联的强大和富裕生活也很羡慕。据资料记载，苏联党政组织、集体农庄擅自迁移中国公民的事情曾经发生多起。1956 年吉尔吉斯某集体农庄党委书记（柯族）来新疆柯尔克孜自治州探望亲戚，动员 280 户准备去苏，中国政府发觉后向苏领馆提出制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处长铁衣甫阿吉（苏联籍）1958 年去哈萨克斯坦探亲，当地一区的党政负责人和农庄负责人给他交代任务，让他负责把伊宁县哈西乡的 462 户农民（全部为中国人）动员到该区去，后哈萨克斯坦党中央书记日甫由夫（哈萨克族）还请他到阿拉木图，热情接待，答应任务完成后给以高位和好的生活。铁衣甫阿吉回新疆不久，苏联驻伊领馆转来了“委任状”，上写：“委任铁衣甫阿吉为代表迁移伊宁县哈西乡 462 户人家回苏。”[③]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分歧逐渐加深，中蒙、中苏边境形势渐趋紧张。1960 年 2 月，苏联边防军占领了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苏联接界的额尔古纳

河尚属于中国的克鲁赤纳岛。4月，苏联边防人员又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驱赶中国牧民，并绑架中方人员。边境冲突发生后，中方认为应以大局为重，秉承“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试图修复日趋恶化的中苏关系。

然而，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两党的分歧开始公开化，苏联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迪道夫等人以各种名义，多次在伊犁、塔城等地进行非法煽惑边民外逃活动。与此同时，苏方还直接派遣特工人员秘密潜人中国境内的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区，纠集联络其骨干，拉拢边民，组织外逃集团。苏方还设立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广播电台，加紧进行反中的宣传攻势，攻击中共和中国政府政策，激化边民的不满情绪，以鼓动边民外逃。[④]

1961年上半年，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恢复了1950年自动撤销的对新疆的维语广播节目，录制返苏侨民和逃苏人员赞美苏联的讲话、访问记等，频繁播放，其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国的维语广播电台相近，极易为新疆地区的听众所接收。[⑤]另外，苏联公民以及越境逃苏人员在与境内亲友的通信中，也鼓吹和宣扬苏联的“自由”、“优越”，并邮寄糖果、肥皂等国内紧缺生活日用品，在信件和包裹中还夹寄苏联政府提供的各类苏联公民身份非法证件。同时，苏联政府趁中国经济困难和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散布一些谣言，如“苏联成立了维吾尔斯坦”，“什么人都可以去苏联”，“苏联人都要回国，苏联派飞机来接”，“霍城边界已经开了好几个口子，逃跑很方便”，“中苏要打仗了”，“中国打不过苏联”，“和田已经暴动了”，“印度6月份开始进攻”等等，制造紧张气氛，以达到诱使中国边民逃苏的目的。[⑥]

1961年年底和1962年年初，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秘书切莫合尼克多次来到塔城专区从事非法活动，并多次接见当地居民。1962年4月4日，季托夫来到塔城，煽动当地居民逃亡苏联。他鼓动大家说：哈萨克族人总是要回苏联的，如果中国不阻挡的话，你们就跑。5天之内，季托夫会见了同苏联侨民有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1 573人次。4月8日下午，季托夫未经当地政府许可，擅自组织群众聚会，并授意苏联侨民在居民中进行煽动工作。他走后不久，塔城地区就有数百人联名上书，申请去苏联。大批自称是苏联侨民的人向当地政府请愿，要求去苏联，甚至扬言要大批外逃。边民的情绪被这些不法分子煽动起来。[⑦]起初只有零星的边民越境逃苏，持续数日后，塔城地区所属的裕民、额敏两县也开始有人非法越境。渐渐的，托



里和布克赛尔、乌苏、沙湾等县也受到影响。非法越境逃苏势头急剧扩大，由起初的单人空手非法越境，发展到拖儿带女，携带财产、牲畜非法越境；由夜间秘密越境，发展为白天公开成群结队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与此同时，伊犁州直属县市也出现群体性的外逃现象。起初是霍城县沿边公社有人零星非法越境，很快就波及至全县。到4月15日，已发展为成群结队地携带大批牲畜、农具，驱赶着马车、牛车公开越境逃苏。[8]

在中国新疆边民大规模外逃期间，苏联边防不仅拒绝遣返中方越境人员，而且设置专门机构安置那些非法越境居民，并在伊犁、塔城等地中苏边界设立临时接待站，配备运输车辆，提供食品、医药、货币，大批地运送越境边民。在塔城县、裕民县、霍城县等地的边境线一带，苏方甚至将铁丝网打开口子，用探照灯、信号弹、汽车灯或安排专人协助，接应中国边民非法越境。[9]

边民越境事件发生以后，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于4月24日邀见苏联大使，向其提出备忘录，希望苏联有关方面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这种情况，恢复中苏国界上的正常状态，避免对两国或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产生不利影响。[10]当时新疆的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印度在美苏两国的援助下，加紧侵占中国领土，中印战争在即，新疆军区国防部队承担了西线的备战任务，不可能调集大量的兵力去镇压边民外逃。另一方面，外逃人员是在各地基层少数民族干部的率领下，有组织地集体逃跑。他们受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操纵和苏联的煽动，手执武器，情绪十分激动。霍城县外逃的群众也是由小队长率领，用猎枪、镰刀、坎土曼、大头棒作为武装，声言“谁不让走，就拼死”，并公开用猎枪威胁前往劝阻的县长巴扎尔。他们还大肆抢劫社队和国家财物，殴打干部和战士。鉴于此，如果中方强行阻拦，势必会引起去意已决的群众强烈的对抗情绪，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冲突，那既不利于新疆的稳定，也会影响对印备战，所以通过武力强行阻止外逃不太可能。除了与苏方进行严正的交涉外，主要还是动员各方力量，深入边境地区，对当地群众进行教育和劝阻。不少干部因此被打伤。即使这样，各地依然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继续对外逃的边民进行说服教育。外交部指示，对回来的人，我们应该一律接受，并好好安慰、说服、安置，要维护好外逃人员的财产。对于已经回来的逃跑社员，要基层干部亲自送去，并进行赔礼道歉切实做好逃跑后又返回群众的巩固工作，尽管这部分人数量不多，也要表示热烈欢迎，解除他们的顾虑，

安定他们的思想情绪，以争取逃走的群众继续返回，稳定人心。[11]要千方百计安排好群众生活，加强民族宗教政策教育，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5月初，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但是，伊宁市边民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5月中下旬，几乎每天都有外逃事件发生，而且有不少人搭乘客运站班车取道霍城逃往苏联。运输站上等待买去霍城车票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每天都有几百人拥挤在车站上。5月29日上午，伊宁市客运站聚集了数百人等候买票去霍城。当苏联领事馆的汽车经过时，季托夫甚至向人群示意。为了防止波动过大，伊犁州决定下午起暂时停止出售由伊宁市去霍城的班车票。破坏分子利用这部分人急于要走的心理，煽动其进行骚乱，于是引发了伊犁"5·29反革命暴乱事件"。一些人殴打客运站干部，围攻伊犁州州长。没买到票的边民去苏联领事馆求助，苏联领事塔查尔金告诉他们，买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他们只管办理回苏联的手续。矛盾进一步激化，经一些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是苏联侨民的人的煽动，这部分人在晚上袭击了州人委和区党委。[12]5月30日，在中方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边民，封闭了伊犁、塔城部分地区的边境。同时，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增强边境的控制力量。随后，成批外逃的风潮遂基本平息。

在反外逃斗争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原则，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办法，积极劝阻制止外逃。虽然这次边民外逃及暴乱事件的发生，与我们的民族工作不完善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苏联的阴谋煽动是最主要的原因。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把它带到了新的中苏关系中。对于关闭中苏边境往来通道，苏联认为是中方对他们的敌视。但是，新疆边民外逃事件，也让中共不再信任苏联。中苏关系岌岌可危。

注释：

①顿时春、陈伍国：《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的历史渊源》，《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1期，第137页。

②（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3年版，第329页。

③新疆自治区办公厅1960年59号卷。

④⑥⑧⑨⑩⑪中共伊犁州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伊塔事件"始末及其反思》，第33页，第51页，第6页，第33页，第45～46页，第66

~67 页。

⑤李丹慧:《对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 年第 4、5 期。

⑦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二版,第 351 页。

⑫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507~508 页。

参考文献:

［1］顿时春,陈伍国,《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的历史渊源》,中共党史资料,2009 年第 1 期。

［2］李丹慧,《对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 年第 4、5 期。

［3］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二版。

［4］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 年版。

［5］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中苏爆发公开论战

经历了伊犁、塔城边民外逃事件后，12 月份赫鲁晓夫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中共对苏联越来越不信任。而莫斯科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肆地攻击中国，终于双方爆发了公开大论战。

1962 年 11 月初至 1963 年 1 月，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意大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先后召开。在这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按照苏共二十二大的方式，从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发展到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一次比一次恶劣，到最后德党六大时，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国。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国代表团分别发表了抗议声明，指出我们党的代表团是抱着增强兄弟党的友谊、增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真诚愿望来参加大会的，但是，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和一些党的做法，不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只能加深分歧，制造分裂。

为了公开回答欧洲几个党的代表大会对我们党的攻击，1962 年 12 月 7 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写几篇评论，进行反驳。1962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3 年 6 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共发表七篇文章，批驳苏联和亲苏派对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攻击，驳斥所谓的各种修正主义的观点。

第一篇文章是评论捷共大会的。1962 年 12 月 14 日，首先在《人民日报》上用一个半版的篇幅刊登诺沃提尼和其他兄弟党以及捷共代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反华言论。1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社论的标题是毛主席最后定的。这篇文章综述了保、匈、捷三党的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反阿、反华事件，特别是捷党大会上的反华闹剧，并就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对待帝国



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如何对待核武器等问题阐明了我们的观点。然后重点针对某些兄弟党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进行了反击。指出这些攻击根本背离了共产党人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立场，迎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社论还强调，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不能采取以多数压少数的办法，只服从真理，决不服从任何反马列主义的指挥棒和所谓多数。[①]这篇社论的发表，实际上是中共迫不得已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多数党进行公开大论战的开始。

意大利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也是12月份召开的，在会上，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也公开攻击中国党。所以，刘少奇指示，由《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来回答陶里亚蒂的讲话，再由《红旗》杂志写一篇论述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文章。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标题是邓小平定的。陶里亚蒂在意党会议上提出了“和平共处论”和“结构改革论”的观点。关于“和平共处论”，他主张在全世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结构改革论”强调“武装起义和内战必须视为灾难而加以防止”，“夺取政权的思想是庸俗的”，主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干预”，迫使垄断资本集团把经济与政治职能“移交给国家”，从而实现“全民对国家的领导”。[②]《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社论，主要批驳了陶里亚蒂对战争与和平、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和平共处、结构改革论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同时阐述了中共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期发表了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它以列宁主义为武器，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文章没有点苏共及其他党的名字，只是在当代几个重大问题上把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分析和揭露现代修正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性。1963年1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以上三篇文章发表后，公开论战也就全面展开了。1963年1月15日至21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此次会议邀请了铁托集团代表参加。他们在发言中积极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翻案，说莫斯科宣言与声明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谴责是“死板的公式”。当中国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在致词时引证宣言和声明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批判时，大会主席一再阻止他的讲

话，会场上还故意发出一片叫喊声、口哨声，甚至有一些人用跺脚声来扰乱会场秩序。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在会上他一面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一面又假惺惺地高调表示应该停止论战。实际上他是对我们的答辩反击害怕了，借机让我们放弃答辩而已。中共中央根据中国代表团汇报的情况，分析认为这次欧洲五党的代表会议将会是修正主义者们反华的新高峰，所以，有必要专门写一篇社论，对赫鲁晓夫的阴谋诡计加以揭露。但又考虑还不到公开点赫鲁晓夫本人名字的时候，既然他们提出公开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公开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文章第一次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是他们不顾团结，利用党代会公开指名批评阿尔巴尼亚。我们党曾做了多次努力，要求停止这样的攻击，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能够阻止苏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反而也受到了某些人的指责。社论还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违背这两个文件的团结都是假团结。这篇评论发表以后，不少兄弟党的领导人依然无视宣言和声明，继续对中共进行攻击。如此，我们也就有理由予以答辩了。2月11日至2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继续抓住几个问题写答辩文章。

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文章之所以指名回答多列士等同志，是因为从1962年12月法共召开中央全会到1963年1月间，多列士和法共其他领导人发表了大量讲话、报告、决议等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他们说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平共处政策，怀疑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上一切争端的必要性，怀疑通过和平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还说中共不同意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而“提出另一条宗派主义和左倾性质的路线”等等，完全是一副为苏共领导辩护的姿态。[③]社论就多列士等人的指责追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还特别申述了中国党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立场，并列举了大量事实指出法共的立场前后矛盾、出尔反尔。最后文章指出：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是言行一致的，不能一面说停，一面又继续攻击。

3月1日至4日的《人民日报》连载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是从政治上批评陶里亚蒂，陶里亚蒂看后很不满，认为评论“缺乏明确性”，是“教条主义”，还表示要把公开



争论继续下去。所以，这次《红旗》杂志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同他展开大辩论，彻底揭露了他的“结构改革理论”的错误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危害，从而也附带着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理论。④

1963 年初，美国共产党也加入到反华的阵营中，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及一些文章，攻击中国党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政策是“导致热核战争的政策”，还攻击中国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却鼓动别人对帝国主义采取冒险政策。为了避免美国的言论产生错误的影响，中共决定再发社论澄清事实。于是，3 月 8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一文。文章指出，美共的一些领导人一方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另一反面又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颠倒是非，不分敌我。美共在声明中批评中国党对台湾、香港和澳门没有采取冒险政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却鼓励别人采取冒险政策，这是“双重标准”。社论则指出，采取“双重标准”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别人。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是这样的，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也是这样的。⑤

上述七篇评论文章，虽然是公开争论，但是中共中央还是对苏共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及其领导人进行点名的批评。中共认为，赫鲁晓夫企图用“多数”来压我们，但是失败了。有很多兄弟党也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但是，赫鲁晓夫这样反下去，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分裂。

其实，这样公开的论战，让赫鲁晓夫的处境也很尴尬。2 月 21 日，苏共中央给中共发来一封信，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为了筹备这个国际会议，建议先举行中苏两党的会谈。中央常委决定，既然苏共已经要求停止公开论战，那么就停止一个时期的争论，准备中苏两党的谈判和召开兄弟党会议，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3 月 9 日，中共中央给苏共复信，同意举行两党会谈，并表示会谈地点可由苏共选，北京或莫斯科都行，一次谈不完，也可以多谈几次。3 月 30 日，苏共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两万余字的长信。信中除了表示希望毛泽东到莫斯科去会谈外，主要阐述了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并建议以他们提出的“总路线”作为双方会谈的基础。4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苏方的这封长信。苏共提出的“总路线”，实际上是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苏有分歧的那些问题做了一下修补而已，本质的东西根本没有改变。中共当然不会同意以这样的“总路线”作为谈判的基础。于是，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起草一份全面阐述我们的观点的文件。

6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给苏共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二十五条”的中心思想是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评了赫鲁晓夫的“三和”和“两全”观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把它概括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在复信中，中方与苏共约定7月5日将派代表团赴苏会谈。同时，“二十五条”被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进行了广播，并用各种文字印成小册子出版。此举无异于把中苏之间的分歧全面公开了，莫斯科对此十分不满。即将举行的中苏会谈因此充满阴霾。

注释：

①④⑤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页，第528页，第530页。

②③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第137页。

参考文献：

［1］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3］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4］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张静如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中共发表九评“公开信”

1962 年底到 1963 年上半年中共的七篇文章是中苏大论战的开始，接下来的九评“公开信”使大论战达到顶峰。

本来中苏双方寄希望于会谈停止论战，但是会谈前的“总路线”问题再次引发了“声明战”。6 月 18 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完全拒绝中共复信中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苏方声称它是对苏共中央毫无根据的攻击，并表示他们不会在报纸上发表这封复信。6 月 21 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通过决议，表示他们坚决执行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而且，苏共代表团在中苏会谈中将会按照自己对总路线的阐述，坚决捍卫苏共的立场。7 月 1 日，中共中央也发表声明，重申了中国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同时，声明还说，对苏共中央 6 月 18 日的声明、6 月 21 日的决议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共暂不做答复，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①]7 月 4 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解释苏共没有发表中共 6 月 14 日信件的原因是不想导致论战的加剧。同时声明还说苏共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中央信件的答复。7 月 5 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一个声明，驳斥了苏方 7 月 4 日的声明，并强调中国代表团在会谈中将会尽最大的努力，加强两党、两国的团结。

7 月 5 日早上 7 点，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当地时间下午 2 点，中共代表团抵达目的地，苏斯洛夫等人到机场迎接。随后，克里姆林宫举行午宴欢迎中共代表团。

从 7 月 6 日至 21 日，中苏两党共进行了 9 次会谈。其实，在来莫斯科之前，中共中央对会谈可能出现的情况已经做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在看到苏共中央 6 月 18 日的声明时，中央领导人就感觉到这次会谈的前景凶多吉少。因此，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对策。毛泽东指出，此次代表团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他还说，如果苏共想破裂，我们也要尽力拖延

破裂的时间，避免完全的破裂。[②]

苏方出席会谈的成员以苏斯洛夫为首，另外还包括格里申、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契尔沃年科以及《真理报》的前任总编辑伊利切夫和现任总编辑萨丘科夫。中方出席会谈的除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外，还有顾问吴冷西和姚溱。在7月6日的第一次会谈上，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先攻击中方6月14日的信，为苏共3月30日的信辩解一番。然后他又对苏共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都是原来那些观点的重复。苏斯洛夫讲了两个多小时，我方没有发言。7月8日第二次会谈举行，由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发言。邓小平主要讲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和分歧的实质。他指出，中苏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分歧的实质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问题。苏方在这次会谈上也没有发言。7月9日，苏方针对北京召开群众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出境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一事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中国的做法只会让两党会谈的局面尖锐化。7月10日，中共中央也发表了声明，指出苏共在这个时候发起对中共新的攻击，我们不得不公开做出回答，6月14日的信并不存在诽谤的问题。也是在这一天，中苏的第三次会谈举行。苏方的苏斯洛夫发言，他反驳说中苏的分歧不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而是从戴维营会谈之后开始的，是中国先对苏联采取了对立的态度。他还说中共发表七篇文章是对苏共的公开攻击，是搞分裂主义。

在7月12日的第四次会谈上，邓小平反击了苏斯洛夫前一次会谈时对我们的攻击。他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苏共是如何指挥其他兄弟党一起搞分裂活动的。邓小平的反驳使苏斯洛夫无言以对。当天下午的第五次会谈上，苏方改由波诺马廖夫发言。他回避了上午中共讲的问题，只是按照原来的发言稿，谈了所谓全面彻底裁军和实现“没有战争、没有军队、没有武器的世界”（即所谓的“三无世界”）的问题。[③]就在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依然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会和决议以及报刊杂志，宣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针对这样的情形，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呼吁苏共同志以团结的大局为重，和我们一起努力，使两党的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7月14日，苏联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公开信》对中共6月14日的《建议》逐条进行批驳。这件事发生在两党会谈期间，显然，赫鲁晓夫已经打算撕破面具，公



开论战了。而且，7 月 13 日，中共代表团得知，西方报刊已公开报道，美、苏、英三国将在莫斯科谈判，准备达成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协议。由此更证明，苏联已经决定联美共同反华。所以，中共代表团觉得这次中苏会谈很可能会毫无结果。

7 月 15 日，中苏第六次会谈开始。彭真发言时指出，苏共在此时发表《公开信》，大肆攻击中共，让我们怀疑你们会谈的诚意。他还郑重声明，中共保留评论《公开信》的权利。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彭真还驳斥了波诺马廖夫上次会谈时的观点。7 月 17 日的第七次会谈，苏方由安德罗波夫发言。他指责中共在 6 月 14 日的复信中不指名地批评赫鲁晓夫，又在这次会谈中多次指名地批评赫鲁晓夫，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是挑唆赫鲁晓夫和苏共的关系，而苏共和赫鲁晓夫是一致的，反对赫鲁晓夫就是反对苏共。然后他又谈起“三无世界”理论。7 月 18 日，中国代表团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鉴于苏共的表现，代表团在后半段的会谈中可以放手批评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领导的错误。可以准备再开一两次会谈就回国，可以提出以后继续谈，但不要答应停止公开论战。[④]7 月 19 日，第八次会谈开始，中共代表团由康生发言。康生在发言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然后又集中谈了斯大林的问题。他批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出尔反尔，这让苏斯洛夫非常生气，波诺马廖夫也几次想打断康生的发言。最后，苏斯洛夫表示他们拒绝这个发言。7 月 20 日，双方进行第九次会谈。邓小平首先讲话，根据中央的指示，他说，从过去八次会谈的情况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的分歧，特别是苏共 7 月 14 日发表《公开信》后，苏方利用报刊连续攻击中国共产党，这样再谈下去也不会达成协议。所以，中方建议会谈暂停，以后议定时间再继续谈。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会谈最后讨论双方要发表一个公报，苏共拿出了一份公报草稿，其中有两句话：“会谈是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和“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中国代表团不赞同这样写。后经协商，把“会谈是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改为“在会谈中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另一句话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最后就没有写在公报中。晚上，苏方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欢送宴，第二天下午，代表团回到北京。

中苏两党的会谈毫无结果，然而，7 月 25 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却就部分停止核试验的问题达成了协议，签署了条约。7 月 31 日，针对

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揭露了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目的是巩固他们自己的核垄断地位，而束缚其他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声明还重申了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销毁核武器的立场。[5]8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8 月 3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为自己辩解。8 月 15 日，中国政府发言人发表长篇声明，驳斥苏联政府 8 月 3 日的声明。这样，两党会谈结束后，分歧即在两国政府之间展开。

从 8 月初开始，中央指示起草反驳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苏共的《公开信》3 万余字，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第二部分讲中苏分歧的实质。第三部分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主要谈“个人迷信”，其实是为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行辩解。第四部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第五部分为总结，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总结为教条主义，而他们自己的路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对于这封《公开信》，中共将它译成英语、日语、德语、俄语、法语五种文字，加上 6 月 14 日我们的《建议》，轮番广播了一个月。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来共同分析、评价到底中苏的观点谁对谁错。[6]从 1963 年 9 月开始至 1964 年 7 月，中共发表了九篇文章评价《公开信》。

因为苏共的《公开信》首先提到的是两党分歧的由来，所以，中共的第一篇文章也先谈这个问题。9 月 6 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一评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指出，中苏两党的分歧，并不是向苏共《公开信》里所说的是从 1960 年 4 月开始，而是早在 1956 年苏共二十大时就开始了。文章还叙述了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批评了苏共提出的“三和”和“三无”的修正主义路线。文章最后总结七年来的历史事实，说明中苏两党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路线所造成的。

9 月 13 日，“二评”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这篇文章是以中国代表团 7 月间在两党会谈中的一个发言稿为基础修改而成的，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文章谈了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指出赫鲁晓夫和苏共某些领导人从苏共二十大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完全错误的态度。同时也讲到了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最后总结苏共领导之所以这样对待



斯大林，是为他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开辟道路。

9月26日，“三评”文章《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个问题是中共和苏共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1957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参加了莫斯科兄弟党会议，后来，他们发表了一个背离马列主义的纲领，又公开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所以，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谴责了南共联盟。“三评”文章通过对南斯拉夫经济关系的分析，指出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因素在发展。那么赫鲁晓夫现在已经抛弃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共识，为铁托集团翻案，说南斯拉夫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说苏共领导同铁托集团“不仅仅是阶级兄弟”，还是“由我们所面临的一致目的而联系的兄弟”，这就等于承认了苏共和南共走的是一样的修正主义道路。文章最后指出，苏共“正在从各个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⑦

10月22日，第四篇评《公开信》的文章《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讲如何看待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着重批驳了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申明，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而苏共领导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苏共领导认为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进入“新阶段”，但“四评”文章指出，现阶段，亚非拉人民的迫切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文章还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五评”文章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1月19日发表。文章共分6个部分，主要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主义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同时，还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在后面的几部分里，主要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最后文章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⑧

1963年12月12日发表“六评”文章《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文章第一部分以《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为小标题，系统阐

述了列宁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第二部分列举大量事实充分阐明中共始终坚持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并取得了重大成就。文章后面的三个部分深刻剖析了苏共“和平共处”总路线的实质。文章的最后，是中共对苏共的劝告，希望苏共不要越走越远，应该尽早抛弃错误的路线，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

1964 年 2 月 4 日“七评”文章《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发表。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同时，还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的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苏共强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文章还阐述了中共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中共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苏共十分恼火。2 月中旬，苏共中央召开了有 6 000 名积极分子参加的中央全会，由苏斯洛夫作了反华报告，会议通过了决议，决定要对中共实行“坚决反击”，并采取“集体措施”。然后又背着中共中央，向各党发出了一封信，攻击中国共产党。

3 月 31 日，“八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表。文章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并且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了中苏两党从苏共二十大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这使莫斯科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已经决定把“反对苏共和苏联”的“敌视运动”进行到底了。于是，赫鲁晓夫在接下来的国内外大会、小会上开始不断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4 月 12 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演说时声称要对中国领导人“给予坚决的回击”。4 月 28 日，《人民日报》将赫鲁晓夫从 4 月 3 日至 4 月 18 日之间有关反华部分的讲话内容全部摘录下来发表了。双方的论战不断升级。5 月 7 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严厉地批评了苏共自 2 月以来对中共所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并表示不会停止公开论战，“你们攻击我们多少，我们就有权利答复多少。”[⑨]

7 月 14 日，最后一篇评论文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文章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二部分是讲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部分着重讲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第四部分驳斥了所谓的“全民国家”；第五部分驳斥所谓的“全民党”；第六部分是讲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最后一部分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教训。

九评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苏间的大论战达到了高潮。7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来信，决定12月15日召开26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筹备会议。这封信的实质是苏共想通过召开这个会议，像不久前召开的华沙条约国会议开除阿尔巴尼亚那样，开除中国共产党。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已经下定决心分裂到底了。8月30日中共复信苏共，明确地指出："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你们7月30日的来信表明，你们不顾一切后果，又朝着自己挖掘的坟墓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在这个紧迫的时间，究竟是自走绝路，还是回头是岸，希望你们权衡利害，擅自抉择。"⑩至此，两党的关系陷入僵局。

注释：

①③⑦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第175页，第204页。

②④⑤⑥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98页，第598页，第630页，第637页。

⑧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6页。

⑨张静如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二卷，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⑩《人民日报》，1964年8月31日。

参考文献：

[1]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 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3]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4]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 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中苏两党关系的中断

1964 年 10 月 16 日，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试图改善中苏之间的关系，然而，苏共的新领导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并没有改变。1966 年 3 月，中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中断。

1964 年 10 月 11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撤换赫鲁晓夫。此时，

赫鲁晓夫正在南方黑海边皮聪大的中央别墅中度假。这次撤换赫鲁晓夫的事件，苏共中央主席团是事前作了周密考虑的。10 月 14 日下午举行中央全会。会议由勃列日涅夫宣布开会，米高扬主持会议，苏斯洛夫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苏斯洛夫的报告，着重批评了赫鲁晓夫国内政策的错误，主要是有关农业政策、经济政策的错误，在有关组织问题方面，指责赫鲁晓夫搞个人迷信，任用亲朋当顾问，以听取亲朋顾问的意见来代替征询主席团的意见。会议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继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当天晚上，苏共中央通过其驻华大使将这一决定告知了中共中央。

从 10 月 15 日起，毛泽东接连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是由于赫鲁晓夫实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所造成的。但是，他下台以后，苏联的内外政策会有怎样的变化，尚不明朗。因此，中共中央决定静观其变，暂时不再发表论战文章。虽然不知道勃列日涅夫会不会改变赫鲁晓夫的一些做法，但是中共希望形势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对苏共新领导的就职还是发了贺电。10 月 27 日晚的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很多党对赫鲁晓夫下台都表态了，我们也该行动了。他建议主动向苏联提出派代表团去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又过了两天，毛泽东提议建议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于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分别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或大使接触，商



议此事。10 月 31 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答复中国方面，表示苏联赞同中国的意见，并将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出邀请。从 11 月 1 日至 4 日，政治局常委又开会研究中国代表团到苏联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对策。毛泽东说，这次周总理带代表团去，既不是同苏方进行公开论战，也不是要同苏方达成什么协议，而是想对苏方促进一下，但也不寄予过大的希望。主要是到现场观察一下这次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原因，以及苏共新领导今后动向的迹象。①

11 月 5 日早上，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7 周年庆典。代表团成员包括贺龙、康生和联络部的同志。同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发了一封祝贺十月革命 47 周年的贺电。在贺电中，中共高度赞扬了苏联人民 47 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所做出的贡献。同时还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两党能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促进共同事业的发展。为了表达中国党的诚意，刘少奇特意带领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和国务院的副总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参加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 47 周年的招待会。

11 月 5 日下午，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除了阿尔巴尼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也陆续到达。11 月 6 日下午举行庆祝大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讲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还提到了他们的对外政策，和以前一样强调和平共处。但是，他又提到了要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还说“再一次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显然已经成熟”。虽然，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没有提到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问题，但是他却强调，苏共最近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始终一贯的、不变的。由于中共中央只看到了勃列日涅夫报告的部分译文，所以一时还不能完全确定苏共的真实想法。

11 月 7 日上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检阅。晚上参加苏方举行的招待会。在晚宴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当贺龙正同崔可夫元帅交谈时，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突然插进来对贺龙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毛泽东、赫鲁晓夫们来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听后非常气愤，他严肃地对马林诺

夫斯基说，中国党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不可能实现。同时，贺龙马上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对苏共的最高领导指出，这是严重的挑衅，我们决不同意马林诺夫斯基的话。勃列日涅夫在了解情况后竟表示，马林诺夫斯基是喝醉了，酒后失言。周恩来指出，这其实是“酒后吐真言”。[②]苏方一再地解释是马林诺夫斯基喝醉了，周恩来很生气，很快就退出了招待会。当夜，中共代表团就将此事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经过中共中央领导的商议，决定让中国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的答复。同时，中共中央还指示代表团抓住这件事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于是，中国代表团趁8日中午苏共领导来我处吃饭时，向苏方正式提出抗议。苏共领导听了之后很慌张，勃列日涅夫同米高扬、柯西金商量后表示，他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中方代表团成员都很气愤。周总理考虑到在吃饭时间不宜长谈，于是提出9日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领导成员举行正式会谈。苏方同意9日晚上会谈。

11月9日晚上，中苏两党举行正式会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出席了会谈，而苏方只有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和柯西金参加，苏斯洛夫没有参加。根据中央的指示，周恩来抓住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采取攻势，他指出，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竟然公开要求颠覆中国党的领导这样严重的事件，苏方不能以他酒后失言来解释。他批评苏方不顾中国人来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好意，反而要颠覆中国党的领导，把朋友当做敌人看待，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苏方的三个人只是一味地重复马林诺夫斯基是喝多了，他的话并不代表苏共中央的意见。周恩来借此机会又一次严正地批驳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由于苏方还有其他的事情，因此，这次会谈只进行了两个小时。中共中央得到会谈的汇报后，对代表团再次做出明确指示：要按照原定的方针放手反击；除了攻他们的修正主义外，还要攻他们搞分裂、搞老子党、搞指挥棒、搞颠覆活动；在会谈中要揭露苏联企图用表面上的承诺所谓团结，来换取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和肯定12月会议合法性的阴谋；坚决拒绝讨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声明我们绝不参加苏方下令在12月召开的筹备会议；如果苏方提出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可以表示同意，但日期和地点另议；要质问苏方过去联美反华的路线改变不改变，愿不愿意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愿不愿意真正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改变过去那种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路线；明确对苏方说，这次会谈不搞联合声明，不发



公报，连新闻都不要发表；在莫斯科不宜久留，争取11日结束会谈，随即动身回国。

11日晚上，中苏举行第二次会谈。周总理按照中央的指示，质问苏共领导：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米高扬回答说："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做出的。"周总理立即指出，中共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和好的意愿来莫斯科的，但是你们故意挑衅，要颠覆我们党的领导。还以老子党自居，搞分裂。既然你们要继续反华，那我们也不会停止公开论战，继续答复你们的《公开信》。[③]周总理说完后，勃列日涅夫又表示，他们还是希望加强团结，增进友好，发展中苏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交往，等等。周总理最后讲了几点意见：我们仍然坚持加强团结的意愿；绝不参加兄弟党会议和它的筹备会；如果苏方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路线，公开论战就不会停止；会谈结束后，不发表任何与此有关的声明、公报或新闻。会谈从晚上5点一直到深夜11点多，最后不欢而散。

11月12日，苏方要求会谈。勃列日涅夫来到中国代表团住处，先是向中国代表团简单介绍了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接着提出举行中苏两国或两党会谈的建议。周总理表示，会向中共中央报告苏方的建议。13日晚上，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组织召开会议，和周总理等人一起研究苏共新领导的趋向。后来，毛泽东指出，我们坚决反对12月会议的召开，但是现阶段暂时不发表批评苏共新领导的文章，再等等看看他们的表现。

对于赫鲁晓夫下台，各个国家、各个党派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分析，决定起草一个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社论。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在这篇社论中，只讲了赫鲁晓夫，对苏共新领导一句话也没谈。社论指出，赫鲁晓夫下台，是一件大好事，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社论还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人们尽可以举出千万条原因说明赫鲁晓夫的垮台，但是根本的一条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他的下台是苏联人

民和世界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社论进一步指出，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实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国内，他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接着，社论列举了赫鲁晓夫的12项罪状。社论说，11年来，赫鲁晓夫做尽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坏事。他的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外对内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社论最后说，赫鲁晓夫虽然垮台了，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他们总希望依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④]从11月21日到1965年1月期间，《人民日报》陆续转载了印尼、秘鲁、日本、法、意、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的评论。

11月26日，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来信。来信不顾中共中央过去提出的由17个党参加起草委员会的建议，硬是要按赫鲁晓夫当政时擅自确定的由26个党参加起草委员会，即使这些党中间有些党不去，会议也要召开，同时通知会期推迟到1965年3月1日。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的来信。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既然苏共决定召开分裂会议，又不同我们商量，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对来信进行答复。毛泽东也说，他们要开就开，让他们掉到深渊，自掘坟墓。我们的方针就是置之不理，看他们怎么办。12月12日，苏联在《真理报》上发表通知，宣布1965年3月1日召开兄弟党“协商会晤”，其实就是兄弟党国际会议，不过换个名称而已。这表明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召开分裂会议了。就在这一天，苏共新领导策动拉丁美洲九个党组成一个代表团来北京游说，劝中共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1965年2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会谈。会谈时，毛泽东说，我们赞成公开公平合理的公开论战。柯西金表示，中苏都是马列主义者，应该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半



开玩笑地说，本来要论战一万年，现在可以减为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中共最后一次劝说苏方放弃召开分裂会议，但是，柯西金以“这个会议不是我们要开的，而是许多党要开的”为由，拒绝了中共的劝告。

1965 年 3 月 1 日至 5 日，苏共新领导不顾各方的反对，召集了 16 个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再加上巴西和澳大利亚两个党的分裂分子，以及印度共产党的丹吉集团，召开了他们所谓的“协商会晤”。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七个党拒绝参加。3 月 3 日，会议发表了一个《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10 日，发表了会议公报。3 月 12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分析了苏共召开的分裂会议，并决定起草一篇论这个会议的文章。3 月 23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文章分为四个小节，第一节的小标题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指出苏共领导玩了一个花招，贩卖的还是赫鲁晓夫的陈货；第二节的小标题是“苏共新领导干了一些什么事”，指出他们上台以来大讲所谓“团结”，所谓“共同对敌”完全是假的；第三节的小标题是“回答几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一个是反驳三月会议公报“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派别活动”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第四节的小标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主要讲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都会团结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文章最后强调，全世界革命人民，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伟大的中苏两党、两国人民，一定会扫除一切障碍，团结起来，消灭一切妖魔鬼怪。[⑤]

1966 年 1 月，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说苏共准备在 4 月间召开二十三大，并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按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共中央不派代表团参加，也不发贺电。此后，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中苏两国的关系也日益对立起来。1966 年 1 月，苏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3 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 10 个师增加到 54 个师，达 100 多万人。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⑥]中苏两国虽然没有正式断交，但实际上已成为敌国。

从苏共二十大到苏共二十三大这十年间，中苏关系由热转冷，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最后发展到两国关系的恶化。中苏论战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论战主要是由于中苏两党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有巨大

的分歧。中共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

其实，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⑦毛泽东也说过，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就是因为“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我们争的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问题。”⑧不管怎么说，中苏论战，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留下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注释：

①③④⑤⑧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53页，第873～875页，第901～902页，第931页，第852～853页。

②⑥从进著：《1949-1989年的中国②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7页，第60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参考文献：

[1] 张静如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二卷》，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2] 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3] 何明，罗锋编著，《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

[4]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的形成

“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①]对此，毛泽东一开始就保持着高度警惕，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高举起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帜。

1948 年底，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最早阐述了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他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彻底胜利时，美国政府决定“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并且提醒全党、全国人民，“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要警惕和反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要求全党防止四种“情绪”，做到两个“务必”，以防止党自身的蜕化变质。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进行了阶级分析，提出在接受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时，要警惕他们的阴谋，不要上当。

1949 年 8 月，毛泽东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进行了评论，先后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文章，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目的、策略、手段以及反和平演变的意义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策动及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失误，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相继发生了一些政治风波。风波过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深刻的思考，《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把反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的进攻和渗透，防止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鲜明地提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不久，毛泽东又提出，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要防止中国发生类似东欧国家出现过的事件。

1958 年 10 月，杜勒斯到台湾公开鼓吹对社会主义中国搞和平演变。他说："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必须用和平的方式使全中国得到自由的精神"，用西方国家的"行为和榜样来支持大陆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毛泽东针对杜勒斯的图谋，在 1959 年 11 月一次小会上专门印发了杜勒斯讲和平演变的几篇材料，并指出：杜勒斯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要大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保持警惕。不仅如此，毛泽东在 1959 年底同刘少奇的一次谈话中，还特别指出：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社会基础的。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纠集在一起，趁中国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矛盾加剧，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发生和平演变的看法日趋严重。1962 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②1964 年以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他



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警惕和防止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蜕化变质，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加强党政建设，反腐倡廉、防腐拒变。在 1956 年 11 月，毛泽东在八届二次会议上总结波匈事件教训时说，我们县委以上的干部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③]

毛泽东随即对干部队伍进行了评估，认为大多数是好的，联系群众的，经过斗争考验的。这一评估深刻阐明了干部的素质对社会主义国家稳定、发展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极端重要性。60 年代前期，毛泽东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因为他在总结了苏联经验教训后，深感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因而多次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警告：警惕领导层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进而提出必须使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特别是中央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如何保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泽东考虑防止“和平演变”的具体措施中的一个重点问题。

1964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作为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一项战略任务，向全党尖锐地提了出来。他说，关于“和平演变”，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够实现呢？帝国主义这个讲话灵不灵呢？我们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具体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马列主义者，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要团结大多数人，要发扬民主作风，要自我批评等等。随后不久，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④]他要求全党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革命家，实际上已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后来在理论和实践中，针对选择提拔干部问题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

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其基本精神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这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使这些本来正确的主张没有能够正确地贯彻下去，相反却采用了个人选定接班人等错误做法，造成了与主观愿望相悖的严重后果。

西方敌对势力认为，要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非武器”，“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也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传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人生观、价值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以腐蚀人们的思想，演变人们的观念。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是我国阶级斗争的主战场，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前沿阵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先导。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由于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因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阶级斗争突出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5]所以，毛泽东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打进攻战，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这一点，不仅是由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定去占领，其间是没有也不会有空间存在的，因此，“我们应当批评各种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6]

为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毛泽东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认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一放松，经济工作和



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7]据此，毛泽东要求：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要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全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62年毛泽东指出，要使社会主义国家不走向反面，我们必须"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久之后又强调：要挫败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

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其关键是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脱离群众，腐化堕落，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是毛泽东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8]中国历史表明，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无法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就是腐化堕落，不能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在战争年代里，他们能够为革命的胜利抛头颅洒热血，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如此，全国人民才打心眼里支持和拥护共产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斗争多么残酷，敌人多么强大，我们党都能渡过难关，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乡村进入城市，由军事工作转为经济工作，由被围剿消灭的对象成为执政党，从而为我们党员干部产生享乐、腐化提供了条件。为此，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就向全党发出了警告，要求每个党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不被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所击中，不被资产阶级拉下水。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作风建设，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代代相传。毛泽东特别重视执政党的腐败变质问题，他把反腐倡廉、防腐拒变当做执政党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建国初期，毛泽东曾经提出："严重的贪污事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9]

建国初期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从对人民负责，捍卫人民政权的高度，下决心果断地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在毛泽东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

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更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毛泽东在反腐倡廉，防腐拒变这一问题上，不但对党内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嫉恶如仇，予以严惩，而且身体力行，以一生的廉洁奉公、淡泊物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防止“和平演变”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历史性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最先觉察到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领导人。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理论的正确性。但是，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重提国内的阶级斗争，并日益把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看得过重，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外延愈益扩大是错误的。同样，他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解释，这也是导致“左”倾错误的根本原因，这些是我们应永远记取的深刻历史教训。

注释：

①百度百科《和平演变》，http：//baike. baidu. com/view/121009. htm

②③⑤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17 页，第 326 页，第 389 页，第 392 页。

④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红旗》，1967 年第 1 期。

⑦《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⑧王贵安，《试论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 6 月，第 14 卷第 6 期。

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 535。

参考文献：

[1] 中华网 军事频道 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晚年一大战略思考 http：//military. china. com/zh_ cn/history2/03/11027561/20070120/13890485. html

[2] 陈建越，《试论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1 年 11 月第 6 卷第 4 期。

[3] 从进著，《1949-1989 年的中国②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

版社，1989 年版。

［4］110 互动论坛 毛主席谈“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与反和平演变 http：//bbs. 110. com/thread-24318-1-1. html

［5］韩强，《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对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人民网强国论坛 http：//bbs. people. com. cn/postDetail. do?view=1&id=84108258&bid=2

［6］阮添辉，《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战略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6 年 10 月，第 8 卷第 5 期。

毛泽东作《十年总结》的讲话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建国以来头10年工作做了总结发言。毛泽东结合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对建国后的经济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回顾和反思。虽然这个发言还有欠深刻的内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毛泽东在发言中首次承认“大跃进”错误。反映出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面对工作中的错误，并用于改正的精神。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全国人民因为急于摆脱贫困，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走向了极“左”的道路。由于党的策略和口号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在这一时期暴露无疑，并最终导致了1959年至1961年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自然灾害的突发造成农村发生严重的饥荒，当然这也有“三面红旗”执行过程中失误的原因。1959年冬和1960年春，在河南信阳地区甚至发生了严重的饿死人的事件。

在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由于对真实情况不了解，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到了1960年的夏天，毛泽东开始感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

1961年3月19日，毛泽东召集参加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二稿的人员谈话，其中说到：“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此外，到1960年春夏之交，国民经济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开始大面积暴露，而且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现得晚，这些问题当时已经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也使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正视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村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正是在此背景下，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



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自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后，第一次对国内的经济形势作了比较清醒的估计，明确意识到了党的工作已处于全面被动的局面，因而提出要争取主动权，要降低计划指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这次会议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的调整，将一些高指标大幅度调低。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还作出"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的方针。这次会议是一个由不切实际的鼓吹"大跃进"，转向实事求是地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指标和发展速度的转折点。不过会议的主要精神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落实，对纠正当时正在严重泛滥的以"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对扭转当时日趋严重的经济困难，没有产生明显的实际作用。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

会议的最后一天，6 月 18 日，毛泽东结合会议的主题，对过去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十年总结》。说是"十年"，其实主要是三年"大跃进"的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

在毛泽东的《十年总结》讲话中，涉及了人民公社、争取主动权、降低指标和自我批评等几个问题。

关于人民公社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1958 年 8 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褒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也出现了许多错误。毛泽东又说："8 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 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着"乱子"。

毛泽东也总结了在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中央和地方的一些措施，他说："11 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12 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

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认为，出乱子的原因，主要是一些领导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的思想。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虽然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但他指出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业方面犯了错误，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直至于今”。农业方面犯了什么错误呢？就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因此他提出要争取主动权。

毛泽东对于主动权作出了解释，他说：“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

在这里，毛泽东把主动权与实事求是联系了起来，认为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主动权，没有对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就没有主动权，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真实的了解客观情况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文章中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①

同时，毛泽东又强调：“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

在这两段话中，毛泽东实际上是强调了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既然犯错误是由于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是由于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那么要改正错误，就必须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如何争取主动权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争取主动权就是要把过高的指标改过来。应该说，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虽然具有积极作用，对于会议全面降低计划指标起了促进作用。



1959 年 1 月的北京会议，毛泽东提出也想修改过高的指标，不过基于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坚持不肯改。而且当时毛泽东也没准备好一个恰当的指标来，所以暂且搁置了。

毛泽东在《十年总结》的讲话中说："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 3 000 万吨钢在 1959 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降至 2 000 万吨。1959 年 4 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 1 650 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

毛泽东指出，当时由于没有与他商量就修改指标，所以当时他也不了解情况。不过在 1959 年 5 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钢的指标为 1 300 万吨，毛泽东认为，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毛泽东指出，这次上海会议，规定后 3 年（指第 3 个 5 年计划的后 3 年）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 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 2 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 3 年余地，多么好呵！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

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 1959 年完成 3 000 万吨钢；12 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 2 000 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 1 650 万吨。例如 1959 年 3 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 4 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重要的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毛泽东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能正视几年来发生的严重错误，作出自我批评，并重新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是难能可贵的。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对不久后国民经济转向调整，彻底纠正"共产风"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作完《十年总结》的发言，他又请周恩来谈谈农业情况。

周恩来出访回国还不到半个月，但他对农业形势已经心中有数。他明确提出，这些年来高指标、高估产带来了严重后果。他说："两年灾荒之后，明年就很难保产了，要很大的人力去克服。所以估计 1962 年的计划，就要放在一个比较保险的可能的数字上，来争取实现或超过。"

周恩来又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赞同："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他提醒大家：农业指标如果提高了，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而且影响轻工业的原料，转而又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所以它比重工业感觉更灵，这是三年农业被动得比工业感觉更厉害的原因，大家反映吃不饱，我们就不安。

周恩来说：既然不能完成，主席昨天也讲了要转入主动，必须在今年的党代会上埋伏一笔，使今年年底的实际数字到明年公布时能够得出为什么减产的结论来。

他还说：不但要为今年着想，而且要为 1962 年着想，全部转入主动，就是 1962 年提的指标跟原来八大的建议差不多或者比八大的建议还少一点都可以，这才能转入真正的主动，不然还是不能主动，因此，后 3 年的补充计划，无论是农业指标还是工业指标，就要把它降低，其目的为使我们留有余地。

大家都赞成毛泽东的总结和周恩来的意见。

刘少奇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毛主席这个总结很重要，已有的经验就需要学习。农业指标我们三年被动，能够在这一次转入主动就好了。"

邓小平强调，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十分重要，"是提到认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从思想方法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接着说："真正决定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

中央主要领导人开始统一了思想，就为下决心调整计划指标、争取主动、扭转困难初步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大体从 1959 年 11 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 1960 年 1 月上海会议，3 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



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为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

《十年总结》是毛泽东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回顾和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文字，也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有错误，认识到在一段时间内领导的思想方法上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的问题，表示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明显地流露出他想转弯的思想。他要求后3年的计划要“留有余地”，“藏一手”。《十年总结》再没有提及1958年初大批反冒进的一桩公案，而是充满感情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二五计划正是周恩来根据反冒进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八大提出来的。

《十年总结》承认二五计划是好的，是间接地撤销了对“反冒进”的批评，非正式地给周恩来“反冒进”问题平了反。这就传递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为调整开绿灯。这个态度至关重要。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在很多方面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首先，对于问题和成绩一分为二，不护短，不遮丑。将工作的成绩加以肯定，错误和问题勇于承认和解决。并且毛泽东对于自己犯过的错误敢于承认，进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具体实在，不笼统，用事实来承认自己的过错，这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

例如毛泽东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 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 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 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

其次，从1958年5月开始大跃进，8月倡导人民公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发展过程中乱子出得不少。毛泽东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现问题，并着手改正，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尊重人类认识规律，强调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有一个过程，并不认识自己已获得绝对真理，吹嘘自己完全正确。毛泽东说："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毛泽东强调，我们还要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去探寻真理，拿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注释：

①彭厚文：《1961 年初毛泽东为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1958 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普遍刮起了“共产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共产风”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向党的各级组织发出专题指示，并委托周恩来负责文件的起草。这就是 1960 年 11 月 3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因为指示信中列举了十二条措施，所以又简称“十二条”。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中断了纠“左”进程，并由纠“左”转变为反右倾，发动新一轮“大跃进”，使 1958 年底以来有所纠正的“左”错误再度发展。

反右倾和继续大跃进的结果，使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以及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农村人民公社的所谓“优越性”再度大受赞扬，一度散伙的公共食堂重新开办，分给农民的自留地再次被收归集体，刚有起色的家庭副业又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特别是急于实现两个过渡（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再次抬头，在部分农村又开始搞基本队有制到基本（公）社有制的过渡。加之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行为，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背人民公社现阶段政策的，是破坏生产力的，并且妨碍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更好发挥，中央和毛主席从 1958 年冬季以来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一部分地方和社队确实纠正了，基本上没有再犯；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的不彻底，有遗留问题，或者在去年冬季以后又刮起“共产风”；还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队，“共产风”一直没有认真地纠正，继续刮，严重地破坏农业生

产力。

对于庐山会议后农村再次出现的“共产风”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并非没有觉察。

1960年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从目前我省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来看，一般是不具备过渡的条件的。如果在目前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转变，那就会违背客观规律，那就有可能重复1958年曾犯过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中共中央也在《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中提出：“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去年4月上海会议十八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①

为了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力争1961年的大丰收，为了使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方针真正成为全党全民的实际行动，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继续大跃进，中央再次指出，“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受中央委托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个《指示信》于1960年11月3日由中央向全国发出。

党中央要求把这封指示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紧急指示信》对“三面红旗”是给予肯定态度的，它提到：“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个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越来越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人民公社在同连续两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做斗争中，越来越表现出无比的优越性。当前的整个形势是大好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农业遭灾歉收所带来的困难是暂时的，是能够克服的。”

《紧急指示信》共包括12条措施，这十二条是：（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



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紧急指示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1961年算起，至少7年不变。在此期间，不再新办基本社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试点。现有的试点和已经过渡为基本社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的社、队，办得好的、群众拥护的，可以继续办下去；办得不好的、群众要求改变的，就停止试验，重新恢复基本队有制。七年以后是否需要改为基本社有制，还要看当时情况由中央统一规定。

对于生产队所有财产、公社所有财产和农民的私有财产，《指示信》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将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分批分期地变基本队有制为基本社有制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并不是"社共队的产"，更不是"共社员的产"。现在归队所有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队营企业，到那时候也不转归社有，仍然归队所有，归队使用。属于个人的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所谓"队共社的产"，就是队共有由社经营的拖拉机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

《紧急指示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凡是从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县和社向生产队平调的、以及县、社和队向社员个人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各种矿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有实物的退还实物，并且付给公平合理的租金、折旧费或修理费；实物已经消耗、无法退还的，作价补偿，付给现款。

指示信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紧急指示信》还规定："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信用社员多余的房屋和家具，必须商得社员本人的同意，切实负责维修保管，承认社员的所有权，付给合理的租金。社员的住房因而发生困难的，必须坚决退回一部分借用的房屋，妥善安置。无偿调用的劳动力，必须彻底清理，给以补偿。除了1959年夏季已经清理退赔了的以外，凡是没有清理的，或者

已经清理、算了账、打了欠条、拖延未付的，都必须在今年内，至迟在明年春耕以前，偿付清楚……否则，就会打击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农业生产力。”②

《紧急指示信》规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管理区或者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应该主要归生产队，公社和作为公社派出机关的管理区（生产大队）不要统的过死，不要乱加干涉。

《紧急指示信》中允许社员留有少量土地作为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鼓励社员种好自留地，饲养少量的猪、羊和家禽，培育好屋前屋后的零星果木，经营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关于公共食堂，《紧急指示信》也明确表示要“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等风气对于经济建设的威胁，已成为党中央关注的重要问题。

《紧急指示信》特别强调：“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整风整社是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大鸣大放，用领导和群众‘两头挤’的方法，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把农村‘三反’贯彻到底，把整风整社搞深搞透。坚决反对：（一）贪污，（二）浪费，（三）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严禁干部用‘不准打饭’和‘不发口粮’的办法来处罚社员。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的，必须从严惩处。党员和干部的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严格执行党纪国法。严禁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坚决反对坏人坏事。”“并且通过整风整社运动改造落后地方和落后社队，纯洁公社各级领导机构，纯洁农村党的组织，进一步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核心作用。”②

周恩来起草这个《紧急指示信》后送毛泽东审批。

11 月 3 日，毛泽东对《紧急指示信》亲自作了认真修改。《紧急指示信》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从 1961 年算起，至少 7 年不变。毛泽东在后面加写了一句话：“在 1967 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

《紧急指示信》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在当前是



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绝不允许对它有任何侵犯，侵犯了必须坚决纠正。”毛泽东将其中“在一定时期内”改为“在一个长时间内”。

《紧急指示信》指出：“在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泽东将此处改为：“在现阶段，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 20 年内，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

《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全党动员和组织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读、解释，同他们一道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而奋斗。中央还连续批转各地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情况，以督促这一工作的进行。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经放过错误，一定要改正。”[④]并且以他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可以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作为他的错误之一例（他还在《十年总结》中说明他在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上同意了过高的钢指标，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错误）。毛泽东在党内作自我批评，希望推动广大干部认识：“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⑤]

同时，各地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情况的报告也陆续送来北京。11 月 12 日，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就纠正“五风”问题，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为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指示”，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 11 日开始。会议围绕“苦战三年，总结经验”这一主题，采取群众路线、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先集中揭发错误，然后再作全面评价，目的是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接受三年来的教训，使全党思想一致，团结一致，去战胜当前的困难，夺取农业丰收。这次会议中，讲对讲错，一律不记账，不戴帽子；要求地、县委首先批评省委，然后县委批评地委，最后是省、地、县三级作自我批评。王任重在报告中还附上了中共沔阳县委所写的《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和县委第一书记马杰的《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两个材料。这两个材料主要是介绍沔阳整风整社运动的开展情况和该县通海口公社在纠正“共产风”后所发生的变化。

甘肃省委在接到《紧急指示信》之后，随即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检查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进一步地检查了省委的领导工作。1960 年 11 月 25 日，甘肃省委向中央汇报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报告中提

到，“自大跃进以来，省委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高举三面红旗，是坚定的、明确的。因而在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方面，在发展工、农、牧各业生产和发展财贸，文教、科学技术事业方面，在进行工矿交通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在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中，也产生了缺点和错误，今年以来，在一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情况是严重的，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关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今年7月间，作过一番检查，向中央作了报告。10月初在省级机关集中进行“三反”时，又专门开了几天常委会，进行了检查。这次三级干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省委先作了自我批评，地、县两级同志对省委领导也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大挖刮“共产风”的根源使我们的认识逐步地更加深化了。”⑥

甘肃省委在召开三级会议，贯彻党中央发布的《紧急指示信》时，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全省的“共产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最终得出：

首先，关于执行中央政策问题，主要是犯了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对于发展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重视不够，抓的不狠以及在收益分配政策上，扣留部分多，社员分配部分少，供给部分大，工资部分小的错误。

其次，在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和农村工作安排方面，有许多不够恰当的地方。主要是关于劳力安排、水利建设、发展养猪、发展公社工业、社办农牧场、丰产方、建立商品基地和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建立副食品基地的方面，虽然在上述这些方面都有成绩，但是也出了不少毛病，刮了很多“共产风”。

最后，是关于领导作风问题。甘肃省委指出，各级干部作风有毛病，和省委的领导也很有关系。省委领导工作中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农业估产偏高。粮食估产偏高了，高得大大超过实际，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不利影响，使领导失去主动权。特别是对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起了不好的作用。

《紧急指示信》对于纠正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在人民公社中也建立起经营管理的一系列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对于公社内的私有财产作了明确的规定，保护了农民的部分利益。

不过，中共中央出台“十二条”原本是希望通过“认真贯彻执行以上



各项政策，特别是经过这次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彻底纠正‘共产风’，切实地把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稳定下来，至少稳定七年不变，不去侵犯它，不乱出新花样，以便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掀起一个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但各地贯彻“十二条”、纠正“共产风”时，却将主要的精力放到了整风整社上，并且将之作为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将有些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当作阶级敌人对待，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差。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②③《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④中央1960年11月28日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

⑤中央1960年11月15日转发湖北省委报告的批示。

⑥中共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重要批示，1960年11月28日。

参考文献：

[1]《1960年底到1961年初的农村整风整社》罗平汉，现代哲学，2009年第6期（总第107期）/11月号

八届九中全会

1961年1月14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研究之风，同时会议还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指导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它对于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此后，中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

自1958年以来，因为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同时，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挫折和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

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以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左”倾错误恶性发展起来。加上1959年到1961年连续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物资设备，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凑在一起，就使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十分严重的情况：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基本建设规模太大，超越了国力的可能，严重脱离了当时工农业基础，国民经济比例进一步失调；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职工实际生活下降30%，有些地方情况更为严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开始察觉到决策的失误和形势的紧迫性，八届九中全会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召开的，为克服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起到了重大转折作用的会议。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在此之前，1960年12月24日至1月13日举行了中央会议，为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3人，候补中央委



员 87 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其他人员 23 人列席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情况，提出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1 月 14 日，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作的《关于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

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情况，指出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农业许多产品都减产了；3 年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某些指标定得偏高，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有些权利下放的偏多过下，有些制度破而未立，有些制度没有严格执行；思想方法上有主观片面性，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干部队伍不纯。根据国家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提出，“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

自从 1960 年下半年起，党中央逐步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国内经济的调整。1960 年 7 月，党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李富春同志在拟定 1961 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提出要按“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安排计划。8 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同志同意李富春同志的意见，并提出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二字，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会议上，李富春提出，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在 3 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

这个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其主要内容是：搞好综合平衡，降低高指标，停建一系列工程，大量节减财政支出，深入重点项目，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个方针的通过和执行，是我们党为克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战胜严重经济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会议认为，1961 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力争农业生产获得较好收成。轻工业要努力克服原料不足的困难，增加生产，尽可能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要缩减基本建设规模，压缩生产指标，调整发展速度。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并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提出，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一方

针，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在“八字方针”的基础上，李富春提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钢产量降到1 900万吨；煤炭则调高到4.36亿吨；粮食调高到2 050亿公斤；基建投资规模为167亿元，比上年减少103亿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700个左右。

全会号召全国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会议决定，努力搞好综合平衡，使农、轻、重之间，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全会在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开展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情况的汇报之后，通过了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产生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决定深入贯彻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纪要》指出，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要彻底检查和纠正“五风”，特别是“共产风”；必须彻底清理对农民的平调账目，并坚决退赔。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不能剥夺农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纪要》还根据农村的生产形势，决定提高粮食、食油、生猪和禽蛋等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益。决定社员自留地的比例调整以后，20年不变。确定养猪政策，以私养为主，并鼓励社员发展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全会还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作的《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对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对莫斯科会议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表示热烈欢迎，并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八届九中全会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的成果，给了正在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世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以沉重的打击，在新的基础上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八届九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当前局势迫切要求世界人民进一步联合起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不屈不挠的斗



争。”事实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侵略战争的土壤。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有国家的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进行顽强的斗争，必须壮大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壮大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八届九中全会的决议再一次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像以往一样，同各国兄弟党和各国革命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促进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而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认为，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八届九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重要性。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中国一贯支持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实现和平共处的种种努力。

八届九中全会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中苏两国的团结和友谊，不但关系到中苏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也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八届九中全会的决议说：“中国共产党一贯为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而努力，认为这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基本利益所在。帝国主义者妄想分离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1 月 13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 18 日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以调查研究为主题的总结讲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 1961 年搞成一个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转折的关键。

毛泽东总结最近几年的教训提出。做工作要有 3 条：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要情况明，就要搞调查研究。不做调查研究，心中无底，无底就无法做好工作。

他说：“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比较有力。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们的同志不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

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 18 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1959 年 3、4 月，我批了 2 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

他指出，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型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 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调查研究年。

毛泽东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

1958 年以来，“大跃进”遭到惨重失败，归根到底是主观脱离了客观、思想脱离了实际。错误是从思想路线不端正犯起的，要纠正错误、克服困难，也必须首先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毛泽东重新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这个时期工作重要转变的开始。

全会还批准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其中，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关于中央局的职权，邓小平在同年 9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如下说明：“现在中央局不同于 1953 年前的中央局，它主要是协商机关。没有中央局，中央办不好。建议恢复中央局职权，将中央局的职权扩大，恢复到 1953 年前一样，中央局决定了算数，不能再是个协商机关，方法要商量，但是商量只是方法”。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



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局以及各地方的领导同志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制定和发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等一系列条例。这些条例是经过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广泛地征集了群众的意见，因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初步形成一套在当时条件下基本适合我国情况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它对顺利进行各个方面的调整工作，纠正各项工作中“左”的错误，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是建国以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过程中指导思想失误，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遇到巨大困难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通过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从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的现状出发，对工农业生产进行的调整和切合实际的安排，以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创议，号召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等等，都是非常及时和完全正确的，它对纠正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战胜严重经济困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八届九中全会，是重新纠正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日益发展的“左”倾错误的转折点，它在克服经济建设中严重“左”倾错误方面起了重大转折作用。可见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地位。

八届九中全会也存在某些局限性。毛泽东在全会上的先后两次讲话中，都对当时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分析和估计。指出：在农村中存在着三类社、三类队，这些社、队的领导权都落到了地、富、反革命分子手中。在农村干部队伍中，地、富、反、坏、右、蜕化变质分子，加上官僚主义占30%等等。显然，这种分析和判断把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这是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对阶级斗争的这种分析和估计，说明了我们在政治思想方面，“左”的思想仍然没有得到克服，并且还有所发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阶级斗争的“左”倾口号，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导致以后在阶级斗争方面一系列严重错误。

“八字方针”的制定

从 1958 年开始，由于在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长达 3 年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八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具体指导下，到 1966 年，全国基本完成了预定的国民经济调整任务，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酝酿、完善和形成的过程。

从 1958 年开始，由于在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长达三年的严重困难局面，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建规模过大，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尤其是粮食供应极端紧张，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1960 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直线下降，被称为“元帅升帐”的钢的日产量由上年第四季度的 5. 38 万吨减至 4. 98 万吨，4 月上旬又降至 4. 84 万吨。到第二季度，20 种主要工业产品有 18 种完不成产量计划，其中有 11 项产量低于第一季度。

从 1959 年起，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 年粮食产量仅有 1 700 亿公斤，比 1958 年实际产量 2 000 亿公斤减少 300 亿公斤。1960 年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落到 1 435 亿公斤，比 1959 年又减少 265 亿公斤，跌落到 1951 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 1951 年的水平。在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的同时，由于浮夸风的泛滥，各地粮食产量虚报为连年增长，而且增幅巨大，造成一种虚幻假象，加上城镇职工人数大幅度增长，使征购粮食连年增加，一减一增，使农村人口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跌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1960 年夏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



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减少了23.7%。植物油减少23%，猪肉减少70%。许多地区因粮食紧张、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

虽然当时依然存在着“反右倾”运动的强大压力，一线领导人还是在“三面红旗”的框架内小心翼翼地进行缓和形势的努力。

从根本上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主要是由于经济建设上“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

出于主观上的良好愿望是想快一点把经济建设搞好，但是实际工作中却忽视了客观规律，超越了国力可以承担的范围，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打乱了国民经济的秩序，导致工农业大幅度滑坡，基本建设规模膨胀，财政拮据，人民的吃穿用紧张，面对这种现实，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只有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来一个大的转变。

1960夏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并对三年“大跃进”运动进行反思，6月14日至18日，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以及《十年总结》中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指出“大跃进”中指标过高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认识公社内部级所有制的教训，1958年和1959曾经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质量放第一位，数量第二位，1960年的指标要加以调整的决定。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李富春作了关于国内经济问题的报告，对国内的任务及其应该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政策提出了“自力更生勤俭建国、以农业为基础、以少数大型企业为骨干、坚决缩短基本建设的战线和三级结合，共同制定全国统一计划”五个方面的意见。

李富春指出，以农业为中心必然会带动工业的发展，我们在一个时期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够，对农业有点盲目乐观的思想，放松了对农业的注意。不抓农业、不支援农业，工业也上不去。所以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确实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间去。他提出，首先要注意安排工业支援农业问题。同时对农业本身，农村劳动力必须做全面的、全年的安排。同时，李富春认为，我们必须接受教训，下决心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下决心搞三级结合，统一计划。李富春特别提出加强企业管理的问题。他还郑重建议：从下一年起，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只搞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

账。所谓几本账是指，当时国家制定计划时，对有些产量定下几个指标。完成了计划里低的指标后，再向高的指标努力。几本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很容易使人好高骛远，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地求大、求快。取消“两本账”的做法，也就从源头上遏止了高指标的滋长和蔓延。

中央工作会议对李富春的意见表示赞成，并且会议讨论通过了李富春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联名提交的《关于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扭转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的局面，解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必须削弱基建，保生产，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输的生产搞上去。

会议还确定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工业等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决定以后国民经济不在搞两本账，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在会上，针对工业交通企业自“大跃进”以来管理混乱、制度废弛、产品及服务质量下降的状况，李富春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计划问题的时候，他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应该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雏形。

8月13日，周恩来在政协形势报告会上，讲了这次北戴河会议的基本精神。他首先讲农业问题：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农业国，经济上是落后的，为了摆脱落后，必须使农业这个基础过关。两年来城市人口增加三千万，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还未很好扭转过来。这不利于农业生产。城市的劳动力有一部分要坚决回农村去，工业支援农业，首先要在劳动力上支援。接着，他讲了经济调整问题：由于大跃进，各方面都想搞些建设，使我们各方面都能得到发展，这个愿望是好的，但不论计划内的或计划外的，都常常突破原来的指标，影响设备、器材等等不够分配，工作上显得百废俱兴，人力物力分散了，搞得很紧张，使我们不能很好集中力量，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计划上加以调整，所以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不仅在经济战线上要缩短，而且在文教战线上也要缩短。战线太长，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们要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能分散力量，这才会使我们的建设更快。周恩来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强调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1960年8月30日至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



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这样，"整顿、巩固、提高"已经不限于工业交通行业，而是作为来年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针了。国家计委向中央各财经部门及各大区通报了李富春的意见，明确要求，编制次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并且将"六字方针"写入了提交国务院审查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

8月30日，李富春等人与周恩来共同审议《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周恩来支持李富春的意见，只是周总理认为，对方针的提法，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通过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使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调整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要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战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因此，人民公社开展了以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为任务的整风整社运动；11月，中央为了纠正"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接着，中央又起草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进一步确定了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同时，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也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

其次，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为缩短基建战线，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停建缓建了大批正在施工的建设工程。1962年，全国施工的基本建设项目由1960年的8.2万多个，减为2.5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由1960年的1 815个减为1 003个，减少了812个。对于重工业生产的调整，主要是有计划地降低了冶金、机械、建材等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全国重工业产值，1962年比1960年下降了58.6%，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53.3%降为35.5%。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

生产，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加快了扭转经济比例失调局面的步子。

再次，实行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中央对企业关停并转作多次指示和规定，对于那些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等不适宜发展的企业，采取果断而有秩序地关停并转。全国工业企业数减少38%，工业生产战线过长的状况基本得到改变。中央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对保留下来的企业进行了整顿。从1961年起，国家对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和城镇人口实行精简，并动员精简下来的人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这就有力地加强了农业战线，大量地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售。

另外，减少财政赤字，稳定市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的有：一是努力增产日用工业品，扭转企业亏损，以增加商品供应，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以及其他各项事业费和国防费用，以减少财政支出。三是在保持生活必需品价格基本稳定的同时，对针织品、自行车、钟表、茶叶、酒类及某些糖果、糕点等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以回笼货币。

通过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使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1960年1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的决定，提出1961年计划安排要点。并且按照这个方针，会议将9月报告里提出的若干指标作了调整：1961年，钢产量由2 300万吨降到2 010万吨，煤炭产量由5.2亿吨降到4.25亿吨，减少职工数由300万人增加到502万人。此外，粮食产量1 950亿公斤，棉花为3 200万担，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 200个（比上年减少300个）。

北戴河会议之后，“保粮”、“保钢”运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1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12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确保6.2万吨，争取达到6.3万吨。依然存有“以钢为纲”的观念。这实际上是与“八字方针”存在矛盾的，也延续了国民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了李富春通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总体设想是，“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争取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使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根据这样一个设想，李富春建议对1961年计划指标再作调整，钢产量降到1 900万吨；煤炭则调高到4.36亿吨；粮食调高到2 050亿公斤；基建投资规模为167亿元，比上年减少103亿元；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比上年减少700个左右。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并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9月30日，由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这个报告分别编制计划草案。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使之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半年的努力，农村困难形势有所缓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得到初步纠正，党内主要领导人开始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到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开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许多方面都出现了迅速恢复的转机。粮食总量达到3 2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250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6.2%，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国家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结束了连续四年的财政赤字的状况；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城乡人民生活有一定提高；农轻重及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的情况有所改善。

在这次经济调整过程中，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1961年1月，中央作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提出把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这三级。1962年，中央又先后对银行、财政、物资、基本建设等集中管理问题作出严格规定和具体要求。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从当年起，再用2、3年的时间，继续实行“八字方针”。在这之后的3年调

整时期，除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之外，着重是加强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并搞好一批设备的更新；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适当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均顺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面貌。

实行调整方针的初期，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围绕着纠正工作指导的错误，作了不少工作。但是，总的来讲，由于当时对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又缺乏经验，以致在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进行调整工作，特别是没有果断地把基本建设规模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确实可靠的程度。1961年8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特别是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由于对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和当时的经济困难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对困难的严重性和调整的紧迫性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1962年2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陈云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5月，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坚决的全面的调整。

参考文献：

[1] 吴才兴，《李富春与“八字方针”》，《文史精华》，2010·4总第240期。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 年，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之风。这次在“大跃进”受挫后严重困难中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的困难和挫折面前重新振作奋起的关键之举。它大大促进了当时国民经济的调整，通过调查研究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条例，确保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有效实施。

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这样一场调查研究之风呢?

由于“大跃进”运动及自然灾害，我国从 1959 年开始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使国民经济和农村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过高的生产指标，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严重障碍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1960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甚至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称作是“人祸”。

1958 年底至 1959 年上半年，毛泽东、中共中央曾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不过经过庐山会议之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进入 1960 年，经过所谓反右倾，鼓干劲，在“争取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口号下，提出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大办文教，不仅高指标没有降低，生产关系没有得到调整，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愈刮愈烈。

受其影响，再加上在一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的粮食生产在 1959 年和 1960 年都大幅度减产，从而使我国的粮食供应和副食品供应出现了从城市到农村全面紧张的局势。1959 年下半年，我国的农村地区就已发生了普遍的饥荒。由于粮食短缺，农民出现了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饿死了很多的人。有些农民逃亡在外，有的抛弃儿女。同时，农村的干部作风恶劣，没有将灾情如实上报，导致灾荒给全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对于这种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虽然有所了解，但是并不全面。

1960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看到了反映这方面问题的材料后，有关部门曾组织过调查。1960年4月底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时，有人向毛泽东这样反馈调查的结果：“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①

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干部不如实报告，这体现出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了解到真实情况是很难的。

由于对农村中发生的真实情况不了解，一部分干部热衷于弄虚作假，向上反映假情况，假信息，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农村工作中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的认识，在1960年上半年是相当不够的。并且根据这些假情况，假信息，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因而没有及时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无疑使得农村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南三区会议）上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他还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②

后来，毛泽东在着手纠正“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时，多次提到他在这一时期为假象所迷惑，上当受骗，并提出要把他为假象所迷惑的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训来吸取。1961年1月9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提到1959年曾被河南省虚报的450亿斤的粮食产量所迷惑；1961年6月12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提到自己受过骗，说曾相信河南一位省委书记说的，以为河南的食堂半机械化可普遍啦，其实根本没有。因此他提出要防止上当受骗，不要被假象所迷惑。③怎样才能不被假象所迷惑呢?

毛泽东后来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指出，“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④“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⑤

毛泽东了解到不能了解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失误。因此，开展一次调查研究运动就显得尤为必要。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1961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首先倡导提出的。

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他批评全党忽视了调查研究工作，并做了自我批评，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

他还指出，做工作要有有3条，一条是情况明。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要搞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这是个大工作，要从实践中认识客观实际。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分批、分头摸清每个省、市、地、县、公社的情况。

因此，他提出：“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如果不做这种调查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只凭感想、凭想象、凭估计是不行的。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

在1月18日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调查研究问题再次发表讲话。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犯过几次“左”倾和右倾错误。右的不做调查研究，“左”的也不做调查研究。近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比较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在向全党发出号召之后，毛泽东抓住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这个主要问题，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推动和领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立即派遣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做农村调查，并指定三个组各分为两个小组，分别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以10天至15天为期，最后会合广州，向他汇报，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

不久，毛泽东也南下杭州，在南下途中，毛泽东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

组组长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谈了话。了解农村中的问题，督促省、市的各级干部要到基层做调查研究。

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毛泽东在杭州听取田家英蹲点调查的情况汇报后。又听取了湖南、广东等调查组的汇报，从而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社队规模、分配制度、公共食堂等多方面的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和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

毛泽东还督促省委第一书记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⑥] "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

3 月 23 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信中指出："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信中还说："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在会议审读这篇 800 字的信稿时，毛泽东竟作了上万言的解释。他嘱咐大家："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也要进行调查研究"[⑦]。

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落实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和切实解决好"大跃进，以来农村中存在的若干重要问题的意见，广州会议刚一结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典型调查，全党上下开展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研究活动。

中共中央在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的同时，又印发了名为《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



毛泽东在会上就这篇文章中有关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作了解释说明。这些方法包括：第一是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第二是调查会到些什么人；第三是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第四是要定调查纲目；第五是要亲自出马；第六是要从个别问题深入；第七是要自己做记录；而做调查研究的态度则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

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到长沙，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和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做了44天的调查。他不住宾馆和招待所，而是住养猪场饲料房或生产队空作坊，自带草席被褥，门板一架就是床。他走村串户，观察座谈，广开群言，洞悉了当地农村的种种问题[8]。刘少奇召开了20多次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掌握了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大量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并写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

周恩来于4月下旬至5月中旬亲率调查组去了河北邯郸的武安和涉县，在武安伯延公社，他除了召开各级干部会议听汇报，更多的时间是与社员们就公共食堂、供给制、评工记分等问题促膝交谈[9]。5月7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了食堂、供给制、评工记分和恢复社员体力等问题。

朱德从3月下旬至5月上旬到四川、陕西、河南进行调查。对各地包产、退赔、分配兑现、自留地、公共食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考察总结[10]。5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着重谈了食堂问题和恢复手工业合作社组织、自由市场的问题。

4月到5月上旬，邓小平、彭真直接领导的5个工作组进驻京郊顺义县和怀柔县农村，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们于5月10日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方面的问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11]。

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15天，并对这里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在15天中听公社党委汇报了两次，召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调查了养猪、双季稻种植、社员口粮安排和自留地等问题，写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三个调查报告，以充分的事例和理由阐述了关于私养母猪、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和多给社员保留一些自留地等政策问题[12]。

同时，中共中央又新派出大批调查组，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杨尚昆领导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领导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领导的山东泰安调查组，陈正人领导的四川简阳调查组，谢富治领导的河北邯郸调查组，廖鲁言领导的山西长治调查组等。

为了使调查研究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毛泽东提出了需要重点调查的问题。在南下到达广州后，毛泽东提出要将“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作为当前调查研究的重要目标，并把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起草人民公社条例的中心指导思想。

1961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亲自拟订了“食堂，粮食，供给制，自留山，山林分级管理，耕牛、农具所有权，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手工业，恢复供销合作社”这 11 个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反映强烈的问题，让邓小平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中列出，要求各到会同志对这些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到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13]。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地、县两级党委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指示发出后，更多的领导深入城乡基层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在全党集中力量开展农业调查研究工作的推动和影响下，其他各条战线都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各地党报、党刊也发表了大量有关调查研究的理论文章、通讯报道、典型的调查报告和社论，使 1961 年成为名副其实的“调查研究年”和“实事求是年”。

1961 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摸清的问题是比较集中的，也就是农村灾荒实情、“五风”危害以及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注意的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等，全是当时带普遍性的突出问题。

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食堂问题，各调查小组都将其列为重点课题。从各小组的报告来看，公社群众大多都不赞成搞食堂。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周恩来在武安调查后于 5 月 7 日报告毛泽东：“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14]5 月 13 日，邓小平、彭真亦在



信中说，食堂问题在京郊地区比较复杂。居住分散的队不办，常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至于农忙食堂，群众的意见很不一致。

正因为调查者们所见略同，一度被视为“共产主义萌芽”而使许多人挨整受苦的公共食堂终被解散。在5至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农业“60条”的“6月修正草案”第36条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15]

1961年9月27日，毛泽东又到河北邯郸地区做调查。他召集了山东、河北两省省委负责人和河北省的5个地委书记进行座谈，研究讨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并作了座谈会记录。两天后，毛泽东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中写道：我们对农村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即生产权在小队，而分配权却在大队。因此，“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16]。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在10月7日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就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1962年2月13日，中央正式发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在全面兴起调查研究之风的时期，毛泽东批转了大量有典型意义和参考价值的调查材料、调查报告和干群来信。这些材料都清晰地反映了全国各地的真实情况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一工作使大量的调查成果得到汇集，又推动了调查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1961年的全党调查研究，是在毛泽东的倡导、推动和领导下进行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于扭转农村局势，恢复国民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这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了解到了农村的许多真实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公社的体制、农村的生产关系作了一些调整。毛泽东和全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认识开始加深，得出了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问题，而且在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食堂制和供给制、基本核算单位等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因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先后解决了社队规模过大的问题，废除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食堂制和供给制，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从而把农村的生产关系基本上调整了到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由于这些调整，中国的经济从1962年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

同时，领导干部们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中，痛切地感受到自己工作失误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内疚自责，更加谨慎地判断形势，从而促进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的恢复，更加求实地开展工作，也更加尊重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但是，由于人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因此，调查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它不可能一次性穷尽真理。

毛泽东在这次调查研究中，对“包产到户”问题的认识就存在着片面性，就没有找到真理，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在1961、1962年内，关于在农村进行“包产到户”的办法，虽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也被实践证明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得到了相当多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但由于毛泽东把它当做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加以反对，终致夭折。

注释：

①③④《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69页，第1166—1167页，第1115页。

②⑤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254页，第253～254页，第284页。

⑥⑬《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第268页。

⑦逄先知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⑧《我眼中的刘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295页。

⑨⑭熊华源等：《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第347页。

⑩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707页。

⑪朱健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48页。

⑫《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146页。

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927～929页。



全党实行调查研究的成果

1961 年初以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和党中央发出的关于调查工作的许多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阵调查研究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展现出的最为重要的成果，是使全党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期间泛滥的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重新端正了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理性传统和作风得以逐步恢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各个环节的有效突破和深入开展。

在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下，党的高级干部纷纷下到基层进行实地实际的考察走访。通过亲身的调查研究，干部们得到了许多以往从报告中得不到的信息和资料，也使全党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纠正了一些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判断和决定。

一系列工作条例的制定，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最重大成果。

在深入实际的调查中，中共中央进一步了解到，由于“大跃进”中对各行各业规章制度的废除和破坏，致使各方面生产均处于杂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严重后果。为迅速而切实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中央有计划地组织各个系统的力量进行目标明确的调研活动，不仅在调查研究中及时解决所发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调研和实践，中共中央陆续制定出一系列关于农业、工业、商业等各条战线的具体政策和工作条例。

1961 年 3 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这是全党进行调查研究的第一个硕果。条例规定：人民公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生产队有一部分所有权，在管理本队生产上有一定的自主权等。

农业“六十条”的贯彻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农村形势迅速好转。此外，党还采取了一

系列具体措施恢复农业生产，包括：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实行退赔政策；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增强农业恢复和发展能力；等等。

工业方面，主要是1961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的制定和贯彻，对于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调整工业内部关系，促进工业生产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对于企业管理的法制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还制定与发布实施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即林业“十八条”）等条例。这对澄清“大跃进”以来的思想混乱，使各项工作走向正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工业方面开展调查研究的推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都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分别制定了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国务院先后制定了《高教60条》、《科研14条》、《手工业35条》、《中学教育50条》、《林业18条》、《商业40条》、《文艺10条》等工作条例。这些条例对当时纠正“左“倾错误，贯彻八字方针，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调整时期制定的这批条例，虽然受当时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限制，尚未能彻底解决经济建设中的所有问题，但毕竟初步提出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基本适合我国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使各项工作转入正常有序、良性发展的轨道，为稳定发展农村形势，深入贯彻“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制定了各项重大的调整决策。

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使中共中央主持调整工作的决策者们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掌握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实际状况，为中共中央制定各项重大的调整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62年，我们党在大力调查研究解决农村工作问题的同时，也着手解决工业和其他方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整了各方面的政策。



经过1961年全党集中对农村的调研和调整，农业情况明显好转。然而工业方面的困难却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为了准确地掌握工业生产现状，陈云在工业第一线做了大量的实际调查，并调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国几十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终于摸清煤、钢生产大滑坡的主要原因在于建设规模超过了实际国力，必须根据国力所能承受的实际水平对工业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工业问题的10人小组，查清了1958～1960三年的粮食实际产量与国家的统计数字相差了约3 600亿斤，当年夏收又比上年减少160亿斤，凸现出工业生产同农业生产的尖锐矛盾，工业困难的症结已完全暴露。

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周恩来在庐山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由于几个月来对工业调查提供的可靠依据，使中共中央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和贯彻“八字方针”的必要性及紧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会议果断地做出了大幅度调整工业的重要决策。

在安排经济计划上，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即“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是重、轻、农，今后要倒过来。按农、轻、重安排”。1962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和综合平衡的方针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从而使过去曾经不相适应的经济计划变得和谐起来。

在农业生产方面。为减轻农民负担，支持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党和政府采取了减少粮食征购、适当调整农业税收等政策。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收购价提高20%，同时对收购棉花、油料、烤烟、麻类等重要经济作物实行奖励粮食的政策。收购一担棉花，奖励35斤粮食，收购一担花生仁、芝麻或烤烟，奖励20斤粮食，由于政策的调整，仅1961年，农民从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中，大约增加了30亿元的收入，大大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好转，首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这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 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

在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方面。根据中央部署，在1961年精简职工800多万、城市人口减少1 000万的基础上，1962年继续精简职工1 000万，减少城市人口1 200万。中央要求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特别是1958年以来从农村招收的职工，凡是能够回农村的，都要动员回农村支援农业生产。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两年半内精简职工约2 000万，减

少城镇人口 2 600 万。这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和粮食供应的压力，而且还配合了对基本建设规模的压缩和对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

在压缩、停建缓建项目方面。同 1960 年相比，1962 年基本建设投资由 384 亿元减少到 67 亿元。基建项目也从 1960 年的 8.2 万多个降为 2.5 万多个，由于基本建设战线缩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也相应地得到调整，1962 年的积累率从 1960 年的 39.6%，下降为 10.4%。这样就腾出众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加强了农业和轻工业战线，改善了人民生话。

在工业调整方面，实行了必要的关、停、并转。对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劳动生产率低、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一律关闭或停办，对一时因原料、燃料和动力供应不上，任务不足的企业，则实行合并或缩小规棋。对“大跃进期间转产生产资料的轻工企业限期恢复原来的生产，对任务不足，适合生产短线产品的企业，根据需要转产，对人民公社的工业企业，除少数具备生产条件、产品适销、质量又好的外，原则上一律关闭。经过调整，全国工业企业数 1962 年比 1959 年减少 38%，同时还降低了大多数重工业的生产指标。钢由 1 866 万吨降为 667 万吨，煤由 3.97 亿吨调整为 1962 年的 2. 2 亿吨。对石油、化纤、洗衣粉、塑料及支农产品等薄弱环节则予以加强。

经过调整，特别是 1962 年的大幅度调整，到 1963 年，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农业开始增产，1962 年粮食比 1961 年增产 250 亿斤，1963 年又比上年增长 200 亿斤。主要经济作物如棉花等均比上年有较多的增长，工业也开始稳步上升，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商品供应量也有较大增加，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达到 605 亿元。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略有节余，货币继续较快回笼。为了进一步巩固扩大成果，1953 年 9 月，党中央决定，从 1963 年起到 1965 年，续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此，全党上下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对内克服自身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的压力，还清了欠苏联的全部债款。在搞好本国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大力支持了不少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

到 1964 年底，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进人了良性循环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我们要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提出，



大大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和斗志。到 1965 年底，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工农业生产接近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改善。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新发展，重新出现了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1 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又一重要成果，就是使全党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期间泛滥的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重新端正了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理性传统和作风因之得以逐步恢复，并进一步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党的各项事业尤其是经济建设工作成败的决定性作用。

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运用，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它在实际工作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惜，建国后党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发扬这个传统。“大跃进”期间，彭德怀等人由于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下情，在庐山会议上如实反映情况，但由于中共中央当时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彭德怀的正确意见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致使“大跃进”的错误愈演愈烈，最终成为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

调查研究活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各级党组织正确决策的依据和手段，也正是因为全党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通过这次广泛的调查研究活动，全党重新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深刻认识到，不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就做不到实事求是，理论就会脱离实际，工作中就会出大问题、大乱子。调查研究正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根本途径和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

虽然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但其只完成了“实事”的使命，能否实现更高的“求是”的目标，归根结底还取决于能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于实事求是，陈云曾做过堪称经典的阐释：“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① “实事”与“求是”这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缺一不可。即调查研究是解决“实事”的阶段，是“求是”的前提；而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则是更高的“求是”的阶段。这个阶段更具决定性作用。

调查研究之风是党为了更加了解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生活状态而采取的非常及时的举措。在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期间，中央制定了许多正确的工作条例和规章制度，同时对工农业采取了适当的调整，从而加速了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领导干部自身也得到了思想认识上的提高，可以说，调查研究之风对全党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调查研究为统一全党对调整形势和任务的认识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依然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认识不清，并把困难的原因过多地归结于自然灾害，忽视对工作中错误根源的探讨。为了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全力以赴完成对经济的调整，刘少奇以在湖南深入调查中的亲身体察，对形势及国民经济困难原因作了深刻分析，对于统一全党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起到了进一步的推进作用。他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明确指出：“关于目前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并以自己的调查所见，修正了关于错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关系的惯用提法，认为缺点和错误至少是三个指头，“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进而尖锐地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②]

同时，由于各级干部经过1961年深入地调查研究，对全国经济形势也已有了较为客观的了解。在这样的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果，为全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增强信心、明确任务、深入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其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还有效地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在这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之前，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和领导干部个人问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体现出某些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恶劣作风，人民群众对此有很不好的印象。特别是在严重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人员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这大大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感召力，影响了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吸引力。

中共中央通过这次认真、深入、系统的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党修正了原来的一些不恰当的政策和做法，使之更加符合人民



的利益和要求。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

许多领导干部在深入群众调查期间，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大多都能够端正态度，虚心向群众求教，能够和群众同甘共苦，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第四，调查研究保证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各项调整措施得以贯彻落实。

1962 年 5 月，中央财经小组正式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国民经济调整的系统方案，但由于“大跃进”的负面影响使这些调整措施很难落实。为了帮助各地制定和落实具体的调整方案，5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几位副总理分别深入到各省、市去进行调查研究以督促指导调整工作。

1962 年 5 ~6 月，周恩来来到东北重工业基地进行调查研究。东北是当时解决全国重工业问题的关键，这里大型企业众多，情况特别复杂，困难也最严重。他视察了各重要工厂和各地农村，全面细致地了解东北经济存在的具体问题，耐心地帮助当地干部提高对调整问题的认识，与东北的干群详细商讨研究各项调整方案具体落实的措施和步骤，不仅对东北地区经济调整卓有成效地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和推进作用，而且促进了全国工业及其他调整工作的发展。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为了贯彻调整方案，各级地方领导从省委到各地委、县委至各个部门的负责干部都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基层调查研究，以确保调整措施落到实处。

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遭遇挫折之后，郑重地自省并自纠其缺点错误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调查研究的内涵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调查研究是保证党的科学决策和正确领导，防止或减少工作失误的一个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更不能丢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十分特殊、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都与亿万民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更须首先经过科学深入的调查研究，使其确实切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并且经过反复的实验和实践，方可实施。否则必然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注释：

①《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79页。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

参考文献：

[1] 刘玉太 1961：“调查研究年”的前因后果



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之1959年开始我国连续三年遭受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导致这几年我国农业连年歉收，粮食短缺，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1961年，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它为纠正“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一些左倾错误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有良好的作用。同时也基本稳定了农村局势，使我国此后没有出现像1960年前后那样的困难局面。

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困难局面的出现，固然与1959年以来全国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苏联撕毁合同逼还贷款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实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其中，人民公社体制上的弊端，又是这种困难局面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人民公社体制最大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而且人们一度认为公社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以为这样可以加快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尽早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社员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交了公，认为这样才能早日提高公有化程度。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又称半供给制和半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所谓供给制，又分为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三种情况。其中普遍实行的是粮食供给制，也就是免费供应粮食。公社化以后，公社不再将粮食直接分配给社员个人，而是分配给食堂，全体社员在公共食堂免费吃饭，另外每月会收到发给几角到几元不等的工资。但是由于公社收入有限，绝大部分公社发了一两个月工资后再也无力发放，工资制也就形同虚设。在公共食堂的形势下，公社搞的是彻头彻尾的平

均主义。不论男女老幼，分配的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严重削弱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在“一平二调”的政策下，生产队和社员比公社化前更贫穷，劳动力也大为减少，同时社员没有自留地，一切生活来源都只得依靠集体。这样一来，不但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也造成国家可征购的农产品减少。

人民公社中产生了严重的“共产风”。在“共产风”的影响下，县、社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大办办公共食堂。“共产风”刮遍了省、地、县、社、大队、小队，甚至社员之间也刮“共产风”，说共产主义不分你我，不分公私。“共产风”的大肆蔓延，并且毫无阻力，在于人民公社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体制，一切平调都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实施，因而社、队干部通过“命令风”去刮“共产风”，干部的特殊化作风和生产上的瞎指挥也逐渐在人民公社出现，大大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了《十年总结》一文，对“大跃进”运动作了初步回顾与反思。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号召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他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继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1 月 14 日至 18 日，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继续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希望今年这 1 年，1961 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在毛泽东号召下，1961 年成了“调查研究年”。作为调查研究最大成果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也就因此产生了。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各中央局、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组织力量，亲自深入基层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毛泽东派出并亲自指导三个调查小组下农村调查情况。1961 年 1 月 20 日，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写信，让陈伯达、胡乔木和田本人各率一个 7 人的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农村进行为期 10 到 15 天的调查



研究。

田家英等人接到指示，立即组织调查组于1月21日离京分赴广东、湖南、浙江农村。在这次调查研究活动中，田家英认真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并且将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为党中央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和措施作了充分的准备。

关于公共食堂，田家英听到绝大多数群众反映不满意见，如老人小孩病人无法照顾；干部有私心，多吃多沾；人人感到不方便；下地干活的壮劳力吃不饱饭；浪费大，谁都不节约。田家英把群众的意见如实的反映给毛泽东。这个情况对毛泽东后来下最终同意解散公共食堂起了不小的作用。

关于粮食产量问题，田家英找生产队长、党支书和仓库保管员谈心，弄清了在普遍瞒产情况下的真实产量，认清了浮夸风的危害。在实地调查研究和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田家英逐步认识到：互助组和初级社是群众最满意的，因为当时真正遵循了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到了高级社的初期，还是正常的，高级社后期，就有些操之过急了。公社化是一哄而起的。[①]

田家英在这次浙江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农村干部因为工作无章可循而违法乱纪，对农业生产"瞎指挥"的情况，这些行为造成了党与农民关系的紧张。同理，社员也因为没有章程，不知道如何监督干部，抵制他们的错误。因此，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制定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章程。毛泽东听后十分赞同。所以，毛泽东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②]

在派出三个调查组之后，1月26日，毛泽东自己也先后经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最后抵达广州。一路上，毛泽东分别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等省委以及派出去的三个工作组的汇报。

毛泽东将带领的3个调查组从1961年2月下旬汇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从1961年2月23日开始，毛泽东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2月25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开会，宣布成立以陶铸为首的起草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写作班子。《条例》的起草工作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该条例在起草时着重参考了邓子恢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修改稿）。因此，可以说《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修改稿）是《农业六十条》的前身。

《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是1960年9、10月间，邓子恢在山

西汾阳、河北石家庄、江苏无锡等地做农村调查时主持制定的。由于在调查过程中，邓子恢发现了在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的过渡，以及缺乏有效的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所以他在《内务条例》中强调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在这里的“队”还是指“生产大队”，即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此外，条例还承认了个人对生活资料和小农具等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提出“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和社员个人所有制必须予以切实的保证”。

邓子恢回到北京后，将这份草案呈送中央，为中央日后进一步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因此，毛泽东后来充分肯定了邓子恢的调查研究。正是在这个条例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对于《条例》的起草工作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3 月 5 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关于人民公社划小的问题，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也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竖是要划小就是了。

3 月 6 日，条例的初稿完成，共 67 条，近 14 000 字。这个初稿印好后送交政治局常委及参加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即三南会议）的负责人讨论。

3 月 7 日，毛泽东在与王任重谈到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时候又说，起草这个《条例》的目的就是把公社各级的职权搞清楚，使基层干部能够各负其责，做好本职工作，并且把生产小队不叫生产小队，改作生产队，就是 3 级，即公社、大队、队。

毛泽东对 3 月 10 日河北省委写的《关于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的意见》非常重视，并认真地进行了批阅，亲自加了醒目的副标题“主张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3 月 10 日至 13 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三南”会议，即中南、东南（华东）、西南 3 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专门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业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只有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等人，指出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大的问题，领导干部不亲自调查是不懂得也不能够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毛泽东强调指出：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在北京主持召开"三北"会议，即华北、西北、东北3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讨论农业问题。

3月14日至23日，"三南"、"三北"会议合并召开，即中共中央广州会议。在这次广州会议的讨论中，争论的问题主要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小队（即后来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及会议的讨论，1961年3月15日，条例第二稿形成，正式定名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共50条，9 000多字。与第一稿相比，条数上压缩了17条，近5 000字。条例第二稿于3月15日下午散发给与会者讨论。与会者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社队的组织规模问题、公社的管理体制问题、党政关系问题、经营管理问题等等。根据讨论结果，条例又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修改后的条例共十章60条。因为有60条，这就是后来我们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为《农业六十条》的原因。该条例经过几天认真的讨论和修改，于1961年3月22日正式为广州工作会议所通过。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调为调查研究的长篇讲话。

毛泽东强调，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广州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是人民公社化以来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会议通过的《六十条（草案）》，较好地集中了各方面的要求和意见，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两个平均主义、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

了较系统的规定。

1961 年 3 月 29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共十章，标题分别为：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公社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社员家庭副业；社员；干部；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

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草案做了明确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③]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保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长期存在。

草案坚持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规定“一切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属于生产大队所有”[④]，但是“生产大队必须把劳动力、土地、耕畜和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并且登记造册，不再变动”[⑤]。这就意味着生产队对于生产资料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这不利于充分发挥生产队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就意味着各条件不同的生产队都必须统一由生产大队进行劳动成果的再分配，这明显体现着平均主义。因此，严重妨碍社员积极性的提高。

关于人民公社的规模，草案规定：人民公社的规模，一般应该相当于原来的乡或者大乡；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地应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⑥]这就控制了人民公社的规模，相比原来以合并的越大越集中来讲是一个进步。同时，公社规模的相对缩小，有利于遏制生产上的“瞎指挥风”。

草案规定人民公社的各级重大事情，都要由社员大会或者是社员代表大会决定，并且要定期开会，“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开会两次。生产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每年至少开会四次。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⑦]

草案对公社管理委员会的权限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向生产大队提出关于生产计划的建议，并可以对生产大队的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检查各大队的生产，同社员和干部商量后，帮助大队解决生产上的问题，不能违背农时，不许乱开电话会议、乱发统计报表、不许瞎指挥；在大队同意前提下，推广已经实验成功的增产措施；在自愿平等互利的条件下，组织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调剂好种子，管理好大型农具，帮助大队实现生产计划。



毛泽东觉得，这些规定从制度上可以约束人民公社干部的作为，这样的结果对于遏制人民公社初期的“瞎指挥”有很好的作用。

针对前一段时间，劳动力经常被社队企业无偿征用的问题，草案规定“一切社队企业的举办，都不妨碍农业生产”，“占用生产大队的劳动力，一般地不得超过生产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8]

草案还规定了生产大队的“三包一奖”制度。草案规定，“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9]不过，有些小队土地多、劳力多，产量大、上交多，却与同一个生产大队里的土地差、劳力少、产量少、上交少的小队口粮一样，所以，造成按劳分配变成一句空话，这就是“三包一奖”制度的弊端。

另外，“三包一奖”制度由于很繁琐，造成可操作性也不强。虽然这与以前吃公社大锅饭相比，平均主义色彩要淡一些，但仍然是平均主义，所以尚需改进。中央和地方在实践中逐步发现了问题，在后面的草案的修正过程中予以解决。

草案还对公益金和公积金问题作了规定。草案规定：生产大队扣留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合计起来，在目前时期，一般控制在大队可分配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10]这一条款对于遏制此前某些公社通过公益金的方式共大队财产的“共产风”起了很大作用，维护生产大队以致农民的利益。

公共食堂是社员们非常关心的问题，草案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真正做到便利群众，便利生产”[11]，同时又规定“公共食堂必须真正实现自愿参加的原则”[12]。这说明中央仍然没有彻底集散食堂的想法。社员对于食堂还是不满意的，原因有饭菜质量不好；一些干部多吃多占；住的地方远的群众吃饭来回不方便等等。

关于家庭副业问题，草案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13]，“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补助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14]。

草案对家庭副业的内容做了具体分析，如饲养猪、鸡、鸭、鹅等；进行缝纫、编制等家庭手工业；屋前屋后可以种果树等其他作物，并规定这些收入永远归社员所有，归社员支配。草案还规定社员可拥有总耕地面积5%的自留地，而且自留地的产出国家不征公粮，不计统购。这就使得社员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也有利于日后农村市场的活跃。

针对人民公社初期某些干部瞎指挥、消极腐败等现象，草案专门用两章来解决这一问题，一章讲干部的职权与义务，一章讲人民公社的监察制度。中央试图通过这些措施来纠正某些干部在工作中的偏差。最后一章里，草案就党委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布置。

《六十条（草案）》虽然通过，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仍然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如它是不是符合农村的实际，能不能得到广大社员的拥护，这些问题都成为在广州会议后毛泽东苦苦思考的问题。他继续大抓调查研究工作，征询对于《六十条（草案）》的反映。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领导同志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影响下，分别带领工作组于3月、4月、5月间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们也大都先后深入农村进行重点调查，并及时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情况。

3月31日，毛泽东在长沙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话。张平化向毛泽东汇报说，湖南农村一些干部群众对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等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说，这个《六十条（草案）》只是征求意见，是试行，还没有确定下来，还要修改，还要补充，还可以减少，还可以推翻某些条文。将来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这个条例修改后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六十条（草案）》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力图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偏差的一个重要成果，主要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把社、队的规模划小。二是把有关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政策明确写入条例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担心党的政策多变的心理。不过这一草案作为初步解决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文件，仍有诸多不足。

《六十条（草案）》将原来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将原来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但是，《六十条（草案）》仍然规定对社员的分配实行供给与工资“三七开”，除了特殊情形以外都要办常年或农忙的公共食堂，基本核算单位权力仍未下放等。这些对于克服两个平均主义仍然有局限性。

此外还有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供给制的问题、公共食堂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因此《六十条（草案）》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不过总的说来，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和全党对整个农村形势的认识比以前实际



多了。这一草案是开始正确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文件，以条例的形式规范了人民公社，同时促进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是1961年全党农村大调查所取得的最大成果。

注释：

①②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第326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55页，第458～459页，第459页，第455～456页，第456页，第457～458页，第459页，第460页，第463页，第463页，第463页，第463页。

对《农业六十条》的不断修改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称“农业六十条”）。会后，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复讨论和在农村的试点后，陆续发现了一些没有解决好的重要问题。因此，从1961年开始到1978年为止，对《农业六十条（草案）》的修改工作也连续不断的进行着。

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制定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历时一年多，期间经过多次修改，最终成型。该文件的制定和修改过程，实际上也是党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六十条（草案）》发布后，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拿着《农业六十条（草案）》，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进行扎实的典型调查。一方面宣讲中央的政策，一方面征求社员的意见，以便为进一步修改草案做准备。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宁乡县做了44天的调查。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朱德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青浦县等农村调查。邓小平和彭真利用工作间隙，直接组织了5个调查组在北京怀柔、顺义调查。另外，中央还派出了河北徐水和安国、邯郸、河南长葛、辽宁海城、甘肃天水、黑龙江双城、山东泰安、山西长治等大批调查组。

各级干部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公共食堂问题方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胡乔木、谢富治、胡耀邦等都在调查的过程中了解到，大多数人对于食堂是不满的。认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力，不节省烧柴。”胡乔木在给毛泽东的研究简要报告中说到：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以后都将不办，另一个不分自留地，不搞家庭副业，恐怕也难持久。①韶山公社仅花三天时间就解决了食堂问题。群众反映相当热烈，称之为“第二



次解放”。

这些关于公共食堂的意见都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为修改《农业六十条（草案)》、彻底废除公共食堂提供了重要参考。这说明曾被称为“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在实践中已经被群众否定了。

在供给制问题方面，领导干部也发现多数群众都不主张。周恩来在调查中发现社员根本不赞成供给制，而是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具体做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②。邓小平、彭真在调查中发现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色彩，害处非常多，明确建议“废除这种供给制”。

在社队规模问题方面，邓小平、彭真调查了解到，北京近郊的农村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社也调整完毕。调整后的社员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提出，为了解决社队规模偏大而带来的不方便，应该在公社内适当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很有远见的。

在公社体制的问题方面，山东省召开的公社体制问题座谈会反映上来的情况是：生产小队掌握着生产资料，并且决定着生产好坏和收入，但却没有分配权。这是目前生产队内部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突出的矛盾。大家认为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统一。但如果以生产队而不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就意味着公社公有化程度的降低，在体制上“后退”了。山东省的座谈会提出了要缩小基本核算单位的这个问题，进一步启发了毛泽东。

此外，关于退赔、供销社、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的矛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上经过干部调查的意见源源不断的汇集到毛泽东和党中央那里，为草案的修改打下了基础。

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提出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毛泽东提出，此次会议的任务之一便是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好还是不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

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1961 年 5 月上旬，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开始着手研究草案的修改。

1961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目的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修改。

会议根据广泛调查研究过程中征得的意见和《六十条（草案）》的试行情况，对《六十条（草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形成了《六十条（修正草案）》。修改的主要部分是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

毛泽东说，这一次中央文件、中央指示上规定，不管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

毛泽东接着说，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有事了。

毛泽东强调说，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

在 5 月 22 日、6 月 5 日，草案第一次和第二次修改稿先后产生。6 月 8 日，在毛泽东圈阅后，草案修改稿复印。6 月 15 日草案修改稿经过文字性修订后，经毛泽东最后审定发出，这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该条例与先前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相比较，仍是 10 章 60 条，大小标题均未改动。但是条例具体内容在吸收调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动，在公共食堂、供给制、山林问题、党政干部问题上均有较大突破，同时加写了山林、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问题。可以说这个修正草案对人民公社的调整幅度远大于此前的草案。

6 月的《六十条（修正草案）》对公共食堂做出了明确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3]

《六十条（修正草案）》并且还规定，对于不参加公共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关于农民的口粮问题要实行“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各地纠正了用行政命令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左”倾错误。各地农村在贯彻执行《六十条（修正草案）》的过程中，有组织、有领导地停办了公共食堂。

在供给制问题上，6 月修正草案将原草案关于社员分配实行供给部分与



工资部分三七开的规定，改为无论包产收入或包产以外的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自留地方面，修正草案规定，允许社员可以拥有全部耕地面积5%到7%的自留地，这无疑进一步提高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的积极性。

在基本核算单位上，3月草案和6月修正草案都认为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不过6月草案在承认土地所有权归生产大队的基础上，对生产大队所有制方面做了新的阐释。6月修正草案规定：集体所有的耕畜、农具，可以归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也可以归生产队所有；也可以有些归生产大队所有，有些归生产队所有。究竟实行那种办法，由生产大队、生产队同社员群众，在有利于保护和繁殖牲畜、有利于保管和维修农具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情况，兼顾大队和各生产队发展农业、畜牧业和副业生产的需要，民主讨论决定。④

6月修正草案中加写了有关于山林部分的条款。各地山林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受到十分严重的毁坏。因此，6月草案特别规定：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所有的山林和生产大队新植的林木，一般都归生产大队所有。⑤还规定生产大队应该将大部分山林转包给生产队固定经营。修正草案规定林木的采伐必须有计划，对于不合规定的采伐，大队和生产队有权制止。这些规定对于保护我国原本就不多的林木资源有很重大的意义。

6月修正草案在监察委员的选举方面比3月草案要详细，规定监察委员“都必须经过社员充分的酝酿，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⑥。

关于社员代表大会的代表，6月草案在规定从事各种业务的人员，有经验的老农，青年和妇女，都要有适当数量的代表外，加写了少数民族的社员、侨眷和归侨三项内容。

6月草案承认农村手工业存在三种形式：有社、队直接经营的手工业企业，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还有进行独立劳动的个体手工业。⑦这就为农民个体进行手工业生产大开方便之门，方便了农村群众的日常生活。

6月草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风”现象写进了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约束干部的作为。“三大纪律”是：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参加劳动；以平等的态度对人；办事公道；不特殊化；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提高政

治水平。

中央的这些措施为干部作风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同时在对于改善干部作风、改善干群关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于6月15日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分别就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甄别平反等问题作了规定。这个《指示》规定：

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把这个工作条例的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要防止一部分干部把那些不合乎自己口味的规定不告诉群众，或者任意加以篡改。在党内和党外的讨论中间，如果对于这个修正草案还有修改意见，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及时地收集起来，报告中央。中央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发出的紧急指示信，其中有的问题，例如供给制问题和食堂问题等，同这个修正草案，规定得不一致的地方，应该以修正草案的规定为准。[8]

6月修正草案在全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3月草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使党的政策更加实际。这些政策对于农村的稳定、人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一些还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

从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直到“邯郸谈话会”，毛泽东继续调查农业政策问题，着重考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修正草案）》通过并试行后，毛泽东继续关注贯彻的情况和调查了解农村中尚存的矛盾。

毛泽东询问草案的贯彻情况，当听到大家说农村的情况好了一些时，毛泽东说，情况好了一些，是因为不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中南同志谈到《六十条（修正草案）》主要解决了生产队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都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权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一来，所有制与分配权就有矛盾。

其实，毛泽东早在3月广州会议时就已发觉这个矛盾现象，并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这次，毛泽东明确提出对此问题应加以研究。

9月26日，毛泽东召集山东、河北省委的部分领导人召开了“邯郸谈话会”。

在这次“谈话会”上，毛泽东主要就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作了专门调查，并且亲自提问题作记录河北、山东两省省委负责人和邯郸等五地委书记反



映，6 月修正草案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6 月草案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9]，“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10]。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如土地、农具、牲畜归大队所有，同时分配权也在大队，而生产权却在生产队。这种制度的弊端就是平均分配，因为大队统一分配，使得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并没有得到纠正；其次，生产大队权力过大，因为握有分配权，就经常干预生产队的生产，使得“瞎指挥风”的源头并没有止住。

“邯郸谈话会”后，毛泽东又阅看了湖北、河北、山东、广东等省的一些材料，对究竟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作了反复思考。一直到 9 月 29 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写信，并附去他作的“邯郸谈话会”记录和几个省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他在心中说，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11]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些问题。农民说，《六十条（修正草案）》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

毛泽东针对农民反映的“三包一奖”这个问题又发表了他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主要指的是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这就是小队而不是大队。毛泽东强调，各地非走这条路不可。

在毛泽东领导下，1962 年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宣布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指示》认为这样做有 4 大好处。而其最大好处便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同时，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就有生产管理权，又有根本决定权，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统一起来，生产和分配也就统一起来。这样，从高级社以来就存在着的束缚生产队积极性的平均主义，也就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克服。

《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是继《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后调整中

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大措施。

《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就此认真作一番调查研究，并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试点，把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以便中央作出决定。

毛泽东还指示田家英等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亲自审改。

1962 年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将这个草案提交大会讨论，并且提出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保持40年不变。

该条例后来执行了十几年，并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考验，起到了稳定农村的作用。

中央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的这一认识直接推动着《农业六十条》6 月草案的修正。同年 6 月 17 日，出《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修改稿的第一稿，7 月 23 日，第二稿改出。8 月 6 日经毛泽东同意后发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讨论。根据各方意见，条例又作了几次修改。9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1962 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与 1961 年 6 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的修改，由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以此为中心，对相关条款作了改动，如关于生产大队的条款由 12 条减少为 2 条，而关于生产队的条款由 10 条增加为 19 条。

基本核算单位的划小，有两个明显的好处，其一是有利于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其二是有利于发扬民主，克服原来大队干部的官僚主义。

从 10 月中旬起，各省都进行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工作。

11 月 9 日，邓子恢向中央报告了他在 10 月下旬听取的河南、江西两省农村工作部的汇报和在福建省龙岩考察的具体情况。

邓子恢说，各级干部和群众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致表示拥护，都认为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官僚主义，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发展副业生产都有极大好处。

11 月 23 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转发邓子恢调查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在转发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



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12 月 13 日至 16 日，毛泽东又到无锡进行调查，与当地的负责同志作了多次谈话。当讲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

当然，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传达下去之后，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对此，毛泽东解释说，这不是倒退，是前进。底子薄，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的底子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了生产大队的权与责。权的方面主要是帮助生产队做好生产计划、帮助生产队经营管理、协调生产队之间农田基本建设与水利建设事业、管好和用好大队所属的农具和运输工具、经营好大队所属山林和企业、督促生产队完成国家规定的统派购任务、管理大队民政、民兵、治安、文教卫生等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该条例在削减了生产大队的权力的同时，极大扩充了生产队的权限，使得生产大队更多的成为一级政府而不再是一个经营单位。条例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他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12]该条例突破以往土地只能归大队所有的认识，明确指出：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13]。

关于山林、水面和草原，条例规定凡是归生产队经营比较有利的，就归生产队所有，这有利于林木、水资源、草地资源的保护。

关于生产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条例明确规定为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既有所有权，又有经营权与受益权，就会大大激发社员的创造性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对于克服当时农村的困难局势有很好的作用。

围绕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条例对公社和大队的权限进行了严格限制，如“在国家规定的征购、派购任务以外，公社和生产大队都不许另派机动粮和自筹粮，不许另立名目，增加任务”，“公社和生产大队，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从生产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14]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文件，它存在了 16 年时间，直到 1978 年新《六十条》出台，中央没有对这一文

件作新的修改。

《六十条（修正草案）》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倡导实事求是传统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得出的一个重要成果。它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思想，使得 1958 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政策中的许多弊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克服。

该条例首要的意义就是以制度的形式规范了人民公社，使人民公社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因此大家有了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章和行动准则。自从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的运作逐步走上正轨，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复苏，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的信心。

其次，该条例促进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重日趋合理，财政收入逐渐增加，再现此前繁荣的场景。

再次，此条例抵挡了“文革”时期“左倾”思潮的影响，维持了农业、农村的稳定。

此外，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调整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克服平均主义而采取的政策界限。

当然，这个《六十条（修正草案）》也有它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这是由于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限制，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然而，在《六十条》的指导下，再加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一条，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根本解决。因此，当有的人提出农业生产实行“包产到户”等措施时，毛泽东极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致于“包产到户”的正确措施被压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延缓了中国农村体制的改革和阻止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

注释：

①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 486 页，第 489 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⑫⑬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84 页，第 478 页，第 480 页，第 474 页，第 477 页，第 470 页，第 474 页，第 474 页，第 634 页，第 634 页，第 633 页。

⑪《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84 页。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科研十四条》的制定和执行，调动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密切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团结广大科技人员，共同克服3年的经济困难，改进研究机构的工作秩序，提高科研水平，加快出人才出成果，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经过反右和“大跃进”的挫折，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倒退，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左”的危害愈来愈充分地暴露。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1961平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要求各条战线总结出若干方针性、政策性的条款来。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全国性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第一个出现的政策性文件是“农业六十条”，第二个就是聂荣臻主持制定的“科学十四条”，此后，工业、教育等各条战线也相继制定了各自的政策性文件。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突出政治的形势下，大量时间被占用搞政治运动和与科研无关的文体活动、体力劳动，影响了技术攻关。1961年的春，聂荣臻借毛泽东倡导要大力调查研究的东风，在科技战线也率先着手制定具体政策。

聂荣臻指示有关部门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召开座谈会，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开“神仙会”，请科学家们就知识分子政策和科技政策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聂荣臻感到必须给知识分子一个“春天”，给科学研究工作环境以“春天”。而要促使这样的“春天”来临，就必须赶快制定这方面的政策。

于是，他让秘书通知有关科研主管部门的一些领导来到王庄，听他们汇报前一阶段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和各单位研究政策的执行情况，提出需要改进的意见，一连开了十多天的会。聂荣臻为了纠正"左"的错误影响，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聂荣臻反复强调，十四条中，最主要的是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及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这三条，这是十四条中的核心问题。杭州会议刚结束，聂荣臻就让中国科学院参加会议的韩光和张劲夫，在北京和东北地区召开中科院党员所长会议，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征求党内外科学家对十四条的意见，提出修改建议，还在钢铁、地质、农业、医学四个科学研究院讨论和试点。中央科学领导小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党组也进行多次讨论。

5 月中旬，聂荣臻又多次找人谈话，了解十四条的修改意见和试点情况。他还请陆定一、郭沫若、张际春、周扬、龚子荣等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帮助修改。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聂荣臻认为，《科学十四条》已趋于成熟。6 月 20 日，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的后面附上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名义写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请示报告》谈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红与专的关系问题。

请示报告认为，当前红专的关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有一些同志只从红的方面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忽视和放松从专的方面要求他们。二、红的方面要求，有一些偏高偏急、不切实际、不加区别的毛病。三、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的帽子。请示报告建议废除"白专"的用语，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认为这个口号挫伤了一部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报告认为，"红"必须落实，不能空洞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

第二，如何正确地对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对此，聂荣臻在报告中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意见：在学术问题上，鼓励各种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进行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打棍



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与保留自己的意见，让科学实践与时间的考验来逐步明辨是非。

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限，对于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要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聂荣臻指出，科学研究应当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是不能有任何疑问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是十分宽广的，在这方面要有全面、长远观点。同时，他还强调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要根据国家建设中提出的科学技术任务，有计划地组织各有关学科的力量协作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科学技术任务的研究解决，来带动各个学科的发展。聂荣臻提出，各个系统的研究机构应该有合理的分工配合。研究工作和推广工作既要有联系，也要有区别。聂荣臻还指出，在大计划之下可以有小自由，对于国家计划以外的自由选题，应量力予以支持，或列入补充计划。

第四，克服培养、使用科学人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

聂荣臻认为，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过去有些负责人往往把个人钻研、个人创造，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他提出，对于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的办法和实行晋级、奖励制度，不受资历、学历、年龄的限制。

聂荣臻还提出了选拔和培养杰出科学人才的六点建议，即对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尽可能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帮助他们继续作出工作成绩；重点培养各研究机构中的优秀青年和中年科学工作者；减轻科学技术骨干的负担，使他们能安定下来搞研究工作；认真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实研究机构；承认并尊重个人的劳动成果；拟请中央批准，在今年内解决一批科学技术人员的升级问题，并在今后实行定期的考核晋级制度。

第五，关于科学工作的保密问题。

聂荣臻指出，必须纠正科学研究工作中保密范围过宽、用人条件要求过苛的现象，尽可能多地调动有经验的科学工作者来参与工作。并且提出了几点建议：（一）要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密级。按密级的不同，分别吸收符合条件的人来参加工作。（二）要正确地进行人员的政治审查，积极大胆地使用科技人员。（三）要妥善地解决科学技术资料和经验的交流问题。

第六，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问题。

《请示报告》指出："必须切实贯彻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的规定。研究工作就是研究机构的'生产第一线'。各项工作都要服务于第一线的需要，应该尽一切可能，把研究技术人员的精力和工作时间，用于研究工作。"另外，其第一节又很具体地说道："研究科技人员亲自动手进行实验，查阅文献，指导研究工作，进行学术讨论、讲课、撰写论文报告和学术出差等的时间，平均每周不得少于五个工作日。一般的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党团工会活动、行政会议，必须改进方法，提高效率，所占时间平均每周不应超过一个工作日。业余时间，应当尽量由研究技术人员自己支配，保证必要的自修、研究和休息的时间。"

第七，研究机构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问题。

聂荣臻认为，党组织在研究机构中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研究和决定研究所内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所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事无巨细都直接干预乃至包办代替、独断专行等毛病。对于学术工作，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民主讨论，通过行政领导和学术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动员科学工作者去努力实现。

1961 年 7 月 17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五院干部大会上，聂荣臻亲自讲解《科研十四条》的基本精神，阐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指明了党领导科技工作的正确方向和广大科技人员今后的奋斗目标。聂荣臻明确提出了科研单位各项工作必须以科研为中心，导弹上天必须依靠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要树立为科研工作服务，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思想等要求，有力地激发了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勇于创新的爱国热情。

聂荣臻的报告在交给中共中央半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个报告。

此时，毛泽东正好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与会了。会上，聂荣臻首先作了汇报，陈述了制订《科研十四条》的理由和过程，说明了制订这个条例的必要性。他在汇报结束时强调：有了这个条例，就能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广大年老的、年轻的、党内的、党外的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随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简要补充了《科学十四条》在中科院试点后的情况和反映。

邓小平在发言中表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很有必要。试行后



在实践中加以补充，使其成为科学工作的“宪法”。

在讨论的过程中，康生对聂荣臻请示汇报中的一段话提出异议。这段话原稿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目前有些提法，如‘资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反动的自然科学学派’、‘无产阶级自然科学体系’、‘红色自然科学家’等等，都是不对的，应当废止。”

本来，对于自然科学是否有阶级性的问题早已解决。1956 年 6 月，陆定一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在自然科学领域，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

这段话虽然重点是讲自然科学工作者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其前提则是承认自然科学的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然而，康生却不这么看，他提出，既然自然科学成为“体系”，就联系到哲学世界观，不好说没有阶级性。既然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后来请示报告在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时，对此作了删除和修改。除此以外，与会者一致通过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科研十四条》。随后又报送了毛泽东并得到了批准。

《科研十四条》总结了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大跃进”中曾经发生过的错误，规定了各项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科研十四条》的十四条内容是：其主要内容是：1. 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2. 采取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的方法，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3. 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4. 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检查科学计划，以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5. 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6. 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7. 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8. 加强协作，发展交流；9. 勤俭办科学，力求最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做出更多更好的科学成果；10. 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1. 继续贯彻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12.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3. 坚持调查研究；14. 健全和改进研究机构的领导制度。

这些政策和措施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在政治运动中和学术批判中“左”的错误。《科研十四条》重申了党的一贯政策，指出要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还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强调要严格划清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问

题的界限。一时难以划清的，应当先作学术问题处理，以避免过去屡屡发生的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当作政治问题批判的错误。

二是整顿科学技术工作的规章制度，保证科学技术工作的正常秩序。《科研十四条》规定，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必须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稳定性，反对轻率上马下马，任意打乱和中断科学研究工作。为了保证科学技术人员得以主要精力从事科学研究，还规定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不得以政治学习、社会活动或其他活动冲击业务工作时间。科学研究机构必须恢复和健全计划管理、实验室管理、学术交流、保密等各种规章制度。今后新的规章制度未建立起来前，旧的规章制度不得废弃不用。强调要树立和倡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与严格、严肃、严密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优良学风。

三是改善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科研十四条》要求科学研究机构的党组织，团结和依靠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尊重他们的专长，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要求各级党的干部认真学习和执行党的政策，学习业务，加强调查研究，对于科学研究机构中党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体制，也作出了适合科学研究工作特点的具体规定。

1961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将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科研十四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求在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宣传和贯彻这个条例所规定的有关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并且给这两个文件加了较长的批语。批语说：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放心、负责地去做工作。要切实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要求和帮助他们踏踏实实地做出成果。

《科研工作十四条》以及聂荣臻的请示报告经中共中央批转下达后，在自然科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反应十分强烈，科学界表示欢迎，积极性普遍提高；做党政工作的干部也表示欢迎，感到政策界限比较清楚了。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全面总结，是调动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多出成果、多出人才的基本政策，是研究机构今后工作的战斗纲领。这份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研究的历史性的文



件，对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研十四条》的制订和实施，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尤其是红与专关系的界定，明确了一个人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就算初步“红”了，实际上等于摘掉了强加给知识分子的“白专”帽子。

同时，党中央抓住了保证科技人员出成果的最关键条件之一——时间。不保证科技人员的时间就很难出成果。一个科技人员没有时间去读书，了解科技的新成就，去作实验计算，怎么可能有创造。当时贯彻《科研十四条》是由党委来管的，“六分之五”是绝对要保证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基本条件，才有“文化大革命”前那段科研的黄金时代。

在三年自然灾害及不公正对待知识分子时代中，中央发出了这样的政策性文件后，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积极性。《科研十四条》是一个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科技工作的经验教训、尽快发展国家科学技术的重要政策性文件。这个文件在全国科学研究机构中贯彻实施之后，迅速地取得显著的效果，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使我国的科技事业踏踏实实地向前发展。自 1961 至 1965 年的这五年间，众多的中国和世界“第一”，特别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是新中国进入第一个科技发展黄金期的重要标志。

同时，《科研十四条》对端正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科研生产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的科研成就，把《科研十四条》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把“广州会议”打成“向党进攻的黑会”；把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技战线上的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反党集团”或“走资派”；把一大批一大批的科技人员，打成“修正主义基础”、“反动学术权威”——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使全国科技工作更加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1979 年春天，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在为《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平反的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批示。批示说，对强加于《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和全国科技战线的一切诬蔑之词全部推倒，对在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都一律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档案中的有关材料全部销毁。

邓小平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1961年出台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章程，是当时整顿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条例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大跃进”的沉痛教训，到1960年已开始被人们所认识。1961年，毛泽东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同年1月，为了切实执行“八字”方针的具体政策，系统解决工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各省、市委主要领导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大跃进”期间，全国的工业企业掀起过一个大破规章制度的高潮，许多必要的规章制度都被废除了，出现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党政不分的混乱局面。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中央采取重大步骤，迅速扭转这种困境。这样一来，起草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此时，邓小平领导和组织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派出11个工作组，分别到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吉林等地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

在通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在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举行的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7月19日，中央又批转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四十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四十条》）。与此同时，9月16日，中共中央颁发了我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重要文件，这就是《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



关于《工业七十条》制定的目的和意义，在与条例同时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中，曾有明确的表述："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过去三年大跃进中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于我国工业今后的发展，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①

大跃进期间，由于建设上一哄而起加之大搞群众运动，废除了工矿企业中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使企业管理出现混乱的状况。《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就指出："在一些工业管理部门和工业企业中间不同程度地滋生了浮夸作风和瞎指挥作风，在不少的企业中管理工作相当混乱，责任制度废弛，设备损坏严重，劳动生产力下降，产品质量降低，企业之间原有的协作关系被破坏了"。②这些情况，造成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降，以1960年与1957年相比：生铁合格率由99.4%下降到74.9%，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12%。因此，在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时，除了从宏观上调整部门之间和工业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外，还必须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并且从重建必要的规章制度入手。

在制定和讨论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对条例的有关原则和规定曾有过争论，在具体实施时也曾有过不同意见。

6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谈到要用《农村六十条》教育干部时，指出："城市也要搞几十条。"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成了制定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的缘起。

7月26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了东北工业企业的情况，提出企业要整顿，要起草一部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并且让薄一波具体负责《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成员有李立三、彭涛、王鹤寿、许力群、田家英、谷牧、梅青、郭洪涛、马洪等。

中央书记处于7月29日在北戴河开会，听取了薄一波的汇报和说明，随后对《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进行分组讨论。讨论中大家发言踊跃，譬如7月31日在分组讨论"群众路线"时，李立三说："群众路线一条，要从正面写，不搞高产日、放卫星。大搞群众运动，偏差比较多。所以，要写不应该怎样做，不提大搞群众运动，不提把先进水平变成全

社会水平。”

李立三还提到了一长制，他说：“一长制无疑是错的，但是一长制时期的一些规章制度是对的，是适合现代化企业的。我们应当否定一长制忽视党的领导，肯定正确的规章制度。五八年打破了一长制的束缚，群众发动起来了，创造了许多新的形式，这是好的。问题在于对五七年前的全面否定，有章不循或无章可循……敢想敢干发展为蛮干……五七年否定一长制，加强党的领导，对。但出现党委包办代替行政，强迫命令有所发展。党不管党，不做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严重，原来的行政一长制变成了书记一专制。不关心工人，生产积极性如何提高？原因何在？上面压任务，高指标。书记睡在炉旁，为什么？也是要任务，要数字，不关心工人。与其受几次批评，不如受一次批评，比如像峰峰煤矿那样……今天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动群众，无法搞生产。”

8 月 6 日，在讨论第三章“责任制度”时，李立三说：“厂长和矿长也有好的，也忙得要死，但他无法负责。因为，他说话不算数，而是书记说了算，是书记在直接指挥生产……在党委直接指挥和管理生产的情况下，厂、矿长无法负责，也不敢负责。因此，搞的很乱。这种乱，不能怪下面……必须肯定一长制时期企业管理有很多好的东西，是符合现代化科学规律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党委直接管生产，发号施令，党政不分。不要工会，党群不分……企业中，群众运动要搞。但是，不能不回忆这几年的教训，所以，不提大搞（群众运动）。”

李立三还说：“六零年下半年，高指标，压任务，强迫命令，群众路线也不要了。不是行政的强迫命令，而是党委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五九年问题很严重，直到现在，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有发展。”

关于生产的重要性，李立三说：“责任制怎样才能建立呢？……是不是要提政治挂帅几个字呢？要进一步考虑。在企业里，最大的政治就是生产。生产好就是政治好。职工评级主要是看其生产表现，不能单纯强调政治。在工交企业中，党支部的任务就是保证生产。”

邓小平专程从庐山赶到北戴河，从 8 月 11 日到 14 日，主持召开起草定稿会议。邓小平在北戴河主持起草小组讨论定稿后，把“草案”带到庐山，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修改，最后才形成了提交 8 月 23 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讨论的正式草案。

《工业七十条（草案）》被归纳为 70 条，共有 10 章，1 个总则，加上邓



力群、田家英、胡绳、吴冷西等人起草的序言，总字数约25 000字。分别是：总则、第一章计划管理、第二章技术管理、第三章劳动管理、第四章工资奖励、第五章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第六章协作、第七章责任制度、第八章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第九章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第十章党的工作。

《工业七十条》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总的来说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则，阐述了国营的性质、任务、管理原则、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以及党组织在企业的领导核心地位；第二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共53条，是关于企业管理的内容；第三部分，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企业党的工作以及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作了若干规定。

8月15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联名向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写信要求给予审查，并附上条例草案稿。信中说，条例针对当前企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重对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一）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负责实行“五保”；（二）加强责任制度；（三）端正对技术人员、老工人的政策；（四）严格经济核算的纪律；（五）工人工资形式采取计时制或者计件制，应视能否更多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定，不强调以哪种形式为主；（六）强调工会的作用；（七）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企业党委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和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布置的任务；（八）调整和固定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严格实行经济合同制；（九）重要的工业企业由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管理；（十）每个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只能由一个行政主管机关管理，不能多头领导。

当天，中央办公厅将条例草案稿和4人的联名信，印发给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人，请他们事先阅读，提出意见。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召开。《工业七十条（草案）》提交会议讨论。9月5日，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强调：整顿企业要从“五定”入手，按照“工业七十条”，一个一个地抓，一个一个地整顿好。并强调，工业调整和整顿是为了前进，不能失去前进的方向和信心。要积极地干，要千方百计地干。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想法，主要放在这上面，不要失掉这个方向。他还说：这个条例将采用《农业六十条》的办法，先发下去试行，在试行中再修改。

对于《工业七十条》，多数与会者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对于兴利除

弊、整顿工业企业、搞好企业管理十分必要。有了这个条例后，工业企业的工作就有章可循了。但是，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条例》对“大跃进”的正面经验总结得不够，肯定得太少，党的领导问题不突出等等。还有人担心，实行这个条例，又将回到“大跃进”以前的老路上去。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会上的不同意见，凡能吸收的都尽量加以吸收，并对条例初稿再次作了修改。尽管如此，仍有人不肯表态。最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出了个主意：在颁发条例的同时，另写一封指示信，全面论述“大跃进”的成就，并对制定这一条例的目的，意义、重要内容进一步加以说明。中央书记处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指定由田家英组织人员起草指示信。

9月16日，彭真将指示信和修改后的条例草案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附信说明：“六个大区的同志已阅，均无意见，认为很好。”最后，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条例。9月17日，毛泽东对条例作出批示“很好”。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审阅时，不约而同地在条例的题目上圈掉了“管理”二字。条例最后定名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并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和试行。

中央通过《工业七十条》之后，立即对基层进行了传达，草案一直发到企业党委。中央要求全体国营工业企业要一字不漏地读给全体职工听，同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选择不同行业和大、中、小不同类型的企业试行，并根据条例的规定整顿企业。文件下发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广泛拥护。辽宁一个大工业城市的市委书记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感到企业问题很多，脑子很乱，千头万绪。《工业七十条》给我们理出头绪来了。”工厂厂长们反映：“过去工作抓多了怕犯一长制错误，抓少了又怕别人说不负责任。现在条文规定明确，工作好做了。”各地科技人员的反映是“《工业七十条》给我们撑了腰，领导尊重科学，尊重我们的职权，我们要更好地工作。钻研技术不怕别人说是走白专道路了。”老工人反映“条例规定得有条有理，都是我们心里想的。”青年工人高兴地说“《工业七十条》规定，定期进行技术考核，调整工资级别，今后可得好好学习技术。”

不过，关于《工业七十条》是否能够兑现的问题，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

天津永利久大化工厂有的工人说：“《工业七十条》好是好，就怕三天



热气一阵风。”沈阳第一机床厂有的工人说“几年来又是风、又是雨，一提规章制度不合理就立刻破。《工业七十条》能长久吗?”安庆邮局有个工作人员说：“《工业七十条》能实行一半也是好的。”一些企业党委书记则对条例草案提出批评。他们说“今后党委没事干了”，“党委书记不好当了”。他们担心车间、工段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会削弱党的领导。坚决反对这一条例的也不乏其人。有一个大城市的党委领导，就这样说过起草人“好像刚从外国回来，不懂中国情况，没有经历过大跃进，总想恢复过去的一套老办法”。

厂长行政负责制是《工业七十条》在试行中引起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执行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制一定要不折不扣。

在 1961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当讨论到企业整顿问题时，邓小平说，企业生产指挥权一定要集中在厂长负责制上，至少 3 年内如此。1962 年 7 月 11 日，书记处听取国防工业情况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工业七十条》明确规定行政上由厂长负责，书记不应该干预日常行政事务。

会上有人说《工业七十条》还在试点时，邓小平指出，要百分之百地执行《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不要试点了，也不要等修改了，就那样办；今后要新章程办事，哪一个书记独断专行，不执行《工业七十条》，请大家讲出名字来。

《工业七十条》对于迅速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起了立竿见影的重大作用。经过“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的正反两方面的对比，这个条例也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对《工业七十条》十分满意，他曾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搞出一些章法来了。”

1965 年 7 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仍为 70 条，但设立了 20 章。由于 1962 年 9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并且在其后的近 3 年时间里开展了一连串的“四清”运动，学大庆、学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等项运动，因此，“修正草案”加进了这些内容。在“修正草案”颁发至 1966 年底文革波及到工矿企业的一年多时间里，工矿企业的工作基

本上是遵照这个修订本执行的。

在后来的实践中，《工业七十条》因为受到了“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并且随着“四清”运动和全国学解放军运动的广泛开展，企业管理日益“政治化”，导致《工业七十条》中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被认为“没有跳出苏联一长制的框框”，而主张割去厂长负责制这个尾巴，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有的还仿照军队做法，企业设政委，实行“双首长制”，即政委、厂长负责制。

“文革”中，《工业七十条》被错误地批判为“管卡压”、“洋奴哲学”、“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等，被“四人帮”诬为“瓦解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一棵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为了治理“文革”经济战线之混乱，鉴于《工业七十条》已被破坏，邓小平1975年复出后，在吸取《工业七十条》的优点基础上，领导制定了《工业二十条》。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工业二十条》没能下发，但其主要内容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之后，围绕《工业七十条》的争论基本上结束了。

《工业七十条》从其制定到“文革”中遭受的批判和挫折，使《工业七十条》的一些局限也相继地暴露出来。譬如，它对国营工业企业的地位及其经营管理权的规定有自相矛盾之处，坚持在“大跃进”中暴露了许多矛盾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而不恢复八大以前的厂长负责制。

不过，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章程的《工业七十条》，是当时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和改进企业管理方面的重要文件。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领导国营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企业管理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对企业管理的法制建设工作做了有益的探索。

《工业七十条》的公布和试行基本上是符合中国情况的，对于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起了重大作用。经过一系列的工作，由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济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我国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对当时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功不可没。以

1965 年与 1962 年比较，三年内工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7.9%，工业净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21.3%，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平均每年降低 1.5%。

注释：

①《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 年版。

②《中国工业管理条例汇编》，地质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00 页。

③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641 页。

④《中国工业的发展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1 页。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1961 年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印发讨论试行的《教育部直属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高教六十条》），是在教育领域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条例及时总结了 1958 年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经验教训，并且对于“文革”后我国教育领域一系列文件的制定以及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从 50 年代中期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关键时期，国家建设急需各类专门人才，因此，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也凸显出来，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56 年 1 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指出：高等学校中的科研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大量培养合乎现代化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

“向现代科学进军”这个号召包含了高等教育与世界新技术革命接轨的思想。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高等学校开始建立起多种新型学科，培养出大批人才。同时，高等学校还凭借其雄厚的科研能力，积极参与《1956 年至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承担重大的国家科研任务，成为我国科学术研究系统的一支重要力量。

但 1957 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打断了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势头。大批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使教育事业蒙受巨大损失。运动结束后，党中央进行对“左”的错误的反思，在教育领域也开始了改革。1958 年 4 月，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批判了教育部门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的错误。随后，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大知识分子开始了“工人阶级化”和



“劳动化”的改造。

1958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了党对教育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场“教育大革命”在全国展开。这一时期，许多高等院校调整学科，组建高新技术专业，促进了科研队伍和科研工作的发展；有些高校“真刀真枪”地进行毕业设计，与业务部门开展科研合作，闯出了教学、科研、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路子。

但是，“教育大革命”没有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失误。这主要是由于“左倾”思想在党内抬头，缺乏经验和急躁冒进，以及对教育客观规律的轻视导致的。主要表现在：当时提出“15 年内普及高等教育”，办学权力下放，学校规模失控，办学质量下降；在高等学校开展了“红专大辩论”，片面强调“红”，打击了师生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批判”，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教学内容”，批判“资产阶级教育体系”，使教师的地位一落千丈；片面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高等教育的目标下降为培养“普通劳动者”，学校大办工厂，学生大搞科研，冲击了正常的教学活动；提出“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使学生掌握的知识十分狭窄，且支离破碎。虽然这场教育领域的大动荡在某些局部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来讲，它给教育领域带来的是一场灾难，是教育质量的全面滑坡。

面对教育领域出现的混乱局面，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为扭转局势，决定进行调整。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一是压缩高等学校数量和在校生规模，至 1963 年底，高等学校由 1960 年的 1 289 所压缩为 407 所，在校学生由 96 万人压缩为 75 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由 1960 年的 6 225 所裁并为 1 355 所，在校学生由 221.6 万人压缩为 45.2 万人；二是调整和规范专业设置，修订高等学校专业目录，1958 年初全国 219 所高校共有专业 363 种，其后两年间新增上千种，种类多、专业窄、不规范的现象严重，1963 年调整为 510 种（其中绝密、机密专业 78 种）；三是稳定和恢复被“大跃进”、“教育革命”打乱的教育教学秩序及常规管理，并将“教育革命”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予以规范化和固定化，起草一个指导性文件被提上议程。

1961 年 3 月，根据中央指示，由邓小平领导，教育部开始进行条例的起

草工作。

草案的起草工作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在此期间，教育部分别到天津、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对高校领导体制问题，教学工作，仪器设备的损失和管理，图书馆工作，学生学习和生活，总务工作等进行深入调查。在获得大量的调查材料和各方面反映的实际情况之后，起草小组开始了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教育部曾召开两次座谈会，邀集部分高等学校的负责同志和教授讨论，并对草案进行反复修改，最终确定了条例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7 月 29 日至 8 月 5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逐条讨论修改，主要修改了七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培养目标方面，草案增加了“具备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要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并将原来的“精通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改为“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第二，在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方面，书记处会议决定将关于教师主导作用一条，移入总则一章，提法改为：“必须正确地贯彻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认真教好学生；另一方面要发挥学生积极性，认真学好功课。”

会议认为，要明确提出贯彻“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为着发展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而不是使马列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说平起平坐。同时，还增加了“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允许对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的内容。此外，文科开设资产阶级课程，只限于高年级。

第三，在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方面，经过激烈的讨论，书记处会议认为，要充分肯定高校科研工作的地位、作用，应独立成章，并保留了条例稿的提法：“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前提下，高等学校应积极地开展科学研究以提高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

第四，在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方面，书记处会议在肯定了“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前提下，把“以系主任为首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改为：系主任是系的负责人，在校长领导下主持系务委员会和系的经常工作，重大工作要经过系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系主任负责执行；系务委员会闭会期间，由系主任召集行政会议，处理系的日常工作；明确系党总支的作用为监督保证。

第五，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红”、“专”关系方面，书记处会议补充



了一条专门讲“红”、“专”关系的内容，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管“红”，而且要管“专”，“红”要通过“专”体现出来。只“专”不“红”或重“红”轻“专”都是不对的。“白”与“专”没有必然的联系，废除“白专道路”的提法。

第六，在总务工作方面，书记处同意将总务工作与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内容合并为独立的一章，在总则中增加“要关心师生员工的生活”的条文；在“校长分工”条文中，增加了“要有人分工管总务工作”等内容；在“系主任职责”中，规定“要关心和改善师生生活”。

第七，在党的工作方面，书记处会议在党的作风一条中增加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

除条例稿外，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由中宣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工作条例的指示稿。8 月 5 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联名致信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报告起草和修改情况，说明讨论经过，并附上条例，请毛泽东审阅后批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教育部排除调查组到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选读条例，征求意见。

1961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16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庐山工作会议，会议对《高教六十条》草案和中央指示草稿进行了讨论和修改，最终批准了《高教六十条》。9 月 15 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核阅批准的《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原则批准《高教六十条》，并决定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讨论试行对这个条例，毛泽东予以肯定。用他的话说：“总算有自己的东西。”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分 10 章、60 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教学工作，第三章生产劳动，第四章研究生培养工作，第五章科学研究工作，第六章教师和学生，第七章物质设备和生活管理，第八章思想政治工作，第九章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第十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第一，规定了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和培养目标。“高教六十条”指出，“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

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第二，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高教六十条”指出，“高等学校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以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术水平，促进科学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第三，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努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为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服务；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和行政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

第四，继承及巩固“教育革命”中的一些经验和成果。对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一条教育方针整体坚持和肯定，但对生产劳动过多、冲击正常教学、损害师生健康、实施简单粗暴等问题加以了限制；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总体上坚持并注重实际，规定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间，理工科、文科分别占总学时的10%、20%左右，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细致、讲求实效，不容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群众性政治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对于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延续了“教育革命”中对校长负责制的否定，继续加强党委领导，首次明确规定高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第五，做好总务后勤工作，保证教学和生的物质条件。

这方面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由于盲目大办教育，加上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保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题。这就突出了总务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条例对做好总务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如总务工作要有全局观点，自觉为教学、科研、师生生活服务；要教育师生尊重总务工作者的劳动，克服忽视总务工作的错误观点等。此外，对改善教学生活条件、加强图书馆、资料室、实验室的建和管理等工作，条例稿也作出了规定。

第六，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



负责制。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几经变化。1950 年，效仿苏联经验，实行校长负责制。1956 年后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但普遍执行得不够理想。由于校长的地位、职责不明，校委会有名无实，使整个行政系统软弱无力，发挥作用不够。若改为校长负责制，又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有些校长事实上不能担负全面领导的责任；二是把校委会改为咨询机构，不利于加强党外人士的责任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总结上述两种形式的经验，取二者之长、去二者之短，条例稿决定试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这是对高校领导体制的一种探索。

《高校六十条》始终是个暂行草案，规定只在高校党员中讨论，全体师生中宣读，不在校外公布、报刊发表，拟经讨论、试验、修改后再行正式公布。1962 年 3 月，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宣布：全国的高等学校，凡是具备条件的，都应该试行。至 1963 年初，全国 407 所高等学校中有 222 所试行了这个条例。其中由各部委领导的 71 所，省、市、自治区领导的 127 所，其余高等学校也大都参照条例精神改进了工作。在此过程中，各高校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对各项工作进行调整和改善。教育部相继出台一系列补充办法和实施细则，高等学校初步建立起一套较为规范的章程制度。经过上下努力，高等教育重新进入了良好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

首先，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如南京大学将已设立和准备设立的 33 个专业调整为 28 个，将已建立和准备建立的 64 个专门组调整为 55 个。由于减少了 110 门新课任务，有关的系、组得以腾出力量，加强基础课教学，并对已开出的 150 多门新课进行充实和提高。

其次，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得到发挥。1962 年，教育部发出在全国重点高校中培养骨干教师的通知。1962 至 1963 学年度，接受进修的教师达 3 118 人。在条例的试行过程中，还对过去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教师进行甄别，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

再次，研究生培养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从 1962 年起，我国开始正规培养三年制研究生，并对提高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1963 年，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研究生专业目录》，并对培养方案等作出原则规定。1962 年至 1965 年，是我国研究生培养制度初步建立的时期，各高等学校共培养研究生 17 521 名。

此外，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蓬勃发展。从 1962 年起，教育部直属院校

拥有一定数量的专职科研人员，1966 年达 5 200 人。从 1963 年起，国家给高等学校专门拨发科研经费，在 11 所学校建立了 18 个专门的科研机构。

经过调整，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国家建设的大批骨干力量被培养出来。1962 年至 1965 年也因此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

《高校六十条》在 1965 年前，起到了稳定教育教学秩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重要作用。但试行、整顿后的制度化教育，与他“全国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理想相距甚远。1964 年高校师生大规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高校六十条》名存实亡。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教六十条》被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纲领”遭到批判，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为了规范高校管理，《高教六十条》也经修订后于 1978 年 10 月在全国高等学校试行，到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印发之前，一直被沿用。

不过，《高校六十条》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局限性。首先。在对高校职能的界定上存在局限性。关于社会服务这一方面，《高校六十条》并未涉及到。虽然谈到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学校办工厂，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是为了使学生养成劳动习惯。这样就使高校变的极其封闭，与外界联系甚少。

其次，在培养目标的界定上存在局限性。《高教六十条》提出要培养有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而未涉及通识教育，这与建国初期各行各业迫切需要专门人才、全盘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按行业设置校和专业、大多数高校接受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等因素有密切联系。

再次，在对高校教师地位的界定上，以及“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的界定上也存在着局限性。虽然《高教六十条》存在着这些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和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但出现了一定的“照搬”倾向；“教育革命”实质是“左”的思想严重影响下的一次现代教育中国化道路探索，结果事与愿违。《高校六十条》纠正了 1958 年至 1960 年“教育革命”期间高等教育教学的偏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教学及管理的经验教训，是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下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及特点的努力探索，在一定时期起到了“准高等教育法”的作用。特别是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

［2］傅颐，《六十年代初〈高教六十条〉的制定、试行及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

［3］《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4］《南大百年实录》下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6］《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7］《当代中国教育》（上）。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

196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通过各地讨论试行。后来，这个文件几经修改，变成8个方面的问题，称《文艺八条》，于1962年4月30日以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的名义下发全国。文件使许多文艺家重拾了创作欲望，文艺工作者精神振奋，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放下了沉重的包袱。

全国解放以来，我国的文学艺术，继续沿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正确方向前进，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学艺术工作者对祖国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视和赞扬。

建国初期，全国革命的、爱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上广泛团结起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共同方向。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在群众斗争中受到了锻炼。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和深入，文艺界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些斗争，密切地配合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5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提出并倡导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又把它们作为文艺工作的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但是，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毛泽东的思维框架又带有某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色彩。在这一思维框架里，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成了政治的附属物，文艺作品，学术见解的主要评价标准是政治标准，文艺批评、学术争论也往往变为政治批判。毛泽东领导甚至直接指导了文艺界几次大规模的错误的批判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就能证明这一点。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对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担心、非但没有消除或减弱，反而加重了。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和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部门，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共产党的领导；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还没有改造好，在思想上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从上述估计出发，他提出思想战线上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思想战线一个重要的乃至头等的大事。

从反右派运动到三年“大跃进”，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图解政治的现象日甚一日，搞了诸如“新诗歌运动”、“教育革命”、“文化大跃进”之类的违背自身客观规律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大批判此起彼伏，相继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批判”新人口论”、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西方文艺和学术思想等一系列运动，其结果，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折，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取得真正的进步与成绩。

60 年代初期，国家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战线出现的“左”倾错误，贯彻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 年上半年，在中央全面调整方针的指导下，文化、教育、科技等战线也开始着手制定具体政策，形成条例，以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为了调整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动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风雨同舟，共渡难关；二是为了复苏和繁荣文化。

1960 年 11 月 14 日，周恩来召集召开有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教工作座谈会。周恩来重申了两年前关于文教工作中纠“左”的意见，对他 1959 年 5 月 3 日所作《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被封锁表示不悦。

周扬和林默涵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参阅了聂荣臻主持制定的《科研十四条》草稿后，决心重新提出 1959 年上半年酝酿的起草一个条例、开一个会、向中央写一个报告的“三一”计划。周扬提议条例的详细条目由林默涵考虑。

1961 年 1 月至 3 月，林默涵分别主持召开了话剧、戏曲、电影、美术、报刊等五个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感到文艺工作管得太死、太乱，存在简单粗暴的现象，双百方针贯彻得不好。他和文化部、文联、作协等一些领导在北戴河进行酝酿、集体讨论。林默涵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周恩

来《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为指导思想，系统讲了十条意见：一是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二是题材风格多样化；三是普及与提高；四是中外遗产的继承；五是加强艺术实践，保证创作时间；六是加强文艺评论；七是重视培养人才；八是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九是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十是改进领导。

5月，林默涵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初稿）。其主要内容是：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其中强调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注意团结党外作家艺术家；强调贯彻“双百”方针，反对简单粗暴和行政命令；强调尊重艺术规律，防止片面追求数量而不注意质量；强调文艺界批评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克服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以说，这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而制定的条例。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并讨论“文艺十条”初稿。

会议指出了“大跃进”以来文艺作品宣传了“五风”、文艺工作未能很好地执行“双百”方针、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解狭窄及主题思想与生活真实关系等问题。与此同时，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也在北京召开。6月19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他在事前调阅了大批文字材料，听取了周扬、林默涵等人的汇报，并同部分代表亲切交谈，倾听了意见。周恩来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为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阐述了在文艺工作中发扬民主作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周恩来指出，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头了，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他还讲到：精神产品的生产有自身规律，不能限制时间和数量，强求一致；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达出来，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

周恩来指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它是精神生产，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在这个问题上，要解决好数



量和质量，原料和加工，思想和业务，批评和讨论等问题。

他还说，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在中外关系上，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

他开宗明义地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对别人的话动不动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全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这种不好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他强调要在文艺界树立民主作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周恩来指出，这是从主观主义、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出发。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

他说，“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总结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排除“左”的干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的讲话不少地方切中时弊，仗义执言，批评了文艺工作以及其他领域出现的一些“左”的思想和观点。讲话总结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讲话，对于排除“左”的干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将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草案总结了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政策方面“左”的错误。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

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这个文件的下发，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对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很有启发。中宣部召开会议，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文艺工作方面也应该制定出一个条例来，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主要是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的毛病。

在周扬同志领导下，由中央宣传部协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由中宣部文艺处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

这个条例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注和文艺界同志的拥护。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地提出应该把这个条例刻成碑。但是，由于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因此，迟迟未将条例报送中央。

8 月 1 日，中宣部把“文艺十条”印发各省市征求意见。各地文艺界普遍拥护，认为这个条例可以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借此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的毛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它“右”了。中宣部长陆定一一时“拿不准”，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因此迟迟未将条例正式下发。

这年 10 月，林默涵参加了周恩来在紫光阁召集的一次在京文艺家座谈会，话题是曹禺刚公演的历史剧作《胆剑篇》。此剧尚未公演，林默涵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座谈会上，就对剧本提出了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见。而周恩来在紫光阁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新的迷信把我们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曹禺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他入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来讲一下有好处，所以举曹禺为例，因为他是党员，是我的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

周恩来还提出，要发扬政治民主、艺术民主，纠正极“左”思潮，鼓励文艺工作者大胆创作，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会后，曹禺对林默涵说：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听总理这么批评和鼓励，我倒觉得如释重负了。



1962年3月2日至26日，林默涵和文化部党组书记齐燕铭受周恩来的委托，共同主持了以文化部、中国剧协名义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160多名剧作家、导演、理论家和戏剧工作者。这是文艺界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会议。会上，首先让大家"出气"，批评文艺领导工作中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发号施令、粗暴干涉等等错误，并将这些问题如实地反映给专程赴会的周恩来和陈毅（他们同时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请他们作报告。

在林默涵、齐燕铭的主持下，广州会议热烈讨论了促进创作、百花齐放、积极表现人民的新时代和鼓励题材风格的多样化问题，在整个文艺界、知识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大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

广州会议上，许多文艺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文艺条例。回京后，林默涵根据周扬交代，又对经陆定一修改压缩、显得过于顾忌的"文艺八条"作了小改动，将之送给陈毅。陈毅对此作了首肯，认为这是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的需要的，是成熟的文件，可以报送中央书记处。

4月30日，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文艺条例以中央名义发至全国各地。广大文艺工作者交口称赞，誉之为"文艺大法"。

《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条例指出，这一方针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只有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同时，条例还提倡文学艺术创作的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文学艺术上不同的体裁、形式，都可以自由发展，自由竞赛。

此外，对于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要多加鼓励，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必须鼓励作家艺术家在艺术手法和艺术技巧上新的探索和创造。对于艺术革新的尝试，只要方向对头，即使一时还不成熟，也要给以支持。

第二、努力提高创作质量，即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条例指出，必须鼓励作家艺术家在艺术手法和艺术技巧上新的探索和创造。对于艺术革新的尝试，只要方向对头，即使一时还不成熟，也要给以

支持。

同时，为做到这一点，要提倡和帮助作家艺术家深入群众，熟悉生活，学习马列著作和艺术技巧，反对在创作的产量和速度上强求一律。

此外，组织创作应该按照作家艺术家的自愿和可能，不要简单地采取定人、定题、定时的办法，不要随便给作者以“创作突击”的任务。

第三、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在整理遗产和继承传统问题上，既反对粗暴，也反对保守，鼓励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恰当的、适合传统艺术特点的革新。在对待外国文化问题上，既反对一概排斥，也反对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要有计划地整理祖国文学艺术遗产，翻译外国优秀作品，并且有选择的在群众中加以传播。

四、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必须克服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人民内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

五、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首先必须保证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时间，此外，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一般每年定为半个月到一个月。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不能过多。要切实注意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劳逸安排，特别要关心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生活，帮他们解决困难。

六、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

对于有突出才能的人要重点培养，培养人才的方向是又红又专。同时要实行优秀作品和优秀表演的奖励制度，制定和实行合理的稿酬制度，保障作家艺术家按照稿酬制度取得应得的报酬。

七、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艺术家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只能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艺术上、学术上的问题只能通过艺术实践和自由讨论来解决，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也不应该把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随便引申为世界观问题，绝不要因为思想上、艺术上的分歧而缩小团结的范围。

八、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必须加强党对文艺事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不应该不适当地干涉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要充分发挥文联和各协会等文艺团体的作用，要吸取一定数量的非党代表人物参加文艺团体



和文艺单位的领导机构，并且使他们真正发挥作用。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党性锻炼，认真学习和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努力熟悉业务，熟悉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规律，努力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文艺八条》是文艺工作进行调整的重要文件，它是多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应当说《文艺八条》不仅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缺点、错误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并且强调了文艺工作者要加强团结，继续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加强党的领导；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反对文艺领导工作中的简单粗暴，不按照文艺规律领导文艺工作的现象，强调对待文艺问题和文艺工作者，都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提出要有艺术上的民主，没有这个民主，文艺根本不能发展等等正确意见。因此，对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文艺界确实出现了新景象。

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

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周总理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鼓励文艺工作者要解放思想。因为这次会议是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所以又被称之为“新侨会议”。

1958年的“大跃进”，在经济建设中，违背了客观规律，发生了“左”倾错误，这种错误也影响到了文艺工作中。当时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主要是：文艺部门，出现了领导方式的简单化，民主作风不够，违反艺术规律，忽视艺术特征，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等现象。尤其是缺乏艺术民主，对作品、对创作者动辄戴帽子，打棍子，严重挫伤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电影界的情况尤其严重。许多制片厂纷纷提出“跃进”计划，提出“人人放卫星”、“部部工农兵，片片满堂红”等，要两三个月就拍制出一部故事片来。

1959年5月3日，周恩来邀约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在紫光阁谈话。谈话的内容是说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文艺是精神产品，工作不能过分紧张，既要力争完成任务，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等等。这两次讲话的精神都是要纠正当时文艺工作中的片面性和“左”的思想。

1959年下半年，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同时，由于当时文化部党组个别领导人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头脑发热，听不进周恩来的这些忠告，认为广泛传达会影响跃进的情绪，只准在小范围内进行了传达，也没有组织讨论，又没有研究如何加以贯彻。所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总理提到，他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谈话，“得不到反映，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1960年冬，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文艺界也开始实行文艺政策的调整，甄别平反曾经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等。1961 年第 3 期《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的专论，指出对于近来一个时期题材问题上的片面化、狭隘化的倾向，不能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必须广开文路，提倡题材的多样化，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因为“题材本身，并不是判断一部作品价值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更不是唯一的条件”，“作家、艺术家在选择题材上，完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

从 1957 年“反右”扩大化开始的“左”的错误急剧膨胀，使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1959 年错误发动的“反右倾”运动，使情况更加严重，对文艺事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1961 年 6 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如何改进文艺工作领导等问题，并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与此同时，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也在北京召开，也是为了贯彻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三年来的经验，改进领导方法，并讨论《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

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论述了发扬艺术民主、尊重文艺规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问题。不久，中央根据这个讲话精神，制订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八条》），集中体现了党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的精神，在创作与评论方面，在文艺队伍建设与文艺领导工作方面，提出了合乎文艺规律的主张。

周恩来的讲话名为《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共分八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周恩来提出要提倡艺术民主，解放思想。他明确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

同时也要主张坚持原则，反对五子登科，即“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周恩来指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

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因此，周恩来要求文艺界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二部分是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问题”。周恩来强调，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他指出，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账，算大账，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

同时周恩来指出，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

他说：“文化部门应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第三部分是关于“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讲话中指出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思想上的，还有旧的习惯势力。

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



派猖狂进攻。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

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

讲起道理，大家都同意，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习惯势力就来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二十一世纪也许能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这里涉及阶级斗争问题。

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否则，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

第四部分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

同时，周恩来还强调文艺作品的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百花齐放。比如：要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

周恩来来还指出，搞文化工作也要研究经济基础。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所以要缩短战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第五部分是“文艺规律问题”。周恩来批评了一些违反艺术规律的现象，反复强调遵循和掌握艺术规律的重要性。

他说：“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

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

周恩来在这一方面的讲话中主要探讨了4个问题，

在“数量和质量”问题上，周恩来指出，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现在应当允许作家的写作时间多一点，不要催得太急。剧团也不要演那么多场，使演员能够劳逸结合。

在“原料和加工”问题上，周恩来指出，现在应当更加着重加工这一方面，因此要多给点时间。并且周恩来还特别提到，“《杨门女将》这出戏如果能由梅兰芳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在“思想和业务”问题上，周恩来指出，一定要加强思想学习，同时也要精通业务，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与此相连，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

在“批评和讨论”问题上，周恩来强调，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

第六部分是“遗产与创造”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虽然谈得并不多，但是他在当时已经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意见：一方面要相信“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另一方面，“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搞复古主义，“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第七部分是“领导问题”。周恩来针对文艺领导的“一言堂”现象，呼吁发扬艺术民主，指出现在民主作风不够和领导有关。

他指出，要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他强调“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第八部分是“话剧问题”。强调掌握话剧创作的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演员自



己要做到客观逼真，主观认真。

最后，周恩来明确地提出了研究艺术规律的重要任务。他说："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周总理这次在新侨会议讲得非常明确："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

周恩来在新侨会议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1959年那个讲话的引申，而且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更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指导思想与领导作风问题，是要求各级党委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应改变"一言堂"的作风，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问题。

这个讲话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经验教训，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艺术民主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所提出来的有关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对继续反对"左"的指导思想，改变缺乏民主的领导作风很有意义，而且对于文艺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解放文艺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文艺更好地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这个讲话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正确解决遗产与创造问题，认真学习、思考，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是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使得创作人员思想解放，终于在1962至1964年又逐渐恢复正常生产，并且又一次形成一个小高峰，先后拍摄了如《甲午风云》、《停战以后》、《阿娜尔罕》、《李双双》、《燎原》、《槐树庄》、《南海潮》、《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小兵张嘎》、《红日》、《农奴》、《英雄儿女》、《阿诗玛》、《白

求恩》、《霓虹灯下的哨兵》、《天山上的红花》，戏曲片《野猪林》、《红楼梦》、《花为媒》、《槐荫记》，美术片《大闹天宫》等等。

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电影故事片创作人员思想最活跃、议论极广泛、讨论最热烈、也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说是对“大跃进”三年来的总结，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电影界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尽管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反右倾运动，当时还不可能得到澄清，但就创作中涉及到的问题来看，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例如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党如何加强和正确地领导精神生产的问题，如何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关于题材风格多样化问题……直到艺术规律、人性论、正面人物的创造、反映矛盾、创作人员的生活、学习等许许多多实际问题。普遍反映了创作人员顾虑重重，精神紧张，一怕“右倾”，二怕“不听党的话”，加上领导作风的简单粗暴，以致在创作中束手束脚，唯恐犯错误的心情。因此，许多同志对1959年总理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讲话没有向下传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甚至提出要追查责任。

会后，中宣部、文化部根据周总理讲话精神，制定了《文艺八条》和《加强电影生产领导》等文件。

不过，在这次会后，各有关部门并没有认真地开展对艺术规律的研究，不重视掌握和运用艺术规律，以致文艺领导工作和创作实践中产生了比较严重地违反和不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的现象。而且，这次会议在“文革”期间竟被诬蔑为“新侨黑会”。而根据总理指示的精神起草并原则同意，又经中央批转，以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名义正式发出的“文艺八条”，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1962年2月16日至3月12日，由国家科委主持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研究了关于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关于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的问题，编制了1963年至1973年的10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从而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

1962年，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调整。中央先后批发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条例对如何改进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了具体办法。在“工业七十条”中，还明确提出国营工业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61年6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周恩来发表了关于解放知识分子思想的重要讲话，因为周恩来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人们不敢讲话了，这与他们所背负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有关。周恩来的讲话中，虽然没有明确恢复1956年他关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但他的话还是给广大知识分子一些新的感受。

同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科研十四条（草案）”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聂荣臻等出席了会议并发言。刘少奇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向要纠。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

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邓小平说：要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我们就是要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根据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7月19日批转这一草案时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文件强调："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地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放心、负责地去做工作。"①

广州会议前夕，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检讨和纠正了1958年以来各项工作中"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没有再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的爱国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95%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同时毛泽东再次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并说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②并且他还提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充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先后发表讲话，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随后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2月16日至3月12日，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同期"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也于广州召开，所以又称为"广州会议"。会议由聂荣臻副总理主持，韩光、张劲夫、杜润生、陶铸、蒋南翔、于光远等参加了会议领导。这些领导人都参加了七千人大会，因而把大会的精神也带到了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卫生部、全国科协、中宣部科学处、中央各产业部门科研机



构、地方科技管理机构等部门的 100 多位主管科学技术的负责人，和全国各学科领域 300 余位重要的科学家都予以参加。

广州会议原定的主题是“动员并组织科学家讨论有关科学长远规划的编制问题”，为了更好地“改进工作”，聂荣臻在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了“一不戴帽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抒己见，充分争鸣，以很好地总结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改进工作。不过，受“七千人大会”的影响，到会科学家发言踊跃，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有科学家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会议第二天，会议核心领导小组发现，科学家们非常关心知识分子的属性，或者说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位置问题。因此，聂荣臻决定给会议再加一个主题：进一步贯彻《科研十四条》，突出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聂荣臻请周恩来、陈毅先后在会上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参加听报告的还有文化部同时在广州召开戏剧创作会议的代表）。

会上，关于总结科技大跃进的教训这一问题，与会者踊跃发言，并成为大会的一项重点。相关言论大致可分为九类：

关于科学工作中的群众运动问题，有的同志说，有些科学技术的群众运动，我很怀疑，因为它害人不浅，破害国家财富。如汽车列车化，四吨车拉百吨货，我听了认为这样搞会“天下大乱”，可是很多方面却认为这是“天大的创造”，纷纷报喜、参观、推广。结果，列车走不了几分钟就碰破头，跑断腿。很多领导同志对此不心痛，还安慰，说是群众创造免不了失败。

关于违背科学规律、瞎指挥问题，有的同志反映了不经试验，不顾条件，遍地开花，造成严重的浪费的现象。锅炉搞超声波化，结果锅炉千疮百孔，漏煤、漏气、漏风，影响锅炉安全运行。也有同志指出，很多地方搞柴油掺水，结果损坏机器严重。

关于浮夸风问题，有同志说，主导思想是：量多就能出成果。展览会上的加速器、计算机，都不能运转，就戴上国际水平的帽子，积极性发挥在戴帽子上。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数学组着重讨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数学发展的命运。有同志说，这几年，代数、几何，成了难兄难弟，被认为是无用的。函数论已经成为空白学科了。

关于科学、教育、卫生界的口号和“风”问题，医学组有些同志对近年来医药卫生工作中的一些口号和提法，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其中包括

"创立我国的新医药学派"、"西医不学中医，只等于半个医"、"批判西医观点"、"有病就有医"、"在两三年内找出对十大疾病有效的药物"、"慢病快治"等。

关于学术问题政治化问题，在红松更新问题上，过去的争论很多，但在整风反右之后，就停止了。因为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带岭森林工业局党委书记对这场争论作了政治结论，说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研究森林生物学规律的人说成是自然主义学派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并在《红旗》杂志和黑龙江林业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的文章。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讲话了。

关于教育革命的问题，有同志说，1960 年暑期，杭州大学大搞教改，搞得很凶。讨论、批判、大字报等，把原来教学的一套从头到尾全批判光了……搞了一个月，教改停止了，又恢复了原来的状况。有的同志反映，因为出了个稍需动脑筋的题目后，就被扣个"帝国主义课程"的帽子，并戴了好几年，后来干脆不教这门课了。

关于保密制度问题，许多小组都提了意见。因为宁紧毋松、层层加码、自我封锁，导致许多资料一到保密室后，就失掉了流通的机会。甚至有的教师自己写了文章，学校说涉及保密，交到保密室。以后自己再要参考都传不出来。

关于时间问题，有的同志说，以往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学习安排得不好。例如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要我们学习 100 小时，学完了还要再学，我就不赞成，不如下去看看。以往甚至还搞读报，难道我们自己不会读？这种方式很浪费时间，我们年纪大了，再没有多少时间，应该赶快工作，不要浪费时间。

代表们除了对以上个别突出问题予以反映，还对大跃进进行了总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家们对"大跃进"运动极其不满。"大跃进"期间科技领域所推行的"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土洋结合"等措施也几乎都被否定。会议代表们通过揭示原有科研路线所导致的大量问题，对大跃进时的科研路线进行了一次总的清算。而在最后总结时，聂荣臻也基本认同这种清算——他承认了错误，对原定路线作了新的解释，并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抛弃许多具体的错误做法。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早在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就深刻地论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并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



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内和社会上，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剥削阶级的范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对知识分子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简单粗暴态度。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党在着手纠正“左”的错误时，也提出了纠正反右派斗争以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科学政策等方面的“左”的错误问题。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反应某大学的党支部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后，写信给陆定一，“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1961年开始，中共中央陆续制定了一些条例来纠正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偏向，并规定了具体措施。但并未摘去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聂荣臻到广州后发现，大家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顾虑仍然很大。经过同少数科学家谈心后他了解到，是“资产阶级”这顶帽子使他们感到十分压抑。

在他们看来，“大跃进”运动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行政干部不让科学家说话，或者不听他们的话，不顾科学规律去鼓动群众盲干。

在他们看来，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应该有专家的位置。有同志认为，一些复杂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需要有分工和协作。这样就需要对研究任务进行分析，找出科学问题。然后再按问题的性质交给单位考虑。为了能作好这个工作，设立一个科学顾问团很重要。这可以设在科委。

有同志说，科学顾问团，是国家科委一级的，这还不够，应当有更高级的。他认为，可以组织一个聂副总理私人咨询的科学顾问团。人数不要多，包括各学科的权威专家。在对重大的科学改革，部署作出决定之前，可以先请顾问团进行研究，提出建议，供采择。

对于行政干部，与会的科学家们和各部门的知识分子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有同志说：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不符合客观要求，这是事实，要加强。第一，党员要有马列主义……第二，学业务。搞行政工作的还要学经济学，同时也要学心理学，让他们不能用粗糙的办法对待人。无论是老干部还是年

轻的，都需要学。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也要由科学技术人员来担任。他们还认为，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应当分开，领导干部不应当干涉具体的科学问题。

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还有人对他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议开始后，声学家马大猷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马大猷的意见被登在会议简报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许多人的共鸣。聂荣臻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因此报告了周恩来。

广州会议召开时，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主持起草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得到聂荣臻反馈回来的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知识分子要求"摘帽"的呼声后，他下决心亲赴广州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2 月 26 日，周恩来和陈毅到达广州，当天，聂荣臻、郭沫若等就向他们汇报了与会代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种种顾虑，强调这个问题严重阻碍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贯彻和知识分子积极性的调动，希望能够在这个会议上予以解决。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周恩来到达广州后看了科学工作会议的全部《简报》，他在几天后的讲话中说："《简报》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从《简报》中还看到大家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不能不使我高兴。"③他希望大家"给点反映"，说"我在 3 月 20 日要在人代会上作报告，有反映才够朋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恩来确实感到摘掉知识分子头上"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为统一思想，3 月 1 日，周恩来约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座谈会决定，在会上增加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由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由于这个问题事先没有经过中央集体讨论，也没有请示过毛泽东，所以周恩来十分谨慎，要大家一个一个表态。大家都表示赞成。他说：那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就讲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通过的，我们大家共同负责。最后他明确地作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结论为他在广州会议讲话的主题最后定了调。

3 月 2 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从理论



和历史两方面论述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

周恩来说，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特殊性。这部分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中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无疑的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曾为旧社会服务过，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因此，“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的大多数结成的特殊形式的阶级联盟。”周恩来说，列宁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劳动阶层”的，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联盟是同劳动者的联盟，这与同非劳动者联盟是不同的。“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十二年来，我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我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要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3 月 6 日，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在全国科学技术会议上作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陈毅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 12 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对我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广大科学家对此欢欣鼓舞、反映强烈，主人翁的责任感大大提高。会议对科学院的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坚持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根本上恢复和继承了 1956 年 1 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对

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产生重要作用。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众多科技界的领导干部和300多名知名科学家在广州所进行的这场反思所带来的实际只是一种较小的调整。但这种调整还是有意义的，它依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达，一度鼓舞了科学家的士气，教育了某些左倾的领导干部，为《科学十四条》的贯彻扫开了障碍，从而为1960年代前半叶中国科学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的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对于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中共中央内部仍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毛泽东对此也没有表态。这也成为后来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等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一种预兆。“文革”时，广州会议被说批判成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重演”④，而会议《简报》则是“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重要工具。这是对广州会议的污蔑。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516页。

②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第27页、第42页。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

④声学所从头越红旗大队，揭开广州会议的黑幕，革命造反，1967-06-21.

参考文献：

①廖心文，《1962年广州会议的前前后后》，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

②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830-831。

③熊卫民，《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

④聂荣臻在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62-03-12。

⑤十二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剧组·采访龚育之谈话记录·1997。

⑥七机部916革命造反兵团等．广州会议的要害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科研批判.1967（2）：5-10.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带领，广大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过程中，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甚至被列入剥削阶级的范围。在 1962 年 3 月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先后发表讲话，为广大的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所谓“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次为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他们思想，使他们心情愉悦，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建国以来，党中央对于知识分子一直很重视，可是在经历“左”倾错误统治时期后，知识分子的属性和定位，一直是重要的问题。同时，知识分子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压迫和束缚，党的一些领导人也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并实施了多项政策，对知识分子加以保护和鼓励。

1951 年 9 月 29 日，周恩来在北京怀仁堂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他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围绕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知识、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详细地论述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思想改造，以及如何进行思想改造。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并且着重阐明“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的政策和措施。报告把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极端重要性，鲜明地、尖锐地向全党全国集中地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 1956 年提出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并断言说：东欧一些国

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因此，中国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

1956 年秋冬，由于社会改革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有些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如粮食、日用品短缺，一些青年人的升学、就业和安置遇到不少困难，因而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特别是对政治敏感、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公开批评，有些意见很尖锐，还有一些错误议论。

在这两个问题上，毛泽东所作的判断是错误的。他认为知识分子“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重新戴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沉重地压抑着知识分子。

在 1957 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这无疑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在毛泽东一系列对于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和判断下，广大知识分子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并且在 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更进一步把知识分子列入剥削阶级的范围，使广大知识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也给党和国家以及他们个人都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泛滥的“左倾”错误，对知识分子集中的科技、教育、文艺、卫生等领域冲击很大。在政治上，搞所谓“拔白旗”，很多教授、专家、学者受到错误批判；在业务上，搞所谓“放卫星”，违反精神产品的客观规律。因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伤害。

1961 年，中共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经济工作中“左”倾 错误，以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调整期间，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也开始纠正“左”的偏向，着手制定相关的工作条列。这



些条例的制订和实施，对纠正高教、科研、文艺等领域中“左”的错误，特别是对纠正自1957年以来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中央认为，这些文件的精神对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适用。批示强调，“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对待知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作风必须纠正，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曾指出：这些条例，“虽然是针对不同方面的工作制定的，但因为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因而许多内容是一致的，解决的问题是共同的”。他把这些共同的问题归纳为三点：第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特别是如何看待“红”与“专”的关系以及坚持“双百”方针问题；第二，明确了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并规定了有关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的秩序，保证根本任务的完成；第三，改善党对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领导。由于上述几个重大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会议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检查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提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此外，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七千人大会为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文化部和中国剧协也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通称广州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并发表了题为《论知识分子》的重要讲话，报告讲了“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四个问题。报告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同知识分子的联盟属于同劳动人民联盟的范围。报告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①]

报告批评了几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再一次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申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宣布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绝不动摇。

报告的具体内容是：

首先，"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于统治地位，知识分子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劳动人民。但是就是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是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背叛了原来出身的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来，为新的阶级说话。所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所有知识分子一概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其次，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来看，有其特殊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为旧社会服务过，受到帝国主义、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极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所以，"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②]

周恩来充分肯定知识分子队伍发生的深刻变化，重申1956年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报告指出：

"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1956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从1956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近两年。"



“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第三，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又培养出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两者构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老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说新老知识分子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

针对几年来党的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简单粗暴、瞎指挥、乱戴帽子成风的现象，周恩来提出6点意见：

“（一）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三）改造靠自觉。”“（四）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五）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六）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③

而且有一些人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周恩来指出，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上下级要有区别，党的支部只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我们讲的外行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要走群众路线。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周恩来认为有6个问题要解决好：“第一，信任他们。”“第二，帮助他们。”“第三，改善关系。过去关系不好的，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第四，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第六，承认错误还要改，只承认错误，不去改正，还是空话。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改正要有行动。”④

周恩来回京后，陈毅于3月5日、6日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

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陈毅首先向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传达周恩来的话说：“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

陈毅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强调说：“不能够经过了十二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共产党不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⑤

周恩来的报告，陈毅的讲话，震撼人心，反响强烈。代表们普遍认为“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聂荣臻回忆录》写道：“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大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说：‘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是脑力劳动者，自己人了，不能再作客人了。”“总而言之，科学家们的主人翁感大大提高。我目睹这一情景，心情也很激动。”

这次会议，是对“左”倾错误的一次勇敢的搏击，使知识分子再一次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思想上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因而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很快便又蒙受了新的更大的磨难。

广州会议的热烈反响，使周恩来决心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到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去，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报告形式进一步把它确定下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⑥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正式恢复了他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出的正确判断。这就表明，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已经不只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共同意见，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同意了的正式意见。

不过，毛泽东对于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不同意的。十中全会前夕，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就知识分子“摘帽”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党中央虽然对于“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但是，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并且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表态，反而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情形是后来党中央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等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由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存在不同意见，在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只是说：“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知识分子是没有“帽子”的“光头”，既没有“劳动人民”之“冕”，也没有戴“资产阶级”之“帽”。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仍然存在“左”和“右”的分歧。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清算“左”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郑重地重申：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此，中国知识分子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注释：

①②③④《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页。

⑤王永钦：《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一搏——周恩来与1962年广州会议》

⑥刘武生：《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六十年代初对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

6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在农业经济调整中，对于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问题，即“包产到户”的认识，共产党人产生严重分歧，并且引起了争论。尽管中央与地方不少干部都表示明确支持，但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包产到户遭到严厉的批判，被说成是“单干风”，“地主、富农利益的思想反映”，“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此后，支持包产到户的意见不被提及，而反对的意见比比皆是。

农业生产责任制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包产到户责任制从产生到最终被认可，也经历了起起落落。

1956年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中共中央注意到合作化迅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为此部署1956年、1957年在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巩固合作社的工作，其中对建立健全农业经营管理制度相当重视。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总结实践经验提出的“三包”责任制，得到了党中央的首肯。中共中央颁布的《农业六十条（草案）》曾明确提出，农业生产实行“三包一奖制”（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要求“建立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

但是，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作了错误的分析，说它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是“农村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的表现”①，从而加以批判。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包产到户被迫中止。

1958年在全面“大跃进”的同时，农村掀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上瞎指挥、“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等“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为此，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4次会议纠正“左”的错误。明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执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②第二次郑州会议又确立了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核算”等方针。随后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原则。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全国许多地方又重新实行了包产到户。

但是，好景不长。在“大跃进”的“左”倾思想继续指导下，尤其是在庐山会议和反“右倾”错误的影响下，“包产到户”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表现被加以批判。

庐山会议后，江苏省委于1959年8月22日发出《关于立即纠正关于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说包产到户“根本上取消了人民公社集体劳动这一基本的劳动形式，退到个体分散劳动的老路”，“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到单干”，“应当立即批判，加以纠正”。并规定“今后一律不提田间管理包到户”。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一通知，并指出：“把全部农活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做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反右倾斗争使“大跃进”和“共产风”再度泛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问题非常严重，各地纷纷寻找解决办法。1960年冬，党中央继续开展被打断了的纠“左”运动，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重申“三包一奖”制度。在整顿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实行生产责任制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包产到户又在各地兴起，其中安徽实行得最早，范围也最大。

“大跃进”期间安徽曾是“五风”严重的省份，灾情严重。1960年8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省委召开的县级以上干部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包产到组的办法，并且将这个办法列入他亲自主持的有关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十条具体政策中，以省人民政府的名义布告全省。1961年2月，在淮北农村驻点的省委常委张柞荫向他反映：1960年宿县有一位70多岁的农民向公社要求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父子俩开荒16亩，收获3 300斤，扣除自用，上交粮食1 800斤、现金60元。曾希圣由此受到启发，2月14日，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产粮食记工分”联产到户的责任制。2月下旬，他派省委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冈山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责任制”试点，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截止到1961年秋末，安徽省已有85%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时称“责任田”。但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安徽省委反复申明

这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单干。他们称之为“包工包产责任制”、“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度”、“田间管理责任田”。

到1962年2月，安徽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0.1%。据估计，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20%③。

3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安徽部分农村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的做法及优缺点，并说明从试点情况看增产是有把握的，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

安徽省委根据“试行的情况”指出，“责任田”的主要好处是：“责任明确，人人争取超产，避免了单纯挣工分，不讲质量，不关心产量的现象，社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并分析“责任田”的性质：它“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土地、耕畜、大农具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它并没有改变产品的分配办法，包产以内的产品统一分配，仍然是按劳取酬；它并没有改变集体的劳动方式，不仅大农活统一做，而且小农活也是为了完成总的包产任务而进行的劳作，所以仍然是集体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分析论证“责任田”不会造成两极分化，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结论是：“责任田”“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只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它能够发挥对组织和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④。

这时，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开始了程度不同，形式不同的包产到户据估计，这期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约占20% 或30%左右。

广西龙胜县的农民群众为解决温饱问题，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基本办法是将全部耕地按人头或劳力或人劳比例，包工包产到户。实行这些办法的生产队占总数42.3%以上，甚至有“半个县都包了”的情况。

贵州省镇宁县布依族聚居的油寨村生产队，在1960年全年人均只有83公斤口粮的情况下，将全部旱地包给农户耕种。1962年又把全部水田包产到户。

据估计，这期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约占20% 或30% 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做法缩小了“公”和“大”的程度，是瓦解人民公社，是方向性的错误。这与集体化道路是相违背的，会引起农村两极分化。

1961年9月6日毛泽东批转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



说：在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并提出“包产到户”“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为此，提醒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这一问题。1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要求各地“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⑤]。当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确立后，包产到户遭到进一步的排斥。

11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10几户的生产队就不要分作业组了，20几户的要分。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有利，能利用全家的辅助劳力。大农活集体干，小农活包到户，但有的地方大小农活都包到户了，这就成了包产到户了[⑥]。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安徽在“大跃进”中刮“五风”严重而受到批判，也把实行责任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进行批判，说他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他被撤了职。3月20日，新省委作出改正责任田的决定，认为责任田“在方向上是错误的，与中央提出的《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要求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

但是，由于“责任田”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广大农民需要的，农民群众不愿意改变，他们把责任田称之为“救命田”。因此，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并由基层一直争论到中央。一些生活在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出于对真实情况的了解，他们对包产到户作了充分的肯定。如江苏的钮惟新、蔡抚民，浙江的杨木水、冯志来、陈新宇都曾经上书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广大农民群众对包产到户的要求，并从理论上对包产到户加以了论证。

中共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他根据自己在基层工作的“切身体验”和实地调查，用颇具说服力的事例和具体数据来论证责任田的优越性，申明“责任田”的优越性，呼吁推广“责任田”。钱让能驳斥了批评“责任田”就是搞单干、限制农村开展较大型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导致两极分化、影响工业生产等种种论调，并指出太湖县农民群众有80%—90%拥护责任田。

1962年于4月，安徽省宿县符离区党委书记给邓子恢写信，反映群众拥护“责任田”的实际情况，这封信受到邓子恢的高度重视，他从中央农村工作部派出工作组到安徽做调查。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应当让农民去搞。6月中旬到7月中旬，他派到安徽调查的工作组陆续发给他一批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对责任田给予肯定，认为责任田是“在集体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上找出了一条出路”，群众非常拥护，说：“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7月2日，宿县符离区党委给邓子恢并中共中央《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七条理由、十个变化，说明“责任田”方向正确、确实好。来自基层的调查材料和情况反映，使邓子恢坚信责任田的办法是正确的。

邓子恢把调查材料和安徽来信呈送给了毛泽东。在给军委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高级党校等单位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时，邓子恢明确表示赞成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办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了”，并特别指出：“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作为田间管理包到户，超产奖励这是允许的。”⑦

田家英于1962年3、4月份率调查组到湖南韶山、炭子冲等地调查，在了解到实际情况后，认为包产到户是农民群众的真正呼声，因此对包产到户表示赞成。在将这些情况报告给陈云和邓小平之后，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陈云认为，“责任田”办法，是恢复农业必须采取的办法。

邓小平7月7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与会者时讲话，谈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他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⑧

刘少奇等人认为国民经济正处于“非常时期”，应该突破原来的政策。看到包产到户对恢复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后，他与邓小平等人对正在地方上广泛出现的包产到户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并酝酿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⑨。

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全国各地出现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与其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全国农村可以60%的搞包产到户，40%的仍搞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毛泽东未予理睬⑩。



6月上旬，陶铸、王任重曾在广西龙胜县调查，召集座谈会，讨论如何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座谈会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指出，集体经济基本标准有四条，即：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统一计划安排；集体劳动；生产收入统一分配。特别提出：集体劳动是指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合理分工，“而不是说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块，集体去干”。座谈会强调，对确实单干的，要说服教育农民放弃单干道路，土地和生产资料私分了的，政府不予承认，并严禁买卖。座谈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同时又强调：“如果不搞好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集体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只有在生产和生活上赛过单干户，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同时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高度，集体经济才有可能最后巩固。”[11]

毛泽东判断，单干风已经产生，而且越到上层风就越大。从7月中旬开始，毛泽东开始采取各种方法对“包产到户”和“单干倾向”进行批判。

毛泽东虽然也认为要搞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而且赞成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的管理办法，但是，他赞成的是“包工”，却不赞成“包产”。他把“包产到户”看作“分田到户”，看作“单干”，更把它与资本主义挂起钩来。

毛泽东把“闹单干”看作农村阶级斗争的反映。他认为，国内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毛泽东说：“富裕农民讲加入合作社是祖业被共产了，他想他的过去。”因此，“分田到户，首先拥护的是富裕中农”。他还认为，“单干”就是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

此外，毛泽东认为“单干”会导致阶级分化。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付酬，平均不能太多。但是，按劳分配搞多了也不好，搞多了四属五保、困难户就有困难，劳动力多的分得过多，也会发生两极分化[12]。

毛泽东认为邓子恢、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就是鼓吹单干，对此十分反感。他把邓子恢视为“单干风”的主要鼓吹者，严厉批评邓子恢动摇了，批评他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

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反对，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不得不转变原来的态度。7月18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问题，批评包产到户，批评从高级干

部到基层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邓小平也收回了他 7 月的讲话。陈云也表示拥护中央作出的关于巩固集体经济的新决定。

7 月下旬到 8 月下旬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随之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更把批判“单干风”作为主要议题之一，集中批判“单干风”，重点批判邓子恢，连带批评了田家英。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会议的基调是批评包产到户。自 8 月 5 日起，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一系列严厉批评包产到户的讲话。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据此，毛泽东把是否同意搞包产到户提升到是搞分田单干，还是集体化；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个政治高度上来。

在 8 月 26 日至 9 月 23 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 9 月 24 日至 27 日的正式会议上，形成了对“单干风”（即“包产到户”）批判的一边倒形势，并对邓子恢横加批判。指责邓子恢是代表富裕农民阶层搞资本主义农业的要求，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还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被撤职，后被调往国家计委任副主任。实践证明，对邓子恢的批判和指责是错误的。1981 年 3 月，中共中央为邓子恢平了反。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单干风”的同时，正式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重申：“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可能性。”比起“单干”，“还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大”，“还是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⑬。会后，中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纠正“单干风”。

在“单干风”被大兴批判之后，各地也相继作出了一系列纠正包产到户或所谓的单干的决定。从此，“包产到户”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代名词，成为不可逾越的政治禁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包产到户这种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三起三落、屡试屡效、屡禁不止的办法，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突破口，成为了中国农村一种普遍经营形式。

注释：

①人民日报评论员：《揭穿包产到户真面目》，人民日报，1957-10-17.

②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③⑨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084～1085 页、第 1098 页、第 1148 页，第 1084 页、第 1085～1086 页。

④《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1961 年 7 月 24 日。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版，第 529 页。

⑥⑫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 3 月版，第 556 页、第 558 页，第 571 页、第 577 页。

⑦邓子恢：《在高级党校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1962 年 7 月 11 日。

⑧《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323～324 页。

⑪《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问题——在广西龙胜县举行的座谈会记录》，《中南通讯》1962 年第 5 期。

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4 册，第 136 页。

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千多人，这次会议又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清理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好转，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有着深刻的国内背景，

在经济方面，1958年—1960年连续三年的“大跃进”，是毛泽东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打开新局面的一次探索，但实践证明，这次探索是不成功的，它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打乱了国民经济的秩序，不仅没有实现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致使国民经济在1959年—1961年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与“大跃进”同时兴起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的“大跃进”，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超越阶段的设想。当时将人民公社的特点概括为：“一曰大，二曰公。”具体来看，表现为：其一，规模大。在初期的人民公社，大多都是几乡一社，平均规模为4797户。2万户以上的特大社，全国就有51个。公社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社员集体劳动，集体吃饭。其二，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把原来的几十个贫富不同、条件各异的合作社合到一起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为了保证公有化程度，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收归集体所有，家庭副业、小商小贩以及集市贸易等也都被取消。

这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被大大地降低了，助长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慢慢滋长起来，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次，农业生产遭到



了极大地破坏。继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这也助长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从1960年夏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于是号召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年，同时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指导方针，从此，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大调整。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调整工作成效不大，经济形势仍然严重。

在政治方面，1957年整风运动，由于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估计严重脱离了实际，变成了一场反右派斗争，后来又被严重扩大化。这次反右派斗争，错划了许多“右派分子”，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其间，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初步纠正了党的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但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纠“左”变成了反“右”,。这场反右倾斗争将阶级斗争引入党内，并且中断了纠“左”的过程，在全党和全国又一次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使大跃进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以纠正“左”的错误，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制定各行各业的工作条例，稳定形势，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从整个经济形势来看，由于“八字方针”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因而我国的经济仍未能摆脱困境。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有些人的急躁情绪又滋长起来；另有一些人对上级领导的主观主义、瞎指挥，产生了埋怨情绪，要求领导发扬民主，要提意见，说心里话。广大的基层干部和党员则对当时的困难形势十分担忧，迫切希望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团结，尽快扭转被动局面。

在此前后，中苏两党也在发展社会主义模式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开始了论战，在世界范围的反共浪潮和中苏论战等一系列国际压力与国内经济、政治困难的背景下，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打通思想的大会的建议。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

报。毛泽东认为这个建议很有道理。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因此毛泽东提出，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泽东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 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就定下来了。

在起草会议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很大，尤其是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他们认为“七十条”消减了他们的权力，因此有抵触情绪，这对贯彻“七十条”很不利。据此，邓力群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这个建议在先后得到杨尚昆、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的同意后，最终被通过。

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中央办公厅专门成立了大会筹备处。大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下，由陈伯达主稿，于 1962 年 1 月初完成的。大会的具体安排工作，由杨尚昆负责。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工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 7 000 多人。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和法制，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周恩来、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林彪也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62 年 1 月 11 日到 29 日，主要是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第一稿）。这个“书面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直接发给到会同志进行讨论和提意见，然后集中大家的意见写出第二稿。

1 月 27 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并讲了话。书面报告初步总结了 1958 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全国的经济形势，工农业减产的原因，成绩与错误的关系，中央与地方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对



“三面红旗”的态度等等一些大会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条是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的地方，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刘少奇在讲话中号召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重视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报告和讲话强调指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最关紧要的一年，全党必须踏踏实实、干劲十足地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2月28日上午，大会分组讨论刘少奇的两个报告（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

第二阶段，从29日到2月7日会议闭幕。主要是发扬民主，“开出气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代表们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认真地严肃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联系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阐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承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100年时间。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深入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具有极大作用。

2月6日，邓小平就党的工作问题讲了话。他是此次七千人大会的倡议者之一，关于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他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即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同时，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也承担了责任。

在这次大会上，为了使大家增强信心，邓小平一上场就讲，中国共产党有五好：“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第二，有好的党中央。……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

风。……第五，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

紧接着，邓小平就指出，最近几年我党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这三方面的优良传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他还说，现在必须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坚持发扬下去，这就需要注意四个问题：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二是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三是培养和选择干部的问题，四是学习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平实具体，对症下药，简洁直接。

2 月 7 日下午，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他主要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过去几年的工作和“三面红旗”的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说：“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周恩来讲话的第二方面是为中央分担责任，代表国务院包括他本人作自我批评。他首先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同时，周恩来通过具体的事例，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第三个方面是讲经济形势的主要困难和克服困难的主要办法。周恩来指出，由于三年严重灾害的影响和许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困难，还不能一下子就完全克服，工农业生产在某些方面遭到了部分的甚至是严重的破坏，经济情况的好转还刚刚开始，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回升，还需要一定时间。周恩来接着又指出了八项解决困难的办法：

第一，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第二，争取农业增产，主要是粮、棉、油。第三，努力增加工业生产，首先是增加能够供应市场的工业品的生产，同时，保证完成煤、木、矿、运的任务。第四，缩短基本建设计划，坚决‘下马’。第五，要统一、全面、彻底、合理地进行清仓核算。第六，大家一起走‘前门’，反对走‘后门’，搞好市场供应，争取财政收支平衡。第七，坚决还账，努力承担国际义务。第八，建立新秩序，树立新风气。”[①]最后，毛泽东宣布散会，七千人大会至此结束。

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们对会议报告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刘少奇又代表中央对会议报告进行了解释和阐发，不仅对当前的困难透了底，而且使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统一了思想，一致认清了当前经济形势。会后，由刘少奇主持对“书面报告”作了修改补充，完成了第三稿，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到省（后又收回）。

被确定后的第三稿包括三个部分：



一、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在这一部分里，报告首先指出，由于工作经验尚且不够，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原因，致使全党这几年来工作中存在的4条缺点和错误：1. 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2.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了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3. 不适当的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4. 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其次，报告肯定了1958年以来，工业、农业、科技队伍、科学研究、学校、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财政、金融、国防等方面的12条成绩。

再次，报告总结了16条基本经验教训：1.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相互制约的。2. 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国的一个根本方针。3.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不能混淆。4.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同时，又是分级管理的。各级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的制度和计划实行管理。否则就会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受到损害，全民所有制受到损害。5. 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尽可能的、适当的发展国防工业。6. 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不能要求过多过急。7. 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结合起来。8. 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9. 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10. 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11. 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12.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13. 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14. 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15. 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16.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把总路线同各项具体政策结合起来。

此外，报告还向全党提出了 1962 年的 10 项工作任务：1. 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2. 积极地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保证实现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指标，并力争超过。3. 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4. 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绝对不允许再有国家统一计划以外的建设项目。5. 坚决压缩或者停止原料、材料消耗多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的生产。6. 认真作好商业工作。7. 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8. 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9. 彻底清理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10. 认真地贯彻执行或试行中央制定的关于农业、工业、手工业、商业、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条例或者规定，整顿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报告指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进一步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反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反对分散主义的倾向"。报告还指出，我们要努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党的问题。报告向全党提出了要树立实事求是作风，坚持群众路线，处理好上下级关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号召，并且提出了 8 项要求：1. 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奋发图强；2. 加强全局观点，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3. 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4. 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老实；5.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6.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7. 健全党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8. 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我们的党，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和宏伟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八大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他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是一个突出的典范。经历了庐山会议及“反右倾”斗争，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及用说假话来趋利避害的风气滋生并盛行起来，这同经济困难的现状一起成为党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在七千人大会上，主要领导人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并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这种对缺点错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这种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使得以往“话到口边留半句”和“守口如瓶”的党内气氛被活跃、解放的氛围代替，广大党员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在这次和大会上，存在着几点明显的分歧。

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上。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到，“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的地方，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众所周知，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讲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实际上，会议上有些人的看法很能代表毛泽东的意见。他们认为形势已根本好转，“58 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柯庆施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提出了一连串的不满，质问：“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他对报告的评价是：“越看越没劲”。

分歧还出现在对经济困难原因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认识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刘少奇进一步评价近几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得失，他说：“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

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②]刘少奇深刻地指出：“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决定问题时，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进行工作时，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他们听了一些假典型、假“卫星”，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他指出：有的人“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③]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指出：中央和地方在最近几年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重视客观条件叫做“唯条件论”、“左”比右好等不正确的口号和提法，他号召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注重调查研究。

分歧还在于对于错误责任的分析上。彭真在 1 月 18 日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

很快，彭真的发言在会上遭到了攻击。1 月 19 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先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面对会上的批评，林彪却大唱反调，29 日上午，林彪在会上讲话，他坚决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夸大自然灾害的程度，接着又过分强调经验不足，用“付学费”的说法推卸责任，同时他又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④]

面对大家的批评，毛泽东本人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深刻认识。

同时，大会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首先，虽然会上总结了近年来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对于几年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却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大前提下进行的，1958 年以来“左”的指导思想未能得到根本触动；其次，在党内民主集中制上，只着重解决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存在的问题，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点错误却没有得到检查改正。这些都是导致党在以后的建设中继续犯错的隐患。

注释：

①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19页。

②③刘少奇：《刘少奇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④《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3月1日第1版，第211页。

“西楼会议”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领导于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简称西楼会议。刘少奇主持了会议，毛泽东未在京没有参加。会议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预算存在大量赤字的严重情况。西楼会议是继七千人大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充分估计了困难的严重性，抓住了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进一步统一了党内的认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中央便开始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调整各项工作。这一工作刚一开始，就发现了财政方面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财政部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发现财政收支不平衡，当年的预算还有很大赤字。由于每月的货币回笼量不足以满足每月的必需支出，只有继续增加对市场的货币投放量。1961年12月底，全国货币流通量达125.3亿元，而1962年1月底增加到了135.9亿元，2月8日更是达到了137亿元。也就是说，1962年1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投放的货币就达12亿元之多。货币投放量的增多意味着市场物价上涨的趋势仍在发展。这表明经济形势的困难程度要比七千人大会估计的要严重很多。这就证明，原来对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的问题估计严重不足，同时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实际上困难时期并没有像七千人大会所说的那样“已经过去”。刘少奇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的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2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常委外，还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的主要成员。

会议分析了经济形势，进一步研究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检



查了财贸办公室提出的《关于1961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执行情况以及1962年预算和信贷的安排的报告》，发现1958到1961年各年的财政都有赤字。实际上是挖了商业库存，涨了市场物价，多发了票子弥补财政赤字，动用了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欠了债，工业、交通设备失修，农具和农民的生产工具失修，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刘少奇对财贸办公室没有及时报告赤字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要求重新提出报告。

会议指出，当时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十分严重，我国经济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会议指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大力发展农业和日用品的生产，首先解决吃、穿、用的问题，稳定市场，制止通货膨胀，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基本建设，在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以外，其他一律停止，并以农业为基础，迅速调整1962年的年度计划。

针对这个问题，刘少奇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暴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①]

会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大家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在23日的会议上，陈云应刘少奇的要求，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发言，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陈云谈到了当前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是在高级干部中对形势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认为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而要把各种不同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这样更有利于使我们的认识趋于统一。

陈云的报告中也着重分析了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情况。他指出，在农业上，近几年都有很大减产，现在粮食已经掉到了1957年前的水平，而且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还不如过去，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要恢复到1957年水平，没有六年也得五年。

当时对于农业困难大小的估计，党内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过高地估计

了《农业六十条》实施后农村形势的变化，说现在有的农村农民吃得很好，鸡鸭成群，等等。陈云在讲话中说，有这样的乡村，但只是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农业恢复的速度问题，陈云在分析了恢复农业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后指出："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

在基本建设上，建设规模同国家财力、物力和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陈云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业建设的所谓大发展，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粮食7 000亿斤、棉花7 000万担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认为粮食已经过关，可以大办工业，于是大量招收职工。陈云指出："摊子铺得大了，工人招得多了。这样就造成了建设规模同实际的工业基础不相适应的情况。"

在金融、市场上，因为多发了钞票，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特别是工业品不足，城市里的钞票大量流向农村。现在不少农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只有国家手里掌握很多物资，能够保证城市供应的时候，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才能停止。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因此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

在人民生活上，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强调，在这几点问题中，农业减产和通货膨胀问题是最基本的。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如不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将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也将影响社会的安定。

陈云提到了在克服困难过程中，我们是拥有一些有利条件的。党已制定了各项工作条例和具体政策，如：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执行后，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进一步巩固。中央关于调整工业的工业企业"七十条"，也已经开始实行并收到效果。同时干部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各项工作会有显著进步；粮食和肉类的产量开始回升，至于经济作物的产量是否能很快恢复以至有所发展，现在还难于肯定，因为粮食不够吃，农民还不愿意多种经济作物；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比以前大了；人民同党合作战胜困难的信心足，只要我们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没有疑问，人民会同我们合作。当然，不是说一点小乱子都不会出。但是，总的说来，人民是会同我们党一起去战胜困难的。……做错了



事，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干部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

总起来说，我们有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但是，陈云也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他建议在中央财经各部委部长一级和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中，对这些问题存在的不同看法，应该彼此进行交换，听听不同的意见，这对暴露缺点、改进工作，很有好处。

陈云还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其中包括6点意见：1. 从1960年算起，“把十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前一阶段大约需要5年，恢复的主要办法有两条：一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二是要稳扎稳打。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要先降下来，速度放慢，以调整为主。

2. 减少城镇人口，“精兵简政”。既减轻了农村的负担又充实了生产第一线。陈云指出：“要精简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都要作适当的安排。如纺织工人，大多是城里人，现在很多纺织厂不能开工，也只能多做思想工作，把道理向工人说清楚。减人这件事是很困难的，要他们来容易，要他们走就很困难。但是，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使我们更加被动。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困难，两个困难比较起来，我看还是早减为好。”

陈云认为，家在农村的人，动员他们回乡有困难。但是总比从农村征购粮食拿到城市里来供给他们要容易得多。去年压缩城市人口1 000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40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民多征购40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10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3. 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陈云提出了4种办法：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回笼货币；三是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重点放在农村；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4. 尽一切力量保证城市人民的生活，增加日用品的供应。陈云指出，目前我们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有3项：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

5. 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陈云认为这一条是根本大计。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除增产粮食外，保证经济作物增产；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三是拨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小农具。

6. 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七百五十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陈云还指出，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

关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这一提法，在此之前，陈云曾到中南各省进行调查。在河南，他同省委负责人算了几笔账：根据现有的材料，一年全省生产多少粮食，扣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种子粮，还有多少余粮？这是一笔账。另一笔账，全省的城市人口有多少？按照当时的供应标准一年要吃多少粮？这些城市人口一年所需要的粮食，同农民所能供应的余粮相比，余粮到底够不够。算账的结果，差得很远。为了满足城市人口需要的粮食，必须把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挤出来，不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城里的人口就要缺粮。农村的农民饿肚子，城市的人口患浮肿病，就是这样造成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减少城市人口，让一部分城市人口回乡务农。

与会同志认为陈云的报告，把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找到了，信心增加了。刘少奇还在会上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化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还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



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②

刘少奇赞同陈云的讲话，并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充分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

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

第一，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③并制定了减少城镇人口、制止通货膨胀、全力保证农业增产等一系列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

第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会上许多领导提出，要摆脱经济困难就必须全面实行包产到户，这样国民经济可在4、5年后恢复，否则中国经济恢复可能需要8到10年。陈云同志将大家的意见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表示坚决否定。他认为这样会导致两极分化，并认为他们对形势估计过于悲观。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马上就可恢复。

1962年3月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并讲了七个方面的问题。讲话中，陈云重申了将十年规划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的意见，并且强调，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他还说，1962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实质上是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并且要坚决搞综合平衡，只有按短线的平衡才是真正的平衡，才能扭转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才能使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讲话中，陈云还针对城市主、副食品供应都不足，人民体质下降的问题，建议多拨出一点钢材，制造一点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工具，如果一年增产15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6 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并且说：陈云同志以前提出的每人每天供应一两豆子的办法很好。但人的营养光有植物蛋白不行，还要有动物蛋白。和尚尼姑，每天打坐，有植物蛋白也许就行了。我们这些人不行，劳动量比我们大的人更不行，有了植物蛋白，还需要有点动物蛋白。

陈云还提出要对1962年的年度计划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④]

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去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组员，统一管理经济工作。

西楼会议决定的一系列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62、1963年，经济逐渐全面恢复；1964年，经济发展开始超额；1965、1966年，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康恩同志讲：经过这五年调整以后的年份，是建国以后最好的时期。宋平同志也讲：经过调整得到发展，为后来“文革”能够渡过困难打下了可靠基础。这个时期，工业增长，农业发展，大庆石油，两弹一氢，这些重大突破，都展示了西楼会议议定的方针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西楼会议是全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事求是地估计了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确定了实行经济调整的原则和具体设想。西楼会议可以说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1958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有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严重困难。通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工作，党内不仅在思想认识上取得了一致，并且找到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明确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方向和具体办法，使“八字方针”得到了全面的贯彻，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果说七千人大会对农村问题搞得比较清楚，城市问题则是“西楼会议”后才搞清楚的，更重要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前我党的领导考虑问题，是从一个个方面入手，而“西楼会议”后，则认识到仅有条例还不够，还要考虑综合平衡这一问题。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4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 549 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 年 3 月 18 日

⑤《陈云文选》第三卷，第 210 页。

参考文献：

［1］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年版。

领导国民经济实现好转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的错误以及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遭遇了严重的困难。从 1960 年冬起，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包括对经济政策调整、政治政策调整、思想政策调整、文化政策调整，还有干部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等。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已经得到基本扭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1960 年 7、8 月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 5 年不变。而且提出，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会议在保证钢铁、煤炭、运输生产的同时，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而且决定不再搞两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随着“五风”问题的严重化，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于 11 月 3 日发向全党全国。《紧急指示信》提出必须坚决彻底地纠正“共产风”，重申了以下原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量做到 90% 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安排好伙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保证社员每天睡足 8 小时；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把农村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搞深搞透。

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以及为准备这次会议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要大搞调查研究，1961 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产生和确认，标志着党和国家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由原来的全面“大跃进”开始转变为实事求是的调整。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农业领域首先迈出了调整的步伐。

1961 年 3 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农村存在的具体问题，讨论并制定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但是，《农业六十条》草案仍然规定对社员的分配实行供给与工资相结合的方式，供给部分三成，工资部分七成；条例还要求除特殊情况外，都还要办常年的或农忙的公共食堂，“社员的口粮，可以分配到食堂，指标到户，节约归己；也可以分配到户”。这些规定，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和“保护共产主义因素”的思想。

广州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都下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调查，领导们了解到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大多数人民公社的社员都对公共食堂不满意。他们说食堂没有优越性，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并且，群众还反映出食堂的“五不好”。

邓小平、彭真在对北京市的顺义、怀柔进行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同时还指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通主张取消。

通过将条例草案下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进行的广泛讨论，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的深入调查研究，原草案的一些缺点得到改正。如公共食堂问题，原来规定要“积极办好”，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办法也改为“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原草案中关于分配方式三七开的规定被取消，代之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修正草案再次下发进行讨论和试行。其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普遍划小了。据 1961 年 8 月统计，全国公社数目由原来的 25 204 个增加到 55 682 个，生产大队则由原来的 483 814 个增加到 708 912 个，生产队由原来的 2 988 168 个增加到 4 549 474 个。

在继续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又发现：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个严重矛盾仍然束缚群众的生产积

极性。最后修订的《农业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这个条例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一些根本矛盾，但是，由于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遏制“共产风”再起方面，一直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农业领域进行调整的同时，工业领域也开始了大范围的调整工作。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以后，工业起初进行的成效不大。讲过半年执行的结果，钢和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产量水平大幅度地跌落下来。

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努力查清几年来粮食实际产量的底数：1958年不是庐山会议“核实”的5 000亿斤，而是4 000亿斤；1959年不是公布的5 100亿斤，而是3 400亿斤；1960年不是估计的3 700亿斤，而是2 870亿斤；1961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了160亿斤。农业情况见了底，工业问题困难的症结也就完全暴露出来，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1961年计划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

1961年8、9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开始了对国民经济计划实行调整后退的阶段。

《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在1958年、1959年两年大跃进以后，在1960年春就应及时地进行调整，主动地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了1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也不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1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使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3年内切实见效。”会后，经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1961年计划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降为87亿元，钢由1 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食由4 100亿斤降为2 700亿斤。当年年底计划执行的结果，与这些指标大体相符，



粮食达到2 950亿斤，比1960年略有回升。

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指导原则，9月中央发布试行。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从而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条例还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和职责，作了详细规定。由于这个条例的实行，国营企业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对于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中央还继续狠抓减少职工和城市人口，缩短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严格控制货币投放、财政开支和社会集团购买力，对某些商品实行高价销售，清仓查库挖掘物资潜力，改进城乡商品分配方法，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改变商业体制等方面的工作。这些措施也都收到了积极成效，整个金融形势、财政形势和物资供应形势明显改观。

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以相继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西楼会议在七千人大会的基础上，进一步纠正经济领域的错误，指出我国在经济上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1962年3月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陈云在会议上指出，当前任务主要是恢复，并且要坚决搞综合平衡。

在金融货币方面。通过实施陈云提出的措施，多发的货币全部收了回来。

这个时期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是2 000多万人城市人口下乡。这个问题也是陈云同志多次提的。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会议指出：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二是工业要

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为了满足城市人口需要的粮食，势必要把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挤出来，不挤农民的口粮、饲料粮，城市的人口就要缺粮。农村的农民饿肚子，城市的人患浮肿病，就是这样造成的。这就不能不造成城乡人民的尖锐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减少城市人口，让一部分城市人口回乡务农。这件事关系全局。

大跃进期间，我国职工人数大幅度上升。1960 年 8 月达到最高峰，为 5 100 万人，比 1957 年增加了 2 649 万人。与此同时，城镇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得 1960 年吃商品粮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1957 年的 15% 左右变为 20% 。为了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必须增加对农民的征购粮数量。在 1959 年、1960 年连续减产的情况下，这就严重缩小了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实际上，1959 年中央就曾经决定精简职工 600 万至 800 万人，到 8 月底，已经压缩掉 507 万人。但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形势下，城市职工人数又有回升，到年底，共新增加了 536 万人，全国职工总数达 4561 万人，比 1958 年底还要多出 29 万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 5 月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 1961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时，对大幅度经济调整作了几项主要的果断决策。根据 1961 年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的情况，会议决定进一步大力精简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

会议讨论后决定改为：在 1962 年和 1963 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 2 000 万，精简职工 1 000 万以上。

在向群众解释时，党政领导要负责向群众作自我批评，说我们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有很多缺点，因此把你们招来多了。现在只好请你们回去。要向他们请求，要求他们，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以便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能够统一起来，然后就能统一行动。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5 月 28 日，又发出了《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要求把全国职工人数从 1961 年末的 4 170 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 1 056 万人至 1 072 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在 1961 年末 1.2 亿人的基础上，再



减少2 000万人；同时相应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在1962年、1963年内基本完成，1964年上半年扫尾；精简职工任务力争在1962年内或1963年上半年大部分完成，1963年下半年全部完成。

经过努力，到1962年9月，当年全国共减少职工940多万人，城镇人口由上半年的12 707万人减为11 659万人，净减1 048万人。

在从1961年1月开始的两年半中，全国职工精简与录用相抵共减少了1 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 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 800万人。这一工作的胜利完成，正如中央精简小组在《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胜利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不断地统一认识，在非常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961—1962年的调整初见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主要表现为：

首先，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250亿斤，结束了三年递降减产的状况，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县农业生产已恢复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

其次，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再次，是年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亿元，终止了连续四年的赤字财政；市场商品供应有所改善，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约35%。

此外，城乡人民生活略有回升，与上年相比，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棉布增加2.5尺，但仍低于1957年的水平。

与经济调整相配合，1961年和1962年，中共中央在政治、思想和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也作了一些调整。先后下发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中学五十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小学四十条》)、《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

案)》(即《文艺八条》)。这些《意见》和《条例》的贯彻执行，使各个领域，包括其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得到恢复。

党中央采取的这些方针和政策，对于恢复和发展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1962年的经济出现了些许好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由于新中国本身建立在一个底子很薄的环境里，而且党和政府毫无经验可循，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一些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的发现错误，并且勇于承认错误，找寻方法改正错误，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毛泽东“左”的思想一直都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左”的错误终于再度发展起来，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

在1958至1962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3年搞的“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得计划结束后的两年被迫进行了调整。党中央不得不中止5年计划的连续制订，用1963至1965年的3年的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经过几年艰难困苦的调整后，终于使国民经济恢复并在许多方面超出“大跃进”发动以前的1957年的水平。

党中央在贯彻落实“调整、发展、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后，1963年初，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好转局面。这时，一种急躁的想法又开始滋生，认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又可以转向加快发展了。1963年第一季度，越冬农作物长势良好，按季度计划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9成以上超额完成任务，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提高30%，财政结余增至10.4亿元。从中央到地方，部分人乐观的情绪更加抬头。

在1962年8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的同志批评说，农业恢复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指出，今后5年不只是恢复，一定要有所发展。

各地将1963年当作“三五”计划的头一年，纷纷喊出打好第一仗，夺取开门红的口号，有的地方又制订了过高的指标。在怎样看待经济形势以及是否还要进行大跃进等问题上，党中央出现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调整的任务已经完成，“八字方针”可以不再提了；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还存在不少遗留问题，“八字方针”必须进一步贯彻。

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他强调：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每个行业都要从本行业的实际出发，把本行业的重点确定下来。

8月6日，薄一波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指出，1963年、1964年、1965年仍然是作为调整的年代。我们原来打算，今年是

第3个5年计划开始。现在不搞了。1963年、1964年、1965年调整三年，1966年开始第三3个5年计划。假如1963年到1965年是调整，加上1961、1962两年，实际上就是5年调整。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把基础打得更扎实，把各方面的关系调整得更好，把第3个5年计划搞得更好，不要仓仓促促。"[①]

9月6日—27日，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正式确定了从1963年起，再用3年继续进行调整的方针。会议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要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会议对今后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工作作了全面部署：一、关于继续调整的总方针——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必须继续贯彻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二、关于继续调整的主要任务——1. 农业生产达到1957年的水平。2. 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主要是工业的各部门，要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3. 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争取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基本协调。4.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济管理工作走上正轨。三、关于继续调整的基本原则——1. 大力加强生产建设中的薄弱环节、薄弱部门，主要是加强基础工业产品的生产，改善职工生活；2. 要在进一步调整的同时，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使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提高；3. 进行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

后三年调整的任务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兼顾国防第三。""在三年之内，调整就是这样摆法。"[②]

中央作出3年继续调整的这一政策，是由几点原因促成的。

其一，1963年北方部遭遇大涝，南方部分地区则出现旱情。由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的破坏，农业生产要恢复到1957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还需要两三年。

其二，工业方面也存在着产品质量差，产品积压，生产效率不高，企业效益低等普遍问题，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需要有较大改进。中央认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不够，必须进一步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同时，工业内部存在的结构不平衡的现象也需要予以调整。总之，工业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整顿，加强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搞好设备的更新和成龙配套，搞好专业化协作。

其三，在财政、债务上，自1950年以来，我国历年向苏联所借外债和



应付利息，将按协定在 1965 年年底以前全部还完。经济发展在缺少投入资金的情况下，资金缺口只能在调整期间通过内部挖潜，互相调剂来解决。

中央领导人推迟“三五”计划，决定继续实行 3 年进行调整的政策，更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更长期的目标和利益。周恩来在 9 月 19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做了说明，他说，毛主席提出，1963 年、1964 年、1965 年作为过渡阶段，继续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我们以后 15 年规划的大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这是主要的方面。12 月 2 日，他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把 1963 年到 1965 年的 3 年计划，叫做过渡计划，意思是指，从第 1 个 5 年计划主要学习苏联，第 2 个 5 年计划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摸索把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过渡到以后 15 年的 3 个 5 年计划，求得在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因为有这样一个目的，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全面安排，创造条件，全面跃进，就必须有这 3 年的过渡。”[③]

在三年继续调整的进程中，根据中央的四条指导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调整的方针实际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除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外，经济工作主要地转到“巩固、充实、提高”上来。

在农业方面，前两年城镇的精简下放使农业生产在人力上得到充实，后三年国家又在资金、物资上加强了对农业的投入。1963 年 10 月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的资金，当年计划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为 62 亿元，比上年增加 18 亿元左右。1963—1965 年对农业的投资总数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 17.6%，为建国以来百分比最高的时期。工业也加大了支援农业的力度，如 1963 年供应农业化肥 540 万吨，比上年增加 219 万吨，此外，排灌机械、农用汽车、拖拉机等也有较大增加。在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放在第一位，力保粮食增产的同时，要求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使这些作物，特别是棉花有较多的增产。为此，国务院先后召开了棉花、烤烟、糖料、茶叶等专业会议，做了具体的安排。

在工业方面，一是在与农业的关系上，密切协作，增强配合。有关重工业部门努力增产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产量有很大提高。

二是在工业内部注意了轻、重工业的关系，积极增产市场和人民所急需的轻工业品，特别是棉纱、棉布、化学纤维和塑料制品等主要生活资料。

三是在重工业内部，用很大力量去加强矿山掘进和设备维修配置工作，

克服采、掘结构失调，矿山设备综合生产能力残缺不全的问题，到1965年，大部分矿山采掘关系基本正常，设备完好率达80%以上；同时，加强急需的“短线”产品如木材、水泥、有色金属、某些钢材品种和硫酸、烧碱、纯碱等基本原料、材料的增产工作

。四是为提高整个工业水平，填补缺门，有计划地引进国外最新的技术和设备。有的研究者指出，为了提高整个工业的水平，填补缺门，继1962年到1963年间中央批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最新的石油化工技术成套设备项目后，1963年至1964年间，中央又批准了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等100多个项目向国外考察、询价和相机签约。我国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以及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都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大庆油田和我国的原子能工业，也是在这几年中取得巨大成就的。

五是大力整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主要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需要品种，降低物资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经过努力，到1965年，全部工业亏损额减至4.9亿元，基本消灭了经营性亏损，工业产值利税率达到39.8%。

六是进行某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改变过去主要用行政方式管理的办法，试办托拉斯，将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专业性大公司，按经济规律进行管理。中央期望以此为契机逐步改变中央权力过分集中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1963年3月，首先成立了中国烟草公司，统管全国卷烟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次年8月，又决定试办盐业、煤炭、汽车、橡胶、医药、电力、制铝等11个托拉斯性质的公司。试办托拉斯不仅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为企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劳动制度方面，经刘少奇提议，中央于1964年5月正式决定在全国逐步推广固定工与临时工并行的两种劳动制度和全日制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的两种教育制度。这一观点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和与会同志的称赞与肯定。随后中央正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经初步实践证明，这种半工半读、亦工亦农的新型制度，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增加人民收入，扩大就业渠道，满足个人学习深造的愿望，而且有利于搞活劳动制度，发展教育事业。

在基本建设方面，1963年以后，以水利工程、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为建设重点。强调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加强管理工作，降低工程造价，讲究投资效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基建投资在1962年压缩到最低点，为46亿



元，实际完成56.6亿元。从1963年起，投资逐年稳步增长，效益不断提高，至1965年，全年完成投资170.89亿元。1963年以后，还有计划地对"大跃进"中仓促上马，简易投产的新企业、新基地添补配套工程和辅助设施以及交通运输和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等外部协作条件，使这些企业和基地恢复和扩大了生产能力。

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1963年4月，中央决定拿出近9亿元给部分职工增加工资，主要是提升40%职工的工资级别，扩大计件工资和奖励范围，提高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全年实际增发工资11亿元，使"大跃进"以来积存的职工工资问题部分得到解决。此外，还适当解决了部分职工住房和文教卫生设施，三年继续调整期间，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由"二五"计划期间的13.2%上升到17%。随着工农业生产情况的好转，国家还有计划地下调了部分商品价格。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工资，另一方面降低了物价，人民购买力有所提高，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进入1964年，随着中国周边局势的紧张，特别是美国扩大对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中苏关系趋于恶化，党中央逐渐将经济工作的重点由"解决吃穿用"转向"备战"。1964年4月底，国家计委编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规定这一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备战问题。鉴于存在战争的严重威胁，毛泽东提出："三五"计划要加强三线建设。8月5日，美国轰炸北越，战火烧近中国边界。十几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优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对一、二线建设实施"停"、"缩"、"搬"、"分"、"帮"的方针。

与三线建设直接关联的是"三五"计划的制定，随着大小三线建设的展开，备战气氛的增加，"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由重点解决吃穿用转向以战备为中心。

总的来说，三年继续调整时期，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注意发展生产，要照顾人民生活，这就使继续调整方针在三年绝大部分时间仍基本得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成功。

经过调整，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到2 235亿元，其中农业833亿元，工业1 4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1957年相比，工农

业总产值增长 59.9%，农业增长 9.9%，工业增长 98.1%。工农业比例自 1960 年的 3.6：1，调整为 1965 年的 1.7：1；轻重工业比例，由 33：67 调整为 51，48。随着这五年国民收入总额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为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前两年调整曾大幅度削减投资，将"大跃进"以来过高的积累率（1959 年高达 43.8%）降低，1962 年最低降至 10.4%；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进行了合理的调整，积累率又逐年适当提高，1963—1965 年分别为 17.5%、22.2% 和 27.1%。

经济效益也有所增加，由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前四年有 80 亿元赤字变为 1963 至 1965 年三年收大于支，略有结余。同时，还清了全部外债。市场上社会商品购买力与零售商品货源之间，由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购买力大于货源 20.9 亿元，变为 1963 年至 1965 年三年中货源大于购买力 53 亿元。人民生活方面，1965 年除了人均粮、油和棉布，由于农业尚未完全恢复而仍低于 1957 年水平外，全国 40% 职工提高了工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

在三年继续调整期间，大庆油田在 1963 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开采，同时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 年，我国在世界上首先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年平均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商品短缺现象大为改观，三年继续调整期间货源大于购买力 53 亿元。全国零售物价和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下降，高价商品和票证供应逐步减少。

1964 年 12 月 21 日至 1965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向全会宣布：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他指出，1965 年应当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尚未完成的任务，同时为"三五"计划做好必要的准备。同时，会议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63—1965 年的继续调整工作取得了非常喜人的成绩，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 1962 年经济出现趋于好转的形势之后，这次的继续调整巩固和发展了前两年调整的成果，进一步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颓势，稳定了



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使社会主义建设重新走上正轨，为五年调整划下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同时，它完善并增强了之前在全国建设起来的众多项目，加上这三年引进和建设起来的新项目，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虽然出现了重大失误，仍然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为经济建设打开了新局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这继续调整的三年在这十年期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指出，这个期间建设了大量的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并培养了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

在继续调整中，党通过对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的进一步认识，积累到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以后进行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使党懂得了，在经济建设中一定要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充分发挥国家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重视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等等。

在肯定经济调整成就的同时，这次调整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没有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它是在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正确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对所犯错误有深刻认识，妨碍调整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而且在调整过程中，一直固守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普遍规律这一教条，继续坚持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大跃进”的错误及其造成国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不从实际出发，却从主观愿望出发，“左”倾冒进，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阶段，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的。

其次，它无法排除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反右倾、批“三风”（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反修防修、四清运动等接连不断，冲击、干扰了继续调整工作的进行。党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运动过多，必然要影响经济，经济建设中也会产生“左”的东西，起极大的破坏作用。

再次，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战争威胁的估计过于严重。由此展开的三线建设步伐太急，规模过大，打乱了原来对继续调整工作的部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摆放在首位的任务——解决人民的吃穿用。

注释：

①②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 年第 4 期，第 5 页。

③《党的文献》1998 年第 4 期，第 12 页。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194 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516 页。

［3］柳随年，吴群敢主编，《“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第 129～130、131 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207。

［5］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63～364 页。



中共中央决定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

在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我国在工业和交通业作了一次重大尝试，试办托拉斯。党中央领导人较早就已经逐渐认识到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存在许多弊端，为此，党决定借鉴苏联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方法，试办托拉斯，改革我国的工业管理体制。这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一次有益实践，也是建国以来首次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的探索。通过对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的这次实践，协调了产供销的比例，在增强了企业办事效率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的进行。

早在解放战争后期，试办托拉斯的思想便在党内萌生。只不过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原因，中共对托拉斯问题的认识，还不过深入。

建国之初，政府曾借鉴苏联管理工业的模式，用于保证全国重点建设，合理分配资源，改变地区布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价值规律、市场调节和经济杠杆的作用被严重忽视，企业积极性不高，形成了条块分割，多头领导，分散管理的局面；各地不顾全局利益，争投资，争项目，重复建设，盲目生产等问题逐渐显露，这种管理体制已经明显不适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在“一五”计划建设过程中，中央各部集中管理的体制“统”得过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考虑改进我国经济管理体制。1958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规定允许大部分企业原则上一律下放，归地方管理。但是，由于在实施中企业下放过快过猛，加上“大跃进”运动，企业之间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被打乱，计划调给中央的物资调不上来，导致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1959年3月，中央又将大中型企业收上来归中央管理。由于采用行政管理方法，而不是经济方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国家

机构直接经营企业，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揽了企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一切经济活动，企业实际上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是单纯的产品生产者。这样就导致条块分割、协作很差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致使市场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

因此，当年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已开始考虑借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管理企业的方法，即组织托拉斯。毛主席说，我们工业建设可以走托拉斯的道路，托拉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比较进步的组织管理形式。

1960 年 5 月 2 日，刘少奇在成都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指出："在搞钢铁煤和矿石企业设计时，要符合经济核算原则。每一个钢铁基地组成一个托拉斯。"此外，他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上的讲话时也明确指出，组织托拉斯也是生产关系上的一种改革，这些都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解决得好，就会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1960 年 3 月 24 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天津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试办托拉斯的问题。他指出，大家赞成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我们要走托拉斯道路。最近我们在北京讨论了托拉斯的问题，就是为了使工业发展速度更快一些，也是为了综合利用。组织托拉斯，首先接触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所谓搞托拉斯，就是以一个行业为主，兼管其他行业。[①]

毛泽东也赞同利用托拉斯方式管理工商企业。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几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我们的工业建设可以走托拉斯的道路，托拉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比较进步的组织管理形式，机器设备利用得比较合理，搞得也比较快。组织托拉斯，是生产关系的改革，也是上层建筑的改革。"[②]这样，试办托拉斯的问题明确提出来了，但由于当时国民经济调整刚开始起步，严重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摆在党的面前，因此，试办托拉斯工作没有进行具体的部署。

1963 年我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就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设想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在工业、交通部门组织专业公司，试办托拉斯。

3 月，中国烟草工业总公司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托拉斯性质的联合企业。公司为了解决烟草行业中争原料、争市场等问题，决定对烟草



工业实行集中管理，统管全国卷烟原料的收购和产品的销售。

9月，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文件指出："管理工业企业，主要是要用经济办法，而不能片面地依靠行政手段。""可以考虑利用像托拉斯这一类生产、交换和科学试验的综合性的组织形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③这个文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正式通过，不过，组织托拉斯的问题已经开始在某些工业部门酝酿试办。

1963年10月，当薄一波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业工作问题时，刘少奇指出，我们现行的办法是用行政的手段去管理经济，即由各级行政机关行使管理经济的权力。这就造成经济管理上或是"统"得过死，或是分散主义，造成经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他说："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托拉斯、辛迪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如何管理好企业，无非是有组织、有计划、避免和减少官僚主义。组织企业性质的公司管，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官僚主义可能少一点。考虑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济组织，这样可以进一步接近生产，接近企业。"④这说明，当时中央领导已在考虑用经济办法代替行政办法。

在了解和征询全党意见的基础上，刘少奇指示有关部门应立即着手在部分工交行业中试办一批托拉斯，即建立专业公司或联合企业的工作。他认为，我们"要组织国内的统一市场，就要组织统一的生产。"⑤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由公司管，而不是由行政机关管。鉴于过去我国都是行政机关管工厂，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过去苏联也是这样搞的，证明不行。"⑥这就证明，以公司组织管理企业，对发展生产更为有利。刘少奇还提出，今后要把中央有关部统统改成公司。公司成立后，中央有关部的职责主要是"搞平衡、检查、监督，帮助公司搞好工作。"⑦各省有关的"厅、局也去搞这些事，不直接插手管工厂。"⑧

同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国家经委就试办托拉斯的问题进行了酝酿和征询意见。1964年1月7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情况，刘少奇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重申了他对试办托拉斯的意见，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说"目前这种按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的人，干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⑨

在薄一波领导下，试办托拉斯工作由国家经委副主任饶斌同志、经委委员吴亮平同志具体负责。党在试办托拉斯的问题上，完全没有经验，因此只能在研究国外做法的同时，再结合研究我们自己的情况。

在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和试点并参照国外办托拉斯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经委党组于1964年6月间草拟出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对托拉斯的性质和经营范围、管理办法、组织机构和它与各方面的关系做了初步规定。该《报告（草案)））指出，组建托拉斯是“改进工业、交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项带有革命性的重要措施。”“我们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统一计划，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

《报告（草稿)》规定托拉斯的基本特点是对内实行高度集中管理，对外实行全行业垄断经营，减弱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托拉斯实行全行业的统一经济核算，具有企业的性质。

《报告（草稿)》规定试办托拉斯的原则是按经济管理的办法，按行业改组工业体系，就是政企分开，由企业性机构管理企业。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原则。

刘少奇还设想了试办托拉斯的三种组织形式：“一种是人权、财权、物权全部统，工厂全部收；另一种是只统计划、价格、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第三种是只管计划、安排任务、交流经验。”[10]在经济核算上，可以由总公司核算，也可以由分公司核算，甚至也可以是企业核算，到底由哪一级核算，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形式不应搞得太单一了。《报告》积极的吸收了刘少奇的这一思想。

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并要求各中央局、省、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参照执行。批示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试办托拉斯，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工业，这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件新事情，中央主管部门和各级党委要充分地重视这件事情，应当结合党的战略的要求，集中力量首先把这一批试办的托拉斯办好。凡是有试办托拉斯任务的主管部门，必须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必须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研究如何办好托拉斯的办法，切实加强领导，选派得力干部担任托拉斯的领导工作，以便通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11]从此，试办托拉斯的



工作便由酝酿和初步试验的阶段，转入了大范围的试办阶段。

根据报告推行托拉斯试点的提议，1964 年全国第一批托拉斯共试办了 12 个。其中，全国性的托拉斯有 9 个，它们是烟草公司、医药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公司、橡胶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地方性的托拉斯有 3 个，它们是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次年，中央又试办了石油工业公司、仪器仪表工业公司和木材加工业公司；有的省市还试办地方性的公司，如陕西棉纺织工业公司、西北电力机械公司等。

这些托拉斯组建以后，即着手改组生产组织，改革管理制度，建立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协作的经营管理方式，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率和利润。从试办这些托拉斯的实践看，虽然是初步试办，且试办的时间不长，但由于是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工业企业，使产供销比较协调，而且企业只有一个“上级”，因而办事快，效率高，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例如，烟草公司将全国 104 个卷烟厂压缩到 62 个，卷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 17%，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35%，卷烟加工费降低 21%。又如，医药工业公司将全国 297 个药厂调整为 167 个，而 1964 年第一季度 6 大类原料药的总产量却比 1963 年同期增长了 29%，并且提高了质量，增加了品种；同时，汽车工业托拉斯的组建，促进了我国汽车业的发展，1965 年全国汽车的产量达 4 万多辆，比上年增长 40% 以上，并且试制了多种新型号汽车。[12]再如，北京玻璃厂按照专业分工，将 6 个玻璃厂改组为 13 个工厂，产品的品种增加了 96 种。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试办托拉斯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反映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在上收企业的问题上，一些地方有不同意见，以致有些原定要收的企业收不上来；在有些要收的企业中，出现了调走人员和设备甚至改行、转产的现象。在改组生产、调整企业的问题上，地方的看法也不同。上海工业基础雄厚，希望自己组织专业生产和协作，江苏、山东、北京等省市也担心托拉斯统一安排生产后，将影响地方的利益。托拉斯上收企业难，调整企业更难。

其次是反映在托拉斯内部统一领导和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为实行集中统一经营、托拉斯着手将过去由各厂矿企业分散管理的计划、财务、供销、劳动等项业务权力集中到股份公司或公司手里，实行产供销和人财物的

统一，这就同曾经是独立核算的厂矿企业产生许多摩擦。

再次反映在试办托拉斯与当时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按照当时的体制，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工业利润和税收，厂矿企业上收到托拉斯后，影响了地方的财政收入，这是当时一些地方不赞成上收企业的重要原因。托拉斯虽然掌握一批企业，但物资分配渠道却没有打通，产品定价权也分别掌握在国家或地方物价委员会手里，托拉斯不能问津，管理生产和统一经营便发生实际困难。在这三个矛盾中，“中央同地方的矛盾，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13]

为了检查托拉斯的试办工作，总结经验，研究解决当前试办工作中的问题，1965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 7 日，国家经委党组专门召开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对于试办托拉斯的一些主要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并提出了解决的建议和方案。会议期间，刘少奇和邓小平听取了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指出，“要全面考虑一下，哪些托拉斯由地方办合理，哪些托拉斯由中央办合理。有些由中央办合理的，也不一定马上就办，可以让地方先办，将来再成立总公司。有些将来也只能是地方办的，中央就不要办”。[14]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搞托拉斯章程的问题，他说：“搞章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内部、外部的矛盾。”[15]

会后，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 1965 年托拉斯试点工作重新作了调整，工作重点继续放在办好现有的托拉斯上，原先准备马上成立的一些全国性的托拉斯暂时缓办，暂不扩大全国性托拉斯的试点范围；少数条件比较成熟的行业和地方，可再试办若干区域的或地方的托拉斯，待进一步积累经验后扩大规模。

这样，在 1965 年下半年和 1966 年上半年，又陆续成立了一批区域性的托拉斯，如东北电力机械公司、华东电力机械公司、贺兰山煤炭公司、上海船舶公司等。同时，各省市也成立了一些地方性的托拉斯企业。

试办托拉斯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探索。从试办情况看，虽然时间很短，都收到一定好的效果。正当试办托拉斯工作在探索中稳步前进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这一重要探索。随着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人先后被打倒，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试办托拉斯工作陷入了瘫痪，并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路线”，成为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党尝试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有益探索自此被打断。1968 年底前后，全国大部分托拉斯被撤销，我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又重



新回到了建国初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轨道上去。

尽管大规模的试办托拉斯工作只持续了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在试办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并且整个试办工作也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的，并没有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在此体制下，托拉斯仅是对完成国家计划负责的企业管理单位，而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而且，在这一体制下，组建托拉斯的工作只能由主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在各自范围内进行，企业间不能根据相互需要自行结合，不能自主运用价值规律来理顺内外各种复杂的关系。

但总的来说，60 年代初期的党领导的试办托拉斯是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有益尝试，刘少奇等人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改革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在调整的后期，党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式，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对流通管理体制、劳动用工制度以及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尝试，在当时党内逐渐强调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来看，当年的探索意义显得更加重大。

试办托拉斯，是党立足国情，善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经验的大胆尝试，凸现了党勇于探索、创新的改革精神。在试办托拉斯的过程中，党中央开始尝试政企分开，把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形式，在探索中已开始触及到“如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关系到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

这种政企分开、由企业性机构管理企业的托拉斯经济组织，为我国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探索。“过去一个厂矿不能办到的事情，现在托拉斯能够办到。过去多头领导难以办通的事情，现在托拉斯也比较容易办通了”[⑯]实践证明，按专业化协作原则实行工业改组、组织托拉斯的方向是正确的。它的优点是产、供、销协调，企业只有一个“上级”，办事快、效率高，产品质量得到了保证，经济效益也提高了不少。

此外，试办托拉斯的这一实践，也为我们搞经济建设提供了要不断总结并且要善于总结改革过程中的做法，妥善解决遇到的实际具体问题的宝贵经验。

注释：

①陈绍畴：《刘少奇发展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②③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5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页。

⑤⑥⑦⑧刘少奇：《组织专业公司，减少行政干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新中国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527页。

⑩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页。

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情报资料研究室．中国工业经济法规汇编（1969－1981），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1981年版，第121页。

⑫肖伟：《60年代中国试办托拉斯的尝试》，纵横，2004（ll）：42～43.

⑬⑯薄一波：《薄一波文选》（一九三七—一九九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⑭《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6页。

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3页。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1962年10月，印度在中印边境再次挑起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进行了有力地反击。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中国取得了自卫战争的胜利。

早在1959年印度就曾制造朗久、空喀山事件，挑起中印边境第一次武装冲突。尽管中国政府本着和平共处的友好方针，一直致力于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和尼赫鲁会谈，但是印方却拒绝中国的诚意，继续在边界滋扰生事。第一次边境冲突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也就为后来的第二次冲突埋下了隐患。

印度政府企图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从未消弭。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印军的飞机频繁侵犯中国的领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1961年到1962年9月间，又在西段边境中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4 000平方公里。在东段，印军又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区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克马洪线”方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嵴作为边界。

对于印军不断挑衅和蚕食中国领土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一方面对印度政府提出抗议和警告，坚决要求印度撤出中国领土；另一方面秉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多次提出与印度政府进行谈判，但都被印度政府拒绝了。

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同时发起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反击，战争由此开始。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嵴”的喀喇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的。战争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0月20日至29日。印军在此次战争中投入了约22 000人的兵力，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部队，并且做了周密的部署。仅在东段就布置了十多个营的兵力，分别把守在克节朗地区，棒山口、边旺地区，吉米塘、

下地地区等。在西段，印军主要依托其入侵的43个据点，继续向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进犯。面对印军的强劲攻势，中国边防部队也布置了充足的兵力进行反击。经过几次战役，到29日，中国军队在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在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入侵的印军。

中国边防部队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斗争正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但是，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以下三项建议：（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云翳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在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进行会谈。这三项建议，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11月4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总理，呼吁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指出中国的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①]

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和停止反击的行动，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敦促印度政府响应中国的建议。三项建议不仅再次表明中国的和平诚意，而且剥下了尼赫鲁自我标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当局侵略的真面目，进一步揭露了印度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诬蔑。印度政府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遭惨败，但仍不认输，悍然拒绝了我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公然要求恢复到1962年9月28日以前的即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攻击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印度政府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和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对紧急情况



的”内阁，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日夜向边境增派军队，赶运武器，一心与我国再作军事较量，与我军一决雌雄。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加了2个师部、9个旅以及炮兵、装甲兵部队各一部，总兵力增至30 000余人。印军于11月14日和16日在瓦弄、西口山等地又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鉴于此，要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创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还必须再给印军以沉重打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反击入侵印军。

第二阶段作战遂从11月16日开始。中央军委下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在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主要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首先是西山口—邦迪拉地区的反击战。19日，我军占领邦迪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印军近千人。随即我军主力便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至此，边防军共歼灭印军3个旅，毙俘印军官兵5 200余人。

瓦弄地区的反击战也很激烈。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其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该地区山高林密，年均海拔4 000米以上，河流交错，水流湍急，断崖峭壁，地势及其险要，易守难攻。入侵印军第十一旅4个营2 000余人凭险扼守，并不断向我军出击。中国边防部队经过周密部署，分割歼灭瓦弄地区之敌。16日17时许，我边防军进占瓦弄。瓦弄之战共歼灭印军1 200余人。在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1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进行反击。班公洛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18日上午，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驻守斯潘古尔湖地区的新疆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新疆边防部队与印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清除了印军廓尔喀第十一联队第一营第三连的大部兵力。20日，反击部队又占领了入侵印军的另3个据点。至此，班公洛地区作战胜利结束，西段入侵印军据点全部被清除。

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于11月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12月中旬，中国边防部队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交还给印

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后来又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共计 3213 人。到 1963 年 2 月 28 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中国政府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用实际行动再一次表明了和平的诚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称赞。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历时 1 个月，我军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作战中，全歼印军 3 个旅，另歼灭印军 5 个旅各一部，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入侵印军 8 900 余人。缴获各种火炮 300 余门，坦克 10 辆，汽车 400 辆各种枪 6 300 余支（挺），及其它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反击作战中，我军共伤亡 2 400 余人。中国军队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国家的领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粉碎了印度的侵略进攻，而且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孤立、分裂中国的野心。同时，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所坚持奉行的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原则，也博得了中外舆论的赞扬，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

注释：

①《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人民日报，1962 年 10 月 24 日

参考文献：

[1] 段永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1949-1989）》，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三版。

[3] 从进著，《1949-1989 年的中国 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4] 张静如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二卷，青岛出版社，2009 年版。

[5] 张树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版。

[6] 百度百科 http：//baike. baidu. com/view/365317. htm



援越抗美

为了帮助越南实现统一，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从 1965 年起，中国政府和人民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尽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中国和越南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在近现代史上，越南同中国一样多次受到列强的侵略。二战前它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中又被日本占领。二战结束后，越南分成南、北方。北方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起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则在法国挟持下由保大皇帝控制。为了完成南方和北方的统一，北越和法国进行了 9 年的抗争。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越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胡志明主席曾热情赞扬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是“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新中国一诞生，就把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作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50 年初，越南的抗法战争正处在困难之际，胡志明主席到北京同中国党政府领导人交换意见，毛泽东主席决定向越南提供全面无私的援助。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政府先后派出了以陈赓、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和以罗贵波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党、政府和人民军指导抗法战争。陈赓、韦国清及军事顾问团先后帮助组织指挥实施的边界战役、奠边府战役等，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与此同时，中国还向越南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和粮食、被服等物资。至 1954 年上半年，援越抗法战争取得了胜利，越南北方基本获得解放。1954 年 5 月至 7 月，中、苏、英、法、美、越南、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由于中国、苏联和越南的共同努力，至 7 月 21 日，会议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越法交战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根据此次日内瓦会议的规定，南北越暂时以北纬 17 度线为界分治，双方应在 1956 年通过自由普选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美国为实现其称霸的野心，企图利用越南为基地进而威胁中国，在法国撤走后，迅速以军事援助为诱饵在南越扶植亲美势力。1955 年，吴庭艳在南越发动政变，建立了越南共和国。1956 年 3 月，吴庭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所谓的“制宪

议会”选举，公开破坏日内瓦会议关于全越南普选实现南北统一的规定。而且，美吴集团实行独裁统治，残酷地镇压南越人民，他们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南越人民的强烈反抗。1960 年 12 月 20 日，南方各界代表举行大会，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要求武力推翻美吴集团的统治，统一越南。1961 年 5 月，美国派特种部队镇压越南南方人民。1962 年 2 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宣告成立，直接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这标志着美国已经开始公开介入对南越人民的战争。1964 年 8 月 4 日，美国制造了所谓的“北部湾事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报复性轰炸”，把侵略的战火烧到越南北方。1965 年 3 月，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 3 500 名士兵在岘港登陆，派其地面部队进入南越参战，同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从此，美国侵越战争演变为以美军为主体、以“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全面战争。同时，美国军用飞机也不断侵入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抗美救国斗争。越南政府也不断向世界人民揭露和控诉美国的侵略罪行，并呼吁国际援助。

中国政府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同样给予了最大的支持。1961 年 6 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时，高度赞扬了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并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当 1962 年美国成立“军事援助司令部”公开镇压南越人民的武装斗争时，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了严正声明，指责美帝国主义实际已参加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其侵略矛头直接指向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而间接针对着中国。当年夏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提供必要的援助。1963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的陪同下访问了越南。16 日，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签署了联合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和战友。刘少奇还向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做你们的后方。8 月 28 日，胡志明发表关于越南形势的声明，要求美帝国主义者撤出越南南方，南越的问题必须由越南南方人民自己解决。8 月 29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强力支持胡志明主席的声明。9 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率团访问中国，双方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主要军事装备



和后勤物资计划”达成协议，中国接着按双方的协议进行了部署和落实。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并郑重宣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①]1965年2月10日，150万人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美国的侵略罪行，声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集会。4月8日和9日，美军飞机攻击中国海南岛上空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海军航空飞机，毛泽东做出指示，为保卫领空而战，坚决打击入侵的美国飞机。中共中央在4月14日下达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势，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全国随即转入临战的状态。4月18日至22日，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委托，率党政军代表团访问中国。越方提出希望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黎笋说，“我们想请一些志愿军飞行人员、志愿军的战士……其他方面的必需人员，包括公路、桥梁方面的人员都在内。”[①]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表示，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是中国应尽的义务。凡是越南需要的，中国有的，一定会尽力援助。这次会谈，中越双方签订了向越南派出中国支援部队的有关协议。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和统一处理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周恩来总理决定，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持越南小组”。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援越部队的组建、开动和任务等工作。

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中国先后派出了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艰难而光荣的历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5年6月开始到1970年7月结束。这一阶段是越南战争最激烈最艰难的阶段。中国派出的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修建和抢修铁路、机场、通信工程、设防工程等任务。

防空部队赴越主要协助越北防空作战，保护交通线。根据中越两军协议和1965年7月14日越军总参谋部的请求，援越高射炮兵部队首批于1965年8月1日入越。至1969年4月止，高炮部队入越轮换作战，计有16个支队、辖63个团和50个队属高炮营及部分高机连和勤务分队等，总计15万

余人。主要担负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谅山段、河内至老街铁路线安沛至老街段、新建的克夫至太原铁路线以及太原钢铁基地的防空作战任务，并掩护中国援越工程部队的施工。

根据1965年5月30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和议定书，由中国派出工程兵部队帮助越南修建公路任务。担负援越筑路任务的中国后勤部队第四、第五、第六支队，辖16个团、1个民工总队、25个测量设计队和4个钻探队，配属6个高炮营及部分高机分队等部队，共8万余人，在中国后勤部队修路工程指挥部的率领下，从1965年9月开始相继入越，投入施工。在3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后勤修路工程部队为越南建成了7条干线公路及附属防护设施，并保证了这7条公路及2号公路北段的畅通，共计修路1 206公里，桥梁305座，总长6 854米；涵洞4 441座，总长46 938米，完成土石方3 050万立方米。此外，还完成了协议以外10号公路放丁至莱云桥的公路接线工程和太原至同登16号公路的维修任务。越方代表验收认为：上述所建公路，工程质量优良、美观。1968年7月23日，胡志明在庆祝公路竣工时说："你们为越南虽然只修了1 200多公里的公路，可是你们的情谊胜过几千公里、几万公里！"[②]

越南北方的原有机场不能起降喷气式飞机，对抗美作战影响很大。1965年1月，越南要求中国在安沛援建一个空军机场。5月，承建该机场工程的中国支援第三支队先遣人员抵达安沛，开始现场勘察设计。安沛机场地形复杂，濒临红河，群山环抱。安沛又是美机空袭的重点之一，市区又被炸成一片瓦砾。第三支队于11月22日正式动工，经过3年6个月的艰苦奋战，于1969年5月21日全部竣工。该机场飞机洞库于1968年9月开工，于翌年10月27日提前完工，工程质量优良。

1965年7月31日，中越双方商定，由中国派出一个通信工程大队，帮助越南在莱州、山萝和奠边府等地区修建通信设施。中国通信工程大队担负了这项任务，于1965年8月18日入越施工。指战员们为改善越南西北地区的军事通信条件，保障作战中的通信联络，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966年7月10日提前并超额完成了施工任务，共架设了通信线路330杆公里，挂线894对公里，安装了4个载波电话站，还架设了由其中一个电话站至越南西北军区驻地的中继线。

中国后勤部队还援助越南东北群岛和红河三角洲地区紧急构筑永久性设防工程。担负这项施工任务的第二、第七支队，奉命于1965年6月9日和



1966 年 12 月 15 日，先后赴越。经过艰苦奋战，第二、第七支队均超额完成了援越施工任务。越方对各项工程的评价说：“工程抗力均超过越方要求，工程质量高，坚固，适用，伪装好。”

中国支援部队在艰苦的条件下同越南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美国在越南投入高达 56 万之多的部队，年度所耗战费多达 300 亿美元，但依然不能使战局朝着它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伤亡人数骤增，到 1968 年下半年，每周平均死亡 200 多人，仅这一年美军死在战场上的就有 14 592 人，这引起了美国国内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此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在 1968 年 11 月宣布，无条件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和炮击。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完成了第一阶段既定的任务后，于 1970 年 7 月全部撤离回国。

第二阶段从 1972 年 5 月开始至 1973 年 8 月结束。美国 1968 年底停止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1969 年初在巴黎与越南开始谈判。从此，越南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判的阶段。到 1972 年 3 月底，越南南方武装力量在越南北方的支援下，发动了全面攻势，接连取得了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伪政权。美国为了切断来自越南北方的支援，保住阮文绍傀儡政权，在大举增调海、空兵力，恢复轰炸越南北方的同时，于 5 月 9 日开始对越南北方沿海航道、港口、河道实施大规模的水雷封锁。其后美国还对越南北方重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设水雷，实行全面海上封锁，使越南北方接受外援物资和对越南南方支援的主要运输线被切断，企图以此迫使越南在巴黎谈判桌上让步。停熄 3 年多的战火又在越南北方重新燃起。

越南政府于美国布雷的当天，就要求中国派海军部队帮助扫雷。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政府同意立即按计划再次开通中越间隐蔽的海上航线，向越运送粮食和其他物资，帮助越南人民打破美军的海上封锁。同时依照中越两国军队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除抽调汽车部队在两国边境地区担负援越公路运输任务外，又承担了协助越军扫除沿海的美军水雷和抢建野战输油管的任务。

从 1972 年 5 月 31 日至 1973 年 2 月 1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部队和民兵 8 000 多人次，并配备大批机械、车辆，在凭祥至友谊关、防城港至滩散两地段，铺设了 5 条援越野战输油管，总长 159 公里，连同新建扩建的油库、泵站、通信设施和铁路专线等工程，共完成土石方 10 多万立方米。防城输油管全长 99 公里。这两个地段的输油管，分别于 1972 年 6 月 15 日和 11 月 6 日开始向越南输送油料。应越方要求，中越边界野战输油管输油

至 1976 年 6 月 30 日才停止。4 年间，中国通过输油管向越南输送的汽油、柴油总计近 130 万吨，占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越石油总量的一半多，有力地支持了越南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斗争。

在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的支援下，越南军民不仅没有在美国的轰炸和海上封锁面前屈服，反而越战越勇，终于迫使美国政府承认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1973 年 1 月 27 日，越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南越阮文绍政权四方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

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对外援助中时间最长、数量最大的。据统计，到 1978 年止，中国对越的援助总值达 200 亿美元左右（按当时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其中无偿援款占 93.3%，无息贷款占 6.7%。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下，1975 年 5 月，越南抗美战争获得胜利，实现了国家统一。对于中国人民和军队为援助越南取得抗美救国战争胜利所给予的真诚、持久、巨大、有效的援助，越南劳动党和政府曾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和感谢。

注释：

①②百度百科：《抗美援越战争》http：//baike. baidu. com/view/1407030. htm

参考文献：

［1］段永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1949-1989），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三版。

［3］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 年版。

［4］中国的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 http：//www. studa. net/lishi/060116/16032956-3. html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外交工作的新开展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但是，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同时，又开展多种形式的外交，扩大与各类国家的交往，并妥善解决了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赢得了更多国家的友谊与尊重。

1959 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为艰难的一年。6 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技术专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西藏发生叛乱事件，中印边界冲突不断，印度支那局势紧张；国民党也趁机叫嚣要反攻大陆。这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使中共领导人开始思索如何打开外交的新局面来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政府首先解决了同邻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纷争，为这一时期和平外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和缅甸的共同边界有 2 000 多公里，其中有 3 段存在着问题。1954 年 12 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时谈到了两国的边界问题。在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双方表示要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1955 年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曾宣布，中国准备同邻邦确定尚未划定的边界。1956 年 11 月，中国邀请缅甸政府负责人来中国商谈边界问题。在认真勘察研究的基础上，中国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对 3 段未决边界提出了建议性的解决方案。缅甸方面认为这些建议照顾到了双方的利益，是公平合理的，遂答应予以考虑。1960 年 1 月 24 日，周总理再次邀请缅甸总理来华会谈。这次会谈十分成功。1 月 28 日，双方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友好相互不侵犯条约》。这是新中国同亚洲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中缅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以后中国同其他邻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之后，中国相继与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阿富汗等国也签订了边界条

约。1961 年 3 月，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访华，两国政府首脑就边界问题开始会谈。中尼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关于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1961 年 9 月 28 日，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访华，经过之前的几次协商，双方终于就珠穆朗玛峰问题达成了协议。10 月 5 日，刘少奇和马亨德拉国王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条约既照顾了中尼两国的民族情意，又维护了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蒙古同中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双方共同边界长约 4 000 公里，但从未正式划定过。1958 年 7 月，蒙古向中方提交关于两国边界的蒙方建议线地图。由于该图系 1945 年苏军总参谋部绘制的未经勘定的军用地图，所以中方未予认可。后来，随着中蒙关系的恶化，两国边界地区不断发生纠纷。1962 年 4 月，中方照会蒙方，希望双方能就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会谈。10 月 12 日，谈判在乌兰巴托举行。经过一个月的和平商谈，11 月 13 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12 月 26 日，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来京同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中蒙边界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为两国边境局势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主要是与中国新疆接壤的长约 600 公里的克什米尔地区。由于克什米尔地区又牵涉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政府对此一向很慎重。虽然六十年代初，中印因边界冲突而交战，但是中国政府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争议由双方谈判解决，中方不介入。目前中方与巴方只能就边界问题签署协议而非条约。巴方表示赞同。于是，1963 年 3 月 2 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与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佐·阿·布托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中国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问题由于涉及第三国苏联（现在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而略显复杂。主要是中、阿、苏交界的帕米尔归属问题。1963 年 6 月，中方与阿富汗在喀布尔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对阿方采取了照顾，谈判进展十分顺利。11 月 22 日，双方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关于边界问题的条约》，并立即生效。

中国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妥善地处理了同亚洲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这也为中国同周边国家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创造了条件。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只有寻求更多可靠的朋友团结互助，才能使中国摆脱两面受敌的局面，开拓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1955 年亚非会议以后，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日益加强。进入 60 年



代，中国同亚非国家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多次出访亚非国家，促进了国家间的友好合作。

1960年4月至6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蒙古6国进行了友好访问。1963年4—5月间，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了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此时中印边界冲突刚结束不久，中国处理与印度关系的做法，得到了这些国家的支持与赞赏。这次出访，增进了中国与这几个国家间的理解和友谊。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亚非欧14国进行了友好访问。重点是对非洲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天的埃及和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10国的访问。离开非洲之后，又访问了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在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各国领导人就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提出了处理中国和非洲国家及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亚非国家援助的八项原则。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对国际事件的立场、观点和对外政策，受访的各个国家对中国倡导和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表赞同。到1963年底，中国已同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相继来中国访问。由此掀起了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

50年代后期，美苏两个大国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除了和亚非拉国家团结合作外，更期望能进一步开展同西欧国家的交往。1957年，毛泽东曾经指出，在美苏之间存在着由欧亚非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组成的广阔的中间地带。它们“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①]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亚非拉发展中地区是美苏之间的“第一中间地带”，而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第二中间地带”。西方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对待美国和西欧要有区别。在这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一方面继续同瑞士、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增进友谊，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同法、日等国改善关系。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成果就是中法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不久，挪威、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由于法国当时正同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进行战争，中国支

持越南人民的解放战争，所以，法国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1954 年日内瓦会议以后，新上台的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总理曾到瑞士伯尔尼中国大使馆会见周总理。这是中法两国总理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打开两国关系的起点。孟戴斯-弗朗斯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深感法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新中国是不现实的。虽然他有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惜他的政府很快就倒台了。

中法关系真正得到改善，源于戴高乐的执政。戴高乐将军是敢于对美国采取独立行动的人，也是敢于对美国说“不”的政治家，但他也是在再度执政五年多之后，才采取同中国建交的步骤。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同戴高乐关系一直密切。1958 年，戴高乐再次上台前夕，富尔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富尔对中国友好，一向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22 日，下野的富尔及其夫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了富尔夫妇。在毛主席接见富尔时，毛主席引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阐明了中法关系的利害。富尔回国后，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法国没有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理由，并借用毛泽东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意思，希望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以说，从富尔第一次访华后，他同中国领导人也建立了一定的友谊，便于帮助沟通情况，商谈问题。1963 年 8 月 19 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打电话，说法国前总理富尔希望于 20 日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李大使当即表示同意。8 月 20 日上午，富尔来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同李清泉大使见面。富尔坐定后，开门见山地道出他此次来访的目的是：要求再次访华，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及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富尔接着说：法中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通过彼此的大使交换意见，这是不正常的。他认为他与双方领导人都有一定友谊，可以帮助沟通情况，谈些问题。访华日期希望能安排在 10 月。富尔临走时，特地留下了他在瑞士休假的地址。富尔走后，李大使立即向国内报告了富尔访谈情况。不久，李大使接到了国内指示，请他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 10 月份访华。8 月 31 日，李大使到瑞士著名休假胜地达沃斯拜会富尔。李大使当面转达了张奚若会长的正式邀请。富尔对李大使的到来感到很高兴，中午同李大使共进午餐。席间，富尔再次提出此次访华



想同中国领导人谈政治问题。收到我国外交学会的正式邀请后，富尔立即从达沃斯返回巴黎，去见戴高乐。戴高乐见到富尔后说：“两年前，我就承认中国问题征求过你的意见，当时你说不能有所作为。现在，你是否还持这种看法？”富尔回答说：“我想一切都变了。”他说：“我已从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收到访华邀请，行期定在10月中旬。”戴高乐就说：“好吧，您到中国去。不过，您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两人还当场商定，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不引起美国的察觉，富尔在访华前，要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然后从香港去北京。回程时再访问缅甸，向戴高乐汇报访问结果。

此次，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授权信交给富尔，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问题。9月12日，富尔夫妇专程来到日内瓦，请李清泉大使与夫人孙琪共进午餐。富尔说：他从瑞士返回法国后不久，便见到了戴高乐将军。将军要他再次来见李大使，一定把问题谈清楚。他此次访华是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他又说，此次访华实质上是官方性质，但对外只能说是个人旅行，希望保密。富尔第二次访华是代表戴高乐的一次重要访问。他10月22日抵达北京，次日周恩来总理便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以后，又同陈毅副总理一起进行了多次认真、坦诚的会谈。中法建交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富尔到达中国后，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北京、上海共进行了六次实质性的会谈，会谈取得了重大成果。应当指出，北京、上海的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富尔带来了戴高乐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近期承认。这三个方案是戴高乐同富尔商定的。戴高乐希望能争取到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第二、三方案是备用方案。周总理会见富尔时对戴高乐的建交三个方案明确做了答复，指出：法国可以从与中国完全平等地位出发，在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全建交方式，如瑞士与北欧诸国那样，也就是说法国先同台湾断交，然后同我国建交；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暂缓建交。周总理指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富尔在谈判时表示，他们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同台湾断绝关系，对法国来说，若要驱逐蒋介石在巴黎的代表是不愉快的，这是一个礼遇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周总理听了富尔的话后，严正指出：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意志表现的结果。周总理说：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的国家”，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后来为了

寻求摆脱法台关系的办法，并照顾到戴高乐的处境，周恩来总理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条件下，于10月31日提出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变通方案。即中法建交三点内部默契。11月2日，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提供了中法建交的方案，内容有三点：1. 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立即建交，互换大使。2. 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3. 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后来，双方又经过几轮协商，终于决定于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2月23日，中法两国使馆的临时代办同时到达驻在国首都。从此，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中法建交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轰动国际社会。这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使美国封锁、扼杀新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了产。正如匈牙利著名政论家萨波伊斯特万所说的那样：“法国不管美国的公开威胁和抗议而承认中国，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与此同时，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关系也得到发展。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采取了积极正确的外交政策，才使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独树一帜。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参考文献：

[1] 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2]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三版。

[3]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 何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

[5] 张树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 百度百科．中法建交．http：//baike. baidu. com/view/1623925. htm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前的准备工作

在1962年8月6日至9月中下旬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先后在北戴河和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即将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

1962年8月6日至24日，北戴河会议召开。早在这一年5月份的时候，中共中央在《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批示中强调，各地要系统研究农业生产、生产力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为接下来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和解决农业方面的问题做好准备。本来这次会议确定要讨论农村、粮食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周总理还围绕这些问题准备了文件，但是毛泽东却在讲话中大谈阶级、形势、矛盾等问题，把会议的主题引向对阶级斗争的讨论。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首先说明，这次工作会议是“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为了便于讨论和畅所欲言，参加会议的成员分成六个大组和若干小组，并且还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成员有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再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共23人。

8月6日，即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究竟这二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

失信心，不对。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在 8 月 9 日中心小组会议上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的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 23 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接着又说，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 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 40% 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场。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



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对干部要进行教育，要办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在会上，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一些部、委，办事不同中央商量，自作主张，事后不报告的作风。说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的这几次讲话，一直强调阶级还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北戴河会议用部分时间讨论了毛泽东上述的讲话，并以讲话精神为指导，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

8 月 26 日到 9 月 23 日举行了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自 9 月 6 日起，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因为搞“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而被撤职。后来，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写信给邓子恢，反映当地农民群众十分拥护“责任田”。于是，邓子恢从农村工作部派出工作组到安徽做调查。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调查组陆续发回调查材料，充分肯定了“责任田”的作用。7 月 2 日，符离区党委又给邓子恢并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 7 条理由，10 个变化，说明“责任田”确实好。邓子恢长期负责农村工作，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就重视农业合作社建立生产责任制问题。1962 年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有些地方适合搞包产到户，就应该允许农民去搞。当他接到调查组发回来的材料以后，就更加坚信实行包产到户是正确的。于是，在毛泽东尚未认可“责任田”的情况下，邓子恢冒着被撤职的危险，毅然地把调查材料和安徽方面的来信一起呈送给了毛泽东。7 月 9 日和 11 日，邓子恢在给中央党校、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单位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时，明确表示赞成包产到户。他提出应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

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等责任制。他还强调，“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毛泽东也曾经派田家英等人下去调查，回来反馈都是赞同包产到户。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如邓小平、刘少奇、陈云也都持赞成态度。但是毛泽东却认为，“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出于对人民公社固有模式的坚持和对集体经济的概念的误解，他把“包产到户”错误的指责为“单干风”。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所以，在这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着重批评了所谓的“单干风”，强调不能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1962 年，中共中央调整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给一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子，给“反右倾”中错批错斗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6 月 16 日，彭德怀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八万言”的申诉信，以便澄清庐山会议加给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里通外国”的罪名，请求党全面地审查他的历史。在“八万言书”的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中，彭德怀沉痛地说：“我没有背着我党在外国人面前搞什么不利于我党的勾当来讨好外国人，更没有什么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我诚恳地要求我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8 月 22 日，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短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再次恳求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彻底弄清他所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处理。对于彭德怀的长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未予答复。但是在 9 月 6 日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却把彭德怀的申诉认为是搞翻案，开始批判所谓的“翻案风”。

无论是批判“单干风”，还是“翻案风”，毛泽东始终认为进行阶级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他的这种观点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讨论主题。

参考文献：

［1］段永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1949-1989），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三版。

［3］从进著，《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张静如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5］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问题，农业、商业问题，以及关于批判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的问题，并且毛泽东重点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次全会过分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对后来国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2人，中央候补委员88人，同时还有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领导同志33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及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他还指出，列宁曾说，革命胜利以后，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会复辟。欧洲的英、法等国都曾经过了几次复辟，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根据以上的“实证”，毛泽东提出：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全会将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写进了公报：美帝国主义者变本加厉地推行它的以称霸世界为目的的侵略和战争计划，各国反动派更加露骨地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更加卑鄙地背叛共产主义的事业和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



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由此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就把我国社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绝对化了。谈到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我们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做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对于如何对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说：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接着又指出，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没有错的不平，不能一律都平反。毛泽东反对“平反风”，主要是针对彭德怀的申诉信。彭德怀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3个月，曾给中共中央写了8万字的申诉信，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康生作为党内意识形态方面的“监察官”，诬蔑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刘志丹》是李建彤（刘志丹的亲弟弟刘景范的夫人）写的一部报告文学体裁的历史小说，歌颂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刘志丹的革命业绩。但是康生武断地认为，刘志丹同高岗都曾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歌颂刘志丹就等于是歌颂高岗，就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的习仲勋、贾拓夫等人也被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

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决定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为生产队，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30年不变。《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

定》，要求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农民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发展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同时，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在工业方面，首先必须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按照目前的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可能性，进一步地进行合理的调整，加强薄弱部门的生产能力，努力改进经营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在商业方面，通过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要根据“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原则，根据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这三条渠道，大力组织农产品和工业品、农村和城市的交流，供应农村更多的生产资料，供应工业更多的原料、材料，供应城乡人民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各 21 人，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书记处书记。

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他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和对形势的分析。他指出，两条道路的问题未最后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泽东说，至少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刘少奇提出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五代到十代，我们算一代，共 100 到 200 年。但是，鉴于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在实际工作中本来应该继续进行的纠“左”工作，刘少奇提议将这次全会对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展开的批判情况，只传达到党的高级干部，不向下传达。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提出了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继续按原计划调整国民经济成为可能。

八届十中全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指导思想向“左”的方向转变的关键性会议。这次会议中断了纠“左”的努力，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



平反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就把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扩大化、绝对化，进一步系统化了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观点，成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公报

[2]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从进著，《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陈峰，高敏编著，《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5] 齐鹏飞，《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9.10》，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 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

从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开始，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左”倾思潮逐渐在社会生活蔓延开来。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理论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1963年9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中指出：这次运动（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此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度成为流行口号，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1956年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然而，1957年整风运动后来转向反右派斗争，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①]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通过了关于我国有“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不正确的论断。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残余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另一个是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于动摇的过渡状态。[②]这一论断，完全否定了八大上关于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定位，为以后的阶级斗争提供了依据。

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了错误的斗争，毛泽东却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③]庐山会议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做对抗阶



级的生死斗争来处理，使得反右派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升级。虽然1961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只是对经济领域中“左倾”思想的纠正，并没有对“左”的指导思想做根本的批判。接下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可是，大会对“三面红旗”仍持肯定的态度，这就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④]

八届十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陆续开展起来。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以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实践活动。在它的影

响下，全国上下充满着阶级斗争的气氛。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在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时，毛泽东认为，“当前社会中唇线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9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和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用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⑤这里毛泽东把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同时称为“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并把它们看作是防止党和国家变质的确实的、可靠的保证。其实，毛泽东此时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了。他甚至认为全国各条战线、各类部门中都存在阶级斗争问题。于是，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批判之风。在文艺界，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被看做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左”倾理论的指导下，许多原本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观点被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错误地当做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一大批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在教育界，毛泽东认为，书“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⑥他还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学校必须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⑦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农村和工矿企业的阶级斗争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毛泽东说，“只有把阶级斗争的仗打好，才能打好生产斗争的仗。”⑧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规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五个要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在这五个问题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同年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1965年1月初，会议进入第二



阶段。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指出：“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简称“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在这里，“纲”就是主题、中心，就是总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工作，包括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军事工作等等，都要统属于这个纲。

此后，在“左”倾思潮的引领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演越烈，最终使我们党和国家遭受了一场“十年浩劫”的灾难，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符合当时国情，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影响了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和策略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从而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严重打击和挫伤了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总结我们党和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果断地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及时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75 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22 册，第 432 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51 页。

④人民日报，1962 年 9 月 29 日。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第 293 页。

⑥⑦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第 23 页，第 96 页，第 256 页。

参考文献：

［1］金春明．“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曲折探索 1956—1966.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2］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3］人民网．中共党史上的 80 句口号（36） “以阶级斗争为纲” http：//www. people. com. cn/GB/shizheng/252/5303/5304/20010608/484744. html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从1963年开始，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部署，全国开展了以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农村“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后，这项运动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

1962年秋，根据对国内形势的观察并联系苏联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哪有有阶级不进行阶级斗争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号召进行一次彻底的社会主义教育。他说：“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村的基层管理确实存在着账目不清，财务混乱等问题。部分干部假公济私、欺压群众，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等不良现象也时有发，投机倒把、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阶级斗争。但各地因忙于经济调整，只有少数地方进行社教工作。从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巡视了11个省，了解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情况。各地负责人在汇报中，大都对阶级斗争讲得少，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大讲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和用阶级斗争进行社教的经验，河北省保定地区结合当年分配进行了以清账目、清工分、清财物、清仓库（简称“四清”）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重点讨论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赞扬了湖南省和河北省的经验，督促各地要抓好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

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示规定：运动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进行。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县级以下的工商企业中如何开展运动，将另行安排。根据部署，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立即在会后组织领导干部开展“五反”运动。同时，许多省区也先后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以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陆续在全国发动起来。

1963 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研究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围绕形势、认识、运动的重点、方法四个方面的问题发表多次讲话。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有关批示，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指导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前十条》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并归纳为九种表现。规定“四清”运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 95% 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要求干部认真参加集体劳动，把这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如不这样做，“势必出修正主义”。《前十条》的主题仍然是围绕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展开的，认为这场运动，是一场“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5 月 8 日，毛泽东作了关于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的批示，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展了访贫问苦，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等活动，向学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按照《前十条》的内容，重新训练干部，在一批社队进行试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 9 月份，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其他各级机关、科教文卫、企事业单位的运动正在进行。

在运动试点中，许多地方发生了乱斗、打人、罚跪等违法乱纪的情况，还出现了经济退赔面普遍偏宽、处罚偏严等现象。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规定来限制这些问题。在 9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



政策问题的规定》，即《后十条》，报送毛泽东。《后十条》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1 月 14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

《后十条》在指导思想上和《前十条》一致，都是强调阶级斗争，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后十条》的出发点是力求缩小打击面，约束过火斗争，减轻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从 1963 年冬开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部门、机关单位，解放军各单位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更大的范围展开了。这一阶段运动在农村主要是建立健全贫下中农组织，打击地富反坏，搞运动还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组起参谋作用，对干部整得还不太激烈。“四清”主要是清经济，“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同时解决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但是，由于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各地出现了打击面过宽、过重的情况。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后，从中央到各地各级领导机关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越来越严重。同时，从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论战。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也影响到了中国国内的政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提到了“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社会基础”的战略高度。

1964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在“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上安排国内工作的重要会议。会议除讨论“三五”计划、大三线建设外，还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会议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切实的概念，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毛泽东还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6 月 8 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在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如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他还忧心忡忡地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刘少奇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多的运动没有搞清，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不仅要追“四不清”干部在下面的根子，还要追他们在上面的根子。会议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出新的部

署，城市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整个运动要延长时间，规定七年内全国搞完，三年内完成三分之一的地区。根据会议精神，6 月 17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修改《后十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在重点县全面展开。

6 月 28 日至 7 月 25 日，刘少奇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视察，同当地党政军干部座谈如何开展四清运动。8 月 5 日至 26 日，他又到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地，并在广州修改《后十条》。9 月 18 日，《后十条》经过讨论修改，由刘少奇签发，印发给县以上党委和工作队。这个修正草案，称为《后十条》修正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指出，阶级敌人"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的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文件要求，要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问题。文件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就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把基层组织和干部丢在了一边。领导干部要亲自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①]与《后十条》相比，修正草案稿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各省市区重新调整部署，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进行"大兵团作战"。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夺权斗争成了运动的中心。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发现了很多问题。在各地"四清"运动中，普遍发生了打击一大片和乱斗、打人等现象。许多高级干部对刘少奇主张的大兵团作战和扎根串连，也有不同的看法。负责一线指挥的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四清运动因此发生了转折。

1964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5 年 1 月 14 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 12 月 20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如何确定主要矛盾和运动性质等问题，意见发生分歧。刘少奇认为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却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对刘少奇主张的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做法，提出了批评。12 月 28 日，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



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 17 条。《十七条》对运动的性质统一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城市“五反”运动的名称。规定运动的时间是全国 7 年内搞完，3 年内搞完 1/3。当日，《十七条》作为中央 811 号文件印发。[2]但是，毛泽东认为有些人对他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十分赞同，遂决定把与会者召回继续开会，把问题说透。1965 年 1 月 5 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毛泽东几次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作自我批评，收回了自己的意见。会议重新讨论会议纪要，由陈伯达执笔，修改《十七条》。1 月 14 日，作了大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最后成稿。

《二十三条》对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打击面过宽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提出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于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人，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这些规定，有利于解放农村基层干部，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但是，《二十三条》主要体现了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是八届十中全会后“左”倾理论又一次的新发展，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二十三条》颁布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大四清阶段，阶级斗争的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思想及组织领域。

从 1965 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对“四清”运动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他认为四清运动和文化战线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决定寻找新的阶级斗争方式来彻底解决问题。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四清”运动随即被这更加激烈的新运动所取代。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历时近 4 年，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场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从清经济开始的“四清”运动，发展到政治上的“夺权斗争”，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实际上成了“文革”中夺权的预演。[3]

注释：

①②③王海光：《60 年代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曲折探索 1956—1966》，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478 页，第 488 页，第 495 页。

参考文献：

［1］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2］林小波，《四清运动始末》，《党史文苑》，2005 年第 9 期。

［3］从进著，《1949-1989 年的中国 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4］朱阳，任永祥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开展学雷锋活动

雷锋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他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尊听党的教导，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艰苦朴素，助人为乐，无私奉献。雷锋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是，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无法计量的。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

1940年12月18日，雷锋（原名雷正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安庆乡简家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雷锋7岁时就成了孤儿，在好心的穷乡亲们的帮助下，他挣扎着活了下来。1949年8月，雷锋的家乡解放了。第二年，他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夏天，乡政府的党支书把他送到乡小学读书。1956年夏天，雷锋小学毕业后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不久就被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还被评为县委机关模范工作者。1958年春天，雷锋来到团山湖农场，学会了开拖拉机。9月，雷锋报名来到辽宁鞍山，做了一名推土机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翌年8月，他又来到条件艰苦的弓长岭焦化厂工作。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期间，他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被评为标兵、红旗手，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1959年12月，征兵工作开始。9日，弓长岭《矿报》发表雷锋《我决心应召》的申请书，表达了他积极要求参军的坚定决心。但是由于他身高只有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不符合征兵条件。雷锋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兵役局表明参军的决心。最后因为他政治素质过硬和有经验技术，被破例批准入伍。

1960年，雷锋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被编入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到了部队，他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努力钻研技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60年8月，雷锋把平时节约下来的200元钱捐赠给抚顺市望花区人民公社和辽阳水灾区，受到部队的表彰。1960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工程兵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学习雷锋的通报》，要求立即组织群众学习雷锋同志的模范事迹。5 月，作为全团候选人，雷锋被选为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 月，他被提为运输连四班班长。入伍以来，雷锋多次立功受奖。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节约标兵"、"模范共青团员"。他的照片、日记和模范事迹，通过报纸、电台作了广泛的宣传。但是雷锋并没有骄傲，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同志、助人为乐。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参加义务劳动，还担任校外辅导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激励青少年。他在日记中曾写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光荣应该归于党，归于热情帮助我的同志，至于我个人做的工作，那是太少了，我这么一点点贡献，比起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还是很不够的……"

在部队，雷锋一直坚持学习理论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1962 年春节，雷锋在《前进报》发表了《62 年春节写给青年同志们的一封信》，他还先后发表过《在毛主席的哺育下成长》、《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我是怎样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署名文章。在日记中，他多次向党表决心，"听党的话，加强政治学习，多看报纸和政治书籍，积极参加党的各项运动，认真执行和宣传党的政策。""继续努力，不怕困难，虚心学习，刻苦钻研，争分夺秒，保证争取政、军、文、体各科学习全年满堂红。""搞好团结，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①]雷锋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领导和战友都很喜欢他。

1962 年 2 月 14 日，雷锋被选为党代会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工程兵十团代表大会。19 日，他又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沈阳军区首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然而，不幸的是，1962 年 8 月 15 日上午，雷锋与战友乔安山一起准备去洗车，在他下车指挥倒车时，车轮打滑，碰倒了一根晾衣服的木柱，这根木柱刚好砸到了他右太阳穴上。雷锋不幸牺牲，年仅 22 岁。

雷锋牺牲后，共青团抚顺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团的组织学雷锋、宣传雷锋。接着又发出倡议书，号召开展以青少年为先锋的学雷锋活动。1962 年 10 月 22 日，雷锋生前所在团举办了《雷锋烈士生平事迹展览》。很多民兵、青少年参观了雷锋事迹展览室，聆听雷锋生平事迹报告，座谈学习雷锋同志的高尚品质。从 1962 年 11 月到 1963 年 4 月，抚顺市共举行大中型报告会 200 多次，举办展览会 100 多次，有 32 万多人听取了雷锋生前事迹的报告和看了展览。[②]1963 年 1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根据雷锋班的请求，正式批准命名雷锋生前所在部队运输连四班为“雷锋班”。

为把学雷锋活动引向深入，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发出了组织党员学习优秀党员雷锋同志模范事迹的通知。同时，还组织了雷锋事迹报告团，在辽宁省各地做巡回报告。全省其他行业也纷纷开展群众性的学习雷锋活动。1963 年 1 月 8 日，沈阳军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决定》，号召广大指战员和青少年向雷锋同志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翌日，沈阳军区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积极开展学习雷锋运动，培养更多雷锋式的战士。③

其实，关于雷锋的先进事迹，舆论的宣传报道，在雷锋生前就已经展开了。1960 年 11 月 26 日，沈阳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前进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长篇通迅，较详细地记述了雷锋的成长过程和模范事迹。12 月 1 日，《前进报》又用整版篇幅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发表了《雷锋日记摘记》15 篇，同时配发了编者按，希望军区部队指战员“把雷锋同志作为一面镜子”，“学习雷锋，赶上雷锋”，并开辟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专栏。④

雷锋牺牲后，新闻媒体进一步加大了宣传的力度。1962 年 8 月 23 日，《前进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雷锋去世的消息。据统计，仅在 1963 年 1 月，《辽宁日报》就用了 9 个版面刊登了雷锋事迹、日记、社论、消息等 134 篇稿件。2 月 5 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辽宁省广泛开展学习宣传雷锋活动的消息，并配发了《向雷锋那样战斗和生活》的社论。2 月 8 日，《人民日报》用三个版面介绍雷锋的事迹，并配发了题为《伟大的普通一兵》的评论员文章及总参谋长罗瑞卿为“雷锋班”命名的题词——“雷锋同志永垂不朽”。

2 月 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雷锋活动。11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雷锋日记摘抄》，供全军学习。2 月 15 日，共青团中央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几个月来，共产主义青年团辽宁省委员会在全省青少年中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使广大青少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生动的共产主义教育。团中央认为各地共青团组织都应该根据形势和任务，结合青少年的思想情况，把这项活动作为当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并要求各地团组织参照辽宁的经验，在青少年中广

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

学雷锋活动在军队、地方开展的积极而又热烈。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自然灾害严重，人民生活困难，党群关系产生距离。毛泽东曾要求共青团加强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学雷锋活动的热烈开展，使毛泽东认为，教育青少年，雷锋是一个绝好的榜样。他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事情，也不是学他某一方面优点，而是要学习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一贯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习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也要带头学雷锋，才能形成好风气”。⑤

文艺界也通过话剧、曲艺、歌剧、电影等形式来歌颂雷锋。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创作的话剧《雷锋》上演了一百多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也先后观看了演出。全国各地的文艺团体还创作演出了大量学雷锋的歌舞、故事。一些作家、诗人创作了一大批富有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诗歌、散文、歌曲。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臧克家的诗歌《想一想生命的意义》，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像雷锋那样》等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

1963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的手迹“向雷锋同志学习”。在毛主席题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也相继为雷锋题词。

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新闻宣传部门站到了第一线。解放军日报连续发表《像雷锋那样做个毛主席的好战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再论像雷锋那样做个毛主席的好战士》、《发扬雷锋精神争当五好战士》、《以雷锋为榜样》4 篇社论和《学雷锋看行动》的评论员文章。各级党委先后下发了关于开展学习雷锋的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积极推动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1963 年 4 月 28 日，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青年的无产阶级觉悟提高到新的高度——谈广泛学习雷锋的深远意义》。团中央的指示和决定以及媒介的宣传，进一步推动了学雷锋活动高潮的到来。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召开了“响应毛主席号召，进一步开展学习雷锋同志活动动员大会”。在会上，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将复制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词放大件，赠



送给雷锋生前所在的运输连。勉励部队官兵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深入开展学习雷锋活动。解放军许多部队都把这一学习列入政治教育和党、团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上海、湖南、甘肃、新疆自治区委员会等省、市自治区的团组织，先后发出向雷锋学习的通知、决定，或举行座谈会和动员大会，号召青少年把学雷锋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各级团组织的积极领导下，广大青少年"以雷锋为榜样，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成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座右铭。⑥

学雷锋活动的开展，大大地激励了一代热血青年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全国各行各业涌现出许许多多雷锋式的先进人物。人们把学习雷锋变成了自觉的行动，雷锋精神成为社会道德情操的标准，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形成。

注释：

①百度百科：《雷锋日记摘抄》http：//baike. baidu. com/view/1753. htm#ref

②③④⑥初卓：《60年代学雷锋活动的思考》，《世纪桥》，2003年第3期，第26页。

⑤百度百科：《毛泽东三次为雷锋题词》http：//baike. baidu. com/view/1753. htm#ref

参考文献：

[1]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三版。

[3] 陈勇，《学雷锋活动的历史回顾》，《道德与文明》，1993年3月2日。

学先进典型活动

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时期。为了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各行各业先后涌现出大批的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王杰、焦裕禄、欧阳海、谢臣、麦得贤、孙乐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事迹被广泛宣传，使社会上掀起一股学先进的热潮。

"爱民模范"谢臣

谢臣（1940—1963），回族，河北省易县西水治村人。他成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受到革命环境的良好熏陶，13岁时便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1959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并被评为模范社员。1960年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入伍后，在部队首长、同志的关怀帮助下，谢臣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刻苦训练，很快便熟练地掌握了炮兵技术，成为一名出色的"三炮手"。在部队里，他不仅工作积极，学习刻苦，而且甘于奉献，助人为乐。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毛主席要我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一个'利他主义者'，这就是我的理想和志气。"他还常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就应该多做，自觉地做。"①他时刻牢记军人的宗旨，经常为驻地群众做好事，多次受到奖励，被评为"爱马标兵"和"节约模范"。

1963年春节过后，谢臣被调到驭手班，并随部队去易县东高士庄执行任务。8月上旬，河北省西部连降暴雨，河水猛涨，保定地区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部队驻地易县东高士庄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附近村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威胁。谢臣和战友一起投入到抗洪救灾的战斗中。他和战友们帮群众抢修漏雨、塌倒的房屋，排除积水，挨家挨户动员群众快速转移，背扶年老体弱的群众上山避险。8月7日夜间，谢臣替换战友看护骡马，忽然



听到有人呼喊：“洪水来啦！快上山呀！”对于刚刚离开山坡的谢臣来说，只要稍一回头就可以安全上山，但是，在这危急的时刻，他想到被困在村里的老乡，便毅然奔向村里。凶猛的洪水冲进了村院，掀倒了房屋，村民们四处逃散。谢臣奋不顾身地跃入激流，在浪涛中沉浮。他救出一名落水妇女后，又听到一个落水儿童的呼救声，虽然此时他已精疲力尽，但仍坚持游向激流。呼救的孩子被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推上岸，然而，扑面而来的洪水却无情地吞噬了他的身影。为了挽救群众，谢臣献出了自己年仅 22 岁的生命。

谢臣牺牲后，他所在的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追记一等功。同年 11 月，北京军区追授他“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师政治部副主任叶石了解到谢臣的事迹后，带领报道组去谢臣的家乡采访，后来写成通讯《不朽的战士——谢臣》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964 年 1 月 22 日，国防部追授谢臣“爱民模范”荣誉称号，表彰他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谢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获得国防部和中央军委授予“爱民模范”称号的人。1 月 29 日，国防部授予谢臣生前所在的五班为“谢臣班”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向谢臣学习。2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爱民模范谢臣》，介绍了他的事迹。此后，他的光荣事迹在全国广泛传播。贺龙元帅亲笔为他题词：“全军同志都要学习爱民模范谢臣同志舍己为人、奋不顾身的共产主义精神。”

谢臣生前曾把“看人民高于自己，学人民改造自己，爱人民胜过自己，为人民舍得自己”这几句话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如今，这几句人生格言已被铸成胸牌，别在他生前所在连队每个战士的胸前。它时刻激励着大家学习谢臣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

欧阳海（1940—1963），湖南省桂阳县人，中共党员，广州部队某部三连 7 班班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爱民模范。他是继雷锋之后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涌现出的又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入伍前，欧阳海积极地参加村里的工作，担任农会的义务通信员，打水、扫地、送信、砍柴，样样都做。村里成立初级农业社，他当上了记工员，转入高级社，又被群众选做会计。他关心群众，热心地帮助没有劳力的村民干活，还把自己劳动所得的粮食送给他们。他勤劳善良，大公无私，甘于奉献，别人认为是“吃亏”的事，他干；别人感到是困难的事，他也干。

入伍后，欧阳海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是学习训练，还是执行任务，都积极主动，奋勇争先。虽然他只读过一年半的书，但是，凭着顽强的毅力，他读了很多毛主席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并写了大量读书笔记，这使他的政治觉悟得到很大的提高。他干起活来不要命，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大家都称他是个“小老虎”。他入伍3个月就加入共青团组织，第二年因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并当上班长。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和模范带头作用赢得了全班战士的信任和支持，所带班被评为先进集体。他曾两次跳进水中，奋不顾身地救起溺水儿童；曾经冒着烈火，抢救一位老人脱险。他在部队一贯表现积极，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团里评为标兵。1960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对战友说过：“我们入党宣誓时说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为共产主义奋斗，绝不是一句空话，那就是干、干、干，尽心尽力地干，忘我地干，什么也不怕地干，一直干到停止呼吸！”[②]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他一直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1963年11月18日清晨，部队按照既定路线冒雨沿铁路行军，行至湖南省衡山车站南峡谷时，由广州开往武汉的282次火车鸣着长笛飞奔而来，响亮的笛声使走在炮连最后的一匹军马骤然受惊，窜上了轨道，横立在双轨之间。眼看一场车翻人亡的惨剧就要发生，就在这危急时刻，欧阳海奋不顾身地跃上铁路，拼尽全力将军马推出轨道，避免了一场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火车安全地通过了，旅客的生命和财产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然而，欧阳海却身受重伤，倒在血泊里。虽然当地的衡山县各有关部门尽力组织抢救，但他终因伤势太重，光荣牺牲，年仅23岁。

欧阳海舍身推马救列车的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分别著文和讲话，高度赞扬欧阳海的崇高精神，桂阳县委也作出向他学习的决定，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为了纪念他，他出生的老鸦村改为凤凰村，沙溪公社改为欧阳海乡。

1964年，广州军区授予欧阳海“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并追记一等功。同年，国防部命名欧阳海生前所在的七班为“欧阳海班”，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欧阳海同志的崇高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朱德、董必武、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高度赞扬了他的英雄行为，并号召全国军民学习欧阳海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风格。

欧阳海的英雄壮举，实践了他自己的人生格言：“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他为



青年人树立了榜样，他先人后己、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他和雷锋被称为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的两座精神丰碑。在欧阳海牺牲的地方，有一座他的塑像，塑像下“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几个大字，是对他的最好评价。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党的好干部”焦裕禄

焦裕禄（1922–1964），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贫农家庭。1946年1月，焦裕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带领民兵参加过多次战斗。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到了河南，被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中共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62年12月，焦裕禄受党的委派来到了兰考县任县委书记。展现在他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一片片结着青色冰凌的洼窝，白茫茫的盐碱地。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暂时困难时期，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县里二十万亩麦子，秋天三十万亩庄稼被淹，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焦裕禄知道，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啊！他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③

1963年2月，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带领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他的肝病已相当严重，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让他在家里听汇报。他却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经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上，焦裕禄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从此，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除“三害”斗争和各项工作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他给自己规定，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不论在

治理“三害”的土地上，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④

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64 年春天，焦裕禄同志的肝病越来越重了。他开会、作报告，经常用右膝顶住肝部，不断用左手按住疼处。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顶住肝部。天长日久，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但是，他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里，组织上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可是当他发现别的同志生病时，却总是关心备至。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在乡下患病，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患慢性疾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同志想的总是别人，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在医院里的时候，焦裕禄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他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

1964 年 5 月 14 日，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 42 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4 年 11 月，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1966 年 2 月 1 日，河南省政府追认焦裕禄同志为革命烈士。2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同时还刊登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高度赞扬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2 月 9 日、10 日、11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先后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随后，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刊登了数十篇文章通讯，焦裕禄的事迹传遍了全国，社会上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焦裕禄同志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他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焦裕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无愧于“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的光荣称号。



“好司务长”孙乐义

孙乐义，1939 年 8 月出生于乳山白沙滩镇白沙滩村，1958 年参军，1961 年担任济南部队某部二连（驻守在荣成宁津）司务长。在部队里，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大公无私，关心战友，乐于助人，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战友们都称赞他是“人民的好司务长”。

为了管理好连队生活，孙乐义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不辞辛苦地在伙房和炊事员一起干活，想方设法为战士们调剂主副食的花样品种。遇上蔬菜淡季，为了让战士们多吃点菜，他就带着炊事员生绿豆芽。绿豆芽怕热、怕冷、怕透风，他每天夜里要起来几次侍弄，绿豆芽生得又嫩又肥。有个时期，连队到岛上执行任务，吃菜要回到大陆运。小岛与陆地之间隔着一段海滩，只有落潮时才能进出。孙乐义经常四更天起床，赶在早潮之前上陆，抓紧时间购买所需的物品，又趁晚潮之前回岛。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孙乐义往回运菜赶到海滩时，海水已经涨到膝盖，他想着连队正等着菜吃，便脱下棉裤，推车下海。冰冷的海水把他的腿冻麻了，他咬紧牙，涉水把菜按时运回连队。战士们说：“我们吃胖了，司务长累瘦了。”⑤

孙乐义总是为部队、为国家着想，公私分明。全连吃的用的，一经他的手别想抛撒一点。他每天都到仓库里去检查几遍，粮食稍微有点潮湿，就搬到外面晾晒，仓库有了鼠洞，就及时填堵。每吃完一袋面，他都要把面袋翻过来，彻底扫净。伙房的一些用具，能做的他就动手去做，没有扫帚自己扎，缺少筷子自己削，笼屉破了自己补，营具坏了都是自己动手修。每花一份钱，都要掂一掂份量。他经常外出买菜购粮，有时天还没亮就出去赶早集，下午才回到连队，中午宁可饿着肚子也舍不得去饭馆吃饭，不肯花公家一顿伙食费。他说：全连百八十号人吃饭，生的熟的，都要经过咱们的手，手头稍微松点，就会造成浪费，影响大家的伙食。他发现连队伙房烧煤总是超支，于是下决心领导炊事班改灶省煤。两年里，他们先后改灶 180 多次，摸索出一套节煤的办法，烧煤比标准耗煤量降低了 40%。孙乐义管账四年多，钉是钉，铆是铆，分文不差。一次，他领着几个战士，去街上买一车西红柿。那时正是大热天，回来的路上，一个新战士口渴了，想拿个西红柿吃。孙乐义马上对他说：“西红柿是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吃。”新战士也感到自己错了。回到连队后，孙乐义让厨房值班员称了一些西红柿，送给那个新战士，说：“你不是喜欢吃西红柿吗？这是我买的，不吃我可有意见!”新战士手里捧着西红柿，心里说不出的敬佩。大家称赞他说：“司务长公私

关系，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⑥

孙乐义时时牵挂着全连同志。到机关开会、报账、领东西，往返 80 多里，尽量当天去当天回来。有时天晚了，机关的同志留他住下来，他却笑着说：“连里还有事要办，住下来，明天一上午的工夫又要耗在路上了。”⑦执勤的同志冷了热了他都关心。刮风下雨的夜晚，他怕巡逻的战士淋雨受寒，三更半夜起来生火烧姜汤。战士们生病了，他就到床头询问，亲自做饭端到跟前。发衣服的时候，有的战士不在连队，他不惜跑七八十里，亲自把衣服送去。冬天，战士钟福太关节炎又犯了，一受冷受潮就痛。有一次，连里宰了头小羊，孙乐义便把羊皮熟制好，缝了两个羊皮筒，亲手一针一线缝在小钟的棉裤里。看到钟福太的床铺垫得薄，第二天，他就把自己铺的草褥子铺在小钟的床上。训练中，战士们爬山涉水，鞋磨损得格外厉害。孙乐义买来一套修鞋工具，到处拜师求艺，学会了补鞋技术。从此，他每天抽出休息时间，把战士穿坏的鞋收回来补。有的同志不愿把鞋拿出来，孙乐义就趁他们睡觉了，悄悄拿来补好。

孙乐义当司务长 3 年，食堂连续 3 年被评为“五好”食堂。他在部队先后任军需股长、团后勤处长，师后勤部副部长、部长。曾荣立二等功 7 次、三等功 4 次。

1965 年 2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宣传和学习孙乐义同志模范事迹的通知》。4 月 3 日，5 000 多名后勤工作人员听取了孙乐义的先进事迹报告。4 月 5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举行取了孙乐义模范事迹报告会，驻京各总部、军种、兵种、院校 4 000 多人，听取了孙乐义的报告。4 月 15 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接见了孙乐义，表扬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用到生活管理方面。5 月 27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举办“好司务长孙乐义事迹展览”，叶剑英、罗瑞卿参观了展览，首都和全国各地的 28 万名观众看了这个展览。

“英雄水兵”麦贤得

麦贤得，1945 年出生在广东饶平一个船民家庭。1964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5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麦贤得在学校读书期间曾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入伍前，他还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民兵。不管是当学生还是当民兵，为了集体利益，



他总是敢闯敢干，勇于承担重任。在学校里，有一次要帮公社送秧苗，麦贤得第一个自告奋勇去送，那天风雨交加，沟宽水深，水蛇又多，他一直在水里干了近两个钟头。当民兵时，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他曾经趟着齐胸的潮水，一个人用船从被淹的公社粮仓里抢救出三千多斤粮食。[⑧]

入伍后，麦贤得到广东虎门沙角海军联合学校学习。在军校里，他学习了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参观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战场，了解了人民海军年轻的战斗历程。他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往往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当一名合格的水兵，保卫祖国的海疆。他的文化底子薄，为了尽快学好专业技能，一到星期天、节假日，他便一个人躲到山顶上，钻研机电原理，熟悉轮机术语，强记大量数据。他还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理论，严格要求自己，以董存瑞、黄继光、安业民、雷锋等为学习榜样。一有时间，他就反复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等著作，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提高很快。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海军护卫艇上，当了一名机电兵。

1965 年 8 月 5 日早晨，国民党海军巡防第 2 舰队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由台湾左营港出航，当日傍晚驶至福建省东山岛东南兄弟屿海域，企图向大陆输送特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即令汕头水警区以鱼雷艇 11 艘和护卫艇 4 艘做好战斗准备。8 月 6 日凌晨，台湾“剑门号”和“章江号”闯进了东山岛附近的渔场。随着指挥员下达作战命令，麦贤得拉动操纵杆，炮艇昂首破浪向前冲去。战斗中，“章江号”燃起了熊熊烈火。正在这时，一块弹片打进麦贤得的右前额，他顿时失去知觉，跌倒在机舱里。副指导员替他包扎好伤口，他苏醒过来，但已经发不出声音，只是焦急地用左手指着机器。副指导员向他点点头，让他好好休息。当副指导员刚刚离开机舱，他就挣扎着站了起来。此时，艇舱开始进水，情况十分危急。麦贤得忍住剧痛，以惊人的毅力，回到机器旁继续坚守岗位，与战友们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机器。他凭着平时练就的一手硬功夫，在剧烈摇摆的机舱里仔细地检查着每一根管路、每一个阀门、每一个螺丝钉，及时排除了故障，保证了机器的正常运转。[⑨]战斗胜利结束了，麦贤得却被送进医院。

1966 年 2 月 3 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广大指战员学习麦贤得。2 月 4 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授予他“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同年 2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麦

贤得的脑神经受伤，但他以顽强的毅力，继续为新时期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着贡献。他曾出席 1987 年和 2007 年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曾任海军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2009 年 9 月 10 日，麦贤得被评为“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一心为革命”的王杰

王杰（1942—1965），山东省金乡县城郊乡华堌村人。1961 年 8 月应征入伍，196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入伍以后，他连续三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奖，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技术能手。他热爱学习，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要带上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一有空闲时间，就拿出来认真学习。他严格要求自己，“干什么工作都要一心一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埋头苦干，踏踏实实”。

他勤奋工作，在执行训练、施工和抗洪救灾等任务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大家称为“闲不住的人”、“不知疲倦的人”。他把雷锋作为自己行为的榜样，处处为他人着想。长途行军，他的脚起了水泡，但他顾不上自己的疼痛，放下背包，先给其他战友打水烧水，帮助炊事班生火切菜，然后自己才去休息；晚上放哨，他一站就到天明，目的是让其他同志多休息一会儿。他爱护集体财产胜过关心自己。一天晚上，外面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想起工地上还放着油桶、木料等施工器材，便一骨碌爬起来，一个人冒着大雨跑到工地，一趟又一趟将施工器材全部转移到山坡上，避免了国家财产的损失。他说：“要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没有别的窍门或捷径，唯一的只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0]

1965 年 7 月，王杰奉命到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今邳州市张楼乡）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爆破训练。14 日，在进行最后一项训练——炸药包实爆时，王杰让大家围成一圈，由他做示范动作。突然，埋设炸药包的土层冒出了白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杰大喊一声“闪开”，便飞身而起，扑向炸药包。随着一声巨响，王杰倒在血泊之中。在场的 12 名民兵和干部得救了，王杰却献出了自己 23 岁的年轻生命。

7 月 16 日上午，在王杰牺牲的地方，当地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根据他生前的愿望，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 月 25 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节目中播发了王杰的事迹和部分日记。同时，中央各大媒体均报道了王杰的英雄事迹。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向王杰同志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一意为革命。”要求各部队立即广泛深入地展开宣传和学习王杰同志的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在部队中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形成更加浓厚的学好人好事、做好人好事的政治风气。同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各级工会发出关于组织广大职工向王杰同志学习的通知。通知里说，从王杰同志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光荣战士，他时时、处处以革命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以革命英雄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以革命的精神对待工作，以革命的态度对待同志，以革命的原则处理个人问题。他是党和毛主席的好战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我们广大职工学习的好榜样。共青团中央也号召全国的共青团员和青少年，学习王杰同志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英雄气概和高尚品质。

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学习王杰同志一心为革命的崇高精神》。11月9日，朱德委员长为王杰题词：“学习王杰同志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解放军报》以“一心为革命”为题，刊登了王杰的日记，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的班为“王杰班”。此后，在全国全军广泛开展了学习王杰活动。

王杰是继雷锋、欧阳海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涌现出的又一名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他在日记中曾说：“真正的革命者，就要准备在斗争的过程迎接万难，排除万难，不怕困难，经受住各种各样的风浪的考验，哪怕是刮起十二级台风来，也要站稳脚跟，坚定不移的前进。”“当兵是为人民、为党、为祖国而来的，不管任何工作，党指到哪里就冲向那里，就是需要献上青春也没怨言。”[11]他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王杰的英雄壮举，1968年，他的家乡华堌村改为“王杰村”，村东还修建了王杰纪念馆。

谢臣、欧阳海、焦裕禄、孙乐义、麦得贤、王杰，是20世纪60年代学先进典型活动中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着全国人民不畏艰难，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是时代的楷模，是我们永远的学习榜样。

注释：

①周继厚：《永不褪色的爱民旗帜——爱民模范谢臣》，《共和国的英雄模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03页。

②新华网：《人民英模：欧阳海》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09-10/25/content_ 12320099. htm

③④百度百科：《焦裕禄》http：//baike. baidu. com/view/7484. htm

⑤⑥⑦人民网 http：//unn. people. com. cn/BIG5/22220/123701/123711/124004/7331721. html

⑧英雄的水兵：出色的战士——麦贤得 http：//www. cctv. com/lm/655/23/39390. html

⑨新华网资料：《麦贤得：英雄水兵坚强战士》http：//news. xinhuanet. 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 2108660. htm

⑩⑪中国军网：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烈士王杰日记摘抄 http：//www. chinamil. com. cn/site1/2007ztpdb/2007-05/30/content_ 831386. htm

参考文献：

[1] 周继厚著，《共和国的英雄模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2]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工业学大庆

大庆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工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1964年初，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此后，全国工交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油田先进事迹和经验的运动。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但是旧中国石油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原油产量极低。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原油产量仅12万吨，总共只有8台浅井钻机、40多名石油技术人员。中国的石油市场被外国石油公司垄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十分重视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1952年2月，毛泽东亲自发布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支援石油工业建设。1953年，毛泽东对地质部长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勘察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被写进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1956年2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石油部工作汇报时得知，西北地区、东北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都是很有希望找到石油的。他高兴地说，美国人（指有些美国地质学家）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是有的。为了摆脱对外国石油供应的依赖，地质工作者不畏艰辛，转战戈壁荒滩，进行地质勘察。1958年，经过调查和钻探，在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找到了含油砂层，并初步证实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现大庆市的一个区）隆起地是一个大型构造带。1959年9月26日，大同镇的松基3号井喷出了工业油流。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时值国庆10周年，因此这块油田被命名为“大庆”。[①]

1960年2月13日，根据松辽盆地探井接连出油的新发现，石油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一鼓作气，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大庆油田。2月20日，中央下发文件，批准了石油部关于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大会战的

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战“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大的作用”，要求各地区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并决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年的退伍军人中动员3万人参加大庆油田会战。

进行大庆石油会战之时，也正是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之际。1960年5月，在余秋里、康世恩等的领导下，石油工业部从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了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几千名技术人员和上万名职工，调集了7万多吨器材设备，来到东北茫茫的大草原。当时的环境状况十分恶劣。几万人无房无铺，连生活用具也不够用。但是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自己动手，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利用一切可用之地住宿、办公。有的人劳动了一天，夜晚干脆往野外一躺，几十个人扯一张篷布盖在身上。冬天到了，没有房子，露营是不行的。只能发动群众，一边搞勘探、搞建设、搞生产，一边挤出时间修土房子。粮食蔬菜也供应不上，只能打草籽、挖野菜充饥。后来又发动职工、家属集体开荒种地、养猪等，自给自足，解决生活困难。生产方面也困难重重。由于没有公路，道路泥泞，几万吨的设备器材，只能靠人用手拉肩扛加滚杠的办法，拖到几公里之外的井场上安装起来。设备安装好之后，水供应不上，大家就排成长队，用水桶脸盆从几百米以外的水池打水传递过来，一打就是几十吨，保证了钻井需要。[②]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会战，到1963年底，大庆油田结束了试验性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首先，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项技术难题，建成了年产原油几百万吨的生产规模，实现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大庆油田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特大型陆相砂岩油田之一，探明储量为267 000万吨。从见油到探明油田面积、大体算出储量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勘探速度，大庆油田的打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苏联部长会议正式命名的格林尼亚功勋钻井队1960年用十一个半月时间打井31 300米，而大庆油田的1202钻井队1961年只用九个半月时间就打井31 746米。技术人员在对85口探井资料、2 800多块岩心样品分析数据进行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了对多油层油田分层开采，对含蜡多、凝固点高、粘度大的原油的集中和输送等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三年内大庆油田共用国家投资7.1亿元，除收回全部投资外，还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③]其次，通过此次石油会战，不仅培养出了一支阶级觉悟高、技术素养好、能吃苦耐劳的优秀的石油工业队伍，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庆人积累了丰富的油田生产管理经验。大庆油田是中国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和能力



建设起来的。大庆工人以“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三老”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指的是严格的要求、严格的组织、严格的态度和严格的纪律。“四个一样”是指黑夜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在场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正是凭着这样的奋斗精神和“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仅用 3 年的时间，大庆人开发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大型的石油化工生产基地。在建设油田的过程中，大庆人还摸索出一套适合我国实际的企业管理经验。主要有：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依靠群众和实行以“岗位责任制”（包括岗位责任制、交接班制、安全生产制、巡回检查制、设备维护保养制、质量负责制、岗位练兵制、班组经济核算制）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矿区；加强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建设一套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和一支素质良好、技术过硬、吃苦耐劳、具有“三老四严”作风的职工队伍。

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在中国石油发展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从此以后，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毛泽东对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初步成果十分满意。1964 年 1 月 7 日，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时，毛泽东指示报纸要写点新鲜事物，报道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并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他们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的一些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作参考。通知发出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1964 年 4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袁木、范荣康合写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报道了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祖国开发石油奋力拼搏的感人事迹。同时，还发表了“编后话”，指出：“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人民日报》接着又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大庆油田的报道。同年 12 月 21 日至 1965 年 1 月 4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

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指出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

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在“大庆精神”的感召下，许多文艺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陆续来到大庆，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电影《大庆战歌》、话剧《初升的太阳》、歌曲《大庆家属闹革命》，以及后来创作的电影《创业》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中央文件的传达和新闻媒体、文艺作品的广泛宣传，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64 年 4 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工交会上谈到学大庆的问题时曾说：“学习大庆把革命干劲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的经验，这很重要，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到处有大庆，……大庆是全国的标兵，每个城市、每个县、每个厂矿还要树立自己的‘大庆’。”“处处有大庆，就可以有秩序地学，持久地学，不是学一阵就停下来了。过去就有这种毛病，今后就可以克服，把学先进持久地进行下去。”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了各地职工的革命精神。到处以大庆为榜样，开展比学赶帮、实行增产节约；学习大庆人、争当“五好”职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掀起生产建设新高潮。各地涌现出了许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典型，也产生了一些大庆式的企业。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地方流于形式，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有的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讲科学、蛮干硬干，生搬硬套大庆的做法，在经济上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业学大庆”运动受到抵制。林彪、“四人帮”诬蔑大庆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把大庆的基本经验攻击为“修正主义”的东西，还鼓吹“不搞科研照样出油”，造成油田生产管理的混乱。同时，他们不准宣传大庆，不许学大庆，反对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7 年，周恩来在关于大庆军管的文件开头亲自加上“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并说明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1970 年，在《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周恩来指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在周总理的深切关怀下，处在困

 

境中的大庆广大干部职工深受鼓舞，许多基层干部白天挨批斗，晚上回去抓生产，坚持采油。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庆油田原油产量持续增长，1976 年达到 5 030 万吨，对于维持特殊情况下的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50 多年前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对于当时振奋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2009 年，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 20 亿吨，上缴利税达 1.7 万亿元，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时值大庆油田发现 50 周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到黑龙江省考察工作。在大庆油田考察时，他高兴地说：“你们提出的‘超越权威、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口号很有气魄，要继续弘扬这种精神，瞄准更高目标，攻克更多难关，使大庆油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为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胡主席还表示：“希望大家高扬钢铁 1205 钻井队的旗帜，发扬优良传统，继续艰苦创业，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注释：

①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59 页。

②③陈清：《工业学大庆运动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版，第 814 页。

参考文献：

［1］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年版。

［2］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3］人民网，从毛泽东“工业学大庆”到胡锦涛“大力弘扬大庆精神”，2009 年 6 月 29 日。

［4］张静如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 年版。

农业学大寨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20世纪中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1966年，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大寨地处昔阳县城东南海拔1 000米的虎头山下，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自古就有“七沟、八梁、一面坡”之称。这里80%是坡地，20%是沟凹地，没有一分是平地。800多亩耕地被分割成4 700多块，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亩产不到200斤。平时人畜用水紧张，可一旦赶上雨季，山洪暴发，全村顷刻间又会变成汪洋一片。要想改变贫穷的面貌，只能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1952年，36岁的陈永贵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1953年，响应中央号召，大寨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凭着镢头和箩筐、铁锤等简陋工具治山改土，一干就是十年。没有炸药，没有机械，只能用镢头、铁锹、钢钎、大锤把怪石移开，把荆条除根，修平荒地。砸下的石头和铲下的土填在沟里，再垒上一层层石坝，形成一片片阶梯形的土“台子”，这就是著名的大寨梯田。从1953年到1962年，大寨人劈山填沟，重新安排山河，在7条山沟里垒起了总长7.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4 700多块地修成了2 900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好地。平均亩产从65公斤上升到385公斤，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超过500公斤，这个产量甚至比当时江南一些地区的产量还要高。在中国农业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①]

大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昔阳县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典型。1959年，昔阳县在全县范围开展了“学大寨，赶大寨”的群众运动，陈永贵受到了表彰。同年，作为昔阳县农村党支部书记标兵，陈永贵赴京参加了国庆10周年庆典。12月，晋中地委在昔阳县召开整风整社现场会，初步总结了大寨精神。大寨同抗战时业已出名的老典型白羊峪、刀把



口并驾齐驱，被称为“昔阳三枝花”。晋中地委上报的《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视。1960 年 2 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6 月 18 日《山西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充分肯定了陈永贵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参加劳动中所做出的成绩。

1963 年 3 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7 月 17 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的社论。社论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而陈永贵正是这样的典型，其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8 月份一场特大洪水袭向虎头山。8 月 1 日，陈永贵离开村子去参加昔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2 日大雨来袭，会上的陈永贵心急如焚。大雨整整下了 7 天 7 夜。全县平均降雨 590 毫米，是去年全年的雨量，实属百年不遇。虎头山的 7 条山沟浊浪滔滔，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8 日下午会议结束，陈永贵急匆匆往回赶。回到村里，他得知全村的 800 多亩土地中，有 139 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 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 620 亩也几近于绝收。淤没粮食 11 787 公斤，其中集体 4 805 公斤，社员户 6 982 公斤。洪水还毁掉了村民们的家。全村 270 间窑洞和房屋，塌了 190 间，63 间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 17 间。80 户社员，78 户塌房无家可归。[②]好在没有人员伤亡。陈永贵说：“人没事就好，只要人还在，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体，还战胜不了这点灾害？洪水冲走了一个破烂的大寨，咱们再用自己的双手建一个新大寨。”此时的大寨在山西省已声名远扬，大寨遭了灾，各界人士纷纷来信、来电要求给予支援。但是，无论是医疗费、救济被服还是救济粮，均被大寨人拒绝了。陈永贵说：“有我们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根扁担俩箩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党支部对全体社员宣布：“大灾之年，我们不要救济物资，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还要做到粮食亩产不少，群众口粮不少，上交国家公粮不少。”等到秋收时，核实当年的收成。据村里干部赵素恒的报告统计，1963 年大寨有收成土地 564 亩，粮食总产 21 万公斤，仅比拥有 712 亩粮田的上年少产 6.6 万公斤，亩

产 372.5 公斤，同去年接近；卖给国家粮食 12 万公斤，社员口粮 200 公斤，皆达去年水平。与此同时，一排排新窑洞、新房屋也立了起来。[③]

1963 年 11 月，昔阳县委和山西省委先后发文肯定大寨抗洪壮举，号召向大寨学习。12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又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名为《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的报道，高度赞扬了大寨人所取得的非凡成绩。

1964 年 1 月 19 日，全国水利系统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大庆经验。会议期间，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希望水利战线上也能树立一个大庆那样的典型，参会的山西省水利厅代表便推荐了大寨。于是，北京市委和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机部、石油部等各中央单位的干部，同参加北京市六级干部会议的农、林、水及郊区公社、农场负责人等 1 万多人，听取了陈永贵做的报告。会后，北京市委印发了陈永贵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号召北京郊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向大寨人学习，北京地区掀起“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的宣传热潮。5 天以后，《北京日报》又以《大寨——我们的一个好榜样》为标题，详细介绍了大寨的经验。一时间，陈永贵和大寨成为京城人热议的话题。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社论说，大寨人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那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3 月 28—29 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得知了 1963 年大寨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事迹以及大寨干部注重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的一些情况。他十分赞赏大寨和陈永贵的做法。4 月 20 日，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以及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受周总理的指示，到大寨进行调查研究。经过 21 天的实地考察，廖鲁言一行向党中央提交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5 月 10 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大寨，他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显然，毛泽东这时已十分关注大寨这个先进典型。

 

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同时，周恩来对“农业学大寨”学什么的问题作了精辟的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把大寨树为典型。1966年8月12日，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此，“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传遍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人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大寨参观学习。在大寨精神的影响下，全国众多省份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农业学大寨运动被引到“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寨由“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变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转变为大力宣传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经验。学大寨本来是农业战线的事，但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文化、财贸、卫生、公安等各行各业都被要求学大寨。学不学大寨的问题不仅被当做认识问题，而且被当做立场问题、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范围更广泛地展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要求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先后结束。

从1964年至1978年，历时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总结的学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农民们自力更生，不依赖国家的支援，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不搞特殊化，使干群关系更加紧密。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使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大寨成为农业战线

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走向了反面。1979年10月，晋中地委在向中共山西省委报送《关于联系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总结了这个时期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把大寨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神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典范”和“全面专政”的典型，扩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二是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三是把农业学大寨同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对立起来，妨碍了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

注释：

①②③李砚洪：《大寨传奇：“农业学大寨”的前世今生》，《北京日报》，2009年7月17日。

参考文献：

[1] 参见中国新闻网，“共和国60周年记忆”：“农业学大寨”激情仍在燃烧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8-31/1841641.shtml

[2] 历史回顾：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前后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团结出版社。

[3] 吴明，农业学大寨运动始末，武汉党史网，

http：//www.whds.org.cn/content.jsp? id=3015

[4] 中国网，周德中，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和结束 共和国重大决策之十八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08/22/content_18381548_2.htm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

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也逐渐在全国各地兴起。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全国出现大面积的严重饥荒。在三年困难时期，盘踞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趁机扩军备战，开始实施其“反攻大陆”的计划。国际上，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仍然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一边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武装侵略干涉和经济封锁，一边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渗透。中苏两党开始了在意识形态上的论战，“反修防修”成为当时工作的主要任务。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60年9月，林彪在北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做工作要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靠群众路线，靠人的觉悟。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贯彻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不打好思想仗，其他仗就打不好。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的建设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紧紧掌握这个方向。”①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接着，林彪指示部队大力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著作，大力提倡“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提倡将军下连当兵深入基层，并在基层连队广泛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活动和群众性练兵活动，使整个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全军部队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开展节约运动，与国家共渡经济难关。这一时期，解放军每年为国家捐出几百万斤粮食。在节流的同时，军队还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到1962年，经过解放军全体人员的努力，军队已经做到蔬菜基本自给，肉食自给率达到50～70%，粮食和食油自给达到10%。②

1963年2月，总政治部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参谋部长罗瑞

卿在会上提出了注意宣扬典型、运用典型的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总政治部随即向全军发出学习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通知，在全军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3 月 5 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题词过程中，毛泽东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事情，也不是学他某一方面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③]对“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个集体的典型，毛泽东也十分关注。1963 年 8 月 1 日，在建军 36 周年之际，毛泽东挥笔为南京路上好八连题写了杂言诗《八连颂》。对于军队出现这样的好典型，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

1963 年春，在我国工业战线上开展了一个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群众运动。在比学赶帮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同时，毛泽东也在思考着怎样用军队来推动地方的工作，如何推动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这一时期解放军的表现，毛泽东是很满意的。

1963 年 12 月 15 日到 1964 年 1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加强工业交通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地武装干部和工人的头脑，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创造‘四好连队’的经验，使广大职工群众更加革命化”。[④]毛泽东在会上作出了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会议迅速对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传达，而且会议还把“在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的指引下，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写入 1964 年工业交通战线的任务中。

12 月 16 日，毛泽东致信军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向他们正式提出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问题。信中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



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⑤

12月19日，薄一波又将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报告说：“石油工业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抓得比较好，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结合石油工业的具体情况，成功地运用了解放军成套的政治工作经验。石油部为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⑥

毛泽东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传达下去后，中共各级组织立即开始行动起来。

1964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社论《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说：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这些方面的宝贵经验学到手。同时《人民日报》还在第二版开辟专栏《学习解放军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精神》。“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运动序幕正式揭开。

1964年2月11日，北京举行了盛大的春节新春拥军优属联欢晚会。会前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了出席联欢会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四好连队、四好单位、五好战士、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的代表和军烈属、复员军人代表，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并号召人民群众要向解放军学习。

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后，尤其是《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发表后，中央各个部门马上行动，迅速召开会议进行落实。除了正式的会议外，各部门和各单位还抓住集会的时机，采取座谈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使群众认识到学习解放军的必要性。各级组织还抓住农历春节之前开展拥军活动的时机，组织群众到军队慰问联欢，面对面感受人民解放军，向人民解放军学习政治工作的经验。

1964年2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把三八作风传到全国去》，提出“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三八作风的重要性，进行反复的教育，启发群众的自觉”，“促进全国人民的革命化”。3月10日，《人民日报》再发

社论《学习解放军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从1964年2月起到当年年底几乎每天都有"学习解放军"的相关报道或者社论刊载。一些报刊还提出了学习解放军的具体措施。如《北京日报》提出要改进版面设计，加强政治工作，克服机关化的作风；《光明日报》提出要抓典型报道，加强学术报道，面对现实斗争。《大公报》则提出首先要抓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⑦

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学习解放军的需要，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政治工作》、《毛泽东同志论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同志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言论摘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八作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建设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时立功条例》九本介绍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书，专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些相关书籍。美术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宣传画，宣传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1964年3月21日，全国妇联同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举办学习解放军电影展览"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大中城市举办学习解放军电影展览。从4月10日开始，电影首先开始在北京等部分地区上映，全国其他地区也先后陆续开始进行。为了配合运动的进行，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摄制了《雷锋》、《好八连归来》、《战士挥笔画英雄》、《军垦战歌》、《英雄工兵》等一批电影。⑧

整个1964年是学习解放军运动的高潮期，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化部门、教育部门，都积极开展了这项活动，全国上下几乎利用各种渠道、手段来宣传学习解放军。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解放军与大庆、大寨一起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1965年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的报告》，《报告》里提到"一年来，各级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学习了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的经验，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是有进步的"。各级工会要"组织职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同工会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使'四个第一'落实到职工生产、生活、教育和家属工作中去。"5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工业



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指示，是十分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要求“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并决定在全国工业交通部门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⑨“学习解放军”、“大学解放军”成为中共中央文件的一种常用语言，并且通过文件直接渗透到党的日常工作中。

在学解放军运动过程中，解放军不仅派出大量人员到地方进行宣讲，还为地方培训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干部。通过学习解放军，使解放军作为“最可爱的人”的良好形象在社会上得到进一步确立，而且密切了军民关系。学解放军运动的开展，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热情，为我国战胜各种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阎峻：《林彪文章辑录——建国后》http://www.oklink.net/online/tougao/87864/152882.htm

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页。

③雷润明：《雷锋登上〈人民日报〉的前前后后》，新华网北京频道。

④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54～456页。

⑥《薄一波文选（1937～1992年）》，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02～303页。

⑦⑧⑨于兴卫：《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第52页，第56～58页，第49页。

参考文献：

［1］于兴卫，《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2］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徐晓莉，《“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运动述略》，《党史文苑》，2009年第4期。

三线建设

1964 年到 1980 年代，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 13 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国防科技、工业交通为基础的经济建设，亦称“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一般是指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西南的川、贵、云三省和西北的陕、甘、宁、青四省合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根据当时比较稳定的国际形势，曾预计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国际战争，遂提出要充分利用这一时期支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入 60 年代之后，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在东面和南面，面临着美国军事力量的重重包围。美国插手越南战争，中国对越南人民的支持，引起美国的敌视。美国的军用飞机不断侵入中国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中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在台湾海峡，美国派军舰、飞机不断侵犯我国的领海、领空，进行军事挑衅，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袭击大陆。在北面和西面，又面临着苏联军队的巨大压力。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导致中国多数重大项目无法继续开展。而且，中苏边境冲突不断。1962 年，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了大批中国居民外逃事件。1963 年 7 月，苏联又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针对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后来，苏联派兵进驻蒙古。在几年之内，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派驻的军队达近百万人，严重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鉴于上述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得不对经济发展总体战略重新考虑。毛泽东想到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曾在乌拉尔以东地区建立的工业基地，联系到中国的情况，认为应该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

1963 年，中央确定的“三五”计划目标是集中解决人民的吃、穿、用



问题，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4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看到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呈交的一份《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的工业布局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港口码头也多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容易遭到破坏。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少，一旦发生战争，将难以应对。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在接下来 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中央工作会议决定，遵照毛主席的意见修改“三五”计划，把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结合起来。8 月 19 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决定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负责筹划有关三线建设的事宜；确立了今后建设方向要转向二、三线，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都要向三线迁移；同时还提出了“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①]

1964 年 8 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国务院成立了各级专门机构：由国家建委负责一、二线向三线地区的迁移；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全国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材料、设备；国家计委负责三线地区新建、扩建工厂。此后，三线建设进入实施阶段。搬迁工作紧张而又迅速地在全国秘密展开。

从 1965 年至“三五”时期为“三线”建设的第一阶段。1965 年 3 月 24 日，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成立。3 月 29 日，成立了以李井泉为主任的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1966 年 1 月，以刘澜清为主任的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3 月，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为主任的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三线各省、自治区同时也成立了相应的三线建设领导小组。从中央到地方，三线建设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集中指挥系统。中央和毛泽东决心用 10 至 15 年的时间把三线建设起来。9 月 18 日至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报送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提出了“三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重点对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做了详细的安排。关于投资分配：按地区分，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占全国的比例约为 40% 以上，西南地区约为 208.3 亿，占 24.5%；西北地区约为 105.3 亿，占 12.4%；湘鄂西地区约为 19.5 亿，占 2.3%。按部门分，各部门中三线地区投资的比例，国防工业 74%，冶金工业 58%，铁道工业 45%，电力工业 40%，煤炭工业 35%，石油工业 30%，化学工业 48%。三线地区计划建设大中型项目共 823 个，其中国防工业 320 个，原材

料工业126个，机械制造175个，燃料动力66个，铁道45个，其他部门，包括纺织、建工、轻工、地质、交通、民航和文教卫生等共75个。从《汇报提纲》中的安排可以看出，国家对三线地区的建设极为重视。[②]

在第一阶段，重点放在打基础方面。国家投入资金560多亿元，主要用于成昆、滇黔、川黔三条铁路，攀枝花酒泉钢铁厂和重庆工业基地的建设。经过1964年至1966年近两年的努力，三线建设进展迅速。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300多项。1966年4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报指出：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正在进行的三线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从1967年到1969年初，许多建设项目，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的状态。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在边界举行副部长级的谈判，但未取得任何进展。为抵御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三线建设的诸多项目得以恢复实行。1970年起，三线建设进入第二阶段。

1970年2月，《“四五”纲要（草案)》强调，要重点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争取在1972年把战略基地基本建设起来。纲要对三线地区的建设作了总体部署：到1972年，三线地区将基本建成一个具有比较强大的重工业和比较稳固的农业基础的战略基地。到1975年，三线地区将建成一个部门齐全、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的战略基地。钢的生产能力将达到1 750万吨，接近现在的全国水平。10种有色金属100万吨，占全国55%。煤2.1亿吨，占全国44%。拥有纱锭572万枚，占全国39%。直接配合军工的钢材、有色金属、稀有金属材料和国防化工产品，大多数在数量上将超过目前全国的水平，能够立足于本地区，成套地大量生产各种常规兵器和尖端武器，成套地生产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设备。[③]

“四五”纲要出台以后，三线建设再掀高潮。成昆、湘黔、南疆、焦枝等铁路都是这一时期的建设成果。湖北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秦岭火力发电厂，以及四川西昌航天发射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等，也是这个阶段建成的。1972年以后，经党中央的批准，国家计委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先进化工、化纤设备，在三线地区建立了四川化工厂、云南天然气厂、洞庭氮肥厂等多个大型化工企业。



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决定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1980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发展滞后。1983年12月，中央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如位于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一批重要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的修建，改变了西南地区落后闭塞的运输环境，为三线地区与一、二线地区的交流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的建立，增强了我国的国防科技实力。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三线建设也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为这些地区日后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三线建设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抢时间、争速度，结果一些建设项目未经周密勘探就盲目定点；当时还采取"三边"原则，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没有搞好总体设计就全面施工；片面追求速度，忽视施工质量；辅助和配套设施没有建成就凑合投产。不仅造成了许多返工浪费，而且把一些工厂建在断裂层、滑坡带、山洪口或缺水区，遗留一些以后不好解决的工程建设问题。而且，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抑制了消费，使人民生活受到了影响。"三五"、"四五"时期，职工工资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这一时期，全国消费水平是1949年以来增长最慢的。再者，由于集中建设三线地区，全国有380多个项目、14.5万人、3.8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到三线地区，忽视了

沿海老基地的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累计三线地区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整个内地建设投资为611.15亿元，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6.8%，沿海投资为282.91亿元，占30.9%。在底子厚、本来能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沿海地区，投资相对严重不足，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也影响了整体国力的增长。

注释：

①②③陈东林：《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曲折探索1956—1966》，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第552～553页，第561页。

参考文献：

［1］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曲折探索1956—1966》，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3］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百度百科，三线建设 http：//baike.baidu.com/view/798186.htm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继美国、苏联、英国 、法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分别投下了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二战"结束。但是，当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中国的核科学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真正开展起来的。1950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托人传话给毛泽东，告诉他，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早在1950年，美国当权者为了挽回朝鲜战场接连失利的战局，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1月30日，合众社报导说，杜鲁门总统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导："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3年，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而做准备。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①]此时，毛泽东完全意识到：美国当权者之所以敢动辄向我国进行核威胁，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国

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指出：“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此次会议作出了创建中国核工业、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9 月底，赫鲁晓夫访华。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但是，赫鲁晓夫总是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核武器贮存时间长了还要变质淘汰，重新投资生产，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中国不必再搞为借口，没有同意。[②]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受到考验。此时的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于是，在对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苏方改变了原来的态度，事情出现了转机。

1957 年 10 月，经过多次谈判，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协议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1958 年 10 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任副主任，领导国防科学技术工作。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于 1960 年 7 月 16 日撕毁协议，并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8 月 23 日，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 200 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国际上有人认为，离开苏联的帮助，中国再过 20 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国内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继续研制下去；另一种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11 月 14 日，张爱萍等人经过调查研究，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 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



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毛泽东审时度势，最后决定，继续研制原子弹，并提出“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口号。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分配到每个人，开始全面攻关。

1962年11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任主任、罗瑞卿任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及中央军委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专门委员会。按照“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原则，集中最大的力量研制原子弹，在全国选调100名技术骨干，6 000名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原子弹研制队伍。对于其它一些尖端武器发展项目，除保留一定的骨干力量继续攻关外，暂缓进行。[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协同作战。经过1961、1962两年的艰苦实践，我国核工业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广大科技工作者在艰苦的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反复试验论证，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3年3月提出了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研制的过程异常艰苦。首先，同步聚焦就是一个难关。美国人在1954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一颗是“枪法”型，另外两颗是“内爆”型。“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表明下一步有可能研制出氢弹。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内爆”型就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④]但是，当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样就无法实现核裂变。所以，必须想办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作同步聚焦。中国科研人员历尽艰辛，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最终实现了同步聚焦。1963年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其次，经过不懈地努力，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研制出来了。铀-235研制过程是一件系统工程，整个过程十分繁杂。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一步筛选，一步一步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整个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行。每一道工序又都有极其严格的技术要求，完成这一任务，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1964年1

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最后，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至关重要。这是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是否能同步起爆。此次试验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然后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最后插雷管。铁塔高102米，竖立在大戈壁，因为当地多风沙，早晚温差很大，技术人员在铁塔上工作非常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就是铁塔的自然摆动。⑤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要把数量甚多、危险甚大的雷管插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的技术人员不畏艰险，克服重重障碍，顺利地完成了最后关键的一步。

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零点定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10月14日下午7时20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吊装到罗布泊地区已竖好的铁塔顶部。10月16日早晨6点30分，在完成了爆炸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联结雷管，全体工作人员于12时56分撤离完毕。

下午2时59分40秒，主控制站技术人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工作状态，倒计时从十到零点顺序跳动。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成功了！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他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对此进行了报道。国内、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讲话，贬低中国原子弹试验的成就，还说中国人造成了空气污染。中国政府在新闻公报报道中明确地表示：“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试爆成功是全国上下共同协作的结果。除了核工业部门的主力技术研究外，其他相关部件、器件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还涉及机械、电气、电子、轻工、化工等许多行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国人自力更生、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而且，这是中国国防科技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注释：

①青海新闻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始末》。

②军人生活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背后的十件大事》。

③④⑤中国军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参考文献：

[1] 张静如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2]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两种教育制度的再次实施

两种教育制度是指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农）半读学校同时存在的学校教育制度。它是由刘少奇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并倡导的新型教育制度。全日制学校由国家主办，学生在校期间整日进行学习；半工（农）半读学校多由厂矿、企业、公社主办，或在中等技术学校、大专院校附设半工半读班，学生一部分时间学习，一部分时间劳动，根据情况可实行“4·4制”（每天4小时学习，4小时劳动）、“6·2制”（每天6小时学习，2小时劳动）或“隔日制”（隔日学习或劳动）等形式，学习内容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两种教育制度的首次试验是在1958年。1957年11月8日，《参考资料》刊载《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二半工半读》一文，刘少奇看后批示道：“此件送团中央一阅。中国是否可以个别试办？请你们研究。”此后，共青团中央印发了这个批示，各地开展了讨论并进行了试点。1958年1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西安第一航空技工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经费自给自足的做法，同时还发表了陕西省委负责人的谈话，提倡大力推广该校的做法。5月27日，天津国棉一厂所办全国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开学，51名学员，每天工作6小时、学习2小时。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从制度变革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半工半读教育的意义，正式提出了“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8月1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开学，除总校外，还在全省各垦殖场设有30所分校。毛泽东肯定了这种“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的办学方式。在此前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举办半工半读的工人学校》等社论，《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文章。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今后半工半读学校将与全日制学校、业余学校同为我国三类主要学校。天津作为半工半读学校的主要发源地和试验地，曾有100多家企业试办。



1958 年由于受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各地师生都积极投入到劳动中，教学工作基本停顿下来，两种教育制度的实施也暂告一个段落。

1964 年，刘少奇再次向中央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想到国家今后 50 年、100 年的发展前途，他认为，只要坚持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经过 50 年到 100 年，中国的工人就能够有 70% ~80% 是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农民的半数是半工半读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工人、农民都有相当高的文化，在他们本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没有多大了，开始消灭了，那时我们国家的情况就会同今天大不相同，整个劳动生产率将大大提高，消灭三大差别的阻力就小得多了，就有希望进人共产主义。教育是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知识水平、改变国家面貌、实现人类崇高理想的重要途径，无数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证明，只有极大地提高全体公民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使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

1964 年 7 月，刘少奇到天津、上海、济南、安徽等地视察。他在谈话中指出："现在的全日制学校还不能不要"，"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再办那种半工半读的学校"。在向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党员干部作报告时，他也多次讲到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7 月下旬，中央学制研究小组邀请了中央各有关部门和 13 个省、市、自治区学制小组的代表召开会议，共同草拟了《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方案提出，建立两种教育制度，一方面继续改革和办好全日制学校，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各级各类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和业余学校。提出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也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肯定与赞同。8 月 1 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党内报告会上，刘少奇进一步阐明了"半工半读，亦工亦农"的构想："我所说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有一部分是结合的，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又是学校制度。就是在农村里面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工厂里面办半工半读的学校。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读书，或者一个星期做工，一个星期读书。要把这种制度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正规的教育制度。"在他看来，从当前来说，只实行一种学校制度，实行当时那种学校制度，是不能普及教育的。因为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从长远来讲，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他还谈到，天津、

上海、江西劳动大学，江苏、广东办的农业中学，和其他地方的工业中学，都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经验。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是比较好的。他们能文能武，就是说，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既能当工人、当农民，又能在科室办事，在研究机关工作；有些还当了技术员。他语重心长地说："必须使我们的工人、农民有文化，而且是有相当高的文化，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个面貌才可以改变，才可以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将来才有希望进入共产主义。"最后他还指出，我国现在的教育制度必须改革，现在的全日制学校还不能不要，还是需要的。但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可以办，以后可以多办。要通过试办，取得经验。一种新的学校教育制度，至少要5年才能初步总结经验，10年才能总结出比较成熟的经验，加以推广。因此，他主张每一个省，每一个大中城市，都来着手试办这种半农半读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应该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农业高级师范、工业高级师范和中级的农业师范、中级的工业师范。要利用现在的国营农场、工厂、中等技术学校或大学，来办一些这样的师范学校，重新培养教员，将来去教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他们将来是半农半教，半工半教，做半天工，教半天书，或者是种半天地，教半天书，不要完全脱离生产。要培养这种新的教员，新的校长。"①

"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是刘少奇将马列主义关于教育问题的思想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改革原有教育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崭新教育事业的一项战略措施。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教育方面"必须根据刘少奇主席的指示，在今后若干年内，一方面对现行的全日制学校制度继续进行改革，认真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且充分依靠群众，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普及小学教育；另一方面要试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②

为了加强对半工半读的领导，刘少奇亲自任中央教育组长，还指出"要成立第二教育厅，专管半工半读学校"。农业部、卫生部、化学工业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等相继召开会议部署落实，中共中央转发江苏省《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定（草案）》，天津、沈阳、北京等地



相继试办了一批半工半读学校。

刘少奇重新提倡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以后，各地城乡都进行了试点。1965 年，两种教育制度的实施在全国进一步铺开。

1965 年 3 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会议总结和交流了各地试办半农半读学校的经验。会议期间，刘少奇听取了何伟、刘季平的汇报，并对有关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何伟说，各地各级党委对半农半读教育都非常重视，现在农村耕读学校发展很快，耕读小学已发展到 40 万所，有学生 1 360 多万人，农业中学也发展到 1.9 万多所，学生 113 万多人。陆定一说，1958 年时农业中学最多有 2 万所，学生 200 万人，到 1962 年下降到 3 700 多所，学生剩下 26 万人。现在小学已经赶上 1958 年了，农业中学还没赶上。刘少奇提出，教育部还是要搞点基本建设，可以办一些师范学校。“现在看来，中等技术学校是非办不可了。”“你们办这样的学校，要有志愿的校长、志愿的教师。教育部必须抓教员、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会议认为，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学习大寨、解放军的革命精神，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实行全日制和半农半读两条腿走路，普及小学教育，扩大试办农业中学，积极试办半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7 月 14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从 4 月 7 日到 10 月 29 日，《人民日报》开辟专栏，共出 15 期，对《怎样办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新型学校》进行了积极的讨论。据 1965 年统计，全国 66 所高等农业院校，试行半农半读的有 37 所，307 所中等农业学校中，试行半农半读的有 220 所。

1965 年 11 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教育部汇报关于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的问题。教育部部长何伟和谷牧、徐子荣、张子意汇报了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上提出的几个问题以及小组讨论情况。在会上，周恩来、朱德、彭真、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刘宁一等先后发言。刘少奇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的国民教育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全日制；一种是业余教育；一种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工半读试验的重点是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我们的目标应该培养到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但是也要当工人、农民。”“我的意见，还是坚持五年试验，十年推广，不能动摇，发展不能太快。”“还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会议最后指出：全国各地试办的城市半工半读学校，今后必须坚持“五年试验，十年推广”的方针，坚定方向，继续积极试办，以便掌握它的规律。

1965 年 12 月 25 日至 1966 年 1 月 16 日，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会议确定要按中央的指示，进行半工半读试验和对全日制的改革。

刘少奇从我国当时的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为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变我国教育落后的面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64 年两种教育制度的再次实施，将 1958 年的教育改革扩展到整个教育领域，不仅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且为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据粗略统计，1965 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全国半工半读学校由 1 700 多所增加 4 000 余所，学生由 26 万余人增加至 80 多万人；1965—1966 学年初，全国 434 所全日制高校中的 177 所学校、477 个专业，开展了半工半读教育试点。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导致学制混乱，半工（农）半读学校被全部砍掉，中等教育结构遭到严重破坏，成人业余教育也基本上荒废了。

注释：

①《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八卷第二节：《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缩短学制的试验》。

②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54 页。

参考文献：

[1] 李国钧等，《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八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

[2]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两种教育制度 http：//myy.cass.cn/file/2006010618565.html



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

1964 年 12 月 20 日至 1965 年 1 月 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共 1199 人，其中新增补的委员 394 人。委员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的代表人物，还有工农业生产建设战线、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先进人物。郭沫若副主席作了关于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决议。会议期间，全体委员还列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

12 月 2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首先选举产生主席团、秘书长和提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主席团由 84 人组成，秘书长为平杰三，提案审查委员会由 25 人组成。接下来由郭沫若副主席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在报告中，郭沫若首先谈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他说，从 1959 年到今天，五年多的时间里，我国各族人民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不断地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了各个战线上的伟大胜利。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国际国内的形势，是对世界革命人民有利、对我国人民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大好形势。从国际上看，“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更加明显。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力量在增长，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成为当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垄断资本、争取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的斗争，也在日益加强。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在逐步扩大。美帝国主义推行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激起了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勒紧了套在它自己脖子上的绞索。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重重，越来越四分五裂了。赫鲁晓夫的下台，表明了适应帝国主义需要

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破产，这是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大失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胜利。从国内方面看，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越来越显示它的威力。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过去较高年份的水平。工业生产不但产量全面上升，品种和质量还有了新的跃进。现在，我国已经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大家知道，今年十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和整个经济情况的好转，集中地表现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表现了我国经济力量、国防力量的增强。这些事实都充分地证明了党的总路线的完全正确，证明了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在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郭沫若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是在进行反复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取得的。接着，他主要讲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过去的五年中所作出的成绩，并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成绩主要有：1. 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常务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双周座谈会，讨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并多次组织委员们到许多城市、农村进行视察和参观访问。还开展了许多经常性的活动。采取多种方式密切同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联系，活跃统一战线工作。2. 推动各界人士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多次作出了关于开展学习的决议和号召，并且协同各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组织和推动了经常学习；还推进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3. 在国际活动方面的工作。声援古巴、越南、巴拿马、刚果（利）等国人民和美国黑人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同有关单位联合举行了庆祝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万隆会议等活动。五年来，还接待了从世界五大洲四十三个国家来我国访问的许多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情况并且交流了经验。这些活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加强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工作起了积极作用。①但是，他又指出，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希望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在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加强下面几项工作：1. 进一步推动各界人士同全国人民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周围，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为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2. 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党与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各种政治活动。要密切同各民主党派、有关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和批评。3. 要积极推动各界人士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国内外阶级斗争中，进一步认清形势，分清是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提高自我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4. 坚决拥护加强国防、全民皆兵的方针，为保卫祖国安全、解放台湾而斗争。5. 坚决拥护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斗争。②

最后，郭沫若指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面临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这边，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把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继续站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原来立场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即反对社会主义呢？两条道路是不可调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死胡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的康庄大道。希望一切爱国的、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能够主动地认识这个问题，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关。不仅自己过好这一关，还要教育自己的子女成为社会主义的年青一代。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的人民政协，一定会在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就。

12 月 21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政协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了会议，听取了周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12 月 23 日，政协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始进行分组讨论。在这次会议的整个大会讨论中，有 179 人先后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

1965 年 1 月 5 日，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意郭沫若副主席的报告，热烈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后，政协全国委员会应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继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错误，认真贯彻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方针任务，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且团结、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其他爱国人士，调动他们的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决议》还说，我们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一切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积极投入这个运动，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兴无产阶级思想，灭

资产阶级思想，过好社会主义关。我们坚决拥护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③

全体委员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周恩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彭真、陈毅、叶剑英、黄炎培、陈叔通、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蔡廷锴、韦国清、邓子恢、李四光、傅作义、滕代远、谢觉哉、沈雁冰、李烛尘、帕巴拉·格列朗杰、许德珩、李德全、马叙伦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平杰三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当选的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共159人。

大会还听取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通过了关于提案审查的决议。下午五时，周恩来主席宣布大会闭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历经17天，圆满地完成了既定议程，胜利结束。此次会议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几乎同时进行。会议不仅回顾了五年来政协工作的成就，对今后政协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而且，深切地表达了全国各界人士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和爱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支持和信心。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报告中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左”的倾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协被迫停止活动，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只举行了这一次会议。

注释：

①②《人民日报》，1965年1月1日第3版。

③《人民日报》，1965年1月6日第1版。

参考文献：

［1］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段永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1949-1989），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朱阳，任永祥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新华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3/content_2085363.htm



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3 040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1965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选举和决定了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即“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会议还分别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

为了摆脱“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日益困难的局面，从1961年起，国民经济开始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1962年1月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提出继续坚持调整的方针。会后，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使国民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经过四年的调整，到1964年，工农业生产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有了全面好转，并且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64年12月20日，首先举行了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会议主要听取了彭真副委员长关于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通过会议议程，选出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主席团和秘书长，并通过全国人大三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人选。

12月2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下午3时30分，刘少奇主席宣布会议开幕，全场起立，乐队高奏国歌。接着，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分三个部分：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

周总理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几年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曾经遇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1959 年到 1961 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而赫鲁晓夫在 1960 年背信弃义地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退苏联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四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三年大发展时期的成就，纠正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克服了重重困难，健全了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工业产品质量、品种的新的跃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接着，周总理从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四个主要方面，概括地论述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第一，农业生产前两年连续增产，今年又获得了更好的收成，达到了过去较高年份的水平。1964 年，全国拥有的农业用拖拉机台数比 1957 年增长 4 倍，排灌设备的马力增长 12 倍，农村用电量增长 22 倍，国家供应的化学肥料增长两倍以上。第二，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品种、质量出现了新的跃进。1964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预计比 1963 年增长 25% 以上，比 1957 年有了很大的增加。钢、石油、化学肥料、水泥、汽车、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工业产品，1964 的产量都比 1963 年增长 20% 以上。四年以来，主要工业产品的品种大约增加了 24 000 种，比 1958 年到 1960 年大发展时期所增加的品种还多两倍。产品质量普遍提高，经营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改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第三，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货币信用提高，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同 1957 年比，1964 年供应的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都增长 30% 以上；机制纸、铝制品、搪瓷制品、自行车、收音机等主要日用品，增长 50% 以上。[①]商品供应比较充裕。第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研究水平有所提高。近几年，教学工作有所改进，教育质量得到提高。各地试办了一些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新型学校，提高了工人和贫农下中农子女的入学率。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了医药、卫生工作，提高了医疗技术。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有了较大发展，体育队伍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队伍日益壮大，已



经有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可以达到先进水平。

周总理强调，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还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 14.06 亿新卢布，剩下的尾数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而且，我们还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1965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在更深入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为 1966 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接着，他又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实现“四化”的宏伟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第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第三，实行技术革命。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接下来周总理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取得的。从 1959 年到现在的五年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是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伟大动力。他指出，目前正在我国农村和城市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着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个运动，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对于发展生产，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周总理还指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胜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他说，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爱国人士、爱国华侨和其他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于胜利地推

进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相信，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定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在支持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由于受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报告过分地强调了要加强阶级斗争和反对帝、修、反。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周总理谈了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工作。他指出，过去五年多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为核心的世界革命人民，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严重的较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贯彻执行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各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仍然是“东风压倒西风”。五年多来，我国人民打退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华高潮。我们的国际威望更加提高了，我们的革命影响更加扩大了。现在，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经增加到五十个，同我国有着贸易和文化联系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达到 120 多个。在这期间，我国领导人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相互访问。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最后，周总理指出，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我们的国际责任也更加重大了。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继续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旗帜，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一起，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一起，同全世界人民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②

12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会上作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报告说，1959 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个时期内，我国的社会治安情况很好，刑事案件总的是一个下降趋势。今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比以前任何一年都要少得多。这说明，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更加巩固。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专门法院，在党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与公安、检察部门密切协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犯罪



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同时，审理了大批民事案件，解决了人民内部纠纷，加强了人民群众的内部团结。[③]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我国整个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加上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坚决贯彻执行了关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方针政策，对敌斗争一直没有放松，治安管理也抓得很紧，全国治安情况是好的，各类犯罪案件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捕人也逐年减少。今年 1 至 11 月，全国发生的反革命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 34%；发生的刑事案件，减少 20%。今年的发案数和捕人数，都是建国以来最少的一年。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坚强的，巩固的。报告最后说，我们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加强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领导干部下去蹲点的制度，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使检察队伍真正成为一支革命化、群众化、有战斗力的队伍，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④]

1965 年 1 月 3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刘少奇继续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刘伯承、李井泉、康生、郭沫若、何香凝、黄炎培、陈叔通、李雪峰、徐向前、杨明轩、程潜、赛福鼎、林枫、刘宁一、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为副委员长，秘书长由刘宁一兼任。选举杨秀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选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96 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 月 4 日，根据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了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

1 月 4 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朱德委员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大会在全体代表雷动的掌声中闭幕。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在国民经济出现好转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提

出要更加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新发展，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些对于团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激励作用。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大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左”的错误倾向。由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第三届全国人大只举行了这一次会议。

注释：

①②《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第1版。

③④《人民日报》，1965年1月1日第3版。

参考文献：

[1] 段永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1949-1989，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新华网，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2/20/content_283401.htm



“三五”计划的编制

“三五”计划是从1964年初开始研究和编制的，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抓备战成为“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不得不进行修改。1965年9月国家计委拟定并经中央讨论基本同意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成为新的“三五”计划并最终得到实施。

1966年到1970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到1967年执行，计划的制定工作则应提前一两年进行。但是，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1961—1962年成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1963年至1965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应该继续进行调整，打下好的底子，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这一主张得到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一致赞同。

在1962年2月底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在《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抑制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要“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①12月31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要“根据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来安排国民经济建设方针。

1963年初，由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8人组成了中央计划领导小组，负责研制长远国民经济计划和“三五”计划问题。2月20日，李富春在讲话中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应当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1964年2—3月间，国务院相继召开全国工交、农业、财贸3个长期规划会议，都讨论了“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 年）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简称《初步设想》），规定“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此外，还提出要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与基本任务相适应，计划工作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首先考虑农业发展的需要，其次兼顾国防工业发展的需要，然后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来安排重工业。这个设想把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吃穿用计划”。5 月 10 日，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了《初步设想》。但是毛泽东对这个计划不是很满意。他担心基础工业搞不好，打起仗来怎么办？接下来从 5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这个《初步设想》。毛泽东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在 6 月 6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他还指出，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主要是学苏联的，我们制定计划应该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分配投资时，应该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是农业。这种想法和《初步设想》中的排序是不同的，基本上否定了中央计划领导小组的计划方案。最后，与会者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赞同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备战。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毛泽东越来越觉得三线建设必须全面展开才行。1964 年 8 月 19 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中央报告进行三线建设的部署和实施意见。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会议决定首先要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明后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一线。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开始转向以加速三线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为中心的轨道。1965 年初，由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陈伯达组成“计划参谋部”（通常称为“小计委”），毛泽东要求小计委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不受其他副



总理干预，专门负责研究战略问题，超脱于国家计委之外。后来，经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小计委接替国家计委的工作，开始拟定新的“三五”计划。3月12日，周恩来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三五”计划设想时指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要立足于打仗，抢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特别是国防建设，但仍然要重视发展农业，加快建设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基础工业，猛攻科学技术关。6月16日，周恩来和余秋里一起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新起草的“三五”计划设想，毛泽东指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搞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他还强调：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小一点，慢一点能达到。工业布局不能分散了。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研究了“三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和主要生产指标。7月22日至26日，余秋里和小计委负责人向周恩来汇报调整和修改后的“三五”计划设想和1966年年度计划。“三五”计划设想提出：必须争取时间，在大小三线把国防工业的基地、原料、材料、燃料、动力、机械工业的基地，以及交通运输系统建立起来，改变我国现有的工业布局，使三线成为坚实的战略大后方。接着，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分别向各大区征求意见。又经过几次修改后，9月14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简称《汇报提纲》）。9月18日至10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共分十个问题，首先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汇报提纲》还特别指出，三线建设“是关系着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全局、关系国家安危、关系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战略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汇报提纲》提出的“三五”期间基本建设的投资总规模为850亿元，每年递增7%左右。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约为2 700亿~2 750亿元，比1965年增长55%~58%，平均每年递增9%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约为700亿~750亿元，比1965年增长26%~35%，平均每年递增5%~6%；工业总产

值约为2 000亿元，比1965年增长69%，平均每年递增11%。[3]1970年粮食产量要达到4 400～4 800亿斤，棉花4 400～4 800万担，钢1 600万吨，原煤2.8～2.9亿吨，原油1 850万吨，职工平均工资水平1970年达到737元，5年提高12%，农民总收入5年提高35.7%。基本建设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共2 000个左右；投资按部门分，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共628亿，比例占74%；农业120亿，由原来的20%下降为14.1%；轻工业37.5亿，占4.4%。按地区分，三线建设总投资为360亿元，占42.4%。[4]《汇报提纲》改变了《初步设想》中的指导思想，由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加强国防战备建设，安排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三线地区的攀枝花、酒泉钢铁工业基地，成昆、湘黔铁路，在《汇报提纲》都是重点建设项目，要求在1970年以前基本建成。原定1972年建成的国防工业体系提前到1970年，而原定的4.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目标被留置到"四五"计划考虑。[5]9月18日至10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在《汇报提纲》中的计划安排。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三五"计划。但是由于"三五"是在3年调整的良好基础上执行的，加上计划规定的指标留有较大的余地，到1970年，计划主要指标基本上完成和超额完成。"三线"建设步子过急，给整个经济协调发展带来影响，造成很大浪费和后遗症。"三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95%，最高年25.7%，最低年-9.6%；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6%，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7%。

"三五"计划的编制历经1年多的时间，指导思想也随着形势的发展由解决吃穿用转变为以备战为中心。在经历了"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国民经济通过调整又出现好转的情况下，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备战、备荒、为人民，不要搞得太紧张，这也给即将兴起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安了一个限制阀门。"三五"计划各项指标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保证了预定任务的基本完成。同时，"三五"计划为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其指导思想一直影响到"四五"计划。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71页。



②李晨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2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5页。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46~1247页。

④⑤陈东林：《“三五”计划的编制与变异》，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参考文献：

[1] 从进，《1949-1989年的中国 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 张静如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3] 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三版。

[4] 中国网，第三个五年计划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jj/2008-12/10/content_16925492.htm

西藏自治区成立

1965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它是我国第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从 1951 年和平解放到自治区成立，历经 14 年多的时间，西藏终于迈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1951 年 5 月 23 日，西藏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于改革西藏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当时中央表示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1954 年 9 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起赴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毛主席在会后会见他们时建议成立西藏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提出趁西藏的两位领袖（指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和大批的高级官员都在北京，可以讨论先成立一个筹备机构，为成立西藏自治区做准备。1955 年 3 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1956 年 2 月，毛泽东在会见在京的藏族人士是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什么时候进行，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下决心，要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庙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时期，一年、两年、三年，要打通思想”①12 月 30 日，周恩来总理在印度访问期间，向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 2 500 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传达了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六年内不改革的决定。

在对待西藏改革的问题上，中共中央一直耐心地等待着西藏上层人士的觉悟。

但是，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却幻想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反对实行民主改



革。他们不断制造局部叛乱，对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进行破坏，企图阻止民主改革。经过1959年的“3·10”叛乱事件，广大农奴和奴隶迅速觉醒。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筹备委员会由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民主改革从此正式开始。6月28日至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决议”指出，西藏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反动的、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只有实行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为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西藏奠定基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顺应西藏人民的愿望，积极推进西藏民主改革。

首先是废除农奴和奴隶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农奴主放给劳动人民的高利贷债务。这项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拥有了人身自由，也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其次，彻底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把农奴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配给农奴和奴隶。据统计，在民主改革中，农奴和奴隶共分得土地280多万亩，人均3.5亩。[②]农奴和奴隶开始成为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主人，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生产和生活的热情。再次，废除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在民主改革中，一方面规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保护人民有当喇嘛、尼姑的自由和喇嘛、尼姑还俗的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不受干涉；另一方面，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封建特权，对寺庙内的公共资金和财产实行民主管理。1961年，西藏民主改革顺利完成，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翻身的农奴和奴隶以高度地热情和负责的精神行使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自治区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很多人通过民主选举开始担任自治区各级领导干部。

为期两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民主改革使西藏在社会形态上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转变为人民民主社会。

民主改革前，西藏社会等级森严，官家（地方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特权，百万农奴和奴隶备受欺压和剥削。民主改革后，西藏全部耕地等生产资料除为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保留小部分，使其自食其力之外，其余没收自参叛领主的土地和由国家赎买自未参叛领主的土地

等生产资料全部无偿分配给了昔日无地的农奴和奴隶。昔日的农奴和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阶级的成员成为社会地位完全平等的国家公民，享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西藏成为生产资料农牧民个体所有的人民民主社会。第二，民主改革使西藏在政治制度上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在民主改革前，西藏地方政府是神权政治和贵族政治的产物，广大农奴完全被排除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农奴和奴隶们依附于农奴主阶级，没有人身安全和最基本人权，当时的西藏完全是一个农奴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专制社会。民主改革后，获得自由身的农奴开始享受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1962 年 8 月 25 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区选举委员会，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决定建立西藏各级选举机构。到 1965 年 8 月，人民选举产生了县、乡两级国家政权，并选出了出席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三，民主改革使西藏宗教从政教合一走向信仰自由。民主改革前，西藏地方政府以弘扬佛法，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维护三大领主对农奴阶级的统治为宗旨。在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统治下，人们没有不信教的自由。全民几乎都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渗透到了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藏传佛教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实力强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是拥有农奴、庄园、牧场和从事经商、放高利贷的经济实体。僧侣人数占西藏人口的十分之一。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分僧官、俗官两大系统，大量僧人担任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职务。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上层僧人参与西藏地方政权日常运作，三大寺在西藏政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③]

民主改革西藏政治与宗教分离，真正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僧人专心学经修行，不得干预社会公共事务。人民拥有信教的权利，也有不信教的权利。最后，民主改革使西藏文化从僵化保守走向繁荣进步。在民主改革前，藏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精神文化领域被深深地打上了藏传佛教的烙印。进入 20 世纪，西藏文化已经失去了其曾经有过的创造活力，政教合一使西藏社会思想变得僵化保守，对新生事物和外来文化持排斥的态度。而民主改革后，马克思主义占据西藏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现代科学思想逐渐融入西藏社会。西藏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都从传统走向现代，西藏文化开始恢复其兼容并包的活力。

1964 年，西藏民主改革已经完成近三年，自治区筹委会作为政权的工作也走上了正轨。不仅成立了各地区的专署，而且各县人民政府以及基层政权也成立了，在平叛武装叛乱和民主改革的工作中，一大批民族干部锻炼成



长起来，成立自治区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一年的全国人代会后，周恩来总理与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两人谈话时说："西藏成立自治区，达赖喇嘛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你们两个掌权了，你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尽快把自治区成立起来，否则人民对你们就会有意见了。"

1965年7月24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8月23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58次会议，讨论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于1965年9月1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相应的议案。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议案，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决议。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76人的代表团于1965年8月29日抵达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受到了拉萨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各族各阶层代表共301人，其中大多数是在平叛、改革中涌现的农牧民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大会共开了9天。8日，大会进行选举，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当时称人民委员会）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协绕顿珠、朗顿·贡嘎旺秋、崔科·顿珠次仁、生钦·洛桑坚赞当选为副主席，37名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洛桑慈诚当选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还选出了日喀则等5个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9月9日，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后胜利闭幕，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热烈祝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社论指出，西藏社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跨越了举个世纪的历程，从封建农奴制社会，经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飞跃，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各族人民从此真正成为西藏的主人。随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也在西藏全面地建立起来。自治区政府领导西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巩固国防，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自治制度，使西藏开始迈入崭新的历史时代。

注释：

①黄光学等：《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②张树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③《50年真相：西藏民主改革与达赖的流亡生涯》http：//r. book118. com/files/article/txtfull/22/22417. txt

参考文献：

[1] 刘国新等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郭德宏等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曲折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新华文摘》2005年第8期 西藏自治区成立始末

http：//www. changsha. cn/newspaper/cswb/B8/t20050831_ 374525. htm

[4] 西藏自治区成立历史 http：//news. qq. com/a/20080321/000022. htm



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的指导下，政治领域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场空前的错误批判也拉开了序幕。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上，修改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他们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在谈到文化问题时，他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此后，毛泽东十分关注文化艺术方面的动态。

1963 年 3 月，文化部提出《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认为戏剧舞台上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鬼戏”，会助长迷信思想。4 月，全国文联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周扬做了《加强文艺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把反对“修正主义”特别是苏联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作为当前的战斗任务。5 月，在江青的支持下，《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批判孟超新编的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诬蔑它们影射攻击共产党，是要向共产党复仇。此后，全国戏剧界开始大批“鬼戏”。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状况很不满意。1963 年 9 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他还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2 月份，在中宣部《文艺情况的汇报》批示中，毛泽东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

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 年 1 月，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 30 多人举行座谈会，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刘少奇也认为，整个文学艺术的阵地，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占压倒优势。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批示是正确的。1964 年 6 月，毛泽东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做了更为严厉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此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的这两个批示，对文艺界的震动很大。其实，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评过于严重了，对文化战线的形势估计是不切实际的。建国后，文艺工作中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是，否定一直以来取得的成绩是不客观的。两个批示下达后，文化部及其直属的文艺单位开始整风。中央成立了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五人小组，负责检查文艺工作中的问题。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生，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都先后受到了批判。同时，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或者并无大错的文学作品，如《李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等，也遭到了无情地批判。批判面不断扩大，一些文艺理论观点也没能幸免。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曾针对创作中题材狭窄、方法简单等问题，提出应该通过人物创作的多样化来反映出现实。然而，他的主张被批判为“中间人物论”，他还被扣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在党的文艺领域的代言人的帽子，赵树理、李准、周立波、马烽等优秀作家也受到迫害。

1964 年下半年以后，文艺界的批判运动迅速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

在哲学界，主要是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原是中央党校校长，1959 年前后，由于他对“大跃进”运动中一些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结果庐山会议后，中央党校党委对他开展了 8 个月的斗争。直到他被迫写了认罪书，才由康生批准停止批判，职务也降为副校长。经过长期的教学和研究，杨献珍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这一



说法，可以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达。所以他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①]1964年4月，杨献珍在给学生讲课时提到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他说，要弄清楚对立面的统一，就要理解“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显然，他认为二者都是对立统一的表达方法。“一分为二”是毛泽东最早在讲对立统一规律时提出来的。对于杨献珍的观点，在哲学界，有的人肯定，有的人否定。这本来属于学术界正常的探讨范围，然而，由于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破裂，国内阶级斗争激烈时期，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是辩证法，而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则被认为是搞修正主义，鼓吹“阶级调和”。《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的观点。1965年3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向中央做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罗列了杨献珍的“十大罪状”，杨献珍因此被撤销中央党校校长、校委委员的职务。“文革”期间，杨献珍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同时，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哲学家冯定也受到批判。他写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平凡的真理》，用通俗易懂的方法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是《红旗》杂志却断章取义，诬蔑冯定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宣传修正主义，“帮助资产阶级毒害青年”。接下来的几个月，从中央到地方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文革”中，冯定被扣上“黑理论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受到批判。

1964年下半年，经济学家孙冶方也受到了错误批判。1954年，孙冶方从上海调到北京，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57年后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代理所长和所长。在平时的工作中，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过长期考察和研究，孙冶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我国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了很深刻的理解，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提高经济效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要注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反对把“商品经济”、“资本”、“利润”“价值”等视为“资本主义观念”和“资产阶级观点”。[②]对于5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绝对平均、吃大锅饭等现象，他持批评的态度。他还主张在统一计划下扩大企业的权限，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由于这些理论和主张与当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相冲突，所以他遭到教条主义者的攻击。1961年，当中国理论界大肆批判价值规律、利润、奖金等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时，孙冶方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写了几份研究报告，经康生转呈给中央。康生对他很不满意。1962年，陈伯达起草了

一份关于财经工作的报告草案。孙冶方后来针对这个报告草案写了一份书面意见，对该草案提出了一些意见，引起了陈伯达的记恨。1964年秋，在全国批资、批修的斗争中，孙冶方的理论观点也遭到批判。康生、陈伯达诬蔑他写的研究报告是在宣传“利润挂帅”，提倡资本主义，判定他是“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者”，组织对他进行批判。尽管受到几十次的批判，但孙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不肯认输。后来，他被撤销职务，下放到农村劳动。“文革”期间，他被捕入狱，受尽了折磨。

在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史学观点也受到了批判。1961年，翦伯赞先后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对1958年以后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一些片面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主张研究历史不但要重视阶级的观点，还要从实际出发，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合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结论，不能片面强调“以史代论”。对于农民战争、历史人物的评价，翦伯赞也有独特的见解。但是，他的正确意见却遭到了批判。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1966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文章中把翦伯赞的学术观点当做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的表现加以批判，说他鼓吹阶级调和，宣扬唯心史观，是“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翦伯赞还被剥夺了发言权，无法为自己辩护。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陈伯达利用他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诬蔑翦伯赞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反共老手”、“蒋介石的走卒”，在精神和肉体上折磨他。1968年12月18日，他和夫人一起含冤离世。[③]

不仅文艺界、经济界、史学界受到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再次否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正确认识，知识分子又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毛泽东在很多场合强调，现在学校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人员，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的文化界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1964年9月11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高等学校文科要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知认为，当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不少单位的领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他们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必须

 

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4]此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文化部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阶级斗争成为一门主课”。许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贡献的教育工作者、科技人员和文化工作者被扣上了种种政治罪名，遭到不应有的错误批判。在1966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在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毛泽东说：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思想文化领域的错误批判，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热爱、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左”倾错误在意识形态领域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注释：

①丛进著：《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2页。

②③④戴知贤：《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曲折探索1956—1966》，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第513页，第514页。

参考文献：

［1］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三版。

［2］从进著，《1949-1989年的中国 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朱阳，任永祥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张静如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成就和经验教训

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这十年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党和国家的工作曾遭受严重的挫折。但是由于有建国后前七年的较好基础，加上八大一次会议后最初的一年多坚持执行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顶住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仍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首先从经济上看，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按当年价格，1965年我国社会总产值达到2 695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 38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1956年增长60.3%和34.8%。以“一五”计划期末的1957年为基数，在1958年到1965年的八年中，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额达1 627.98亿元，投产大中型项目936个。1965年同1957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钢增长1.29倍，达到1 223万吨；原煤增长77.1%，达到2.32亿吨；发电量增长2.5倍，达到676亿千瓦小时；原油增长6.75倍，达到1 131万吨；天然气增长14.71倍，达到11亿立方米；水泥增长1.38倍，达到1 634万吨。主要农业产品中，棉花增长27.93%，达到4 195.5万担。[①]

在工业方面成就尤其显著。十年中，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了。除了鞍山钢铁基地外，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和一大批中型钢铁基地也建立起来。在机械工业方面，形成了冶金、采矿、石化、电站等工业设备制造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我国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以上。一些新兴的工业，如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精密仪表制造业，从无到有，填补了我国工业的空白，为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支



持。1965年，中国已经能生产雷达、广播电视发射设备、电视中心设备、无线电通讯设备、原子射线仪、各种气象仪、水声设备、电子计算机、电视机等。特别是石油工业发展迅速。1959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东北松嫩平原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迅速建设起大庆油田。一年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总产量的2/3。在石油地质理论、油田开发和炼油工艺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随后，还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②]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全部能够自给，终于使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

同时，工业布局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内地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生产力的地区配置有了重大改变。从1958年到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近8 000公里，绝大部分修建在内地。鹰厦、包兰、兰新、兰青、川黔、贵昆等线的建成，以及成昆、襄渝、湘黔等线的修建，为沟通内地、沿海和边疆之间的联系奠定了基础。全国除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铁路货运量1965年比1957年增加50.67%，客运量增加了50.94%。[③]

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从1958年开始，国家在水利建设上共投资137.9亿元，大中型施工项目290多个，除了继续治理淮河外，还开始治理黄河、海河、长江部分支流及珠江、辽河等，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大中型拖拉机增长5.4倍，联合收割机增长3.6倍，农业载重汽车增长1.9倍。[④]水浇地面积增加2 600多万亩，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57年的2.4%提高到1965年的15%。在耕地面积减少1.33亿亩的情况下，1966年的粮食产量仍达到4 280亿斤，比1956年增长18%；棉花产量达到4 374万担，比1956年增长61%；甘蔗、甜菜、烤烟等经济作物也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⑤]

科教文体卫生方面的成就也很显著。科学研究水平和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工农业生产、医疗技术以及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发现了大庆油田及其他矿产资源。在医学方面，成功地解决了对重度烧伤病员的治疗问题。1961年我国成功的研造出1.2万吨水压机，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能制造此类大型锻压机械的国家。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

了第一颗原子弹，从此我国跨入了核国家的行列。1965 年还成功的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这是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的成就也很可观。十年中，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达 139.2 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累计达 199.1 万人，分别为 1950 年到 1956 年的 4.9 倍和 2.2 倍。业余的高等学校毕业生 8.85 万人。业余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62.56 万人。[⑥]经过调整，教育质量有所提高，科学技术队伍显著壮大。1957 年到 1963 年，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由 120 多万人增加到 230 多万人。医疗卫生条件也有所改善，1957 年至 1965 年，全国卫生机构由 122 954 个增加到 224 266 个，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由 0.46 张增加到 1.06 张，每千人拥有医生数由 0.85 人增加到 1.05 人。[⑦]在这个十年中培养起来的一大批专门人才，他们在祖国的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经受了实践的锻炼，大部分人在后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以及经济、教育、科技、文艺、体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骨干力量。

政治建设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政党建设。1957 年中共中央在全党进行了一次以反官僚主义为重点的整风运动。1956 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面对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决定改进党的作风，开展整风运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此次整风采取开门整风、“内外夹击”的方式，号召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并且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了广泛地吸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先后举行了 13 次座谈会，对党的工作和国家政治生活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上海、广州、兰州、沈阳等九大城市邀请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也举行座谈会，对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法制和制度建设以及现行工商业政策的制定等问题，诚恳地发表了意见。与此同时，各级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都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认真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批评或建设性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是以切实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



整风运动的初期，由于党能够正确对待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使这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党的工作作风，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

第二方面是关于少数民族的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根据国内历史情况和民族关系制定了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壮、瑶、苗、侗等11个主要的少数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当时广西人口总数的36%。他们聚居在50个县、市，占广西总面积的60%。1949年12月，广西全境解放后，广西各族人民和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一起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积极开展剿匪反霸斗争，肃清了广西境内的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接着，广西有开展了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翻身成为社会的主人。1958年3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对于巩固国家统一，保卫边疆安全，发挥广西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1956年，当时全国回族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110多万）聚居在甘肃省。建立回族自治区不仅是回族干部和群众所关系的问题，而且，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在甘肃省东北部回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建立一个省级的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经过多年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党和政府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下，根据少数民族的意愿，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或土地改革，使少数民族地区在废除了剥削制度和消灭了阶级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巩固了国家政权，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

从万隆会议到60年代中期，我国在外交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万隆会议后，周恩来总理不辞劳苦地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友好访问，为增进中国与亚非欧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做出了不懈地努力。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2月5日，周恩来访问了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今斯里兰卡）8个亚洲国家和苏联、波兰、匈牙利欧洲三国。1960年4月至6月，在外交环境恶化的境况下，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又访问了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和蒙古6国，并与缅甸、尼泊尔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成功地解

决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1963 年 12 月 13 日至 1964 年 3 月 1 日，周恩来总理利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访问了亚非欧 14 个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末，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经历民族解放运动取得独立。周总理的非洲之行，加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与团结，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这是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认真执行 1957 年 7 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阐述的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和方针（即实事求是的区别对待各种不同情况、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结果，这大大改善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正确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在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同时，还努力加强对第二个中间地带西欧、大洋洲和日本的工作。在此期间，中日民间交往密切，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改善，为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1964 年中法正式建交。这一重大举措，推动了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对日后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重大失误，加上国际形势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十年的建设也遭到了严重挫折。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求成和急于过渡，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1959 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及其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中断了经济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作出错误的判断，并在随后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了过火的错误批判，致使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左”倾错误日益严重。经济方面的损失十分严重。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的头三年，企图以高速度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奇迹，发动“大跃进”运动，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 1957 年的 6.1% 上升到 1958 年的 32.6%，但是这种脱离实际可能、人为加快的超高速度很快就因难以维系而回落，1959 年下降为 18%，1960 年又下降至 4.7%，1961、1962 年竟成大幅度负增长。整个“二五”计划时期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人的年平均增长率都是负增长。经济的发展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加快，反而遭受了严重损失。[8]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遭受了不小的挫折，



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第一，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放在切实可行的留有充分余地的基础上。

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迫切希望能尽快地使我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把国家建成现代化的强国。但是，经济发展速度不是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粮食和原料，工业能够提供多少产品，有多少资金，有多少人才等等。如果不看条件，主观地要求一个高速度，就会欲速则不达。所以，必须从国情出发，不能不切实际的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第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1958年，由于过分夸大了改革生产关系的作用，在高级社还没有站稳脚跟，就急忙向人民公社过渡，由于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倒退。实践证明，违反客观规律，就要受惩罚。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客观真理。第三，要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地增长，必须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要使经济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按比例安排各个产业的比重。比例失调不但保不住高速度，而且会被迫下降。最后，必须注意处理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在安排国家计划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保障人民生活，使人民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有所改善。在这个前提下，把余下来的力量用来安排基本建设。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也是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必要条件。三年“大跃进”中，片面地强调经济建设，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建设不是快了而是慢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注释：

①②童昌平：《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③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18页。

④刘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二卷1957—1965》，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⑤童昌平：《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⑥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714页。

⑦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796、797页。

⑧童昌平：《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童昌平：《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柳随年、吴群敢主编：《“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1958—196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4］刘国新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 1956—1966》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何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

［6］刘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二卷1957--1965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7］吴保平：《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浅析及其评价》，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论文，2007年5月。

［8］张静如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第二卷，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